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考古学前沿研究： 理论与问题

陈淳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考古学前沿研究： 理论与问题

陈淳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 陈淳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3-20186-0

I. ①考… II. ①陈… III. ①考古学—研究 IV. K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7300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KAOGUXUE QIANYAN YANJIU: LILUN YU WENTI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插 页：3

印 张：41.75

字 数：623 千字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齐 琳 王一夫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肖 辉 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已审阅

子居 17-12-05, 19:0



作者简介

陈淳 1948年生，浙江奉化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博士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研究领域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考古学理论、农业起源研究、文明与国家探源。著有《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考古学理论》《当代考古学》《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考古学研究入门》《远古人类》；译作有《手》《骗局、神话与奥秘》《欧洲文明的曙光》《考古学思想史》《时间与传统》《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和《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3月

序言

考古学是在 20 世纪初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当时被国学用来作为疑古辨伪，解决我国上古史争议的手段。受国学倡导的“二重证据法”的影响，考古材料一直被看作是重建历史的重要工具，是验证文献和补充史料的途径。于是，考古学和历史学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车的两轮或鸟的两翼，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但是，考古学被视为历史学的分支，为历史学提供地下之材的学科，限制了这门学科在了解人类历史上的潜力。

目前，考古学在我国已经上升为一级学科，这说明我国学界取得了共识，即虽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目的相似，但是它并非后者的附庸，而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独立学科。但是，由于受传统国学的影响，以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国际学界缺乏交流，我国这门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和国际学界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表现为：发掘研究往往比较盲目，为发掘而发掘，而且研究报告局限于材料分类描述，并不能提供其他学科所期盼的各种历史信息。再者，由于重材料轻理论的传统，考古学的田野实践往往以重大发现为鹄的，而许多抢救性发掘则成为一种照章办事的操作，不仅浪费社会经济与人力资源，而且浪费地下文物这类不可再生的宝贵遗产。

国际考古学研究有三大重要基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这些战略性研究是无法单靠材料积累就能做到的，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且要了解它们起源的原因和过程。这类重大课题的探索，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社会变迁的动力和因果关系。因此，理论先行和问题意识成为考古学探索的关键所在。

然而，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则评论说，中国考古学家体会不到理论与范式的作用，他们把理论看作是天国里的泼阿斯所为，是某种空洞的胡诌。结果，中国人的考古报

告是因循守旧的典范，是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东西。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也说，中国对考古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不像西方那样活跃。然而，重建、理解和解释我们人类早期历史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极富挑战性的心智上的努力。因此，如要提高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水准，要使这门学科的成果跻身国际学术之林，就必须认识到理论思维和问题意识的意义和重要性。

本文集是 21 世纪初以来发表的论文的集锦，意在强调考古学研究中理论和问题的重要性。总体来说，无论是工作在第一线的考古学家，还是高校考古专业的学生，受训的背景主要还是比较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即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方法，研究目的主要集中于构建年表和文化关系。这种传统训练缺乏理论思维和科学方法，如实证检验和逻辑推理等训练，因此难以用透物见人的严谨步骤来重建人类行为和社会变迁的过程。

科林·伦福儒说，经历了大概 40 年，我们这些考古学者，尤其是英、美的考古学者，才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本研究正是意在向国人传递观念创新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和发展首先应该从观念入手，解放思想，努力创新。

本文集以讨论主题的不同，分为五个部分。立足于国际考古学界公认的三个基石来昭示理论先行和问题意识的重要作用，讨论考古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介绍旧石器时代研究的新进展、人类起源研究、农业起源、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等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以求将国际学界流行的理论方法与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实践相结合。

要提高考古学的研究水平，必须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检视我们学科的思维模式。认识论就是对我们如何来认识研究对象的讨论，其中涉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具体与抽象认识的关系、一般性研究和特殊性研究的关系等。这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考古学不仅意在重建历史，还有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重任。我国学者觉得理论指导是先入为主，偏好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认为考古学是用材料说话的学科，很少意识到研究

者习得知识的局限性和主观判断的选择性仍然在材料收集和分析中发挥着很大作用。虽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密切，但是历史科学的概念应该突破文献学的范畴，延伸到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领域。就考古学在西方的发展而言，无论是对考古遗存的鉴定、人类行为的解读还是对社会结构的重建，民族学类比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科技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高新科技手段的应用和信息提炼，有时对考古学重建历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科交叉已经成为考古研究中最活跃、最具突破性和成果最为丰硕的方面。这种多学科途径可以超越传统及单学科方法的局限，从不同物质遗存、特别是隐性材料来提炼各种信息。科技手段的应用以及这种学科交叉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面对这样的趋势，理论探索和问题导向对于采用何种方法、需要采集哪些材料的针对性探索显得越来越重要。

旧石器时代研究的部分讨论了国际上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对人类进化过程的新认识。线粒体 DNA 的发现为现代人起源提供了颠覆性的认识，这就是“夏娃理论”和走出非洲的进化模式。而我国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学界还是倾向于强调独立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对于这一问题，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应该用自己的发现来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检验。本文集还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国际上旧石器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并在纪念丁村遗址发掘 60 周年之际，参照国际学科发展的背景，对我国旧石器研究范式的更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于农业起源方面的问题，文集介绍了国际上农业起源理论和主要概念的应用及研究实践的进展，利用环境考古与植物考古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对我国稻作起源以及稻作农业与社会复杂化关系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文明与早期国家的探源问题涉及该领域的方方面面。首先对美国社会人类学新进化论中的酋邦概念进行了梳理和讨论，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以及夏文化问题，还有安阳小屯的发掘和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讨论。对目前我国重建上古史的现状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当代科学考古学的精髓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考古学最大的优势也正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

层次来全面分析人类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变迁，并梳理各种对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或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不同作用。“疑”和“思”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从学科范式的变更上来说，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本文集还讨论了聚落考古在文明探源中的作用和潜力，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根据人类栖居形态的特点和变化来观察社会结构的特点与演变的轨迹。在学术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学界也开始超越文献，尝试从区域聚落形态观察社会复杂化进程，用世界系统理论探究区域政体的互动。在得天独厚的文献研究帮助下，考古学研究可以做得更好。文明探源是一项跨学科、全方位的探索工程，需要中外学界之间、不同学科之间持续保持互动，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促成从专业向通业的转变。

就后过程考古学的探索而言，本文集回顾了美国性别考古学的兴起、发展和主要研究方法，以重新评估男女两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作用和深入探讨古代社会结构的变迁。本文集还将性别研究的理论方法用于我国考古学的实践，分析了良渚反山遗址墓葬中女性的葬俗和随葬品，为我国的性别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文集还通过三星堆青铜树与民族学中萨满树图案的相似性比较，提出了青铜树就是萨满用来通天和与神灵沟通的工具，为这类考古遗存的意识形态解读提供了一种与依赖文献记载不同的视角。至于考古学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本文集以玛雅、复活节岛和良渚文明崩溃为镜鉴，解释了古代文明崩溃的“报酬递减”和“最省力”机制，然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趋势表示了忧虑。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对当代工业文明的人口激增、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提倡“知足最好”，避免重蹈古代文明崩溃的覆辙。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本研究以国际文物保护的视野，汲取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针对文化遗产保护中普遍存在的发展和保护的矛盾、保护和研究的关系，以及立法、操作和公众教育等问题，结合中国的现状作了比较和探讨。文集认为，健全法制和加强公众教育是完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

本文集可以被看作是《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一书的续集或姐妹篇，后者在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下于2003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2004年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并被《中

《国文物报》评选为 2004 年最佳文博学术论著，2014 年又入选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庆祝成立 25 周年的精选丛书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够继续为考古学这门学科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集的出版首先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以及相关评审专家的支持、肯定和宝贵意见。其次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先生的鼓励和推荐，没有他的建议，正在忙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翻译工作的我可能无暇顾及成果文库项目的申请。还要感谢《历史研究》《复旦学报》《文史哲》《中国学术》《东南文化》《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南方文物》《四川文物》等专业杂志相关编辑对入选论文在修改和成稿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同时要感谢文集中参与合作的同人及在材料收集、整理和内容撰写中为这些论文付出辛劳的各位学生，他们是安家瑗、郑建明、陈虹、龚辛、潘艳、谢银玲、魏敏、殷敏、孔德贞、韩进等。最后要感谢帮助我统一体例和注释格式及添加参考文献和索引的两位研究生任晓莹和张萌，没有她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文集整理和统稿的任务。

陈 淳

2015 年 10 月 15 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认识论与方法论

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 (3)

考古研究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16)

谈考古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译后记 (27)

考古学认识论的思考 (36)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54)

作为历史科学的考古学 (76)

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 (90)

谈考古科技与科学考古学 (107)

考古学文化功能研究的战略性起点

——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译介 (121)

第二部分 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 (139)

小南海石制品再研究 (162)

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184)

丁村遗址六十年与旧石器考古范式的变迁 (203)

第三部分 农业起源研究

再读跨湖桥 (227)

马家浜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48)

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268)

农业起源与“广谱革命”理论的变迁 (278)

农业起源研究的实践与理论 (296)

第四部分 文明与国家探源

酋邦与中国早期国家探源 (331)

环太湖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比较研究 (350)

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 (368)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387)

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 (409)

安阳小屯发掘的回顾与思考
——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 (423)

聚落考古与城市起源研究 (456)

早期文明的标准与阐释 (477)

从“专业”到“通业”：当今文明探源的
理论、方法与实践 (492)

探究早期文明社会的世界观 (519)

第五部分 后过程考古及其他

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 (537)

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观察 (554)

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 (567)

考古学与未来：工业文明的忧虑	(579)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视野	(596)
参考文献	(610)
索 引	(639)

CONTENTS

Part I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first of all is a history of idea and perception	3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6
On general and particular studies in archaeology	27
Thinking epistemology in archaeology	36
Paradigmatic change and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in archaeology	54
Archaeology as a historical science	76
Contribution of ethnography to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90
On archaeological science and scientific archaeology	107
A strategic starting point for the functional study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121

Part II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New advances in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139
Restudy of the Xiaonanzhai lithic industry	162
Questions and consideration of Early Man and their cultures in China ...	184
Sixty years of excavations at the Dingcun sites and paradigmatic change of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203

Part III Study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The Kuahuqiao site revisited	227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f the Majiabang culture	248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paddy agriculture	268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and theoretical change of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278
The study of agricultural origin and its practice and theory	296

Part IV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Early States

Chiefdom and the origin of early state in China	331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circum-Lake Tai and the Ningbo-Shaoxing regions in prehistory	350
Erlitou, Xia dynasty and the study of early states in China	368
Doubt of the Old,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387
Models of social evolution and social nature of the early states in China	409
Retrospect and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of Xiaotun, Anyang	423
Settlement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	456
Criteria and explanation of early civilizations	477
From specialty to holistic study: current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in the exploration of civilizations	492
Exploring the world view in early civilizations	519

Part V 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 and Others

Gender archaeology in the US and its implication	537
Gender archaeology and a social study of Jade <i>Huang</i>	554
Symbolic analysis of the bronze trees from the Sanxingdui site	567
Archaeology and future: anxiousnes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579
A global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596
Bibliography	610
Index	639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第一部分

认识论与方法论

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说过，经历了大概四十年，我们这些考古学者，尤其是英美的考古学者，才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①。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也是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在1989年出版后大受学界重视的原因。该书第一版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被欧美大学列为考古学、人类学和艺术史专业必读的参考书，足见其在学界的影响力。

《思想史》在2006年重版，与第一版相比，篇幅和内容都有了面目一新的变化和扩充。两相比较，其篇幅从第一版的500页增加到710页，所引的文献篇幅从47页增加到97页。在第一版出版后，欧美学界对考古学史的兴趣日益高涨，相关的出版物激增。此外，在第一版问世后的十几年里，世界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变化巨大。后现代思潮给考古学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特里格在第二版前言中指出，正是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背景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使得《思想史》第二版的修订显得十分必要。特里格说，第二版

^① 科林·伦福儒：《序》，见杨建华著《外国考古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不仅审视了第一版出版之后考古学理论重大发展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对第一版中的不足进行了修订，努力提供一种更为平衡和客观的原创见解。他说，虽然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撰写的，但是全书的内容从头到尾进行了重写，几乎没有一处句子完全相同。大量增补的新资料和新见解，使得这本经典更显时代光彩。

和第一版一样，《思想史》追溯的脉络基本上是根据欧美考古学发展的轨迹，但是在第二版中对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发展特点也基于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包括中国考古学。特里格除了将中国考古学的性质列为民族主义考古学，将方法列为文化历史考古学之外，并没有做太多的评论。这一方面固然和作者无法阅读中文第一手资料有关，也和中国考古学与欧美考古学相比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地位有关。中国考古学除了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引起世界瞩目之外，其研究水准并没有跻身世界主流。因此，尽管中国是一个文物考古大国，但是由于长期的学术封闭，世界考古学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主流似乎与中国无关。

阅读《思想史》不仅可以了解人类了解自己历史的过程，也可以深刻体会到人类自身观念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制约和推动。这门学科酝酿和发展的过程充满了宗教信仰的钳制、文艺复兴的洗礼、启蒙运动的熏陶、进化论思想的引导、种族主义思潮的逆流、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以及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碰撞。这一跌宕起伏的思想发展过程，与世界各地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积累过程一起构成了波澜壮阔的考古学发展史。读完这本《思想史》，使人深刻认识到，我们从考古发现探索过去，发现和材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观察和研究这些材料。这种探索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那一时代考古学家认知能力密切相关。下面是本人在阅读《思想史》第二版后，对这个问题的粗浅体会。

一、考古学与历史

我们一般认为，考古学的前身是古物学和金石学。但是特里格指出，对古物的兴趣并不一定导致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考古学是在与古物无关的对过去的兴趣上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对于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是由神话和各种创世传说来编造的。因此，神话传说的基本宗教信仰要远远早于考古学的探索。

科学考古学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是古物学。然而，早期古物学只限于对文物本身美学的欣赏和收藏的爱好，未必与研究人类的历史相关。而且，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圣经对人类的历史有一种权威的解释，因此探讨这些遗迹和古物的来历既无必要，而且也会招致麻烦。宗教的教义使人们普遍认为：(1)世界的年龄十分年轻，最多不过6 000年；(2)世界处于持续的退化过程中，这是上帝创世后的必然趋势；(3)人类被认为是由上帝在中东伊甸园中创造的，从那里人类逐渐扩散到全世界；(4)人类的智慧源自上帝，那些离开圣地而无法持续受到教义智慧灌输的人类，在各方面都处于持续的退化和堕落过程中；(5)世界历史由上帝所安排，世间的万物以固定和循环的方式延续。

宗教思想对考古学最大的影响是人类的史前史。在圣经对人类历史纪年描述的影响下，欧洲的古生物学用灾变论来解释地层中各种绝灭动物的存在，并否认与一些绝灭动物共生的石器是人工所为。自16世纪开始，就有许多人对出土的史前石器做出种种推测，认为它们早于上帝创世的年代。结果，这些著作遭到焚毁，作者向教皇公开认错。即便在大航海时代，航海家从世界其他大陆发现了处于石器时代的土著，有人开始将欧洲的石器与这些土著的工具有联系到一起。但是受圣经教义的影响，人们还是从智慧退化来进行解释，认为这些土著是因为远离上帝而堕落到只会使用石器的地步。

一直要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认真考虑石器可能是早于金属的人类工具。但真正要从石器和文物来认识人类的历史，一方面要到达尔文进化论为人类历史提供一个比圣纪年长得多的进化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有赖于一种用来判断文物早晚的断代方法。

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除了圣经为人类历史提供了可信的纪年之外，其他有关人类过去的知识只能来自文献。早在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古物学”是指专门研究修道院中的藏书，学者们特别注重对历史、法律、文学方面拉丁文文献的收集与研读。到了15世纪，学者们对古希腊文献有了更多的关注。古典古物学发现了意大利和古希腊光辉历史的详细信息，这些历史信息是圣经记载中所没有的。即便是埃及学和亚述学研究，最初也是由希伯来文中所记载的神秘文明所激发。一直到17世纪，由于从文献来研究历史的途径越走越窄，于是有些学者从典籍开始转向收集与过去有关的物质材料。

但是，这种研究的地位远不如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显赫。直到 19 世纪末，古典考古学家、雅典不列颠学派的掌门人 D. G. 霍加斯仍然坚信，有文献说明的考古学要优于没有文献帮助的考古学。这使得大部分考古学家不得不认为，他们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只是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特里格指出，古典考古学、埃及学和亚述学一旦确立，就显示了一种很强的抵制变革的倾向。这些领域的考古学家主要关注将文物和纪念建筑的调查与古典文献记载相结合，将自己发现的材料供其他学科学者研究，这使得古典考古学与铭刻学、古文献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等学科相比处于一种次等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发生改观。

中国具有非常发达的编年史学传统，一方面使得中国的金石学的发展一直处于编著佚书和订正史籍的地位。即便到了清代金石学的范围从金文和碑刻扩大为古器物学，但是仍然与“锄头考古学”的探索相去甚远，没有能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特里格指出，虽然这些古物学家为考古学在现代中国的本土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他们在发现材料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金石学研究只是整个编年史学的一个分支，并没有像欧洲古典学、埃及学和亚述学那样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物学家虽然很重视古物，但是他们很忌讳自己动手发掘古墓来获取材料。

另一方面，史学的至尊地位使得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便处于从属的地位。梁启超的二重证据法便体现了中国早期学界对考古学的价值期望和学术定位，并至今仍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比如，有资深学者认为，与历史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鲜明特色，这与西方考古研究与艺术史、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极不相同。并指出考古发现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有字的，有字的一类负载的信息更丰富^①。还有不少学者仍然坚持，考古学是和文献学连在一起的，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材料来说明才有价值^②。

我们现在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不到整个人类史的 1%。史前考古学已经将人类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延伸至 300 万年以前。而且，恰

① 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张京华：《20 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第 1 期。

如柴尔德所言，物质遗存与文字一样信息丰富而且可靠。即使在有断续文字记载的阶段也需要考古证据来阐明经济、人口和技术问题。他说，英格兰土地记录不仅能通过对村落遗址的发掘来验证，还能对其加以补充。单凭考古学证据，就可说明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已经开始使用水动力，这一点是研究古书和碑铭的人所想不到的。奥林索斯的发掘要比所有文献和碑刻研究能让我们更可靠地估算第五世纪希腊城市的人口^①。

人类对自己历史的了解从对圣经教义的信从，到对文献的依赖，最后到从文化遗存中独立提炼信息，反映了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轨迹。考古学的这一发展并非是材料积累的结果，而是观念进步和在分析方法日益精进的条件实现的。

二、考古学与社会

考古学的发展也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对考古材料的阐述也会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取向和社会价值观，并影响到考古学的实践与发展。

标志考古学诞生的三期论就是在丹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19世纪初，英法联军摧毁了哥本哈根港口的丹麦海军主力，外来的侵略和民族灾难激发了丹麦人民的民族团结精神，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来激励民众的团结和斗志。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仿效法国革命后成立的巴黎文物博物馆，建议成立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以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用文物来展示丹麦的历史，汤姆森受命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分类和陈列。他首先从年代学方法入手，根据石、铜、铁这个技术发展的框架确立了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将丹麦的整个史前史梳理出一个大概的年代学序列。汤姆森的三期论被誉为“史前学的基础”和“现代考古学的柱石”^②。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19世纪的社会和科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主宰这一时代思想的主流。所以，达尔文的学说既是生物进化的学说，又是哲学思想的证明。但始料未及的是，这一理论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中

^① 柴尔德：《告别辞》，见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的延伸，却成为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种族灭绝和殖民活动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支柱。英国博物学家卢伯克深信文化的直线进化观，是自然选择导致了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他认为，现代欧洲人是文化与生物学强势进化的产物，落后的民族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智力和生物学特征上都劣于进步的民族。

这种种族主义进化观认为，原始的民族或群体注定要随着文明的扩张而消亡。于是其被先进民族所取代也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这是人类群体改善和进步的必由之路。达尔文进化理论经过卢伯克的发挥，将人种优劣论和史前考古学联系在一起，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世界观的一部分，并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学研究中影响到对考古材料的解释。

在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的考古工作普遍存在一种排斥从文化演变角度来观察考古现象的习惯。学者与普通民众都认为，美洲土著文化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可以排除它们在历史上发生过任何变化的可能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美国中西部地区土墩的解释，引起了一场“土墩建造者”的争论，大部分人认为印第安土著不可能有如此先进的文化遗存，因为他们不可能拥有建造这些古建筑的智力。他们认为，这些土墩是由来自墨西哥的托尔特克人、亚洲前往墨西哥的印度人、威尔士人、流亡的以色列人，甚至北欧海盗所为。19世纪末，美国考古学家塞勒斯·托马斯对这些土墩进行调查。经过10年的考察和发掘，得出了印第安人是土墩建造者的结论，可是这个结论在整体上仍然无法扭转公众对土著人的偏见。

在南非，对土著文化的歧视，从围绕对大津巴布韦石砌建筑的争论反映出来。英国金融家希尔斯·罗德斯为了证明欧洲人对南非进行殖民以及开采金矿的正当性，认为这些遗迹是由腓尼基人所造。1891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赞助下，古物学家西奥多·本特对这些石砌建筑进行研究。他发现这些建筑的年代不过几百年，可能是由当地的班图人所建，但是他最终还是屈服于社会压力，认为它们可能是一批从阿拉伯来到南非的北方人种所建。

1906年，皮特里的学生戴维·迈克弗进过调查认定，这些石砌建筑属于中世纪，并出自非洲土著之手。1929年，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对该遗址进行了更加仔细的考察。经过详尽的地层学和考古发掘，汤普森认定这些建筑为非洲土著班图人所建。但是，这些研究结论被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定居

者所拒绝，殖民者和考古学家之间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冲突。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许多考古学家不得不离开南非。直到 1980 年津巴布韦独立之后，当地的建筑废墟和考古遗存才按照本土的历史来进行重新撰写。

20 世纪初兴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也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使得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文化进化理论受到质疑和挑战。许多受到列强欺凌的欧洲国家，希望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民族的身份与尊严，于是从考古发现来追溯民族来历和特征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东欧，考古学成为生活在俄国及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民族和国家用来强化民族意识的一种手段，并在这些帝国的瓦解和一系列新的国家诞生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而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关键概念“考古学文化”，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的产物。

1909 年，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声称，考古学是各种学科中最具有民族性的学科，研究古代德国人的起源应当是考古学最神圣的目标。早在 1895 年，科西纳就试图追寻日耳曼民族在欧洲的定居过程。他提出“文化群即民族群，文化区即民族区”，因此文化的差异就反映了民族的差异。科西纳声称，在地图上标出的一类器物的分布代表了某一民族群体的分布，而文化的延续反映了民族的延续，于是，考古学就能够根据器物确定的文化单位来追溯民族群体的分布和延续。20 世纪初，科西纳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强调运用考古材料来激励民族主义精神。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后来被纳粹政权所宣扬，他的史前观成为德国纳粹的官方立场，并成为在第三帝国学校中传授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课程的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考古学家有一种政治和社会压力，强调崇拜天皇的神圣地位以增强民族团结使得他们无法发掘和研究某些特定历史阶段，以及与皇室有关的遗址与墓葬。考古学家必须非常小心，避免他们的解释有悖于官方对日本古代史的说法。在 20 世纪 30 年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气氛中，对日本皇室起源产生怀疑的任何研究都是极其危险的，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会有丢掉饭碗和银铛入狱的危险。这种社会压力，使得体质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民族问题三缄其口，而考古学家只进行类型学研究，避免任何有悖于官方解释的文化变迁讨论。

日本战败后，考古学则成为军国主义垮台后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最好手段。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考古发现为他们在政治极为动荡的时期，提供了

一种可以触及和自己历史关联的安定意识和社会凝聚力。新的考古发现帮助日本民众追溯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并重拾民族的自尊心。为此，考古学存在一种努力将日本民族的历史持续推前到绳纹时期之前和旧石器时代的倾向。2000年10月，日本考古界爆出旧石器时代遗址造假丑闻就是这种倾向的结果。被誉为考古“神手”的藤村新一将一批打制石器埋入宫城县上高森遗址距今50多万年的火山灰层下一米处的地层中，根据这一发现，日本学者认为直立人至少在第四纪明德冰期通过出露的陆桥到达了日本。藤村新一造假屡试不爽，并被社会和媒体追捧，这完全迎合了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以后，渴望成为政治大国和文明古国的心态^①。

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考古学对前伊斯兰时期的考古遗存没有什么兴趣。早在20世纪20年代，伊斯兰学者就声称，埃及在泛阿拉伯或泛伊斯兰世界中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自40年代以来，随泛阿拉伯主义影响和伊斯兰运动的逐渐扩大，导致了一种对古埃及灿烂文明日趋敌视的态度。古埃及法老遗产的价值被贬低到仅是旅游资源的地步。而在以色列，考古学的发展十分不同。考古研究被用来确认以色列移民与上帝赋予他们祖先土地之间的关系。以色列考古学并非以宗教考古为导向，但是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推动而被用来增强民族意识以及以色列人与他们领土之间的关系。除了鼓励以色列人将圣经看作是他们的民族历史的渊源之外，考古学家也提倡一种世俗的观点。因此，以色列考古学基本上是一种民族主义考古学而非宗教考古学。其研究具有很大的选择性，主要关注这一地区犹太人定居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对基督教和伊斯兰阶段的考古学则不感兴趣。大部分以色列考古学家是在历史学和圣经研究方面受训的，主要关注史学、语言学和艺术史的研究。今天，以色列考古学在阐释上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划一。它从内部也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视考古发掘是冒犯古希伯来人的极端正统派犹太组织。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和经济的融合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考古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过去那种被用来推动民族认同的做法。但是，欧洲考古学基本上继续在当地、国家和大陆的层次上关注欧洲的历史。

^① 陈淳：《一幕新“皮尔唐人”的骗局》，《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9日。

在许多大学里，史前考古学仍然隶属于历史系，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大部分欧洲人还是认为，考古学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了解人类自身的过去。

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考古学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考古学的名称也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而被批判与废弃，考古研究所改称为物质文化史研究院。汤姆森的技术三期论被废弃，转而提倡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社会发展三期论。器物类型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而否定，考古学研究被要求从考古材料来重建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并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性。虽然苏联考古学的重新导向充满了极左和偏激的举措，但是它在研究方法和材料阐释上开辟了许多全新的领域，如微痕研究、陶器的社会学研究以及聚落形态分析，特别是从社会内部动力来解释文化演变，和当时欧美各国从传播论来解释文化差异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再流行，文化历史考古学重新成为学界偏爱的研究方法，以弥补过去年代学研究的不足。

在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在中国的发展也受到本土社会背景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首先，考古学引入的社会背景是 20 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它提倡科学和民主的理念为现代西方科学体系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西学的流行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价值观产生了重大的转变，传统文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运用近代西方史学思辨方法对中国的上古史所做的无情检讨，批评古代典籍“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性质，动摇了整个古史体系。鉴于旧的偶像被打破，必须有一个新的体系取而代之，然而无论是疑古派还是传统学派都拿不出一部“上古的信史”来，于是中国学术界认识到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这便是考古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疑古思潮最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①。

其次，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经历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历史学一直占据着中国智慧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成为显学，被历代的统治者作为维护自身合法统治的工具，并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学识的必由之路和统治能力的先决条件。虽然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前所

^① 李学勤：《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人文杂志》1997 年第 5 期。

未有的冲击，但是凭借史学在中国学术界的龙头老大地位，外来的考古学过于弱小根本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上在研究目标上的共性，使得考古学自然成为依附于历史学的一种工具。即便是在西方受训的李济，在标志中国考古学处女航的西阴村和殷墟发掘中，明显带有史学的导向。特别是殷墟发掘材料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使得商代的历史成为信史，有力地巩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并最终确立了考古学在中国学界为史学服务的学术定位。

虽然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漫长编年史而使考古学受益匪浅，但是将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一方面，史学导向使得很多考古工作者完全从史籍中寻找研究对象和目标，而且将印证史籍看作是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或将考古学材料简单地与历史文献对号入座，考古学在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方面的研究潜力无形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历史学的价值判断影响，考古学既难以独立发展和更新学科自身的理论方法，也缺乏吸收国际学术最新进展的积极性。这种传统学术观念的束缚，成为中国考古学在引入 80 年后在主要学术概念上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的主要原因^①。

特里格说，和历史学一样，考古学是在复杂、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在这些社会中，对过去演变理解被赋予了现实意义。因此，考古学既不是社会的简单反映，也不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只要人类社会仍然存在民族、阶级和信仰等差别，对考古记录的解释就不会有根本的共识。不同的理论，只要它们不相互排斥，将会成为深入研究的动力^②。

三、考古学与学者

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和探究途径的正当与否。

欧美考古学将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家看作是天真的经验主义者，这就是指凭直觉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做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

^①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布鲁斯·特里格：《世界考古学展望》（沈辛成译），《南方文物》2008 年第 2 期。

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极端经验主义甚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这些人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反对抽象思维，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概念和普遍的学术命题。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指通过逻辑推理而非根据表象来获得真知。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强调超越人类的经验来解释主导自然法则的重要性，标志着科学探索对理性主义的重视。人们意识到，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蒙蔽性。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科学应该超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实证”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哪些主观直觉是可靠的，并强调科学解释必须在对不同现象的观察和对这些现象的归纳之间建立起某种规律。演绎法是实证主义最常用的方法，它强调对主导表象的潜因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来予以检验，以了解事物的本质。虽然欧美考古学很早就认识到主客观因素对考古研究的影响，但是采取明确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则要到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开始。在克服主观性方面，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家认为经验主义研究和归纳法的最大缺点是无法判断解释和结论的对和错，他们要求采用实证方法来消除主观性，为考古材料提供客观和科学的阐释。为了要达到这种严谨的要求，考古学家必须采取自然科学的演绎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以尽量防止偏见的产生，同时要求对考古学家本身的研究能力和诚实性做充分的审视。过程考古学在采取实证方法的同时，也强调研究一般性通则的重要性，明确求助于各种唯物主义决定论来探讨社会演变规律，其中以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怀特的技术决定论，以及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最为流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方面，欧美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重拾对人类行为复杂性、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兴趣，开始

采纳所谓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类意识形态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与过程考古学关注生态环境、经济背景和人口条件不同，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采取象征、结构、认知、性别等途径来研究考古材料。他们认为，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关系中也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能够被用来指导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会影响到社会的变迁。

另一方面，后过程考古学追随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提出的观念论，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认知的影响。科林伍德指出，人类习得概念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发现的材料，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考古学家的认知离不开自己习得的分析概念，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概念以外的现象^①。

这种被称为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思维认为，每代人、不同阶级和个人都会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历史，而且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能使学者评估不同的见解。在历史学方面，他们认为即便是历史资料本身，也是由古代史官和学者根据他们认为什么是值得记录的价值判断而有选择地保留在史籍之中的，这种记录或史料难免掺杂了作者当时的个人利益、社会价值观和历史偏见。在考古学领域中，他们认为，即使考古学随材料的积累和技术方法的提高会减少主观性，但是社会条件仍会影响学者认为哪些材料是重要的，以及如何来解释它们。这些社会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因此，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信念并无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普遍被认为缺乏理性主义的元素，中国的认知哲学向来强调“求实”，而西方则是强调“求真”。这种经验主义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重材料而轻理论，重现象而轻阐释。理性主义的缺失不仅使中国的自然科学难以发展，也严重制约了学者的头脑和视野。虽然中国传统国学并没有对自己认识论的哲学思考，但也存在分别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重特征。它一方面强调“无证不信”，反映了一种客观主义特点；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心知其意”，具有相信感性认识、依赖主观性和经验主义的特点。张光直先生将这种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

^① 科林伍德：《科林伍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抽象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和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①。

四、结 语

特里格在一篇回顾他探究考古学思想史的文章中指出，认识论与人终身相随。人类的脑子不是黑匣子，而是由生物感性驱动的有机体。人类大脑是适应机制下形成的器官，在适应的过程中，获得了自己分析问题的方法。他同意观念论的看法，即我们所看待的世界有别于真实的世界。人类大脑如何运转，以及它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不再是心理学讨论的课题，它也成了科学研究的领域^②。这使得 20 世纪末欧美的后过程考古学不但开始研究物质文化的象征意义以及人类认知能力和能动性，而且对考古学家自身观念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因此，考古学的重建历史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单凭材料积累就能做到，而我们重建的历史也难免掺杂着当代的价值观和个人评判。特里格还指出，虽然主观性影响很大，但是考古材料的积累也会对阐释产生制约，这反过来也会增强考古学研究的客观性，并提高这门学科在了解人类历史中的价值^③。我觉得，学习思想史对中国学者最大的启示是，如果要将这门学科持续向前推进，当务之急并不在于发掘和发现更多更好的材料，也不仅仅在于引入新的测试技术和分析方法，而是努力更新我们脑子里的观念。

（原刊《南方文物》2009 年第 1 期）

① 张光直：《序》，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Trigger, B. G., Introduction. *Artifacts and Idea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3.

③ Trigger, B. G.,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考古研究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用来证经补史。梁启超的二重证据法体现了早期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认识和价值期望，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在欧美，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通过间接方法从物质文化来了解古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学科。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大部分是没有文字的物质材料，于是他们既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通过文字来重建历史，也无法像文化人类学家那样从研究对象直接观察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这一缺陷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考古学家了解过去和对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重建的最大挑战。

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和探究途径的正当与否。

长期以来，人类认识世界大体存在两种对立的认知途径。一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认识论，它强调感官的认知作用。二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它强调用逻辑推理来提供知识的可靠性。20世纪末兴起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对科学研究中个人观念和社会影响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批评。考古学的发展大致也体现了这样的过程，对科学认知过程的主观客观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这门学科的日趋成熟。考察一下考古学认知过程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对对自己的研究有更多的反思精神。

一、经验主义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操作，这就是指凭直觉、常识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作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

经验主义者十分注重经验知识，这是指能够被人们亲身观察到，并做出描述的具体事实。这也常被看作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认为经验事实是客观的，它们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人们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那么由此提供的经验知识可以不受任何理论或先入之见而保持中立，绝对可靠。经验主义者这种将观察看作是单纯的生理反应过程，好像是摄像机镜头的物理成像，似乎过于简单和片面^①。极端经验主义甚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这些人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反对抽象思维，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概念和普遍性的学术命题。

中国考古学的操作目前大多仍处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学者们强调材料的采集和观察，凭自己的经验和常识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我们有些学者十分鄙视理论，将理论看作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或主观想象的胡诌。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传统的治学方法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英国早期古墓发掘者威廉·格林威尔的名言就是“只管收集事实，永远不要考虑理论”^②。科学历史学之父里奥波德·冯·兰克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材料自己说话，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意见夹杂其中。傅斯年将兰克学派的治学方法引入中国，他自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并提出“史学便

^① 张巨青：《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方法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保罗·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是史料学”的口号^①。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语所设立考古学组，就是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②”。傅斯年当年设立的这一治学方针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在之后的考古研究中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人的经验观察并不等同于摄像机的机械成像，而是一种对感官反应的图像加以识别的过程。这种识别首先取决于观察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训练和实践经验。如果观察者的知识状况和专业背景不同，那么对于图像的识别方式也就有所不同，因此观察到的东西或结果也会大不相同。安特生造访龙骨山，发现洞穴堆积中有脉石英，便判断洞穴中可能存在古人类遗存，而天天经过这里的老乡却熟视无睹。医生观察胸片能够诊断疾病，而病人自己却看不出来。这就是观察现象时，专家与外行之间的区别。还有，经验观察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并非事物的本质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再者，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或深度，因此研究不同现象和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多层次的。

由此可见，即使我们想保持完全客观的经验观察，也渗透着主观判断和理论的因素，而对经验事实的本质进行了解和解释更加离不开理论的逻辑思辨。科学研究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研究方法，声称让材料自己说话的学者，其实在挑选和整理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已经渗入了他的主观判断，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点而已。意大利学者埃米利奥·贝蒂对解释学的主客观问题曾有精彩的见解，他强调材料的客观性离不开解释者的主观性，但是解释者的主观性必须能够深入解释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否则解释者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主观片面性投射到解释对象之上而已。

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表象，而是要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奥秘或规律，通过认识事物的表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和造就事物的因果关系。考古研究同样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的 what, when, where, who, 而且也要探究造就这些材料和现象的 why 和 how。近代的科学方法是在西欧诞生的，被马克思誉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

^①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 年第 1 期。

斯·培根提出，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为人类科学认识世界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归纳法建立在世界是物质的基础上，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观念来自于感觉，感觉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也需要用合理的方法来对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消化，而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的主要路径。归纳法是扩充性的认知过程，并根据具体观察或事实的综合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当越来越可靠与精确的特定事实积累起来时，它们就能被分类和总结，达到一种不断扩充的有用“公理”的层次。

目前，我们的考古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归纳法的范畴。比如，用类型学来进行分期分区、命名各类考古学文化和确立文化区系类型。还有，根据归纳和总结，我们可以推导出仰韶和龙山文化分属两个时代，分别以生产彩陶和黑陶为特点的结论。再有，从商代青铜器和墓葬的分化，我们可以得出当时存在国家和阶级分化的结论。这些操作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出土材料分析、比较和归纳之上。

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牛顿时代以来，归纳法被看作是科学真正的基础。但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不是经验事实的罗列和归纳，而是要探究这些事实背后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言：“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于是，人们意识到，科学研究的起点应该是问题而非现象。如果反复观察现象却没有发现和提出问题，那么即使有新的发现，也只不过是记叙新的事实而已。中国考古学一个最大不足，就是将无数考古发现当作材料和现象来处理，并没有将它们转变为层次有别的各种科学问题，或至多停留在与文献相关或探寻 when, what, who 和 where 的粗浅认识上。结果，这门学科的发展仅表现在材料积累上，既难以获得历史的真知，也无法激发深入探究真知的后续动力。

中国考古学者信奉凭材料说话的宗旨，不愿去探讨材料以外的问题，使得这门学科的操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照章办事。我想用赫胥黎的一句话来指出这种认识的误区：“人们普遍有种错觉，以为科学研究者做结论和概括不应该超出观察到的事实……但是，大凡实际接触过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肯超越事实的人很少会有成就。”

二、理性主义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指通过逻辑推理而非根据表

象来获得真知。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强调超越人类的经验来解释主导自然法则的重要性，标志着科学探索对理性主义的重视。人们意识到，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蒙蔽性。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认为，归纳无法导出必然性的法则，所谓客观事物的观察只不过是“一堆印象”而已。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科学应该超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立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实证”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哪些主观直觉是可靠的，并强调科学解释必须在对不同现象的观察和对这些现象的归纳之间建立起某种规律。演绎法是实证主义最常用的方法，它强调对主导表象的潜因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或收集证据来予以检验，以了解事物的本质。比如，孟德尔对豌豆杂交形状变异所获得的对遗传规律的认识，以及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完善都可以作为用科学演绎法认识事物真相的最好案例。用演绎法来探究科学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并通过理论来指导研究，并对结论做出阐释。演绎法探究的是现象的潜因，是透过表象看本质。由于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并不存在可靠和必然的逻辑通道，因此它实际上只能通过种种猜测，依靠“试错法”来解决。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廷德尔(J. Tyndall)指出：“有了精确的实验和观察作为研究的依据，想象力便成为自然科学理论的设计师。”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考古学的兴起就是对经验主义方法的不满，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家认为经验主义和归纳法研究的最大缺点是无法判断解释和结论的对和错，他们要求采用实证方法来消除主观性，为考古材料提供客观和科学的阐释。而且，考古学的目标也不能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罗列和编年之上，它还应当探究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了要达到这种要求，考古学家必须采取自然科学的演绎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以尽量防止偏见的产生，同时要求对考古学家本身的研究能力和诚实性做充分的审视。过程考古学在采取实证方法的同时，也强调研究一般性通则的重要性，明确求助于各种唯物主义决定论来探讨社会演变规律，其中以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怀

特的技术决定论以及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最为流行。过程考古学还强调文化的系统论观点，提倡聚落形态和文化生态学为导向的人地关系研究，改变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中通常求助于外来因素的传播论解释，将文化演变的动力看作是来自社会内部各种亚系统的互动。为了从物质遗存来解读人类行为，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提出了“中程理论”的概念，这就是要从民族学、实验考古学和埋藏学等角度来了解器物的生命史，排除其废弃后自然和人为扰动对它产生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地从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信息。

过程考古学在考古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和提倡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理念，对考古研究摆脱经验主义和直觉方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考古学研究的是历史和社会现象，这类研究客体还是和自然现象有很大的区别。过程考古学也过高估计了实证方法的作用，以为只要采取严谨的科学方法和步骤，就能克服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影响，获得客观和科学的结论。此外，导致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因纷繁复杂，考古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具有像自然科学那样明确定义的通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过程考古学认为通过实证方法就可以获得科学结论的“天真”想法提出了挑战，这种被称为“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即使实证研究也无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客观。虽然，考古学会随材料的积累和技术方法的改进而减少主观性，但是，社会条件仍会影响学者认为哪些材料是重要的，以及如何来解释它们。这些社会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这些阐释总会有意或无意地支持社会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总会加强或捍卫与这些人相关的意识形态立场。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就从观念论或唯心论(idealism)角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认知的影响。我们过去习惯于将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起来，似乎讨论主观因素对研究客体的影响是一种唯心史观的表现。但是，正是西方学者具有不断反思主观意识在认知过程中存在偏颇的传统，才促进了科学进步。比如，自然科学上哥白尼和伽利略颠覆地心说，后者则发明望远镜来进行观察，检验和纠正主观感知的错误，代表了科学研究划时代的转变。

科林伍德指出，人类习得概念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发现的材料，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考古学家的认知离不开自己

习得的分析概念，他们无法理解这些概念以外的现象。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比如，只关注类型学和年代学概念的考古学家一般不会认为提炼其他信息有什么意义，也不大会意识到生态物的重要性。因此，考古学家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过去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己感知结合而已^①。

这种观念主义的影响在科学史上无处不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了解和重建历史时受阶级立场、种族优越感、个人偏见、科学时尚，以及材料限制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受时尚的生物进化论影响，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用进化论来研究印第安土著历史，强化了对印第安人的偏见，将他们看作是无法进化到文明的原始人类，难免灭绝的命运。甚至路易斯·摩尔根都认为印第安土著，包括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在内，都处于部落社会的层次。与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相呼应，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用考古证据来证明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历史，为纳粹政权的兴起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安特生在材料不足和当时盛行的传播论影响下，根据仰韶的彩陶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解释。而中国学者受成文编年史的影响，一度认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只是随着其他地区考古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才改变了这种单中心的文明起源观。但是这种文献导向的影子，仍在当今的文明探源中挥之不去，反映了习得知识与既有传统思维对科学探索的制约。

在材料分析层面上，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主要采用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分析概念，对20世纪下半叶国际学界流行的功能论、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等学术概念颇感陌生，甚至有人对这些方法感到抵触和难以理解。因此，深受历史学定位影响并擅长于类型学和年代学分析的考古学者，自然会认为确立文化分期和历史关系、用考古材料补充成文历史是最重要的研究目标，并不认为了解人类行为方式有什么必要。他们并不看重和探究这些材料所反映的人类适应和能动性方面的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完全处在他们习得概念和经验范畴之外。这种主观意识和知识背景上的局限，成为目前制约这门学科发展的

① 科林伍德：《科林伍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一个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显著问题。我国学者很少坦承自己可能存在主观偏见、传统价值观和专业知识的陈旧偏颇，缺乏对自己研究能力的反思，也不太欢迎对立或不同的批评意见。从这点上来说，考古学受国学传统方法的影响很深。

三、讨论与结语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而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因为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方法，大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提供历史学家所能理解和利用的历史知识。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J. H. Poincare)曾经说过：“科学由事实所构建，正如房子由石头筑成一样；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子一样。”^①这正是中国考古研究目前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转化为历史学家能够利用的具体知识，那么考古学必须超越单纯的经验主义方法和想当然解释，采用科学推理和各种分析方法来提炼信息和了解事物和现象的潜因，为历史重建提供充实可靠的依据。

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它们受传统国学的的影响很大。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对自己认识论的哲学思考，但是也存在分别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重性。这种认知传统一方面强调“无证不信”，反映了一种不自觉的客观主义特点。然而对不可直观的现象，则采用纯思辨的方式，即以“心知其意”来解释各种现象的潜因。在史学领域，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学者这种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②。

^① Thomas, D. H., *Archaeology*, Third edition,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Inc., 1998.

^② 张光直：《序言》，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现代科学思想将世界看作是一种自然和独立存在的客体，通过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方法，能够将经验观察变成洞悉与解释真实世界的科学理论。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知识遗产。对于感官无法证实的事物，人们并不把确定某种见解看作是一个可用逻辑推理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丁文江》一书的作者费侠莉(C. Furth)总结了中国传统认识论常用的三种方法。一是以史为鉴，用过去的成功经验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二是采用信仰调和，注意新旧合并，但不是做出选择。三是模仿，根据概念的感染力来进行梳理。她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最纯的“理性”，这就是既不依赖实证主义的检验，又不依赖逻辑推理来分析事物的内在结构。因此，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见解完全是通过冥想而得来的。还有，在早期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最感兴趣的还是西方的技术，重视的是应用学科而非基础理论。后来，人们才逐渐体会到科学的巨大力量不仅在于技术，而且在于科学推理的预见性和洞察力^①。

将中西文化的认知传统加以比较可见，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认知哲学是“求实”，而西方是讲究“求真”。换言之，中国人讲究实用或强调具体和个别的东西和事件，缺乏西方那种关注一般法则和普遍原理的理性主义探索。然而，经验总是限于已经过去和完成的事情，而科学探究的范围还包含着未来。显然，拘泥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无法满足科学探索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要求，难以从根本上揭示自然和历史的奥秘。理性主义的缺位不仅使中国的自然科学无法发展，也严重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和视野。20世纪初，虽然五四运动为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场科学和民主的洗礼，但是理性主义作为手段和目的都是缺位的。

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为接受西方科学思想提供什么基础和准备，于是考古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它引入的过程中因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它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十分不同。与早期许多西方科学技术引入中国主要是看重它们的实用性一样，考古学也是被作为一种有助于史家寻找地下之材的重要工具而受到青睐的，因此中国学界的价值期望还是它在史学上的“求实”和“致用”而非科学上的“求真”。于是，这门学科基本被作为一种掘地技术

^① 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来加以引入和应用的，至于如何从无言的物质遗存来探究和重建历史则缺乏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考古学者除了求助于历史和依赖文献线索之外，只能采用凭借直觉和经验主义的途径。

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欠缺，在考古学引入中国的 80 年后，我们虽然引进了不少物理化学的年代测定和分析测试技术，但是研究目标和主要学术概念却没有什麼变化。由于物质文化的分期和分区仍被视为考古研究的核心目标，于是类型学方法和“考古学文化”概念，今天仍被一些学者作为中国的学术正统来坚持，对欧美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心存疑虑。在学术圈内，尊崇师长的教诲胜过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将师承和习得的概念当作一种信念来坚持，影响到这门学科的持续发展和年轻一代创新精神的培养。瑞典化学家柏济利阿斯提醒我们，习惯于某种见解，经常会使我们深信它的正确性，习惯能掩饰这种见解的最大弱点，并会使我们丧失运用反驳它的论证的能力。

面对国际学术进展和中西学术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我们总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应：西方那套东西并不适用于中国，不能照搬，我们需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也许是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的结果，每每谈到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我们某些学者就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不屑和鄙夷，认为我们中国人的研究就是不吃这一套。如果从中西认识论的探讨与比较来审视这种观点，那么这种坚持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表述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无非就是文献学导向的研究，西方那套不适用于中国的东西无非就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理性主义的研究。然而，大部分考古发现是杂乱无章的物质现象，它们既无法通过文献考证、也无法单靠我们的直觉和经验来了解。所以，考古学必须发展科学的理性主义方法来解读物质现象背后的信息，梳理文化变迁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我们认为不适用中国国情的那套东西，恰恰正是我们研究中最欠缺的东西和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我们的考古仅仅挖东西；发掘没有想法和目标，谈不上解决什么历史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传统文化“求实”和“致用”的价值取向，使得考古学在传入中国时只将它看作是一种工具和技术，是史学研究的帮手。而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也凸显了这种价值取舍的偏颇，比如，目前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方法被中国学界所广泛采纳，浮选法也成为发掘过程中必备的操作程序。其实，这些方法都

是 20 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新考古学普遍采用的方法。然而在美国，这些研究方法是和文化生态学、系统论以及社会复杂化等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一起发展起来的，用以探究文化适应以及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但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过我们的取舍，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其“致用”的功能而被推广，而与之相伴的被用来解决人地关系互动和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却被漠视。结果，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缺乏理论支撑而难免流于一种纯技术操作，成为器物类型学的点缀，无法对史前文化的变迁提供“真知”。因此，我们在考虑引入技术“致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基础理论研究在指导技术操作和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性。

张光直先生说过，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不是世界的主流，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现代中国出了不少优秀的历史学家，但是没有一个人被国际学界尊为大师，也没有一个人在国际上成为有地位的历史理论家。这是因为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地位，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①。究其根本原因，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层面上来进行反思。中国并非没有人才，也非资料不好，更非脑子不如别人，而是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束缚了我们的大脑，缺乏理性主义思维是难以培养出可以跻身诺贝尔奖的一流学者的。我们应当意识到，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和出于实用主义的借鉴并非考古研究的康庄大道，单是追求“致用”的价值取向难以产生具有普世价值的研究成果，无法在科学的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

中国考古学在培养学生的方法上必须有所变革，不应只传授学生田野发掘技术和分辨器物类型这类经验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理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将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有创造能力的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能。

（原刊《南方文物》2010 年第 1 期）

^① 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谈考古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译后记

一、引言

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2012年第六版的中文翻译终于在2013年年底脱稿。这本厚达656页的教材能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的五本著作中首先完成，还要归功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助理童立军先生。正是他的鼓励和努力，本书新版的版权购买和翻译在2012年年底就完成和启动，之后便成为申报“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课题的首选。作为译著，还是需要写一篇译后记，以表达译者的体会和心得。本书第三版的翻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陈星灿牵头，组织了11位同行合力翻译，并撰写了译者序。我很赞同他在序言里的一些坦言，并感同身受。这就是翻译这两位考古学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一种荣幸，也有许多风险，主要还是“本书浩卷繁帙，涉及问题多、领域广、课题新、许多概念没有现成的翻译……”^①。第六版是修订最大的一版，做了一番最彻底的更新和重组，增加了许多新内容，特别是框式专栏。所以，翻译这本巨著的最新版本对我来说也是新的挑战。

为了本书新版的中译本，我在2013年8月上海举办的世界考古学论坛上

^① 陈星灿：《译者序》，见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特地拜访了伦福儒教授，请他为新版中译本写一篇新序。伦福儒教授谈吐儒雅、和蔼可亲，不但欣然应允，而且与我及复旦学生进行了愉快的交谈，让人受益匪浅。作为译后记，我想借伦福儒中文版自序中表述的一些看法，谈谈考古学研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学界似乎仍没有足够的认识。在研究生课程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有学生特地问我有没有针对性专论可供参阅。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至少迄今我尚未找到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专著。对于国外学者这可能是无须介绍或不言而喻的常识，而在中国学界可能认为社会演化规律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已有定论，无须挂怀。但是，对于国内同行与在校学子，这个问题还是值得一提。

第一，伦福儒说，考古学研究方法是国际性的：它们超越一切疆界。这意味着尽管各国的历史发展和考古材料不同，各国的考古学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是相通的。第二，他提到，在上海考古论坛上，虽然各国考古学家介绍的是各自的研究成果，但是它们对增进中国文明起源原创性和独特性的了解提供了世界背景。而中国文明探源的案例也能为社会等级制度发展的一般性辩论做出重要贡献。第一点，伦福儒强调了考古学研究的一般性或普遍性问题，此地的一般性是指方法，与下面讨论的规律性问题略有不同。但是，方法的相通源自问题的相同。第二点，伦福儒强调了独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问题。国际考古学研究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一般性研究，还有一种即特殊性研究。一般性研究是指探索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跨文化的社会变迁或农业与国家起源的动力等。而特殊性研究是指某特定个案的研究或具体的某个事件或遗址，如历史学重建和中国和埃及文明起源的具体轨迹等。这个两分和互补的问题可能还未完全为我国同行所充分理解，讨论中时会将不同概念混为一谈，难免造成误解，产生争议。我们不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国外那套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我们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这种论点显然是强调特殊性的重要而漠视一般性的意义。下面我想以此为题，讨论一下两者的关系和作用，这对于我们阅读本书，学习国际考古学先进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前提。

二、一般性研究

一般性研究又称通则(*generalization*)研究，常见于自然科学领域，意在探究那些重复发生现象背后的潜因和规律。而特殊性探究多见于历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主要侧重那些偶然、孤立和非重复发生的独特事件。虽然一般性研究与特殊性研

究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及人文科学的区别所在，但是自 18 世纪以来，西方的社会人文学科也产生了探究社会规律的一般性视角。其早期代表为亨利·摩尔根、爱德华·泰勒、马克思和恩格斯，20 世纪上半叶和中叶为戈登·柴尔德、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特，下半叶为马歇尔·萨林斯、埃尔曼·塞维斯以及路易斯·宾福德等欧美诸多过程考古学家。这些学者都采用进化论模式，设法构建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般性发展轨迹。由于通则或规律性研究是高层次的理论阐释，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是相通的，因此彼此采用的术语、概念和阐释方式都基本相同。而这正是为何美国过程考古学将通则性研究看作是最具成就感的目标，因为它能为整个社会学科做贡献。

摩尔根是早期进化论的代表，他从直线进化的视角来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般性趋势和普遍规律，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文化进化模式，这就是蒙昧、野蛮和文明。他还强调，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经—过所有的低级阶段而达到高级阶段^①。摩尔根的社会进化研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赞赏，并试图加以完善，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做出整体解释。泰勒被誉为人类学之父，他主要关注人类知识与信仰系统的进化。摩尔根和泰勒都将社会文化的进化看作是自然界万物进化规则的组成部分。

柴尔德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鼻祖，20 世纪上半叶，他为构建考古学文化概念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考古学方法论带来了一场变革。他同时还被誉为考古学一般性解释的先驱。柴尔德充分利用当时欧洲与近东考古材料的积累，采用摩尔根的三阶段进化模式来构建和解释这些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般性趋势。这种社会进化论阐释见于他两本通俗性著作《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之中。比如，他用蒙昧、野蛮和文明概念分别指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并提出了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起初，他求助于技术因素来解释文化变迁的动因，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来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国家与古埃及神权君主国家之间的区别^②。柴尔德以其出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下册）（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② 布鲁斯·特里格：《柴尔德，一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陈淳译），见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色的材料整合能力和敏锐的抽象理论思维，被誉为罕见的伟大综述者。

20世纪中叶，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以摩尔根的继任者自许，以一般性视角来解释社会文化的变迁。他将文化定义为热动力系统，而该系统的发展受制于技术与能量，如果所有条件均等，那么文化会以能力投入的增加而发展。怀特用“文化=能量×技术”这一公式来表述这一模型^①。朱利安·斯图尔特则以多线演进的模型来构建不同社会文化的一般性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文化生态学作为解释文化变迁的理论。受功能论的影响，他视文化为环境适应的手段，因此文化演变的原因可以从生态环境找到答案^②。在怀特和斯图尔特的影响下，萨林斯和塞维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新进化论的概念，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这四阶段进化类型，建立起一套与摩尔根文化进化论有别的新进化论模型^③。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和萨林斯及塞维斯的新进化论为美国新考古学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宾福德将构建社会发展规律或文化进程看作是考古学研究最主要的目标。虽然其纲领过于偏执，但是考古学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努力在过程考古学阶段达到了鼎盛时期。

三、特殊性研究

特殊性研究一般关注具体、偶发和独特的事件和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历史重建，它是在19世纪进化考古学的式微之后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学领域，19世纪摩尔根和泰勒的早期进化论后来饱受诟病，被认为过于演绎推理，太过于一般化和理论化，对历史事实和民族志材料不够重视^④。于是，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社会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博厄斯学派的历史特殊论。而当时柴尔德、怀特和斯图尔特等人的一般性探究几乎是逆流而行，孤军作战。弗朗兹·博厄斯反对进化概念，反对摩尔根的文

① 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Steward, J. H., Cultural ecology. In Still, D. L.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er, 1968, 337—344.

③ Sahlins, M. D. and Service, E. R.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M. 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④ 塞维斯：《序言》，见《文化进化论》（黄宝玮、温世伟、李业甫、金雪鸣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化进化论，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实体，必须将它们从其本身来了解和评估。博厄斯将社会文化演变看作是一种偶然的过程，由传播、传统行事方式出错以及对既有思想的偶然重组所引发^①。当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阶段时，其研究导向趋于忽视理论概括，强调事实比理论更重要。当时博厄斯派学者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资料收集工作可以脱离理论指导来进行，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料，就可能得出清楚的理论解释。总的来说，博厄斯学派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反对社会进化学说^②。而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学领域里，则由兰克学派主导着国际的史学潮流。里奥波德·冯·兰克的史学观也很接近特殊论，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提倡秉笔直书，用材料说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通过史料来重新认识历史。

20 世纪上半叶，由于考古学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关系密切（旧石器时代考古仍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两门学科对考古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影响很大。比如，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明显受到傅斯年治学方法的影响。傅斯年留学英、德七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他以中国的兰克学派自许，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③。这种治学方法在我国考古学中至今仍明显可见，这就是重材料而轻理论，提倡充分公布考古材料，让材料自己说话。

四、概念与路径

考古学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研究在诸多方面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差异对于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所帮助。特殊性研究关注具体、偶然和独特的问题，可以用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n)、何物(what)来概述，而一般性研究主要关注重复或平行发生事件(如农业和国家起源)背后的因果关系和

① Trigger, B. 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②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潜在规律，可以归结为为何(why)和怎样(how)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特殊性研究采用归纳法，就是充分收集材料和事实，在材料充分积累的基础上取得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并做出解释。而一般性研究探讨的是现象背后的潜因，所以无法用归纳法做到，必须采用演绎法的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就是先对可能的原因提出假设或构建解释的模型，然后寻找材料来予以证实。在解释的层次，特殊性研究大体是从具体现象追溯其直接的原因，而非探究长时段的规律。文化历史考古学普遍流行传播论解释，偏好从考古学文化的器物类型比较来说明它们的关系，将它们说成是文化交流、融合、人群迁徙的结果。至于文化变迁的深层原因往往无能为力，或只能用“碰撞”“断裂”等词汇来做些不着边际的说明。而对于历史阶段的考古学解释，很大程度要直接依赖文献记载。一般性研究探讨社会文化的动因和发展规律，往往以决定论方式提出一些文化变迁的所谓“主动力”，并构建和提出因果关系的解释模型，如怀特的技术决定论、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等，都是一般性研究的解释方式。由于这种研究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是相通的，所以欧美考古学的阐释理论大都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进展。

由于特殊性和一般性研究的视角和解释方式不同，因此采用的术语也彼此有别。特殊性研究因为是针对特定现象和偶发事件，所以常常被说成是“常识性”或“历史的”说明，如指认某些遗存属于某人群、某种工具或某个时代等。一般性研究则因其探究平行和重复发生事件的规律而被过程考古学视为“科学的”研究。科学阐释有别于常识说明在于它是组织化的知识体系，是条理化的知识。这种知识要确定事实和现象的前因后果，揭示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于是，为了进行系统解释，科学必须重塑日常语言，或减少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提高专业性。科学陈述语言的主要特点就是采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经验性事物性质的关系并不明显。而表述的抽象性是科学知识的显著特点^①。

不清楚历史解释与科学解释之间的区别，往往会造成误会。这在我国一些学者对“酋邦”概念的认识和讨论中表现非常明显。酋邦是萨林斯和塞维斯社会进化四阶段模式中的一种社会类型，该概念引入中国后引起了不小争论，

^①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有人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它无法与我国的考古发现对号入座，有人则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前国家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传统文献中名称如“古国”或“五帝时代”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根据上面对特殊性与一般性研究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这就是我国学者将国外一般性研究的概念与我国历史用语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酋邦是代表社会某发展阶段类型的抽象术语，而我国文献中的“古国”“方国”或“邦国”是史籍中的名称，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出现这样的误解，显然是因为中国的文明探源工作完全是在历史学领域进行的，对人类学的解释模式和抽象术语十分陌生。夏鼐曾对考古学的最终目标有清楚的陈述：“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存、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①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应当熟悉规律性研究的概念和方法，不应再局限和满足于将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进化论经典术语当作社会标签来使用。值得称道的例外是，苏秉琦采用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古国—方国—帝国所谓三类型和三部曲的累进模式来解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社会进化^②。然而，这些术语缺乏明确的科学定义，古文化、古城、古国也不具备类型学内在性质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也没有可供考古学横向比较和参照的历史学和民族志实例，其初衷也并非意在建立一种可以与西方社会进化论比肩的模型，所以这还不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通则性构建。

斯图尔特曾对构建社会进化模型有如下说明：(1)必须建立一种文化、形态和机构的类型学，诸类型代表了抽象化的概念，它们并不考虑独特性，而是将共性分离出来进行比较；(2)诸类型的前后关联必须以纵向(累进)或横向(跨文化或跨地域)或以两者兼有的方式加以确定；(3)将文化现象纵向和横向关系平行的重复发生予以公式化，便是对因果、法则和规律的科学陈述^③。由此可见，摩尔根所谓蒙昧、野蛮和文明的文化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所谓原

①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③ Steward, J. H., Cultural causality and law: a trial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9, 51(1): 2-28.

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进化论、萨林斯和塞维斯的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新进化论以及弗里德的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和阶级社会的政治进化论^①，都属于这种社会直线进化模型的构建。

现在大家明白，过分强调特殊性或规律性研究都有失偏颇，理想的是兼顾两者并予以整合。20世纪60年代，布鲁斯·特里格曾对新考古学大力提倡考古学的通则研究并贬低其历史价值的倾向提出批评，认为考古学的历史和通则研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互补而非对立的。考古学从其学科性质而言，最好还是尽量收集物质材料来详尽重建历史，让可以直接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来制定通则。而通则研究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好地了解 and 解释历史为何这样变迁的原因。特里格还用古生物学来做比方：古生物学详尽的化石收集和分析可以充分了解一个物种的具体特点和演化过程，而达尔文进化理论则能对这种特点和过程做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②。前者堪比历史学的特殊性探究，后者则是通则性的科学研究。

五、小 结

科学的发展充满了轮回的变数，过程考古学的规律性研究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红火了一阵之后便再次受到批评。在后现代思潮的攻击下，这种规律性解释被说成是主观的，不足以被现有的证据所证实。况且，社会科学领域的大部分解释都是暂时的，并存在激烈的争论。而高层次理论的通则一般都无法用具体事实予以验证。因此，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一种唯物论解释要比唯心论解释更客观。面对这种诘难，特里格提倡并身体力行一种比较方法来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和早期文明。这种方法在一般性上注重分析基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因素，而在特殊性上研究差异极大、由文化所决定因而是独特且不会重复的思维模式^③。这应该是当下国际考古学研究的合理视角与趋势。

① Fried, M. H.,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② 布鲁斯·特里格：《史前考古学的目的》，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兼顾和整合考古学研究的这两种视角与方法，以问题来编排各个章节。一方面详细讲授如何重建文化的独特性和具体细节，包括传统视角所关注的各个方面，如何物(第二章)、何地(第三章)、何时(第四章)、谁(第十一章)、接触与传播(第九章)。还包括过程考古学的特长：生态环境(第六章)、技术(第八章)、食谱与生计(第七章)。以及后过程考古学的认知研究(第十章)。而一般性问题的怎样(第五章)和为何及阐释(第十二章)也以显著位置进行了详述，可谓十分周全，值得称道。

我们今天处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考古学也不例外，它表现为理论和学术流派层出不穷，分析技术日新月异，科学成果信息激增。面对这样的发展势头，进入高校的莘莘学子在接受考古学专业的启蒙训练时就必须及时了解 and 掌握当今国际学科前沿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而伦福儒和巴恩的这本第六版《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无疑是最好的教材。在学术全球化的洪流中，我们不要再以师承的方式和过时的知识来培养学生，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外有别未必是这门学科的康庄大道，否则 21 世纪培养出来的学子将仍是以 20 世纪思维方式行事的接班人。

(原刊《南方文物》2014 年第 2 期)

考古学认识论的思考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他为人类科学认识世界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探索自然规律。他指出,人们之所以不能进步,是因为崇拜古人和所谓的伟大权威,相信普遍的共识。早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古希腊哲学家就将科学与见解区分开来,认为科学知识是有别于个人意见的真知。所以,科学研究应该超越普通常识来探究科学对各种自然规律的认识^①。

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主要凭借发掘材料来了解人类的过去和重建历史。长期以来,考古学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用来证经补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体现了早期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认识和价值期望,它不但影响到这门学科在中国学界的学术定位,而且至今仍左右着人们对这门学科性质的认识。在欧美,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通过间接方法从物质文化来了解古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学科。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大部分是没有文字的物质材料,而他们也无法直接观察古代人类的行为和思想,于是考古学家既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通过文字来重建历史,也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从研究对象直接读懂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这一缺陷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考古学家了解过去和对考古材料做出历史阐释的最大挑战。

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

^①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自然及文化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技术手段和探究结论的正当与否。因此，本文想探讨一下考古学家如何通过物质文化来认识历史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科学认识论问题。认识论或求知的理论，被定义为“关注对人类知识性质和正确性的了解。它探究知识如何获得、认知的可靠性和盖然性，以及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知其然)和信念(并不一定知其然)之间的区别”^①。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世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认识论。一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认识论，它认为所有知识来自感官与直觉。二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它强调采用逻辑或数学推理获得真知的重要性。培根将经验主义者比作只顾埋头收集材料的蚂蚁，将理性主义者比作自身织网的蜘蛛，他提出学习既收集材料又用自己力量来消化材料的蜜蜂，他认为真知的科学工作就应该这样。当然，考古学研究也不应例外。

与自然科学研究面对完全外在的客观世界不同，考古学家研究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这就使考古学具有和其他人文科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即观察者既是评判者又是参与者，研究人员可以主观介入本该从外部去研究的对象，使他感觉不到有采用客观方法的必要性^②。结果是，即便考古学家自以为客观中立，但是在分析材料和做结论时，总难免表现出他自己的期许，难免在做出历史解释时渗入他自身的好恶、阶级立场或社会价值取向。虽然考古学家很少考虑认识论和科学哲学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习得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有什么不对，但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无疑对考古研究十分必要。正如加拿大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利奥·本格所言，哲学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明确性、清晰度、深度和严密性，哲学能对科学推理的性质提供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揭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指出研究者所期望结论的错误与不当^③。

① Trigger, B. G., *Archaeology and epistemology: dialoguing across the Darwinian chasm*.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98, 102: 1-34.

②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③ Bunge, M. A.,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一、经验主义

欧美考古学家将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家看作是天真的经验论者，这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对发现的材料做出想当然的或貌似合理的解释^①，它有时被称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在对考古现象的解释中，经验主义方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和因果推理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直接从现象推导出结论。经验主义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经验主义认为解释应该建立在对事物的观察之上，而且认为通过实验研究而后进行理论推导要优于单纯的逻辑推理。激进的经验主义甚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他们看来，理性或理论思维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根本上否定抽象，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的概念和普遍的学术命题。

对于经验主义的考古学研究而言，归纳法是采用最普遍的一种分析途径。归纳法在 16 世纪为弗兰西斯·培根所提出，培根认为科学必须追求自然界事物的原因和规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以感官经验为依据。他所提倡的归纳法也是建立在世界是物质的基础上，物质构成了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培根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和观念来自于感觉，感官的直觉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也需要合理的方法来对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消化，而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的主要路径。归纳法是扩充性的认知过程，并根据具体观察得出结论，由事实的综合而得出结论。当越来越可靠与精确的特定事实积累起来时，它们就能被分类和总结，产生一种不断扩充的有用“公理”的层次。对于归纳法研究而言，尽可能收集充分的材料和证据是提高阐释和结论正确性的有效手段。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对自己认识论的哲学思考，但是也存在分别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重性。这种认知传统对可直观和可感受的方面强调“无证不信”，反映了一种不自觉的客观主义特点。然而对不可直观的现象，则采用纯思辨的方式，即以“心知其意”或依赖冥想来解释各种现象。在史学领域，

^① Trigger, B. G.,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学者这种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①。对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欠缺，难免使我们常常把增进对过去认识寄希望于材料的积累，漠视抽象理论和逻辑推理在研究中的必要性，认为理论只不过是脱离事实的空谈。

这种经验主义和归纳法的认识论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西方传统史学的治学方法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科学历史学之父里奥波德·冯·兰克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兰克的史学观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材料自己说话，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意见夹杂其中。傅斯年留学英、德七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傅斯年自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他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②。

1949 年以来，我国考古学的主流刊物和考古报告一直遵循一条原则，就是要求学者客观公布材料，避免做主观的解释。因此，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成果还是体现在原始材料的积累上，并使田野发掘成为纯粹的技术操作而非持续的科学探索。至于利用这些材料来重建历史，因缺乏类似国际上流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指导而乏善可陈，学者只能用原始材料的编年或附会历史文献来进行操作。结果，用器物类型和考古学文化建立的史前史充其量只是建立在事实归纳上的一种器物发展史，而非社会发展史和人类创造自身的文化史。

中国考古学重材料轻阐释的传统，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初期考虑到出土材料较少，研究人员训练和学养不足，夏鼐先生要求考古工作只发表第一手

① 张光直：《序言》，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材料，尽量避免草率对材料进行解释和贸然下主观的结论。然而从当时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一原则也体现了20世纪初国际史学界潮流和史语所及傅斯年的治学理念。

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经验主义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世界的看法，而且表象很可能具有蒙蔽性。更重要的是，表象的观察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因果机理。这正如单凭发烧无法知道病人罹患哪种疾病，由何种病因引起一样。因此完全致力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比较有限。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而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因为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方法，大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提供历史学家所能理解和利用的历史知识。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J. H. Poincare, 1854~1912)曾经说过：“科学由事实所构建，正如房子由石头筑成一样；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子一样。”^①这正是中国考古研究目前需要克服的最大问题，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并能够转化为历史学家能够利用的具体知识，那么考古学必须超越单纯的经验主义方法和想当然解释，采用科学推理和各种分析方法来提炼信息和了解事物和现象的潜因，为历史重建提供充实可靠的依据。

二、观念主义(idealism)

我们过去习惯于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起来，似乎讨论主观因素对研究客体的影响是一种唯心史观的表现。但是，正是西方学者具有不断反思主观意识在认知过程中存在偏颇的传统，才促进了科学进步。在此，为了避免受“唯心主义”这个术语长期被贬义化的影响，在此将思考主观性对科学研究影响的idealism思维，翻译成“观念主义”或“观念论”。自然科学上哥白尼和伽利略颠覆地心说，后者则发明望远镜来进行观察，检验和纠正主观感知

^① 引自：Thomas, D. H., *Archaeology*, Third edition,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Inc., 1998.

的错误，代表了科学研究划时代的转变。在历史学方面，意大利学者埃米利奥·贝蒂对解释学的主客观性问题提出了精彩的见解，他强调文献和材料的客观性离不开解释者的主观性，但是解释者的主观性必须能够深入解释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否则解释者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主观片面性投射到解释对象之上而已。

20世纪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对如何从考古发掘和研究来了解历史进行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他指出，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项发掘无论其大小，发掘者应该明知其发掘的理由，必须知道他想找什么，然后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这就是科林伍德的“问答逻辑”的中心原则。他说，早期的考古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寻找答案的明确问题。虽然后来考古发掘从18世纪的挖宝转向19世纪的求知，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比如，英国考古学之父皮特·里弗斯将军是一位天才的考古学先驱，虽然他的发掘过程极其严谨细致，但是并没有明确的问题指导。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仍以遗址而非问题为导向，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在完整发掘后，再选择下一个遗址。这种发掘的结果是，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物，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科林伍德指出，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询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出土东西的含义各不相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东西本身或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认为，认知思维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过程，而是主观的积极探究。科林伍德还指出，即使最简单的感知也只能来自于观察者脑子里固有的概念。人们无法感知自己经验之外的世界。虽然像时空等概念与生俱来，但是人类大部分认知概念是习得的。不管这些概念来自何处，如果没有这些概念任何观察都毫无意义。

科林伍德还认为，考古学家研究的历史并不是死亡的去，它仍然存活于今天。因为我们有关于过去的了解都来自于遗留至今的文献和器物，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他们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将过去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

天所面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己感知结合而已^①。

在科学史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了解和重建历史时受阶级立场、种族优越感、个人偏见、科学时尚，以及材料限制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受时尚的生物进化论影响，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用进化论来研究印第安土著历史，强化了对印第安人的偏见，将他们看作是无法进化到文明的原始人类，难免灭绝的命运。甚至路易斯·摩尔根都认为印第安土著，包括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在内，都处于部落社会的层次。与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相呼应，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用考古证据来证明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历史，为纳粹政权的兴起提供了思想上基础。安特生在材料不足和当时盛行的传播论影响下，根据仰韶的彩陶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解释。而中国学者受成文编年史的影响，一度认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只是随着其他地区考古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才改变了这种单中心的文明起源观。但是这种文献导向的影子，仍在当今的文明探源中挥之不去，反映了习得知识与传统思维对科学探索的制约。

在材料分析层面上，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主要采用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分析概念，对20世纪下半叶欧美流行的功能论、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等分析概念十分陌生。因此，习惯并擅长于类型学和年代学分析的学者自然认为文化分期和相互关系是最重要的研究目标，不会意识到提炼器物中的人类信息有什么必要。他们也不会去思考和探究这些材料所反映的人类适应和能动性方面的问题，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完全处在他们习得概念和经验范畴之外。

20世纪40和50年代，以格林·丹尼尔和克里斯多夫·霍克斯为代表的一些英国考古学家在事实和解释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他们认为，考古学材料构成了这门学科真实和累加的核心，这些过去的材料是客观的。但是对材料的解释则是高度主观性的，它会因人而异。更重要的是，由于物质文化只反映了人类行为很有限的一部分，并受到残存概率的影响，因此这些因素对考古学解释也会产生很大的制约。

由于考古学处理的是复杂现象，而且本身不是一门实验性学科，因此它

^① 科林伍德：《科林伍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在面对那些被当作是真理的观察时特别脆弱。因为考古学家所做的阐释常常会微妙地受到社会与个人对事实先入之见的影响，并会下意识排斥其他的可能性解释。考古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探寻的问题和他们所认为是合理的答案，这种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说，社会成见会以显著方式影响对考古材料的阐释，而考古学家却浑然不觉。这些成见也影响到考古学家提出的问题和他们所期望获得的答案。这些阐释未必需要标准严格的证据，只要看上去能自圆其说或符合常识就行^①。他还指出，历史阐释常常是推测性和随意的，在一定程度上某些阐释只能被看作是个人的表述。大家都承认，由于历史材料的复杂性，不同证据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安排以证明任何事情。

受国学传统熏陶的中国学者很少会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主观偏见和传统价值观的偏颇，缺乏对自己研究能力的反思，也不太欢迎对立或不同的批评意见。从这点上来说，考古学受国学传统方法的影响很深。对各种考古现象，用“心知其意”的纯思辨方法来对物质材料和现象做想当然的解读，在当下的考古学解释中仍然十分流行。

三、实证主义(positivism)

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1711~1776)认为，归纳无法导出必然性的总结和法则，所有对因果的归纳性总结只不过是立足于事件之间反复关联的观察。他称这些想法是“怀疑论”，认为所谓客观事物只不过是“一堆印象”，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随意的，由人的意志所决定，不具备客观的必然性。人们平常所感受到的因果关系，只是由于印象所形成的习惯性联想和推论。休谟还区分了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获得的知识与从经验事实关系所获得的知识的区别，认为运用逻辑推理可以从理由的运算显示其真实性，但是仅凭理由与直觉却无法建立事实之间的关联。

继休谟之后，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提出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将演绎法思维引入科学研究。他将人类认识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或经验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也就是科学阶段，

^① 布鲁斯·特里格：《世界考古学展望》(沈辛成译)，《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他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以“实证的事实”为基础，人的思想和行为只能建立在严格检验、系统化和实证的知识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方法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哪些主观直觉是可靠的，并强调科学解释必须在不同观察现象和对将这些现象的归纳之间建立起某种规律。实证主义的演绎法是自然科学最常用的方法，如孟德尔对豌豆杂交形状变异所获得的对遗传规律的认识，以及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完善都可以作为用科学演绎法认识事物真相的最好案例。

欧美考古学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主客观因素对考古研究的影响，但是采取明确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则要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正式开始。在克服主观性方面，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家认为经验主义研究和归纳法途径的最大缺点是无法判断阐释和结论的对和错，他们要求采用一种实证的方法消除主观性，为考古材料的提供客观和科学的阐释。为了要达到这种严谨的要求，考古学家必须采取自然科学的演绎法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以尽量防止偏见的产生，同时要求对考古学家本身的研究能力和诚实性做充分的审视。他们认为，只要有合适的材料，并用合适的科学方法来加以分析，就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就能避免研究者主观的偏见。此外，过程考古学家还强调考古学应该向其他社会科学学习，认为考古学不应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复原和描述，而是应该致力于对社会发展规律做出科学的总结。

过程考古学家认为，只要考古学的阐释建立在明确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采用合适的科学方法用适当的证据加以检验，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对考古学的研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在实证论的影响下，过程考古学家将制定可供检验的假设看作科学和经验主义方法的分野，假设的真实性有赖于独立观察者可操作的观察和实验。科学假设应该通过演绎性的预测来加以检验，如导致农业和文明起源的不同原因。采取检验假设并接受更好的实证方法，科学可以发展出更有力和更精确的理论，并从这些理论中提出对更为广泛现象的预测。

从事实观察和经验积累的归纳法转向检验假设的演绎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科学中要保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绝不像经验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认为只要观察者具有正常的感官、排除先

人之见的干扰、保持正常的情绪、抱着公正的态度，就能够保持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因为以观察大量事实为前提的归纳法分析，其结果常常是值得怀疑的。科学中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人们概括一般的规律和概念，并不需要依靠大量的观察。反过来，科学中有许多普遍性规律和概念，无论进行多么大量的观察，也是不可能归纳出来的。因此，对于我们研究对象中那些无法根据事实用归纳法进行探究的问题，就必须用演绎来解决^①。

用演绎法来探究科学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并通过理论来指导研究并对结论做出阐释。演绎法探究的是现象的潜因，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由于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并不存在可靠和必然的逻辑通道，因此它实际上只能通过种种猜测，依靠“试错法”来解决。

科学运用抽象概念的实质就是把研究的大量对象进行简化，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纷繁复杂，因此如果我们不运用抽象方法在头脑里建立简化的模式或过程加以梳理，我们就无法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和研究。抽象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无比巨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方法，就不会有科学概念和数理方法。从事抽象思维和建立科学概念的过程就是建立理论的过程，对于理论，美国考古学家奥代尔有一个定义，称之为对主导种种现象内在关系潜在法则所提出的一系列系统和可予以检验的假设^②。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理论是指一种阐释的体系，人们用它来认识或解释某些现象^③。美国科学哲学家胡佛指出，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理论是一组相关的前提以设定为何事件会以其发生的方式产生。任何一门学科的关键是要发展一套理论来解释观察范围内发生的事件。理论是一种尝试性的系统陈述^④。

过程考古学在采取实证方法的同时，明确求助于各种唯物主义决定论来探讨社会演变的因果律，其中以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怀特的技术决定论以及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最为流行。过程考古学还强调文化的系统论观点，

① 林定夷：《科学研究方法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Odell, G. H., *Stone Tools: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Human Prehistory*, New York: Plenum, 1996.

③ 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 Hoover, K. R.,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New York: Martin's Press, 1976.

提倡聚落形态和生态学为导向的人地关系研究，改变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中普遍存在求助于外来因素的传播论解释，将文化演变的动力看作是来自内部各种亚系统的互动。过程考古学还提出相关背景研究(contextual research)的重要性，所谓的相关性就是厘清材料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美国考古学家费根对考古材料的 context 有这样一番陈述：相关性远不是指一件器物发现的具体位置和时空位置，它包括评估一件器物是怎么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以及它在被主人废弃之后又发生了什么^①。为了从物质遗存来解读人类行为，宾福德提出了“中程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这就是要从民族学、实验考古学和埋藏学等角度来了解器物的生命史，排除其废弃后自然和人为扰动对它产生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地从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信息。

中国传统认识论缺乏逻辑思维的因子，因此中国学者对实证主义的演绎法不太习惯，认为这种以假设为先导的考古研究不是从实物证据着手，而是以想象为出发点，简直就是本末倒置，难免成为脱离事实的空谈。其实，这种方法正是现代科学用来克服感性认识和经验主义偏颇的手段。理论探索或科学假设是指考古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指导，这种有明确导向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寻找和发现事物内在的潜因，避免被复杂无序的表象和事实所迷惑。这正如侦探用假设和推理从茫茫人海中甄别及锁定嫌疑的调查范围，然后逐一排除各种可能而最终破解谜案。理论或假设具有先导或选择探究目标的作用，特别是对我们一时难以直观的领域。理论探索可以集中我们探究的方向，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创造性思维的价值^②。因此科学理论既是一种研究向导，又是一种通则性陈述(generalization)。它意在说明事物如何发生及怎样演变，对探索的问题提出一种阐释性的总结。

四、相对主义(relativism)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欧美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方面重拾对人类行为复杂性、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兴趣，开始采纳所谓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类意识形态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开始强调

^① Fagan, B. M., *In 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1.

^② 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2007年第10期。

早先由科林伍德提出的观念论，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阐释的影响。这导致学界以一种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取代过程考古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证主义研究。于是，文化取代人类行为成为主要关注的目标，思想和观念被用来解释人类如何行事，每种文化再度被作为人类独特的精神表现来予以评估。

在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同意这样的看法，要客观了解历史和人类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一代人、各社会阶级和个人都会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历史，而且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能使学者评估不同的见解。一些极端相对主义者强调，没有两个人或两个集体会以相同方式看待世界。由于所有理解都证据不足，因此没有办法确定某种观点要比另一种观点更正确。这一进展鼓励考古学家采取一种源自中欧的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强调，人们观察和解释世界会不同程度受其信念的影响，感知的材料难以排斥观念的干扰，而科学只不过是知识的一种来源，它与常识、宗教信仰、甚至错觉没有什么区别^①。

在历史学研究方面，相对主义者认为即便是历史资料本身，也是由古代史官和学者根据他们认为什么是值得记录的价值判断而有选择地保留在史籍之中的，这种记录和研究难免掺杂了作者个人的利益和偏好。屡见不鲜的是，每一代人都会重修历史，这不单因为历史是在发展变化的，而且每一代人都会对历史提出不同的问题，有着和上一代人不同的认识。当然，学者们仍然认为这门学科具有一种客观和科学的方面。如果历史记录是一种见多识广的个人表述，那么这些记录足以构成一种可靠事实证据的资料库。而这种实在的资料核心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基础^②。

在考古学领域中，相对主义者认为，即使考古学随材料的积累和技术方法的扩充而减少主观性，但是学者所做出的阐释总是会微妙地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影响。这些阐释总会有意或无意地支持社会主流和

① Trigger, B. G., Introduction. In Trigger, B. G., *Artifacts and Ideas, Essays in Archaeolog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1—30.

② Trigger, B. G., Hyperrelativism,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89, 26: 776—797.

赞助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总会加强或捍卫与这些人相关的意识形态立场。此外，考古学阐释还会受到由自然科学、生物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分析模式的制约。

欧美后过程考古学家信奉相对主义和观念论，对过程论的实证方法提出质疑。这些学者认为即使实证研究也无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客观，强调社会条件会影响学者认为哪些材料是重要的，以及如何来解释它们。他们还认为科学知识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信念并无不同，由于没有一种客观评估理论的标准，因此科学并不应该受到刻板规定的束缚，在评估对立的理论时，个人的偏爱和美学品位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极端相对论者甚至走到了不可知论的极端，声称考古材料的阐释如此受到考古学家自身知识信念、阶级利益、族群忠诚、性别偏见和个人利益的左右，以至于要做到阐释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

这些考古学者还认为，物质文化或器物具有难以推演的多义性，也就是说它们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甚至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也会意味不同的东西。这种观点否定对一批器物的背景分析能够获得其原来的含义。于是，今天这些器物所展示的意义只不过是考古学家和其他人赋予它们的意义，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复原的信息是否与古人赋以它们的含义相同。

后过程考古学家还批评过程论的实证主义研究漠视人类认知能力对行为的指导与影响，因此低估了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与过程考古学关注物质文化的生态环境、经济背景和人口条件不同，后过程考古学关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采取象征、结构、认知、性别等途径来研究考古材料。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关系中也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可以被用来指导经济活动。有人认为，了解物质文化在仪式和威望实践中的活动，是重建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文化形态及其变迁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有些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者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非经济因素或宗教信仰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祭祀和仪式活动被用来确立现有的社会关系，使之看上去是自然规则的一部分以便增强威望群体和个人的权力和地位。

后过程考古学还强调个人能动性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能动性”概念认为，有许多文化现象既非适应的产物，也非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个人合力的产物。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往往有其自身独特的认知和想法，常常会抵制社会规范而我行我素，有摆脱社会制约的倾向，

这种个性表达有时在合适的环境里也会形成气候，改变社会风尚和习俗，甚至影响社会进程^①。于是后过程考古学认为，要解释社会的稳定或变迁，就必须更多关注个人的决策。人类行为不仅受环境适应和社会习俗的影响，而且也应该被看作是有个别人物有明确目的指导的活动。

与20世纪中叶过程考古学认为只要采取科学的实证方法就能减少阐释的主观性不同，20世纪末后过程考古学对考古学阐释的主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将考古学探索扩大到过程考古学所欠缺的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层面。在英国，后过程考古学和过程考古学被认为是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一种方法的成功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方法的消亡。但是，大部分美国考古学家将它们看作是互补的两种方法。过程考古学很适于解释生存方式和经济行为，而后过程考古学则适合解释宗教信仰。

特里格指出，社会科学史表明，人文学科远非是客观的学科。它们的成果常常被用来支持社会和政治运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学科仍能够为人类的历史提供客观的和详细的认识。如果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努力避开当前极端相对主义的陷阱。极端相对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实证主义的欠缺。社会科学家不但要有怀疑的智慧，同时也需要有勇气来相信自己和他们所做的工作。

五、讨论与结语

现代科学思想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这种认识论将世界看作是一种自然和独立存在的客体，通过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以及数学推理方法，能够将经验观察变成洞悉与解释真实世界的科学理论。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知识遗产。对于感官无法证实的事物，人们并不把确定某种见解看作是一个可用逻辑推理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丁文江》一书的作者费侠莉(C. Furth)总结了中国传统认识论常用的三种方法。一是以史为鉴，用过去的成功经验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二是采用信仰调和，注意新旧合并，但不是做出选择。三是模仿，根据概念的感染力来进行梳理。她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最纯的“理性”，这就是既不依赖实证主义的检验，又不依

^① Dornan, J. L., Agency and archae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002, 9(4): 303-329.

赖逻辑推理来分析事物的内在结构。因此，中国认识自然的见解完全是通过冥想而得来的。还有，在早期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最感兴趣的还是西方的技术，重视的是应用学科而非基础理论研究。后来，人们才逐渐体会到科学的巨大力量不仅在于技术，而且在于科学推理的预见性和洞察力^①。

中国人对此也有相似的认识，认为中国传统的认知哲学是“求实”，而西方是讲究“求真”。换言之，中国人讲究实用或强调具体和个别的东西和事件，缺乏西方那种关注一般法则和普遍原理的理性主义探索。然而，经验总是限于已经过去和完成的事情，而科学探究的范围还包含着未来。显然，拘泥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无法满足科学探索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要求，难以从根本上揭示自然和历史的奥秘。理性主义的缺位不仅使中国的自然科学无法发展，也严重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和视野。20世纪初，虽然五四运动为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场科学和民主的洗礼，但是理性主义作为手段和目的都是缺位的。

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为接受西方科学思想提供什么基础和准备，于是考古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它引入的过程中因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它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十分不同。与早期许多西方科学技术引入中国主要是看重它们的实用性一样，考古学也是被作为一种有助于史家寻找地下之材的不陈工具(傅斯年语)而受到青睐的^②，因此中国学界的价值期望还是它在史学上的“致用”而非科学上的“求真”。于是，这门学科基本是被作为一种掘地技术来加以引入和应用的，至于如何从无言的物质遗存来探究和重建历史则缺乏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考古学者除了求助于历史和依赖文献线索之外，便是采用经验主义途径，强调对材料的分类和归纳，而不注重理论假设和建立阐释模式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

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的欠缺，在考古学引入中国的几十年后，我们虽然引进了不少物理化学的年代测定和分析测试技术，但是研究目标和主要学术概念却没有什麼变化。由于物质文化的分期和分区仍被视为考古研究的核心或终极目标，于是类型学方法和“考古学文化”概念，今天仍被一些学者作

① 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期。

为中国的学术正统来坚持，对欧美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心存疑虑。在学术圈内，尊崇师长的教诲胜过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将习得的研究概念当作一种信念来坚持，影响到这门学科的持续发展和年轻一代创新精神的培养。反观欧美考古学，从 20 世纪中叶之前的经验主义发展到 60 年代的实证主义，而后者在 80 年代开始受到相对主义的批评，使考古学者对材料、科学方法与学者自身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考古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面对国际学术进展和中西学术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我们总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应：西方那套东西并不适用于中国，不能照搬，我们需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也许是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每每谈到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我们许多学者就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不屑和鄙夷，认为我们中国人的研究就是不吃这一套。如果从本文对中西认识论的探讨与比较来审视这种观点，那么这种坚持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表述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无非就是文献学导向的研究，西方那套不适用于中国的东西无非就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理性主义的实证研究。然而，大部分考古发现是杂乱无章的物质现象，它们既无法通过文献考证、也无法单靠我们的直觉和经验来了解。所以，考古学必须发展科学的理性主义方法来解读物质现象背后的信息，梳理文化变迁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我们认为不适用中国国情的那套东西，恰恰正是我们研究中最欠缺的东西和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我们的考古仅仅挖东西，发掘没有想法和目标，谈不上解决什么历史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传统文化“求实”的价值取向，使得考古学在传入中国时只将它看作是一种工具和技术，是史学的附庸。而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也凸显了这种价值取舍的偏颇，比如，目前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方法被中国学界所广泛采纳，浮选法也成为发掘过程中必备的操作程序。其实，这些方法都是 20 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新考古学普遍采用的方法。然而在美国，这些研究方法是和文化生态学、系统论以及社会复杂化等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一起发展起来的，用以探究文化适应以及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但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过我们的取舍，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其“致用”的功能而被推广，而与之相伴的被用来解决人地关系互动和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却

被漠视。结果，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缺乏理论支撑而难免流于一种纯技术操作，成为器物类型学的点缀，无法对史前文化的变迁提供深入的认识。因此，我们在考虑引入技术“致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基础理论研究在指导技术操作和进行历史重建方面的重要性。

张光直先生说过，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不是世界的主流，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现代中国出了不少优秀的历史学家，但是没有一个人被国际学界尊为大师，也没有一个人在国际上成为有地位的历史理论家。这是因为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地位，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①。究其根本原因，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认识论的层面上来进行反思。中国并非没有人才，也非资料不好，更非脑子不如别人，而是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束缚了我们的大脑，缺乏理性主义思维是难以培养出可以跻身诺贝尔奖的一流学者的。我们应当意识到，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和出于实用主义的借鉴并非考古研究的康庄大道，单是追求“致用”的价值取向难以产生具有普世价值的研究成果，无法在科学的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

有学者告诫，在当前学术全球化的趋势下，人文科学必须有超越国家的普遍性原理，离开这些原理，就无所谓科学。全球化要求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进行综合的思考。在全球化的时代，学术理论的创新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创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动力。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否则就是自取灭亡^②。

虽然考古学与认识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显然密不可分，因为认识论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门学科研究成果的正当性和可信度。科学认识论会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改变着人们对自然和自身历史的认识。在考古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了解这门学科认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使我们避开西方考古学所走的弯路。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中国考古学界可以参考一下他山的经验，不妨学其精华，但不必蹈其覆辙^③。

① 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俞可平：《全球化与中国学术》，《文汇报》2008年7月6日。

③ 张光直：《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指出，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研究工作中新科技的发展史，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是考古思想的发展史。他说，经验证明，观念上的进步难度最大。要回答历史重建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不如说是来自分析上的进步与理性和观念上的发展^①。因此，中国考古学应该在田野工作和材料积累基础上，重视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有目的地采用理性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和提高研究水平。

（原刊《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版）

^① 科林·伦福儒：《序》，见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一、前言

大家都公认，考古学主要是一门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学科。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的看法，科学是组织化的知识体系，是对观察事实的系统解释^①。对照内格尔的论断来审视当下我国的考古学实践，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比如，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许多学者和研究生论文试图利用海量的出土材料，进行一些宏观的分析和综述，以期获得有关社会文化与历史发展的洞见。但是，这类综述性研究者马上就会发现，发掘报告良莠不齐，并不能提供研究所需的基本材料和信息。虽然这类发掘报告介绍了出土材料的特点，但是对于宏观范围的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几乎毫无用处。还比如，在一些专题讨论中，不同学者用相同的语汇，但含义却不相同。而有些学者拒绝采用别人或国际通用语汇，偏爱自己的语汇，但却没有定义或说明。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议题，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然而浏览这些文献，我们会发现，这些论著中讨论的问题、概念和术语既不统一，也缺乏科学定义，几乎无法达成或提供对某议题的某种共识，各种看法和解释充满了推测性和随意性，所谓的科学见解也纯粹是作者个人观点的表述。再比如，科学研究和方法本来需要不断提高、完善和系统化，以求增进学科的认识。但是，现在的考古发掘似乎成了一种照章办事。特别在抢救

^①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性发掘任务繁重的地方，发掘与承包工程同义。考古人员缺乏思考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发掘不是科学探究，而是成了条件(习得知识)反射和机械操作，或像自己雇用的民工一样成了谋生的一份工作。所谓的研究无非是描述，或继续相信我们相信的东西。

由于我们大学的教育只传授知识，并没有像爱因斯坦所大力提倡的那样，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放在首位^①，于是这种习得的考古学知识就成了被“操纵的学问”，就会像信念一样根植于我们的思维之中，觉得这就是正统的考古方法，在工作中只要按部就班操作就可以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外部缺乏国际交流，内部强调师承，将习得方法奉为圭臬，缺乏反省和批判精神，以至于我们难以认识自身知识结构的缺点与国际水准的差距，产生改善方法和提高研究水准的愿望，甚至会将国际学科的发展和考古方法的更新视为异端。

本文想从考古学发展的角度，审视当下我们习用的考古学方法在学术规范变更和概念转型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以期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少一些对经验和直觉的执着，多一些对学科发展的批判性思考。

二、范例的变更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例或范式(paradigm)的概念，认为这种范例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由科学界予以认可，并确定了值得研究的问题类型、阐释材料的理论以及收集和分析材料的程序。这种范例构成了学界同仁的信仰系统，并在教学、出版物和资质评定中推广。在某种范例中工作的科学家会无法理解在另类范例中工作的同行是如何看问题的。库恩也指出，当一种老的范例无法应对不断积累的材料，或产生的新问题无法被当下的范例所回答时，范例就会发生变更，而科学的发展往往就以这样的变更为标志^②。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知识型(*episteme*)概念，用它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作用及表达的深层框架。知识型的主要规范是认知对象被确定

① 爱因斯坦：《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1936年10月15日在纽约州立大学“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稿。

②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的方式，认知主体的定位方式与认知概念的排列方式。他提出了不同时代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断裂的看法，并划分了文艺复兴、古典时代和现代三个阶段^①。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也以一般性趋势将考古学发展大致分为几个相继的阶段，这就是进化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些阶段之间考古知识有完全的断裂，而是不断完善，老的知识如地层学和类型学被确立之后，仍会在以后的操作中继续发挥作用，但是新的知识结构则远远超越了过去^②。

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从库恩的范例、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考古学也可以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某一范例、知识型和阶段，这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流行的范例。文化历史考古学最初源自德国的学术传统，被柴尔德完善后被国际学界普遍采纳。这种方法就是用分类和类型学来处理大量的材料，用考古学文化来组织这些材料，将其看作是民族学文化一样的研究单位，以便能与古代的族群单位相对应，从而构建起一种类似编年史学的区域文化发展年表。但是，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考古学家很少自称为文化历史考古学家，并认为这就是干考古的正统方法。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宗旨和原理是在其他学术传统如功能论和过程论出现之后，才被其批评者定义的。这一时期的学者很少反省，很少自我意识；另类考古学家如美国路易斯·宾福德的过程论或和英国伊恩·霍德的后过程论思想往往被视为异端^③。

对习得知识的反省往往是一种后知后觉的过程。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新考古学的兴起，对文化历史考古学有许多自我意识，对其优缺点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我国大部分仍然在实践这种方法的考古学家可能浑然不觉，因此了解这种反省，也许对我们不无裨益。

①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②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③ Webster, G., Cultural history: a culture-historical approach. In Bentley, R. A., Maschner, H. D. G. and Chippindale, C. (eds.),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8, 11-27.

1. 分类与类型学

迄今为止，类型学仍然被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但是，我国学者的操作常常将分类(classification)和类型学(typology)混为一谈，将分类、分型和分式等同于类型学研究。许多这类分析并不明白为何要分类，只是注重形式，为分类而分类，以为分类越细就越科学。

根据美国考古学家欧文·劳斯的看法，分类是将器物按材料归组(如陶、石、木、玻璃等)；然后，再根据加工技术、形状、纹饰、功能加以细分。得到的是一种类别(class)和亚类别(subclass)的等级系列。每个类别由相同的物理性质、用途和特点归组。而类型是“这样一组器物，它们共同拥有一批特征，并以此与其他类别相区分”。根据劳斯的看法，分类或类别是经验性的器物归组，而类型是理论和分析的单位，可以被用来定义文化单位，用于分布研究或其他阐释性目的^①。柴尔德指出，考古材料具有令人困惑的多样性，需要将它们压缩到便于科学研究的可把握范围。而“类型”就是一种抽象概念，而分类是一种抽象化过程，只有将材料分类之后，考古学家才能开始解释它们，并从中提炼出历史^②。

因此，从考古分析的操作程序来看，分类是整理物质材料的过程，而类型是为定义考古学文化和确定文化时空分布而从器物类别中挑选出来的分析单位。由此来看，分类或经验性的类别并非都能称为类型，而只有被挑选来定义考古学文化和构建文化时空框架的器物类别才能被看作类型。分类在考古学上的功能有三：(1)规范标本之间的比较；(2)简化材料的登记和描述；(3)提供一种简便的方式对考古材料做初步的观察和分析。而类型学是为了解决特定科学问题所构建的特种分类方法^③。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沃伦指出，类型学是从一批材料中寻找及发现规律和结构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将主观规

① Rouse, I.,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history. In Sol Tax(ed.), *Anthropology Toda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84-103.

② 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③ 陈淳：《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见《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则强加于材料的过程^①。

张光直认为分类与类型学比较接近，但是两者并不相同。分类是指一般、具体和综合的作业方式，而类型学是系统的研究。他提出，分类应该有两个原则：一是分类的标准要明确、客观、有可比性；二是不能为分类而分类，而要有特定目的，如原料、用途、生活内容、人群间的关系等。从器物分类出发，可以进一步研究文化的分类^②。

类型学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相对断代，这是根据器物形制的变化来安置遗存组合或文化的早晚。旧大陆流行的是所谓的“出现排列”(occurrence seriation)，主要根据大量不同类型中关系特别密切器物的存在或缺失进行归组，这是一种按照“质量”进行排列的方法。汤姆森的三期论、蒙特柳斯对欧洲史前史的分期和皮特里对埃及前王朝时期墓地中的墓葬进行相对断代，就属于这种方法。而北美采用的是一种所谓的“频率排列”(frequency seriation)，主要根据器物的流行性原理进行分类和排列。类型出现后被认为会在数量上逐渐达到流行的高峰，然后逐渐衰落。从图表上来看，这种变化曲线会产生透镜状的形态——所谓的船舰形曲线。这是按照一种“数量”进行排列的方式，根据类型的相对百分比或频率来进行相对断代。后来，器物排列主要用来确定聚落和墓葬详细的历时期序，而非早期进化考古学家如汤姆森和蒙特柳斯所做的那样为考古材料进行分期^③。

2. 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文化被认为是欧洲史前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也是目前我国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概念。柴尔德把不同遗址里出土同样类型的组合称之为“文化”^④，并将其定义为“总是反复共生的某些遗存的类型——陶器、工具、装

① Whallon, R., Variables and dimensions: the critical step in quantitative typology. In Whallon, R. and Brwon, J. A. (eds.), *Essays on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Evaston, Illinois: Center for American Anthropology, 1982, 127-161.

② 张光直：《考古分类》，见《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③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④ Rouse, I.,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history. In Sol Tax(ed.), *Anthropology Toda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84-103.

饰品、葬俗、房屋式样”^①。中国学者将考古学文化定义为“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②。从类型来定义考古学文化是基于一种文化规范的思想，认为文化是一批共同和独特规范的集合体，也即文化的规范观。柴尔德说，考古器物类型的相似组合之所以反复共存一处，是因为它们曾经被同时代的同一群人所制造并使用。由共存关系的器物类型所组成的不同组合之所以同时出现，是因为它们为不同的人群所制造^③。根据文化规范性的原理，考古学文化被看作是液态的，时间上会源远流长地延续，而在空间上会像涟漪那样从一个文化中心扩散开去。它们也被视为颗粒状的，由许多本身独有的系列特征所组成，在地图上标出某些文化特征的分布，人们就能确立一个文化的边界并追溯其历史^④。

考古学文化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建立区域文化的年表，并以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为代表。柴尔德利用蒙特柳斯的类型学方法结合确认的考古学文化，为欧洲构建了一份整合的图表。在此之前，蒙特柳斯用器物排列已经建立起区域考古材料的发展序列，并利用区域间交流的器物将欧洲不同区域和不同时代联系起来，最后用希腊有埃及历史纪年的迈锡尼陶器和埃及釉陶珠，为欧洲的青铜时代提供一个日历纪年^⑤。蒙特柳斯的年代学并没有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而柴尔德利用文化的概念来追溯欧洲史前族群的发展，成为重建欧洲史前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创新，被格林·丹尼尔誉为“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⑥。

20 世纪上半叶，北美也采取了相似的方法来构建区域文化的发展。但是考虑到文化是一个比较杂的概念，所以尽管美国考古学家采用了与柴尔德不同的术语，但是内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美国考古学家将遗址的单一栖居单

① Childe, V. G.,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② 安志敏：《考古学文化》，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④ Webster, G., *Cultural history: a culture-historical approach*. In Bentley, R. A., Maschner, H. D. G. and Chippindale, C. (eds.),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8, 11-27.

⑤ 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⑥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位称为组构(component),某组构出土的所有器物称为组合(ensemble),组构和组合被认为相当于一个社群(community)的活动单位和文化遗存。具有相同器物的组构被归入“点”(foci),而具有相同主要特征点归入“面”(aspect)。而“点”和“面”对应的就是部落那样的族群,好比欧洲的考古学文化和文化区。美国考古学家就用它们来构建北美的区域文化年表,将文化的历时性延续称为“传统”(tradition),将地域上的共时性分布称为“层面”(horizon)。

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认为全国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文化的内涵、分期和年代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可以对史前期的文化发展进行编年,以追溯它们的传承关系和渊源。他还认为目前中国有57个民族,史前期的部落和部族数量一定更多,他们很可能就是这些不同文化的创造者。他认为,虽然将文献上的族群与考古学文化人为地联系起来,从长远来看是一种可能的方向,但是目前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充分,还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他进而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区系类型的主要功能是“着力于把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及相互间的关系搞清楚……然后,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①。

3. 问题与争议

20世纪50年代,欧美考古学界对一些主要概念一直存在争议。对于类型的争论,主要是考古学家定义的类型究竟与史前先民的分类相合,还是考古学家自己主观创建的分析单位,也即类型自名(emic)和他名(etic)的问题。比如,美国考古学家阿尔伯特·斯波尔丁认为,类型在经验性上是真实的,它们潜在对应于其制造者的自名类型。他认为,类型能够用统计学和质量比较来发现^②。但是,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福特则认为,类型是被用来对文化

^①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② Spaulding, A. C.,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the discovery of artifact types. *American Antiquity*, 1953, 18: 305—313.

连续体加以分割的分类方法，它们对衡量文化历史并没有什么用处。他注意到，当分析样本数量和范围较小时，类型看上去好像是真实和自然的，但是当样本覆盖面扩大时，它们会开始重叠和模糊，类型的规范或平均值会发生变化^①。张光直认为，如有必要应该辨认古人自己的分类，即自名类型，以便使我们与古人相通。但是他也指出，我们不必完全着眼于与古代社会相同的分类，我们可以用科学家的眼光做出其他分类^②。

虽然目前类型和类型学仍被用来处理考古材料的年代学问题，但是由于范例和研究目的的转变，需要建立能够满足其他研究目标的新概念。从文化的适应和功能来看待考古材料，那么传统类型学将所有出土文物按形式加以归类的分析方法就不适当了。因为像类型学这样凭借单一参照体系的研究只是将不同器物根据其质地、形制和纹饰放入孤立和互不相关的鸽子笼般的类型范畴中去，它并不能使我们了解它们在人类生存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以及适应意义。不同的物质文化，在人类生存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类型学的分析让我们看到的像是一堆堆按大小或形态归类及互不关联的骨骼，而不是像复原装架后的动物骨架，可以让我们了解动物生前的形态与行为。实际上，物质文化遗存的特点与组合方式可以反映已经消失的文化系统，这需要考古学家采取完全不同的参照体系来将这些物质遗存归组，以便重建文化运转的系统结构。于是，发掘出土的所有材料都需要收集和不可偏废，包括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生态物。这些材料被看作研究文化与环境互动的各种变量和参数。在这种视野的研究中，各种考古材料不再是类型学罗列的静态序列，而是要整合所有文化和环境资料来重建史前社会文化的动态过程。

类型学方法在构建史前文化时空关系的问题中，不只有分类主观性和随意性的问题，还有具体操作上的难度。用少数几种代表性类型的一致分布来确定考古学文化的界线是极其困难的，这些问题因类型分布界线模糊、混杂、

① Ford, J. A., On the concept of types: the type concept revisite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4, 56: 42-53.

② 张光直：《考古分类》，见《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重合、交融以及类型式样的渐变，会随样本涵盖量和规模的增加或从数量上来衡量时变得更加严重^①。劳斯指出了考古学家从材料分布来建立文化区时的困难，因为“文化区并不像自然区那样会随时间而保持稳定”。于是他建议考古学家用材料来确定：(1)最为相似的各文化中心，在那里存在几个不同的文化，因此不大可能定义单一的、文化同质性的区域。(2)主观的地理分区。(3)具有某种文化同质性的地理上隔开的自然区域^②。

对于考古学文化的争议，还在于文化概念是否能够对应族群的问题。虽然柴尔德认为考古学文化代表了一群人共同的行为方式，但是他也认识到，将考古学文化与所知的族群或语言群相对应是一个推测性和十分危险的做法。他认为，文化只能指称一种非特指的“人群”(people)，而这种“人群”并不一定是某特定人种、讲某种语言或以一个政治单位行事，其社会的确切性质同样很难纯粹从考古材料来确定^③。考古学家认识到，单一形态的物质文化与某社会或政治单位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特里格指出，考古学文化无法以任何一种机械方式与诸如部落、游群或民族这样的社会群体相对应。其理由不只是一个材料不够充分的技术问题，而是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未必与社会或政治结构相一致。比如，北美的休伦部落是四个部落组成的联盟，而且在许多方面与易洛魁人相近，却只能分辨出一个考古学文化。苏丹的努尔人和丁卡人拥有大致相同的物质文化，但却是彼此敌对的部落。古代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如甲骨文中记载了55个与商敌对的“方”国，它们或处于商的控制区外，或以飞地的形式生活在商的疆域内。但是，从考古遗存根本无法分辨这些不同的族群，而表现的是一种相同的“商文化”^④。特里格指出，各种术语如商文明、商时期、商民族、商代、商国和商文化是范畴不同的概念，不能

① 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 Rouse, I.,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history. In Sol Tax (ed.), *Anthropology Toda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84—103.

③ Childe, V. G.,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Schuman, 1951.

④ Keightley, D. N.,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1978—1980, 5: 25—34.

互换。商代国家要比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商文化和商文明范围小得多^①。同样，文化特点相同的玛雅文明是由许多敌对的城邦国家组成的。可见，物质文化相同未必能分辨族群，或证明其代表的人群必定拥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意识，而物质文化不同也未必能证明缺乏这种认同意识。因此，试图用物质文化共性来分辨史前人群实质上是劳而无功的^②。特里格还指出，考古学文化概念比较适合研究小规模、同质性的和较为定居的群体，如“中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流动的游群随机接触比较频繁，考古学家面对的是广阔区域内分布着基本相同的工具组合，无法发现地理界线清楚的文化。而在复杂文化中，社会和经济差异会在社群内产生极大的异质性。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文化和政治的界线更加难以对应，使得考古学文化在研究许多问题上变得毫无价值^③。

最终，考古学家认识到类型学与人群概念之间的悖论。分类方法是考古学家的一种分析工具，是试图将材料令人棘手的多样性缩小到分析可以掌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分类的过程中，我们略去许多看似无关和难以处理的材料和差异，以便集中在一些可以归组的共性和显著特征上，使得分析的器物组合和文化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貌似相近的关系。戴维·克拉克也指出，考古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材料非正常分布的产物，这些材料既受制于其内在的局限性，也受制于我们研究手段和水平的局限性^④。所以，这种分类得出的共性和历史关系很可能是一种人为的“错觉”，其结果是否与古代人群之间真实的共性和关联相对应是很成问题的。类型是一种用于分析的抽象概念，如果不用这种抽象办法，材料分析就无从入手。史前人群是十分具体的对象，他们以十分复杂的行为塑造了自己的文化。类型学抽象分析得出的某种文化关系并非就是史前人群的真实关系。美国考古学家李·莱曼等认为，将两种不同的原理——类型学和史前群体概念加以调和来分析考古材料是一种“真实

① Trigger, B. G., Sha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0, 1: 43-62.

② Trigger, B. 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Time and Tra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5-121.

③ Trigger, B. G., Major concepts of archae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ime and Tra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8, 96-114.

④ Clarke, D. L., Archaeology: the loss of innocence. *Antiquity*, 1973, 47: 6-18.

性的错误观”。考古学家徒劳研究的诸如类型、文化、传统等类型学的单位，只不过是一种人为抽象的时空板块，不一定是史前族群真实的历史^①。

在我国的考古学传统中，考古学文化的重建被看作是“重构国史”的实践。然而，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和杰里米·萨布洛夫就对这种“文化历史学的重建”做了一个恰当的评价，认为这种重建只不过是将区域的考古材料用一种时空框架来加以整理，充其量只是一个用水平行列代表年代分期，用垂直纵列代表地理分区来予以安排的年表^②。由此可见，虽然考古学文化试图像模仿文献一样来追溯史前人群的历史，但是它充其量只能限于器物的年代学研究，无法真正做到“透物见人”。

正是类型学方法内在的诸多缺陷，导致了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衰落，让位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今天的欧美，虽然文化历史考古学不再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并没有完全失效。它仍在社会条件支持探究族群历史和民族身份的地方存活，也在受人类学影响较小的考古学家中保持着影响。罗伯特·普罗塞尔和伊恩·霍德认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作用或功效在于描述某地区的考古发现，将遗址与器物归入可供比较和断代的文化单位，为文化特征的发展、传播和迁移构建一个时空框架^③。因此，文化历史考古学仍然能为低层次的理论如何何时何地等问题服务^④。

三、概念的重构

库恩指出，当一种老范例无法应对不断积累的材料，或产生的新问题无法被当下的范例所回答时，范例就会发生变更，而科学的发展往往就以这样的变更为标志。对文化历史考古学不满和反叛的先声是哈佛大学沃尔特·泰勒于1942年完成、194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泰勒将传统的文化历史

① Lyman, R. L., O'Brien, M. J. and Dannel, R. C.,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Plenum, 1997.

② Willey, G. R. and Sabloff, J. A.,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4.

③ Preucel, R. and Hodder, I.,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in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6.

④ 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学研究批评为“纯粹的编年史”。他认为物质遗存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本身，呼吁考古学家应该将遗址当作一个生存系统来研究，努力尽可能多地从考古遗址中提取信息，包括看似微不足道的证据来了解人类行为的信息，以便对遗址出土的材料做综合分析，这样考古学家就能像民族学家一样对文化的性质和运转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泰勒视文化为包含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组成部分在内的功能运转实体，考古学家必须从内部来加以整体研究^①。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考古学的转型主要表现在对生态学和聚落形态的关注，并受到了强调文化规律的新进化论人类学日益普及的推动，于是引发了范例的变更和概念的重构。朱利安·斯图尔特大力倡导文化生态学，将文化看作是一种适应系统。他呼吁考古学家不要专注于器物的形制分析，而要用他们的材料来研究生存经济、人口规模和聚落形态的变迁。而他自己也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志的聚落形态材料研究美国西南部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互动^②。

斯图尔特还推动了聚落考古的发展，并以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为先河。他说服威利将聚落形态调查作为维鲁河谷计划的组成部分，研究几百个史前居址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而威利在他的工作中超越了生态适应和人地关系，将聚落形态看作是有关人类行为诸多方面的信息来源，并将它们从一种社会关系的演化系统来解释。威利的研究成为运用考古材料来解释长时段社会和政治演变的重大先驱性努力，激起了全球范围内对社会复杂化进行深入的区域聚落形态调查。威利在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成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被认为是自汤姆森三期论突破以来最重要的发明。斯图尔特还倡导一种多线的、生态的和较为经验性的方法来研究文化进化，从一般进化来研究社会演变的规律。于是，一种被称为“新进化论”的范例在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和埃尔曼·塞维斯运用民族志材料，用社会进化的类型学概念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建立起直线递进的、推测性的和高度一般性的序列。这种考古学探究的新取向，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新科技引入考古学而成为可能，特

① Taylor, W. W., *A Study of Archaeolog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83.

② Steward, J. H.,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别是威拉德·利比在 1948 年所建立的放射性碳测年方法。从功能(文化的适应)与过程(演变的动力和原因)的视角来分析考古材料,使得文化历史考古学对年代学和民族身份日显技穷的专攻,最终被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变迁的全新探究所取代。对文化研究兴趣的衰退和对人类行为研究兴趣的增强,预示着史前考古学进一步变革的到来^①。

考古学研究的转型可以从几个关键概念的重构来回顾。这种概念的转移表明,在考古学构建起考古材料的年代学框架之后,应该是深入探究和解释文化异同和社会变迁的时候了。

1. 功能论与过程论

由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作用主要是解决年代学和文化关系问题,在了解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演变上无能为力,于是欧美考古学家开始另辟蹊径来研究史前史。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从文化与环境以及社会内部结构的功能关系来了解文化变迁,这种方法的早期努力是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也即人地关系,将文化看作是人类适应的一种手段,努力了解人类是怎样生活的,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就是指导这类研究的理论。后来的功能方法则设法了解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和互动,也即所谓的过程论方法,这种方法意在了解文化系统是如何以及为何不可逆转地发生变化。功能论和过程论方法往往是一起应用的,两类解释不仅密切相关,而且是互补的,不了解文化的功能,就无法解释它们的运转与变迁^②。早期的功能-过程论方法以 19 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冢研究为代表,它对瑞典学者孢粉和植物研究及环境考古的发端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虽然考古学家主要的精力放在构建区域文化年表,并以传播迁移论来解释文化变迁。但是随着欧美考古学文化区域年代学的日益完善和功能方法的迅速发展,功能论和过程论方法逐渐开始取代文化历史学方法,最后,新考古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后一方法发起反叛而最终成为考古学的主流。

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2. 系统论

在新的范例中，考古学文化被看作是功能运转的系统而不是特征的集合体或各种器物混装的口袋。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将文化看作是“人类超肌体的适应手段”，于是文化系统应该从其对自然环境的波动、人口压力的变化以及与邻近文化系统竞争的适应性了解来解释^①。用“系统”取代“文化”，或从人地关系的互动来分析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就必须发生变化。比如，以工具和器物定义的考古学文化在分析文化传承或传播外，是否也要考虑不同文化对相似环境的适应？是否需要在确定它们的文化关系之前排除功能适应上“趋同”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文化在发展了几百年后会变得差异很大，所以祖裔传承的同一文化可能因环境变迁，在几百年后会变得比同一时期中相邻的两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更明显。考古学又如何解决考古学文化异同观察时所必须加以分辨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再有，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文化分析和衡量尺度主要是立足于一批典型器物的存在与缺失，这种研究一般是采用分类详述的方式。如果不了解器物工具变化和兴衰的原因，那么考古学文化的分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的比较，它无法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显然，文化生态学与系统论的结合为考古学找到了研究文化演变动力的切入点，从而将考古学局限于器物表象的静态分析转向社会生存系统的动态研究，为重建史前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新考古学将文化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文化系统的运转受制于各种不同因素，而考古学就是要研究造成文化相似和变异的那些原因。系统论早期的一些出色研究就是从经济、人口和其他社会特征的变化和某一环境在漫长时期里相互作用来研究社会文化的演变。系统论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宏观角度来观察社会与社会、社会与环境之间互动和发展的过程^②。

系统论将文化分为不同和相互依存的亚系统，生计、经济、社会结构、贸易、宗教各亚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并与周边的生态系统和相邻

^① Binford, L. R.,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2.

^② Plog, F. T., Systems theory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5, 4: 207-224.

文化系统互动。文化被看作是一种以积极或消极反馈过程来进行自动平衡的系统，某个亚系统的变化会牵涉到其他亚系统的联动，并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变迁。以一种相伴关系而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观察亚系统之间的作用和运转，可以避免单因论的推断。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要留意起主导作用的多变量因素，并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使得考古学能够从动态和功能结构来从局部分析整个文化现象，进而深入探讨和推论考古学证据不足的那些社会文化方面，如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①。

3. 社会规律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美国民族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就呼吁考古学家努力发现主导人类行为的法则，以解释文化是如何及为何演变的。沃尔特·泰勒就将建立一般法则看作考古学的最高目标。这是美国学者将社会规律研究看作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希望考古学成果能够与其他社会科学比肩的一种体现。于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特倡导人类发展的一种进化观，并成为新考古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这种进化概念认为，世界上不同社会或文明尽管其文化特征、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的具体细节迥异，但是各自的发展轨迹可以用几个一般性的社会类型如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来追溯，而考古学研究就是要寻找这种一般性发展趋势的内在规律。这种研究也采取了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视角，认为有少数关键变量如生态环境、技术和人口主导着社会文化变迁。于是，研究这些变量的运作就能发现社会演变的普遍规律。美国新考古学家把社会规律研究看作优于历史重建的目标，将考古学的历史研究看成是描述性的、年代学的和归纳法的浅薄操作。但是特里格认为，考古学从其处理的材料性质来看，最好还是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无视理论和通则。历史学研究涵盖了对过程以及对事件和年代学的关注。任何一门历史学科的目的，不仅要描述，而且也要解释特定的事件^②。

① 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② Trigger, B. G., *Current trend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Time and Tra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8.

4. 实证论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操作基本上是一种归纳法，从收集材料来做分析，从经验直觉来下结论，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被批评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虽然经验主义强调材料的客观性，但是凭材料说话仍无法排除主观判断的错误与直觉的偏差。科学实证论的发展是意识到材料和现象具有蒙蔽性，单凭归纳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材料和现象背后的潜因。于是，美国新考古学提倡引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强调用逻辑推理的演绎法来梳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并对分析的结论进行检验，以防止偏见的产生。从考古材料来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所要解决的也都是不可直观的问题，必须用演绎法来探究。演绎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于是理论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它是一种对主导种种现象内在关系潜在法则可予以检验的假设和尝试性的系统陈述。实证论的考古研究无不以问题为导向，于是考古发掘成了搜寻证据，分析研究便是验证各种可能性假设的过程。这种研究对于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有了大量事实提供的证据链，考古学家才能够从逻辑上证明自己设想的对与错。这和归纳法从材料积累和表象观察直接得出结论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5. 面对新概念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虽然我国学者对欧美考古学的新进展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在借鉴国外经验时仍然问题不少。目前我们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理论薄弱、概念模糊、方法脱节、田野工作缺乏问题意识。

虽然我国许多学者对美国新考古学的价值取向并不认可，但是对几十年来我国环境考古学和聚落考古学的发展持积极态度，而且这些领域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实，环境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是新考古学功能论和过程论取向最关键的特征。显然，新考古学的方法已被我国学者普遍认可，浮选法和动植物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发掘的常规操作，而聚落形态也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由于我们并没有采取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理论概念，环境考古和聚落形态方法大都成了无的之矢，或成了对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补充。我国学者虽然认识到聚落考古在研究社会结构和文化功能上的潜质，但是研究物质遗存的方法仍没有跳出类型学的窠臼，这就无法从遗存的功能和动态过程来探究史前社会的运转和与周边环境 and 文化的互动。结果，环境考古和聚

落研究和类型学分析成了两张皮，只是考古报告的一份附录，根本无法说明人地关系互动和文化的变迁，无法达到透物见人和探究社会文化演变的境界。这表明，考古研究并不是仅凭提升技术手段和科技含量就能改观和推进的。因此，在采用新方法的同时，也应该同时更新理论和分析概念。有学者告诫，一种考古学实践的范例，其目标、理论和方法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不了解这种成功实践的具体情况，就无法加以利用^①。张光直也指出，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论既是考古作业的指导，又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总结。有了理论，考古实践就能避免盲目性，引导我们不断探索各种历史和科学问题。张光直也坦言，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②。

还有，就是习惯传统文献和马列经典术语的我国学者在面对国际新术语和新概念时出现的困扰。比如，由于考古学在了解和解释社会长期变迁中的潜质，于是社会复杂化成了聚落形态研究的主要目的。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概念被用来构建社会演化不同阶段物化与量化的一般性特点，以便能帮助考古学家从物质现象来判断史前社会的发展层次。像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的文化进化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进化模式一样，新进化论的模式和类型也是一种抽象的社会递进序列，以便构建社会演变的一般性通则。受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学者偏好摩尔根和马克思主义的直线进化模式，习惯于将考古证据和这些进化模式的经典术语对号入座。在新进化论的术语传入中国之后，因不了解其由来和定义，学界对酋邦这个术语的理解出现了一定的误区和争议。有的学者认为酋邦和部落联盟是两种不同的准国家形态^③，有的学者认为它在启示部落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之外并无普遍意义^④，而有的学者认为它不适

① Habu, Junko, *Ancient Jomon of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张光直：《序》，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用于中国^①。面对国际学界的理论模式，一些中国学者更加偏好采纳自己构建的社会进化模式，如苏秉琦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或“古国、方国、帝国”的概念^②，以及严文明的“古国时代、王国时代、帝国时代”的概念^③。对舶来之词的不满或不屑，反映了理论概念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学者更愿意采纳源自典籍中的传统术语，以体现中国考古学的民族主义特色。但是正如刘莉所言，问题不仅仅在于是用外来术语还是传统术语，最重要的是与该术语相关的研究方法^④。西方术语有社会科学的严格定义和物化及量化的标准，如人口规模、聚落等级、社会分层、管辖和再分配方式等。这种标准为社会复杂化的“异质性”和“不平等”过程提供了一个衡量依据。横向的“异质性”是指社会成员之间职业和身份的分化，而纵向的“不平等”是指社会内部的等级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某一社会的形态^⑤。中国学者构建自己的学术概念无可厚非，需要改善的是应赋予各种概念以严格的科学定义和量化标准，否则这些概念难免流于一种标签，既缺乏实际操作上的指导作用，也无法与国际学界进行对等的交流与沟通。

虽然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但是学者们对待理论和方法的态度却并不相同。张光直说，技术和方法是我们手中的工具，它们具有中立性，没有阶级性和民族性，也没有国家性。但是理论则不同，考古学家因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民族而有不同的立场^⑥。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也持类似的想法，认为理论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个人的标签。学者选择理论犹如选择党派与信仰，意味着隶属于某个群体或派别。因此，采纳新的理论，

① Yang, Xiaoneng, Urban revolution in late prehistoric China. In Yang, Xiaoneng (ed.),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9-137.

②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③ 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 年第 1 期。

④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

⑤ McGuire, R. H., Breaking down cultural complexity: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3, 6: 91-142.

⑥ 张光直：《泛论考古学》，见《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要比借鉴新技术和新方法困难得多^①。正是我国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脱节，使得高新科技手段成了类型学研究的时髦点缀和科学主义陪衬，而非破解历史难题的一柄利器。

6. 问题意识

我国相当部分的田野发掘，特别是抢救性发掘是一种照章办事，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遵循一条不变的道路盲目自动地向前走”^②，这种发掘的盲目性是缺乏理论指导的直接后果。缺乏理论思考的考古发掘，表现为发掘之前没有一定的目的，挖到什么就收集什么材料。这样的发掘往往以典型、罕见、精美和完整的器物为目标，并不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具有理论指导的发掘是有目的和带着问题的发掘。有了解决特定科学问题的目的，发掘的范围、如何发掘、所要采集的样本种类，以及分析的内容和步骤都需要做仔细的设计。所以，带有理论思考和研究目标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为了分析特定的材料和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收集科学证据。

张光直概括了考古学的四个基本概念：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材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和总结^③。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认为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观念和理论，二是研究方法和技术，三是田野考古发现。问题和理论主导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且指导寻找哪些考古材料或样本；方法和技术根据设计要求，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息；田野发掘则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的要求采集样本^④。这三个方面都是彼此衔接，相互依存的。如上所述，如果没有特定的问题意识，方法的选择和好坏就没有标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

在当代考古学中，田野发掘就是科学研究的采样过程，它是根据问题和

① 保罗·巴恩：《当代学术入门——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张光直：《序》，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张光直：《序》，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研究目标寻找适当的材料和证据，这种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需要满足严格的特定要求。比如，研究人类生计变迁的环境考古需要采集各时期地层中所有的动植物样本，计算它们的百分比和卡路里含量，然后从这些材料的种类和数量历时的百分比消长来观察食谱的变化。而人类使用的工具也被用来分辨开拓和加工食物的方式和功效。如果从聚落形态来研究社会变迁，那么需要从个别房屋、村落布局、区域聚落分布中寻找各种不同的材料，以便提炼生态环境、经济、交换、人口规模、家庭结构、管辖体制等方面的信息。而漫无目的发掘所获得的材料对于任何的探索性问题都毫无用处。因此，我们需要对目前承包工程式的抢救性发掘进行反思，抢救是为了保存有价值的材料，以便为深入的科学研究保存珍贵的资料。但是，发掘者本身没有问题意识，结果在发掘过程中难免会疏漏大量解决各种问题必不可少的资料。由于考古材料不可再生的性质，以致这种发掘实质上是形式主义的抢救，是在抢救名义下的破坏。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颁布了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制定的田野发掘细则，为发掘和采样工作制定了新的规程，这是我国考古研究科学化的可喜进步^①。在大部分田野工作者缺乏问题意识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的情况下，要求发掘采样按严格步骤操作和达到基本的标准和要求，至少不要疏漏任何重要的材料和遗迹，为今后的综合研究和比较分析提供某种基本的保证。

四、小 结

从本文开头内格尔的论述来看，中国考古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停留在田野发掘和材料积累上，应该努力将海量的考古资料变成组织化的知识体系，并为各种考古材料和现象提供解释。我国学者认为考古学的目的是“重构国史”，但是这种“国史”不应只是器物类型和考古学文化的描述和年表，而应像特里格所言：“重建的目的总是意指解释。”^②张光直也曾批评

① 赵辉、秦岭、张海、孙波：《新形势新需求新规程：新修订〈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相关说明》，《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② Trigger, B. G., *Aims in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Time and Tra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8, 19—36.

国内的研究只是一个陈述，缺乏进一步的证明，难以令人信服^①。

内格尔说，科学的解释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并需要追求统一的说明体系，将科学与常识区别开来。虽然分类是梳理和组织材料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但是没有人会将分类结果和目录看作是一门科学。目前对于大量材料的综述和解释，如果还是基于经验和常识的话，那么他的观点很可能只不过是利用各种材料的胡乱拼凑来发挥不着边际的猜想。常识虽然也能为现象提供解释，但是它可能是先入之见的结果，而且经常不加批评和检验就予以认可。而且这种解释经常受到学者的兴趣和对材料的选择，以及自身社会价值观和无意识偏见的左右。科学有别于常识在于它是组织化的知识体系，是系统化的常识。科学意在发现各种现象和事件发生的条件，以便从那些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来说明相关的现象和事件。因此，科学对现象和事件的系统解释是说明它们产生的因果关系，揭示不同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解释，科学陈述必须重塑日常语汇以减少它们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提高专业性。这种语汇还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种抽象性是科学知识的显著特点^②。

我国考古研究的科学化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张光直生前对此有许多切中时弊的建议，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他曾大声疾呼中国考古学应该争取做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③。我觉得，近年来我们在技术国际化方面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现在是需要向“理论多元化和方法系统化”方向努力了。要向这个方向努力，首先需要大家有问题意识，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学者与匠人无异，技术现代化和方法国际化也是白搭。考古研究有不同层次的探索问题，一般来说就是六点，即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何地(when)、为何(why)和怎样(how)。要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方法，解决年代学和文化关系问题的类型学材料对解决其他问题并没有什么用处。由于考古发掘(包括抢救性发掘)是一种破坏，因此考古学家有义务收集一批基本的材料，为其他学者和子孙后代保留

① 张光直：《中国考古向何处去》，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张光直：《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尽可能多的信息，否则重构国史将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

“理论多元化和方法系统化”是一体化的操作，这是指面对各种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来进行攻关，这样采用什么方法和应用何种先进技术来解决问题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中国考古学的区系文化类型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现在应该是转向文化功能和过程问题的时候了，也就是探究人类生计、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高层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尤其需要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学者的成功经验，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材料的描述转向科学的探索 and 解释，为这门学科建立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也是重构国史的必由之路。要做到这点，我们起码要有清晰的探索目标、让各种术语概念有明确和统一的定义，推理分析要有严密性、逻辑性和规范性。如果缺乏这些科学规范的控制，那么许多各抒己见的争议、商榷和批评就难免只是一己之见，是尝试性或经验性的一种表述。此外，我们还应该建立克服偏见的科学自动校正机制，强调自我意识，鼓励负责任的批评。我们必须超越经验直觉，学会理性思考，特别是批判性思考^①。只有掌握这些科学思维方法和严格遵循科学规范，我们的研究、讨论和争议才有望消弭分歧，增进共识，朝着提高认识的共同方向前进，而非一直停留在众说纷纭、聚讼不断的层次上。

最后，我们应该响应张光直生前的呼吁：多了解世界考古学家的工作，看看我们能够学些什么，又能贡献些什么。他提出过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三部曲：一是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学科主流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二是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否为解决全人类的问题做出新贡献。三是采用世界通用的语汇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交流^②。如果要朝这个方向前进，那么中国考古学范例的变更和概念的重构无疑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原刊《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① 文森特·鲁吉罗：《超越感觉：批判性思考指南》（顾肃、董玉荣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张光直：《中国人文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作为历史科学的考古学

自国际考古学新思潮传入中国以来，考古学的学术定位之争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针对欧美考古学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我国一些以主流地位自居的学者坚持自己历史学定位，重申中国考古学“重构国史”的既定方针^①。诚然，中国学者强调自己的史学癖以及眷恋编史情结无可厚非，但是这不应该作为我们漠视国际学术潮流迅猛发展和坚持守旧抱拙的口实。如果以“重构国史”来强调“薪火传承”，进而作为我们排斥和抵制当代科学新思潮和新方法的理由，这门学科的前途何在？

中国考古学定位的历史学和人类学之争，归根结底是学术理念的反映。学术的本意是经验知识和理论方法的交融和相互促进，“学”是学科知识的积累，而“术”是指理论方法的精进。如果我们用“学术”这两个字，而不是用考古发现资料的积累来衡量中国考古学的成就的话，现实实在是很令人惭愧。尽管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量的史前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遗迹，并自我感觉良好地宣称已建立起史前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脉络，弄清了远古文化的内涵和差异云云。但是我们不妨反躬自问：除了一些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推测之外，这些考古发现究竟为人们提供了多少明了而清晰的历史知识？

中国考古学发展初期存在的两个致命弱点，今天已成为妨碍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症结。第一，科学考古学方法当初只是作为一种技能被引入

^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文物》2002年第7期。

中国的，主要被中国学者用来寻找史籍中匮乏的历史证据。于是在中国，考古基本上就是“干考古”而已。第二，在工作初期，考虑到出土材料的不完整和考古工作者阐释能力有限，夏鼐先生要求中国学者只发表材料，而避免进行贸然和随意的解释。从当时来说，这一谨慎举措十分得当而且必要，但是恪守这一惯例使得后来的大部分考古工作成为一种照章办事的技术操作和纯粹的资料积累，严重影响到考古研究一个至关重要环节的提高与完善——现象与材料的解读和信息提炼。

我们现在明白，考古学研究不仅包含一套发掘和采样技术，而且和分析与阐释的理论方法密不可分。没有理论的指导，盲目发掘出来的材料对于了解和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充分。在考古学引入中国的初期，考古学的操作仅仅就是为历史学者寻找证据，用于解决有争议的上古史问题，所以在这种史学导向的发掘中，考古学不需要独立的思维，理论方法也毫无用处的。我们可以从李济对西阴村和殷墟发掘中，体会到那种纯粹史学导向的局限性。但是，考古发现更多面对的是与史籍无关的内容。这些人类历史上遗留的大量物质遗存如果不是用独立的理论方法来加以分析和研究，提炼其中的各种人类行为的信息，单凭考古学家常识和经验的推测是无法将原始材料转化成历史知识的。

考古学发掘方法、分析技术和阐释理论构成了“术”的范畴。有了“术”的精进才可能有“学”的长进。然而，我们现在对“术”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层次上，尽管有人称这两种方法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但是它们的功能仅限于对考古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与人类行为的信息提炼无关。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大量精力放在第一手资料的积累上，因此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除了那些直接能提供文字证据的材料之外，其他的物质遗存在没有经过技术分析和理论阐释的情况下是无法提供历史知识的。

于是，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重构国史”的情结上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艰苦的释读工作将堆积如山的考古材料转化为可信的历史知识，考古学家如何来“重构国史”？如果考古学家自己没有“透物见人”的能力，他对发现的材料自言自语究竟能够为我们增进多少对历史的了解？因此，从知识积累的“学”的范畴而言，中国考古学也是值得检讨的。因为，发掘出来的资料再多，学者们对它们的分类和分期无论如何详尽，如果没有细致的信息提炼，它们仍然是一堆堆无言的标本，而不是对国史的重构。

一、历史学与考古学

历史学从其词义而言，是研究自古至今的演变。相对于自然史的人类史研究，历史学的学术范畴要狭窄得多，它基本上是将人类发生的事件按年代学序列加以编排，这一领域的学者大部分以一种传记方式来处理材料，而他们研究的对象都是文字记载的史料。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没有文字资料也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学^①。

由于历史学主要依赖文字记载，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人类的发展已有 300 多万年的历史，而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超过 5 000 年。在世界许多地区，这段时间往往更短。像美洲印加和阿兹特克帝国由于没有书写系统，也处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之外。于是，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学研究仅限于一小部分的文明社会，而且其时间跨度也相对有限。即便像中国这样文献记载十分丰富的国度，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许多细节和复杂性也不可能全部从文献来予以全面了解和重建。

史前史和史前考古学是针对编年史之外的时期或历史材料的研究，这门学科主要通过一套技术和方法，从人类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入手来独立了解历史。由于在这段时间里仅仅是人类的“物质文化”被保留至今，因此史前史的重建关键在于对文化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了解。然而，由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对物质和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很不充分，在历史学导向的中国考古学中几乎很少予以关注。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前考古学家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用物质文化发展的年代学来重建人类的史前史，而难以企及这些物质文化演变的性质。

在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中，人类的历史证据是过去人类生产和使用的器物和它们所处的相关背景，考古学家就是对这些物质遗存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来了解人类的活动和社会的形态。考古记录的主要缺点是：(1)不完整性，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仅仅是人类活动的一小部分，相当部分的物质文化因各种保存原因而无法保留至今。(2)非直观性，许多文化性质如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特征必须从物质遗存来进行间接的推断，即使是经济和技术

^① Trigger, B. G., *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 of Prehist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形态从考古记录上观察有时也并非一目了然。

由于从物质材料来观察人类行为和重建历史的难度，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家的研究与文献探讨主要集中在发掘技术和对考古材料的分类处理上，而避免对文化历史的性质做任何贸然和草率的解释。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缺乏有效的断代技术，考古学材料的断代工作已经耗去了学者们的大部分精力，使他们无暇顾及其他深层次的问题。

在历史记录比较丰富的文明古国，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考古学更容易被用来作为对文献研究的补充和说明，因此考古研究有可能变成对文献研究的一种补充。其实像埃及古王国时期以前和中国秦汉之前，由于文字资料的贫乏，这段时间也很难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方法来加以研究，而必须主要依赖考古学的探索。

将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放在历史学范畴之内并没有错，中国学者的编史情结也无可非议。但是问题在于，像目前这样对考古发现进行描述、分期、分类是否就等同于重构国史？在还没有能充分解读出蕴含在物质文化中的人类行为信息的情况下，考古学家又如何重构国史？建立在少数典型器物分期基础上的史前区系文化类型是否就能等同于国史？中国学者对夏代的广泛心理认同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准”信史？中国学者将历史学问题置于考古研究的中心地位，并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机械对应的研究方法是否已经代表了考古学的最高境界？

再从当代社会科学的概念上来进行理解，仅仅将考古学服务于史学研究是否就能胜任“重构国史”重任？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 Braudel)提出过三种层次的历史研究。先是表面层次，是他称之为个人时间的历史事件。在这些表面事件之下是较为缓慢的律动，包括由经济学家们所分辨的、也许以几十年为衡量期限的循环。最后，在这些律动之下是基本的、往往最终取胜的长期趋势。由此可见，就目前中国学者对地下出土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碑刻墓志、陶文封泥的积累，以及将器物和遗迹的研究来补充文献的研究方式而言，也未必能达到现代历史学研究的境界。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献记录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福气，无疑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有极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应当不加鉴别地根据它们的表面价值全盘接受。我们也不应忘记文献信息保存下来的偶然性以及一个社会中文献

的特殊作用与背景。偏重文字记录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们会用其自身的观点和偏颇影响我们，以至于它们不但为我们的问题提供答案，而且无意中限定了这些问题的性质，甚至我们的概念和术语^①。

因此，将考古研究看作是编史学的辅助工具，与立足于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的独立研究来重构国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目前，在强调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定位的主流学者中对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献对于考古学家不过是一类特殊的研究材料而已，它们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对分析和阐释过程有帮助的依据，绝对不应该成为左右考古学家研究视野的方向盘。

目前，除了类型学和地层学这两门看家本领以及自以为有一手绝活的文献考辨之外，中国考古学到底有多大能耐来提炼和解读物质遗存中的信息？没有“术”的日益精进，哪来“学”的持续长进？几十年来，随着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积累，阐释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到了考古学家的面前。如果考古研究不是努力创造新的理论方法，从堆积如山的考古材料中去提炼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的信息，物质遗存不会自动转变成历史知识。同样，如果考古学家不是通过独立的工作来寻找只有考古学家才能分析和解读的材料，以自己独特的证据来提供新的认识和新发现，重构国史也难免流于一句空话。

以编史和证经补史为导向的考古研究在许多实践操作中的弊端已显露无遗。比如，20世纪50年代，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文化遗存，包括周长近7千米的城垣和一些宫殿基址，于是学者们根据史籍的线索，判断这很可能就是“帝仲丁迁于隰”的隰都^②。1989年，考古学者在郑州西北处发现了小双桥遗址，于是有学者转而认为小双桥才是隰都，郑州商城应该是汤都亳而非仲丁所迁之隰。80年代初，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找到了一处商代早期城址，1997年又在偃师商城的中部和南部找到了时代更早的小城，有学者便认为此处城址很可能就是汤都亳。由于无法确定两个遗址中究竟哪一处是亳，于是

^①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有人分别将它们称作郑亳和西亳，并提出早商存在“两京制”来自圆其说^①。

这些学者对隰都与亳都的判定完全是将考古发现来硬套文献资料，凸显了文献导向对考古研究的不利影响。我们发现，面对复杂的考古现象，严肃的科学阐释如同儿戏：隰都好似一块地名标志牌，可以被考古学者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换插到不同的地点；亳都有两处可能的地点争执不下，有学者居然可以编造出“两京制”的“神话”来确认它们都属正統的都城。面对复杂的考古现象除了从本本上的记载进行死搬硬套之外，考古学者似乎已丧失了独立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正如水涛所言，这种文献导向的研究可能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方向，完全局限于文献来讨论三代考古，并非是一种可取的方案。以两京制来调和文献中所载亳的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的矛盾，未免有机会主义之嫌。如果以后发现了新的商代早期城址，是否要提出所谓的“三京制”和“多京制”呢^②？到目前为止，考古学者已经发现了5处早期商城^③。显然，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历史事实与文献记载无法完全吻合，真实的历史远比文字的记载来得复杂，如果考古学重构国史的任务仅局限于通过发掘来确认典籍上所记载的地点和人物，那么就会严重限制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由此可见，用考古学来重构国史并非是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号入座就能完成的。其实，文献典籍由于当时社会背景、传播过程、作者立场和时代偏见等因素，完全有可能传递残缺、片面、扭曲甚至错误的信息。如果考古学家不是采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独立方法加以梳理和审视，执着地将其用来作为指导考古实践的科学依据，不免会有误入歧途的危险。正如吕振羽曾经指出的，“正如地下考古一样，从地层的分析上，分别出同时代的遗物，和因地层的变动或其他原因而杂入之不同时代的東西。所以我們在中国史的研究上，对古书中的材料，也必须经过一次开挖的手续，才能正确引用”^④。

① 许顺湛：《论郑亳与西亳》，见《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水涛：《近十年来的夏商周考古学》，见《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③ 佟伟华：《垣曲商城宫殿区再次发掘明确整体形状和布局》，《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27日。

④ 吕振羽：《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再有，考古学的重构国史是否就是简单地用考古发现来证经补史？我们是否要考虑将研究的境界涵盖布罗代尔所指的缓慢律动和最终取胜的长期趋势？这个研究目标显然并非考古材料的自然积累以及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就能达到，而是一种需要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发展规律研究，我们不能忘记吕振羽的另一句话：如果人类历史发展法则的一般性不得到确立，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便不能前进一步^①。夏鼎先生也指出：“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不应限于古代遗物和遗迹的描述和系统化的分类，不应限于鉴定它们的年代和确定它们的用途。历史科学应该是阐明历史过程的规律。”^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的考古报告或研究文献里对史籍和考古材料处理方法的局限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还普遍缺乏从物质文化中来提炼人类行为信息的努力，还看不到探讨一般性法则和历史规律的影子。为此，再回过头来审视那些主流学者对重构国史的执着，实在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地方。

二、人类学与考古学

我国一些主流学者刻意强调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定位，显然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欧美考古学界人类学化潮流的一种反应，是对国内学界要求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呼声的一种负面暗示。人类学导向的考古学真的是和历史学的考古学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吗？坚持拥抱历史学的既定方针，中国考古学就能真的游离于澎湃的世界学术潮流之外而独善其身吗？

实质上，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发生的新考古学思潮是对考古学目的、方法和发展方向的有益探索和深刻反思，主要表现在：（1）探讨史前考古学的理论结构；（2）系统探讨考古资料阐释的科学规则；（3）摸索和开辟新的方法。正如布鲁斯·特里格所指出的，尽管这个思潮中出现了一些褊狭的看法和充斥着晦涩的术语，但是这一发展毕竟使人们对考古资料的意义有了更好的了解。如果一个人不能估计这些研究的积极价值，那他毫无疑问是保守的^③。

① 吕振羽：《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夏鼎：《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 年第 10 期。

③ 布鲁斯·特里格：《史前考古学的目的》，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新考古学对史学导向的传统考古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目的仅限于处理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并了解文化和器物类型的时空分布；(2)对考古现象只能依赖常识性解释；(3)信奉传播论，局限于从外部原因来解释文化的异同和演变；(4)研究的基本目的仅是解释个别事件，而不是对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做规律性的总结。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主要埋头于考古证据的收集，这是这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大量出土材料的积累和各地文化年代学的确立，考古学界对于材料的阐释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于是，过去那种对考古遗存所做的形态描述、断代、文化年代学分析，以及考古学家依赖常识和经验的解释，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这门学科发展的要求。

学者们日益认识到，虽然考古研究有时可以用古代文献的帮助来破解考古发现中的历史之谜，但是他们所面对的主要还是无言的物质遗存，他们必须采取独立的方法来从这些物质遗存中来提炼信息，重建人类的文化历史。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考古学家必须发展理论和方法来从物质遗存中提炼过去人类的行为信息。这些信息远不止器物和考古学文化时空分布的年代学框架，它还包含了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以及演变的原因。换言之，重构历史不只是寻找和罗列史前文化的各种特征和确定它们的年代序列，考古学者还必须对文化的性质和演变的原因做出解释。面对这一任务，在没有了解物质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之前，考古学者无法对它们的性质做出满意的解释。同样，在没有了解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性质的前提下，考古学者也无法对任何的社会发展现象做出解释。因此，勾画文化发展的轮廓对于重构国史的目的来说是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考古材料也具有非历史学的价值。

在这点上，新考古学将总结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普遍性规律视为考古学研究的终极境界。美国新考古学家们认为，对普遍法则的研究要比解释特殊事件更为重要。从传统考古学注重个案描述转向人类行为普遍规律的总结，可以使考古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

新考古学将自己的学科定位在人类学，并刻意贬低历史学的作用，显然有其褊狭之处。然而，以历史学为己任的中国学者因此就认定新考古学非吾族类，必须划清界限，那也显得过于偏执。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鼻祖柴尔德说，

考古学的终极目的是复原历史，人类行为的规律总结是为这个终极目的服务的。他在临终前的告别辞中呼吁：“对于考古材料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最终的历史阐释，现在已成为我们一项主要任务，这会对人类历史做出很大的贡献，也将提升考古学的地位。”^①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巨擘如郭沫若、夏鼐和吕振羽都强调过社会规律总结的重要性，其实重建历史和总结社会发展规律是同一研究目的的两个方面，因为只有详尽了解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才有可能进行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另一方面，只有深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深刻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这其实正是布罗代尔所强调的不同历史时间研究的科学境界。

事实上，如何从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个案研究来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了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动力，历来是我们的一个弱项。在谈及发展规律和社会模式时，中国学者唯一的本事就是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经典术语，将他们在19世纪所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模式和学术概念来给中国的材料定性。这种治学方式已在国际学术界成为一种笑柄：中国学者面对自己的材料进行科学阐释时，除了搬抄经典语录之外，已完全丧失了独立分析和思考的能力。

虽然新考古学的许多激进言论和做法受到批评，但是它在科学研究方法领域的突破却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无数新技术和新方法被用来从考古材料中提炼经济、社会和政治行为的信息。比如，石器微痕和拼合分析为了解古人类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关键的手段；痕量元素的物理学分析被用来了解原料和产品分布和流通；碳同位素和微量元素被用来分析古代人类的食谱，为经济形态分析和社会地位的观察提供了有效的依据；遗传学的分析被用来确定人群的渊源和民族关系；而空间分布的新技术可以从器物分布上获得意想不到的规律，从而破解背后的人类行为方式。

为了透物见人，新考古学大力发展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力图从现生土著人的行为方式和物质文化的观察来找到能够破解史前人类遗迹的“罗塞达碑”。为了了解考古学文化的差异和演变，新考古学大力倡

^① Childe, V. G., Valedic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8, 1: 1-8.

导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努力从文化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和调节来了解文化的性质和兴衰的原因，从而导致环境考古学和聚落考古学在世界范围的勃兴。聚落考古学从观察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入手，进而意识到聚落形态又是社会结构的反映，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研究和文明探源的有力武器。

意识到考古遗存大多是“个人时间”的产物，要从这些凌乱的个人行为来观察长时间的“社会律动”，并总结社会发展规律显然有相当的难度，于是新考古学提出了“中程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沟通考古学物质证据和社会普遍规律之间的一座桥梁。只有考古学家拥有了从物质文化来提炼人类行为法则的能力和办法，才有可能企及更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

随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考古学家对考古证据的局限性和考古学采样方式有了更为清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考古研究的对象还不是古代人类行为的绝对证据，能被考古发掘所找到的材料仅仅是在各种偶然因素中得以保存的有限幸存者。而且大部分考古材料是古代社会废弃的垃圾，要从这些物质遗存的废弃方式来了解它们生产和使用的社会背景，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有甚者，考古遗址废弃后历经千万年的沧桑，会被各种自然动力和人为原因所扰动。因此，如果要从废弃的物质遗存来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就必须从事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仔细分辨导致遗物分布的人类行为和后来各种扰动的原因。

考古学信息提炼和科学阐释所带来的挑战，迫使考古学家必须要以更为细致和谨小慎微的方式来收集各种材料，包括以前所忽视和那些不起眼的材料，并且以数理统计来分析这些材料时空上的量变和质变，人们意识到，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仅仅通过对单一遗址的发掘就能解决。考古学的田野发掘从邂逅的运气，转向问题指导和精心设计的探索。它需要细致和全面的区域调查和采样，并带着问题选择遗址，寻找能够证实某种阐释理论的实物证据。

问题指导的考古学探索，是将考古资料视为检验科学阐释的依据。这使考古学开始从以前简单的材料归纳和记录转向假设和演绎。因为考古现象纷繁复杂，究其原因也有种种不同的可能性，考古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涵盖了从技术经济到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为了了解造就和产生考古现象的原因，考古学家就必须像侦探一样对现象和事物的因果关系进行梳理，并对材料的解释提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假设，而考古发掘的实践就是要寻找

种种证据来排除和减少各种可能性的数量，最后得到比较可信的结论。这种以问题和验证假设为导向的发掘与研究，将考古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每一个新发现的材料片段，不仅有助于完善对历史的重建，而且能够用来检验以前的设想。正确的阐释和理论必须经受新的考古材料的反复检验才能得以保留，疑虑和分歧也通过这一过程被消除，我们对历史事件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就能不断完善和深入。

新考古学除了在学科理论方法上努力创建新的范例之外，另一个值得称道的进展是强调对学者研究能力、客观性和诚实性的不断反躬自问，以及对任何理论模式和阐释立场所采取严格审慎的批评态度。考古学者所做的阐释总有自己的政治共鸣，希望获得当代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因此考古学的中立性不能确立，我们对历史的解释绝不是从真实世界获得的客观判断。这种严谨和几近苛刻的学风，成为优化各种理论方法的最佳机制。这也正是新考古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如日中天之后，迅速被后过程考古学所超越的原因。

后过程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体现了考古学对人类意识形态和被新考古学所忽视的各种其他社会动力的关注。象征和结构考古学、个体和身份考古学、性别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和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研究，开始突破新考古学对考古学文化功能和适应研究的局限，把影响物质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动因分析渗透到了各种材料和对象之中。在如此庞杂和多元的研究新趋势中，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并没有变，变化的是分析的思路、研究的方法和提出的问题。过去考古学者仅仅用类型学来进行年代学分析的物质遗存，现在可以在新的理论方法指导下为我们认识人类的过去提供前所未有的新认识。

三、讨论与小结

如果撇开考古学定位的历史学与人类学之争，平心而论的关键问题还是应该在于：哪种途径能够更好地增进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视考古学为历史学分支，反复强调考古学重构国史意义的中国考古学并没有使这门学科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它的实践操作一直停留在类似史料学的层次上。面对堆积如山的考古资料，考古学者的阐释和历史重建工作乏善可陈，由于没有努力去创造新的理论方法来提炼信息，这门学科实质上已流于一种只用专业术语自说自话的象牙塔里的冷僻学问。而国际考古学人类学化的潮流，使这门学科在“透物见人”的信息解读上不断取得令人鼓舞的突破和进展。

因此，过分强调考古学的编史作用，贬低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价值，只会曲解国际考古学变革的意义，妨碍这门学科视野和进取心，削弱考古学为了解和重建历史提供独到见解的能力。

特里格将考古学比作古生物学。古生物学家通过研究动植物化石标本来了解古生物的形态和生存背景，通过形态比较来重建和解释它们的发展脉络，因此这门学科是以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和历史性为基础。但是，自达尔文时代以来，古生物学并没有停留在一门描述和比较的历史性学科的水平上，而是促使这门学科转向解决进化机制和法则的研究。从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的提出，最后深入到对生物遗传机制破解，从本质上揭示出生物进化的动力和原因^①。

以古生物学来进行类比，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形态和谱系研究就好比考古学家对器物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这种形态和演化关系的研究是这门学科的基础。但是，古生物学家还要依赖现生物种的研究和比较来了解绝灭生物的生理和习性，重建它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方式，这种研究很像考古学家利用民族学资料来复原史前人类的生存方式。从化石比较解剖探究生物进化的机制和兴衰的原因，很像考古学家试图通过器物和遗址的研究来分析史前社会发展和兴衰的过程。而新考古学所提出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法则的总结，就像是生物学建立进化论来对整个地球生命发展史做出阐释。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国史重构，不是仅仅对事件的描述和年代学的关注，也不会局限于用考古发现来证经补史，它同时需要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做出解释。

中国有些学者一直认为以为自己“证经补史”的导向才代表了学术的正统，批评欧美考古学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导向偏离了考古学的最终目标。中国学者常口口声声声称自己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考古学现象的社会分析，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正宗的拥护者和信奉者。但是中国考古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一直停留在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层次上，无论是理论视野还是探索精神，中国学者既比不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更比不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在学术上的建树。

^① 布鲁斯·特里格：《史前考古学的目的》，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和塑造了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宗教信仰、司法系统、美学观念等称之为上层建筑的诸多特点。生产方式由技术和生产关系所组成，社会的成员以合作的方式来生产所需要的物品。于是，社会中物品的生产和传播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而且取决于影响生产资料获取和拥有、保证工匠协力合作和为社会提供导向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柴尔德受苏联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启发，努力摆脱纯器物的考古学文化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他认为，尽管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可能是导致演变的关键变量，但是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在塑造社会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能低估。他认为技术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而视宗教和政治机制是制约人类历史发展的负面因素^①。

马克思主义相信存在某种被称为“历史法则”的普遍规律，它包括社会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作为集团意识和政治行为的阶级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阶段性发展的概念，以及以革命方式解决这些冲突的信念。尽管这些法则只是少数高层次的抽象规律，而且过于一般而难以直接用于考古资料的具体阐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有许多能够使考古分析获益的地方，如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不只是技术必须被看作是影响整个文化方式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考古学家不应该仅从技术证据来推断社会结构，而必须根据考古材料的独立分析来推断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②。中国学者非常看重冶金术的出现，认为这是文明和国家社会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实质上，社会结构与生产技术并不能相互对应，玛雅和印加的国家社会并没有冶金术，而欧洲的青铜时代一直是酋邦社会。由此可见，如何利用社会科学理论来指导具体观察和开拓方法论领域，是我们亟待重视的一个问题。在新考古学的系统论中，社会发展的模式是一种文化与周边环境相互协调与和平的互动和反馈。但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以辩证方法来看待社会演变，视矛

① Childe, V. G.,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43.

② Trigger, B. G., *Archeologyus Historical Science*, Monograph of the Department of Ancient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Archaeology: No. 14, 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Varanasi, 1985.

盾与冲突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只能从社会结构的内部去了解，于是建立起一种有别于系统论的全新思路。虽然马克思主义重视唯物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对意识形态的作用予以极大的关注，将其作为分析研究的重点。它一方面关注过去的意识形态，探究一种特定的信仰系统如何会使一个贵族或国王在古代社会中取得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也关注现在的意识形态，发现今天的考古报告如何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导向。

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已经使考古学与历史学建立起新的关系。传统史学被批评为拘泥于事实的堆砌和事件的描述，取一种经验主义和归纳的方法来重建历史。现在，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已将他们的兴趣扩展到了过去社会的各个方面，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使得历史学变得更像人类学，它的开始从讲述政治事件转向了解社会系统和文化进程。年鉴学派的出现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他们观察经济、环境和人口的趋势和循环，开始在布罗代尔提出的研究历史缓慢律动和最终取胜的长期趋势上一展身手^①。

在这个趋势中，文献研究已不是考古学研究的导向和阐释依据，历史考古学家试图将文献作为一种“中程”手段来加以运用。换言之，历史文献中的信息就像民族考古学观察一样被用来帮助解读物质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和社会信息，这种解读不是一对一的注释或考证，而是试图从典籍中对整个社会背景信息做一番重新提炼来为考古现象的阐释提供依据。

在过去习惯于将学术问题打上政治标签的年代，历史学和考古学被看作是最具民族性的学科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人类学则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学科在中国长期受到漠视且难以发展。如今，面对当代考古学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依赖自然科学的学科交叉来进行信息提炼和科学阐释的世界潮流，中国考古学的当务之急是应当考虑如何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而不宜用陈旧的价值取向来自命清高，掩饰与国际学术主流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原刊《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① 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贡献

一、前言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被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学科分类或定位上归属于历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种分类或定位是受我国学术传统影响的结果，并源于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考古学被我国史学界用来解决上古史的争议。傅斯年将考古学看作是一个不陈的工具，可以用它来处置些新获见的材料^①。而夏鼐将考古学与文献探索为基础的狭义历史学构成了广义历史学，犹如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不可偏废^②。最近，考古学脱离历史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表明我国学界认识到考古学的独立性。因为，考古学与历史学虽然在目标上相同并在研究上互补，但是它们在研究材料和理论方法上相去甚远。

大体来说，历史学是研究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③，或者如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所言，“考古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的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④。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期。

② 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期。

③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④ Clarke, D. L., Archaeology, the loss of innocence. *Antiquity*, 1973, 47: 6-18.

由此可见,考古学的潜质和任务主要是从古代社会遗留的物质遗存来了解历史和社会变迁。为了研究这些遗存,考古学家采用源自地质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并加上他们自己发明的技术,以便在没有文字的帮助下来了解和解释过去。因此,考古学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家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读懂”这些从地下出土的无字材料,并用这些材料来重建历史^①。

由于大多数考古材料无文献资料可供参考,这些物质遗存也并非不言自明,因此考古学家的研究更像是自然科学的探索和实践,需要对材料进行采集、分类、描述和阐释。我们熟悉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就是处理材料的方法,但是要读懂这些材料,单凭分类和建立年代学是不够的。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指出,考古材料的阐释受民族学和历史学概念的影响特别大,这两门学科与考古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来自地质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理论概念,或直接或通过人类学和历史学对考古学施加影响^②。由于我国考古学家主要是在历史学领域里受训的,将考古材料与文献相结合来做解释是得心应手的传统。相对而言,人类学和民族学在我国并非显学,在传统和研究上都比较薄弱。本文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顾一下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考古研究中,如果对于无法从历史资料中找到说明依据的材料或现象,考古学家一般采取常识性类比的方法来解决。比如,将石刀和石斧与我们熟悉的刀斧比较,将史前陶器与青铜时代的类似器物或我们常用的器皿比较。但是,考古材料的复杂性和探究问题的多样性并非单凭这种常识类比就能解决,因为许多现象远非单凭考古学家的常识和历史知识所能解释。在欧美考古学的发展中,民族学作为考古学阐释的重要参照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为考古学家的器物分析提供借鉴,为透物见人提供一座桥梁,并且为重建古代社会变迁的过程提供通则性的模式。

二、对史前研究的贡献

对于有 300 万年的人类发展史而言,5 000 年的成文史与之相比连百分之

^① Crabtree, P. J. and Campana, D. V.,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②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一的比例都不到。因此，有文字的历史只是“一出长剧的最后一幕”。人类历史中存在大段文字记载的盲区，就是史前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考古学的主要理论方法都是在史前考古学领域中创造出来的。是历史材料最为贫乏的北欧成为科学考古学的摇篮，使得丹麦的汤姆森和瑞典的蒙特柳斯创立了三期论和精致的器物类型学。埃及学家皮特里在发掘法尤姆前王朝墓地时，由于没有象形文字可供断代，便创造了独特的器物排列法对陶器类型进行年代学研究^①。同样，是文献资料最为贫乏的北美，考古学家们创造出各种理论方法来从物质遗存中提炼信息以重建史前史。这是值得我国考古学家深思的问题，也许正是过分依赖文献和强调二重证据法，使得我们忽视了独立创造和发展理论方法的必要性。在欧洲，考古学并非历史学的工具和延伸。对于了解史前史，历史学的帮助十分有限，因此更多的需要采取各种类比，将我们所不知的东西与我们所知的东西比较，其中民族学的作用尤大。

认识史前人工石器就是一个例子。很久以前，地下出土的石器在欧洲人的认识和收藏中被放在矿物和化石的范畴之中，与玛瑙、玉髓、绿松石、钻石和陶土等为伍。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从地下长出来或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就如人们所见的流星。于是，这些石斧和石器被称为“雷石”。到17世纪中、晚期，对于地下出土的化石有了进一步的区分。丹麦地质学家尼古拉斯·斯坦诺(Nicolas Steno 1638~1686)对水晶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化石贝壳及现代贝壳的结构进行比较，显示化石贝壳与现代贝壳的关系要比水晶更加接近。于是斯坦诺断言，化石贝壳并非地下自己长出来的物体，而是曾经活过的、后来被埋在土里的动物遗骸。在认识石器的过程中，民族志类比所发挥的作用，就如斯坦诺对现代软体动物与化石贝壳所做的观察。到17世纪晚期，欧洲人不仅对非西方的石器工具已有所知，而且还用他们的现代工具来与石器进行类比^②。

然而，民族志的类比出现较晚。16世纪和17世纪是西欧展开环球航海的大探险时代。航海家们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见到了石器时代的各种狩猎采

^① Malina, J. and Vašíček, Z., *Archaeology Yesterday and To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Grayson, D. K.,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Antiqu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集者和原始农人。这些土著的工具和服饰被作为珍稀之物带回欧洲，欧洲人发现，这些土著不知金属为何物，仍然在使用和他们在地下发现的石器非常相似的工具。这一发现促成了史前研究最重要的进展，即意识到欧洲出土的石器工具是人类制作的，并非自然或超自然的起源。16世纪晚期，英国古物学家约翰·特怀尼(John Twyne)根据古希腊民族志推断，在公元前第一千年里，北欧人的生活方式很像石器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17世纪，英国人对新大陆的土著居民有了日益增进的了解，著名古物学家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提出，史前英格兰人的生活很像美国弗吉尼亚的土著。古物学家威廉·达格代尔(William Dugdale)将英国发现的石器归于古代土著布列吞人，并断言它们的制作和使用早于铜器和铁器。达格代尔的女婿和阿什莫尔博物馆的管理人罗伯特·普罗特(Robert Plot)认为，我们若要了解史前的石器如何装柄，可以将它们和北美印第安人的装柄石器进行比较。之后，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将英国的石箭镞与太平洋群岛上现代居民制作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即前者很可能是由不知道如何生产铁器的一类民族所制作。18世纪初，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朱西厄(Antoine de Jussieu)将欧洲石器工具与从新法兰西和加勒比海带回的民族学标本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声称：法国、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人们，他们要不是发明了铁，很可能就类似今天的那些蒙昧人那样生活。到了18世纪，不仅石器工具是人工制品，而且它们的时代非常古老的看法已被广泛认可。

用民族志类比的方法，除了确认史前石器工具是人工制品外，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文化和技术的进化思想提供了证据。欧洲航海家在大航海中邂逅了土著人，发现他们不知金属为何物。这种事实也符合欧洲人的圣经教义，即那些无法与上帝保持接触的人群，因无法持续得到神谕，会在道德上和技术上日益退化。所以，冶金术可能被那些迁移到了没有铁矿地方的民族所遗忘。但17世纪以降，启蒙运动和日益增长的进步信念得到了逐渐强调理性主义的补充。人们鼓励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方法来了解自然，并相信人类的创造力是进步的，并非处于持续退化之中。1734年，尼古拉斯·马胡德尔(Nicolas Mahudel)向巴黎的铭刻学会宣读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石、青铜和铁三个相继时代作为对人类发展的一种解释。这显然是汤姆森三期论的先声。由于缺乏适当的断代方法，18世纪的古物学家常常采用比较民族学、比较语文学、体

质人类学、民间传说和口述传统来评估他们发现的史前古物。

在考古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考古学研究除了表现出显著的地质学特点外，还体现了强烈的进化论取向，即以器物构建人类文化发展的序列。除了三期论，法国考古学家莫尔蒂耶也用进化框架来构建法国的旧石器序列，并认为这一序列可适用于欧洲其他地方，乃至全世界。18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不仅是一种生物演变的理论，而且是一种哲学思想，被许多科学家用来解释社会现象。于是，石器时代和原始社会被视为由许多阶段组成的直线序列，并不关注同时性的差异。直线进化论还鼓励一种信念，即现代民族志材料可以被用来说明史前文化发展的一般进程。这种信念还得到了启蒙运动心理同一性的支持，即认为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在面对相似的问题时一般会做出相似的决策。于是，舍利人被等同于塔斯马尼亚土著，莫斯特人被等同于澳洲土著，梭鲁特人被等同于因纽特人。这使得许多学者认为，根据处于不同发展层次的现代土著社会的比较，有可能用来说明欧洲史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化特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他提出的蒙昧、野蛮到文明的三期文化进化论，是对人类社会直线进化普遍规律的阐释。摩尔根的蒙昧阶段大体对应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经济特点为狩猎和采集。野蛮时代对应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这一时代出现了农业和家畜，发明了陶器和金属工具。文明时代以文字出现为标志^①。

摩尔根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并较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体现的文化更加完备。它们对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所能提供的资料，其丰富性无与伦比。由于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而且其途径相同，因此凡处于相同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因此，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经验，足以代表我们远祖处于相同状态下的历史和经验^②。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从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来探索文明和国家的形成。

受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人类进化思想的影响，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

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在他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将欧洲和近东的考古资料用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来加以编排和阐释，以重建人类的文明史。柴尔德的蒙昧期以旧石器时代为代表，野蛮期以新石器时代与红铜时代为代表，文明期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革命和埃及与印度的早期青铜时代为代表^①。虽然柴尔德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创始人，但是他对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地。他认为，民族学和考古学是人类科学两个互补的分支，就如生命科学中古生物学与动物学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人类 99% 的历史是史前史，因此必须依赖考古学来重建。但是很遗憾，考古记录很不平衡，只能体现文化的某些方面。考古学家对其进行分类，建立技术阶段并进行文化分类，确立时空的发展序列。民族学也研究较为简单的社会，对这些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进行观察和分类，并建立起相似的发展序列。将考古材料与民族学记录相对应，在比较民族学的框架中根据文化的相似性方面为社会分类，并用考古学来安排其时间序列，这就能显示发展的方向。柴尔德指出，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以协调功能论、传播论和进化论，可以为推断无文字的社会提供基础，并能为建立历史变迁的通则开辟光辉的前景^②。

在北美，考古学属于人类学的范畴，除了因为考古学研究的是印第安土著而非欧洲殖民者自身的历史之外，还因为史前和现代美洲土著人群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区别，历史时期的民族志资料可以直接用来解释史前考古材料。了解过去使得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以及与土著群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土著居民不再以传统方式生活的地区，考古学家便参照早期欧洲人有关印第安人的历史记录来进行解读。于是，在北美考古学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研究与阐释方法——直接历史学法。这种方法被定义为：利用活体文化的历史或民族志信息，来解释同一文化或历史上关系密切的文化在较早时期没有文字记载阶段的考古发现^③。

①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② 戈登·柴尔德：《考古学与人类学》，见《历史的重建》（附录）（方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Childe, G. V.,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46, 2(3): 243-251）

③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美国直接历史学法的一个例子就是解释印第安土著“如何制作箭镞”。早期记载对箭镞制作的大部分观察语意不祥，这是因为这些观察者没有实践经验，对石器打片过程缺乏了解。1911年，加州当局抓到了一名叫伊希(Ishi)的印第安土著，他是一个名叫雅纳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最后一位幸存者，该部落在19世纪为了逃避屠杀而躲入加州中北部的深山老林之中，由于环境极其艰苦，这个部落濒临灭绝。在目睹了最后的亲友死于苦难之后，绝望和饥寒交迫的伊希潜入一处欧裔美国人的聚落偷窃食物，结果被狗包围。他作为加州最后一名“野生”印第安人被拘禁，主要的原因是大家不知道如何与他相处，而非对他有敌意。当该消息见报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 Kroeber)和沃特曼(T. T. Waterman)将伊希解救出来，安置在旧金山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里，他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余生，最后死于结核病。伊希是一名压制石箭镞的高手，他向人类学家和博物馆参观者表演他的石器制作技巧。伊希是一位被观察最为仔细，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位依赖石器技术生存的美洲印第安人。他启发了萨克斯顿·波普(Saxton Pope)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土著人的弓箭。包括内尔斯·纳尔逊(Nels Nelson)在内的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同时研究史前和现生的人群，他们向伊希学习，根据对土著的观察和自己的实践，掌握了石器打片的基本诀窍，并用这种知识来解释史前的考古材料^①。

20世纪初，史前考古学见证了从进化论范式向历史学范式的转变，考古学文化取代了阶段和时期，成为考古学的主要分析概念，标志着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诞生。虽然考古学以文化历史为取向，但是其文化概念也是来自民族学而非历史学。考古学文化类似于民族志文化，也即将考古学文化看作是过去活体文化的物质遗存^②。格林·丹尼尔(G. Daniel)指出，20世纪初，考古学的进展从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中获得了新的指导方针。这是因为，考古材料的积累表明同一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这标志着莫尔蒂直线进化论阐释范

^① Whittaker, J. C., *Flintknapping: Making and Understanding Stone Tool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5.

^②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文化在欧美的发展》，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式的破产。还有，人文地理学注意到地理隔绝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于是，考古学家逐渐放弃原来的根据典型器物分期分段，转而根据文化特征为文化分类。这种研究很像人文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现代原始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信仰在区域上的差异，并用传播迁移来解释这种差异。于是，史前考古学从地质学方法转向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态度进行研究^①。

“文化”最初由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使用，意指智力的培养，但是文化历史则最早为德国人所研究。在德国，“文化”起初泛指部落和农人的生活方式。1880年代，德国民族学家古斯塔夫·克莱姆(Gustav Klemm)运用文化和传播概念来研究人群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19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Gustav Kossina)首次用文化概念来研究史前人群，提出了“文化群即民族群，文化区即民族区”的口号。他用物质文化的异同等同于族群身份的异同，于是在地图上标出某些器物类型的分布就能确定一批特殊人群的分布。文化概念被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采纳，在他的《欧洲文明的曙光》中，他用考古学文化概念以时空镶嵌的方式来系统安排史前考古学材料，被誉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起点”。于是，欧洲的史前学从研究人类发展变成描述人类的文化。在史前物质遗存的研究方向上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体现了把人类作为一种动物研究转变成把人类当作真正的人进行研究^②。

三、在过程考古学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欧美考古学走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新考古学取代传统考古学并逐渐成为国际潮流。过程考古学在范式上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强调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看作是人地互动的产物；信奉新进化论，认为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要阐释社会演变的规律；提倡系统论，认为文化并非静态器物的集合，而是功能互补的动态系统；强调实证论的科学方法，用问题导向的演绎—检验方法来解释文化变迁的动因^③。出于“向前看”的社会价值

①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Trigger, B. G., Archaeology at the crossroads: what's new?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4, 13: 274-300. (布鲁斯·特里格：《十字路口的考古学：新在哪里》，《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

观，美国新考古学对历史学采取了一种鄙视和贬低的态度。认为历史知识只不过是一堆废话，既不能创造社会效益，又无法为当代社会管理决策提供指导性成果。路易斯·宾福德(L. R. Binford)在他的宣言性论文《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号召考古学应当向人类学看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索做出贡献，从而使考古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①。

宾福德建立的一个新的方法论是所谓的“中程理论”。这是因为宾福德痛感传统考古学主要依赖直觉、经验和常识来解释考古材料，对许多结论缺乏严谨的检验，在用物质遗存复原人类的过去时普遍缺乏可行的方法论，因此极有可能扭曲对过去真相的了解。他提出，如果考古学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一种范式，创建种种认知手段来分辨过去的特点或判读考古记录，赋予考古记录以真正的含义。而这样的阐释取决于对静态和动态、考古遗存与人类行为及社会动力系统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完整、正确和清晰的认识。他将“中程理论”看作是一种可信赖的认知手段，是考古学家能够将静态的观察转变成有关动因阐释的“罗塞达碑”。“中程理论”这一术语来自于社会学，新考古学借用这一术语是想建立一座理论的桥梁，从考古学静态的现象来解释人类的行为，破解过去社会变迁的动因。换言之，“中程理论”为考古记录和人工制品所涉及的物质现象提供解释的概念工具。宾福德借鉴了地质学家赖尔的“均变说”来支持这一范式。均变说是指发生于现在的地质学动力也存在于过去，所以当今世界里我们所看到的地质动力和地质沉积现象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作为我们判断过去地质运动的依据。考古学借鉴“均变说”原理，也就是要用今天所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动态方式来说明过去已逝的物质现象。宾福德声称，尽管过去文化的动力系统已经消失，但是相似的动与静的关系仍然存在于现生的文化系统之中，如土著群体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土著人的活动与动植物资源的关系，以及他们生产工具、技术与原料及活动方式的关系都应当和过去的状况相似。如果在现生文化系统之中人类物质文化废弃特点和人类行为的相伴关系存在某种规律的话，那么考古学家对这种

^① Binford, L. R.,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1962, 28: 217-225.

规律的总结可以用来从史前文化的物质现象来提炼人类行为和文化动力的信息^①。

为了建立中程理论的研究范式，宾福德身体力行，采用“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的研究方法。他只身前往阿拉斯加，与纽纳米因纽特人生活了十年，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资源利用、群体结构和移动方式。和民族学家不同的是，宾福德特别关注土著人行为与废弃方式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在废弃的垃圾和居址的遗迹方面留下哪些特征，并寻找行为与物质之间的因果率。民族考古学也被称为“活的考古学”(living archaeology)，这种方法意在使用民族志的材料和对现代土著人的观察来解释史前人工制品和考古遗址。

布鲁斯·特里格(B. G. Trigger)对民族考古学在建立中程理论研究范式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解释：民族考古学是用来了解物质文化是怎样从其有机系统的位置上过渡到考古学位置上去的。对这种物质转化过程的分析，能够使考古学家了解正常运转的文化系统中物质的废弃过程，通过对土著群体和部落社会中物质的废弃率、废弃地点、缺失概率以及废弃实例的观察来了解活体社会文化中物质保留下来和不能保留下来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套关系法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正确地由物质遗存中推断其所代表的文化系统^②。

宾福德的研究，使得一大批考古学家群起效仿。他们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中美洲、北极、澳大利亚、非洲和美国西南部，对象是那些还处于狩猎采集或原始农耕阶段的土著人，观察他们的生活栖居习性，以及制作工具和废弃垃圾的过程。在观察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不仅关注土著人如何生产他们的工具与器物，而且关注这些工具和器物的生产与使用和哪些活动有关，他们如何安置他们的营地，由哪些因素决定营地的位置和居住的长短、营地大小，资源种类及丰富程度和人群聚散的关系。在活动中，哪些工具很少丢弃，而哪些东西往往会一次性就被废弃，这些废弃物中保留了哪些人类活动的信息。

① Binford, L. R., Middle-range research and the role of actualistic studies. In Binford, L. R., *Working at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② Trigger, B. G.,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这些人类行为和物质之间关系用来建立某种观察的原则，正如宾福德所言，这些原则可以通过在现生系统中的检验而上升为理论，那么它们可以成为我们用来从史前遗存中破解人类行为和文化系统动力的密码，考古学家就有了解读文化动力的“罗塞达碑”。

民族考古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榜样，是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古尔德(R. Gould)在澳洲的工作，当地的土著居民不但指导他寻找考古遗址，而且还告诉他什么人在这些遗址住过，并详细为他讲述与这些遗址有关的传统习俗和发生过的事情。土著居民还为古尔德展示石器工具的分类，教他一些有关石器的名称，并解释如何使用它们。根据对现代土著的调查和了解，古尔德成功地将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比较古代和现代遗址中人工制品的组合模式，从而进一步用他所掌握的现代资料推断出这一地区史前人口的密度为每个营地 3.55 人。

根据尼古拉斯·戴维(Nicholas David)和卡罗·克拉莫(Carol Kramer)的看法，民族考古学最早以克兰丁斯特(M. R. Kleindienst)和帕蒂·乔·沃森(P. J. Watson)的“行动中的考古学：对活社群的考古学调查”的论文为代表。该研究之目的，是考古学家带着理论进入现生土著社群，观察他们人工制品的类型与功能、屠宰技术、生计形态和社会结构，收集必要的信息，以便能够从考古材料中推断那些非物质方面的特点。因此，民族考古学的目的是为考古学家提供民族志的蓝图，或以考古学为目的展开工艺技术方面的民族志研究，以及从文化整体的民族志背景来解释考古学材料^①。

过程考古学强调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信奉“一般进化”的新进化论。新进化论的两位倡导者是朱利安·斯图尔特(J. H. Steward)和莱斯利·怀特(L. White)，斯图尔特倡导探究文化发展的普世通则，通过文化差异来看共性，了解文化进程中独立重复发生事件的机制。他指出，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秘鲁北部和中美洲的古代文明，在物质文化、农作物、社会等级、神灵表现和祭祀方式上差异很大，但是通过抽象出来的共性进行比较，可以探究其形成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他定义了五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来对这六个早期文明的发展共性进行总结，探讨其中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产生这些社会结构的原因。斯图尔特倡导的是一种多线的、生态

^① 尼·戴维、卡·克拉莫：《民族考古学实践》(郭立新等译)，岳麓书社 2009 年版。

决定论的文化进化观，相信在相似的环境背景里，不同社会会变得形态相同，并会遵循相似的发展轨迹^①。

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卡勒沃·奥博格(K. Oberg)根据墨西哥南部低地前哥伦布时期印第安土著社会的结构特点，首次提出酋邦的概念，将其列为前国家的一种社会形态^②。1960年，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 Sahlins)和塞维斯(E. R. Service)根据同时性民族志材料中所见的社会结构的性质差异，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概念，建立起一个推测性和一般性的四阶段进化模式，以概括人类社会演进的一种历时性直线发展序列^③。其中，定义部落和酋邦的性质是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对太平洋地区土著社会的详尽知识，特别是美拉尼西亚头人社会为定义酋邦提供了模型。

酋邦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之后，学界出现了不同的态度。有人尝试用它来探讨中国史前社会的演变，分析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有人觉得，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前国家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中国古籍中的名称如“古国”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这里就涉及如何进行类比的方法论问题，根据人类学和民族志观察提出的酋邦，有着现代土著社会在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参照蓝图，可以用来作为与考古材料对比时的依据。但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的古国却没有可供类比的具体参照特点，无法为考古学家判断社会发展层次提供蓝图。还有，酋邦像“人类”或“国家”的称呼一样，是个泛指的概念，用来统指平等的部落与阶级的国家之间各种社会形态，并不与古今中外某个或某种具体社会对号入座。美国科学哲学家内格尔指出，科学陈述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具体事物所显示的关系或属性并不明显，甚至相去甚远，但是它是探求综合性解释的必然结果。为了要说明形形色色事物性质的普遍性，在系统表述

① Steward, J. H., Cultural causality and law: a trial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9, 51(1): 2-28.

② Oberg, K., Types of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lowland trib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5, 57(3): 472-487.

③ Sahlins, M. D. and Service, E. R.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M. 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其结构特征时，就必须进行抽象^①。

由此可见，过程考古学无论从物质材料来了解人类行为的中程理论建设上，还是在探究社会发展通则的高级理论建设上，民族学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诚如格林·丹尼尔所言，史前考古学的发展是与人类学的发展齐头并进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学与考古学共同成长，用彼此的思想观念相互补充^②。

四、中国学者的努力

在我国学界，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地位无法与历史学比肩。考古学研究与民族学的联系也远不及与历史学的关系亲密，这是因为我国绝大多数的考古学家是在历史学领域里培养出来的。但是，我国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如林惠祥、林耀华、宋兆麟、梁钊韬、汪宁生、容观复、黄淑娉、龚佩华等学者的工作也可圈可点，他们将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介绍进来，其中有些人还十分关注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的结合与借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出身但以民族学观察为己任的李仰松教授，他为民族学观察与考古学阐释相结合进行了毕生的不懈努力。他从民族学证据来解读史前工具的制作和使用、复原史前的制陶工艺，将佉族的聚落形态和葬俗与考古材料进行比较，并破译仰韶文化中许多图案的含义。他强调民族学对考古学阐释的重要性，认为考古学的特点是研究过去留存至今的静态物质遗存，通过对现存的、带有原始社会残余的民族的社会调查，对我们研究新石器时代和古代史中有关文化及其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启迪作用^③。

我国文化人类学家对美国新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的关注也早于考古学界对欧美考古学变革的关注。我国考古学界最早对美国新考古学的介绍当属署名“瞭望”的1986年发表在《史前研究》上的一篇报道，谈了1985年我国一批考古学家参加美国考古学会第五十届年会的观感^④。但是，梁钊韬从1981年

①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文化在欧美的发展》，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李仰松：《民族学调查与考古学研究的关系》，见《民族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瞭望：《访美观感——参加美国考古学会成立50周年学术讨论会侧记》，《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合刊。

起就已关注考古学的理论问题，并与张寿祺在 1983 年合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美国新考古学采用的民族考古学^①。1984 年和 1987 年，容观复^②和汪宁生^③也分别介绍和探讨了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和意义。这也许是我国文化人类学家要比考古学家更加关注国际学术动态的缘故。

可能是对美国新考古学变革的背景缺乏了解的原因，有些人类学家对民族考古学的概念、含义和作用心存疑惑。因为美国的考古学一直与民族学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所以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学界突然开始流行“民族考古学”这个新术语，它与以前的民族志与考古学的关系究竟有何不同，有何创新，便在我国人类学家中引发了争论^④。一些学者查阅国外各种著作和学术辞典中的定义，以便了解民族考古学真正的含义。但是，缺乏对欧美考古学变革背景的全面了解，单是琢磨定义的表述仍然不能根本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考古学界对新考古学的冷漠与人类学家对民族考古学的热情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我国人类学家们对民族考古学的热烈讨论对考古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有了本文上面的背景介绍，即新考古学创建“中程理论”和采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论，意在在静态的物质现象与动态的人类行为之间构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解读密码或“罗塞达碑”，以便能用考古记录重建已逝社会的鲜活情景，进而实现建立人类社会发展通则的目标。那么，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理解丹尼尔·斯泰尔斯(Daniel Stiles)对民族考古学概念的这番陈述^⑤，以便区分民族考古学与一般民族志研究之间的区别：

民族志材料一直被考古学家用来阐释和说明考古记录中所见的各种现象。近年来，由于考古学家变得更加致力于考古学的理论方面，他们便设法有意为应用民族志类比构建一种更系统的模型。学者们认识到，

① 梁钊韬、张寿祺：《论“民族考古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 4 期。

② 容观复：《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民族考古学”介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③ 汪宁生：《论民族考古学》，《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2 期。

④ 容观复、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

⑤ Stiles, D., Ethnoarchaeology: a discussion of method and application. *Man*, 1977, 12(1): 87-103.

在民族志和考古学材料之间存在历史联系与在没有这种连续性情况下采用一般性比较方法之间采用民族志类比是不同的。必须指出，在应用民族志材料时必须注意和分清这种界线，而其恰当性也是有条件的。

赞同在考古学阐释中审慎应用民族志类比，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大部分民族志解释是不适用于考古学的。民族志学者通常不会关注考古学家的问题，所以一个社会中大部分对考古学有用的东西并未被记录下来。为了弥补这种欠缺，便开始了一种从考古学视角来研究非工业化社会的人群。

科林·伦福儒(C. Renfrew)和保罗·巴恩(P. Bahn)对民族考古学的概念也有精到的说明^①：

民族考古学是研究当今的生活方式以便了解造就考古证据或与其保存与损毁相关的过程。……民族考古学与民族志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目的是从其本身来阐明和了解一个文化，而前者是要阐明人类生活的物质方面以便了解考古证据，或是源自同一地区，或是来自世界完全不同的地区。……总之，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令人激动和充满活力的一个领域，就理论和经验而言，对于该学科的未来与今天都同样重要。

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容观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民族考古学、中程理论、考古学类比的方法论以及考古研究的整体观，后来以《民族考古学初论》的书名结集出版。也许是因为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也许是因为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民族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的刊物上，他的学术努力在考古学界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这也许是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学界的边缘地位使然，与某些历史学家参与考古学重大项目如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一言九鼎和领衔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再读容教授在该书前言中摘引的两段美国考古学家的告诫也许令人感慨：“如果我们仍然满足于孤立地对遗物本身仅仅进行描述分析，并不把它置于当时的精神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理解，认识不到

^① Renfrew, C. and Bahn, P., *Ethnoarchaeology. Archaeology: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Routledge, 2005, 95—105.

物质器物与人的关系，那么考古学和史前学就无权对文化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文化是在一个社会单位里进行创造的成果的总和，而不是游离于一个社会之外的堆积物。”“只有当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把文化看作是行为完整一体的系统时，考古学才不只是一种资料收集工作。”^①

五、结 语

从考古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这门学科的发展无论从低层次上的史前器物解读还是在高层次的原始社会重建上，都与人类学和民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每次考古学范式的重大变革，人类学和民族学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考古学的定位长期放在历史学，又因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学界的弱势地位，使得这两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十分薄弱，仅限于个别学者的专攻和某些专题如制陶术的探究。这种欠缺也影响到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使得考古学家将重建我国古史看作这门学科的主要目标。但正如张光直所言，考古学本身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历史，没有比较研究，历史过程无法被揭示出来。无论考古学家的分析多么系统，他仍必须从时空上来比较所发现的东西。为了确定各种特征和复合物的可比性，并确定它们历史关系的性质，社会文化系统的重建必须首先提供一种功能的背景^②。在一篇题为“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的短文里，张光直指出民族学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途径，因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全世界不同文化的习俗与制度，具备各种解读的蓝图，而这些习俗和制度在考古遗址里只是一些残迹。不懂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工作者只是将这些遗物当作物质文化处理，而熟知各种习俗制度蓝图的考古工作者，便有可能根据这些残迹来复原古代的习俗和制度，对各种器物 and 图像提出新的解释。张先生还告诫，民族学资料的使用也需非常谨慎，一些原理的适用性是有限的或有条件的，不能将其作为教条到处套用。因此，熟悉民族学资料必须融会贯通^③。

① 容观龛、乔晓勤：《民族考古学初论》，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Chang, K. C., Major aspect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7, 8(3): 227-243.

③ 张光直：《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目前，我国考古学家的实践操作仍然基本限于类型学和地层学。这两种方法只是确定考古遗存的年代和文化关系的方法，无助于解读物质遗存中的社会信息。单凭器物类型和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排序并非真正的社会发展史，因此考古学的古史重建仍然任重道远。最后值得谈谈我国人类学家在引入民族考古学概念时所探讨的一个新术语，整体性(holism)或整体观(holistic view)研究，这是和新考古学范式一起提上议事日程的一个概念。整体观是指考古学采用一种广泛和包容性的方法，从人类社会各方面如人地关系、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体、艺术到意识形态做全面的调查。为了全面调查各种现象及其关系，整体观的考古学也采用各种方法，包括民族志、民族史和背景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整体观要求在考古研究中尽可能仔细参照来自民族志和民族史的信息，而背景考古学为考古遗存的研究提供一种明确的方法论，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等新技术来分析从生计到宗教等不同方面的材料，并制定一种严谨和系统的途径来解释出土材料。整体观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的方法，对考古学实践产生了持久的影响^①。对于意在重建古史和透物见人的中国考古学，整体考古学(holistic archaeology)显然是无法绕行的必由之路。

最后，为纪念李仰松教授八十华诞，衷心希望他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在我国能够后继有人并发扬光大，进而引领中国考古学融入全球化的学术潮流。

(原刊《考古学研究 10：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① Renfrew, C. and Bahn, P., *Holistic/contextual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Routledge, 2005, 141-146.

谈考古科技与科学考古学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科技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高新科技手段的应用和信息提炼,有时对考古学重建历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对科技手段的运用以及对科技考古学的地位在我国学界及考古圈内仍然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仍然强调考古学的纯净性,认为这门学科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地层学和类型学,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考古材料不能算考古。而一些长期从事考古科技研究的学者认为,科技考古可以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一个全新的科技考古学已初具轮廓^①。在此,我们还需厘清一个概念问题。在欧美,考古科技(archaeological science)和科技或科学考古学(scientific archaeology)是有所不同的。考古科技是指利用那些与考古学无关的科研机构承担一些考古分析工作。当然,现在许多大学和博物馆都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利用相同的科技方法从事考古分析。而科技或科学考古学则是指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探究考古现象的潜因,采用严谨的科学程序和精密技术手段来予以分析和检验。对于研究的问题,考古学家和科技专家在感兴趣的问题或探索视野上可能并不相同^②。因此,就目前我国科技考古而言,实际上仍是处于考古科技的层面,考古学家和科技专家在理论导向和研究目标上有时未必一致,真正的跨学科研究还任重而道远。

① 王昌燧:《学科进展与展望:蓬勃发展的科技考古学》,《南方文物》2009年3期。

② Green, K.,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Four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2009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发起，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科技与考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和融合”的研讨会。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的30余名著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在回顾了中国科技考古的骄人成绩外，还谈到了科技考古所面临的困扰。主要包括科技考古没有“名分”，研究人员面临申请科研项目和经费的巨大困难，也不能作为一个专业招收合格的研究生，没有项目、样品、经费和人才支撑的科技考古工作处处举步维艰^①。

科技考古涉及多学科交叉，这自然会涉及研究项目申请时学科定位的尴尬问题。而且学科交叉所参与的学者本身专业背景不同，关注的问题也会存在差异。以往，当考古学者有求于自然科学工作者时，科技人员往往作为陪衬或辅助人员参与考古项目，如年代测定或环境研究。而其成果也常常被作为研究报告的附录以供参考。而对考古学感兴趣的科技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未必受到考古学者的同等关注甚至获得业内的认同。结果，科技手段可能并未能够恰到好处地用到解决考古学的重大问题上。

中国科技考古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像当代欧美考古学那样，像过去的类型学和地层学方法那样，将各种科技手段作为常态或规范研究程序来解决各种科学问题。这样科技考古不再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是成了考古学的规范程序。考古学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纳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过程，而科技手段的发展和提高与这门学科发展的息息相关。这首先需要考古学家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而科技工作者也要了解考古学探索的方向和难题所在。如果两者对对方的想法了然于胸，并对考古学探索目标能够达成共识，这就能拧成一股力量来推动科技考古研究的进展。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培养各种跨学科的复合型考古人才，不必再像现在，考

^①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科技与考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和融合”研讨会会议纪要》，2009年10月25日。

古与科技仍是两张皮，考古学家只考虑器物和年代，让科技专家做些辅助性的检测工作，这样的合作难免貌合神离。

本文想对科学技术融入考古学的历史过程做个约略的回顾，并对科技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些初步的看法。科技考古并非是用拿来主义，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手段简单撮合的问题，它还涉及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设计。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将科技考古常态性地融入所有分析研究之中，使得科技考古最终成为考古研究的主流。

一、历史回顾

考古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这门学科最早是在西欧确立的。考古学是从古物学脱胎而来，其形成过程受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影响很大。地质学的均变论为生物进化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进化论的普及才能使考古学这门学科突破 6 000 年的圣纪年，进而探究人类漫长的史前史。为了探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地层学和类型学便成了确定人类文化遗存年代的主要手段。汤姆森的三期论首先确立了一种不求助于文献的独立断代方法，成为考古学与古物学的分水岭。

在考古学发展的初期，困惑学者们的主要问题是考古遗存的年代。因为不知道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或它们孰早孰晚，考古学的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于是，在绝对年代测定出现之前，考古探究的主要精力大多集中在年代学问题上。而解决的办法采取了两条路径，首先就是汤姆森根据器物的材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前后，确立了石、铜、铁的前后发展阶段。而后，汤姆森又根据器物的形制或风格，将青铜时代的石器以及将铁器时代的青铜器和石器区分开来。其次，就是借用地质学中的层位学方法，确定物质遗存埋藏时间的早晚。

在放射性碳技术出现之前，欧美的类型学发明了器物排列方法(seriation)来为遗址和墓葬相对时代排序，同时采用交叉断代的方法，将没有文献的欧洲史前阶段与有历史纪年的埃及编年史联系起来，在欧洲和近东建立起一个大致推算的绝对年表。此外，从 1905 年到 1912 年，斯堪的纳维亚的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利用冰川湖泊纹泥和孢粉建立起大约 12 000 年的绝对年代，并将其与历史纪年联系起来。1894 年起，美国天文学家安德鲁·道格拉斯开始研究太阳辐射对地球气候和树木生长年轮的影响，这一方法在 1912 年开始用于对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史前遗址中建筑木料的绝对断代，将该区域

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4 000年。后来，西北欧利用橡树年轮将当地史前史上溯到公元前8 000年，而德国利用松树年轮，将当地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0 000年^①。

考古学的革命性变化发生在1950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发明的放射性碳断代方法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绝对年代的测定方法。这一科技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用核技术的一个副产品，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全球适用的断代技术。之后，该方法对其他放射性断代方法的诞生起到了促进作用，裂变径迹法、铀系法、钾氩法等测年方法纷纷问世。再加上含氟量、黑耀石水合法、古地磁、电子自旋共振、热释光、光释光等不同测年技术的诞生，为考古学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测年方法。这些方法不但将考古学家从类型学断代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其他更加重要的问题，而且精确的年代测定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加细致观察和分析文化的变迁，探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原因。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探究主要局限在探究谁、何物、何时与何地等问题，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则提出了为何和如何的问题。新考古学对文化历史考古学描述性和编年学方法表示不满，认为考古学不应局限于历史学的描述和编年，必须像科学一样来探究造就文化变迁的原因。新考古学提倡在考古分析中引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以明确的问题导向提出假设，用严谨的科技分析手段来进行检验。过程考古学采纳了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方法，从文化功能观和人地关系来观察文化的变迁，将文化看作是人类对局部环境压力所做的功能适应。于是，文化变迁的动力被认为主要来自生态环境的影响。于是，环境考古学成为过程考古学的主要方法。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与国家起源等战略性课题，成为考古研究的基石。在这一研究取向的激励下，各种科技手段蓬勃发展起来。这些科技手段的运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地学，涉及地质学和土壤学的环境研究；植物学，涉及利用植物、孢粉、植硅石、树木年轮对生态气候的重建；动物学，涉及哺乳动物、鱼类、贝类、昆虫等生物链的重建；人类，涉及墓葬、病理学、食谱和遗传学的研究；器物和原料，涉及石、陶瓷和金属等工具的生产和使用。

^① Kuniholm, P., Dendrochronology and other application of tree-ring studies in archaeology. In Brothwell, D. R. and Pollard, A. M. (eds.),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2001.

1. 环境考古

环境考古是考古科技中多学科交叉表现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它所研究的问题涉及极为广泛的层面。比如，以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研究为例，考古学家需要有详细的动植物知识，对气候条件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并要掌握人类生计和食谱的信息。如以文明兴衰研究为例，环境研究可以为玛雅文明、复活节岛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提供深入的洞见。环境考古首先在 19 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冢研究中开启先河，随后在瑞士的湖居遗址和北美的贝冢研究中采纳。1949 年，英国考古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对中石器时代斯塔卡遗址的发掘采取了环境重建的方法，为在欧洲推广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榜样。目前，环境考古是考古科技的一项主要目标，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从全球气候到影响个人日常生活的昆虫和细菌。正如美国考古学家丁考兹(D. F. Dincauze)所言，环境考古的意义在于，如果不了解自然和生物学背景，就无法了解人类过去生活的各种状况^①。

环境变迁与气候密切相关，更新世是冷暖交替剧烈的冰川时代，这种气候环境对人类起源和演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冰后期的气候变迁与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关系密切。虽然长期的气候变迁十分重要，但是短期波动对人类生活也影响巨大，特别是以特定农作物和牲畜为生的农业社会。

地貌和土壤对于重建古环境十分重要。地表的土壤堆积、岩石露头和河湖水源的分布决定了动植物的类型和分布，以及人类觅食活动和农耕活动的条件。但是，目前土壤的分布以及农业经济的潜力可能与古代不同。土壤科学需要勘查地层的剖面，以分辨被侵蚀活动或后来土建活动所掩埋的古代地面。特别当人类不断砍伐山上的森林以拓展耕地，水土流失就会掩埋河谷底部原来的农田和聚落。分辨不同类型的土壤，也能够了解人类对环境的扰动。比如，褐土是林地环境的典型土壤，只要林木生长，土壤就十分稳定。但是伐林开荒后，降雨的淋滤过程会导致土壤退化，结果变成贫瘠的不毛之地^②。

^① Dincauze, D. F., *Environment Archae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Barham, A. J. and Macphail, R. I. (eds.), *Archaeological Sediments and Soils: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Management*, Lond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Conference, 1995.

植被是区域环境变迁的一个很好衡量指标，除了充分利用大型植物遗存如种子、木头和叶子外，孢粉和植硅石被广泛用来重建古环境的变迁。而动物群一直是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收集和分析各种动物的骨骼，并统计它们的数量。最初，动物群研究纯粹是从年代学和气候环境角度来分析的，后来这些材料成为研究人类生计和经济变迁的重要内容。考古学家研究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季节性变化和丰富程度，以了解古代人群的觅食策略和聚落形态，这种研究对于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经济过渡尤为关键。当一处遗址或一个区域的植被历时变迁被构建起来之后，加入动物群、聚落分布和器物工具等资料，就能对该地区古代人类的生活和物质文化功能做出比较准确的解读，并能够重建人类经济、技术和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的具体演变轨迹。但是，动物群分析需要仔细研究动物骨骼的堆积动力，不能将它们看作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这就产生了埋藏学和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领域，将人类活动与自然动力如食肉动物造成的骨骼堆积区别开来^①。为了从遗址中尽可能提取所有动植物材料，浮选法或水洗法被用来收集微小的植物种子和小动物骨骼。浮选技术的应用，对农业起源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在对伊朗阿里科什遗址发掘之初，认为植物遗存很少，人们生计仍然以狩猎采集为主。两年后采用了浮选技术，从整个文化层中发现了四万颗小麦和大麦的种子，彻底改变了对近东农业起源的认识^②。而区分野生动植物种和驯化物种也是一个需要用特殊方法分析的领域，因为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不可能通过鉴定少数样本的特征就可以获得对这一过程的充分认识。

大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开始加大对水生资源的利用。到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鱼类和贝类成为广谱经济的主要利用对象，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大量的贝丘遗址。鱼类的骨骼较小，需要通过水洗来收集。与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相比，鱼骨保存的概率要低得多。因此有可能低估一个遗址中对鱼类资源的利用。许多鱼类都有耳石，能够留存下来以供鉴定。有些鱼类

^① Lyman, R. L., *Vertebrate Taph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Hole, F., Flannery, K. V. and Neely, J. A., *Prehistory and Human Ecology of the Deh Luran Plain*, Ann Arbor: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1996, no. 1.

如鲶鱼鳍的椎骨，能用显微镜观察其生长线以估算其年龄及其大小。从一些鱼类可以推断其栖息地的水域环境，甚至捕捞的季节^①。有些海滨和湖畔的贝丘遗址几乎都是由贝壳堆积而成，贝类作为食物资源的潜力比较容易计算，由于其卡路里能量较低，所以虽然其看似数量巨大，但是可能仍不足以作为主食或全年供养较多的人口。一头赤鹿提供的卡路里相当于 52 267 只牡蛎或 156 800 只蛤^②。不同贝类栖息地的水深，可以指示捕捞的范围和强度。贝壳生长线的观察，可以指示是全年还是季节性采集。比如，对丹麦一处贝丘遗址的观察发现，中石器时代先民主要在春天捕捞牡蛎，而新石器时代先民捕捞的时间更长，一直延续到夏天^③。但是，有时在内陆遗址发现一些贝壳，则未必作为食物。大的贝壳会作为容器和工具，甚者作为仪式用的号角。小的海贝常常被作装饰品甚至货币。周口店的山顶洞出土了用作饰件的海蚶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 6 800 多枚产自南海的海贝，三星堆祭祀坑也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贝类显然是远程交换的奢侈品，具有特殊的文化或宗教象征意义。昆虫在指示环境变迁、过去人类的生活条件、食谱和健康方面信息具有较大的潜力。

2. 人类骨骸

更新世的古人类骨骸极其珍贵，可以提供人类起源和体质进化、物种差异的信息。全新世人类骨骸出土成倍增加，过去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一般观察一下性别和年龄，现在采用高新技术，考古学家可以从人骨中直接获得其当时生活状况的信息。

首先，通过检测骨骼中的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可以了解古代人群的食谱。比如，碳同位素¹³C/¹²C 比值可以指示主食的类型和来源，氮同位素¹⁵N/¹⁴N 比值较低指示农业为主的经济，而比值较高指示一种以海洋资源为主的经济。而微量元素锶则是素食和肉食比例的有用标志，这种测定往往可以在没有其

① Brinkhuizen, D. C. and Clason, A. T. (eds.), *Fish and Archaeology: Studies in Osteometry, Taphonomy, Seasonality and Fishing Methods*,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S294, 1986.

②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Stein, J. K. (ed.), *Deciphering a Shell Midden*,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2.

他动植物遗存的情况下，直接了解人类的生计及经济形态的转变。

其次，人骨的病理学和法医学研究可以了解过去人群的身高、营养状况、劳动强度、暴力创伤、寿命和疾病。理想的话，病理学研究与其他考古信息结合起来，可以详细重建过去人类生活状况的细节。有时，单一遗址就能提供经济变迁的重大信息。比如，叙利亚幼发拉底河边的阿布胡赖拉遗址，起先由狩猎采集者居住，后来由新石器农人居住，于是对这两个阶段的人群能够直接做病理学的比较。证据显示，新石器时代的妇女，因长期跪着碾磨谷物，导致关节炎和膝盖、脚趾的损伤。此外，长期负重、暴力和战斗也会留下过量运动导致的损伤^①。

最后，遗传学的 DNA 技术利用分子钟来破解人类的遗传密码，它不仅可以区分性别，而且可以追溯现代人的起源、族群的渊源和迁徙，因此可以解决物质文化无法分辨的族群问题^②。线粒体 DNA 可以追溯母系的渊源关系，而 Y 染色体可以追溯父系的渊源。DNA 技术近二十多年来成果斐然，为了解现代人的起源和扩散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成就被认为可与人类登陆火星相媲美。

3. 器物、原料和工艺

岩石学方法可以分析石、玉和陶器的成分和结构，这些岩石和陶片的切片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知道组成的矿物以及地质来源。金属器物也能同样做金相学的显微观察，了解金属生产的主要阶段，以及区分细微的铸造过程。它还能揭示铜器是否经过冷加工处理或低温退火处理。对铁和钢的金相分析，可以识别锻铁和渗碳，了解金属冶炼的工序，并揭示古代工艺的无数奥秘。

痕量元素(trace elements)是指器物或原料中的微量杂质，采用光谱测定法(spectrometry)可以加以探测和测量，它们对于追踪原料产地极其有用。这种方法在特征化(characterisation)研究中十分关键，这是一种为石器、玉器、矿石和陶土原料产地提供个别“指纹”的方法。此外，X 射线衍射、X 射线荧

① Roberts, C. A. and Manchester, K., *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Brown, T. A. and Brown, K. A., Ancient DNA and archaeologist. *Antiquity* 1992, 66: 10-23.

光技术、等离子发射光谱法和粒子诱发 X 射线荧光分析(PIXE)都是一些无损伤的探测技术,可分析少量样本中的痕量元素。对于了解古代人类的生产活动、交换、贸易,这些技术能够提供极其重要的信息。

考古学家现在常常采用微痕分析来了解石器的使用痕迹、骨骼上的工具切痕或动物齿痕,以了解工具如何使用,以及人类对肉食的利用。比如,美国考古学家发现非洲早期人类遗址和周口店遗址中的一些动物骨骼上,石器的切痕总是覆盖在动物的齿痕之上,表明这些动物并非是古人类自己猎获的,而是通过尸食或腐食来获得肉类。微痕观察后来衍生出器物的残渍或残留物分析,通过生物、化学(如气相色谱)、免疫、微观形态观察等多种现代手段识别石器和陶器上残留的古代 DNA、淀粉颗粒、植硅石、蛋白质、脂类、碳化物等,以了解工具使用的对象和人类的生计。比如,加拿大考古学家托马斯·洛伊(T. H. Loy)采用免疫学方法,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史前遗址出土的石器上分辨出十几种动物的血渍^①。我们曾将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带有锅巴的陶片,请复旦大学拉曼光谱实验室检测其化学分子结构,结果发现了脂肪和植物的残渍,表明当时可能采取一锅煮的烹饪方式^②。现在,磷酸盐分析被用来分辨不利骨骼保存土壤区域的人类居住和活动区,因为人类和动物的脂肪、骨骼和粪便分解后会留下大量的磷酸盐。

现在,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已经涉及各个探索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只是一组方法中的一部分,获得的信息需要解读与整合,以求重建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场景和过程。所以,这需要问题指导下的探究和理论指导下的阐释,作为将不同科技领域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的纽带和桥梁。

二、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真正的科技考古应该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整合,这是当代考古学的魅力之一。我国一些学者坚称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类型学和地层学,目前许多学者从事的工作仍然是对器物的分类、分期和分辨考古学文化。其实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考古学界流行的研究范例,因为当时考古学家的

^① Loy, T. H., Prehistoric blood residues: detection on tool surfac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species of origin. *Science*, 1983, 220: 1269—1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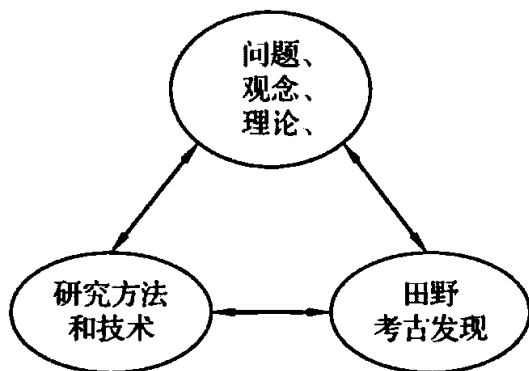
^② 陈淳、潘艳、魏敏:《再读跨湖桥》,《东方博物》2008年3期。

主要任务是对考古发现断代和编年，所以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考古学与史前学无论在目的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变，考古学家已认识到并努力克服先前工作中的缺陷，这就是：缺乏知识训练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分析缺乏缜密性，以及阐释方法上的主观性。目前，这门学科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对方法问题的日益关注，并对早期研究结论的怀疑。在研究技术上，则越来越多地从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中吸取方法和手段，并在研究分析上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在考古学术圈里，人文科学已经与实验科学建立起更为稳固和融洽的联系^①。

科技手段毕竟是各种不同的方法，如果考古学目的是要了解过去，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希望了解什么信息。当今的考古学可谓十分庞杂，林林总总分为不同时段和不同探索领域的专攻。传统考古学仅限于编年学目的，从现在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来看已经显得过于狭隘。过去，中国学者将考古学定位在历史学，希望以地下之材补充文献资料的欠缺，现在来看这样的定位和视野也已过时。当代考古学意在揭示存在于一定时空里不同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并远远超越了文献记载和关注的范围。

作为研究手段的科技方法，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与方法密不可分，理论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么我们会设法采用不同方法来解决它。如果一位考古学家缺乏理论指导的探索性思维，就不会意识到新技术对他的分析有什么用处，也不会积极开发新技术来解决新问题。同样，一位科技专家分析陶瓷、玉器或金属的成分，如果他不了解并设法去解决考古学探索的问题，对检测结果可能也就只能就事论事。

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为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观念和理论，二是研究方法和技术，三是田野考古发现(见右图)。问题和理论主导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且指导寻找哪些考古材料或样本；方法和技术根据设计要求，



^①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考古学和史前学》，见《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主要趋势》(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息；田野发掘则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的要求采集样本。这三个方面都是彼此衔接，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特定的问题意识，方法的选择和好坏就没有标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只能是挖到什么就收集什么材料。这样的发掘往往以典型、罕见、精美和完整的器物为目标。有了理论和问题的指导，采用哪种方法以及创造新方法就有了明确目标，而且田野发掘也对寻求和收集的材料有了明确的选择和要求。所以，在田野发掘中为特定测定技术如碳-14 或孢粉的采样，必须谨慎和缜密地进行。发掘和记录也必须留意每件器物 and 每处遗迹的空间位置，以求重现遗址的原貌。

为此，在科技手段日益渗透到考古分析各个领域中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同步增强理论指导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与对科技专家而言同等重要。中国学者向来鄙视理论，认为理论是个人的成见，是将主观想象硬套到考古材料之上的做法。这种将考古学看作是一种“材料科学”并让材料自己说话的研究其实是很成问题的。正如伦福儒和巴恩所言，虽然考古学研究人类的过去，是一门历史科学，但是考古学家发现的材料并不会直接引导我们去思考什么问题，发现的物质遗存自己也不会说话，是现实中的我们赋予其意义的。在这点上，考古学的实践更像科学研究，需要像其他自然科学专家一样收集材料和证据，做实验，构建假设用来解释材料，并用更多的材料予以检验，从而提出一种最佳陈述。考古学家的历史重建也是通过相同的途径才能取得，这种历史图像并不能现成地从材料中自动显现出来^①。

当今考古学的发展趋势，使得考古学家不仅需要不断增加和改善本学科的技术和方法，而且需要熟悉和掌握那些看起来与自己研究领域毫不相干的科技方法。与其他学科发展一样，考古学的专业化和分工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对于这种学科交叉的趋势，需要从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并列，转向跨学科研究一体化的协调与合作。后者才是科学考古学的最终目标。

皮埃尔·德·拜勾画了多学科向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渐进过程，在他看来，只有当不同学科的合作达到可以说是高度综合的程度，才算是真正的跨学科

^①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阶段：

(1)不同学科的学者各自研究同一课题的不同方面。

(2)各门不同学科的学者同时研究同一个问题，并协调各自的工作和成果，并在综合这些成果之后，寻求某种程度上的统一。

(3)研究者共同研究同一个课题，比较各自做出的假设，以批评方式相互评估各自的方法，以求获得一个共同的结果。

(4)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以便更好地认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①。

在学科交叉的初期，考古学家常常会将其他领域科技专家的工作看作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低层次的交叉研究阶段，考古学家求助于“辅助”学科，向其他学科专家索求一些资料和帮助，而这些专家也不亲自参加考古调查，甚至对考古研究不感兴趣。将这种学科交叉，称之为“辅助”科学也许是恰当的。但是，在学科交叉中，考古学家更愿意与对考古学感兴趣的专家合作。因为，考古学对他们探索的问题也许同样是一门“辅助”学科。著名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曾对旧石器考古学的学科交叉有一个经典的见解，他说：“在我们自己的学科内，没有哪一门学科是‘辅助’主要学科的，所有学科都是相互辅助的。我们认为，外行的‘咨询’专家是不能胜任的。这个队伍的所有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所提及的三个主要学科的专家，即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同时通过能相互熟悉其他学科的问题，并且习惯于进行长期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研究‘整体’，而不是研究的专业划分，这是首要的问题。”^②博尔德的见解应该适用于所有学科交叉的考古研究领域。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指出，要使考古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性学科，需要对事实真相的锲而不舍的、系统的研究。并且为重现过去的整体面貌，在研究中采取历史批判主义的原则，审视所利用的一切材料，对原始材料的价值和可靠性做不断的检验。今天，考古学已成为了如此广阔的天地，以致考

^① 皮埃尔·德·拜：《定向研究》，见《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考古学和史前学》，见《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与该文作者的私人通信。

古学多数部门都趋于专业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支团队能够涉及所有方面。因此，当合作研究需要完全不同的学科参与时，这样的协作就会出现困难。理论上说，学科交叉是一项集体的任务，但是考古学的综述则总是一个人的工作，尽管这种综述是建立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之上。一个有能力的考古学家不仅必须精通本专业的方法，而且必须受过历史学家的训练，并且对共同合作的其他学科有充分的了解，以便在自己的阐释和综述中，正确地、批判性地运用这些学科提供的研究成果。但是，具备这种广博知识，有能力进行大范围综合的专家并不多^①。因此，中国的科技考古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小 结

最近几十年，见证了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与此同时，研究材料也越来越广，种类也越来越繁杂。这使得考古学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发掘比原来更为缓慢，这样才不会遗失和疏漏土壤中包含的任何材料和信息。于是，我们看到，发掘工作过去只不过是挖土的活儿，现在就其需要的细巧和精密而言，简直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媲美。二是我们可以从每件器物上获得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说，随着考古科技的发展，它正在用比原来少得多的材料做比原来更多的事情。

与此同时，考古学理论也蓬勃发展，引导着考古学家不断探索的新方向。正如巴恩所言，考古学变得像一块海绵，浸泡在各个学科组成的整个海洋中，不断吸收各种理论观念和技术的片段。然而，在考古学的发展中，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并不平衡。由于技术没有国界和阶级的归属，大家都愿意接受和学习，但理论则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个人的标签。学者选择理论犹如选择党派与信仰，意味着隶属于某个群体或派别。因此，我们会发现，采纳新的理论，要比借鉴新技术和新方法困难得多。比如，我国有些学者对新考古学的理念并不认同，但是在推进新考古学习用的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上却十分积极。然而，虽然采用了与国外相似的方法和材料，但因理论指导和问题意

^①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考古学和史前学》，见《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识不同，研究成果也就大不相同。因此，考古学并非完全是客观的、单凭提升技术就能达到预期目标的研究领域，考古学家自身的观念和指导思想会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法国史前考古学泰斗莫尔蒂耶为旧石器考古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脾气很坏，经常出言不逊。他主办的刊物总是诋毁其他学者，偏袒自己的学生和盟友。他对所有的新理论都嗤之以鼻，确信任何与他看法不合的理论都是错的。而欧洲史前学者因信服莫尔蒂耶这样有影响学者的见解，长期阻碍了对旧石器时代墓葬、洞穴壁画和尼安德特人的研究^①。

在上述伦福儒和巴恩所提出的理论观念、方法技术和发掘材料的三角关系中，理论观念显然处于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考古学的发展，首先是观念、理论和看待过去的历史，其次是方法技术和研究问题的历史，最后才是材料发现的历史^②。为此，我们应该始终在思想观念上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样考古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探索性和不断有新发现的学科，而不是仅仅靠运气来邂逅重大发现的经验性实践和一门仅凭材料积累为特点的学科。

（原刊《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① 保罗·巴恩：《当代学术入门——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考古学文化功能研究的战略性起点

——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译介

一、方法论的里程碑

20世纪中叶，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难以胜任了解史前文化与社会如何运转和演变的工作。早在1939年，英国考古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J. G. D. Clark)就提出考古学应该“研究人类在过去如何生活的”。他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从功能观的视角观察考古材料，尽可能重建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体系^①。美国文化人类学中也有悠久的历史主义传统。1948年沃尔特·泰勒(W. W. Taylor)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文化历史考古学见物不见人的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学者们热衷于“纯粹的编年史”，对人类的行为毫不挂怀。他建议应当详细研究遗址的内部结构，仔细关注所有的器物与遗迹，并留心它们的功能关系。考古学通过历时分析可以观察遗址在被利用的漫长时间里的缓慢变化，并努力解释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尖端军事技术向其他领域的转移、电脑的逐

^① Clark, J. G. D., *Archae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Methuen, 1939.

^② Taylor, W. W., *A Study of Archaeolog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83.

渐普及、广泛应用统计方法以及科学哲学的影响，考古分析从古代遗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大大提高。同时，理论研究出现了各种流派，进而促成了分析方法的多元化和探索领域的扩展，考古学逐渐从一门描述性学科发展成更严谨的探索性学科^①。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W. F. Libby)于1949年公布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技术，对考古学革命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同时，美国民族考古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 H. Steward)在考古学中倡导“文化生态学”，强调研究文化的功能适应，为文化变迁的理论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②。斯图尔特还促成了聚落考古这一方法的产生，不但研究原始文化的人地关系，而且可以从遗址的分布和变迁追溯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过程^③。在克拉克、泰勒和斯图尔特等学者的影响下，欧美考古学开始从物质文化的描述和断代，进而探究社会变迁的动力问题，从而使考古学成为一门真正以人为本的人文学科。美国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B. Fagan)高度评价了泰勒和斯图尔特的贡献，认为是他们两位将20世纪考古学引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的门槛上^④。

1962年美国哲学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将科学范式定义为一种公认的科学实践规则，指出它为科学研究特定的连贯的传统提供了模式，而问题和方法的转移往往会导致范式的革命^⑤。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在维鲁河谷(the Virú Valley)首先采用的聚落形态研究，标志了考古学范式的重大变革。它不但将考古分析从类型学的编年提高到社会演变的层次，而且开始将考古学阐释从先前注重外来影响的传播论模式转向社会内部动因的探究。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不再以确定特定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为鹄的，而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性质有异、功能互补的生存系统来研究。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要从这种系统的动态结构来提炼社会各方面的信息。

① 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朱利安·斯图尔特著：《文化生态学》(潘艳、陈洪波译)，《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③ Willey, G. 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ú Valley, Peru*,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ulletin 155, 1953.

④ Fagan, B. M., *In 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1.

⑤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

二、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研究

1. 研究起因与问题导向

起初，维鲁河谷项目并非以聚落形态为目的。它只是几位在秘鲁工作过的考古学家饭后茶余闲聊而形成的合作议题，即由得到资助的几位学者包括秘鲁同行同时去维鲁河谷工作，并有意识地将人类学、地理学和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该项目最初的计划还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些传统分析上，如陶片断代、墓葬清理等，且不打算做地层学研究。在1945年夏天的维鲁项目讨论中，斯图尔特向威利提出了“聚落形态”研究的设想。他建议威利参照他1937年在北美西南部所做的民族学调查。那时，斯图尔特跟随半定居土著从一个地点迁往另一地点，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废弃行为。他建议威利从人类居住留下的居址网络形态来提炼生态、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信息，了解先民在某种特定景观里是如何适应其环境并将自己组织起来的。项目启动后，威利以最大努力来进行研究，还有意地偏离斯图尔特的生态学取向，而更加注重建筑与遗迹的分布、功能与结构。面对一大堆不同的建筑和居址，威利曾感到无所适从，但是他强烈意识到，维鲁河谷在前哥伦布(pre-Columbian)时期曾经有过大型的聚落和密集的人口，而研究不同时期的建筑和遗迹的变迁可以重建社会发展的历程。50年后，威利在一篇回顾中坦承，一是后悔当年没与斯图尔特更多地讨论聚落形态，二是对自己偏离斯图尔特生态学取向的建议感到十分欣慰^①。

在开始田野工作之前，威利团队首先向秘鲁空军购买了维鲁河谷的航照，发现了无数从未报道的各类遗址和遗迹。在航照地图上挑选的315处遗址不到整个河谷史前遗址的四分之一，而且至少有一半并没有明显的地表特征。田野勘察是根据航照上选定的遗址进行核实，威利将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研究的问题设定为：第一，对一系列史前遗址的地理学和年代学位置进行描述；第二，对这些史前聚落功能的序列进行预测性重建；第三，对聚落形态反映出来的社会结构进行重建；第四，将维鲁与秘鲁其他地区的聚落形态进行比

^① 戈登·威利：《维鲁河谷课题与聚落考古——回顾与当前的认识》（贾伟明译），《华夏考古》2004年第1期。

较。威利将“聚落形态”定义为“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这是指居址组合方式及其他附属建筑的性质和配置。这种居址布局体现了当时的自然环境、建筑的营造水平，还有各种社会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机制。由于聚落形态是人们维持生计和举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①。聚落形态超越了碎片化研究的传统方法，为考古学透物见人开辟了令人振奋的前景。

尽管威利为遗址设定了功能性范畴和描述性类型，但他还是回避了以下问题：什么是遗址？遗址之间的划分有何标准？虽然维鲁河谷团队看法不一，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在采集现场资料时，对周围的单位或区块的所有遗迹进行记录很重要。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想法，体现了该项目已经有了不同于传统田野工作的意识——不放过发掘地点附近的各种现象。他们意识到遗址群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栖居在河谷内的几处聚落先民，在某时期内可能联手营造一个金字塔。由于当时“聚落形态”及其相关概念尚未清晰确立，因此这种较大范围的栖居形态被称为“社群组合”(community assemblages)或“社区形态”(community patterns)。

图1是维鲁河谷八个史前时期各类型遗址数量的变化，从图中内容可以看出，时间越早，遗址类型越单一。比如，公元前的塞罗普列托(Cerro Prieto)时期基本只见一般生活居址；波多穆林(Puerto Moorin)时期四类遗址开始出现，且居址大增，显然河谷的人口在此时突然激增；而社区与仪式建筑在加伊纳索(Gallinazo)及万卡戈(Huancaco)时期明显大增，往后就开始显著下降；尤其是托马巴(Tomaval)时期，在仪式建筑逐渐减少的同时，一般生活居址却大增，成为整个史前时期居址最多的时期。对这个极端现象可以推测为：极有可能到托马巴时期，人们对公共活动与宗教仪式的兴趣或依赖性降低，而对世俗生活有更多的关注，并且在住宅上投入更多的劳力和资源。

^① Willey, G. 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ú Valley, Peru*,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ulletin 155,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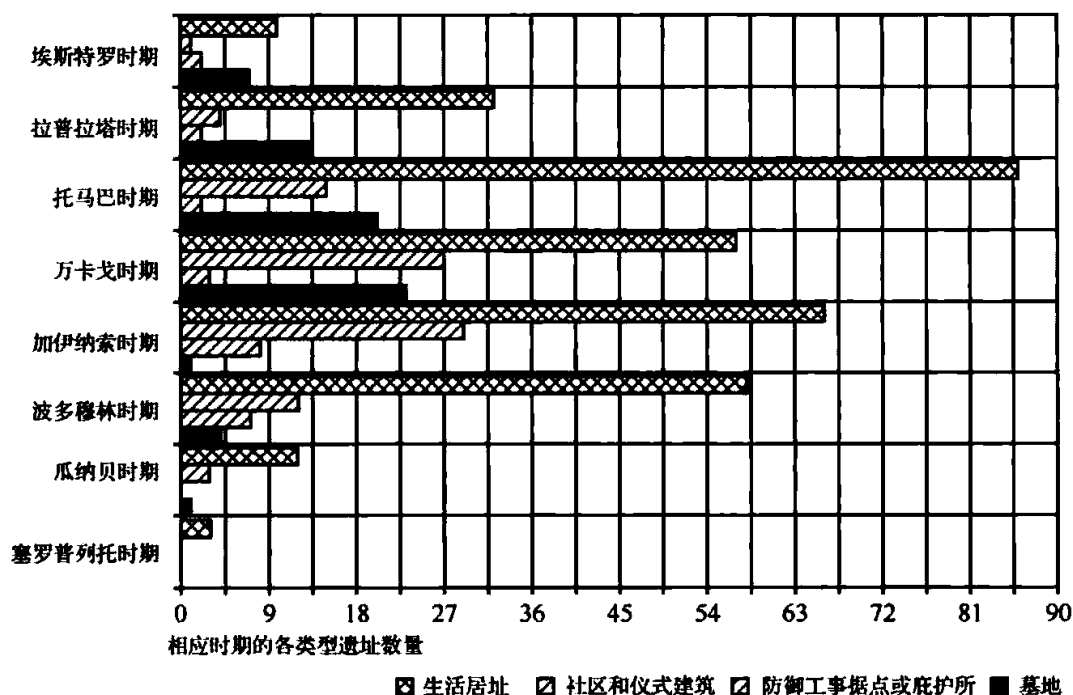


图1 维鲁河谷史前各时期的遗址类型数量变化图

2. 断代方法

维鲁河谷遗址的断代采用陶器类型的垂直(地层学)与水平(排列法)的层位断代,某些类型组合以及这些类型在垂直层位或水平层位上的频率分布被指定为年代序列中的某个时期和阶段(亚时期)。这些时期和阶段的早晚序列依次是:瓜纳贝(Guanape)(早、中、晚)、波多穆林(早、晚),加伊纳索(早、中、晚)、万卡戈、托马巴、拉普拉塔(La Plata)及埃斯特罗(Estero)。在用陶器建立起维鲁河谷的年代学后,接下来要确定这些遗址的共存关系,也即确定不同时期共生的遗址和遗迹。威利感到这个题比较棘手,因为维鲁河谷很小,许多位置理想的地点在各时期被反复栖居。这些遗址往往混有多个时期的陶片,而如何将陶片年代与不同时期的建筑和遗迹相对应就成了问题。于是,威利设法解决陶片与遗址中的某些建筑或遗迹的关联性问题的。他设想,房屋和建筑里的陶片要比垃圾堆里的陶片更能确定其年代。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确定遗址类型,间接依赖共存的陶片,并辅以其他因素的考量。比如,如果发现用方形藤纹泥砖建造的小型金字塔与加伊纳索晚期的陶片共存,那么,混有波多穆林早期和加伊纳索晚期两类陶片、用相同泥砖建造的金字塔年代很有可能是属于加伊纳索晚期的。虽然威利采用地表陶片的共生关系来对许多遗址断代,但是大量的重要遗址还是用发掘来确定其年代序列。威利在总

结维鲁项目的经验时认为，未来的聚落形态项目应该多做仔细的发掘，对区域遗址最初可以采用陶片排列法和参照陶片与建筑的共生关系来断代，但接下来应该结合遗址出土材料与遗址类型做仔细的审视和核实，有了比较坚实的年代学框架，才能对各种遗址的功能和动态组合提供有用的洞见。

3. 遗址功能分析

威利将维鲁河谷的史前遗址划分为四个功能性类型：(1)生活居址；(2)社区和仪式建筑；(3)防御工事据点或庇护所；(4)墓地。其中第二类遗址相对重要，如政治中心及宗教中心。虽然这些遗址按照其功能分类，但也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有些遗址的功能有所重合，如第三类的山头堡垒显然是防御工事，但其结构特征显示，有些堡垒也是仪式中心和居址(表1)。

表1 维鲁河谷史前遗址类型及亚型表

类 型	亚 型			
生活居址	散置的小屋村寨	聚落： 1. 无序 2. 规则	半封闭的大房子	复合村： 1. 方形围屋 2. 宏伟的方形围屋 3. 无序的围屋
社区和仪式建筑	社区建筑	金字塔	金字塔-住宅-建筑复合体	
防御工事据点或庇护所	山头堡垒	山头平台	山头村落(聚集型)	城堡防御工事复合体
墓地				

这种功能性分类既便于简化描述，也对追溯维鲁河谷聚落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从遗址中，可以明显看出较早的方形圈围宅院(the rectangular enclosure compound)与后期圈围宅院的差异。威利力主关注这些差异，认为它们是具有年代学意义的变迁。事实证明，威利的敏锐很有道理。因为，最后的报告显示出这种复合遗址很多，而且可以合理推断其背后的原因：根据不同时期河谷的条件，居民为适应灌溉及人口的聚集或迁移，发展出多种功能的复合宅院；另一个实际因素就是“原地重建”的经济性与方便性。

在建立起遗址的功能类型之后，威利便从遗址的年代序列追溯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变迁。对于居址，他总结出其住宅单元依存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从孤立和无序的安置向聚集和对称规划的方向发展。虽然这种发展趋势可以做比较客观的推测，但是将某建筑或纪念物解释为“政治-宗教结构”的反映，

则是比较主观的判断。因为该判断设想这类建筑与住宅明显不同，如不寻常的规模或形状，因此可能是寺庙或宫殿等。尽管这样的假设带有猜测性，但是威利强调，这可以参照同时期世界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建筑、秘鲁早期历史时期的同类建筑，以及秘鲁北部沿海史前文化来得到佐证。维鲁河谷政治-宗教建筑形式的变迁有两个明显现象：首先，引进波多穆林时期的土墩建造思想；其次，自托马巴时期开始，土墩崇尚风气急剧下降。威利做出了一个概括性结论：趋势本身或许不一定有什么新意义，但作为每次冲击的一个起点，都开启了一个后续时期的流行趋势^①。

表 2 是基于各时期遗址类型及数量的变迁，分析了各时期遗址占用情况以及反映的聚落形态特征。表中显示，波多穆林时期，在图 1 中的人口激增可以和表 2 的“引进灌溉渠道”和“山头堡垒”的出现对应起来。据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水利工程提高了粮食产能，直接刺激了人口的增长，或吸引了外来的移民，结果是导致群体间的冲突和防御工事的出现。再看托马巴时期，出现了用人工泻湖供水，表明溉渠可能已不敷使用，不排除可能是人口过多导致水源紧张的缘故，因此必须再创建其他供水设施。

表 2 维鲁河谷史前各时期聚落形态变迁表(不包含有争议遗址)

年代 (公元)	史前 各期	生活 遗址	社区与 仪式 建筑	防御工 事或庇 护所	墓 地	聚落形态变迁	
						特征	遗址占用情况
各期数量							
-1200	塞罗 普列托	3	0	0	0	因地制宜	地下房子、手工泥砖
-1200 -400	瓜纳贝	12	3	0	1	聚落形态 无序	地面小房子、粗石砌造建筑、 方形巨石庙宇
-400 0	波多 穆林	58	12	7	4	溉渠引进	遗址大增、房子开始群聚紧凑。 圆锥石泥砖金字塔、围墙、山 头堡垒

^① Willey, G. 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ú Valley, Peru*,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ulletin 155, 1953.

续表

年代 (公元)	史前 各期	生活 遗址	社区与 仪式 建筑	防御工 事或庇 护所	墓 地	聚落形态变迁	
各期数量						特征	遗址占用情况
0 800	加伊 纳索	66	29	8	1	沿海成技术 中心	聚集规模更大、房间对称、遗址不很集中。水渠扩大、堡垒式防御工事
800 1000	万卡戈	57	27	3	23	金字塔宫殿 行政中心	模制砖、墓葬精致、聚落形态显著。运河活跃、防御墙超级社区
1000 1300	托马巴	86	15	2	20	人工泻湖 供水	住宅增多、土墩没落、围屋变大。前期社区中心重复占用、弃城堡用防御墙
1300 1470	拉普 拉塔	32	4	2	13	河谷聚落形态 完全确立	金字塔更少、城堡减少、前期围屋继续占用。采用防御墙
1470 1532	埃斯 特罗	10	1	2	7	扩张最后 阶段	金字塔消亡、前期围屋继续占用、半封闭大宅消失。改用防御墙

4. 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建

遗址类型的增加和功能的复杂化过程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同步发展。于是，某时期住宅与村落的规模与布局，庙宇、宫殿、公共工程和防御工事等遗址和遗迹，体现了社群内部结构和控制以及与外部的冲突。于是，维鲁河谷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历时过程便可以从聚落形态变迁推导出来。

瓜纳贝早期及之前，维鲁河谷聚落形态完全依地形特征而分布，没有存在政治控制或宗教组织的证据。到了瓜纳贝中、晚期，有一些被威利称为“核心社区”的遗址出现，该时期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村落围绕着一个“中心”。然而，同一时期在秘鲁其他地方，宗教崇拜的查文(Chavin)艺术风格正在逐渐扩散。因此，对瓜纳贝时期出现的这类仪式遗址，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庙宇或宗教建筑。其后，随着查文宗教崇拜的式微和波多穆林时期的到来，防御工事的出现表明军事对抗的兴起，相关文化中也显示出各种技术观念而非宗教现象的传播。金字塔很可能一直是政治或宗教的中心，与人口增长、农业发展和战争的发展进程相关。虽然尚不能肯定当时的维鲁河谷究竟是个单一的国家，还是若干较小的对等政体并存，但是从社会管理的要求上判断，

世俗活动很可能已经集权化。

到了后来的加伊纳索时期，由于凭借复杂的灌溉系统从内陆的瓦卡邦戈(Huacaponco)运河上游高地引水，一直延伸到沿海，还有晚期其他的庞大工程项目，更加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体，或是一种平稳运转的紧密联盟在密切协调下运作，而宏伟的金字塔极有可能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据此，威利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存在中央集权管理机构。其他证据也显示，此时北部沿海和秘鲁其他地方已出现了早期国家，这暗示加伊纳索时期可能出现了战争领袖。特别是从此时期起，最大的人口聚居中心就在维鲁河谷，社会内部的竞争自然加剧，战争频繁，因此城堡防御工事的建设变得十分流行。而且，许多庞大的公共工程也标志着巨大的劳力支出及有效的行政管理。

万卡戈时期有一个与宫殿建筑群相连的宏伟金字塔，它是这个河谷尚未统一时期中最可能的“中心”。但从万卡戈时期典型的莫奇卡(Mochica)艺术风格推测，其管辖权可能掌握在来自北方沿海的莫奇卡战争领袖的手中。从万卡戈时期的墓葬装饰看，老的加伊纳索风格已经完全被莫奇卡陶器取代。但威利认为，这些变化所隐含的意义远非简单的文化兴替，而是象征着莫奇卡政体向南的政治扩张。在万卡戈时期，维鲁河谷成了多河谷国家的一个行省。图2是维鲁报告中万卡戈时期的聚落形态，为维鲁河谷史前仪式建筑遗址的全盛期，金字塔林立，金字塔-建筑-复合体成为周边居址、墓地以及其他较小金字塔的“中心”，这些不同类型的遗址共同组成了许多大小不一的社区群落，有的聚落还有“城堡防御工事复合体”以抵御外来入侵。图2虚线圈内的箭头表示聚落内各种遗址围绕着一个“中心”分布。不同虚线圈显示各聚落的大小和范围，并有不同规模的“中心”。如左下角维鲁河北侧的虚线圈中心是一个金字塔(三角形)，其周边主要是一般性遗址(小圆圈)，没有其他功能性建筑。该虚线圈右侧有一个箭头指向中间靠下的狭长虚线圈，后者的形态显然比前者复杂，其中心是个金字塔-建筑-复合体(扁长方形上置三角形)，周围遗址类型多样，包括一般遗址、金字塔、墓地(外围有半弧形的圆形)，甚至城堡-防御工事-复合体(四角有外凸结构的正方形)。左下角虚线圈的箭头指向较为复杂的狭长虚线圈，表明它以后者为“中心”。同样，中右虚线圈的聚落形态也相对简单，它也有一个箭头指向下面的复杂聚落，表示对后者的依附。这些聚落形态的规模与关系暗示：史前维鲁河谷的“聚落中心”很可能有等级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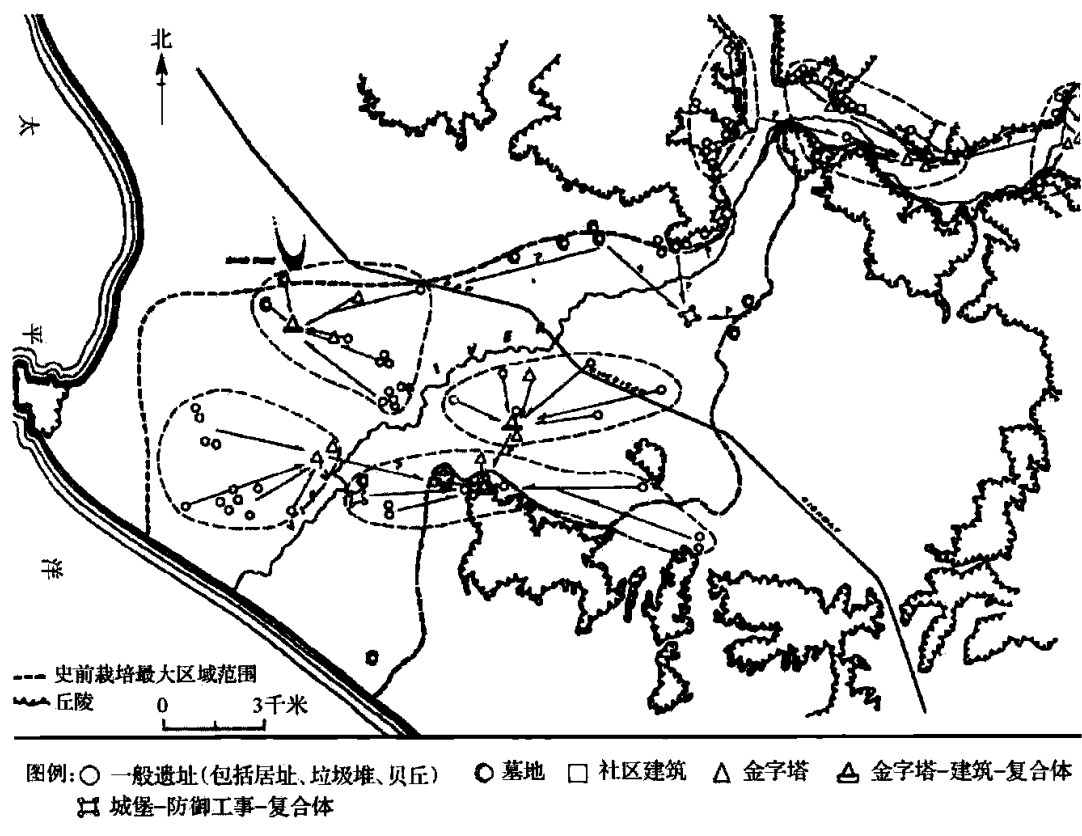


图2 万卡戈时期聚落形态

引自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图7.8(图例为作者所附)

金字塔营造始于波多穆林早期并延续到万卡戈时期，它们在社区核心作用的式微，可能反映了托马巴时期原先的政治-宗教体制的衰落。城堡防御工事已不再需要，河谷下段高大的带墙复合建筑成为庇护、驻军、行政中心三种功能皆备的设施。在住宅区，一种新的方形圈围宅院开始流行，内部的房屋建造得比村落更加有序，这样理性的社区布局显然隐含着某种文化价值。

后起印加帝国(Inca Empire)的征服显然承袭了本地几个世纪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因为，维鲁河谷本地的拉普拉塔时期与秘鲁史前的奇穆时期同时，印加征服者从奇穆人(Chimu)那里继承了许多艺术和手工艺改良技术、大规模生产系统，以及方形城镇或方形复合体的建筑规划。尽管维鲁河谷的拉普拉塔时期并没有政治中心，但奇穆王国已经是都市化社会。印加人到来之前的托马巴和拉普拉塔时期的复合围屋(遗址见有陶制模型)都与奇穆城市的大

型方形围宅有相似之处^①。这表明，一个相似的社会结构可能已经在两地同时流行，而且这种社会结构在大的都市中心不断扩大以适应增加的人口。

威利推测，许多的管理方式是从社会结构更复杂的沿海居民引入的，印加征服者用奇穆统治者的管辖方式接管了前奇穆省，文化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从考古学证据也无法在该地区分辨出一个“印加时期”。虽然器物经常会被发现在废弃地点，但建筑遗迹留在原地，因此能够提供不同社区空间各种活动的直接证据。在社会政治结构的阐释中，威利充分认识到聚落形态材料对于系统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价值。

三、聚落形态研究的意义

聚落考古可以被视为 20 世纪考古学变革的重要标志，是从器物分析转向人地关系和社会分析的重要一步。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B. G. Trigger)对聚落或居址考古学有一个简洁的定义，称之为“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他认为，聚落分析将加强而不是取代或破坏原来的考古学体系，它有别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地方是，聚落考古学并不试图简单地列举各种文化特征，作为了解考古学文化组合之间的关系，而是要了解影响这些关系经济和政治的功能系统；聚落形态研究从人类栖居形态的特点和变化来观察社会结构的特点与演变的轨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人类社会如何从自治村落向集中城市发展的过程^②。聚落考古学的方法论能够在出土的实物资料和人类学的生活单位与结构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为从考古的实物材料探讨社会生计和生产等的组织方式、规模以及发展变化的规律等提供系统的背景框架^③。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研究采用功能和规模分类过程，在此过程当中考古学家必须依赖他可以使用的所有物质材料和各种考古技能，其中心问题也在于制定合适的分类，并确定适当的相伴关系。特里格将聚落和居址考古学的分析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个别建筑，第二是聚落，第三是聚落的区域形态。个别建筑如房屋、粮仓、工场、庙宇的分析可以了解一个社群里家庭的结构和

① Willey, G. 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ú Valley, Peru*,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ulletin 155, 1953.

② Trigger, B. G., 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s and promise. *American Antiquity*, 1967, 32(2): 149—159.

③ 曹兵武：《聚落考古的几个问题》，《考古》1995年第3期。

较大的居住单位、劳动分工和职业的专门化；分析聚落的布局可以揭示社会关系的信息；区域聚落形态的空间分析可以探究社群在经济、政治上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①。国内有学者也提出聚落形态研究的四个层次：(1)聚落位置的选择，分析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不同聚落之间社会、经济等活动之间的关系；(2)聚落内部的布局，了解各种建筑的功能以及相互关系，这是一种微观的社会关系分析；(3)聚落之间的关系，分析同时期邻近不同聚落之间的互动和依存；(4)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也是区域社会形态的宏观分析^②。为此，聚落形态考古一般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生态学研究，主要用来考察聚落形态如何反映一个社会及其技术对环境的适应；另一种是对史前文化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结构进行推断和重建。

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的研究成果相较于传统的田野发掘报告可谓是成就非凡的创造。威利的维鲁报告在按阶段介绍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缺陷。他在报告中坚信，用“聚落形态”来重建史前文化的功能和社会变迁是很好的主意。报告作为首个聚落形态研究成果，除了引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以及用较长篇幅介绍了不同时期遗址的基本资料外，威利在后面几章对维鲁河谷的考古遗存和聚落形态做出了社会性的阐释，试图重建维鲁河谷古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他们适应自然环境的生活场景。特别是最后两章作为全书的结论，威利根据人口的规模和增长，论述了聚落形态中所体现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提供了一种秘鲁建筑形式和社群类型变迁的比较性视角。所以他的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研究为考古学文化区域差异和适应的复杂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认识。张光直高度评价了威利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认为它即使不是宣告美国考古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至少可以成为一个象征^③。它为考古学方法论带来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即从以器物为对象的分析转向以遗址为单位的研究方法。从此，聚落形态成为考古学文化功能分析的战略起点。

① 布鲁斯·特里格著：《聚落形态的决定因素》(陈淳译)，见《时间与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文明探源》，《郑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③ 张光直：《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胡鸿保、周燕译，陈星灿校)，《华夏考古》2002 年第 1 期。

四、概念释疑

裴安平在 2015 年第 1 期的《东南文化》上发表了题为《区域聚落形态可以休矣》的文章(以下简称裴文),对威利聚落形态的研究价值提出六点质疑^①。略予详察,发现作者似乎并没有读过原著,这些质疑均源自他本人对聚落形态概念和方法理解的偏颇。下面是对其批评的逐一释疑。

第一,裴文认为聚落形态并非始于史前期晚期。这一批评显然是受了中英对译“聚落”一词的误导。威利对 settlement pattern(聚落形态)的定义是“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所以,英文 settlement 并不完全对应中译“聚落”一词(中文字义是指聚居的村落或居址,一般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实际上,从古人类诞生伊始, settlement 就出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在东非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或华北泥河湾盆地留下的临时营地和屠宰地点分布也叫 settlement pattern(聚落形态),但这里的“聚落”概念显然不能用新石器时代的聚落概念来理解。意识到该术语的中译沿用到旧石器时代会产生误导,本文的第二作者曾撰文,建议用“居址形态”翻译该术语^②。虽然“居址”一词也不太贴切,但是似乎没有更恰当的中译。由于起初讨论西方聚落形态方法的大部分中国学者包括张光直先生都是研究史前期晚期的,于是对他们而言,译为“聚落”显然更加顺口。

第二,裴文认为聚落形态混淆了自然与社会的区别。上文提到聚落形态研究有两个途径:一是生态学方法,研究人地关系互动;二是社会研究,即研究某区域里人群组织的方式,也就是从栖居形态的变迁来研究的社会复杂化。因此,裴文的这一批评显得没有道理。

第三,裴文质疑区域聚落形态忽视小区域的聚落形态及其变化,认为国外区域聚落形态研究偏好范围和形态较大的遗址。其实,区域聚落形态意指大范围里的社会变迁研究,这是因为研究社会变迁的进程不能囿于局地和个别遗址的观察,必须着眼于大范围的社群和政体互动。这并不意味对小聚落的忽视,这在上文介绍聚落形态分析的不同层次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在此不再赘述。

^① 裴安平:《区域聚落形态可以休矣》,《东南文化》2015 年第 1 期。

^② 陈淳:《居址考古学的探索与启示》,《文物世界》1999 年第 4 期。

第四，裴文质疑区域聚落形态不能反映聚落之间的血缘关系。这有点委屈了威利，从物质遗存和居址遗迹来分辨族属和血缘关系，对于考古学来说向来是个难题。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聚落形态确实可以研究社群组织起来的方式，它比用器物类型定义的考古学文化来分辨人群更切合实际。

第五，裴文质疑区域聚落形态将遗址与聚落混为一谈，这点无须再做解释，因为 settlement pattern 已将人类留在地面上的所有活动遗迹和遗址都涵盖在内。

第六，裴文质疑威利的聚落形态研究过分强调面积和内涵，也就是重视大遗址而忽视小遗址。这个批评也误解了威利，上述介绍应该可以释疑。

裴文对聚落形态方法的质疑，凸显了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方法时，需要吃透原始概念、科学定义和产生背景的重要性。许多外来概念在中英对译过程中，因词意的微妙差异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如果完全按照中译术语的表面字义加以理解和发挥，并应用到聚落研究中，有可能会误用这一方法，甚至偏离其初衷。因此，翻译威利的原著对于了解聚落形态研究的开创性意义与具体操作显然很有必要。

五、结 语

在我国的史前研究中，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文化遗存一般用类型学来进行分析和比较，然后以一批比较典型的器物或一处比较典型的遗址作为某一考古学文化的代表，而一些区域分布的遗址和考古发现都根据出土的材料和这些典型遗址建立联系，以构建这些遗址的区系类型。这种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方法在建立年代学或文化关系上应当说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用来观察社会、经济和宗教信仰等现象或重建社会变迁过程可能就不一定合适了。考古学文化和类型学一样，是一种静态的观察方法，而人类的社会则是一种调节和适应的生存系统，所以，在考虑物质文化的异同时必须考虑社群生存的环境。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分析考古学文化，我们应该将各种器物 and 考古遗存看作是社会不同系统组成部分的物质表现，而这些物质表现根据其功能和不同的适应分别表现出自身的特点。技术和经济层次上的物质表现可以根据当地环境和社群角度来进行观察和讨论，社会结构层次上的物质表现可以从社群内部的分化和等级来进行分析和比较，而意识形态层次上的物质表现可以从思想观念的作用来进行解释。总之，聚落形态对遗址、遗迹和遗物功能的整合

分析可以为考古学家提供一种全方位的视野，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共时到历时的不同角度来分析人类群体的生存、社会的结构与运作以及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它为考古学透物见人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途径。威利在维鲁河谷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不愧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和自汤姆森(C. J. Thomsen)“三期论”创立以来最重要的发明^①。

(与谢银玲合写，原刊《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①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第二部分

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

一、前言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 20 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已经从最初 19 世纪“标准化石”一样的断代工具，发展到 20 世纪上半叶分辨人类群体的文化类型，最后在 20 世纪下半叶进入全方位的人类行为解读。凭借各种研究方法的完善和测试技术的借鉴和引入，打制石器已经不再是那种单调的石核、石片以及器物分类，或硬锤、软锤以及压制技术发展的探讨，或手斧和砾石砍砸器传统以及石器大小传统的论证，它已经可以分析史前人类技术、经济、贸易、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为我们了解古人类的演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出版的《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一书的“考古学和史前学”章节中，法国学者西·德·拉埃对世界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和发掘技术做了很好的回顾。他说，考古学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明确提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首要任务是要系统地搜集尽可能多的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材料。发掘仅仅局限于使埋藏在地下的考古遗迹重见天日、搜集艺术品和具有审美价值的、珍贵的“博物馆文物”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看到，为什么发掘工作在不久前往往不过是民工挖土的活儿，而现在，就其所需要的细致和精密而言，简直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媲美。

拉埃认为，只有当不同学科的合作达到了可以说是高度综合的程度，才

算进入真正的跨学科阶段。因此，他赞同法国学界的看法，认为“史前史”是非常狭隘含义的研究，应当采用博尔德提出的“更新世学”(pleistocenology)的概念，因为它准确包括了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包括古人类学和古生态学)高度综合的特点。他引用了博尔德写给他的信里的一段话来阐述这个观点：“包括我们自己的学科在内，没有哪一门学科是‘辅助’性的，所有学科都是相互辅助的。我们认为，外行的‘咨询’专家是不能胜任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所提及的三个主要学科的专家，即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同时通过训练能相互熟悉其他学科的问题，并且习惯进行长期协作。我认为，这是一个研究‘整体’，而不是研究专业的划分，这是首要的问题。”^①

本文试图对 20 世纪最后 10 年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做一约略的回顾，其中包括了中国学者的努力。根据这一回顾我们可以了解当今国际学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发现差距，以便努力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二、原料分析

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石料含有指示它们产地和交换的丰富信息。长期以来，原料的产地分析基本上是一种目测方法。最近发现，燧石在紫外线下发出的荧光可以显示一种性状将不同的燧石种类区分开来。虽然目测分辨石料的方法有所改善，但是仍不很可靠。Moholy-Nagy 等人的研究显示，他们从中美洲蒂卡尔遗址采集了 29 件石器和 1 件未知的石块，先用目测，然后采用紫外线荧光，发现一半的目测结果有误^②。

将遗址与原料产地关系的比较，可以提供一种视野来了解区域劳力相对于其拥有的技术所采用的策略。比如，对外来原料的利用率要高于本地的原料。对北美西部的分析发现，不同的原料被用来生产不同的工具。比如，俄勒冈州山地的一处遗址里，正规的工具用从低地运到高地的石料如燧石和黑曜石生产，而本地产的安山岩只是一种补充原料，用来生产粗制的两面器和

①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考古学与史前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周铭扬译，董欣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Moholy-Nagy, H. and Nelson, F. W., New data on sources of obsidian artifacts from Tikal, Guatemala. *Ancient Mesoamerica*, 1990, 1: 71-80.

权宜性工具^①。在北美另一处地点，外来的原料主要用来生产正规工具，而本地原料被用来生产权宜性工具，外来原料有时还被用两极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殆尽^②。

过去十几年里我国旧石器考古也开始关注原料分析。比如，王建等在对丁村遗址群的研究中强调，汾河地堑有良好的角页岩和石英岩，可以生产大型的石器，而周口店地区主要为裂隙发育的燧石和脉石英，所以石器就很小^③。卫奇在对泥河湾半山遗址的发掘中就关注石料对技术和石工业特点的影响，注意到石核大小和剥片受石料原型的影响很大^④。陈淳呼吁在石器分析中将石料质地和技术、可获性、器物的大小和精致性综合考虑，避免从文化传统单一角度来解释文化现象^⑤。1998年，陈淳和沈辰等在对小长梁遗址的发掘中采用实验来分析石料，认为小长梁石工业以小型制品为主是由于石料裂隙发育所致^⑥。裴树文等分析了东谷坨的石料，探讨了泥河湾直立人获取石料的三种途径^⑦。高星从周口店第15地点的原料分析中发现，石英的比例高达95.2%。这种高含量和低质量的原料利用，制约了第15地点的石器技术和文化面貌^⑧。杜水生通过对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中原料采集和利用策略的分析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之前，除了少量优质石料来自10千米之外的地方，古人类主要采取就近采集和利用石料的办法。但是自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开始，古人类选料的策略发生了变化，对优质石料开始

① MacDonald, D. H., Mobility and raw material use at the Hunting Camp Spring site, Blue Mountains, Oregon. *North American Archaeologist*, 1995, 16: 343-361.

② Andrefsky, W. Jr., The geological occurrence of lithic material and stone tool production strategies. *Geoarchaeology*, 1994, 9: 375-391.

③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

④ 卫奇：《泥河湾盆地半山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⑤ 陈淳：《旧石器研究：原料、技术及其他》，《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⑥ 陈淳、沈辰、陈万勇、汤英俊：《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⑦ 裴树文、侯亚梅：《东谷坨遗址石制品原料利用浅析》，《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⑧ 高星：《关于周口店第15地点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研究》，《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做精心的选择和追求，优质石料的运输远达 10 千米以上^①。王益人对周口店第 1 地点和第 15 地点石料的分析后认为，环境因素是北京人遗址原料选择和技术变革的直接因素^②。

三、打制技术

技术是指制造石器的各种方法，包括对操作和打片的策略和顺序，打片的工具以及对于原料和操作力度的分析。

1. 技术与类型

在技术类型领域，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博尔德(F. Bordes)和宾福德夫妇(L. and S. Binford)有关莫斯特文化的争论至今仍有影响。早在 1968 年，博尔德根据法国莫斯特文化中不同器物的分布频率，分辨出四类莫斯特文化传统，认为这四种不同的传统代表了四批相对独立的民族群体^③。而宾福德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组合的差异代表了人类不同的活动方式而非传统和人类群体的不同^④。

范皮尔(van Peer)对北非的研究发现，石工业的特点很可能代表不同的群体。其中一种当地沿尼罗河生存的人群发展到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与这批群体同时，有一批适应于沙漠多样环境的努比亚人群拥有一种相当复杂的不同文化特征^⑤。然而对于许多研究旧大陆的美国学者来说，并不赞同博尔德的解释。他们认为，尽管莫斯特文化中存在不同的文化组合，但是这些组合中的差异是由技术和功能而非形制所造成的。比如，弗里曼(L. G. Freeman)说：“就我所知，从民族学记录而言没有哪个社会文化群体会

① 杜水生：《泥河湾盆地旧石器中晚期石制品原料初步分析》，《人类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② 王益人：《周口店第 1 地点和第 15 地点石器原料分析》，见《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暨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 75 周年国际古人类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2004 年。

③ Bordes, F., *The Old Stone Age*,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8.

④ Binford, L. R. and Binford, S. R.,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functional variability in the Mousterian of Levallois fac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6, 92(2): 238-292.

⑤ van Peer, P., Interassemblage variability and Levallois styl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1, 10: 107-151.

以生产不同百分比的石器工具来把自己和相邻的其他群体区分开来。”^①迪布尔(H. L. Dibble)等以对法国南部几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组合的分析,支持这一观点。他们的研究显示,莫斯特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以一系列不同特点所表现,这些差别表现为一种渐变而非绝对的方式^②。

高星对周口店第15地点石器技术的研究发现,虽然脉石英占的比重很大,但是石核剥片已经主要采用锤击法,砸击技术退居次要地位,表明古人类已经能够用锤击法熟练加工脉石英这种劣质石料,并根据原料不同形状采取不同方式生产石片和加工石器。而对第15地点石器类型的分析表明,刮削器的形态变异取决于石料的原始形态,而非代表功能的不同^③。

2. 废片分析

1985年,由沙利文(A. P. Sullivan)和罗森(K. C. Rozen)提出的分析系统给该研究领域带来了一场风暴,他们建立了废片特征的鉴定标准,并提出了从不同废片特征来分辨人类生产活动的特点,如是进行初级剥片还是工具修整,他们对废片特征的区分为学界所重视^④。

后来有些学者进一步用实验来检验他们的废片分析模式,如普伦蒂斯(J. T. Prentiss)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用硬锤和软锤打片,然后用沙利文和罗森的废片标准进行区分,发现这一标准十分有效,可以得到非常一致的结果^⑤。然而,阿米克(D. S. Amick)等用石核和两面器生产的实验方法来了解

① Freeman, L. G., Mousterian facies in space; new data from Morin Level 16. In Dibble, H. and Mellars, P. (eds.), *The Middle Paleolithic: Adaptation, Behavior and Variabil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Museum Symposium Series, 1992, Vol. 4, 113—125.

② Dibble, H. L. and Rolland, N., On assemblage variability in the Middle Paleolithic of Western Europe: history, perspectives, and a new synthesis. In Dibble, H. and Mellars, P. (eds.), *The Middle Paleolithic: Adaptation, Behavior and Variabil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Symposium Series, 1992, Vol. 4, 1—28.

③ a, 高星:《周口店第15地点剥片技术研究》,《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3期。

b, 高星:《周口店第15地点石器原料开发方略与经济形态研究》,《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④ Sullivan, A. P. and Rozen, K. C., Debitage analysis and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85, 50: 755—779.

⑤ Prentiss, J. T., Experimental replication and use of Cantabrian Lower Magdalenian antler projectile point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8, 25: 875—886.

石料种类对破碎方式的影响。他们发现，玄武岩和石英岩的破碎特点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因此他们认为，破碎的形态与石料的关系要大于其他的因素，因此认为，沙利文和罗森的分析方法并不实用^①。

根据假设，二次废弃地点或垃圾堆积要比剥片和生产地点含有更多的碎屑块。于是，希兰(D. M. Healan)运用因子分析将生产区和垃圾区区分开来。他发现墨西哥图拉(Tula)遗址的石器生产区位于房屋和垃圾坑之间，而不在房屋里^②。

陈淳和沈辰等在对小长梁石工业的分析中应用了沙利文和罗森的模式来分析出土的废片，显示比例非常高的碎屑块和比例非常低的完整石片，进一步验证了劣质石料对打片结果和石工业性质的重大制约^③。

3. 拼合研究

拼合研究主要是一种分析打片程序和人类生产活动方式的方法，现在被用来提炼遗址中各种人类行为和遗址利用的信息。比如，在巴黎南部平斯文遗址的晚更新世营地中，不同家居群体(household group)之间的关系被通过石片拼合有效建立起来。诸如石片、骨骼和粗糙的石头拼合关系不但发现在主要的器物集中地，而且发现在不同的器物集中地之间，构成了不同地点同时性和一种群体生活方式的证据。学者发现，该遗址剥片有两种方式，大的石料用来生产大型和规整的石叶，而质地较差的小石核被用来生产权宜型工具^④。

拼合的另一项研究是针对分辨工具是再生修理还是精致加工。科纳德(N. J. Conard)等对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居住点进行石制品的拼合分析发现，支持工具再生修理和反复利用的事实。表明古人类有预先设想的考虑，由此对肯尼亚库彼福拉遗址早期人科动物地点的考量，也存在事前设想的行

① Amick, D. S. and Mauldin, R. P., Effects of raw material on flake breakage pattern. *Lithic Technology*, 1997, 22: 18-32.

② Healan, D. M., Identifying lithic reduction loci with size-grade macrodebitage: a multivariate approach. *American Antiquity*, 1995, 60: 689-699.

③ 陈淳、沈辰、陈万勇、汤英俊：《小长梁石工业研究》，《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④ Julien, M., Karlin, C. and Valentin, B., Dechets de silex, dechets de pierres chauffees de l'interet des remontages a Pincevent (France). In Hofman, J. and Enloe, J. (eds.), *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 Application of Refitting Studies in Archaeolog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578, Oxford, 1992, 179-209.

为存在^①。

我国拼合研究首先是在泥河湾尝试的。1990年，中美学者对东谷坨石制品进行石料质地和打制技术的观察中，首先进行了拼合研究尝试，有23件标本组成11个拼合组，其中有2件石片可以和一件石核拼合^②。谢飞等对岑家湾1986年出土的897件石制品进行拼合实验，发现其中有131件可以拼接，拼合率达14.6%，表明遗址为原地埋藏^③。1994年，岑家湾1986年和1992年出土的石制品被放在一起拼合，在1383件石制品中有三分之一可以拼合，拼合率为33.4%。1990年飞梁遗址的发掘也采用了拼合研究，共有9个拼合组，拼合率达17.6%，为该遗址的埋藏环境和人类行为方式提供了重要依据^④。

李超荣等对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出土的骨制品进行的拼合研究，他们从上文化层出土的20件和下文化层出土的245件骨骼中发现，有79件骨制品和骨骼可以拼合成33组，45件上有人类砍砸、切割和刻划的痕迹，丰富了我们对于古人类行为的了解^⑤。

4. 打片方法

砸击法在中国猿人遗址中被用来处理脉石英，是用得很多的一种打片方法，由于中国境内好的石料不多，因此在各地都可以发现许多用砸击法打制石片的史前工业。于是，有些学者把砸击法看作是联系我国旧石器文化的纽带。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剥片方法，除非它和原料的可获性一起考虑，否则不值得一提。因为连黑猩猩都会用石头砸击核桃，人类用这种简单方法来处理很小的石核无须专门的经验授受和传统的继承。

① Conard, N. J. and Adler, D. S., Lithic reduction and hominid behavior in the Middle Paleolithic of the Rhineland.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997, 53: 147-173.

② Schick, K. D., Toth, N., Wei, Qi, Clark, J. D. and Etler, 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he Nihewan Basin, Chin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991, (21): 13-26.

③ 谢飞、凯西·石克、屠尼克、柯德曼：《岑家湾1986年出土石制品的拼合研究》，《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

④ 中美泥河湾考古队：《飞梁遗址发掘报告》，见《河北省考古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⑤ 李超荣、冯兴五、郁金城、赵凌霞：《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骨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总的来说，没有人会正规采取这种石片生产方法，除非他想要把石料利用殆尽。当然还有石料质地的因素，这使得利用两极法的石工业表现出一种技术退化的外貌。

丁村遗址自 1954 年发现以来，碰砧法被许多国内学者所热烈讨论并从事了初步的实验。但是进行系统和有控制实验来研究碰砧石片特点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主要有李莉、沈辰、王社江和王益人等。李莉对碰砧法做了实验，认为碰砧和锤击法产生的石片区别不是很大，用同一类石料打片难以区分两种技术的产品^①。沈辰和王社江的实验结果认为，过去所说的碰砧石片破裂特征不能有效将碰砧石片和锤击石片区分开来^②。1991 年经过一个月有设计的打片实验之后，王益人在总结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否定了丁村遗址主要采用碰砧技术的传统看法，认为那些被认为用碰砧法打制的石片完全可能用锤击法生产，丁村石制品中没有发现明确的碰砧石核^③。

5. 操作链分析

在旧石器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考古学界对类型学方法的局限性有了充分的认识，导致了旧石器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重大变革，这就是 *chaine opératoire* 概念的流行。杰利内克 (A. J. Jelinek) 称赞这一概念是“旧石器时代最具开创性和最重要的新研究，它为石工业研究指出了崭新的方向，并应当作为无数探索的起点”。克拉克·豪厄尔也对这一进展做了高度评价：“以 *chaine opératoire* 概念所表述的石制品生产过程，分辨打片的程序和分析器物精致加工、废弃和使用，现已成为研究的重心和关注的焦点。”^④

Chaine opératoire 或“操作链”概念最早于 1968 年被法国考古学家所采用，但是一直到 80 年代才开始流行。该概念表述为：根据预先存在的考虑，

① 李莉：《碰砧法和锤击法的打片实验研究》，《南方民族考古》1992 年第 5 期。

② Shen, C. and Wang, S. J.,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nvil-chipping technique: experiment and evaluation. *Lithic Technology*, 1999, 25(2): 81-100.

③ 王益人：《碰砧石片及其实验研究之评述》，见《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中国考古艺术中心 2004 年版。

④ Clark Howell, F., Forward. In Debenath, A. and Dibble, H. L. (eds.), *Handbook of Paleolithic Ty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4, vii-viii.

通过大脑运作的连续过程和技术的表现来满足某种需求^①。“操作链”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来从石制品技术的动态角度分析每个环节，包括原料的采办、剥片的程序、使用维修和废弃的全过程。与类型学的静态观察不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人类行为的动态视野，通过石制品生产和使用的相互关系来了解一类石工业的生命史^②。

在对小长梁石工业的分析中，陈淳和沈辰等应用了“操作链”概念来对生产流程进行分析，认为小长梁直立人加工技术处于很低的决策层次，行为简单，不存在将各个打片环节严格衔接来达到预定目的的决策过程^③。

四、类型分析

长期以来，类型学在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被用来确定时代和分辨群体关系，建立考古学文化和旧石器工业。但是现在类型学分析已经从静态的分类转向动态的人类行为的重建，比如，美国考古学家迪布尔认为，一个遗址中发现的各种石制品其实是不同生产和使用阶段的废弃物，是器物生命史不同阶段的产物。于是，石器被看作是一个史前文化系统动态的一部分而非静态的一个个不同的类型。我们所发现的器物常常是较大工具种类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态和刃缘在它们使用的寿命中常常被修锐和加工。这样的改造会改变工具的最终形态，并改变了它们的考古学分类标准。目前的热烈讨论是，这一对工具形态变化的认识是否使得我们目前采用的分类体系不再有效，或是这样的形态变化微不足道，我们的类型学仍然还是有用的。

迪布尔认为一些刮削器的类型不是界限明确的不同类型，而是不断修整

① Grimaldis, S.,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aîne opératoire* in Lower-Middle Paleolithic industries. In Milikens, S. and Peresanim, M. (eds.), *Lithic Technology, from Raw Material Procurement to Tool Produ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homonymous workshop held in Forli September 1996, within the VI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 1998, 19—22.

② Sellet, F., *Chaîne opératoire: the concept and its application*. *Lithic Technology*, 1993, 18(1, 2): 106—112.

③ 陈淳、沈辰、陈万勇、汤英俊：《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 1998 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

过程中的连续形变^①。另有人认为，刮削器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荒坯决定的，因此荒坯的形态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式样。另一些研究也支持这一看法，认为是非规范性的因素，诸如使用的程度、不同的工具使用频率、以及经济性的行为是影响旧石器时代中期组合类型变异的主要因素。比如，库恩(S. L. Kuhn)就指出，在意大利的 Grotta di Sant'Agostino 遗址中，没有证据支持直刃尖状器转变成聚刃尖状器的事实。他同意，石器的整体式样取决于荒坯的形状，但是认为荒坯的形状取决于石核剥片的技术，而不是修理的结果^②。

同样，戈登(D. Gordon)观察了从以色列发掘出来的一个组合以检验某些类型，特别是莫斯特尖状器所显示的连续形变。他发现，尽管这些尖状器有可能显示了与刮削器修整后变成聚刃刮削器相似的轨迹，但是这些尖状器的修整强度似乎不够，因此莫斯特尖状器应当是一种独立的类型^③。

在不同工具类型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上，民族考古学的观察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认识。比如，格里弗斯(R. D. Greaves)研究了委内瑞拉西南部 Pume 人的狩猎装备，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在分析了个人 20 次外出狩猎时携带的个人工具套所从事的活动后，他发现上路时所带工具的数量与所要走路程长短没有关系。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不同活动中次数用得最多的工具是弓，它被用来挖掘、捅、戳刺等，其次是箭镞。类似于小刀和大砍刀这些西方工业社会里的人看来是多用途的工具，在 Pume 人中是一种专用工具^④。

埃里斯(C. Ellis)的民族学调查发现没有证据支持不同的石制尖状器被用来狩猎特定的猎物。装上石制的矛头专门是被用来猎取大型动物的。较小的动物一般采用投掷棍棒、投石索、陷阱和圈套等。此外，石箭镞被广泛用来

① Dibble, H. L., The interpretation of Middle Paleolithic scraper morph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1987, 52: 109-117.

② Kuhn, S. L., Blank form and reduction as determinants of Mousterian scraper morph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1992, 57: 115-128.

③ Gordon, D., Mousterian tool selection, reduction, and discard at Ghar, Israel.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993, 20: 205-218.

④ Greave, R. D., Hunting and multifunctional use of bows and arrows: ethnoarchaeology of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 among Pume hunters of Venezuela. In Knecht, H. (ed.), *Projectile Techn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287-320.

打仗，因为石头的脆性，使得在射中目标后会断裂，造成更大的伤害^①。以上这些发现对于解释考古发现中的石器功能有很大的启发性，因为它们显示了文化的种种不同方面，迫使我们不断检视自己的常识性判断和偏见。

长期以来学者们没有注意到史前和现代土著常常利用木头、骨头和鹿角来制作箭簇。现在有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些不同原料制作的箭簇的差异。在比较了石质和鹿角制作的箭簇射入死亡的山羊和奶牛的实验之后，克内克特(H. Knecht)用电脑进行分析，发现鹿角的箭簇要比石质箭簇的柔韧性高30%，因此更为坚韧，射杀时能够深入到长骨之中而不会断裂^②。波金斯(J. T. Pokines)也报道了相同的结果，指出鹿角的箭簇要比石头的箭簇更耐用，寿命更长。另一方面，石头的箭簇要比鹿角的箭簇可以破坏更多的肌肉纤维，因此要比后者更加致命^③。

目前考古学分析已经不大像过去那样单单根据表面的类型学分析来推断一些石器的功能，这一反思导致对一些地区类型做新的检视，并对制造和使用这些工具的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比如，有学者对雕刻器各种技术变量以及显微观察，认为这些雕刻器是多用途的器物，它有时是一种灵活和权宜使用的工具，两侧加工的石叶是为了装柄用做箭头。因此，考古学家不应该将它们看作是一种雕刻工具，而可以将它们看作是根据特定加工方式来定义的一类器物。

同样，刮削器的研究也侧重它们的功能分析。比如，北美历史时期Chickasaw部落使用的圆头刮削器用来加工与英国人进行贸易的野牛皮革；另一类发现在中石器时代的微型刮削器，普遍沾有赤铁矿的痕迹，微痕分析发现这种刮削器用来加工染过色的干皮革。然而对奥地利新石器时代一处聚落中的刮削器的分析表明，这类工具根本不用于加工皮革，而是加工木头。

① Ellis, 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stone projectile tips: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In Knecht, H. (ed.), *Projectile Techn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37—74.

② Knecht, H., Projectile points of bone, antler, and stone: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of manufacture and use. In Knecht, H. (ed.), *Projectile Techn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191—212.

③ Pokines, J. T., Experimental replication and use of Cantabrian Lower Magdalenian antler projectile point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8, 25: 875—886.

在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中，类型学一直被作为衡量文化关系和建立文化传统的尺度。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单维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的缺陷，开始从石料、人类行为、埋藏环境等方面来考虑复杂因素的作用。比如，北京人和丁村遗址的石器一直被认为是两类不同文化传统的代表，这是因为我国学者一度认为，石器的大小和打制方法是人类世代传承的，而没有意识到石器的类型和尺寸可能和多种因素有关。王建等就提出，北京人遗址和桑干河以及丁村遗址群文化遗存之间的可比性很差，这是因为三地原料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决定了石制品的不同^①。对于我国有学者根据主观建立的类型学标准，将丁村 54：100 地点的石制品归入了以周口店第 1 地点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工业”或“小石器”文化传统，王益人认为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他认为，造成丁村不同地点石制品大小有异的原因是河流搬运和分选的结果，并非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在汾河流域生存^②。他进而对贾兰坡著名的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的划分提出了意见，认为石制品大小并不一定为人类刻意造就，而是人类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结果。除了人类文化传统和行为方式之外，我们还应当从遗址形成过程和埋藏学角度来进行多元分析^③。

五、功能分析

1. 微痕分析

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争论，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高倍法和低倍法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

目前的微痕分析中，分辨把握和装柄痕迹进展仍然很慢，在进行装柄刮削器的实验后发现后，无法定义特殊的装柄痕迹，如果工具用树脂和蜡固定的话，几乎就没有痕迹。另外一些研究者报道了装柄磨损可能由不同装柄方式或石料的原因所致。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盲测实验来确定将工作磨损和装柄磨损特征区别开来的能力。他们声称，装柄磨损常常会加工软材料的磨

①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 年第 3 期。

② 王益人：《从河流埋藏环境看丁村遗址群的文化性质》，《人类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③ 王益人：《贾兰坡与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人类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损相混淆，而手握磨损像是屠宰的痕迹。如果这类痕迹能够被区分出来，那将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奥代尔(G. H. Odell)在观察了美国中西部史前期 7 500年中把握痕迹的发展发现，装柄痕迹呈现随时间增加的趋势，而手握的痕迹呈减少趋势。装柄痕迹的增加暗示与人类移动策略的变化和日益定居有关，因为装柄代表了试图制造更为有效的工具并不易断裂^①。

我国一些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介绍了微痕分析方法，并对石制品做显微观察。但是系统进行实验分析要到 90 年代。如侯亚梅对周口店第 1 地点和马鞍山遗址石制品的微痕分析^②；黄蕴平对山东沂源上崖洞石制品的微痕分析^③；夏竞峰对实验刮削器的微痕观察等^④。沈辰和陈淳系统介绍了微痕分析低倍法的方法论，并对小长梁石制品进行了微痕分析，发现这些石制品都为没有二次加工的石片，主要为加工肉类和少量植物的痕迹^⑤。

2. 残渍分析

当石器被用来屠宰动物时，这类工具上就会留下动物的血渍。洛伊(T. Loy)首次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对血渍进行了分析，借助于医学实验室的帮助，他采用不同的技术来分辨这些血渍的物种。最近，洛伊从不列颠哥伦比亚路边冲出来的几件箭镞上发现了野牛的毛发，尽管野牛早就不在这个地区栖息了。而对野牛血渍的 AMS 年代测定，结果为 2180±160B. P. ^⑥。采用同样的方法，洛伊在土耳其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座大型石砌祭坛上发现了人和牛的血渍。他还从阿拉斯加的开槽尖状器上发现了几种哺乳动物包括猛犸的血渍^⑦。洛伊的血渍分析近来也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因为人们发

① Odell, G. H., Prehistoric hafting and mobility in the North American Midcontinent: examples from Illinoi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4, 13: 51—73.

② a, 侯亚梅:《石制品微痕的实验性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 年第 3 期。

b, 侯亚梅:《考古标本微磨痕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③ 黄蕴平:《沂源上崖洞石制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④ 夏竞峰:《燧石刮削器的微痕观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 年第 1 期。

⑤ 沈辰、陈淳:《微痕研究(低倍法)的探索与实践》,《考古》2001 年第 7 期。

⑥ Loy, T. and Dixon, E. J., Blood residues on fluted points from eastern Beringia. *American Antiquity*, 1998, 63: 21—46.

⑦ Loy, T. and Wood, A. R., Blood residue analysis at Çayönü Tepesi, Turkey.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989, 16: 451—460.

现有些分析结果与其他分析不合。比如，在安大略省发现了牛类的血渍，但是在那里没有发现过史前的野牛骨骸。在俄勒冈也发现有血渍分析与考古记录不合的地方。

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同的测试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一些学者用现代动物做盲测来检验不同的测试方法，发现对一些考古标本鉴定的三种特定技术存在明显不同结果和缺乏可比性。另外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血渍分析与微痕分析结果的不合。一个案例是对弗吉尼亚北部四处遗址出土的 100 件工具的分析。有 20 件检测出有肯定的血渍，而 16 件有微痕，但是研究人员无法将两者的结果加以对比，只有 4 件工具显示两种测试技术结果的吻合，这个比例过低。这些工具上保留了很少的使用痕迹，可能由于它们是权宜型工具或者埋藏后的化学变化^①。

英国的卡塔尼奥(C. Cattaneo)等将沾有血渍以及没有血渍的工具与人骨和动物骨骼一起埋入窖穴。一些石器被用来加工肉类和骨骼，但是每件仅使用 2 分钟。还有一些工具被沾上血渍保留在实验室里。之后，他们用一种比较敏感的测试方法来对两种保存状态的标本进行分析，发现对实验室里保存的标本测试获得了很好的结果，但是对埋藏在窖穴里的标本测试的结果很不理想。在一件埋藏了一年的刮削器上无误地分辨出白蛋白，但是其他同时埋入的工具上的检测结果却呈否定结果，表明在这种条件下血渍的残存很不稳定^②。

为此，有学者认为石器残渍分析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它类似于微痕分析 10 年前的状态，呼吁在这一领域采取更多的盲测实验。

3. 植物

石器上的残留物还有各种植物的残渍，如淀粉颗粒、树脂和硅酸体。石器上的淀粉颗粒的分辨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确定它是工具使用的残留物还是沉积过程中黏附上去的。富拉格(R. Fullagar)等观察了三件粘有淀粉的石

① Petraglia, M. (ed.), Immunological and microwear analysis of chipped-stone artifacts from piedmont contexts, *American Antiquity*, 1996, 61: 127-135.

② Cattaneo, C. (ed.), Blood residues on stone tools: indoor and outdoor experiment. *World Archaeology*, 1993, 25: 29-43.

杵,发现工具上黏附的淀粉在密度和颗粒上都大于周围沉积物中的淀粉,因此,工具上的淀粉不大可能是在沉积过程中的污染^①。

索博利克(K. D. Sobolik)观察了从德克萨斯 Hinds Cave 中古代期中晚段层位中发现的 55 件燧石片、刮削器和其他工具,发现这些工具上除了植物纤维和动物毛发之外,最多的是植物硅酸体,分辨出来的植物有龙舌兰、丝兰属植物和草类。在植物残渍和微痕之间没有发现相应的关系,工具没有特殊使用的证据,显然被用作多种用途^②。但是在澳洲,基尔霍弗(L. Kealhofer)等对一些工具进行了试验性的分析来比较微痕和硅酸体。两项技术结果的吻合程度非常高,被认为能够互相补充来解决相同的问题^③。

与血渍相比,植物残渍如硅酸体、淀粉颗粒和纤维可以直接观察分析,而血渍需要依靠医学的生化分析来进行分辨。如果植物的痕迹可以分辨,一般可以做到分辨到种和属的层次。目前,植物残渍不同保存机制的研究仍然不够。

4. 古 DNA

石器上的古 DNA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虽然哈迪(B. L. Hardy)等从法国莫斯特文化中的基纳型刮削器上发现并提炼出了 DNA,但是它只是非常小的片段。从现代实验的结果所知, DNA 在动物死亡后降解很快,因此虽然从石器上和沉积物里发现古 DNA 十分令人鼓舞,但是目前研究刚刚开始发现问题的复杂性^④。

六、人类行为

1. 移动策略

20 世纪 70 年代,宾福德提出了著名的狩猎采集者两种觅食移动模式,即

① Fullagar, R. (ed.), Starch grains, sediments and stone tool function: evidence from Bitokara, Papua New Guinea. In Fullagar, R. (ed.), *A Close Look: Archaeological Methods Series 6*,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1998, 49—60.

② Sobolik, K. D., Lithic organic residue analysis: an example from the Southwestern Archaic.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996, 23: 461—469.

③ Kealhofer, L. (ed.), Integrating phytoliths within use-wear/residue studies of stone tool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9, 26: 527—546.

④ Hardy, B. L. (ed.), Recovery of mammalian DNA from Middle Paleolithic stone tool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7, 24: 601—611.

“栖居移动”(residential mobility)和“后勤移动”(logistic mobility)。前者是将人口移向资源,后者是指将资源移向人口^①。这一模式对于考古学家如何看待史前群体的季节性移动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一模式也受到了批评,认为将狩猎采集者的移动策略分为两种形态过于简单,其实大部分的群体是一种两种方式的混合。有人指出,一个群体某一年的移动策略和次年都会不同。

尽管存在缺点,但是这一模式仍然是构建考古学材料的有效框架。肖特(M. J. Shott)改善了这一模式,将栖居移动进一步分为频繁和大规模移动,并认为石器技术的多样性和频繁移动更加密切^②。库恩(S. L. Kuhn)描述了一种“移动工具套”,这类工具套相对于携带重量来说是最有效的装备,根据这一设想,高度流动的群体倾向于携带几种小型的工具,而不是相等重量的大型工具^③。但是,莫洛(T. A. Morrow)批评了这一模式,认为这一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后勤移动来说并不有效。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与不同技术策略相关的移动很可能有不止一种的解决方案,最终的选择取决于最终功效的历史轨迹^④。

陈淳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了东亚和北美细石叶的分布机制,由于这种技术分布在环境差异很大的环境里,加上细石叶技术的复杂性和生产难度,它们体现了一种流动性很大的生存方式。生活在可食植物资源稀少的环境里,使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史前狩猎群在严酷的环境里频繁转移狩猎区来获得足够的食物,导致这类遗存从东亚到北美的广泛分布^⑤。

2. 生存策略

我们对于远古人类的生存策略知之甚少。对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

① Binford, L. R., Willow smoke and dog's tails: 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 *American Antiquity*, 1980, 45: 4-20.

② Shott, M. J.,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 and settlement mobility: ethnographic examina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6, 42: 15-51.

③ Kuhn, S. L., A formal approach to the design and assembly of mobile toolkits. *American Antiquity*, 1994, 59: 426-442.

④ Morrow, T. A., Bigger is better: comments on Kuhn's formal approach to mobile tool kits. *American Antiquity*, 1996, 61: 581-590.

⑤ 陈淳:《东亚与北美细石叶遗存的古环境》,《第四纪地质》1994年第4期。

来说,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靠狩猎还是靠从肉食动物口中夺取肉食的尸食策略。大部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遗址中动物残骸的分析,如尸食一般存在大量的头骨部分、较少的肢骨和相对来说残缺的动物组合。

对莫斯特遗址中的石器分析与动物群的指示十分吻合。尸食的石器组合显示为勒瓦娄哇盘状石核技术,强化的工具修理,很少的大型石片,强化的石核利用率,高比率的非本地原料。狩猎的石器组合表现为更为有效的平行剥片石核、较小较窄的石片,每件石核上生产的石片相对较多,工具修理较少,以当地石料为主。这说明,尸食的生存策略移动更为频繁,领地范围大,拥有携带移动的工具套。狩猎群在大本营分配食物,将动物带回营地,移动较少,工具加工更为有效^①。

刘德银和王幼平对湖北荆州鸡公山遗址的发掘,于下文化层揭露出近500平方米的生活面,布满砾石、石核、石片和各类石器,并发现了密集砾石组成的石圈,中间是空白区,这些石圈和空白区可能与人类的栖居活动有关^②。房迎山等报道了安徽省毛竹山一处中更新世遗址里由砾石垒砌的半圆形遗迹。1997年对这一半圆遗迹所做的发掘,发现该遗迹由近1100块砾石构成,被认为是刻意建造的掩体或一处活动区,该地点还发现了154件石制品。这些对原生居住面完整揭露和研究,为中国古人类行为研究开辟了令人鼓舞的前景^③。

中美联合调查的贵州高原盘县大洞遗址,是我国南方地区旧石器考古埋藏学和多学科研究的一个成功案例^④。谢泼兹(L. A. Schepartz)等(2003)的研究文章指出,从这一巨大中更新世洞穴中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曾被古人类、食肉类和啮齿类的活动所改造。由于大部分的物种不是穴居动物。作者认为,考虑到洞穴里发现的石料质地很差,洞中大量存在的牙齿很可能是被古人类

① Kuhn, S. L., Mousterian technology as adaptive response: a case study. In Peterkin, G., et al. (eds.), *Hunting and Animal Exploitation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and Mesolithic of Eurasia*,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No. 4, Washington D. C., 1993, 25-31.

② 刘德银、王幼平:《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③ 房迎山、黄蕴平、梁任又、陈勇、彭道起:《安徽宁国毛竹山发现的旧石器早期遗存》,《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④ 黄慰文、侯亚梅、斯信强:《盘县大洞的石器工业》,《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3期。

作为工具原料而携入洞中的^①。

3. 精致加工

在许多遗址里，有些石制品被做了修理，而另一些则没有，这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推测我们远古祖先可能仅保留经过修理的工具，而未加修理的就是废弃物。现在，对石制品的观察改变了这种看法，修理的原因是根据不同情况和策略而定，而许多不加修理的石片经常被用来作为工具使用。所以，目前的精致加工更多的是关注修理的程度，如修锐、成型加工或把握舒适修正等。

宾福德创造了 curation 这个术语，由于如此流行，因此许多反思也随之而来。肖特认为该术语应该是表述工具的使用程度。换言之，应该是工具开始使用后的潜在利用率和废弃数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该术语应用范围只对个别的工具，而不应是整个石工业^②。

克洛斯(A. E. Close)应用精致加工的概念来研究工具从一个地点运到另一个地点的机制。在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史前居民明显携带石片和石核从一个地点绕行到另一个地点，他们反复利用并储存这些工具为了未来之用。在德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个遗址也有这种现象，石器并不在遗址里加工，而是加工好了从别处拿来的，在遗址里进行的是再生加工和维修，因此这个遗址是一处工具再加工的地点^③。

4. 文化复杂化

长期以来打制石器的研究总是和文化发展的原始阶段相连。但是，最近我们发现石器研究开始转向文化复杂化的方向，以及它们如何会被金属工具所取代。社会复杂化的一个标志是手工业的专门化。

打制石器生产的专门化出现在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的西班牙 El Malagon

① Schepartz, L. A., *et al.*, Faunal approaches to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at Panxian Dadong. In Shen, C. and Keates, S. G.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179, Oxford, 2003, 99—110.

② Shott, M. J., An exegesis of the curation concept.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996, 42: 15—51.

③ Close, A. E., Carry that weight: the use and transportation of stone tools.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6, 37: 545—553.

的一处聚落中。聚落中的先民专门生产小石叶，并显然用它们来交换其他所需的日用品。对较晚阶段的 8 处窝棚的调查，发现石器生产之间存在差异，表明基本的生产小组是家庭单位。拉莫斯-米兰(A. Ramos-Millan)认为，专业化和政治控制随着时间而加强，反映在大量的本地和外来的开采石料上。专业的石器生产看来也出现在奥地利新石器时代末，一些高规格的墓葬里用非常长的石叶作为陪葬品^①。

在加州沿海的查尼尔(Channel)岛上，Chumashi 人和他们的祖先用贝珠生产来交换他们的日用品，虽然贸易的性质仍不清楚，但是看来这种贸易由内陆很高级别的人士所控制，并由周边一些专门人士参与货物分配^②。

史前社会晚期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加速，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贸易和交换关系的出现。然而，长途贸易很难从直线的交换，或从获取一种资源、贸易品或一般狩猎采集者季节性巡回来分辨。就石器原料而言，阐释需要对一个地区原料产地详细的了解。

史前石制品贸易中一种重要的对象是黑曜石，它在美洲和欧洲都非常流行。在美国西南部、高原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黑曜石构成了贸易系统最常见的物品。一些制成品的贸易也非常广泛。在美国东北部，尾部凹缺的箭簇的贸易网形成于伍德兰中期。在大洋洲的几个岛屿上没有燧石和黑曜石，它们是在陶器阶段早期从几百公里远的地方运来的。

火成岩和变质岩是西欧新石器时代贸易的重要原料，因为它们制作的斧子、凿子等是重要的生产工具。考古学家发现，这些原料和工具由东向西跨越阿尔卑斯山进行长途贸易。在上埃及的前王朝时期，一些火山岩生产的磨光石器在石料产地生产，然后运输到 150 千米以外的地方，表明该时期存在长途的贸易和交流。

和手工业专门化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手工业的结构，工具的生产 and 传播是否是受一个中央政体或社会阶级控制的，还是处于家庭或血缘村落层次上的

① Ramos-Millan, A., Flint political economy in a tribal society, a material-culture study in the El Malagon settlement. In Ramos-Millan, A. (ed.), *Siliceous Rocks and Culture*,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Granada, Spain, 1997, 671-711.

② Arnold, J. E., Complex hunter-gatherer-fishers of prehistoric California: chiefs, specialists, and maritime adaptations of the Channel Island. *American Antiquity*, 1992, 57: 60-84.

小型作坊生产。

波普(M. Pope)等比较了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土墩和两个前王朝初期阶段两处土墩出土的石器，发现所有的遗址出土的都是预制成型的石核，当地的工匠将这些石核制成石叶和其他工具。因此，他们认为，石器并非家庭而是聚落层次上的生产和消费^①。

最近，考古学家对北美史前群体的石器研究也发现了可能的社会政治控制。比如，贝曼(J. M. Bayman)注意到在美国西南部的 Marana Hohokam 社群里，黑曜石的生产和消费集中在一处大型的平顶土墩上，而遗址附近其他的土墩上几乎没有黑曜石，这个证据表明黑曜石的集中生产和分配，暗示存在集中的再分配机制，和形成中的贵族阶层。同样，加州沿海岛屿上的贝珠生产，生产地点分布在周围的一些小岛上，而一处主要的大岛没有加工生产的地点，说明这很可能是一处首领聚居的中心控制着周边岛屿的生产和贸易^②。

然而，总的来说新大陆考古中没有很明显的证据表明石制品的生产存在社会政治的控制，即使是在玛雅帝国的一些中心，如蒂卡尔和亚希哈(Yaxha)，那里没有大型的燧石加工场，说明石器生产并没有集中的控制。

5. 工具的取代

石器工具被金属工具的取代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罗森(S. A. Rosen)对近东铜石并用时代经历了 3 000 年的工具取代的轨迹的研究，开始消失的是箭簇，然后依次是雕刻器、石斧、石钻，最后是镰刀上的石叶。在这一过程中贸易通道的建立对于铜器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代价相对低廉和原来比较完善的专门化生产，使得镰刀的石叶生产坚持到最后才被价格更为低廉的铁镰刀所取代^③。在北美的大盆地，金属刀很快取代了石刀，但是石制的刮削器和碾磨工具仍然被使用了很长的时间，因为金属工

① Pope, M. and Pollock, S., Trade, tools and tasks; a study of Uruk chipped stone industries.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1995, 16: 227—265.

② Bayman, J. M., Rethinking “redistribution”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obsidian exchange at the Marana platform mound.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995, 51: 37—63.

③ Rosen, S. A.,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flint. In Odell, G. (ed.), *Stone Tools: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Human Prehistory*, New York: Plenum, 1996, 129—158.

具的功能并不比这些石器来得优越^①。同样，在澳洲的西北部，日常用具如凿、刀和矛头迅速被金属所取代，但是一些标志地位的石器如用做礼品的大型尖状器仍被生产用于交换^②。

6. 象征与祭祀

近年来有关非实用性目的的石器使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后过程考古学思潮探究技术背后的社会思考。澳洲土著的实践就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因为许多部落是从一种神话的方式来看待石头的。与石头和石矿相关的神话，使得石器也具有某种社会和宗教的价值。这个问题由佩顿(R. Paton)的研究很好的提了出来，他对澳洲北部一种石英岩石叶的研究中发现，这类石叶是生产出来用于贸易的，而它的使用也和严格规范的行为相伴。在调查了离原料产地不同距离内的遗址之后，他没有发现一件石叶，尽管存在用这种原料生产石制品的废料。如果不是从其他方面了解到澳洲土著的这种行为，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些遗址中生产了什么样的东西^③。

追溯到北美的史前阶段，有证据表明有些被广泛贸易的器物具有象征意义。其中之一是火鸡尾形尖状器，在大湖区一个围绕它的贸易网在古代晚期和伍德兰期早期被建立起来。这些尖状器一般用 Dongola 燧石制成，并与铜饰珠共出。这种器物很可能像是有些地方的贝壳项链和臂章是那样用做一种贸易的标准器物(trade regulator)^④。西弗特(A. K. Sievert)研究了中美洲尤加坦半岛祭祀遗址出土的石器的破碎方式、使用痕迹和工具上的残渍，发现这些石器的使用与祭祀活动有关，如放血、牺牲等^⑤。

① Hudson, L., Protohistoric Pawnee lithic economy. *Plains Anthropologist*, 1993, 38: 365-277.

② Head, L. and Fullagar, R., Hunter-gatherer archaeology and pastoral contact: perspectives from the northwest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World Archaeology*, 1997, 28: 418-428.

③ Paton, R., Speaking through stone: a study from northern Australia. *World Archaeology*, 1994, 26: 172-184.

④ Krakker, J. J., Biface caches, exchange, and regulatory system in the prehistoric Great Lakes region. *Midcontinent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97, 22: 1-41.

⑤ Sievert, A. K., The detection of ritual tool use through func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examples from the Spino and Angel sites. *Lithic Technology*, 1994, 62: 146-156.

7. 语言和认知

人类语言和认知是在旧石器时代完善的，因此石器研究的一个领域就是试图从石器技术的特点来推断人类语言和认知能力的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温(T. Wynn)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石器技术的学习行为很难告诉我们有关语言和语法的发展，但是，他认为人类在阿休利阶段已经有了某种学习行为。而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是语言起源的重要阶段，如像勒瓦娄哇技术的复杂性和分布的范围，显然是通过语言进行传授和学习的一种迹象^①。

陈淳和沈辰等根据皮亚杰理论和温的分析模式，从石制品分析了直立人的认知水平，认为小长梁直立人仅表现为前运算智力和低层次的具体运算智力，可能低于今天 12 岁儿童的智力^②。

七、小 结

从上述介绍的旧石器研究的现状的介绍可见，国际上这一领域的范围已经从类型学和年代学扩展到了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所采用的技术也借鉴了化学、物理、生物、遗传等自然科学的各种手段，研究的视野也从实证的器物分析扩展到了人类的意识形态层面，包括祭祀和认知等宗教和思维等活动。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现代化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步，在老一辈学者先驱性工作的基础上，年轻一代学者思想活跃，在许多发掘和研究中引入国际先进的理论方法，努力采用更为细致的采样技术和多种技术手段来提炼生态环境和人类行为的信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这些进展也受到国际考古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2000 年 4 月在费城召开的美国考古学会第 65 届年会以“中国更新世考古的理论和实践”为主题分会上，分会主持人之一的加拿大资深考古学家舒特勒(B. Shutler Jr.)教授在评述中指出，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已经进入了利用现代技术和理论解释文化遗存的新阶段，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已成功走上了运用现代考古技术和实验方法的研究道路。我感到中国

^① Wynn, T., Tools, grammar and the archaeology of cognition.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991, 1: 191-206.

^② 陈淳、沈辰、陈万勇、汤英俊：《小长梁石工业研究》，《人类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趋成熟，其前进的步伐是迅速的^①。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奥法·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教授也指出，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层位学、年代学、石器工业技术等，长期以来难以摆脱早年发现的周口店研究的窠臼，而最新的研究试图纠正这种状况，打破前人的桎梏，为我们提供由国外和国内学者联手奉献的最新成果^②。

然而，面对国际考古学迅速发展的趋势，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存在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我们热切希望国内同行能够加快步伐，吸收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原刊《自然科学与博物馆研究》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① Shutler, R. Jr., Remarks o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In Shen, C. and Keates, S. G.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179, Oxford, 2003, 137—142.

② Bar-Yosef, O., Preface. In Shen, C. and Keates, S. G.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179, Oxford, 2003, ix.

小南海石制品再研究

一、前言

河南安阳小南海是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一处重要地点，安志敏先生于1960和1978年主持了两次发掘^①。第二次发掘于1978年10月11日~11月1日进行，参加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还有郑乃武、任万明和王吉怀等先生，动物化石由周本雄先生整理。但是，这批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后来因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和发表。安家瑗曾征求安志敏先生的意见，承蒙他的同意，由我们继续这项工作，并予以公布。我们在此谨对先期主持和参加发掘工作的前辈和学长们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2006年，为了撰写纪念吕遵谔先生八十华诞的论文，我们考虑对这批材料进行研究，于是安家瑗对安先生封存在办公室里的小南海石制品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整理中一共发现石制品1204件，其中属1978年发掘编号的有944件，本文的研究主要以这批标本为基础，在分析和描述中也选用了1960年发掘的个别典型标本。

安先生1978年的发掘笔记主要描述了地层情况，并对石制品进行了统计，并记录了几点分析思路，但极其约略。据他的发掘笔记，描述的一些主要情况简介如下：

1960年首次发掘靠近洞口，洞口朝东，面积约10平方米，被定为A方。

^① 安志敏：《中国晚期旧石器的碳-14断代问题》，《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4期。

1963年，当地政府在A方的东壁建立了门楣状水泥柱以支撑洞顶兼为保护标志。在发掘后的岁月里，洞穴又因自然风化而发生很大变化，洞顶和发掘探方的四壁剖面坍塌。安阳地区政府部门为了加强保护，向安先生建议继续发掘整顿以便建立永久性建筑，第二次发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同时进一步弄清洞穴的轮廓、地层堆积及文化遗存埋藏情况。

1978年发掘在水泥柱内侧开方5平方米，被定为B方，同时在A方与北壁之间开方4平方米，被定为C方。通过清理发掘，弄清了原来洞穴最深可达10米左右，洞口宽5米以上。从洞顶到地表岩盘最高有4米，因此洞穴呈穹庐形。洞底岩盘向洞口倾斜，因此堆积也呈斜坡状向外延伸。A方与C方均靠近洞口，而B方位于洞内，出土遗存以A方最多，C方次之，B方最少，说明当时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洞口部分。

各探方的地层序列大致相同，只是堆积厚度和成分略有差异。1960年发掘的A方被分为5层，并将第1层又分出三小层。1978年发掘采取层位统一编号，分为7层。由于B方地层保存比较完整，所以地层描述以其为代表。

1. 灰褐土，厚0.06~0.2米，质地松散。仅见于本方的南半部，大部分遭到流水或人为破坏，层内分布较多的碎石块和少量碎片。在本层的中部有一条宽1.6米，深0.4米的扰沟，沟内填满了角砾状的石灰岩碎块，可能是由于流水作用，从洞后的裂隙中冲来角砾，并扰乱了1~3层。

2. 黄褐土，厚0.2~0.6米，质地较第1层稍坚硬，夹杂有较多的石灰岩碎块，出土燧石、石片、石料，零星木炭，以及鸵鸟蛋壳等。

3. 深黄土，厚0.2~0.5米，出土燧石，偶有木炭碎屑，动物化石等。

4. 略带白斑黄褐土，厚0.3~0.9米，内夹有少量石块，出土有燧石、动物化石等。

5. 灰白色黄土，含砂量较多，厚0.15~0.5米，南半部有较大的石灰岩碎块，含较多的石器与化石。本层底部有薄层灰烬，取做¹⁴C测定样本。

6. 黄褐土，厚0.17~1.0米，夹杂较多的红烧土块和炭屑，质地较以上各层为坚硬，此层的下部基本上为石灰岩的岩盘，当是洞底的所在。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也是最多的一层。还发现一件骨锥和加工痕迹的鹿角，还有几近完整的牛腿骨化石。

7. 灰白色的砂质黄土，厚0.25~0.7米，仅见于南部的小沟中，出土几

件石片，无其他遗物发现。

C方堆积的1~3层已遭破坏，发掘始于4层。层次和土色与A、B方一致，堆积走向是西高东低，出土的文化遗物较B方丰富，其中以第6层为最多。两个探方出土动物化石不多，多数为碎片，个别为大型肢骨，种属未经鉴定，安先生认为不会超出第一次发现种属的范围^①。B方与C方出土石制品的比较请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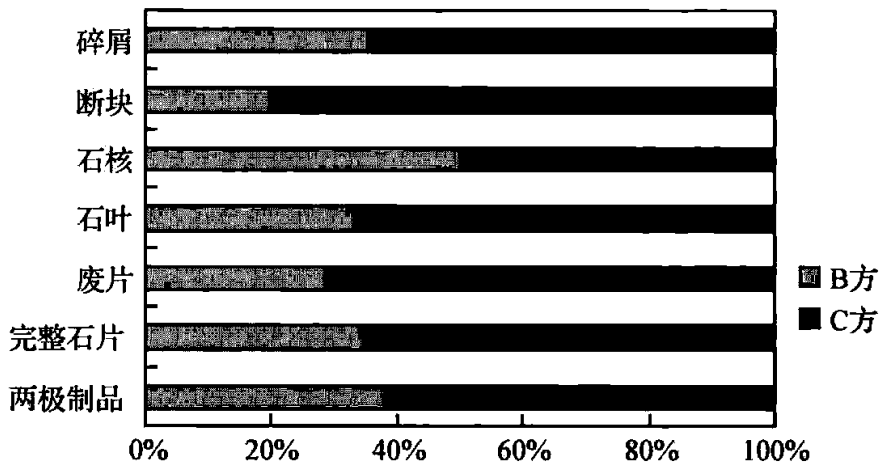


图1 B方与C方石制品数量比较

长期以来小南海遗址被认为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中占有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安先生在1965年发掘报告中指出，小南海文化与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以及水洞沟、萨拉乌苏的遗存有許多相似之处，并认为小南海文化遥承了北京人文化^②。在1978年的发掘笔记中，安先生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小南海可能承袭周口店文化，开辟了细石器文化的先声，在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和传统研究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安先生的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被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认可。1972年，贾兰坡、盖培和尤玉柱在山西峙峪遗址的发掘报告中提出了华北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的小石器传统序列，将小南海置于峙峪与华北细石器文化遗址之间的中间环节，视作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的直接源头^③。1976年，在与卫奇合著的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发掘

① 安志敏：《安阳小南海洞穴堆积的再发掘》（未刊稿）。

② 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③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报告中，贾兰坡在将许家窑纳入华北小石器传统后，进一步完善了华北旧石器序列，正式提出了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即“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或称“匱河-丁村系”以及“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或称“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的阐释理论，其中小南海仍显要地处于小石器传统中的重要一环^①。对于小石器传统，贾兰坡在谈中国细石器起源问题时是这样论述的：“属于这一传统的文化有周口店北京人文化、山西阳高许家窑文化、山西朔县峙峪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文化，最后发展成为‘中石器时代’以及再晚的细石器文化^②。”1978年，在一篇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进行回顾的综述中，邱中郎和李炎贤指出：“小南海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重要的洞穴遗址。小南海文化是遥承北京人文化而继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③。”相同的观点也为其他学者所表述^④。

进入21世纪，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也要继承和创新，对一些观点和材料的重新审视也许不无裨益。比如，王益人于2002年撰文，对贾兰坡的两大传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充分肯定该理论标志着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从描述走向阐释的开端、并对提高研究层次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基础上，认为石器的大小和技术不一定是文化传统的表现或文化传承的结果，而更多反映了人类生存受制于自然环境的表现，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需要进行多角度分析^⑤。

在旧石器考古学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觉得有必要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对前人的材料和工作做再次的观察和分析，以求获得一些新的体会和结果。安先生在史前考古学上造诣很深，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作为后辈与后学，我们觉得对前辈最好的纪念就是对他们工作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希望今天这项研究，能够在前辈学者于20世纪研究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检验、提高和完善，并揭示表象背后的规律。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尝

①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②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

③ 邱中郎、李炎贤：《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④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

⑤ 王益人：《贾兰坡与华北两大传统》，《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3期。

试采取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视角对 1978 年发掘的小南海石制品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求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并作为呈献给吕遵谔先生八十华诞的特殊寿礼。

二、目标与方法

我们对小南海石制品的再研究，目标和方法与 47 年前会有所不同。而这批标本又是近 30 年前发掘采集的，因此我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可能与发掘一个新遗址时所期望解决的问题相同。我们曾试图对小南海动物化石做一番埋藏学再观察，以期发现一些与石制品使用有关的间接证据，了解小南海古人类利用动物资源的信息。但是，由于小南海动物群研究者周本雄先生已经退休，标本也不知所终，所以只好放弃。我们也曾考虑根据石制品标本上的层位编号来探究石工业从早到晚在技术、类型和组合上的差异及历时变化，以发现一些古人类在技术和适应变化上的证据。但是，由于上部层位出土标本太少，经初步观察，发现不足以提供有意义的行为信息。于是，我们只能将所有标本作为一个单元进行分析。

在安先生分析小南海石工业时，当时学界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年代学和文化关系，这是 20 世纪初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主要特点。因此，石制品和动物群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对于今天已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石料性质、生态环境、人类行为与生存适应等问题都不可能涉及。虽然我们今天的再研究试图超越年代学和文化关系来探究深层次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却有赖于从发掘开始就有目的地收集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多学科的分析研究。因此，即使我们今天想做一些新的尝试，但由于受到原始材料脱离相关背景(context)和不完整性的严重制约，许多关键信息已经永远消失。

为此，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对目前这批材料所能提供的信息方面做一番考察后，才能提出可以解决的问题。本文目的是希望小南海石工业再研究能够在过去的认识上提高一步，并为今后其他石工业分析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借鉴。

我们对小南海石工业再观察试图探讨的问题主要有：

1. 小南海石制品比较小，许多学者认为它是北京人文化向细石器文化发展漫长序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小南海石工业的再研究有必要对其技术和石工业特点做一番考察，以了解其内在的文化性质。

2. 1965 年发掘简报(以下简称原报告)提到，小南海石工业中的燧石主要

采用了直接锤击法，石英等原料则用砸击法打片。张森水的观察有所不同，认为小南海的打片技术以砸击为主。并认为，砸击法为主的石工业在中国除了北京人遗址外，小南海可算首屈一指。

3. 原报告指出，比较完整的石片多半有使用痕迹。根据目前学界的共识，用肉眼观察来判断石制品的使用痕迹已被认为不太可靠，我们希望用微痕观察来验证这一看法。

4. 原报告还指出，小南海石核种类复杂，其中柱状石核有两端器的特点，制作尤为精致，是小南海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但是从张森水的评述来看，我们怀疑这类石核其实是两级石核，对其精致的印象可能受了上面常有砸击产生的长条形片疤的迷惑。而且柱状石核和两端器作为旧石器的命名较为含糊，因此，有必要对这类石制品做进一步的观察。

5. 原报告认为，除了使用石片外，最具特色的为尖状器和刮削器两大类。尖状器较常见，器型富于变化。刮削器数量多，形状较为复杂。但是，从图版上的器物来看似乎还是比较简单，因此值得对这些类型的加工技术进行细致的观察。

6. 此外，我们想对小南海的石料进行观察和打片实验分析，以了解石料质地对石制品大小、加工技术及器物形态的制约。

7. 最后，我们想从细石叶技术及其类型特点对小南海石制品进行一番比较和探讨，以求了解它是否具有类似细石器特点，能否被看作是细石叶技术的源头。小南海共有三个¹⁴C年代测定数据，1960年用各层混合化石测定的一个数据为 $11\ 125 \pm 220$ B. C. 或 $13\ 075 \pm 220$ B. P. (ZK170-0)^①，被安先生认为不太可靠。用第6层木炭测得的一个数据为 $22\ 150 \pm 500$ B. C. (ZK654)，而用第2、3层骨炭混合样品测出的一个数据为 $9\ 050 \pm 500$ B. C. (ZK665-0)。所以，其年代范围与细石叶技术已十分发达和成熟的早期细石叶工业，如柴寺、下川、薛关等遗址相当或较晚。对这一现象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摆脱过去那种文化直线发展观的刻板思路，转向环境制约和人类适应的多样性以拓

^① Jia, Lanpo and Huang, Weiwen, The late Paleolithic of China. In Wu, Rukang and Olsen, J. W. (eds.), *Palaeoanthropology and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5, 211-223.

宽我们的视野。

基于材料的限制和至关重要的出土背景信息的缺乏，我们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石制品本身。此外，辅以石料打片实验和微痕观察来了解岩性对打片技术发挥和剥片质量的影响以及石器可能的用途。然后，根据观察的结果对小南海石工业的性质进行新的探讨，以求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三、观察与分析

根据标本编号统计确认，1978年小南海发掘的石制品共944件。虽然2、3层的年代较晚，但是C方上三层缺失，而B方的材料主要出自6层。因此，我们还是将这批材料作为一个单元分析。下面从石料、打片技术、器物分类、废片分析、微痕观察等几个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然后在整合分析的基础上讨论石工业的性质。详细观察统计数据请参见表1。

1. 石料

原报告介绍的石料以燧石(90.0%)和石英(9.6%)为大宗，其他石料如火石、石髓和石灰岩只占0.39%。安先生1978年发掘笔记中的描述与之前基本相同，并指出遗址附近有燧石矿，石料为就地取材，主要为河床上的砾石。我们对原料的观察基本与此吻合。但是我们观察的石制品中未见石髓和石灰岩。除了对石料进行观察外，我们还对一块燧石块料进行了打片实验，了解石料的破碎特点。

表1 小南海石制品统计分类表

名称			数量			百分比(%)			备注
类型	亚类	子类	类型	亚类	子类	类型	/石制品总数	/各自类型	
锤击	多台面		6	—		0.7			脉石英6件
两极	石核		80	—	41	8.5	4.4	51.2	脉石英8件
	石片			—	38		4.0	47.5	脉石英19件
	两极裂片			—	1		0.1	1.3	特殊

续表

名称		数量			百分比(%)		备注			
完整石片	有自然面	自然台面	168	98	67	17.8	7.1	39.9		
		片疤台面			18		1.9	10.7		
		点状台面			3		0.3	1.8		
		线状台面			8		0.9	4.8		
		脊状台面			2		0.2	1.2		
	无自然面	片疤台面	70	54	5.7	32.1				
		点状台面		4	0.4	2.4				
		线状台面		7	0.8	4.2				
脊状台面		5		0.5	2.9					
废片	近端		130	—	28	13.8	3.0	21.5		
	远端			—	42		4.4	32.3		
	中段			—	10		1.1	7.7		
	左/右端			—	6		0.6	4.6		
	脉石英			—	44		4.7	33.9		
石器	刮削器	单直刃	79	49	11	8.4	1.2	13.9		
		凸刃			5		0.5	6.3	锤击 2	两极 3
		双刃			11		1.2	13.9		
		凹缺			19		2.0	24.1		
		多边			2		0.2	2.5		
		凹缺凸刃			1		0.1	1.6		
	尖状器		8	—	0.9	—				
	鼻形尖状器		1	—	0.1	—				
	锯齿状器		20	—	2.1	—				
	雕刻器		1	—	0.1	—				
石锤		3	—	—	0.3	—	1 碎, 2 完整			
石叶		3	—	—	0.3	—	1 残			
断块		200	—	—	21.1	—	脉石英 47			
碎屑块		275	—	—	29.1	—				
总计		944			100					

这类燧石的细节理和微晶结构发育，节理走向纵横交错，其中还夹杂着片状或条纹分布的白色微晶体杂质，所以严重影响剥片效果，因为打击力无法正常和均匀地在石核体内延伸，随时会被节理或杂质所阻断而导致石核不规则破裂。打片中无法控制石片的破裂走向，打下的石片很不规则，破裂面粗糙不平，半锥体、波纹与放射线等一般在燧石上很容易出现的锤击石片特征几乎很难看到。石片的形状和终止特征完全受制于石料内在的节理。对这类石料的实验分析很像在小长梁遗址石料实验打片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即“大部分石片和碎屑块不是沿打片方向剥离，而是沿其内在的节理崩裂，呈现一种粉碎性破碎的特点”^①。但是，根据两项实验打片的感觉和结果比较，小长梁燧石在细部质地上比小南海燧石细腻坚韧，但是节理的发育对剥片的影响却更为显著。这种石料质地差异的结果是，小南海燧石打片会产生比小长梁更多较为完整和个体较大的石片，但是在石片的二次加工和使用上较为松脆，韧性和强度都不如小长梁燧石。

实验剥片的结果显示，打片中产生大量粉碎性破碎的碎屑块，石片和断块的形状和大小与观察的标本十分一致，其中最大的石片为 40.1mm×35.4mm×8.2mm。较大的石核可以用锤击剥片，但是当石核直径减缩到 50mm~40mm，就很难用锤击法剥片了，但是用砸击法仍可以继续剥片。实验打片在石核最后断裂成两块直径 47mm 的碎块后终止，上面没有明显留下石核剥片通常形成的片疤阴面、波纹和放射线。

2. 打片方法

小南海石工业主要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剥片及修理石器，从观察的几件石叶上保留的台面特点看，可能存在压制法的迹象，但是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原报告中对打片方法的介绍比较含糊，如在介绍石片的部分，报告说不规则石片都采用直接打法剥片，不同形状的石片是因处理打击面方式不同造成的，而条形石片都是从修好的打击面上直接剥片。其实，不同形状的石片更多受制于石料的质地、棱脊和用力方向，而不是台面。而且“处理打击面方式”的描述是指台面修理、还是指选择打击点和台面角并不明确。条形石片大多是砸击法产生的两极制品，但是认为这种石片是从修好的打击面上直接剥

^① 陈淳、沈辰、陈万勇、汤英俊：《小长梁石工业研究》，《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2期。

片显然是不正确的，目前小南海并没有发现台面修理的证据。因为在石料质地较差、剥片大小和走向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台面修理显得徒劳和毫无意义。

原报告描述绝大多数石片都用石锤直接打击产生，只有在介绍石英制品时才谈及砸击法。这可能受北京人文化中砸击法被普遍用来处理脉石英的影响，大家便以为砸击法是专门处理石英的一种技术。比如，原报告中对一件柱状石核有这样的描述：“它还是用纯熟的直接打法制成，表现了非常进步的制作技术，特别是像核身细小，打击面保存很少，底端又加工成刃部等特点，说明它不是一般的石核，而是有意制作的一种工具，很可能是作为石凿使用的。”“柱状石核和窄小长石片的存在，更表现了直接打法的熟练水平。”其实，报告描述的这些柱状石核和窄长石片是典型的两极石核或石片。

根据我们的观察统计，两极制品在所有观察的标本中占 8.5%，在燧石质的石核、石片和废料中两极制品占 7.8%，石英质石料的石核、石片和废料中两极制品占 17.1%，在有二次加工痕迹的器类中用两极石片作为坯件的占 15.2%。根据这一观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小南海工业的打片方法还是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为辅。对石英制品的观察也可以看到，对于石英这样劣质的石料，如果石核大小合适，小南海先民主要还是采用锤击法剥片。在燧石和石英在质地和剥片效果十分相似的情况下，选择锤击和砸击两种不同打片方法并非完全根据石料质地而很可能是根据石核大小而定。

图 2 的 1、2 为两件锤击石核，标本 028 是一件多台面石核，长宽厚分别为 4.2cm×3.0cm×2.0cm。核体呈龟背状。凸面有六个小面组成，除一个面为残留的破裂面外，其余都为块料原始面。较平的一面有从四个方向打片的四个完整石片疤。标本 029 是 1960 年 A 方所出，个体略大，长宽厚分别为 3.9cm×3.8cm×2.4cm。核体也呈龟背状，凸面为砾石磨圆的石皮，较平的一面有三个方向锤击片疤。这两件石核可能是强化剥片后的废弃物，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比较娴熟锤击剥片技能。

图 2 的 3、4 为两件砸击制品，标本 161 为灰色燧石质原料，呈三角形，长宽厚为 3.3cm×1.4cm×1.0cm，形似石叶，背面有崩裂的长条形片疤，较平的腹面两端留有受力导致的放射线和破碎疤痕。标本 102 是 1960 年 A 方所出，呈三角形，形似石叶，除了两端有砸击的破碎痕迹外，两侧缘上有二次加工的鳞片状疤痕。从加工特点来看，也可以归入双刃边刮器的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现了一件两极裂片(*pièce esquillées*)(图 2, 5)，标本 162 为了一件很薄的梯形石片，长宽厚分别为：3.0cm×2.5cm×0.3cm，一端砸击痕迹显著，相对一端的反坐力量不很明显，台面呈刃状或线状。对这类石制品迄今关注不多，具体内容请参见一篇专论^①。由于目前这类制品在我们观察的小南海标本中也仅为孤例或特殊标本，很难对其类型学上的意义做进一步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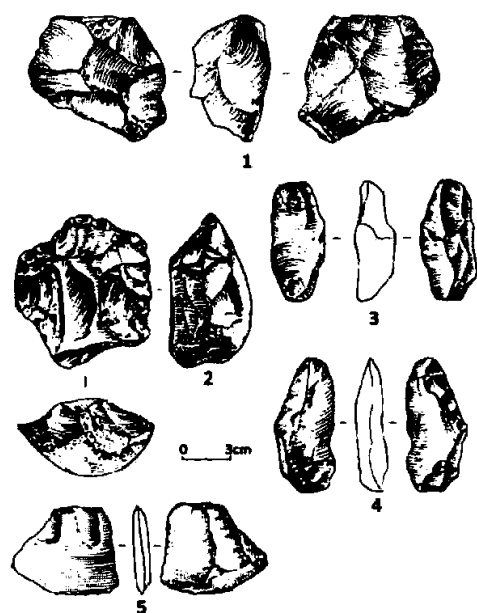


图 2 小南海石制品

1、2. 锤击石核；3、4. 砸击制品；5. 两极裂片

3. 器物类型

根据传统的类型学方法，我们将具有二次加工的石制品其归入器物工具，但是这种分类和器物名称是根据旧石器习用的分类标准，并不一定代表其确切用途或功能，我们对这些器物的微痕观察将进一步说明了类型学分析的主观性。原报告的器物类型共 117 件，占全部采集品的 1.7%。其中包括敲砸器(n=4, 3.4%)、尖状器(n=17, 14.5%)、刮削器(n=17, 77.8%)。我们在观察的 944 件石制品中鉴定出 79 件石器，占有所有标本的 8.4%，具体分类和数量请参见上面的表 1。总体来说，小南海石工业的器物类型并不丰富，种类

^① 陈淳：《两极法与 *pièce esquillées*》，《人类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

比较单调，而且精致加工的程度也不是很高。

与原报告描述相似，1978年发掘品中刮削器类也占了较大的比例，但是我们的观察特点和分类原则与简报有所不同，主要根据二次加工的特点，其中双刃和凹刃数量较多。简报中一类“弧背长刮器”被描述为小南海石器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但是“弧背”实质上是残留岩面或石皮所表现的自然特点，并非人工刻意所为。标本 111 是一件凸刃刮削器(图 3, 1)，用一块厚石片制成，长宽厚分别为 $3.3\text{cm} \times 2.4\text{cm} \times 0.8\text{cm}$ 。半圆形的弧状缘有几个连续修整的疤痕，由于疤痕较深，使得片疤之间形成尖锐的突起，好像锯齿一样。标本 135 为一件小型双刃刮削器，长宽厚分别为 $2.5\text{cm} \times 1.6\text{cm} \times 0.6\text{cm}$ ，一条长弧缘做了连续和细腻的加工(图 3, 2)。标本 043 是 1960 年 A 方所出，为一件凹刃刮削器，长宽厚分别为 $2.8\text{cm} \times 2.6\text{cm} \times 1.1\text{cm}$ 。该器物用一件锤击小石片制成，背面一侧留有该石片先前剥片留下的深凹疤痕，另一侧则是连续打片形成的凹刃(图 3, 3)。

尖状器相对较少，从加工特点、形状和精致程度来看，这些尖状器还是比较粗糙的。标本 050 是 1960 年出土的一件较典型的尖状器(图 3, 4)，长宽厚分别为 $4.1\text{cm} \times 2.8\text{cm} \times 1.0\text{cm}$ 。该器物的加工主要集中在—面，留有密集而浅平的疤痕，两侧刃缘比较对称并聚成一尖。另一面除了局部留有石片先前的片疤外，没有修整的痕迹，说明该尖状器为单面加工而成。

比尖状器更值得注意的是数量相对较多的锯齿状器，主要特征为沿石片较锐的边缘有断续或连续的齿状突起。这些器物可以与刮削器中凹刃或凹缺器(notch)放在一起分析，是小南海石工业中颇具特色的一类制品。如果将这些锯齿和凹缺加工的标本加在一起共有 40 件，占有所有石器工具的 50.6%。这类锯齿状器在欧洲旧石器类型学被称为 denticulates，是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它们在山西丁村遗址中也有所见，但均为大中型石片为坯材^①，因此与欧洲和小南海以小型石片为坯材的特点有所不同。这类器物常被认为可能用来加工木器。较大的凹缺器可能用于刮削木棒和木锥，锯齿状器的功能可能与现代的锯子相似。为了检验其用途的合理性，我们特

^① 王益人：《丁村的凹缺刃器和锯齿刃器》，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钟侃、高星主编《旧石器时代论集——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地用实验加以检验。将一件锯齿状器复制品用来锯木头，结果令人十分意外。由于燧石石料十分松脆，所以用这类器物来回锯木头的时候，没有操作几下，这些锯齿全部崩碎断裂，刃缘变得直而圆钝，根本无法将木头锯开。由于这类锯齿状和凹缺的加工十分随意，有时仅为几个不连续的缺口，也不见有明显使用破碎的迹象。所以，石质锯齿状器可能根本无法与金属锯子相提并论，其功能可能更适用于割草(类似镰刀)而非锯木。因此，对小南海这类器物的功能和加工目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件似雕刻器制品，为浅灰色燧石，带有一个类似屋脊形的凿口(图3, 5)。由于这件雕刻器迄今在小南海仅为孤例，并经过仔细观察和反复研讨，觉得它有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雕刻器特点的砸击制品，不便作为小南海存在雕刻器技术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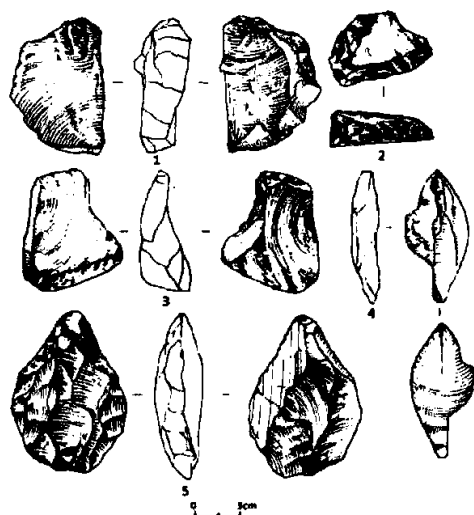


图3 小南海石制品

1. 凸刃刮削器；2. 双刃刮削器；3. 凹刃刮削器；4. 尖状器；5. 似雕刻器

国内学者对西方旧石器文献中的 modify 和 retouch 曾有讨论，认为前者的加工为粗制品，而后者的加工为精制品^①。这种两分确实很有用，但是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在英语文献的使用中也并非泾渭分明。小南海石器工具的二次加工都十分粗糙，不存在对器物的成型加工和再生修理，均可以被视为是随意性很大的权益性工具和粗制品。

^① 卫奇：《泥河湾盆地半山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在此，我们还想对原报告中描述的一类“窄长小石片”发表一点看法。这些小石片被认为与细石叶非常接近，但是片身较厚，横断面呈三角形，与间接法或压制的细石叶不同。简报认为，这些小石片是用纯熟的直接打击法制成，可能是修理柱状石核留下的石片。其实，这些小石片两端一般有楔裂的痕迹，没有台面，是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片。但是，在我们的观察中确实发现了3件典型的石叶，有非常小的点状台面，应该用压制法生产。

4. 废片分析

对小南海石工业进行废片分析主要是了解石料质地对打片技术和剥片过程的影响。小长梁石工业的废片分析结果，表现出非常低的完整石片和比例极高的碎屑块。我们在对石料质地的分析中，发现小南海与小长梁的燧石质地都不是很好，遂将这两个石工业的废片分析加以对比，以了解这两类石料在剥片结果上的异同(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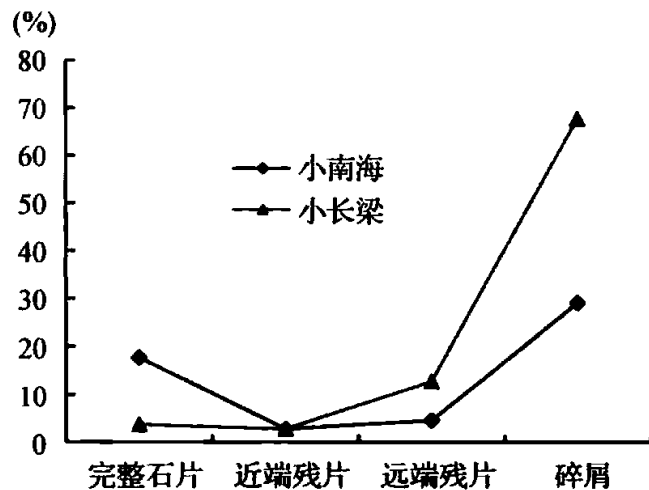


图4 小南海与小长梁石工业废片分析之比较

5. 微痕分析

在此次分析的小南海石制品中，我们选取了部分被视为可能使用过的标本进行微痕观察，共选取78件。由于设备局限，整个过程采用一台10~40倍的单目光学显微镜，集中观察刃缘部分；并结合CCD电脑显微摄像系统，详细记录微痕组合状态；进而对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探讨小南海人群使用工具的方式，并尝试分辨其加工材料和可能的饮食组合。

经过仔细观察，共发现21件具有使用痕迹的标本，占观察样本的

26.9%。由于每件标本不仅一个部位被使用，可能在不同部位留有使用痕迹，所以根据国际惯用法则，采用了“使用单位”的概念——EU 来统计使用痕迹的数量。其中部分 EU 是确实被使用的，能分辨其使用方式和被加工材料硬度，定义为“确定 EU”；部分被认为可能经过使用，但由于组合规律模糊，无法判断具体的运动方式或被加工材料，定义为“不确定 EU”。观察结果显示，21 件标本上共有 32 处 EU，其中 22 处为确定的，10 处为不确定的。

(1) 使用石片

具有使用痕迹的标本都是未经二次加工的使用石片。根据统计，可以分辨出 4 种运动方式：刮(scraping)、切(cutting)、割(slicing)和刻(carving)。其中，刮和切的动作比例较高，分别为 43.8% 与 12.5%(表 2)。

表 2 石制品运动方式统计

运动方式	EU 数	百分比%
刮(scraping)	14	43.8
切(cutting)	4	12.5
割(slicing)	3	9.4
刻(carving)	1	3.1
不确定 EU	10	31.2
总计	32	100

由于方法和技术的局限，有少部分 EU 无法判断对应的加工材料。统计结果表明，32 处 EU 中，以加工软性材料为多，如动物皮、肉等，少量用于加工中性物质或硬性物质(表 3)。

表 3 石制品加工材料统计

加工材料	EU 数	百分比%
软性物质	10	31.2
中性物质	6	18.8
硬性物质	3	9.4
不确定 EU	13	40.6
总计	32	100

将运动方式和加工材料硬度结合起来，可以得到这样的初步认识：(1)切软性物质的标本有 1 件，2 处 EU；切割中性物质的标本有 1 件，1 处 EU。

(2)刮软性物质的标本有6件,6处EU;刮中性物质的标本有3件,4处EU;刮硬性物质的标本有1件,2处EU。(3)刻硬性物质的标本有1件,1处EU。(4)割软性物质的标本有2件,2处EU;割中性物质的标本有1件,1处EU。(5)运动方式或加工材料不确定的标本有6件,不确定加工材料的EU有13处。其中标本005和092均有2处EU,都是一处用于刮削软性材料。

(2)石器

在初步观察时有5件石器被认为可能具有使用痕迹,但是在显微镜观察之后认为:其边缘的破碎痕迹均为二次加工造成的,刃部几乎没有磨圆和抛光,可以认定没有被使用过。

长期以来,旧石器分类及命名一直是以形制和功能为依据,但是微痕分析的普遍结果表明,某些石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经过使用或具有人们赋予的功能。小南海的石器上几乎没有明显的人工痕迹。笔者推测,这几件石器很可能只是生产“操作链”中某个环节的半成品或废品,而非成型器物,一些石器可能已被使用者带走,这为我们探讨小南海遗址性质和功能带来新的启示。此外,微痕分析提醒我们,石器的命名原则还需考虑其他要素,如加工技术等。当然,这次观察石器数量偏少有可能导致认识上的偏颇,因此期望以后进一步工作,对二次加工器物微痕的观察和分析。

(3)锯齿状器

锯齿状器经常出现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不少欧洲学者认为锯齿形器具有特殊的功能,可能用于加工某些硬性或中性材料。但是,微痕观察确定小南海出土的锯齿状器没有经过人工使用,边缘没有任何使用痕迹,这与前面所提的实验结果相符。因为其形似刃部的边缘过薄,锯齿脆弱,一旦使用,锯齿形边缘必然变平滑,不可能保留锯齿的形状。此次观察将为分析锯齿状器的功能提供新的思路。

微痕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小南海石制品的使用和人类的行为。小南海人群在洞穴内生活的时候,生态环境比今天要好得多,食物的资源和种类应该比较丰富,因此他们可能并不需要采取流动性很大的觅食方式。当地比较丰富的燧石资源又能提供随手可得的工具原料,因此他们一般会更多地采用权益性石器技术,不必留意以节省原料和反复使用为目的的精致加工。至于为何二次加工的器物都没有使用痕迹,可能是这些所谓有加工痕迹的

“器物”不过是废弃的半成品。精致加工的器物一般被认为要多次使用，并常常被狩猎采集者带在身边，以应付流动觅食中的不时之需。因此，真正加工成型的工具可能不大会发现在类似小南海洞穴这样的大本营里，因为在这种原料丰富的大本营里，燧石原料随手可得，用初级石片即可完成加工任务。而外出觅食往往需要轻便、能反复使用以及多功能的工具，所以精致加工的器物可能已经带离遗址了。

四、讨论

根据对 1978 年发掘石制品观察的结果，结合 1965 年发掘简报，我们想围绕前面提出的问题做一番全面的讨论，以求对小南海石工业有一个新的认识。

从小南海石料质地和打片方式分析的可知，虽然这类黑色燧石质地比较致密，但是节理发育、杂质多，对剥片效果影响较大。剥离的石片和块屑往往沿节理或杂质条纹碎裂，产生大量不规则的碎屑块。即使能够剥离较大和完整的石片，但是受节理和杂质的影响，这些石片在二次加工中仍然很容易断裂和破碎，这些石片的人工特征有时并不明显。废片分析表明，虽然小南海燧石质地较差，存在大量的废片和碎屑块，但也不乏相当数量的完整石片，因此总体上比小长梁的石料略好。

小南海石制品个体普遍较小，显然也是受石料质地影响的结果。安志敏先生认为它具有类似细石器的特征，贾兰坡先生将其看作是细石器的直系渊源。虽然，在我们观察的标本中发现了几件比较典型的石叶，但是并没有发现产生这类石叶的石核，因此对于这些石叶是否用类似典型细石器那种楔形或锥形细石核生产并不清楚。许多被描述为类似石叶的窄长小石片，其实是两极制品，与压制法为特点的石叶技术没有关系。从总体来看，小南海石工业仍以石片为主要特点。石制品个体较小是石料所致，并非工匠刻意所为。对小长梁石制品的认识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疑惑和讨论，认为它个体小，十分精致，常常将其归入小石器传统。现在我们认识到，在用两大传统理论来比较石工业时，应该分辨石制品大小的制约因素。如果是人类刻意生产的小型石器，如细石叶、端刮器和雕刻器等，那么这种特征具有指示人类行为和技术的重要意义；如果制约因素是石料或其他非人为因素，那么不应该赋予任何文化传统上的意义。由于在与小南海石工业繁盛的同时及更早，以细石

叶技术为代表的石工业已经在华北出现，因此，它不可能是典型细石器的直系渊源，也与细石叶技术无关。

原报告认为小南海石工业的燧石采用了直接锤击法，脉石英等原料则用砸击法。张森水认为小南海的打片技术以砸击为主。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小南海的打片技术还是以锤击为主，砸击为辅。在石核大小适宜的范围内一般用锤击最为方便，砸击一般被认为是用来处理劣质和个体较小及不宜锤击的石料，或是用于强化剥片以耗竭石料的一种做法。而且，砸击法是一种简便而粗糙的打片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被史前人类和现代土著所采用，是一种权益性的打片技术，并不一定反映文化传统上的关系。在小南海，砸击法也常被用来处理质地较差的燧石原料，这在小长梁石工业中也有表现。这说明，在打片和制作工具的过程中，史前人类对打片技术会因各种因素或不同目的做灵活的应变和选择。大的脉石英也常用锤击法剥片，小的燧石则用砸击法处理，没有针对某一类石料特点的专门打片技术。

根据直觉推测多半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现在通过微痕分析可以获得更为准确的判断。

小南海的主要器类是尖状器和刮削器两大类。从尖状器的加工来看，个别器物比较对称，而且加工表面的片疤浅平。刮削器多为以各种方式沿石片边缘修整的类别，有凸刃、凹刃、多刃等，其中以凹刃或凹缺器为多，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锯齿状器。对于这些锯齿状器的实验分析，依据其齿刃易碎的情况，我们觉得它不像是一种锯木头的工具，似乎更适于收割草本植物。这些二次加工的器物均没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它们很可能是加工精致器物流程中的半成品或废品，因此并不具有严格的类型学意义。

接下来，我们想跳出两大传统的框架来对小南海石工业作一番讨论。由于石制品大小和打片方法已不足以作为追溯文化传统的依据，存在窄长小石片也和细石器技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和分析小南海石工业的文化意义呢？就更新世晚期的人工制品而言，它们显然在适宜的环境中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这些石制品应该被看作古人类应对特定环境和资源的手段与策略，以便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和繁衍。因此，环境对早期人类的文化和石器技术的制约非常大。

美国考古学家托伦斯(R. Torrence)指出，技术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

是用来应付环境和社会的一种策略，不同的技术和工具应该被看作是人类不同的行为策略，并与这些策略的代价/收益相关。从人类适应来看，人类采用的技术一般是能够用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的最佳技术(optimal technology)。对于古人类来说，技术作为一种策略主要被用来获取资源，并降低生存风险。这种风险一般是指因觅食失败而威胁到生存的严重性。如果在风险很大的环境里，人们一般会加大技术的投入来避免觅食的失败。因此，石器技术与石制品的精致和粗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的觅食方式有关。托伦斯根据民族学中对工具复杂性的观察提出，风险较大的觅食方式需要精致的技术和工具，随着从纬度较低的地区向高纬度地区的推进，随着人类对动物依赖程度的增加，工具会显示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动物资源流动性大、出现时间短，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工具的效率来防止觅食失败的风险。她将时间压力看作是制约石器技术的主要变量，认为复杂技术是用来节省时间的。于是，高纬度地区狩猎采集者的工具要比低纬度地区的工具来得复杂^①。

在另一篇文章里，托伦斯从觅食风险来探讨工具的复杂性，提出了工具组合结构的3个内容：(1)功能类型工具的组成；(2)工具类型的多样性；(3)个体工具的复杂性。她认为决定组合结构和工具套(tool kits)性质的不是时间而是风险，食物的流动性越大，觅食的风险也就越大，觅食的潜在风险可以根据食谱中植物资源与动物资源的百分比加以衡量。有效和昂贵的技术往往出现在获取关键生存资源风险较高的环境里，这些技术保证了狩猎采集者不错失转瞬即逝的时机^②。

美国考古学家鲍斯曼(C. B. Bousman)提出4种类型的工具设计：(1)权益工具，表现为很少予以加工和修理，使用频率较低；(2)维修工具，有一定程度的加工与维修，往往多用途；(3)可靠工具，功能上有特殊目的，表现为结实耐用和关键部位质量较高，有可替换的部件或需精心维修。这种工具常用于觅食风险大，而觅食失误会导致十分严重后果的情况；(4)有效工具，指一

① Torrence, R., Time budgeting and hunter-gatherer technology. In Bailey, G. (ed.), *Hunter-Gatherer Economy in Prehistor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22.

② Torrence, R., Retooling, towards a behavioral theory of stone tools. In Torrence, R. (ed.), *Time, Energy and Stone To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57-66.

定单位的原料能够生产更多的工具(使用单位),以减少获取原料的代价。最典型的就是石叶技术^①。

小南海石工业的特点除了石料质地的制约外,可能还需要从时间和风险等生存策略来加以考虑。我们知道,在小南海石工业繁盛时期,与安阳距离并不远的晋南下川和薛关等遗址中已经存在非常复杂的细石叶技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从环境和人类适应角度来探讨也许更有启发。下川和薛关细石叶技术和工具种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实代表了可靠工具和有效工具的完美结合,是复杂工具发展的极致。除了各种细石核和细石叶外,下川遗址出土的各种精致的小型石器,如端刮器、石核端刮器、雕刻器、箭镞、两面加工的尖状器、锥钻、琢背小刀等类型的多样性,综合了石料利用的经济性、器物的标准性和多功能用途,以及便于维修、更新和替换等多种优点。而小南海石工业的技术和工具显得较为粗糙和简单,石制品绝大部分可归于权益工具和维修工具,技术既不复杂,类型也不多样,没有所谓的可靠工具和有效工具。即使存在一些诸如刮削器、尖状器和锯齿状器等类型,其加工的精致和维修程度也相对较低,根本无法与下川或薛关的石工业比肩。或许有些精致工具已被带离遗址,但是从留下的废片来看,也没有类似下川遗址常见的大量加工特殊精致工具组合留下的独特废片。

目前对于小南海生态环境的信息只能从动物群来了解。根据周本雄的研究,小南海动物群包括鸵鸟(*Struthio anderssoni* Lowe)和17种哺乳动物,其中有刺猬(*Erinaceus* sp.)、方氏鼯鼠(*Myospalax fontanieri*)、黑鼠(*Rattus* sp.)、洞熊(*Ursus cf. spelaeus* Blumenbach)、狗獾(*Meles leucurus* Hodgson)、狼(*Canis cf. lupus* L.)、豹(*Felis pardus* L.)、最后鬣狗(*Hyaena ultima* Matsumoto)、野驴(*Equus hemionus* Pallas)、披毛犀(*Ceolodonta antiquitatis*)、野猪(*Sus* sp.)、狍(*Capreolus cf. manchuricus* Lydekker)、斑鹿(*Cervus Pseudaxis* sp.)、水牛(*Bubalus* sp.)、普氏羚羊(*Gazella przewalskyi* Buchner)、苏门铃(*Capricornis* sp.)和猩猩(*Pongo* sp.)。动物群是典型的晚更新世种类,表现为森林和草原物种的混合,以及南方物种和北方物种

^① Bousman, C. B., Hunter-gatherer adaptation, economic risk and stone tools. *Lithic Technology*, 1993, 18(2): 59-86.

的混合。它含有鸵鸟、最后鬣狗、野驴、披毛犀、普氏羚羊这些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常见的疏林草原典型物种，也有野猪、斑鹿、豹、苏门铃、水牛甚至猩猩等南方森林物种。说明在当时小南海附近，至少存在与低纬度条件酷似的斑块状生态区。周本雄认为，小南海出土猩猩牙齿化石很不寻常，因为以往的猩猩化石记录只见于广西桂林即北纬 26° 以南地区，而且到晚更新世末在华南已经和剑齿象一起消失^①。这说明，在小南海附近当时有可能存在一片环境适宜的飞地，其中残存着一些华南动物群的孑遗。这一证据也许有助于我们解释小南海石工业特点，在猩猩这类森林物种都能生存的小南海，其局部生态环境应该和低纬度的华南地区相仿，森林和草原植被混合的生境一般被认为是生物量最丰富的环境，可以提供较为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处于这种环境优越、食物资源相对充足而流动性又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觅食的风险和压力相对比纯粹的疏林草原要小，加上燧石原料虽然较差，但是有可以就地取材的丰富石料，小南海的先民自然就没有在技术和工具上加大投入的必要。即使当时小南海先民了解附近其他游群或部落生产细石叶，但是由于他们生活在觅食压力较小的环境中，这类精致技术对他们而言也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或适应上的特别优势。由于周本雄对小南海动物群的初步分析只是鉴定物种，并没有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埋藏动力学分析，所以目前尚无法了解这些动物中哪些是为人类所利用的对象及采取了何种利用手段。

五、小 结

通过对小南海石工业的再观察和理论探讨，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和新认识：

1. 小南海石工业的石料以黑色燧石为主，并有少量脉石英。燧石质地不是很好，对剥片产生很大的制约，导致石制品个体较小，并留下大量的碎屑块。打片技术以锤击为主，砸击为辅，二次加工也采用直接打制。虽然发现个别类似压制法生产的石叶，但是由于数量太少，又没有发现石核和其他副产品，因此难以对这类制品及其意义作进一步认识。

2. 小南海石制品中的二次加工比较简单粗糙，器物类型较少，特征也不

^① 周本雄：《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典型。多为一些权益性的器物和粗略维修的工具，其中刮削器为大宗，尖状器并不十分典型，凹缺和锯齿状器比较多，但是对其用途仍然不很清楚。如要从形态判断其功能，这类器物可能更接近采集植物的“镰刀”，而不大可能是加工木器的“锯子”。而一件“雕刻器”孤例则很可能是砸击法打击偶尔产生的类似制品。这些二次加工的“器物”没有使用痕迹，表明它们可能是器物加工流程中废弃的半成品。

3. 小南海石工业比较简单和粗糙的特点，既与石料的质地和丰富性有关，可能也与环境的特殊适应有关。在生态环境相对优越和食物丰富的地区，群体流动性不大，缺乏觅食的风险和压力，石器技术自然表现出比较简单和权益的特点。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加工较为精致的器物被人带走，在营地以外的觅食活动中使用的可能。

4. 小南海石工业与以细石叶技术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没有渊源关系，也不再适宜用承袭或直线递进关系来看待它们在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旧石器技术和工具更多反映了古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其中包括石料的质地和可获性、食物资源的种类和流动性，以及觅食中的风险与时间压力。虽然史前人群中也有文化的传承，但是应付眼前的环境条件和生存状况要比墨守成规可能更现实、更重要。

5. 小南海石工业和以细石叶技术为代表的石工业在华北地区的共存，表明了文化并行发展的特点，表明了古人类不同群体在适应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因此，在以后的旧石器研究中，我们需要从石器使用的生态背景和人类生存策略的视野来分析技术的采用、工具的制作、类型的差异，以及加工的复杂程度等问题，并结合石料的质地、可获性、丰富性、对技术和器物的制约进行综合分析，以便对石工业性质及其人类生存方式和适应行为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与安家瑗、陈虹合作，原刊《考古学研究 7》，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一、前言

长期以来中国悠久的历史一直被用源远流长和一脉相承来予以形容，中国古人类学家和史前学家也一直试图用他们的发现与研究来证实中华文明的原初性和独特性，将这一文明的源头追溯到直立人阶段的元谋人和北京人。这些一百万年和几十万年以前的远古祖先，经历了早期智人、晚期智人阶段，最后发展成今天我们的中华各民族的大家庭。

20世纪40年代，中国大陆的考古发现揭示出远东旧石器文化和西方同类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这促使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H. L. Movius)提出了分隔世界两大旧石器文化区域的“莫氏线”，将东亚大部划归所谓的“砍斫器文化圈”，而将非洲、欧洲以及近东和印度半岛划归所谓的“手斧文化圈”^①。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大量发现，使得贾兰坡在华北建立起两大旧石器传统：其一是以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为特征的“匱河-丁村系”或“大石片-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其二是以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的各种刮削器、雕刻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简称“第1地点-峙峪

^① Movius, H. L.,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944, 19 (3): 1-15.

系”)或“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①。这两大传统可以被看作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古人类直线演化的考古学佐证。

虽然中国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努力从他们的发现来构建中华民族和文化一种线形的编史学模式,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提出中西旧石器文化从远古开始就存在某种交流的看法,并对“莫氏线”提出了挑战。黄慰文根据汾渭地塬、汉水流域以及广西百色盆地发现的“手斧”,认为旧石器初期就存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②。对于考古学来说,传播迁移论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一直是文化演变的主要阐释途径,将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归于外来的影响。虽然文化的交流可以只是思想的传播而没有人群的流动,但是对于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的直立人来说,在智力和语言尚未充分完善的情况下,一些文化特征的地理扩散没有人口的移动是难以想象的。

长期以来,文化历史考古学求助于传播迁移论来解释文化的共性,但是没有充分考虑人类适应所形成的文化趋同和并行发展的机制,于是在见到一种有异于其他文化特征的现象,就首先考虑其外来的起源。其实,弄清一种技术或文化特征是否是本土文化的独立创造其意义同样重要。于是,到底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并如何入手来进行论证,完全成为研究人员自己价值观的体现。

于是,我们在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微妙的不和谐之处。古人类学家努力构建中国古人类直线演化的脉络,力求将外来人群的影响尽可能降低到次要的地位,以体现源远流长和一脉相承的民族主义价值观。而有些考古学家则竭力要否定中国大陆史前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对隔绝的看法,打破区域文化的“藩篱”,挑战“莫氏线”来强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古老性和重要性,以体现成功运用传播迁移论范式的价值观。

在此,我们有必要聆听后过程考古学提出的警示:如果科学的中立性无法得到充分的尊重,那么我们有关过去的说法绝非是从真实世界获得的冷静客观的判断。它们总是和今天的政治和道德判断混在一起。这并不意味着考古

①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 黄慰文:《中国的手斧》,《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1期。

学家故意不以一种诚恳的态度做学问，而是考古学家自己总有一种思想的共鸣，解释过去总是现在从事的一种政治行为，考古学家总是想使自己对过去的阐释得到今天社会价值观的认同^①。

由此可见，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自身学科价值观的微妙差别会如何影响到对考古材料的观察、分析和阐释，这些价值观不仅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本学科传统范例的影响，这些影响直接和学者们孜孜追求的学术成就感交织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和获得如此的结论才会得到社会和学术界最高规格的认同。比如，黄慰文在回答林圣龙对百色手斧的商榷时，就以百色的手斧报告在美国《科学》杂志审稿和发表后未受质疑为由，认为这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手斧和对“莫氏线”的挑战的有力支持^②。这显然与中国古人类学家强调的，中国古人类化石“显示出一脉相承的进化脉络，他们与外界有一定深度的隔离，故得以保持其地方特色，在形态上有别于其他地区”^③的论断有所抵牾。

自“夏娃理论”和“走出非洲”假说风行以来，分子人类学的突破也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并对中国的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学者们现在要考虑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否发生过外来人种的取代或交融，反思我们现在所习用的研究方法是否能从本土文化传统中有效地辨认外来文化传统的因素，以作为人口取代和交融的文化依据。根据最近几十年来的古人类研究和断代技术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人类演化的复杂性显然是难以用“一脉相承”予以概括的。本文试图对目前逐渐得到公认的中国古人类镶嵌进化的观点和“夏娃理论”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提出的问题加以讨论，希望今后的探索能突破传统思维的框架，尽量克服一种本土和民族观念，以放眼世界的胸怀来面对全新的挑战。

二、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

1980年和1981年，安徽和县的龙潭洞出土了一具相当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和一些人骨碎片及牙齿，吴汝康与董兴仁对头骨进行了研究之后认为，和县

① 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② 黄慰文、袁宝印：《关于百色石器研究——答林圣龙》，《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③ 吴新智：《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4期。

人具有直立人的典型特征，在形态上和北京猿人相似，系统地位与较晚的北京猿人相当，是一种进步的直立人类型^①。

1982年，在和县西南约50千米的巢县银山发掘出土了一块不完整的枕骨。1983年，对巢县化石地点的再次发掘，又找到了一块不太完整的人类上颌骨。许春华和张银运等人对骨化石进行了研究，发现产自堆积上层的枕骨代表一个青年女性的个体，骨壁较薄，枕骨圆度较直立人为大，其特征与北京猿人和和县猿人不同，而与某些早期智人相近^②。对同一层位出土的上颌骨进行了分析之后，许春华和张银运等认为，这块上颌骨应属于早期智人而不是直立人的一位男性个体。根据动物化石的分析，人类化石的地质年代相当于北京猿人地点1~4层的时代或稍晚，属中更新世^③。

1987年，陈铁梅和原思训等发表了对和县和巢县银山古人类地点的铀系法测定数据。对和县8个哺乳动物牙齿样品的测试，其中4个封闭样品提供了16.5万年的²³⁰Th年龄，它们的²³¹Pa/²³⁰Th年龄与²³⁰Th年龄在误差范围内一致。因此，陈铁梅和原思训等将距今15万年~19万年作为和县直立人化石层位堆积的年代。巢县银山的上部地层共测试了9个样品，第二层7个样品中三个封闭样品提供了16.1±1.4万年，17.0±1.4万年和19.2±3.0万年的结果。因此，陈铁梅和原思训等将巢县银山上部堆积的年代定在了距今16万年~20万年^④。

铀系法的测定年代表明，和县直立人化石堆积和巢县银山早期智人化石堆积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于是张银运发表专论讨论了中国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生存时代重叠的问题，并提出了3个需要探讨的问题：(1)如何看待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年代界限；(2)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祖裔关系是否存在；(3)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差异如何从种一级的分类学上予以确立。张银运从分类学

① 吴汝康、董兴仁：《安徽和县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② 许春华、张银运、陈才弟、方笃生：《安徽巢县发现的人类枕骨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③ 许春华、张银运、方笃生：《安徽巢县人类化石地点的新材料》，《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④ 陈铁梅、原思训、高世君、胡艳秋：《安徽和县和巢县古人类地点的铀系法年代测定和研究》，《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3期。

上的角度提出了两种可行的方案，一种是根据某些国外学者的主张将直立人与智人合并，直立人降为智人种当中的一个亚种，于是和县直立人和巢县智人成了生存在同一时期的两类智人亚种。另一种是将和县直立人和周口店猿人洞上部的直立人化石并入智人种，以解决分类上的矛盾^①。

1994年沈冠军等发表了对巢县银山化石地点钟乳石和骨化石的铀系年代，他们在对8个钟乳石及3个骨化石样本的15次 $^{230}\text{Th}/^{234}\text{U}$ 分析和对1个钟乳石和3个骨化石的 $^{227}\text{Th}/^{230}\text{Th}$ 法的测定后认为，巢县人的年代上限应为距今31万年。根据新的测试结果沈冠军等认为，新的年代有助于解决史前学家们的困惑，因为巢县人化石的年代已经处于直立人的生存范围之内，而巢县人化石虽然有不少明确早期智人的特征，但是也有一些无可否认的直立人性状。古人类特征的“进步性”和“原始性”是人类演化过程中镶嵌性的反映，很难进行定量的分析比较，而人种的谱系分类只不过是学者们为了方便而制定的，根据我国古人类学界将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定在距今20万年的界限，因此，巢县人化石应当归入直立人^②。然而，沈冠军等将巢县人化石划归直立人并没有解决史前学家的困扰，因为他们仍然无法解释进步特征较为明显的巢县人为什么会比特征较为原始的和县人早10万年的问题。

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在辽宁营口的金牛山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的古人类头骨，以及同一个体的体骨。根据其28万年(后来修正为26.3万年)的铀系年代数据^③，这具化石起先被定为直立人^④，后来又改定为晚期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类型^⑤。1988年，吴汝康对金牛山人头骨进行了研究，认为这具化石属于一个年龄在30多岁的壮年男性个体，并根据其头骨壁较薄、脑量之大以及其他综合特征将其定为早期智人。同时认为化石的28万年数据值

① 张银运：《关于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并存而引起的问题》，见《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沈冠军、房迎山、金林红：《巢县人年代位置新证据及其意义》，《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③ Chen, T. M and Yuan, S. X., Uranium-series dating of bones and teeth from Chinese Paleolithic sites. *Archaeometry*, 1988, 30: 59—76.

④ 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⑤ 吕遵谔：《金牛山人的时代及其演化地位》，《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

得商榷^①。

1991年,陈铁梅和张银运联名在美国《世界考古学》杂志上撰文指出,根据巢县和金牛山人年龄与晚期直立人生存年代重合的现象,说明这两种人类曾经在中国大陆共存^②。1993年,陈铁梅等公布了金牛山动物牙化石电子自旋共振(ESR)的测年结果,4个ESR年龄相互接近,平均值为 22.8 ± 2.1 万年。这些样本同时得出的铀系年龄平均值为 23.9 ± 5.2 万年,因此证实金牛山人化石层位的年龄早于20万年,并支持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共存^③。1994年,郑公望等公布了他们对金牛山遗址下部地层的热释光年代数据,出土人骨化石的第7层下部为 19.46 ± 0.34 万年,确认金牛山人大约生活在20万年以前^④。

从北京人遗址来看,这种年代和人类化石发生冲突的现象也十分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对周口店猿人洞进行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表明,北京直立人在这里生存的年代大约从50万年前开始,到20万年前结束。1980年,赵树森等公布了用铀系法对猿人洞上部1~3层一件鹿角样品的 ^{230}Th 年龄为25.6万年^⑤。1982年,夏明用铀系混合模式对猿人洞堆积物进行年代学研究,给出1~3层的堆积物年龄为23万年以前^⑥。1984年,陈铁梅对该鹿角样品做了 ^{220}Th 和 ^{231}Pa 的测定,认为25.1万年应该为上部堆积的时代^⑦。1985年,赵树森等再次确认猿人洞堆积顶部骨化石的年代为距今25.6万年至23万年,

① 吴汝康:《辽宁营口金牛山人化石头骨的复员及其主要性状》,《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② Chen, T. M. and Zhang Y. Y., Paleolithic chronology and possible coexistence of *Homo erectus* and *Homo sapiens* in China. *World Archaeology*, 1991, 23(2): 147-154.

③ 陈铁梅、杨全、吴恩:《辽宁金牛山遗址牙釉质样品的电子自旋共振(ESR)测年研究》,《人类学学报》1993年第4期。

④ 郑公望、康永洙:《金牛山人遗址下部地层的热释光断代》,《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⑤ 赵树森等:《应用铀系法研究北京猿人年龄》,《科学通报》1980年第4期。

⑥ 夏明:《周口店北京猿人洞骨化石铀系年龄数据——混合模式》,《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⑦ 陈铁梅、原思训、高世君:《铀子系法测定骨化石年龄的可靠性研究及华北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的铀子系年代序列》,《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期。

因此同期生活的北京人年龄应为距今 23 万年左右^①。

钱方等根据古地磁方法对猿人洞的堆积进行了推论，认为北京直立人在洞中生活从距今 69 万年左右开始到距今 22 万多年结束，有大约近 50 万年的时间^②。周义华用氨基酸外消旋法对猿人洞第 3~4 层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测定，获得了距今 20 万年的结果^③。裴静娴用热释光对猿人洞堆积物测定，其中上部堆积第 4 层的两个上下层位(4~4 和 4~5)的数据分别为 29.2 ± 26 万年和 31.2 ± 28 万年^④。郭士伦等于 1991 年公布了他们用裂变径迹法对猿人洞第 4 层的年代测定，得到的结果为 29.9 ± 5.5 万年，因此第 4 层的年代约为距今 30 万年^⑤。根据以上不同断代方法交叉断代的结果，学者们一般认为北京人第 5 个头盖骨的年龄应当在距今 23 万年左右。

1991 年，沈冠军等用铀系法对猿人洞第 1 层的钙板进行了测定， $^{230}\text{Th}/^{234}\text{U}$ 给出的年代结果为 42 万年^⑥。1996 年，沈冠军等又用高精度热电离质谱铀系法对猿人洞 1~2 层钙板样本做年代测定，4 次结果的平均值为 41 ± 1 万年。为此，他们认为北京直立人在猿人洞居住的时间并没有像以前想象的那么长，并依此否定了亚洲直立人演化较慢和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可能镶嵌并存的说法^⑦。

沈冠军等的测定结果将北京人在周口店栖居的时间一下子砍去了近 20 万年，这一结论是否能得到地层学、古生物学和其他年代学方法的支持暂时另当别论。就像提前巢县人的年代来将其归入直立人一样，这至少可以从局部

① 赵树森等：《应用铀系法研究北京猿人年代》，见《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钱方、张景鑫、殷伟德：《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壁及探井堆积物磁性地层的研究》，见《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③ 周义华：《北京猿人和丁村人的氨基酸年龄测定》，《人类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

④ 裴静娴：《北京猿人洞穴堆积及其它洞穴堆积的热发光年龄》，见《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⑤ 郭士伦等：《北京猿人遗址第四层裂变径迹法年代测定》，《人类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⑥ 沈冠军、金林红：《北京猿人遗址上限再研究》，《人类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⑦ 沈冠军等：《高精度热电离质谱铀系法测定北京猿人遗址年代初步结果》，《人类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

范围避免了化石材料解释上的尴尬，但是仍然无法解释其他古人类化石年代存在重叠的现象。看来，中国古人类演化的复杂性并不是我们来回摆弄他们的分类地位和年代早晚就能自圆其说的。

1989 和 1990 年，在湖北郧县青曲镇曲远河口相继发现了两具古人类颅骨化石，伴生动物有 18 种，从动物化石判断其年代应为中更新世早期或稍早。两具颅骨受埋藏挤压变形严重，但是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李天元等认为郧县人与蓝田人关系较为密切，其系统地位应当处于北京人和蓝田人之间^①。1996 年，陈铁梅等公布了他们采用 ESR 对与郧县人颅骨同层的 9 个哺乳动物牙釉化石的测年，得出的平均值为 58.1 ± 9.3 万年^②。这个年代基本上与动物化石年代的推断吻合。

1999 年，张银运对蓝田人和郧县人头骨化石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认为，根据郧县人颅骨化石上的所谓直立人性状还不足以说明该人类的颅骨代表直立人。根据颅骨 II 所估算的长、宽、高，张银运认为郧县人的脑容量可能与大荔早期智人的脑容量(1 120ml)相当或稍大，远超过蓝田人的脑容量。如果蓝田人与郧县人的年代确实相当，那么这又是一例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共存的现象。由此可以断言，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并存的现象在中国已不再是孤例，而且不是限制在局部地区，人类演化过程的若干段落可能需要加以改写^③。

由于人类化石形态有着地区和时间上的变异，多大程度可以被用来作为分辨不同人种的标志有时很难确定，因此直立人与智人的界限和起源问题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上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将直立人种(*Homo erectus*)和智人种(*Homo sapiens*)合二为一，即取消直立人种，将其并入智人种。他们认为，无论在时间和形态上，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都没有明确的界限。最重要的依据是，被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是直立人的印尼昂栋人头骨其年代测定只有距今 5 万年。但是，许多学者还是认为将直

① 李天元等：《湖北郧县曲远河口人类颅骨的形态特征及其在人类演化中的位置》，《人类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

② 陈铁梅、杨全、胡艳秋、李天元：《湖北“郧县人”化石地层的 ESR 测年研究》，《人类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

③ 张银运：《直进演化抑或分支演化——中国的人类化石证据》，《第四纪研究》1999 年第 2 期。

立人和早期智人分开为好。直立人的年代最早距今不到 200 万年，最晚到距今约 20 万年^①。

三、现代人的起源问题

1987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分子人类学学家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线粒体 DNA 与人类进化”的文章^②。他们根据祖籍来自非洲、欧洲、近东和亚洲，以及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土著妇女共 147 人，分析了她们胎盘细胞内的线粒体 DNA，以追踪他们的遗传关系和谱系。虽然这些不同类型的线粒体 DNA 存在差异，但是根据已知的线粒体 DNA 突变速率的推算，它们的分化年代大约在距今 290 000 至 140 000 年。于是，这些人类学家认为，将所有妇女线粒体 DNA 向前追溯，最后可以追溯到大约 2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就是现在全世界人类的祖先。大约在 13 万年前，她的一批后裔离开了非洲，分散到世界各地，在全球定居下来。西方国家的媒体根据圣经中的说法，将我们今天几十亿人的血亲和第一万代前的曾祖母称为“夏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现代人起源的“夏娃理论”或“走出非洲”假说^③。

1998 年，媒体披露了诸嘉祐与金力领衔的研究项目《中国各人群的遗传关系》的初步成果，以及金力与吴新智、林圣龙对这一问题交换意见的报道。中国遗传学家采用 15~30 个微卫星标记测试了从中国不同省份采集的 28 个群体的遗传变异，根据各群体之间的相似性构建出反映群体进化关系的谱系树。这一谱系树显示，包括所有中国各人群在内的所有东亚人群有着同一起源，并支持现代人非洲起源的“夏娃理论”。因此，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与北京猿人和所有 10 万年前的化石人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④。

然而，中国遗传学家的论断并没有得到古人类学家的欣然认可。针对“夏娃理论”，吴新智早在 1990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重申了“中国人类进化以连续性为主，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有渐增的基因交流”的观点。他还强调，中国的古

① 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人类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

② Cann, R. L., Stoneking, M. and Wilson, A. C., 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 *Nature*, 1987, 325: 31-36.

③ 吴汝康：《现代人起源的新争论》，《人类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

④ 杨继桢：《中国人自非洲来？》，《新民周刊》1998 年 12 月。

人类化石显示出一脉相承的进化脉络，与外界有一定深度的隔离。现代类型人类起源的取代论也无法得到文化分析的支持，中国的旧石器文化无论在哪个时期都看不出来自西方的文化特征和取代中国原有文化的迹象^①。

之后，中国古人类学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来阐述中国现代人起源的连续性，以质疑“夏娃理论”的取代说。吴新智对中国和非洲的古老智人颅骨的一系列特征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如果中国现代型智人与非洲的晚期智人是从共同祖先分离不久的堂兄弟，那么颅骨的诸多性状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吴新智选择了额骨最隆突部位、上颌颧骨的下缘和与颧骨下缘的关系、上颌颧突下缘与上颌体交接点的位置，以及头骨最宽处的位置等4个方面进行测量和比较。结果认为，中国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额骨最突出位置的测量指数都较非洲相应阶段的智人为低，或在其额骨的较下部位；非洲早期智人的上颌颧突的下缘与颧骨下缘的关系变异较大，在Bodo和Broken Hill 1号头骨上几乎连成一条直线，二者相交的地方没有向下的弯转，而在Broken Hill 2号和Florissbad头骨上连成一条曲线而非直线，中国早期和晚期智人都与非洲标本的后一种情况相似；上颌颧突下缘与上颌体交接点的位置在非洲Bodo头骨上靠近齿槽缘，但在Broken Hill 1号和LH18号头骨上则远离齿槽缘，中国的智人标本都远离齿槽缘；头骨最宽处的位置在非洲古代智人中变异较大，有的在颅骨后端、有的在颅骨中部，中国所有更新世智人的头骨化石中还未发现有最宽处在头骨后部的。

在牙齿特征比较上，吴新智根据刘武的分析数据表明东亚人群的铲形门齿百分比高达73.5%，欧洲白人2.3%，非洲黑人7.3%，这样悬殊的差异令人很难想象东亚智人的牙齿特征如何能在短短的几万年时间里从非洲现代型智人发展而来。

为此吴新智指出，中国晚期智人这些形态特征表现出比非洲早期智人较狭的变异谱是由于遗传漂变。根据“夏娃理论”，如果这些遗传漂变发生在走出非洲之后向亚洲迁徙的人群中，那么这4项特征变异的一致性都有这样的巧合就难以理解。对此，现代人起源的地区连续进化学说可以做出更好的解释，这就是中国晚期智人继承了中国的早期智人的特征。中国现代人的起源

^① 吴新智：《中国远古人类的进化》，《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可以用“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来概括^①。

在 1999 年的一篇论文中，吴新智强调了 1990 年中国古人类化石的综合研究成果，指出目前总结出的 11 项中国古人类共同形态特征在目前发现的化石，特别是较早期的化石中普遍存在，而在大陆西部地区出现频率很低，有的在欧洲几乎没有。这一系列共同特征都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假说。但是，吴新智承认中国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存在形态镶嵌的现象，以及马坝人头骨上与欧洲尼人相似的圆形眼眶，因此在“一脉相承”的立场上有所后退。

1996 年，刘武发表了他对第三臼齿退化的研究来论证东亚地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连续性。根据蓝田人和柳江人第三臼齿先天缺失这一特征在蒙古人种中有较高的出现率，而在欧洲、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群中出现率较低或极低的事实，刘武认为第三臼齿退化是全人类的共同特征，代表了人类牙齿演化的一种趋势。第三臼齿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人群中呈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并出现率自新石器时代以后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人群，表明东亚地区蒙古人种在起源和演化上的连续性，并为现代人多地连续进化的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②。

1997 年，刘武从一系列特征的组合进一步论证中国古人类化石在演化过程中的连续性。他列举了矢状脊、颅骨最宽处位置、印加骨、额鼻及额缝、上面部低矮、颧颌角较大、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的朝向、鼻区扁塌、眼眶下缘圆钝、上颌骨颧突、铲形门齿、第三臼齿缺失 12 项特征为反映东亚地区人类演化连续性的证据，这一系列相似的形态特征表明他们之间具有遗传上的密切关系。

针对非洲起源说的遗传学证据，刘武认为目前已有遗传学家指出其统计方法有缺陷，非洲地区人类线粒体 DNA 的高度变异可能是基因交流的结果，并不意味着非洲人类的古老性。目前的证据表明 10 万年前在非洲和西亚已经存在现代解剖特征的人类，由于世界各地古人类演化并不同步，因此并不能得出非洲或西亚是现代人类起源地的结论。就东亚地区而言，地区连续进化的说

① 吴新智：《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人类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② 刘武：《第三臼齿退化及其在人类演化上的意义》，《人类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

法似乎更具说服力^①。

1999年,刘武对第四纪中国境内人类牙齿大小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世界其他地区人类牙齿的测量数据进行比较,指出中国古人类演化中显示牙齿尺寸缩小的趋势,具有与世界其他地区人类不同的特点。首先,进入晚更新世之后中国古人类牙齿大小及变化特点与欧洲同期人类有明显不同,提示当时东亚和欧洲的人类是类型和体质特征上差别较大的人群。其次,中国晚期智人及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牙齿尺寸与西亚的早期人类相比差异极为明显,因此很难得出东亚和欧洲的早期现代人起源于西亚的结论。而对中国境内人类牙齿测量的数据分析,中国直立人与早期智人在牙齿大小尺寸上极为接近,两者的曲线几乎重合,这无疑意味着东亚地区的智人是由当地直立人进化而来的^②。

尽管古人类学家试图强调中国古人类演化的连续性,但是以研究今人为主的体质人类学家张振标从早期智人到现代时期中国人颅骨特征变化的数理统计分析中却得出了十分令人玩味的结果。张振标指出,从颅骨面部主要尺寸时态变化趋势的比较表明,中国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南北地区人类的颅面部尺寸的变化不一致,南北两地区人类颅面部尺寸的时态演化中呈现逆向变化的趋势。因此,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之间在体质形态上存在不连续的演化。早期智人以高而宽的面形、眶形和鼻形以及不前突的面部为特点,晚期智人以低而中等宽的面形、眶形和鼻形以及向前突颌的面部为特点。这种体质特征的不连续性,也许暗示中国的晚期智人不一定是由同一类早期智人演化而来。虽然,张振标以推测北方的晚期智人可能源自大荔人和金牛山人,而南方的晚期智人可能源自马坝人来解释这种不连续性^③,但是面对“夏娃理论”的挑战,这种不连续性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解释?

蒙古人种或现代中国人的直线演化也受到了其他案例分析的挑战,新英格兰大学古人类学家彼得·布朗于1998年撰文指出,山顶洞101号头骨和柳江人不是现代的或新石器时代的蒙古人种,它们的测量数据以及颅骨面骨的

① 刘武:《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② 刘武:《中国第四纪人类牙齿大小的演化及其意义》,《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张振标:《现代中国人起源的实证》,《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2期。

形态特征都不在蒙古人种的变异之内，因此他们不能被认为是蒙古人或任何现代东亚人群的祖先。这一结论显然为那些坚持中更新世的中国化石人类到现代蒙古人种之间存在连续演化的人们设置了障碍^①。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中国古人类演化的复杂性超出了我们以前的想象。化石人类的个体总有一定的变异，对不同变异的观察和判断也难以避免成见的干扰，因此如何从这些特征性状的异同来分辨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重建人类在东亚地区的演化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面对“夏娃理论”的挑战，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可能需要做更深入的工作来检验这一假说的可信度。中国目前缺乏距今 10 万年~4 万年之间的古人类化石，而这段空白地带正是现代智人在中国起源的时间。这段空白究竟是受化石材料保存条件所制约的考古学可见度的影响，还是取代论所假设的外来人种入侵的结果，无疑是让世人拭目以待的一大科学悬念。

四、考古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从目前的旧石器考古学的证据来看，中国的旧石器文化还没有可以作为晚期智人被外来人种取代的确凿考古学证据。但是，这种影响很可能有两种原因所导致。一是人群的变迁可能难以从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特点上来找到确切的依据，像打制石器这样的技术其变化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受生态环境、区域性石料种类的分布、生存资源和不同阶段古人类群体学习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不会囿于人群的传统和习俗而固守某一种生产方式。二是我们目前的石器研究水平可能还不足以辨认人群变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因此，如何从考古学分析来深入探讨分子人类学提出的新问题，是广大考古工作者应当努力的方向。

打制石器分析不足以解决人群变迁的问题在考古学上不乏其例。比如，美洲大陆印第安土著是来自亚洲大陆的蒙古人种是不争的事实，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确认美洲土著在更新世末至少有 4 次大的迁徙浪潮，跨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②。其中除后来一次迁徙从亚洲带来了细石叶技术可以明确追溯其渊源或文化传统之外，其他几次均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特别是 1 万年前古印第

① 布朗·P.：《最初的蒙古人种吗？》，《人类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② Turner, I. I., Dental evidence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Americas.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Research Report*, 1985, 19: 573—596.

安文化的克罗维斯和福尔塞姆尖状器工艺几乎在亚洲无法找到任何传承的线索，以至于使有些考古学家到欧洲的两面器技术中寻找其渊源，这个问题在新大陆的考古中成为很大的一个悬念。另一方面，被中国一些考古学家用来挑战“莫氏线”的手斧也未必一定来自西方，因为迄今为止限于形态上的分析与讨论，还没有说明这种并不复杂的打片技术为何不会在中国本土上独立发明的理由。

1987年，黄慰文根据中国发现的类似西方两面器技术，提出中国、东亚和南亚不缺手斧，这类器物在欧洲与非洲手斧文化的相似之处，可以填平东西方文化上的“鸿沟”，证明两大地区的文化交流早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就已经存在^①。作者提出这样的看法，并不是意在挑战中国古人类一脉相承的定论，而是因为传统文化历史考古学将追溯某种文化现象的渊源看作是最有意义的工作。

仅根据一些文化特征表面相似来断言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而不考虑其他种种可能性的极端传播论在西方早已受到质疑。为了要证实文化现象的历史关系，我们必须排除被比较的器物是趋同发展结果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考古学家常常无法分辨独立发明和共同起源所导致的文化相似性，因此单分析式样和功能会使他们无法确定这两个因素到底是哪个起作用。

考古学界十分重视人类学家格雷伯纳(F. Graebner)提出的“质量”和“数量”标准作为分辨文化趋同和共同起源的依据。所谓质量标准是指一种文化特征愈复杂，那么就有愈大机会来证实其共同的起源，而所谓数量标准是指两个地区文化性质上相似的数量愈大，它们之间存在历史关系的机会也愈大。特里格也指出，为了确定一种历史关系的可信度，被比较的特征必须是非功能性的，如箭镞常被有限的几种材料制成，形状上的变异十分有限，所以它们可以被多次重复发明。此外，分辨传播和独立发展的另一个标准是分布的连续性或区域间交流容易程度^②。

现在我们根据“质量”“数量”和连续分布3项标准来审视中国手斧的问题。

1. 就质量标准而言，迄今中国发现的所谓手斧都是硬锤加工的尖状重型工具，表现为深凹的片疤、刃缘不直、轮廓不规整。虽然它们与欧洲和非洲

^① 黄慰文：《中国的手斧》，《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布鲁斯·特里格：《论文化的起源、传播与迁移》(陈淳译)，《文物季刊》1994年第1期。

早期的阿布维利手斧有技术上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这类工具并不需要十分复杂的加工技巧和步骤，而且其形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使用的功能，具有一般打制石器技能的人都可以制作。所以，仅仅根据这类工具形态上的相似，仍无法排除它们之间独立发明的可能性。

非洲和欧洲的进步手斧，或阿休利手斧主要的工艺表现为软锤的去薄工艺，这种工艺步骤需要仔细的台面修理和敲琢，器物的片疤常横贯器身，而软锤去薄的废片很薄、台面小、打击点散漫、台面的破裂面边上有外突的唇沿。林圣龙在对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软锤技术进行探讨之后，认为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中软锤技术十分稀少^①。在中国发现的9件手斧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林圣龙描述了它们的主要特征：(1)是一种重型工具；(2)用硬锤两面打制；(3)形状不规范；(4)刃缘不规则；(5)把柄处不加工；(6)横截面厚；(7)主要使用部位在坚韧的远端。进而他认为，中国迄今仅见一件类似于西方的手斧是从地表捡的，没有地层和年代依据，因此，在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中像典型的阿休利手斧那样的石器，即使不是完全缺乏，也是十分稀少的。中国与欧洲旧石器工业是差异很大的文化，无论在类型还是地质时代方面都看不到存在什么关系^②。林圣龙的分析应当是十分到位的，显然从质量的标准来看，要把中国的手斧与西方的阿休利文化拉上关系似乎还缺乏有力的依据。中国的手斧只要将传统单面打制的砍斫器翻过面来加工，并打出一个尖的刃端即可。这样的发明只需改变一下打片习惯就可以做到，并不一定需要来自非洲和欧洲人类的启发。

2. 就数量标准而言，虽然目前报道了产手斧的3个区域和11个地点，但是总的来看大部分地点出土的手斧数量比较零星，而且年代也并不一致。其中百色例外，目前发现的石器地点近70个，采集石制品达7000件，经研究的手斧已超过100件。通过对百色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进行的裂变径迹法测定，得出百色旧石器的年代为距今73.3万年^③。

① 林圣龙：《关于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软锤技术》，《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② 林圣龙：《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③ 谢光茂、林强：《百色旧石器的发现与研究》，见《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1年版。

虽然一些学者认为百色的手斧是真正的手斧，但是单根据测量数据和形状本身的描述是解决不了趋同和共同起源的问题的，何况百色手斧也不见软锤技术的迹象。林圣龙指出，百色发现的手斧没有一件出自地层，全部是地表的采集，因此根据土壤地表下 1.2 米处采集的玻璃陨石样品得出的绝对年代不能代表手斧的年代，侯亚梅等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百色旧石器》一文中提出的对“莫氏线”的挑战缺乏立论的基础^①。

3. 关于连续分布的证据问题，黄慰文指出东亚、南亚和其他地区都不缺手斧。比如，朝鲜半岛的全谷里、爪哇的巴芝丹文化，原手斧和手斧占 8.06% 和 6.32%，印巴次大陆的索安文化和马来半岛的谈边文化也存在手斧，此外俄罗斯中亚地区和蒙古高原的阿尔泰地区也有手斧^②。但是，在没有对这些被称为手斧的标本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比较，分辨它们之间的异同，并确认它们传播路线的前提下，单单以存在形态相似的标本还不足以断言它们的共同起源。要说明手斧的西方起源，必须证实它们在某一时期在地理上是连续分布的，这种证据应当有一系列的考古遗址，并有断代依据的支持。在没有将这些凌乱的发现用时空框架的证据联系起来之前，任何有关文化关系的说法仍然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综上所述，中国的手斧仅和非洲和欧洲的早期手斧或原始手斧有些类似，但和软锤技术生产的阿休利手斧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它们在数量上也比较零星和分散，出产手斧唯一较多的百色也都是地表的采集品；就目前中国手斧的分布来看，即使在大陆本土尚不足以确认这些不同地点之间的关系，更不要说弄清由西向东的传播路线了。因此就目前来看，把中国的手斧从趋同的角度来解释似乎更为可信，除非以后发现有更为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可以证实与西方手斧共同起源的可能性。

然而话又说回来，在中国迄今发现的旧石器中，还是手斧与西方的远古文化可以做一些对比，问题是我们目前拥有的材料、年代学证据和习用的类型学方法可能还不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就百色遗址的发现而言，锤击的手

① 林圣龙：《评〈科学〉发表的〈中国南方百色盆地中更新世似阿舍利石器技术〉》，《人类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② 黄慰文：《中国的手斧》，《人类学学报》1987 年第 1 期。

斧以相当高的频率出现，表明一种有共同标准或习俗制约的生产方式。由于这些手斧都为地表分布，它们的年代就可能比较晚近，而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如果它们的时代可以晚至和“夏娃理论”走出非洲的时代相吻合，也许就百色手斧的探讨来说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但要检验这样的假设，我们必须进行严密的研究和采样设计。

检验中国人非洲起源的假说，也有一系列文化人类学的问题需要回答。如果说，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不是本地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后代，而是来自非洲的外来人群，而且这一过程表现为取代而非融合，那么我们需要解释中国原来的居民到哪里去了。

文化人类学的人口迁徙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向无人区的扩散，如更新世末蒙古人种越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这种迁徙因为新大陆没有人类，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古印第安人大约在2万年前进入阿拉斯加，在1100年前已到达火地岛。但是，人群的迁徙要越过已经有人栖居的区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人类学家一般认为外来者很难越过已被占据的土地，特别是一种人口的完全置换。这要求当地居民在外来人口移入的过程中完全被消灭，不发生任何的基因交流。这种人群迁徙的模式仍然难以令人置信。欧洲殖民者占据美洲，使美洲土著居民人口锐减90%以上，除了战争与屠杀之外天花是一个致命的因素。即便如此，欧洲人仍未消灭印第安人，而且发生了广泛的基因融合。

同样从遗传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来看，日本也发生过多次从大陆来的移民浪潮，现在的日本人和史前的绳纹人并无传承关系，但是绳纹人的子遗仍然在北海道的虾夷人群之中被保留下来。史前人口的移动更有可能是小股人群的随机渗透，而非大规模的定向征服和蚕食，因此要以小吃大来完成整个亚洲人口的取代，需要有某种更好的理论依据和考古学实证的支持。

五、思考与结语

从目前来看，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之间对于“夏娃理论”和中国人起源问题的讨论仍然各执己见，其中古人类学家的立场显得尤为明确。在2000年1月1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了吴新智对“重写中国人史前史”的反应，他说，遗传学家不只要关心软材料，而且要对硬材料予以更多的关注。晚期智人走出非洲的理论或许对欧洲来说是事实，但是中国则完全是不同的演化过程。现代人类在远东的演化以本地人种延续为主，外来人种杂

交为辅^①。

不久前，立足于线粒体 DNA 提出的“夏娃理论”得到了根据 Y 染色体研究得出的“亚当理论”的支持。一项由 19 项信息更为丰富的 Y 染色体指标被用来揭示东亚人群父系传承的遗传学研究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完成。由于变异相对较小，用 Y 染色体指标来重建人群的遗传历史长期没有进展，直到一种更有效的测定方法——高性能液相层析法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被引入之后，这一领域的探索才有了进展。在过去几年里，大量 Y 染色体指标被分辨出来。通过对包括 21 个中国不同民族的人口、22 个省份的汉族人口，3 组东北亚人口，5 组东南亚人口，以及 12 组非亚裔人口在内的大量样本的分析，表明东南亚人口要比亚洲北部的人口拥有更大的变异。这意味着东南亚大陆应是东亚现代人群最早的定居点。根据 Y 染色体变异速率的推算，晚期智人进入东南亚的时间大约在距今 60 000~18 000 年，紧接着开始了向北方的迁徙过程。与此同时，另有一批晚期智人群体从东南亚开始向南迁徙，进入马来西亚和印尼并到达太平洋群岛。为此，Y 染色体分析的结果与线粒体 DNA 的证据吻合，进一步证实了“夏娃理论”和东亚人口自南向北迁徙和扩散的模式^②。

“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论”为 21 世纪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提出了一个意义极其深远的科学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地区看来不是在华北的黄河流域，而是在我们先前认为旧石器发展脉络不清的华南地区。在过去 70 年里，以周口店发掘为起点的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建立起以华北为中心的演化模式，表现为泥河湾早更新世地点为代表的直立人，经蓝田人、北京人、许家窑人、大荔人、金牛山人、峙峪人和山顶洞人为主要脉络的演进谱系。对“夏娃理论”的进一步检验也许会完全改写中国这一史前史的发展模式。

“走出非洲”或“夏娃理论”是立足于现代人群线粒体 DNA 和 Y 染色体等遗传物质突变速率推算所得出的假设，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用发现的考古材料来对这一假设做进一步的检验。西方学者对遗传学的研究结果和结论

① Spaeth, A., Rewriting prehistory—a team of researchers concludes that Chinese, like everyone else, came out of Africa. *Time*, 2000, January 17, 45.

② Jin, L. and Su, B., Natives or immigrants: modern human origin in East Asia.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000, 1(2): 126—133.

抱有较大的信任感，相对来说考古学分析的主观性较大，而且人类的文化变异完全不同于生物变异，给多角度证据的检验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我觉得目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中国人起源问题上需要留意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努力寻找缺环。在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过渡环节上，中国的古人类化石材料还存在缺环，特别是距今 10 万年~4 万年的材料尤其关键。这一阶段在绝对年代测定技术上也存在一定的“盲区”。如果晚期智人首先进入华南，那么我们应当在今后的田野工作中特别留心与此相关的材料，把寻找能够检验“夏娃理论”的考古材料放在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肯定或否定这一理论的确凿证据，那将成为世界考古学界和科学界的一项轰动成就，其影响绝不亚于 73 年前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

第二，提高研究水平。在旧石器研究上采取更加细致和严谨的方法，以关注人类行为和技术的变化。过去我们所习用的文化分析线条过于粗略，根本无法观察到能够反映人类行为和适应方面的细微变化。如果要检验“夏娃理论”，就需要在石器的文化分析上取得突破和改善。就目前的旧石器研究来看，我们还不足于系统观察伴随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过渡所发生的可能变化，人类文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两种不同人类群体的取代应当会从他们文化传统上反映出来。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人类的文化适应也可能使他们的技术和工具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当他们迁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像打制石器这样的原始工具，其形态特征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适应行为，而不是文化传统。

第三，重视学科交叉。在“夏娃理论”的检验上采取学科联合的途径，也就是希望我们的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们联手进行这项重大课题的攻关。遗传学证据是软材料，而考古学证据是硬材料，这两种材料的分析和佐证不应当对立起来，应当以力求获得共同科学结论为目标。这可能需要我们克服一种民族和乡土观念，以放眼世界的胸怀和中立不偏的科学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

（原刊《东方考古》第 5 集，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丁村遗址六十年与旧石器考古范式的变迁

一、前言

丁村遗址自 1954 年发掘至今已有 60 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丁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周口店发现后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第二座里程碑。它在我国旧石器考古上的重要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表述：它是继北京中国猿人遗址后发现的最大的旧石器地点；它是在华北地区发现的、与周口店洞穴遗址不同的旷野遗址；它的石制品特点与北京人石工业迥异；它在年代上是中国猿人之后、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文化遗存，在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上处在承前启后的地位；与周口店遗址不同，它是完全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和研究的遗址，而且 60 年来没有中断。因此，丁村遗址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中国旧石器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发展。本文想利用纪念丁村遗址发掘 60 周年的机会，对中国旧石器研究范式的进展做一简单回顾，并借鉴国际学界的范式变迁，对今后的学科发展提出些许期望。

丁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在裴文中和贾兰坡率督下进行的，可以看作是周口店研究的继续。就当时研究目的而言，因我国旧石器时代发展脉络不清，所以参照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经验，遂以建立文化分期为鹄的。裴文中曾说：“中国史前史上，虽有上述（指周口店和山顶洞）之重要发现，但其分期之简陋，若与欧诸之史前分期想比，则相差甚远。我们确信，中国尚有若干史

前期，至今尚未发现，这就是我们将来之工作，也是我们将来之希望。”^①在研究方法上，裴文中则强调“中国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和旧石器文化分析”^②的重要性，他强调，“作为基本的方法问题，我们主张不要从石器形态的类以上着眼，而要用地质学的根据来进行对比，即以第四纪动物群的总体进化的各阶段为基础”^③。于是，中国的旧石器研究便和第四纪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一起，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方法论“四条腿走路”的范式，并充分体现在丁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在研究态度上，裴文中还告诫我们，“一个史前学家的的工作：1. 搜集与史前人类有关材料；2. 整理这些材料；3. 推论和解释这些材料的意义。至于推论一项（即英语所谓之 interpretation），即对所有材料加以正当解释，无论解释和推论，均必须在可能范围之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牵强附会，不可视小为大，不可无中生有，不可舍此就彼，更不可伪造证据，以求自圆其说”^④。

在过去的 60 年里，丁村遗址的发掘、发现和研究工作从未停止，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这些工作的进展主要可以几项阶段性成果为代表，首先以裴文中等撰写、1958 年出版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为开山之作^⑤，之后有张森水 1993 年发表的《丁村 54：100 地点石制品研究》^⑥和王建、陶富海和王益人 1994 年发表的《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⑦。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新的理论方法也在丁村的研究中进行整合性尝试，并集中体现在 2014 年出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丁村旧石器时代

①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史前研究》1983 年第 2 期。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裴文中：《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裴文中：《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史前研究》1983 年第 2 期。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⑤ 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⑥ 张森水：《丁村 54：100 地点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3 年第 3 期。

⑦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 年第 3 期。

遗址群：丁村遗址群 1976~1980 年发掘报告》^①之中。下面对这些阶段性成果在构建中国旧石器研究范式上的作用做一回顾。

二、丁村与中国旧石器的研究范式

上面提到，裴文中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提出了四条腿走路的方针，因此 1958 年的丁村遗址发掘报告就是按这一范式撰写的。第四纪地质学与动物化石将丁村地质时代定在晚更新世早期（虽然有些地点时代可能较早），人类化石属智人类型，石制品所反映的文化属性则以打击技术、石制品尺寸和器物分类进行描述，认为丁村遗址虽然有个别地点发现有较小的石制品，但是大多数石器都属于中大型的^②。丁村文化是在继承了早期文化发展起来的一种旧石器文化，其打片技术和石器类型与欧洲的莫斯特石器毫无共同之处^③。

我国这一时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虽然与自然科学和古人类进化关系密切，但是在文化遗存的研究上仍然受我国考古编年史学的影响，认为人类的史前史是古代史的向前延伸，而古人类的这种历史是以发展阶段或分期来表示的。因此，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也可以归于现在所谓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畴。但是，最初由莫尔蒂耶在法国建立的旧石器时代分期却是进化考古学的产物，继而由步日耶加以完善，分辨出不同时期共存的不同文化，如阿布维利与克拉克当同时、莫斯特与佩利戈得同时等，并将其视为不同人群的文化遗存。后来博尔德用优化的类型学来分辨不同的莫斯特工业以对应不同的尼人群体，从而开启了旧石器考古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

由于 1949 年后的中国旧石器研究对博尔德的工作所知甚微，加之我国旧石器考古尚处在材料发现和积累阶段，旧石器文化发展脉络不清，文化面貌与法国及欧洲的迥异。因此，这一阶段我国的旧石器研究仍然秉承周口店和丁村研究模式，以建立史前文化的分期和序列为目的，并借以构建中国史前史的演进脉络。

① 山西省考古所编，王益人主编：《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 1976~1980 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 邱中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见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邱中郎、李炎贤：《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20世纪60和70年代，随着华北旧石器新地点的发现和新材料的积累，特别是诸如匭河、许家窑-侯家窑、峙峪、小南海、萨拉乌苏河、西侯度、鹅毛口、虎头梁、下川等地点的发现，使得贾兰坡从文化一般性演进的视角，尝试构建中国旧石器发展的分期与传统。这些新发现地点的石制品显然都是将先前发现的周口店和丁村的石器遗存为参照来进行比较和思考的。而周口店与丁村石制品的明显差异，使得贾兰坡首先在1972年峙峪遗址发掘报告中提出了第1地点-峙峪系传统的雏形^①，继而在1976年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发掘报告中完善了两大传统的框架，将其看作是基本与丁村文化并行的一类文化。该框架以石制品大小为分野标志，一为“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或称“匭河-丁村系”，二为“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或称“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②。这一模式的构建虽然是中国学者的首创，但是其中似乎有莫氏线的影子，即将南亚、欧洲与东亚的旧石器传统以器物类型来加以区分，将前者定义为手斧或两面器传统，后者为砍砸器传统^③。华北旧石器两大传统很快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当然也有明显不同的看法。比如，裴文中和张森水认为，华北与华南的旧石器均来自中国猿人文化一脉，是同一文化传统中的不同文化类型，其对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更大，主要以小石片工具将各旧石器文化发展环节连接起来，显示出不同的亲疏关系^④。虽然后者的看法与前者有所抵牾，但是以石制品大小作为构建文化传统和工业的标准并无不同，只不过是如何看待石制品大小，及哪种看法更具权威性之别。

1990年，张森水发表了对丁村54：100地点石制品的研究结果，通过石制品大小测量的统计，根据完整石片，小型占65.38%或64.37%，大型的占18.46%或17.35%（前者指全部石片，后者指完整石片[两项统计的百分比相加都不到100%——笔者存疑]）。于是，他提出了重新认识丁村文化的问题，认为丁村文化中，至少54：100地点的石制品与中国猿人文化同属一脉，认

①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③ Movius, H. L., The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s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8, 38(4): 329-420.

④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为丁村也应归属于他所定义的北方主工业的成员和发展环节之一。这项研究还注意到了埋藏学、石料和人类行为的问题，其一是根据器物磨圆特点，认为石制品受到过水流的搬运，有的小石片可能被流水带走。其二是认识到石制品大小是石料不同的缘故，周口店多采用较小的脉石英，而丁村为大块的角页岩。其三是在研究石制品中使用石片较少，推测制作好的工具可能已经被人携往他处，留在原地的是大量初级产品和废弃物^①。虽然研究者有这样的积极思考，遗憾的是并未将其作为影响工业组合特点的要素而结合到对不同地点石工业的观察和比较中去。

丁村 54: 100 地点石制品的研究结果被张森水用来论证他先前设想的北方主工业的依据。他认为，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只有一种以北京猿人文化为代表的小石器工业，中期存在以小石制品工业和中型石制品工业两个支脉，而将丁村 54: 100 地点石制品作为丁村遗址群的代表而划归小石器工业之中，而中型石制品工业仅以四道沟地点为代表。晚期分为直接打制的小石器工业和长石片-细石器工业。于是，他将华北的所有旧石器时代的工业和组合都看作是小石器工业的成员，统称中国北方主工业，并认为该主工业定型于北京猿人时代晚期，由于中国古人类的文化遗产，加之对环境的适应，一直生产着相似的石制品。并认为这是古人类“善于继承，疏于创新”的结果^②。

值得指出，将“工业”这个术语涵盖华北整个旧石器时代的主要遗存，存在与其定义和用法不符的问题。欧美旧石器考古中一般用“工业”代替“文化”，是因为旧石器时代遗存不像柴尔德所定义的考古学文化那样，具有陶器、石器、葬俗、房屋式样等一批反复共存的文化特征^③。于是，工业或石工业便被用来定义“一套人工制品，它们因特定器物类型的反复共生而被视为同一批人群的产物。这一术语只限于单一的器物类群，如莫斯特工业”^④。维基百科的定义是，“工业是史前考古学研究中赋予与单一产品相对应的组合名称，例

① 张森水：《丁村 54: 100 地点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3 年第 3 期。

②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

③ Childe, V. G.,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④ Champion, S., *Dictionary of Terms and Techniques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Everest House Publishers, 1980.

如朗代尔手斧工业”。由此可见，工业是与某单一器物组合(assembly)或某种工艺技术(如手斧和勒瓦娄哇)相对应的术语和较小的分析单位。将华北整个更新世的旧石器称为北方主工业，显然与作为旧石器考古基本分析单位的科学定义不合。

1994年王建、陶富海和王益人发表了《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对丁村遗址从1976年至1980年的发掘成果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报道。在这份简报中公布了汾河流域的旧石器地点从1954年发现的11处地点增加到26处，而其时间范围也从当初认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早和向晚扩展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丁村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段，因此建议用“丁村遗址群”来加以命名。这项研究从时空上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丁村文化的认识，并对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与传统、埋藏学问题、原料对文化面貌的影响以及旧石器工业的区域差异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与研究。该报告认为，丁村文化的早、中、晚三段对应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基本承袭了一种以角页岩制作的大石片工具和大尖状器为主的石工业特点，并在晚期出现了以燧石制作的细石叶工艺及各种精致小石器类型的组合，以77：10地点为代表。该项研究的一个新认识是，汾河流水对各地点石制品进行过明显的搬运和分选，因此自上游至下游，诸地点的石制品显示有自上而下变小的趋势。所以，某些地点显示出来的石制品趋小的特点是自然动力改造的结果，不能作为文化特征来看待。因此，以石片测量结果断言丁村文化性质的异同显然毫无意义。简报还从石料对石制品的制约，对华北区域旧石器工业的差异做出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丁村石工业与中国猿人遗址及桑干河流域的石工业之间并无可比性。因为，汾渭地堑有良好的质地均匀的角页岩和石英岩，适合制作大型的石片和工具。而中国猿人主要利用很小的脉石英作为原料，这类石料只能用砸击法处理，而且有一种粉碎性倾向，所以工业面貌以小型为主。桑干河地区也是如此，因此两种不同的石工业，其大小特点主要是由于原料的制约所造成，不宜作为定义文化传统的标准^①。

在丁村石制品的研究中，王益人对贾兰坡的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进行了

^①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

反思，在充分肯定了贾老“两大传统”学说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从描述走向阐释的重大意义之后，他认为石制品的大与小仅是一种表象，并不一定是由人刻意造就的。换言之，石器的大小不一定是文化传统或是由人文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类受制于自然环境的一种产物或表现，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应当从遗址的形成过程、埋藏过程和动态复原去考虑那些已经丢失的成分和信息，并对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多角度的分析^①。由此类推，张森水用测量数据和主观标准来划分石制品大小，进而以石制品大小的百分比来定义中国北方主工业的断言，也值得作如是观。

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1976~1980年发掘报告》在纪念丁村遗址发掘60周年之际面世，与1994年的简报相比，2014年报告体现了旧石器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类型学是考古器物整理和分析的一种基本方法，但是常由于标准因人而异而饱受诟病。为了克服这个问题，王益人借鉴国际流行的分类法，对类型标准进行严格的定义和界定，并采纳“操作链”的概念进行动态分类的尝试，为石片、石核和刮削器建立了一套严谨的系统分类模型，并借鉴国际流行标准对石制品加工修理特征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定义，为丁村石制品分析建立了科学的标准。为了建立动态类型学，必须了解剥片程序。王益人在丁村花了大量时间来进行角页岩的打片实验，不但由此建立了一套符合工艺流程的石制品分类法，而且对当初认为丁村大石片多采用碰砧法的看法进行了修正，认为丁村大型石片主要还是用锤击法打制的。报告不但对石核、石片和加工制品进行分析，而且对打片废弃物如断块和碎屑进行统计，用以评估遗址的埋藏环境和石制品堆积动力。2014年报告还注意石器地点的分布与埋藏学特点，了解遗址的形成过程、分析石料的种类和来源，为了解古人类在遗址周围的活动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报告提供了267页的石制品观察测量数据列表，注明台面、形状和背脊的特征。这相对于过去分类仅限于简化描述是一个重大进步，使得每件石制品的基本信息都能够保留下来。

^① 王益人：《贾兰坡与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3期。

最重要的，是科学理念和学术思维的进步。在报告撰写的漫长时间里，主要作者不断反思过去研究方法的不足，潜心学习法国和北美的旧石器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日本学者的考古报告，特别是博尔德旧石器类型学和中美联合团队发掘泥河湾东谷坨的成功经验，将中国旧石器研究传统的静态描述和分类转向动态的行为重建。最值得称道的是，王建从观察丁村石片上第一个领悟到石片背脊在石核剥片过程中的控制作用，以及对石片形状的制约。古代工匠如要获得理想的长石片或修理平整的石器，都需要注意石核棱脊的分布和走向，并刻意预制棱脊和台面。正是这一认识，使得下川细石核的动态分析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

2014年报告体现了王建和王益人父子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和20年的心路历程。王氏父子可谓是无师自通、永不满足的学者。王建虽师从贾兰坡，但是他在师父领进门之后，全凭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树立起他自身的学术声誉。他思想开放、乐于吸收最新理论方法，从不抱旧守拙，所以他的研究总有亮点，常有突破。王益人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和治学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进取。这本报告的面世既是益人对先父的告慰，也是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一座新的丰碑。

丁村旧石器研究体现了学界对史前文化演进探究不断深入的漫长历程。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史前人类及他们文化的观察与研究带有太多现代人想当然的臆断，特别是对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行为和文化分析，这就难免堕入裴老所告诫的“牵强附会”的窠臼。由于史前人类的文化只有石制品和骨头遗存残留至今，于是我们往往会将它们所有特点看作他们的文化特征，没有意识到古人类的智力及行为方式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还有我们所研究的石制品大多是制作工具的废料，所含的文化及行为信息非常有限，加上受各种石料质地不同的严重制约及自然动力如流水和埋藏后地质动力的搬运和改造，其原来保存的丁点行为信息早已荡然无存。于是，考古学家设法从某些地点残留的石制品差异和比较来讨论和追溯人类进化和文化变迁难免像是盲人摸象，与事实差之千里。

史前史被等同为对异国陌生文化的研究，远古人类的探究更是一堆谜团。

许多遗存和现象完全无法为考古学家的经验和常识所理解^①。就旧石器考古而言，窥视远古的文化差异和变迁的原因远非比较石制品大小就能简单做到。已故著名的美国考古学家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对早期人类打制石器发展缓慢和缺乏变化也深感困惑，觉得在一百万年的漫长岁月里，打制石器变化很小，看来像是一种变化微弱和毫无方向的无尽蹒跚^②。至于考古学家所推崇的器物类型学在旧石器研究中也难免令人啼笑皆非，因为自微痕分析采用以后，人们发现古人类普遍将未经加工的石片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而考古分析所器重的各种二次加工的所谓工具，其分类也未必名副其实，许多所谓的类型，其实是经过多次再生、变形、早已面目全非的废弃残留物而已。于是，希望用这类废弃物来构建所谓的分期、传统和文化单位并建立文化关系，借以构建史前文化变迁的脉络难免成为一种徒劳的操作。因为，类型学的方法论本身存在一种悖论，表现为两种原理体系——本质论/类型学的思维和唯物论/人群思维的合璧。即一方面将文化看作是人类独立的群体，并努力分辨和解释这类文化和群体，另一方面又将文化历史看作是一条诸多特征的河流，不断融合变化，从过去流向未来。这两种原理在具体分析中其实难以兼容。而考古学家用发掘的有限样本，以漠视许多差异而强化的文化同质性只不过是人为的幻觉和想象而已^③。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过程考古学的兴起集中表现了对考古学陈旧范式的不满。英国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说，这种对不尽人意现状的反思产生了学科意识的新认识，这就是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出现。在这个新阶段里，学者们对学科理论、方法、阐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从而提高了逻辑学、认

① Zimmerman, L. J.,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40th Harrington Lectur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Reprint in *The Second Score: The Harrington Lectures*, 1973~1992, Vermillio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Press, 1992, 289-302.

② Isaac, G., The earliest archaeological traces. In Clark, J. 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500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57-247.

③ Webster, G., Cultural history: a culture-historical approach. In Bentley, R. A., Maschner, H. D. G. and Chippindale, C. (eds.),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8, 11-27.

识论和理论思维的地位。战后几十年里是考古学学科环境和内容急剧变化的时代，相邻学科的互相碰撞改变着自己，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探索领域。以前习惯于依赖直觉工作的考古学家发现，先前的经验直觉在许多情况下是误人的。从而发现有许多我们原来想做的事实际上是徒劳的，是不值得做的，而有些事却在学科交叉的帮助下是大有作为的^①。

三、更新范式 继往开来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一门世界性学科，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旧石器考古从根本上说还没有摆脱历史留下的阴影。在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整个考古学科一样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成为置身于国际学科主流之外的一种封闭性技术操作。尽管老一辈学者对早期人类的古老性以及文化传统的源流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潜心探索，但是从旧石器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上来说，基本上承袭了裴老从法国带回来的那套知识而未有持续的提高与发展。

再者，我国旧石器考古学至今尚未建立严谨的研究范式，如在专业术语、器物类型、加工特点、分类和称谓上存在缺乏科学定义、标准不一、随意性极大的弊端。这种缺乏理论指导和分析技巧的研究，使得考古分析变成因人而异的操作，考古报告无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难以了解文化特点和进行时空上的比较。卫奇曾对这种缺乏科学规范的研究痛加针砭，他说，“研究工作既缺乏严密有序的科学定型系统，又缺少正确的逻辑思维，甚至有的研究者背离科学行为准则”，使得许多情况变得十分异常。研究报告中的分类和错误划分屡见不鲜，术语使用的混乱不但见于不同人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人的同一篇文章里。他认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有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也有行为浮躁和不实在的问题”^②。这些批评，确实切中时弊，值得我们深思。

我国这门学科与国际水平显示出来的反差令人汗颜，使人深深认识到封闭所造成的停滞与落后。当我们仍醉心于追求考古新发现，并对旧石器时代

^① Clarke, D. L., *Archaeology: the loss of innocence. Antiquity*, 1973, 47: 6—18.

^② 卫奇：《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检讨》，见芹沢長介先生追悼论文集刊行编《芹沢長介先生追悼考古·民族·历史学论丛》，六一书房2008年版。

向前推前、新地点的增加和原始材料的积累充满着成就感的时候，国际同行们却早在考古材料的信息提炼和人类行为的阐释上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这种信息提炼和人类行为重建的目标给旧石器考古学的发掘技术、田野采样和理论阐释带来了一次次的突破和冲击，并使这门学科在内部分支不断细化的同时，高新技术则不断向里渗透，成为学科交叉最广泛的领域。

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在弗朗索瓦·博尔德的倡导下完善了类型学方法，并将量化分析引入了旧石器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以重建史前人类行为模式和石工业生命史的“操作链”分析开始主导国际旧石器研究的趋势。与此同时，苏联考古学家西蒙诺夫(S. A. Semonov)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微痕来分析石器功能，进而探讨古人类的生产方式。微痕技术被北美的考古学家所迅速采纳，这一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劳伦斯·基利(L. H. Keeley)和乔治·奥代尔(G. Odell)两位美国学者从高倍法和低倍法两方面进行完善之后，成为当今国际旧石器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现在，微痕分析已经突破了工具用途的分辨，被用来探索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经济发展的过程，帮助解读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北欧，微痕研究结合加工技术和特定器物的分布被用来探索人群的交流与社会身份。

今天，这种多元手段采纳已成为世界旧石器考古研究的趋势。比如，南美阿根廷在经历了一段类型学方法的研究之后，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先是受法国后来又受美国的影响，大量的新研究突破了静态的形态描述，尝试探索主导石器技术过程的内在动力。学者们开始深究石器技术与功能，以及在史前社会技术结构中的意义，并力图从器物的生命流程来了解狩猎采集者甚至农牧民的生存背景。石料来源研究涉及原料的种类、可获性、打片的质量、成分特点，以及热处理等诸多方面。实验方法被用来研究不同的打片技术和器物功能分析。除了对石叶、尖状器等工具进行研究之外，拼合与空间分布在废片分析中非常流行。在具体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包括人群的流动性、空间的利用、技术策略和技术结构等。

在欧洲其他国家，类型学、拼合、功能和空间分析相结合成为主要手段来分辨考古遗址中的生产区、生活区、工具再生等人类不同的活动地点，了解古人类打片、狩猎技术和工具生产、使用、修理和废弃的方式。考古学家越来越强调系统的区域性田野研究，以充分了解遗址内部和遗址之间的空间

分布和考古遗存形成的动力问题。

在东非，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利基夫妇首先采取水平发掘的方法对肯尼亚一处阿休利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寻找活动面，观察文化遗存空间分布形态来提取早期人类的行为信息，从而成为标志旧石器考古田野方法变革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方法后来成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发掘的典范而在奥杜威峡谷等遗址的发掘中推广。此外，美国考古学家柯德曼(Desmond J. Clark)在非洲史前研究中大力倡导文化生态学，关注物质文化、环境与人类适应的关系。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与 70 年代，由问题指导的考古学研究开始走向成熟，考古学家开始从一般的归纳方法转向采用检验不同的理论模式来做演绎性探索。其中一位先驱性人物就是已故美国考古学家格林·艾萨克，他在东非早期人类遗址特别是库比福拉的发掘中首先尝试采用多学科途径来从事一系列的全新研究^①。

柯德曼于 1990~1991 年来到中国泥河湾进行发掘，为我们带来了水平逐层揭露的发掘方法，彻底改变了我国旧石器挖土豆式的无序刨掘。从此，我国旧石器的发掘开始走向规范。需要指出的是，柯德曼的水平发掘目的是寻找古人类的原始活动面，进而设法从活动面上的遗迹和遗存分布和相互关系来探究古人类的活动和行为方式。由于没有注意到泥河湾石器地点的有些地层是倾斜的，这样的纯水平发掘还是存在瑕疵，因此，水平揭露的操作过程不应刻板地遵循水平原则和规定厚度下掘，而必须随时做仔细观察和灵活调整，按照沉积的规律和原始地面的走向做逐层的揭露。再者，在详细记录了活动面的遗迹和遗存分布后，室内研究就需要根据这些信息来提炼古人类的行为及环境信息。最好用花粉和动物群信息来复原当时的环境，从石制品来了解人类加工和使用石器的行为(如石料的携入、加工或纯粹的屠宰活动)，从动物骨骼的破损及石器切痕来了解人类的肉食利用策略(如是狩猎还是尸食)，甚至从遗迹遗存的特点估算利用这个地点的人群规模和栖居长短。野外发掘是收集证据，室内分析是提炼信息。两者相辅相成，如果其中某些环节操作不当，研究就无法获得期望的结果。

^① Toth, N. and Schick, K. D., The first million years; the archaeology of prehuman culture. In Schiffer, M. B. (ed.),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6, 9: 1-96.

今天国际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领域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原料质地、来源和利用,石器打制技术的种类和实验重建,废片和拼合分析,操作链的行为动态研究,类型学命名与器物实际用途,微痕分析之外,还包括石器上残留的残渍和DNA分析,从石制品分布了解狩猎采集者的移动和生存策略,器物精致加工和权益技术在适应上的表现,技术和器物所表现的交流、手工业专门化和社会复杂化,工具和技术的取代过程、原因和背景(打制石器被磨光石器和金属工具所取代),器物的象征性和祭祀意义,早期旧石器技术所反映的古人类认知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发展。旧石器研究已经涉及人类行为、思想和社会、经济 and 意识演变的诸多领域,成为全方位解读人类史前史的重要领域。

贾兰坡生前曾说,我们的优势是地域辽阔,地层保存完好,越来越多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遗址相继发现,很多国外科学家都把眼光逐渐移向中国,他们也都想跑到中国来看看,寻找人类的祖先。既然这门学科是世界性的,那么它就会受到各国科学家的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项事业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一片光明的前景,也更能促进我国这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然而,就像国际经济和贸易合作一样,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也有它的游戏规则。目前我们还很不熟悉和适应这样的规则,将合作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其实并不妥当。如果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话,需要革除一些根深蒂固的陈规陋习,最好首先能打破行业内的人为藩篱。中国搞旧石器的专业人士本来就屈指可数,如果连国内同行间的一些合作问题尚难达成共识,要虚心学习他国的长处又谈何容易!

经过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但是正如卫奇和陈哲英所言,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仍然还没有形成严密有序的科学系统,研究方法缺少正确的逻辑思维,一些研究者欠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①。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正如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在1985年访华后谈其观感时指出的,中国对史前综合性探索还没有同全球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多数的

^① 卫奇、陈哲英:《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反思》,《文物春秋》2001年第5期。

研究工作被臃肿的科研体制和缺乏理论能力和研究技巧的状况所束缚^①。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思想理念和学术规范上跟上时代的步伐。

在对 20 世纪考古学和史前学的回顾中，法国考古学家西格弗雷德·德·拉埃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考古学和史前学无论在研究目的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已经逐渐克服了草创时期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为缺乏知识训练的经验主义，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缺乏缜密性，以及在阐释上的主观性。目前这个学科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对方法论问题的日益关注，并不断对早期研究成果提出鉴定上的怀疑。至于研究技术，则越来越多地从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中吸取方法和手段。从学科研究来看，考古学和史前学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但是从研究和分析方法来看，却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于是，考古发掘在不久的过去往往不过是民工的挖土活儿，而现在，就其所需要的细密和精巧而言，简直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媲美^②。

在纪念丁村发掘 60 周年之际，回顾中国考古学历程和反思传统学科范式十分必要。我觉得，我国目前的旧石器研究仍需要对目前的工作现状深刻自省，特别迫切要在三个方面补课以便迎头赶上，并充分结合到每项发掘和研究中去。这三个方面就是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石器打制实验、文化生态学的思维。下面对这三个领域作一简单介绍。

1. 埋藏学与遗址形成过程

在旧石器考古中，我们会将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和其他遗物、遗迹看作是人类行为所致，如将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遗址看作是同一批人群栖居的场所，或将动物骨骼看作是人类狩猎或食用的庖厨垃圾。考古遗址在发现时早已处于被弃置状态，从被古人类栖居到被发掘出来的漫长岁月中，饱经地质、气候、生物和人类的种种动力作用，沧海桑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因此，单凭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表面印象而做的结论，难免与遗址本来的面目有很大的

^① 刘景芝译，裴树文校：《外国学者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春秋》2001 年第 10 期。

^②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考古学与史前学》，见《当代学术通观——当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主要趋势》（周铭扬、董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出入。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要把影响遗址和文化遗存堆积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从而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方式。迈克尔·希弗(M. Schiffer)是最早提出遗址形成过程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他提出了“文化改造”和“自然改造”的概念，认为一处考古遗址是由人类文化和自然动力过程共同塑造的。自遗址形成阶段开始，文化动力和自然动力就无时无刻不在对文化材料产生影响，它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行为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特别是遗址废弃后的扰动会导致考古记录呈现一种被扭曲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图像，造成我们了解和重建过去的偏差。由于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不存在有没有问题，而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考古记录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凝固的远古社会形态，而是受到破坏后的扰动状态。希弗指出，在对出土文化遗存做出行为阐释之前，分辨形成过程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绝不为过。屡见不鲜的是，许多考古学家将所见的遗物和遗迹归因于人类活动而非各种形成过程。如果首先关注形成过程，利用最敏感的各种证据，那么研究者就能确定沉积与研究问题之间的恰当性，并选择最合适的研究策略。可信的推断就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①。

美国考古学家伍德(W. R. Wood)和约翰逊(D. L. Johnson)指出，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关系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迹象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如果我们误读了这些关系或对这些关系做出了错误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出可信的考古结论^②。希弗还告诫，无论证据如何充分，考古学家仍无法直接从考古记录的形态中读懂行为和结构。为了替考古学阐释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就必须构建形成过程的各种新原理，并以一种周密和系统的方式应用到分析中去^③。

① Schiffer, M. B., Toward the identification of formation processes. *American Antiquity*, 1983, 48(4): 675—706.

② Wood, W. R. and Johnson, D. L., A survey of disturbance processes in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 In Schiffer M. B. (ed.),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1-4: 539—605.

③ Schiffer, M. B.,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7, 8—10.

丁村遗址群出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基本上都发现在河流相的砾石层里，其堆积、分布和大小明显受到水动力的长期改造和扰动，早已面目全非。因此，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大多不是它们最初废弃和沉积的地点。就像现在河边所见的垃圾一样，既不清楚它们从何处来，也不知道它们是否是同时丢弃的。因此，将丁村某地点出土的一批二次沉积的石制品看作是某种工业和组合的代表并不妥当，即使采用测量和数理统计来看待石片的大小和百分比也没有什么意义。

2. 石器打制实验

对于石器打制实验在考古研究中的意义，美国考古学家唐·克雷布特利(D. Crabtree)有这样的评述：“复制史前石器工具可以提供有关生产方法、工艺技术、甚至石器时代工具用途的信息。毫无疑问，实验复制有助于类型学家，而功能实验能了解工具如何及为何这样使用提供关键的证据。通过实验，我们不仅能定义工艺技术，而且也能评估一件工具的完成要经过多少步骤，考虑那些工具破损、畸变和再加工的意义。”^①

美国考古学家凯西·希克(K. D. Schick)和尼古拉·托什(N. Toth)指出：“实验考古尝试利用与古人类采用的相同原料、技术和策略来复原古代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从而使我们能够详细探究古人类如何制作他们的工具，这类工作有何种难度，需要多少时间，会产生何种副产品，何种类型对完成某种工作是有用的，以及它们的功效如何，在使用中它们是如何破损的，总之，这些技术是如何与他们的生活相适应的。”^②

在我国的石器分析中，研究者经常根据器物形态、台面和石片疤的特征来判断工艺技术，以便对它们进行分类。或判断这些石片和工具是否是用直接法、间接法、还是用压制法加工的，而这些特征又被作为一种依据来追溯石器工业之间的传承和接触。其实，能够制作石器的石料不多，加工方法有限，所含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十分有限。有的石制品很简单，而有的石制品的

^① Crabtree D, Comment on lithic technology and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In Swanson E. H. (ed.), *Lithic Technology*,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 1975, 105—114.

^② Schick, K. D. and Toth, N., *Making Silent Stones Speak*,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20.

形态特征仅仅反映了最后一系列的加工步骤。而对于一件工具，特别是精致的工具类型来说，它的加工很可能是多种不同技术综合使用的产物。娴熟掌握打制技术的考古学家，可能并不会像不懂石器打制技术的学者那样，特别关注台面或片疤分布特点以便将石制品进行分类和描述，而是关注它们是哪个打片环节中的废弃物，并判断其形成及废弃的原因。

打制实验可以让考古学家认识石料质地对打片过程和产品的影响。一些常见的硅质石料如燧石、火石、石英岩、黑曜石等在质地上有相当差异，而且同一类石料因产地和成分不同，质地也有优劣之分，这种特点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发挥和器物的形态。自然界中大小、质地合适的石料并不常见，这一因素会制约工匠制作石器时采用的技术、产品的大小以及质量。

克雷布特利强调：石器研究不应完全自以为是，专断独行。它最好将实验和结果与其他石器研究进行交流和对比，以便对史前打片技法取得共识。史前人类发明了成百上千种技法，对于我们来说是失传的艺术，没有一个人能够声称自己在这个领域是一个权威或专家。多年来我总结了所有实验者的努力，最终接近我们祖先的技艺。要记住，早期文化仅限于少量的技术，而当代的石器技术专家试图解决的是从奥杜威到石器时代子遗的各种技法。这将我们置于一个非常艰巨的地位，我们必须合力涵盖这段漫长的时间跨度^①。

我国的石器打制实验也是在丁村尝试得最为频繁和成功，王益人通过大量实验纠正了1958年丁村发掘报告中的某些观察结论，认为丁村的大型石片主要是用硬锤直接打击所致，而不是先前认为的碰砧法。总体来看，目前我们发掘报告的石制品分析仍拘泥于分类和描述，技术层面的观察也无非是直接打击还是砸击或压制，无法看出它们是打制过程中哪一步骤的产物。当下，操作链概念已被大家所认可，这就是努力从石制品来研究它们的生命史。但要真正做到这点，研究者自身熟练掌握打制技术必不可少。有了实验打制石器的经验，我们就能对石制品及其特征产生的原因心领神会，判定其在制作过程中的生命轨迹和废弃原因。

^① D. Crabtree, The potential of lithic technology. In Raymond, J. S., Loveseth, B., Arnold, C. and Reardon, G. (eds.), *Primitive Art and Technology*,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1976, 1-6.

博尔德说，“石器打制实验一定要成为每个对史前史感兴趣的考古学家所必须受训的一部分”^①。约翰·惠特克(J. C. Whittaker)说，“打制石器的实验能给予我们解释史前人工制品必不可少的知识，并借以作为管窥过去生活方式的证据”^②。归根结底，卫奇所痛陈的我国旧石器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错误，主要是研究者缺乏理论能力和研究技巧、没有拿过石锤和鹿角、不懂石片成因的缘故。当下，中国旧石器研究开始努力尝试从类型学的静态描述转向操作链的动态分析时，研究者亲手学会打制石器是这种研究的基本功和必要前提。

3. 文化生态学

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般性思维还是以历史学为导向，丁村文化与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这样的定义和概念就是明显的代表。虽然旧石器研究在手段上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但目标仍是编年史学的建构。中国学者习惯上从史学观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来看待考古遗存，并以此进行历史的重建。而另一方面，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也关系密切，特别在北美，考古学是人类学的分支。美国学者倾向于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待考古遗存。文化生态学就是从生态学角度来观察和解释人类的文化，其中当然包括打制石器。文化生态学研究人地互动，研究文化与环境的许多方面。这种视角把人类的文化和工具看作是人类用来解决自己生计问题的产物，是人类超肌体的适应手段。文化人类学把文化看作是习得的过程，虽有祖裔传承，但它在发展中会受环境变迁和文化交流而发生变化。因此，这是文化分析的一种功能观，并采用一种动态的系统论框架来看待文化与环境关系，了解文化在维持生计中所起的作用^③。

路易斯·宾福德说，考古学家在发掘和分析野外考古地点时往往持一种静态的观点，对它们进行孤立的观察和分析。然而，过去人类的行为，特别

① Bordes, F., Comments on A history of flintknapping experimentation, 1838 ~ 1976.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8, 19(2): 359-360.

② Whittaker, J. C., *Flintknapping: Making and Understanding Stone Tool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299.

③ Watson, P. J., LeBlanc, S. A. and Redman, C. L., The ecological view of culture.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An Explicitly Scientific Approa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88-107.

是狩猎采集者的行为，是高度流动的。所以，每个遗址或地点只不过是某些人群活动范围中有限而存在偏差的一个片断。狩猎采集者从来不会局限在今天考古学家找到的某个遗址范围里活动，而很可能覆盖 30 万平方千米。他们根据资源的分布和生计的需要，在不同季节利用不同的地点，因此，考古学必须从不同遗址的分布和特点来研究史前人类这种季节性利用的空间范围和生存策略^①。

从丁村遗址群的分布来看，沿汾河流域的各遗址可能都是不同时期古人类开采石料和进行初级剥片的地点，而有的可能纯粹就是二次搬运的异地堆积。古人类的栖息营地可能在附件的阶地或河漫滩上，他们在需要石料和水源时会来到河边活动。在更新世漫长的岁月里，在汾河边上活动并留下的足迹的古人类，绝非同一批人群和他们的后裔。由于角页岩的性质和打片及加工方法有限，所以我们无法从这些石制品中分辨出不同人群的足迹和文化特点，习惯于将它们归入同一个文化。比如，如果我们今天在汾河边练习打片，其他旧石器专家未必能够将这些现代石片与旧石器遗存区别开来。因此，从古人类的活动性质和人地关系来思考丁村遗址群，将其命名为同一种文化或将其从前后承袭和源远流长的传统来看待，可能都有悖于历史的真实。

四、小 结

在纪念丁村发掘 60 周年之际，回顾一下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反思这门学科目前在范式上存在的问题十分必要。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是由国际合作启动的。20 世纪初，许多外国科学家在中国进行考古学调查，或者是带着人类学、考古学、古动物学的兴趣作了田野调查，这些学者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早年周口店发掘过程中培养的两位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裴文中和贾兰坡，在其后几十年里一直领导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研究工作。而丁村的发掘和研究，就是这两位学者领导下的独立探索。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重启了中西学术交流的新纪元。过去 30 年来，许多国际合作项目在中国展开，引入了新的发掘方法和技术、并用新的理论探索中国的考古学问题。对于许多中国学者特别是对那些在西方

^① 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陈胜前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

受训的学者来说，西方考古学的所取得的进步凸显了一种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进行设计和规划多学科研究方案的必要性，并运用各种方法从事生存方式和栖居形态(settlement pattern 目前普遍译为聚落形态，但是对于旧石器时代流动的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的临时营地不宜被称为聚落，还是译为栖居形态较好)研究。这使我们想起裴文中，他所从事的埋藏学研究，就是在巴黎跟随步日耶接受各项训练的结果^①。

从旧石器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国际上这门学科的范式已经从类型学和年代学扩展到了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所采用的技术也借鉴了化学、物理、生物、遗传等自然科学的各种手段，研究的视野也从实证的器物分析扩展到了人类的意识形态层面，包括祭祀和认知等宗教和思维等活动。博尔德曾提出过“更新世学”(pleistocenology)的概念，体现了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古生态学高度综合的特点。博尔德强调，“包括我们自己的学科在内，没有哪一门学科是‘辅助’性的，所有学科都是相互辅助的。我们认为，外行的‘咨询’专家是不能胜任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所提及的三个主要学科的专家，即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同时通过训练能相互熟悉其他学科的问题，并且习惯进行长期协作。我认为，这是一个研究‘整体’，而不是研究专业的划分，这是首要的问题”^②。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奥法·巴尔-约瑟夫(O. Bar-Yosef)也指出，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层位学、年代学、石器工业技术等，长期以来难以摆脱早年发现的周口店研究的窠臼，而目前的研究正在试图纠正这种状况，打破前人的桎梏，为我们提供由国内外学者联手奉献的最新成果^③。遗憾的是，当下这种令人期待的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因此，中国旧石器考古亟须倡导理性思考和科学方法，掌握问题导向的逻辑思维，摆脱经验直觉和单向思维的束缚。比如，在石器分析中看某

① Shen, Chen and Keates, S. G.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179, Oxford: Archaeopress, 2003.

② 引自西格弗雷德·德·拉埃：《考古学与史前学》，见《当代学术通观——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主要趋势》(周铭扬、董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 Bar-Yosef, O., Preface. In Shen, C. and Keates, S. G.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179, Oxford: 2003.

工业石制品较小，马上断言属于北方主工业。或见到两面打制的大尖状器就认为与西方的手斧存在文化联系，是挑战莫氏线的有力证据。用有限的发现来讨论如此宏观和不着边际的问题，现在看来是徒劳和不值得做的。也许换个角度，如尝试采用文化人类学的问题导向，从人地关系来探究古人类如何选择石料和开拓各种食物资源，重建当时生态环境里的生存策略更有意义。

探究古人类行为的旧石器考古一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因为：(1)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往往仅限于石制品和动物骨骸，这些遗存本身所含的文化和行为信息相当有限；(2)大部分早期人类遗址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自然扰动和人为的破坏，这对于想从文化遗存的特点和分布来提炼早期人类行为的信息造成了巨大的困难；(3)早期人类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和现代人类存在显著差异，考古学家不可能也不应当用自己常识性想象去理解和解释文化遗存中所蕴含的行为意义。所以，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来说，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埋藏学、石器技术、实验分析、微痕观察、人地关系和遗存空间分布以及人类认知考古学的探索都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热切希望国内同行能够加快步伐，努力吸收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学习和应用最新的研究范式，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原刊《砥砺集——丁村遗址发现 60 周年纪念文集》，三晋出版社 2016 年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第三部分
农业起源研究

再读跨湖桥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以其较早的年代，丰富的物质遗存和蕴含的大量信息，受到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出土的独木舟、栽培水稻以及精美的陶器，极具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它们为我们了解 8 000~7 000 年前人类在钱塘江沿岸的适应生息，探索水稻栽培的起源和生态背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具体证据。同时，它也为我们探究新石器时代早期经济、资源、技术和社会复杂化问题提供了极具科学价值的样板。2002 年，跨湖桥遗址被评为 2001 年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5 年，萧山文化局和萧山博物馆委托复旦大学文博系为筹建中的跨湖桥遗址展示馆撰写信息主导型的展示方案。《跨湖桥》发掘报告已经提供了出色和全面的研究成果，然而科学研究与公众普及在信息要求上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后者需要一些更直观和生动的事例、数据和说明。为了向公众展现生态背景和变迁、先民的日常生息，乃至遗址栖居直到废弃的整个动态过程，我们觉得有必要对环境和文化的具体细节方面再做一些分析。在此，我们综合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尝试从环境、生计方式、陶器技术三方面对跨湖桥先民的生息与文化进行深入的阐释，了解其社会发展的层次和原因。

一、环境变迁

史前期的原始文化被认为是对特殊环境的适应，因此解读跨湖桥先民的生息和物质文化必须从他们的环境来综合考虑。我们采用从遗址中提取的生态物(ecofact)来了解古环境。比如，土壤粒度和微小炭屑的历时变化反映了

文化活动的强度和变化，有孔虫反映了全新世海平面波动及其对遗址的影响，花粉等各类微化石分析和真菌揭示了环境与植被的变迁。各项分析结果的综合显示，跨湖桥遗址的兴衰与海平面变化和周边水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1. 土壤粒度

土壤粒度分析对地表至 300cm 深的 6 个沉积层进行等间隔取样，显示整个剖面的沉积物都很细，以小于 $63\mu\text{m}$ 的颗粒为主，从上向下有变细的趋势，这种比较均一的粒度反映了水动力总体较弱。文化层的粒度值略有变化（表 1），上部平均粒度 $14.4\mu\text{m}$ ，中部 $19.8\mu\text{m}$ ，标准偏差增大，颗粒均匀程度不一。这一现象可能由文化扰动所致，也可能由地表流水侵蚀加大引起。下部粒度平均值较小反映一种静水环境，扰动很小。

表 1 跨湖桥土壤粒度参数

取样部位	平均值(mean)	中值(median)	峰值(mode)	标准偏差(s. d)
文化层上部 (88cm~198cm)	14.4	10.4	22.5	13.8
文化层 (198cm~240cm)	19.8	7.8	17.6	32.9
文化层下部 (240cm~292cm)	12.1	6.2	8.6	17.5

2. 有孔虫

有孔虫是带壳的海洋单细胞动物，对海水的深度、温度、盐度等反应灵敏，因此是理想的环境指示物。研究结果表明大量有孔虫集中在文化层以上的 1~4 层，即剖面深度 88cm~198cm 间。在 110cm~150cm 间丰度最高，110cm 以上次之，150cm~198cm 间最低。文化层和遗址下部地层中不见有孔虫。这表明，7 000B. P. 以前遗址下部和文化层尚未受到海侵影响，当时海平面低于现代海平面 2.4m（跨湖桥遗址人类活动面），但可能已非常接近遗址居住面的海拔位置。这种情况在跨湖桥持续了 1 000 年左右，日益严重的海水入侵使先民难以维持日常生计，便放弃遗址，迁往他乡。

此后，受到海平面持续上升的影响，遗址有孔虫组合与含量表明通常生长在河口外 20m 深处的有孔虫已可直趋钱塘江河口，抵达当时地势较低的跨湖桥遗址。卫星遥感也显示，虽然遗址地势相对较高，但其所在的两座平行

低山向东北形成一个近似喇叭口的峡谷，与紧邻的杭州湾之间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如遇天文大潮，海水便容易长驱直入^①。在7 000~6 000B. P.的文化层上部，已出现少量有孔虫，表明遗址开始受到海侵影响。6 000~5 400B. P.时，有孔虫组合以毕克卷转虫(*Ammonia beccarii*)和异地希望虫(*Elphidium advenum*)为主，且含量极多，反映了较强的海侵。5 400~4 600B. P.时，有孔虫数量又减少，海侵又变弱。这种演变表明全新世早、中期，海平面在波动中上升的特点。而且，海平面持续上升是遗址废弃的主要原因。

3. 环境复原

遗址植被呈“三层”结构景观，森林以亚热带和热带乔木树种为主；丘陵地带分布有适应温凉气候的榆、榛、松、云杉、冷杉等高大乔木；还有大量20m~25m高的壳斗科树木，麻栎和白栎分布在地势较低处，栓皮栎生长在位置较高的向阳坡。林下灌木以杜鹃为代表，地面覆盖蕨类植物。南酸枣树生长在低山丘陵与平原相接地带，为高达30m的落叶乔木。先民在水网密布的平原上临湖而居，栽培水稻，周围有大量以蒿、藜科为主的杂草。淡水湖沼中生长着茂盛的芦苇和香蒲，还有以柳树和桤树为主的湿地灌丛，湖里盛产菱角和芡实。

这一从低山丘陵逐渐向湿地过渡的生态区域是许多动物的理想生境，因此动物群分布也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湖沼地带的生态过渡性尤为显著，生物种类也最为丰富，开阔的水域和繁盛的沼泽灌丛不仅是大量淡水软体动物、鱼类、爬行类和鸟类的栖息地，也是众多小型哺乳类的觅食场所。蟹等十足目栖于较远的河口半咸水域；乌鳢和鲤多见于水草丛生的浅水区；龟和扬子鳄活跃在蓬蒿杂乱的潮湿地带；雁、鸭、天鹅、鹤、鹁等水禽栖息在水域附近的沼泽草地或草原；部分雕类出没于湿地或附近林地草原；豹猫、貉、獾等小型哺乳动物则性喜在水滨觅食；犀牛和麋鹿也经常到沼泽附近悠游。人类捕猎的主要大中型哺乳动物中，鹿生活在森林边缘和山地草原，啃食幼嫩的草本植物和野果，间或到山下采食，还常到盐碱地舔食盐碱，温暖的向阳

^① 王永江、姜晓玮：《卫星遥感探讨杭州湾跨湖桥古文化消失原因》，《国土资源遥感》2005年第1期。

坡是其活动的主要地带，而苏门羚则出没在山地森林中^①。

为了复原整体区域生态环境和植被演变的动态过程，我们对遗址保留的探方隔梁剖面进行了不间断的连续采样，采用 AMS 测年、高分辨率的花粉以及非孢粉微生物化石分析相结合，提供了跨湖桥遗址详细的诊断性材料（图 1）。生态遗留物的历时特点显示，在剖面底部约 8 722~9 319B. P. 的 A 段和顶部 7 144~7 428B. P. 的 G 段黏土沉积中，均为高比例的海相盐水硅藻和港湾型非孢粉微生物，主要为潮间带的真菌孢子、海生腰鞭毛虫囊，指示一种海相沉积。虽然这些海相沉积中存在盐沼草本植物的花粉，但是大部分花粉组合还是来自淡水植物群落，显示一种港湾而非开阔的海滨环境。碳-14 数据表明，地层从 B 段到 F 段的 1 500 年中，由于海平面相对稳定，主要反映了一种淡水环境的有机物沉积，落叶和常青栎树为陆地的主要植被，表现为一种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

8 722~7 863B. P. 的 B 段沉积中的微生物化石指示了一种淡水环境，没有海水的影响。大量的水生真菌、大型植物和水藻指示存在宽阔的湖塘，而后又逐渐变为多芦苇的沼泽湿地。在 B 段上部，草类和淡水沼泽草本植物花粉的增加表明水体逐渐变浅、芦苇湿地扩大。沉积中大量的尾梗霉属(*Cercophora*)是草本植物分解后产生的一种真菌，它进一步证明了沼泽湿地环境。B 段之末，这一湿地环境导致了茂密灌木的生成，先是桦树和柳树，然后是桤树。同时，硅藻证据显示有微弱的海水影响。

大约从 7 700B. P. 左右的 C 段下部开始，人类活动开始显著影响环境，显示了桤树花粉、沼泽林地非孢粉微生物化石和水生沼泽种类的急剧减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炭屑增加了 10 倍。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水稻花粉，还有杂草和人猪共患的寄生虫——鞭虫卵。这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明显改造过程持续了大约 100 年，直至被一次海侵所打断，表现为 D 段含盐的黏土沉积、一定程度的林地复苏和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微生物证据的减少。自 B 段之末起，在 C、E、F 各时段中均表现为盐沼草本植物和耐盐硅藻的增加，尽管淡水硅藻仍占 85% 以上，但是体现了少量海水经常性的渗入。在 E、F 时段，沉积中的炭屑减少，但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微生物却大量增加，其中包括指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示土壤扰动和侵蚀以及粪便分解所产生的真菌孢子。季节性的高潮位使得沼泽湿地香蒲大量繁殖，有可能是人类的食物和加工原料。人类的这种活动持续到 7 550 B. P.，最后被海侵所中断^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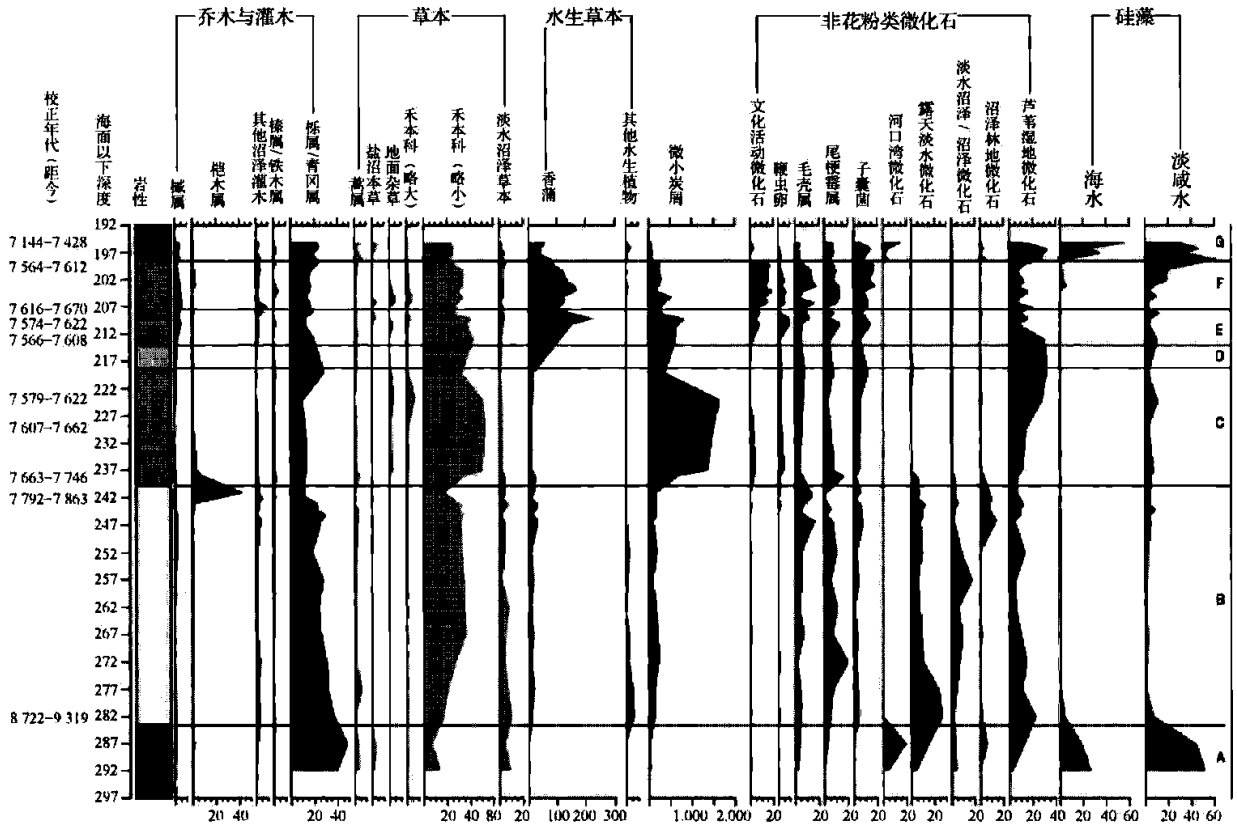


图 1 跨湖桥古生态遗留物综合统计

二、资源、食谱与生计

史前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依赖野生资源的原始社会。斯图尔特在讨论文化生态学时提出，要了解过去的文化，必须从考察“文化核心”入手，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与生存活动和经济安排最紧密相关的特征组合”，主要指技术与生存方式。在此基础上，社会结构和政治、宗教等更复杂的方面才能被理解^②。

^① Zong, Y., Chen, Z., Innes, J. B., Chen, C., Wang, Z., and Wang, H., Fire and flood management of coastal swamp enabled first rice paddy cultivation in east China. *Nature*, 2007, 449: 459—462.

^② Steward, J.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生态环境决定了野生资源的种类和丰富程度，野生资源又决定了人类的生计和技术，并对群体大小有很大的制约。在此，结合《跨湖桥》报告中提供的信息，我们采用浮选法获得的结果来了解跨湖桥遗址周边环境中的野生资源，复原先民的古食谱。然后，我们试图结合其他考古材料来了解先民的觅食方式、加工与储藏，探讨他们如何根据不同资源的分布来调节食物供应的波动，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

1. 浮选

我们选取被认为是古人集中废弃垃圾的古湖泊岸“堤”，从考古报告的第⑥~⑩层采取土样，采样面积仅为 1m^2 ，虽然局部观察有一定的局限和偶然性，但随机采样反映的分布应该体现了比较普遍的趋势。浮选物尺寸差异非常大，表明该埋藏地点应为静水环境，没有明显搬运和分选，保持着被废弃时的状态。其中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为人类食用后所丢弃，有助于深入观察遗址先民的环境和食谱。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该遗址出土了稻壳和炭化稻米堆积，但浮选中尚未发现稻子遗存。表2为浮选物的种类。

表2 跨湖桥遗址浮选物一览

浮选产物种类	内容
植物	壳斗科坚果、芡实、菱角、蔷薇科
动物	鱼类、鸟类、哺乳类、爬行类、贝壳、蟹
其他	炭屑、陶片、红烧土、石块

浮选出的动物骨骼量比较多且非常细碎，所以能够辨认种属的很少，部分尚可辨认属爬行类、鸟类、哺乳类中的某一大类。其中，鱼类以脊椎骨、鱼牙为多，鸟类以肢骨为主，有些骨骼过于细小难以辨认。还有数量极少、尺寸很小的贝壳残片。此外，每个地层都筛出一定量的蟹螯，在整个文化的中晚期数量稳定。

植物遗存中大多数为果核、果壳，极少发现小颗粒种子，主要有以下几种。

壳斗科(*Quercus*)：每个地层中出土的壳斗科果壳数量巨大，在所有植物中数量最多。其外壳表面较平滑，有平行纹路。未见完整果实，也未见完整壳斗，因此难以确切断定种属，根据某些碎片特征推测可能包括橡子、栗子

之类的果实。

芡实(*Euryale ferox*): 个体呈球形, 一端有一小孔, 旁边另有一凹陷种脐, 显微镜下可见表皮呈网状雕纹。数量仅次于壳斗科, 有少数完整果实。

菱科(*Trapaceae*): 果实碎片比较细碎, 多为硬刺状角, 尖端有喙。亦有完整个体, 连角宽为 1.8cm~2.5cm, 尺寸较正常个体略小, 似未成熟。可鉴定出包括两个种: 二角菱(*T. bispinosa*)、四角菱(*T. quadrispinosa*)。

蔷薇科(*Rosaceae*): 个别地层发现少量, 为梅和桃。

尽管跨湖桥文化时期资源丰富, 但分布的季节性和不平衡比较明显。每年 6 月果树陆续开始结实, 蔷薇科水果最先成熟, 接着菱角进入花果期, 可从 7 月一直收获到 10 月, 延续时间最长。8~10 月间是壳斗科坚果、菱角、芡实等淀粉类物种集中收获的时期, 自盛夏至秋末可源源不断供应, 并为冬季储藏作准备。到 11 月, 各种植物结实完毕, 收获季节结束。从 12 月到次年 5 月, 是全年植食供应的低谷。此外, 遗址中发现的麻栎和栓皮栎都是 5 月开花, 翌年 9~10 月果熟, 所以两年才能收获一次, 如果加上植株自身营养状况和气候等方面的原因, 很可能使收成有大小年差异。

动物的季节特征与植物性食物供应有一定的互补。植食最为短缺的冬春之际, 正是众多候鸟回归的季节, 某些禽类如鹤就在长江流域越冬, 鹿、水牛、鱼类也可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春季是许多物种集中摄食和繁殖的时期, 4~5 月间, 冬眠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开始活动, 从整个夏季直到入秋都可供人渔猎。到秋季, 许多动物会为越冬储备脂肪、蛋白质而特别活跃, 此时也成为先民一年中捕猎和收获的高峰。

因此, 对跨湖桥先民而言, 他们生活在一种生态群落层次丰富、多样性和互补性强、生物链结构稳定的港汊滨水环境中, 土地载能较高, 基本上是衣食无忧。资源本身也不易因过度开发而快速耗竭, 即使某种主食物种发生短缺也不会影响基本食物供应, 有其他多种食物可供选择。因此先民可以在此定居, 经长期稳定的发展, 会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2. 古食谱

人类生活环境中有多种可食用的资源, 但并非所有物种都是人类觅食的对象, 而且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亦非选择的唯一标准, 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像其他动物一样, 早期人类的觅食行为会遵循“最省力原则”, 即选择支出少回

报大的种类，这就是最佳觅食模式的原理。根据该模式，我们可以推测先民会在各种食物资源的种类上以投入及回报的大小，列出最佳食谱序列，其中大型有蹄类动物回报显然最高，可能是最优的食谱，然后依食物的回报率从高到低依次列入食谱，直至达到食谱整体的能量回报最大化为止^①。我们以此原理来考察跨湖桥先民食谱的构成及其营养摄入状况。

(1)果腹食物。植食的构成主要反映在浮选结果中，坚果比重占绝大多数，达80%以上，包括麻栎、白栎、栓皮栎等。此外还发现了许多规模不小的栎实储藏坑，有些还以木构件精心围护，说明其不仅产量多，而且是先民赖以果腹的主要食物。古籍中也有记载，《庄子·盗跖》：“古者兽多民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这恰与考古发现长江下游早期史前遗址人群以木构干栏式建筑为居，主食坚果的情形相合。《夏小正》载“八月栗零”，更是以板栗成熟作为季节更替的标志，说明坚果对先民生存的重要意义。

芡实也是一种产量较大的坚果，性状与同为睡莲科的莲子颇似，俗称“鸡头米”，至今仍是江南地区制作糕点的原料之一，也应当是果腹的主食，经晒干后可储藏。浮选发现的菱角完整个体皆为未成熟的小坚果，估计因其果肉少而被直接废弃，这可能暗示菱角在收获当季产量很大，几近不可胜用。此外，由于菱角相对壳斗科和芡实较不易储藏，在晒干处理的过程中，它的果肉会迅速收缩，从而失去食用价值，所以估计它基本在收获当季被食用。

以上三种坚果都是淀粉类食品，尤其是壳斗科果实还含有脂肪和蛋白质，它们在觅食上又具有低投入、高回报的优势，这使其成为跨湖桥先民食谱中的主食。

动物骨骼研究显示，鹿科和水牛的比例较高，为30%~40%，而且从早期到晚期持续上升，哺乳动物整体百分比增长也很快，从早期的39.05%，到中期69.95%，晚期达到70%。这说明大型有蹄类动物十分丰富，没有利用过度的迹象。它们在跨湖桥先民的食谱中应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爬行动物也占相当比例，特别是在早期。但作为家畜的猪比例却持续减少，其原因十分耐人寻味。首先，在大型动物十分丰富的情况下，为何要饲养家

^① Smith, E. A., Anthrop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a critical review.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3, 24: 625—640.

畜仍不清楚。根据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的观点，大部分早期驯化的物种都属于宴享物种^{①②}。所以，猪可能是作为美食驯养的。当然，也可能被用来应付偶然发生的食物短缺。从家猪减少与鹿及水牛增加的趋势来看，跨湖桥先民可能因生活方式的变化，逐渐减少投入代价较高的家畜驯养，直接获取野生资源。在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猪往往作为财富的象征。如有这种可能，那么猪的驯化也可能是财富积累的一种初级状态。

(2)宴享食物。上面我们推测猪可能是作为一种美食饲养的观点，是因为它不符合最佳觅食模式的原理。跨湖桥不符合这一原理的食物还有稻米和蟹。海登曾以不列颠哥伦比亚高原的民族学资料说明，在资源较为丰富和可靠的地区，采集社会会因经济富裕和人口增长而发展出比较复杂的社会形态。一些人会用夸富宴来取得其他群体成员的劳力、忠诚和产品，借此树立自己的地位。而这些高投入低回报的食物很可能就是为夸富而消费，它们只是少数人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③。

水稻也有这个可能，在各种食物种类中，收集和加工野草籽的劳力支出最大，但是回报非常低。西南亚早期食物加工的实验考古学显示，橡子的热量回报率是谷物的2~6倍，该数据还未计入采集和加工的代价，若计入，悬殊更大^④。跨湖桥遗址水稻的结实率很低，采集和加工成本却非常高，而且自然灾害和鸟类啄食使收获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因此在其他果腹食物十分丰富的情况下，难以想象先民会乐意将它作为主食来进行栽培。

全球的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显示，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文明层次较高的复杂社会，酒类的消费是极为普遍和重要的现象。酒类被认为是社会的凝聚剂和润滑剂，早期社会中各种社会活动和宗教仪式都少不了酒的作用。海登根据对中美洲玉米酒酿制和消费的研究认为，在史前期的中美洲，玉米酿

① Hayden, B., Model of domestication. In Gebauer, A. B. and Price, T. D. (eds.), *Transitions to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y*, Madison, Wisconsin: Prehistory Press, 1992, 11—19.

② 加布赖恩·海登：《驯化的模式》(陈淳译)，《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③ Hayden, B., Conclusions: ecology and complex hunter/gatherers. In Hayden, B. (ed.), *A Complex Culture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Plateau*, Vancouver: UBC Press, 1992, 525—563.

④ Wright, K. I., Ground-stone tools and hunter-gatherer subsistence in Southwe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ition to farming. *American Antiquity*, 1994, 59: 238—263.

酒的作用要比果腹更重要。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遗址中，最为精美的器物往往是酒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酒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

尽管尚无直接证据表明跨湖桥出土的稻米用于酿酒，但是考虑到人们愿意花大力气来栽培产量很低的水稻，那么它至少是一种与平常果腹食物不同的“奢侈品”。一个间接的证据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陶片残渍分析表明，公元前 7000~公元前 5500 年先民就用稻米、蜂蜜和水果(特别是山楂)为原料混合发酵制成饮料^①。跨湖桥遗址有大量南酸枣出土。它属漆树科，9~10 月果熟，恰与稻同时收获，适于酿酒^②，所以我们觉得稻米用来酿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后来野生资源日趋枯竭，人们才会加大投入来栽培水稻，将它作为我们的主食。

虽然我们觉得酿酒是稻米驯化的一种比较大的可能，但它毕竟也能用来果腹。我们参考了其他学者对稻谷驯化的假设，觉得果腹的作用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淀粉类食物储存中，坚果因颗粒大，产量高一直是比较重要的首选储藏品种。但是，坚果不同种类存在收获上的差异，有的是一年收获一次，而有的是一年收获一次。这样就无法保证每年冬天有充足的坚果储藏。这种储藏食品大小的波动，可能会促使人们考虑在坚果小年的年份，用其他适于储藏的物种来补充。而可储藏淀粉类植物中，稻谷可能是仅次于坚果的合适选择。虽然颗粒较小，产量不及坚果类食物。但是作为补充，稻谷还是能够起到应付季节性食物短缺的作用。

在跨湖桥的每个地层中都发现一定量的蟹螯，而且皆经人为砸碎，可以判断是被人类食用。蟹似乎是一种不很经济的物种，投入大，肉量却很少。就单纯果腹而言，蟹与哺乳动物相比实在是一种回报率太低的食物。但它在食谱中长时间存在而未被淘汰，说明人类对其利用是文化适应的组成部分，它有可能是一种美食。当然，从冰后期盛行的“广谱经济”而言，它也可以因产量较高而被人类所青睐。

^① McGovern, P. E. and Zhang, J., Fermented beverages of pre-and proto-historic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4, 101: 17593-17598.

^②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编：《江苏植物志》(下册)，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年版。

由于宴享食物往往出现在复杂社会中，因此利用这些宴享食物与精美的制陶工艺和大型的奉食器皿相互印证，间接提供了跨湖桥遗址先民的社会发展层次。

3. 食物加工与消费

遗址出土的人工制品中，有些与食谱有着密切关系，在此结合器物对植食加工和消费做一简略介绍，一般包括去壳、捣制、碾磨和炊煮几个步骤，这里主要分析坚果和稻谷。

芡实去壳较为复杂，因为其果实外面密布尖刺，所以收获后先要弄破有刺的果皮，才能取出种子。另一种方法也可能是将果实堆积数天，等果皮腐烂，再取种子。而种子并不能直接食用，因为其种皮坚硬，故还需将硬壳碾破，才能得到可食用的白色胚乳。相对来说，壳斗科坚果去壳就简便得多，通过手剥即可完成。

壳斗科坚果常含单宁酸，有毒并带涩味，除涩去毒的方法是用臼和杵将其捣成粉后用水反复浸泡。跨湖桥有一类陶钵，敞口、直腹、圜底略平，适合当作臼使用。它很可能与木质捣杵配合使用，出土的木器中有形似蒜头的木槌，适于作捣杵用。碾磨工具是石磨板和磨棒。跨湖桥出土 25 件磨石，多为灰绿色砂岩，其中部分磨面略凹，可见研磨痕迹，与近东黎凡特遗址用来碾磨坚果和谷物的石磨板十分相似，推测其具有相同功能。不同之处在于，跨湖桥出土的一些卵石上有摩擦痕，可能曾用于捣制。磨粉的另一好处是有助消化吸收。

稻谷需要脱粒，方法多样。干燥后将其摩擦，颖壳就会脱落，也可用类似连枷的工具通过打谷脱粒。捣制也是一种方法，陶钵与木杵是十分胜任这项工作的。

动物屠宰肢解会在动物骨骼上留下切割痕迹，用锋利的石器进行切割，往往在骨骼上留下平行的 V 形凹槽。而较粗的 U 形凹槽和点状压印是食肉动物啃咬所致(图 2)。表明人在食用骨头之后丢给狗，或遗弃在垃圾堆里，被其他食肉动物啃咬。尚不明确的是跨湖桥先民如何加工烹饪水牛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因为许多水牛骨骼非常完整，不可能放在较小的陶器里水煮，有可能采用了民族学中常说的石煮法，即用烧烫的石头来煮熟大块肉食。



(左) 横向为石器切割的 V 形凹槽，纵向为动物啃咬的 U 形凹槽
(中) 人类工具切痕
(右) 箭头所指点状压印为食肉动物牙齿的齿痕

图 2 动物骨骼上的不同痕迹

4. 资源波动与对策

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主要问题是应付野生资源的波动。短期波动是季节性的，而长期波动则可能长至十几年或更长时段，大多表现为灾害性事件。在此我们主要讨论季节性波动及其对策。

跨湖桥先民肯定会面临食物的季节性短缺，那么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根据考古分析和民族学资料，他们一般会采取以下几种对策。

(1) 调节主食比例。在鲜果收获前的季节，人类可能以陆生动物和鱼类为主。跨湖桥发现的动物骨骼中，鹿的比例很高。鱼、禽类也是人类经常利用的物种。

(2) 后勤移动。若遗址周围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人们会扩大觅食的范围。宾福德把这种将资源移向人群的方式称为“后勤移动”。与之相对的是“迁居移动”，即将人群移向资源，在资源分散的环境里，人群往往会采取这种方式^①。跨湖桥先民采取定居的方式，因此会采取后勤移动，在周边 10km 范围里觅食(一天步行来回的距离)。

(3) 储藏。储藏是复杂狩猎采集群的行事方式^{②③}。跨湖桥出土的大量橡

^① Binford, L. R., Willow smoke and dogs' tails: 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 *American Antiquity*, 1980, 45: 4-20.

^② Testart, A., The significance of food storage among hunter-gatherers.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2, 23: 523-537.

^③ Binford, L. R., Mobility, housing and environ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990, 46: 119-152.

子坑，表明储藏在应付资源波动中的作用。坚果储藏有一定的难度，其保鲜效果与环境温湿度有密切关系。以板栗为例，适宜的温度在 $5^{\circ}\text{C}\sim 10^{\circ}\text{C}$ ，低于 0°C 的低温会冻伤果肉。湿度低果实易干瘪，湿度高则易霉烂变质。此外，贮藏过程中还需注意保持通气，以免造成坚果无氧呼吸，产生有毒的乙醛物质^①。

因此，储藏坚果首先要进行干燥处理，降低含水量。储藏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控制温湿度，跨湖桥的橡子坑经过精心处理，一部分坑口架设“井”字形木构，交叉叠压，坑内有木桩支撑，有的坑底铺垫木板、木条，另有一些铺有一层沙。今天北京燕山栗区贮藏板栗多用沙藏保湿，贮藏在低温窑中，或在阴凉处储藏。跨湖桥先民显然已经掌握了储藏坚果的要诀。

坚果在9~10月间收获贮藏，一个多月内新鲜细腻，口感最佳。自11月中旬到1月上旬的贮藏中期，含糖量因风干而逐渐升高，甜度增加、果肉稍硬，可食性最好。1月底2月初，种实开始萌动，果皮皱缩变脆，果肉干硬萎缩，有些出现石灰化现象，但仍有近三成果实可供食用。由此可见，储藏坚果基本可以解决整个冬季至初春的口粮问题，在尚未采纳大规模农业的社会中，它对供养人口和维持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水稻。稻谷因其储藏上的优势可在食物短缺季节提供人类所需的食物。但由于种植和加工投入过大，在其他野生资源比较丰富的情况下，稻谷栽培可能是最不经济的选择。就跨湖桥遗址而言，尚难以断定水稻在食谱中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也不排除稻子作为应付短期波动而被栽培的可能。

5. 生存方式

跨湖桥先民的生计以渔猎采集为主，小规模尝试水稻栽培和家畜饲养。宾福德将狩猎采集群的行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集食者”(collector)，他们居址相对固定，外出觅食并储藏食物，主要采取将资源移向人群的策略；另一类“寻食者”(forager)无固定居址，随觅食地点移动，不储藏食物，策略是将人群移向资源^②。我们认为这一区分有助于认识生存策略差异导致的不同社

^① 秦岭、董清华、王有年：《板栗贮藏期间几种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北京农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陈胜前：《农业起源与农业的不起源》，《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8日。

会演进结果，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起源。我们根据宾福德的概念，暂将跨湖桥先民定义为“集食-栽培者”(collector-cultivator)。另外，宴享食物的考虑可以启示我们从另一角度考虑长江下游地区稻作起源的动力机制。

三、陶器技术

跨湖桥陶器无论与较早的上山文化相比，还是与较晚的河姆渡文化相比，都呈现出技术和工艺上的复杂性和成熟性，使不少人对先民在8000年前所达到的技术水准大为惊诧，甚至怀疑其测定年龄。在此，我们对陶片进行了元素成分和食物残渍测试，尝试对其技术工艺及用途进行一些深入观察。

1. PIXE 测定与工艺分析

我们运用质子激发 X 射线荧光(简称 PIXE)等技术分析了陶胎和黑光陶衣的元素组成，并将数据与湖底淤泥层土样的元素分析进行对比。遗址淤泥层土样的化学元素组成与陶胎的元素组成基本一致，因此陶器应当是用黏土掺杂了湖底淤泥，或直接用淤泥制作而成，原料有着很好的均一性。稳定的化学组分还反映了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陶土的挑选和处理没有明显变化^①。

共振背散射和 XRF 测试显示，碳元素在黑陶呈色工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黑陶样品的碳含量是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黑陶碳含量的 2 倍。烧失实验发现，当黑陶片被高温加热后，其中的碳完全消失，表面和胎体变成红褐色。由此可知，这些黑陶是因烧制时渗炭而通体发黑。有人推测，玻璃相的黑光陶衣可能是海水制盐所致^②。我们对黑光陶衣层的分析表明，其中并没有钠和氯元素。值得注意的是，黑光陶衣与胎体元素组成不同，硫含量特别高，且在不同层次存在浓度梯度，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先民在陶器烧制过程中有意对器表施加了某种特殊物质。柴尔德曾借鉴民族学资料对此进行描述，古人制陶时会在器表尚温热时特意涂油脂或兽类粪便使之达到某种特殊效果^③。目前我们还无法知道，较高的硫含量来自何种物质。

南亚民族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黑光陶制作的一个实例。当陶胎风干后，工

① 林嘉炜：《PIXE 在古陶瓷产地和制造工艺中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 年。

② 柳志青、沈忠悦、柳翔：《跨湖桥文化先民发明了陶轮和制盐》，《浙江国土资源》2006 年第 3 期。

③ Childe, V. G.,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Watts and Co., 1936.

匠把泥浆料涂抹到器表，趁其未干用钝口工具摩擦，使其均匀分布，经土包窑烧制后陶器表面的黑色陶衣就呈现光亮^①。根据 Rye 对陶器技术特征的研究，陶器表面产生光泽的主要方法是打磨。一般利用工具的钝口刃缘或凸出弧面在表面来回摩擦，使陶衣物质微粒细腻均匀，从而烧制后会发亮。这一步骤会在表面留下与打磨方向一致的密集平行纹路(图 3)，要使表面光泽更亮，须再用皮革之类的柔软物抛光^②(图 4)，以消除细小纹路，这两种情况都可在跨湖桥黑光陶表面观察到。此外，黑陶表面光泽层明显可见细小的迸裂纹，很可能是打磨留下的痕迹。根据以上分析，黑光陶器的制作有这几项要素：(1)渗炭呈色；(2)陶胎原料质地细腻；(3)器表涂有某种含硫的未知物质；(4)陶衣的打磨抛光。



图 3 黑光陶罐表面打磨处理的条纹痕迹 图 4 黑光陶罐表面抛光处理后光泽均匀

Skibo 等人在实验中发现陶衣能增进夹炭陶的导热性能^{③④⑤}。跨湖桥 168 件陶钵内外壁皆施彩，特别是其中 55% 外壁施红彩陶衣，内壁为黑光陶衣，还有几件陶罐内外皆施黑光陶衣。钵和罐都是典型的盛食器，特别是罐的敛口就有利于保持热量，看来保温导热是陶衣的一项重要作用。此外，在

① Maria. *Indian Pottery Maker of San Ildefonso*, US National Park Service, (film document).

② Rye, O. S., *Pottery Technology: Principles and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 C.: Taraxacum, 1981.

③ Skibo, J. M., Schiffer, M. B. and Reid, K. C., Organic-tempered pottery: an experimental study. *American Antiquity*, 1989, 54: 122—146.

④ Schiffer, M. B. and Skibo, J. M., Theory and experiment in the stud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7, 28: 595—622.

⑤ 刘莉：《植物质陶器与石煮法》，《中国文物报》2006 年 5 月 26 日。

同类型的陶罐中，仅一部分被施以黑光陶衣，其外形以凸棱为界分段，饰以较密的弦纹，比同类器物制作更为精良。陶豆也有此现象，但豆是盛食器，其形状显然不适宜导热保温，却仍施黑衣。因此，陶衣除保温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社会功能或特殊意义目前尚难以确定，这需要对器物的出土背景加以更加细致和多元的考察才有可能揭示。

2. 残渍分析

为了获得更多陶器与食谱的信息，我们将 8 片黏结残渍(锅巴)的夹砂陶口沿送拉曼光谱实验室检测其化学分子结构，仅在两片陶片的 4 处测点上发现了一些线索，大致结果如下：测点编号 LF-zfb 和 LF-zf 显示为动物脂肪结构，LF-f 大致为肉食，LE1 为植物性食物。这些结果显示，跨湖桥先民很可能采取肉食与植物一锅煮的方式，在烹饪技术尚未完善的史前时期，一锅煮是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炊煮方式。从最佳觅食原理来看，这种炊煮方式不仅使食物变得可口，而且增强了食物的消化与营养的吸收。

3. 动力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制陶技术的动力机制。

(1) 全世界的最早的陶器普遍发现于海岸河滨环境的狩猎采集群中，当时流行的广谱经济，使得人类开始利用过去不利用的资源，于是需要新的工具和加工方法来利用这些资源。陶器对扩大和强化利用某些资源优势明显，尤其是一些特殊物质的提取和加工，如油脂、发酵饮料、汤、炖品等^①。坚果、稻米、水生动物的加工、炊煮和特殊处理都需要使用陶器。

(2) 定居为陶器生产和使用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因为在流动性很大的狩猎采集群中，陶器会成为笨重的累赘。陶器属料还是生存方式的重要指示，夹炭陶具有易于生产和便携的特点，夹砂陶则在导热性、抗撞击、抗热胀冷缩和抗剥蚀等机械性能上具有优势。跨湖桥陶器组合中，夹砂陶始终占 1/3 到 1/2，且比例有从早到晚逐渐增长的趋势。夹砂陶器可以在火上加热，尤其适用于湿热法烹制食物，与干热法要达到 150℃~625℃才能煮熟食物相比，湿热法只需 85℃~100℃，回报率明显较高，同时可以防止营养流失。夹炭陶衣

^① Rice, P. M., On the origins of potter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99, 6: 1-54.

能够增强导热保温性能，有利于炊煮。此外，黑光陶衣可能还有较好的防渗透功能，特别适用于长时间炊煮或盛放液体。有些钵仅在内壁施黑光陶衣，也许就是这种意图。

(3)Ingold 提出复杂狩猎采集群储藏一般出现在资源非常丰富，而又有明显季节性波动的环境中^①。跨湖桥已有复杂的储藏坑，大型陶器也可用于短期食物存放，以防老鼠等动物的破坏。

(4)大型陶器往往不是家庭使用的器物，它们与群体的宴饮活动有关，因此也应被视为财富或社会中一种分配机制的表现。东非肯尼亚 Luo 部落的宴享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大型陶罐使用的实例。罐直径达 50cm~60cm，高达 60cm~70cm，有的更大。宴饮时，将盛满酒的大罐放在地上，成年男性聚在周围，用中空的植物茎秆当吸管吸酒(图 5)。酒是 Luo 部落宴享时特有的美食^②。跨湖桥陶罐最大径达 36cm，高达 40cm，质地夹炭，不宜直接火煮，有可能类似于 Luo 部落的大酒罐(图 6)。此外，跨湖桥还有作为盛食器的大型陶盆，直径达 110cm，器腹深达 43cm，一般家庭日常无须如此大型食器，所以它们很可能也用于群体宴享。还有，在夸富宴中，这种不同寻常的大型容器展示有助于确立主人的地位和声望。正如从 Luo 部落等现代土著社会所见，有能力拥有这种大罐的，只属于部落中的少数人^③。从这些陶器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见跨湖桥先民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发展层次。

(5)陶器彩绘可能具有象征性的社会功能，跨湖桥大型陶器上的施彩尤为明显。以太阳形图案为主题，而且只在肩部、外壁和外撇的足部施彩。彩绘只见于盛食器，不见于炊器，因为炊煮会熏黑和破坏彩绘图案。在复杂狩猎采集群中，夸富者会在宴享中用精致的陶器及其特殊纹饰来显示身份，一如

① Ingold, T., The significance of storage in hunting societies. *Man*, 1983, 18: 533—571.

② Dietler, M., Theorizing the feast: rituals of consumption, commensal politics, and power in African contexts. In Dietler, M. and Hayden, B. (eds), *Feasts: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Food, Politics and Power*, Washington, D. C.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1, 65—114.

③ Clarke, M. J., Akha feasting: an ethn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Dietler, M. and Hayden, B. (eds.), *Feasts: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Food, Politics and Power*, Washington, D. C.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1, 144—167.

殷商青铜器所发挥的功能。综合来看，跨湖桥的施彩陶器可能表明先民在奉食(serving)过程中有意通过象征或符号来炫耀财富或厘定身份。

西方学者将史前技术分为“实用”技术与“显赫”技术两类^{①②}。跨湖桥陶器中那些普通的素面、麁砂粗陶显然为实用器，用来满足日常的需要。而那些体量巨大、制作精美的陶罐、陶盆、黑光陶和彩陶则可能是显赫技术的产物，用于仪式和宴享，具有展示身份的社会功能。



图5 肯尼亚 Luo 部落宴享饮酒情景



图6 跨湖桥大陶罐

4. 陶器与文化演变

在跨湖桥之前，宁绍平原的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已出土了植物麁料的陶容器，尤其是上山遗址陶器麁有大量稻壳，但仍显粗糙。跨湖桥陶器体现了非常进步的工艺，由于年代较早，常常使人感到困惑。对于这样的疑虑，我们最好不要以文化累进和类型学的模式来进行思考。如果我们将文化看作是人类社会对特殊环境的适应，而且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复杂化程度，那么跨湖桥复杂的制陶技术应该从它特殊的社会背景来考虑。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有许多狩猎采集复杂社会的例子，它们存在于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环境里，所以能够出现密集的人口聚居。如美国加利福尼亚沿海和北美西北沿海捕捞洄游鲑鱼的渔猎群体，这些社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定居村落，形成了

① Clark, J. E. and Gossler, D., Reinventing Mesoamerica's first pottery. In Barnett, W. K. and Hoopes, J. W. (eds.), *The Emergence of Potter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Ancient Societie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5, 209-221.

② Hayden, B., Practical and prestige technologies: the evolution of material system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98, 5: 1-55.

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技术。所以，跨湖桥先进制陶术是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反映，只要当地的环境适宜，那么不要很久，复杂的社会特点很快就会出现，技术进步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跨湖桥陶器组合总体上比较适合资源强化利用的理论^①。其出现原因可解释如下：富裕环境可以供养较多的人口，促使人类对资源利用的强化，并促使社会经济的复杂化。较为复杂的社会会提高技术的进步来满足日常生活以及群体宴享的需求，而一些地位较高的成员也会试图通过宴享和显赫产品的生产和拥有来确立自己的地位。由此观之，跨湖桥先民在8 000年前就掌握比较高超的制陶技术，如慢轮制坯、施加黑光和彩绘陶衣等就不难理解了。

四、讨论与小结

跨湖桥文化可以被看作是全新世初人类在资源富裕环境中的一种特殊适应，它与世界上许多富裕狩猎采集社会的发展有许多类似之处，表现为发展层次较高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水准。当时跨湖桥环境条件甚至可能不亚于华北地区以旱地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一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因此可以创造出令人刮目的物质文化。

8 000~7 000B. P. 的跨湖桥遗址地理环境优越，气候宜人。每年的亚热带季风带来丰沛的降雨，沿海的湿地是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生境，土地载能非常高。因此为定居的渔猎采集社会提供了可供多种选择而不易枯竭的资源库，使之能成功应对食物资源的季节性波动。较高的土地载能自然可以维持较多人口，并使人群长年定居在一个地方。人口的稳定增长必然导致社会结构复杂化，一些新技术得以发展，一些农业社会中常见的矛盾和关系也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可能促发农业社会中因剩余产品积累所导致的贫富分化，一些地位较高的首领或族长，以及积累了较多财富的人，也许会以民族学中常见的“夸富宴”方式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财力，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跨湖桥陶容器的技术和精致程度是经济

^① Hayden, B., The emergence of prestige technologies and pottery. In Barnett, W. K. and Hoopes, J. W. (eds.) *The Emergence of Potter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Ancient Societie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5, 257-265.

强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的明显表征，这种发展层次在华北以旱地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往往要到很晚的时期才能够出现。

尽管陶器反映出社会的初步分化，但是跨湖桥文化似乎仍处于原始的平等社会，因为它出土的装饰品和其他奢侈品极少。即使像较晚的崧泽文化出现了相当多的个人玉饰件，墓葬所体现的社会成员身份和等级并没有明显差异，这表明跨湖桥社会复杂化程度并不会很高。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①，跨湖桥文化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应该属于部落层次，表现为一种超家庭聚合的社会结构，存在一定规模的村落，群体大小的上限在 500 人左右（与一个独立农业村落维生系统相比）。这种社会的基本维生活动为集食与栽培，在有野生动植物资源保证的同时，饲养狗和猪，并可能为酿制群体宴饮活动所需的酒类而利用并栽培水稻。由于资源丰富，剩余产品的积累可能在某些成员之间产生了细微的贫富差别，那些地位较高或比较富裕的成员会采取“夸富宴”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还有，人群的聚居也会使各种祭祀仪式和宗教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活动也常常表现为集会、宴饮和献祭。因为跨湖桥许多精致的陶器显然不是为家庭日用所制作，其生产加工所需的时间、劳力和技能，应该具备一定余暇时间和经验积累的熟练陶工才能做到。

跨湖桥遗址因海平面的上升而被废弃，这些先民的去向在目前考古研究中仍然是个谜。我们应该理解，依赖富裕自然资源的复杂社会是很不稳定的，一旦支持社会聚集的环境和资源消失，其文化也会随之消失。我们也许不必刻意追寻跨湖桥文化的去向，如果遗址的先民迁徙到一个环境和资源不同的区域里，他们也许再也无法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

以上的解读工作只是将生态、技术与社会背景相联系的一种整体观察，借鉴了世界上的民族学观察和考古学成果。由于跨湖桥遗址的中心区域已经被破坏，我们只能从遗址残留的部分遗物和遗迹来进行社会文化的重建，其过程具有相当的难度和挑战性。许多观点还停留在假设层面，需要今后工作的检验和深入。

^① Service, E. R.,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致 谢

感谢萧山文化局和萧山博物馆的大力配合，特别对施加农馆长和朱倩副馆长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周到细致的工作表示感谢。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陈中原教授以及华师大地理系与河口海岸研究室的团队承担古地质沉积和古环境复原等相关研究，并完成报告《跨湖桥遗址环境演变的重建》。感谢英国杜伦大学地理系的宗永强教授与 J. B. Innes 教授提供了高分辨率的硅藻与孢粉等微化石分析序列。感谢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的承焕生教授及其课题组承担陶片元素的 PIXE 分析。感谢复旦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拉曼光谱实验室的姚文华研究员承担陶片残渍化学结构的测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访问学者金成坤博士曾专程赴萧山帮助进行动物骨骼的埋藏学观察，复旦大学文博系博士研究生陈虹也参与了微痕观察，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复旦大学文博系实验室陈刚教授、俞蕙老师和殷敏同学对浮选研究的支持和帮助。

(与潘艳、魏敏合作，原刊《东方博物》2008 年第 2 期)

马家浜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前言

马家浜文化自 1959 年马家浜遗址的发掘以来，先后又有一批遗址出土，重要的包括：浙江嘉兴马家浜^①、吴家浜^②、吴兴邱城^③、桐乡罗家角^④、余杭吴家埠^⑤，江苏常州圩墩^⑥、武进潘家塘^⑦、吴江袁家埭^⑧、广福村^⑨、吴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 年第 7 期。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吴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2》。

③ 梅福根：《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 年第 9 期。

④ 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见《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 1 辑，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2》，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⑥ 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 年第 2 期；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 年第 4 期；常州博物馆：《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 年第 4 期；常州市博物馆等：《常州市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6》；江苏省圩墩遗址考古队：《常州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5 年第 4 期。

⑦ 武进县文化馆等：《江苏武进潘家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 年第 5 期。

⑧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 年第 6 期。

⑨ 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吴江广福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3 期。

县草鞋山^①、苏州越城^②、张家港东山村^③、许庄^④，上海青浦崧泽^⑤、福泉山^⑥等几处。这些遗址大致遍布包括浙北、苏南及上海在内的整个环太湖流域。丰富地下资料的发现与积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发现至今的50年里，经过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其文化面貌日趋清晰，从作为一支独立考古学文化的确立，到细致的分期与分区，马家浜文化成为环太湖流域史前社会文化演变进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就考古学的发展和现状而言，马家浜文化的研究如果要在目前基础上有所拓展和推进，无论研究视野还是理论方法都需要提升一个档次，即从考古学物质文化的描述和比较转向文化演变进程的阐释。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引入国际上流行的系统论思维、文化生态学理论和聚落考古等方法，从人地关系或文化与环境的互动来揭示新石器时代社会文化演变的脉络，了解史前人类的行为，并对诸多独特的文化现象做出科学的阐释。在社会结构和意识信仰等比较困难的研究领域，我们也需要摆脱目前那种仅仅根据有限的墓葬材料，将其作为历史证据来和马克思经典理论与术语简单对号入座的做法，更多的利用民族学和民俗学知识来了解和解释史前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文试图对马家浜文化的研究历史做一回顾，并就如何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视野和提高研究的档次提出一些初步的见解。

二、历史回顾

1. 马家浜文化的确立

马家浜文化的确立过程，也是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淮、闽粤)考古学文化序列建立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马家浜等遗址发现以后，由于该地区可资比较的文化不多，而周边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江淮地区的青莲岗文化，因此

① 南京博物院：《吴县草鞋山遗址》，见《文物资料丛3》，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③ 张照根等：《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发掘收获》，《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

④ 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张家港许庄新石器朝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0年第5期。

⑤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⑥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与马家浜遗址进行对比的参照。

青莲岗遗址自 1951 年年底发现以来，因其面貌的独特性，被确立为一支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其范围被认为主要分布于以江苏为中心的江淮平原和太湖流域，北抵山东南部，南到太湖南岸，远及杭州湾地区，西到安徽东部、苏皖交界处东迄江苏沿海地带，东南达淀山湖以东^①。这一文化区域的划定，自然将环太湖的诸原始文化包括在内。这种观点认为，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前龙山文化时期的史前文化是单一的，可统称为青莲岗文化。但是随着资料的积累，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江淮地区与环太湖流域的史前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于是提出将青莲岗文化以长江为界分成南北两个类型^②。

然而以夏鼐和牟永抗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一开始就认为马家浜文化面貌独特，可以单独命名为一支考古学文化^③。此外，还有人提出了“草鞋山文化”的名称^④。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80 年代以后，各种争议渐平，学界对马家浜文化的命名达成了共识，并以姚仲源的《二论马家浜文化》最具代表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而且对其文化性质作了全面总结^⑤。至此，马家浜文化的地位最终得到了确立。

在讨论文化命名的同时，不少学者还对其文化面貌进行了总结，其中涉及器物、居住形态、墓葬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认为其主要特点有：（1）盛行俯身葬；（2）陶器以红陶和表红胎黑的泥质陶为特色，器表多素面，外表常

① 尹焕章等：《对江苏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些认识》，《考古》1962 年第 3 期；吴山菁：《略论青莲岗文化》，《文物》1973 年第 6 期；南京博物院：《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的探析》，《文物》1978 年第 4 期；南京博物院：《青莲岗文化的类型、特征、分期和年代》，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本刊通讯社：《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1978 年第 3 期。

② 南京博物院：《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的探析》，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南京博物院：《青莲岗文化的类型、特征、分期和年代》，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夏鼐：《碳-14 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 年第 4 期；牟永抗、魏正瑾：《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文物》1978 年第 4 期。

④ 吴绵吉：《长江南北青莲岗文化的相互关系》，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⑤ 姚仲源：《二论马家浜文化》，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有红色陶衣，器型以腰沿釜(或称宽沿釜)、喇叭形圈足的豆、牛鼻形器耳的罐、圆锥形足的鼎等具有代表性；(3)使用玉玦、玉璜等装饰品；(4)有孔石斧(钺)出现；(5)经济以农业为主；(6)手工业生产包括石器、木器、骨器、漆器、丝织等；(7)葬俗以俯身葬为主，随葬品少而简单；(8)人神合一的巫术活动^①。

2. 年代学

绝对年代的确立主要是依据碳-14的测定，目前马家浜文化的年代大致卡在7 000B. P. 至6 000B. P.。在罗家角遗址发现之前，邱城下层被认为是马家浜文化的初始，一般认为其上限为6 000B. P. 左右。罗家角遗址发现后，碳-14及陶片热释光的数据接近甚至超过了7 000B. P.，从而进一步提前了其上限。至于其下限，因为良渚文化发现和认识相对较早，因此起初是将其与良渚文化的早期相衔接，在崧泽文化的面貌逐步清晰并单独命名后，又将其下限卡在崧泽文化的上限，也即6 000B. P. 左右(表1)。

表1 马家浜文化年代主要数据表^②

编号	标本	地点	测定年数(距今)	树轮校正年数(距今)
1	Sb004a-e	罗家角 H18④陶片五块	平均为 7 170	
2	BK80004	罗家角 H16④芦苇	6 400±100	7 040±150
3	Sb003a-c	罗家角 H16④陶片三块	平均为 6 990	
4	ZK860	罗家角 H16④芦苇	6 240±130	6 905±155
5	ZK46	吴兴邱城(下)木板	6 040±100	6 696±125
6	ZK201	吴县草鞋山 T202⑩木板	5 620±115	6 275±205
7	BK76022	吴县草鞋山 T703⑤木头	5 370±110	6 015±145
8	ZK202	吴县草鞋山 T203⑧木炭	5 365±105	6 008±140
9	ZK55	青浦崧泽③层木头	5 345±105	5 985±140

①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吴汝祚：《马家浜文化的社会生产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② 汪遵国：《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分析》，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续表

编号	标本	地点	测定年数(距今)	树轮校正年数(距今)
10	BK76023	常州圩墩 T1310⑤木头	5 300±110	5 940±135
11	ZK583	海安青墩 T7⑥木头	5 035±30	5 645±110
12	ZK316	圩墩 T1310⑤木头	5 020±120	5 630±140
13	ZK315	圩墩 T1310④木头	5 000±100	5 605±140

相对年代的确立是与新遗址的发现和地层学分析密切相关的。良渚文化是环太湖地区最早确立的一支原始文化，由于开始对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脉络不是很清楚，崧泽文化还没有作为一种文化被提出，而宁镇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也没有予以区分，因此前良渚文化或被分成四期：马家浜期、北阴阳营期、崧泽期、张陵山期或典型良渚文化诸类型^①。当时河姆渡下层遗存刚发现，还难以进行比较，因此未被列入。或被分为三期：马家浜期、北阴阳营期和崧泽期^②。

当有人注意到宁镇与环太湖地区古文化的区别，于是三期变成了马家浜期、崧泽期和张陵山期^③；或变成了两期：马家浜期(早期)和崧泽期^④。其中有争议的是以崧泽中层墓地为代表的文化归属问题，有人认为与马家浜关系密切，应属马家浜文化晚期；有人则认为与良渚文化关系更密切，应是良渚文化早期。于是，汪遵国等学者将崧泽命名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⑤。及罗家角遗址的发现，又有学者做了新的分期，将罗家角遗址三、四层与马家浜遗址的下层归为早期，将罗家角遗址的一、二层，马家浜遗址的上层，圩

① 南京博物院：《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的探析》，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南京博物院：《青莲岗文化的类型、特征、分期和年代》，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张之恒：《关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的区分》，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④ 姚仲源：《二论马家浜文化》，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 南京博物院：《青莲岗文化的类型、特征、分期和年代》，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墩遗址的下层，草鞋山遗址的第十层归为中期，将圩墩遗址中层，草鞋山遗址第八、九层归为晚期^①。

在罗家角遗址发现之前，以河姆渡文化为最早，因此一般认为马家浜文化是由河姆渡文化发展而来^②。随着罗家角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文化面貌的进一步清晰，最终确认马家浜文化是由罗家角下层发展而来，与河姆渡文化是两支平行发展的文化。再加上崧泽文化的命名，于是整个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基本上确立：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3. 分区

姚仲源认为邱城遗址在许多方面与马家浜文化有较大的区别，可能代表了西部丘陵地区的一种地方类型，也可能代表东西不同的文化类型，于是提出马家浜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着若干亚文化类型^③。这一看法代表了对马家浜文化分区的一种早期认识。而系统地进行分区研究的有陈晶与张照根两位学者。陈晶认为，分布在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遗存，除了共有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明显的差异。并由此提出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有两个不同的类型，并分别同邻近地区同时期的不同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典型器物比较，提出了以罗家角遗址与草鞋山、圩墩遗址为代表的两个不同类型^④，这基本上是以以太湖为界分成的南北两个类型。后来随着吴家埠遗址的发现，王明达与牟永抗又认为浙江地区还可以增加一种新的类型^⑤。

随着新材料的积累，特别是张家港东山村、吴江广福村等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的分区工作提供了依据。张照根根据对各遗址典型陶器的分析，结

① 南京博物院：《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的探析》，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南京博物院：《青莲岗文化的类型、特征、分期和年代》，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③ 汪遵国：《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分析》，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④ 陈晶：《马家浜文化两个类型的分析》，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2》，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合生产工具、房址和葬俗等因素，认为马家浜文化各遗址存在许多差异，据此将马家浜文化暂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苏南沿江地区的东山村类型、浙北地区的罗家角类型、太湖流域腹地的草鞋山类型。三个类型各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并且从马家浜文化开始直至良渚文化，均有自己的区域传统，形成三个文化区，并且分别与周边的文化发生相应的联系^①。

4. 生态环境

马家浜文化的环境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基本可分两种情况，一是立足整个环太湖地区史前环境的变迁，分析马家浜文化时间段中的生态环境^②。二是直接对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环境进行研究^③，研究方法也可分成两类，一是直接对遗址中出土的野生的动植物进行研究，以复原当时的环境；二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遗址中的花粉、植硅石、土壤微量元素、古今植物的 DNA 比较分析，以重建当时的古环境^④。

几种研究手段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表明自 8 000B. P. 以来，这一地区的气候与环境变迁可以分成几个大的波动期，马家浜时期是一个稳定的湿热时期。生态环境以芦苇丛生、水草茂盛、水网发达的河湖沼泽湿地平原环境为特点，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约高出 2℃ 左右，并已开始栽培水稻。

5. 器物研究

对马家浜文化器物的专论基本没有，只是在一些总论性的文章中对各种器物进行归纳，而且为描述性的，并仅限于对各种陶石器形态的介绍，很少

① 张照根：《关于马家浜文化的类型问题》，《农业考古》1999 年第 3 期。

② 蔡永立等：《上海青浦 8.5kaB. P. 以来植被演变与气候波动》，《生态学报》2001 年第 1 期；王开发等：《上海地区全新世植被、环境演替与古人类活动的关系探讨》，《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6 年第 1 期；陈云等：《全新世高温期气候不稳定性记录》，《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9 年第 3 期；张立等：《中国江南先秦时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地理学报》2000 年第 6 期；刘会平等：《沪杭苏地区若干文化遗址的孢粉—气候对应分析》，《地理科学》1998 年第 4 期；陈中原等：《太湖地区环境考古》，《地理学报》1997 年第 2 期。

③ 张敏等：《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 年第 2 期；丁金龙：《马家浜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农业考古》1999 年第 3 期。

④ 谷建祥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 年第 3 期；黄翡等：《苏州草鞋山遗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植硅石研究》，《微体古生物学报》1998 年第 1 期。

涉及器物功能、制作等方面的研究。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最早出现玉器的原始文化之一，主要有玉玦、玉璜、玉管、玉环等。但是相关专论极少，主要是在良渚文化玉器研究中偶尔将玉器的起源追溯到马家浜文化^①。

6. 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主要是根据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植物及水稻的种子来推测当时的食物结构。马家浜文化诸遗址中均发现了大量的兽骨与食用的野生植物，如马家浜下文化层的黑色黏土厚达 0.25m~0.75m，T1~T3 的黑土层厚 0.1m~0.5m，其中接近坑底的 0.2m~0.3m 几乎全是兽骨堆积，下文化层兽骨比上文化层多。

考古人员曾从马家浜遗址所在的供销社中收购了从该遗址出土的两万多斤打算用作肥料的动物骨骼^②；罗家角出土的动物骨骼超过两千斤；邱城遗址建筑遗迹两层硬土面之间的灰土里有较多的兽骨；梅堰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兽骨、鹿角，及骨石质箭镞、鱼镖、网坠等。而且，在罗家角、圩墩^③、青浦崧泽^④、福泉山等良渚文化以前的文化层中，动物骨骼均以野生动物为主，直到良渚文化的龙南等遗址中，驯养动物才开始增多^⑤。因此，学者推测马家浜文化时期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较大。

罗家角等遗址发现了稻谷与骨耜，土壤中也发现了水稻植硅石，因此可以推测马家浜文化时期已有较成熟的稻作农业^⑥。或者至少在马家浜文化晚期，粳稻可能已经被大量栽培^⑦。据此认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稻作农业和渔猎经济并重并相互补充，这种经济形态得益于当时优裕的生态环境。

由于马家浜文化时代较早，且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遗存，因此整个环太湖

① 魏正瑾：《马家浜文化玉质装饰品考察》，《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② 牟永抗：《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纪念马家浜文化发现四十周年》，《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③ 黄文几：《圩墩新石器时代出土动物遗骨的鉴定》，《考古》1978年第4期。

④ 黄象洪等：《崧泽遗址中的人类和动物遗骸》，见《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吴建民：《龙南新石器时代出土动物遗骸的初步鉴定》，《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

⑥ 范毓周：《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

⑦ 郑云飞等：《从南庄桥遗址的稻硅酸体看早期水稻的系统演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地区成为稻作起源研究的中心地区之一，这也成为近年马家浜文化研究中一个重点。开始，以游修龄为代表的学者对遗址中出土的水稻颗粒进行判别，认为当时的水稻尚未分化出粳稻和籼稻两个亚种，表现为一种原始形状，也即处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状态^①。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郑云飞为代表的学者利用水稻植硅石分析，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②。

7. 文化关系

文化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周边文化的居址形态、窖穴式样、葬俗、石器形制和陶器等方面的比较上。这项研究在对马家浜文化的命名过程中即已开始，并是分期和分区的主要入手方法；也有学者对马家浜文化与周边文化、主要是河姆渡文化进行比较研究^③。

在马家浜文化的各个亚类型中，太湖以北及与宁镇地区相邻的遗址、太湖以南与河姆渡文化相邻的遗址分别与南北两地相邻的文化似有更多的交流与相似性，而中心区的遗址的文化面貌相对要单纯一些。在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上，在河姆渡遗址第3、4层中，河姆渡文化因素要比马家浜大，及至河姆渡遗址第2层时，则转变为马家浜文化因素大于河姆渡文化。

8. 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的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为指导，探讨这一时期是否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如吴汝祚认为，马家浜文化各遗址均发现有大量野生动植物，狩猎采集经济重要，因此推断妇女地位较高，应是一种母系社会^④。

也有学者根据马家浜文化墓葬一般没有或只有很少随葬品，且多为日用陶器，推断当时贫富差别和私有观念不明显。少数遗址所见的合葬墓都是年

① 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

② 郑云飞等：《河姆渡罗家角两遗址水稻硅酸体形状特征之比较》，《株洲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郑云飞等：《太湖地区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水稻硅酸体形状特征分析》，《中国水稻科学》1999年第1期；郑云飞等：《从南庄桥遗址的稻硅酸体看早期水稻的系统演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郑云飞等：《罗家角遗址水稻硅酸体形状特征及其在水稻进化上的意义》，《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郑云飞等：《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水稻硅酸体形状特征及其稻种演变初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③ 吴汝祚：《试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④ 吴汝祚：《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龄相当的同性合葬，未见男女合葬，氏族内年龄相当的同性成员被埋葬在一起，于是推测当时盛行对偶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①。

也有学者认为马家浜文化的早期为母系氏族社会，而晚期开始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比如，罗家角遗址的第三、第四文化层所发现的两具人骨架，其中一具成年女性的头骨基本完整，但少一个上颌左犬齿，缺齿部位齿槽胀满，说明死者生前早已拔除。张梅坤认为拔除部位明显的上颌犬齿、门齿等几个齿种，是作为氏族成员是否婚配的标志。据此推测，罗家角遗址早期，应该属于母系氏族阶段，实行对偶婚，已排除了同胞兄弟姐妹间的通婚，实行男性从女方居住的族外婚。在稍晚的第二文化层中，发现一个头部残缺的裸体泥塑立像，残长 6.5 厘米，腹鼓出，背部内凹，两短腿微屈，稍向两侧分开。上肢已残缺，两腿间塑有形态夸张的锥形男性生殖器。罗家角第二文化层陶祖的发现，说明女阴或女性崇拜的衰退与让位，也是男性性崇拜的萌芽与发展，反映了从母系向父系过渡的一种迹象^②。

9. 原始宗教与艺术

与原始宗教或巫术相关的材料有：罗家角遗址发现的白陶豆、陶塑人像、各种陶塑动物，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发现陶制的兽面形纹支座和兽面形纹的器耳，圩墩的特殊功能的土坑等。其中白陶豆器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浅弧腹的豆盘，下部附有粗壮而高的圈足，器表压印凸起的弦纹、匀连纹、曲折次、菱形纹、月牙纹等组合成类似饕餮纹样的图案。支座的兽面纹，两眼向外鼓起，嘴扁宽，被认为是一种神兽，并可能与巫术活动有关^③。

江苏常州市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清理出一个土坑，平面呈亚腰形，四角突出，直壁，坡形底，长 2.06 米、宽 1.24 米。坑内堆积分两层，上层厚 0.7 米，灰褐色土，质地较硬且纯净，含陶片少；下层厚 0.34 米，深褐色夹黄色土，红烧土粒较多，土质坚硬，出土大量陶片，有人推测这可能是进行祭祀活动的遗迹^④。

① 南京博物馆：《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张梅坤：《试析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的内涵与特征》，《农业考古》1999 年第 3 期。

③ 吴汝祚：《马家浜文化的社会生产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1999 年第 3 期。

④ 江苏省圩墩遗址考古队：《常州圩墩遗址第五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95 年第 4 期；车广锦：《马家浜文化——东方文明的曙光》，《农业考古》1999 年第 3 期。

迄今为止，马家浜文化研究与良渚文化相比，显得相对较为薄弱。其中以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为标志，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的高潮，第二次高潮则以 20 世纪 90 年代马家浜文化 40 周年的纪念会为标志。追溯研究的历程，80 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文化的确认，年代学，文化分期、分区等方面，并随材料增加进行相应充实。90 年代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农业起源、环境考古等方面的问题，并更多地开始借助于一些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探讨经济形态等重要问题。至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涉及更少，而且非常粗浅，是最薄弱的研究环节。

三、思考与展望

1. 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马家浜文化研究从目前的状况而言，属于习见的文化历史学范式。这就是用典型器物组合来确立考古学文化及划分区系类型，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进行分期、追溯和分辨文化关系，并根据发现的考古材料对文化所反映的生存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做一些主观推测。虽然这种传统方法已成为我国学者的一种定式思维，但是就目前考古学发展现状而言，这种研究已显得有点过时，并且远远不够了。

用器物组合来定义考古学文化的传统方法在 20 世纪 60 年代起在国际上已经开始过时，因为这种只见器物不见人的描述性研究很难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历史知识。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 20 世纪 20 年代首创用考古学文化概念来定义一定区域和一定时段内拥有相似文化特征的史前文化，他认为这样的考古学文化相当于民族学中的部落或氏族群体。柴尔德一度认为，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只有当人们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才有可能，那些拥有相同考古学文化的人应当具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意识、并在社会和政治上彼此认同^①。

但是到了 20 世纪中叶，这一范式已经受到了包括柴尔德本人在内的广泛质疑。考古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考古学文化并不以机械的方式与部落或民族这样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不一定与社会或政治结构相一致。民族学的进展也使考古学家们认识到地理隔绝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在史

^① 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前阶段由于交流的不便，物质文化呈现区域差异是很正常的现象。

像语言或方言常被语言学家用来分辨社会群体一样，典型器物作为一种相似的工具被考古学家来判别史前社会群体。但是我们也应当明白，这些分辨的标准是很难掌握的，特别对于不同群体范围的界定。更重要的是，将语言与民族群体相对应的分辨方法不同，民族考古学研究发现，不同器物类型和文化特征可能有不同的传播机制。也就是说石器、陶器、居址形态、装饰品、葬俗的传播机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它们的分布范围也并不完全重合，单凭某些器物是难以确定一个民族群体的身份或分布范围的。正如柴尔德曾指出的，那些实用的器物如工具和武器比较容易被模仿而传播较广，因此比较适合分辨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而陶器、葬俗和装饰品则反映了群体的习俗或偏爱，可以用来分辨群体身份^①。到了史前阶段后期，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发展，一些标志信仰、等级和社会地位的物品会因其所拥有的特殊象征性而会随强势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与日用器物完全不同的传播特征，良渚玉器被不同区域复杂社会的采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化功能分析、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引入考古学，考古学文化被看作是一种对特定生态环境的适应系统，而不同物质文化在人类社会的适应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简单地比较器物工具而不了解这些器物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生存方式，导致物质文化的差异，而人群不同的习俗、爱好、甚至价值观，也会影响到物质文化的特点。所以，人类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受制于历史传承的机制，有时生态环境对文化性质的制约更大。由此可见，如从文化的功能观进行审视，用主观挑选的器物特征所定义的考古学文化，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换言之，不考虑到文化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器物的特殊功能，单凭器物的异同来进行命名和分区意义是不大的。

再有，物质文化是易变的。同一时期相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能小于同一种文化百年后差异。所以，如何把握文化共时性和历时性所表现出来的异同，是考古分析必须仔细考虑的问题。否则，单凭某些考古现象来简单做

^① Trigger, B. G., *Gordon Childe: Revolution in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出分区或分期的判断，很可能与历史实际面貌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

为此，正如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凭经验的直觉判断在许多情况下是误人的，而且会发现有许多我们原来想做的事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必去做的，相反有些事却是可以做好的。这种反思改变了在传统学科研究体系中所获得的成果和定型认识，从而必须对这些认识做重新修整^①。

下面我们尝试从生存方式、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几个方面来对马家浜文化的深入研究进行一番思考与展望。

2. 生存方式

(1) 器物分析。如果我们将各种器物看作是史前先民用来开拓周围的环境，以保证社群生存和繁衍的手段，那么我们必须从功能的角度和详尽的数理分析来了解这些器物工具所表现的人类生存方式，以及对环境的适应和不同资源的利用。

人类发明和使用的各种工具被看作是人们超肌体的适应方式，是被用来解决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比如，一些磨制石器在早期很可能是被用来砍伐森林和建造房屋的，后来出现了许多用于农耕的器物。对这些不同石器的功能分析和数理统计，可以了解当时先民日常的劳作以及不同生产活动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对渔猎采集工具的种类、功能和数量分析，可以和动植物遗骸分析相对照，了解当时渔猎采集经济所占的比重、捕猎方法、不同物种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性以及历时发生的消长。将器物分析与环境考古研究的成果相结合进行整合分析，我们可以从文化和环境的互动关系来了解人类生存方式和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发生的缓慢变迁。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分析对象，当前的陶器分析我们应当突破过去那种类型学的描述性方法，拓宽视野，努力采用各种现代高科技手段来提炼这些器物所反映的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陶器形制研究不但能用来断代，分析生存方式，还可以用来研究社群之间的交往。在功能分析上，欧美学者早就发现一般用于炊煮的器物是不予施彩的，而且多为夹砂陶，因为火烤会使彩绘变黑，而夹砂是为了让陶器更耐火烤。于是，彩陶和素面加砂陶往往

^① Clarke, D. L., *Archaeology: the loss of innocence. Antiquity*, 1973, 47: 6—18.

有不同的形制和制作方法，彩陶一般是用做储存或食用器皿，因为不用于炊煮而多为泥质陶，而炊煮器多为夹砂的素面陶。

在史前期的简单社会中，陶器一般是妇女生产的家庭手工业，可以反映以聚落为单位的生存方式。进入酋邦阶段的复杂社会，陶器有可能成为男性为主导的作坊式的商品生产，其使用和流通与简单社会有所不同，因此其分析方法也应当与观察简单社会的陶器分析不同。苏联和美国的考古学家根据聚落陶器形制的异同，分辨出一些社会群体从母居的社会形态。陶器有时是社群之间存在不同程度交往的证据，如通婚、交换和经济合作等。一般认为，同一时期遗址之间陶器的相似性应当随它们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但是，实际考古学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大部分情况下遗址陶器之间的相似性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没有刻板的相伴关系，而取决于当时群体之间的交往方式^①。

现在陶器的功能分析引入科技手段可以更深入提炼人类的行为信息，如从实验分析来观察器物表面的处理和变化，包括器物内外表面的结构、泥釉、抛光、烟熏、手指抹平、树脂外涂等各种特点。用于炊煮的陶器表面的某种结构与特点往往与热反应的效能和耐热性有关。一般认为陶器表面的某种结构可以使陶器暴露在烹饪火焰中的面积增加，从而通过提高热效率而扩大热效能。耐热性可以从受热外表面的处理、烧成温度、陶土的性质、胎壁的厚薄、器皿的形状和尺寸、内表面的处理等方面来加以研究。

残渍分析则被用来了解陶器的用途、加工食物或存放物质的种类，其中包括：①烟灰分析，陶器表面的烟灰的分布可以确定是如何被用来炊煮的，如置于火上还是放在火中；②残渍分析，主要收集器物内残留的食物残渍如锅巴，以了解当时人们食物和烹饪方式。比如，对两河流域史前陶器内的锅巴分析，考古学家得知史前先民采取的是一锅煮的烹饪方式，和现在当地居民的烹饪方式非常相似。还有分析残留于或渗入器表的各种成分如酒、动物脂肪、植物油等，可用色谱法来分析出各种成分，用同位素还可区分出这些东西是本地产的还是输入的。比如，日本学者佐原真采用脂肪酸分析法对平城宫出土的灯碗进行研究，得出当时采用菜籽油、动物油和鱼油点灯的结论，

^① Plog, S., *Stylistic Variation in Prehistoric Cer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引起学界的轰动。

陶土的岩相学分析被用来分析陶器材料的成分，其作用包括：(1)根据成分特点追溯陶器的产地或原料的来源，用以分析陶器为本地生产的还是交换或贸易的产品；(2)可分析许多与原料处理、陶土处理相关的技术问题。

标准化和专业化是陶器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的方面，被用来分析手工业规模和复杂化程度。标准化表现为陶器形制和尺寸变异程度的减小，陶器尺寸规范表明生产标准化程度高，而尺寸变异范围大，表明标准化的程度低。而生产专业化是指物品生产是为了满足更多的消费人群，通常表现为轮制技术的广泛采用，并由全职工匠承担^①。

专业化是指专职陶工的存在，与社会手工业出现相关。标准化与专业化又紧密相关，专职工匠的产品会实行标准化，而标准化陶器反过来可以指示专职陶工的存在。专业化还可能表现在某些特殊器物如标志身份、地位或特殊丧葬用品生产上的专业化，这类器物的生产往往受社会贵族阶层的控制，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的程度。因此标准化陶器和生产方式与社会复杂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②。专门化可通过对陶器各方面的比较，包括形制(用途、象征性)和技术(黏土、掺和、烧造)、装饰或表面的处理、尺寸等重要方面的变化加以识别^③。

(2)稻作农业起源。马家浜文化的时代比较早，其中存在稻作农业的迹象，因此成为研究我国稻作起源的重要对象。目前我国的稻作起源还局限于实证性的研究，即以寻找最早的栽培作物种子来确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虽然这对于确定最早的栽培作物有所帮助，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即哪里发现最早的栽培作物的证据就把那里看作是起源地。因此先后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说、长江中游地区说、华南说甚至是淮河流域说，造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我们知道，有意识选择和控制动植物种类和繁殖一直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一种努力而

① Stark, M. T., Ceramic production and community specialization: a Kalinga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 *World Archaeology*, 1991, 23(1): 64—78.

② Roux, V., Ceramic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nsity of production, quantifying degrees of specialization. *American Antiquity*, 2003, 68(4): 768—782.

③ Rice, P. M., Recent ceramic analysis 2: composition, produc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996, 4(3): 165—202.

普遍存在于整个史前时期，而农业经济取代狩猎采集则取决各种因素和条件。只要符合这些因素和条件，农业就会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里产生。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农业起源的时间相当集中，即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之交的短短几千年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导致其发生的背后应该有一种动力机制，因此农业起源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这种动力机制。这就需要一种理论建设来指导研究并提出可信阐释依据。目前国际考古学界有关农业起源的理论主要有：人口压力说、竞争宴享说、富裕采集文化说。

人口压力说由博塞洛普(E. Boserup)提出，并由科恩(M. Cohen)做了详细论证。该理论认为，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失衡会使人类采用一种饥不择食的广谱经济，从利用高档资源转向低档资源。当人口继续增长，对驯养动植物的依赖会导致农业经济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发展，最后取代利用经济^①。

竞争宴享说由海登(B. Hayden)提出，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驯养动植物因其数量有限与供应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种类与充饥无关。因此，驯养动植物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②。

富裕采集文化说由张光直提出，该观点与海登的宴享说有些类似，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在饥荒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只能由基本温饱无虞、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们所尝试。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③。”

从这些理论来审视我国境内的农业起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南北地

① Cohen, M. N.,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Hayden, B., Model of domestication. In Gebauer A. B. and Price T. D. (eds.),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y*, Madison: Prehistory Press, 1992, 11-19.

③ 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区的农业起源很可能是由不同的动力机制所引发。北方地区的粟、黍、高粱和麦子等旱地作物的起源很可能与应付季节性的粮食短缺有关，而南方地区的水稻处于一种生物量较高的沼泽相环境，野生资源比较丰富。我们从马家浜和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野生动植物遗骸可以看到当时野生资源的丰富程度。因此，稻子的驯化应当并不源于食物短缺的人口压力，但是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力来栽培稻谷，则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探究背后的原因。马家浜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应当在这个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3. 社会结构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还是习惯于从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发展的进化理论来解释史前社会结构和演化，即原始社会由母系进化到父系，然后发展到阶级社会。比如，有学者从经济形态或葬俗推测马家浜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认为在狩猎采集经济中妇女地位较高，或将同性合葬墓看作是母系社会对偶婚的表现。在没有任何民族学证据的支持下，这些结论难免显得过于简单和武断。

其实，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演化理论是在 19 世纪民族学和考古学证据十分单薄的情况下建立的，随着 20 世纪人类学的进展，学界对人类原始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北美的人类学研究表明，早期狩猎采集社会一般是以夫妻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由于男子在家庭生产中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普遍是父权制的。倒是在定居的大型农业社会中，因其以母系论血统的组织形式，表现为一种母系的特点。这一点与我们一些学者的推测正好完全相反。

需要指出的是，以父系或母系论血统与父权、母权制是指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辨认族群谱系而言，这是一种血缘维系的不同社会组织机制；而后者则是一种管理和统治形式。现在普遍认为，史前社会中只存在过以父系或母系论血统的社会及父权制的社会，而母权制社会“除了在对社会神话的记忆中和在研究家庭权力问题的最早的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想象中存在过以外，从未存在过”^①。

^① 安德烈·比尔基埃：《家庭史——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第 1 卷上册）（袁树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母系社会中，男子的地位不一定比女子低，而仅指从母方来论世系。在这种社会中，男子可以拥有很高的单位，只是其身份从母舅而非父亲。而在父系社会中，女子的地位也可能高过男子。如新几内亚的阿布昌利社会，在那里的父系社会中，女人才是权柄的真正掌握者^①。

此外还有一些部族采取同等承认双系，这种世系制度也见于我国云南。比如，克木人的社会既非父系也非母系社会，而是“按性别递延，即子随父，女随母，世代相传”^②。而永胜彝族的他鲁人正式结婚，一般要实行夫方居住，按父系计算世系，子女从父姓，财产传子而不传女。但他鲁人若遇女方无劳动能力或是独女，或男方经济困难，缺乏基本生产资料，不能独立组成家庭等情况，则实行妻方居住，即所谓上门。凡上门者子女仍从母姓，就不实行父系了。还有下列情况不实行父系：夫死回娘家的妇女，离婚回娘家的妇女，终身过尼查马生活的妇女，其子女均从母姓^③。

因此，考古分析仅仅试图用经济形态或葬俗来推断社会结构是很不适当的，也是难以做到的。而从个别现象来和经典著作中的论断对号入座，则更显刻板教条。

要识别马家浜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应更多地借助于聚落考古的研究手段。聚落考古学是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并从三个基本的分析方面：单个的建筑结构、聚落与聚落分布来分析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研究房屋布局与建筑的功能就能了解很多有关核心家庭与社会组织结构、等级分化和职业专门化方面的许多内容^④。目前西方流行的“家户考古学”(household archaeology)注重房屋特点和功能分析，并结合民族学资料来解读家庭社会结构，应当为我们所重视。

① 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宋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赵卫邦：《解放前西双版纳的社会结构》，见《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③ 汪宁生：《云南永胜彝族(他鲁人)的原始婚姻形态》，见《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④ Trigger, B. G., 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s and promise. *American Antiquity*, 1967, 32(2): 149—159.

由于材料关系，要了解马家浜文化的聚落分布尚显困难，但要弄清聚落内部布局和个别建筑的结构则是可行的，尤其是后者。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马家浜遗址上文化层发现了长方形房址，两排柱洞基本平行，东西宽 2.75 米~3 米，现已发掘的南北长应在 8.5 米以上。邱城下文化层有一个长达 36 米的面积为 265 平方米的发掘单位，似乎表明这一时期流行一种“长屋”结构。这种长屋建筑在世界各地都有所见，如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普遍居住在长屋组成的村落中。但是从民族学资料来看，长屋内部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各地区、各个时期是很不相同的。它可以是许多父系核心小家庭在基本无多少经济联系之下的一种地域性的居住方式，如云南的基诺族。也可以是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一种扩大母系家庭居住方式，如布朗族^①。因此，这需要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采取更为细致的发掘和采样分析，以分辨这些“长屋”究竟是属于何种性质的居住形态，这需要涉及建筑内部功能分析，诸如生活劳作、男女活动区，家庭规模和宗教活动等。只有这些情况清楚了，才能推测其功能，进而推测其社会关系。

4. 意识形态

这一领域是对考古学研究最严峻的挑战，因为它处于英国考古学家霍克斯于 20 世纪 50 年代所确立的考古研究三个难度级别中最难应付的层次。目前对马家浜文化这样早期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上仍处于非常粗浅的阶段，除了对于一些遗迹和现象做一些纯粹的推测以外，无法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艺术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早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大约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纯艺术尚未出现的时候，史前期的艺术可能更大程度上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诸如新石器时代刻意捏制的陶塑制品、绘制的陶器纹饰和图案，以及精致加工的玉石制品都应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这些艺术品需要用象征考古学方法来加以解读。

宗教是人类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超自然和超人的神灵和力量有关，表现了人类对无法预见和无法控制的自然力以及命运的敬畏，宗教超越了人类日常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宗教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宗教信仰在统治机

^① 汪宁生：《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见《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制尚不完善的复杂社会中被首领们操纵来实施控制，规范社会的等级和不同社会成员的行为。从人类宗教发展的四个层次，个人宗教、萨满教、群体宗教和教会宗教来看，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宗教形式大致相当于个人宗教或萨满教。

伦福儒和巴恩提出了将宗教遗迹与日常活动区分开来的四个方法：(1)集中注意力。祭祀活动常常需要表现狂热的宗教热情，因此都需要有集中注意力的各种设施，如神龛和庙宇。(2)两个世界的界限。祭祀活动的焦点是现世与神界的交界区，是一个特殊而又神秘的区域。(3)神的存在。神一般用某些物质形式或形象来予以象征。这种象征物不一定非常复杂，一种符号或容器里看不见的东西都可以被用来代表神灵。(4)参与和祭品。祭祀常常需要一些活动如舞蹈或宴饮来表现，此外还有贡品和牺牲。从考古学角度而言，如果能够发现以上这些祭祀标志共存的话，那么就有理由来推断宗教活动的存在^①。

四、小 结

在马家浜遗址发现至今的 50 年里，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特点表现为基本材料的积累和区系文化类型的确立。就学科发展而言，这些成果是考古研究的必不可少基础。但是在积累了一定的材料之后，建立在扎实理论基础上的科学阐释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考古材料做出科学的阐释才是这门学科的核心所在。如果考古学研究仅仅局限于发掘采集一些材料，发表一份简报，显然已远远不够了。这需要我们引入和借鉴当代国际上流行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重视学科交叉，从生存方式、社会结构和意识信仰三个层面，对马家浜文化和其他史前文化进行全面和整合研究，深入了解我国史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总结我国史前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并对一些战略性课题如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动力的探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与郑建明合作，原刊《东南文化》2005 年第 4 期)

^①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一、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 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将人类的稻作文明又推前了3 000年。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并列为世界考古学的三大战略性课题，而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这项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实证的层次，即以寻找最早的稻谷遗存来确定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阐释层次上，学者们还倾向于把稻作起源看作是人类的创造，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 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距今9 000~7 800年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距今9 000~7 000年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10 000年以上^①。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距

^①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今 9 000 年到距今 10 000 年的稻谷^①。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稻作起源，何处是摇篮？

二、理论与实践

我国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和认识基本仍处于国外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发现论”阶段，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因此农业起源的原因是一个无须深究的问题。于是，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时间以及传播和扩散的轨迹。对河姆渡和玉蟾岩发现古老炭化稻谷的认识，就是“发现论”思维的表现。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研究的范式开始从寻找最早驯化的植物种子，转向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式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目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农业起源理论有以下几种。

1. 人口压力理论

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塞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②。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③。

2. 竞争宴享理论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

① 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长江下游早期稻作文明的最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11 年第 7 期。

② Boserup, E.,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Chicago: Aldine, 1965.

③ Redding, R. W.,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subsistence change: from hunter-gathering to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88, (7): 56-97.

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海登还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在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①。

3.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

和海登的理论模式有些相仿，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 50 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其论点是，在饥馑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有在饥馑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②。与竞争宴享理论不同的是，富裕采集文化理论没有解释为何不愁吃穿的人群要从事农业这种时间和劳力支出很大，而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劳动？因此，上面的宴享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4.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这一理论注重农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农业起源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群体，刺激了粮食生产的出现^③。随着社会的日趋增大和复杂，会出现比简单社会更多的需求。对权力与个人的财富追求，这也促进了少数人扩大生产的愿望，特别是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增大的需求成为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

从上述几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

① 布赖恩·海登：《驯化的模式》(陈淳译)，《农业考古》1994 年第 1 期。

② Sauer, C., *Agricultural Origin and Dispersal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9.

③ Bender, B., Gatherer-hunter to farmer: a social perspective. *World Archaeology*, 1978, 10(2): 204-222.

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旱地农业和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华北的旱地农业似乎和人口压力的理论模式比较吻合，而稻作起源则用宴享模式或富裕采集文化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这表明，农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可以由不同的动力机制所激发。对动植物繁殖进行操纵在史前的狩猎采集经济中应该早就存在，而改变局部环境或选择利用的物种也是普遍的一种活动，然而从栽培转向农业，也就是说使栽培作物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很可能是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科学研究导向性的思维，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这项工作也无法单凭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独家学科能力所能解决，需要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

三、考古学观察

目前我国稻作起源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即使考古发现将炭化稻谷时代追溯得再早，也不能告诉我们农业起源的原因；其二，稻作起源的实证研究容易变成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技术性鉴定工作，不能将它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一部分，很好地与环境考古及生产工具或遗迹分析结合起来，了解农业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熟，以及它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应该把农业和栽培区分开来。农业是指人类生存主要依赖栽培或驯化作物的一种经济形态；栽培是指人类开始操控某些有用物种的繁殖。一看野生稻出现变异性状就认为是农业起源的证据是不恰当的，因为许多耕作和栽培方法并不能改变植物的性状，即使有些情况下这种性状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发生需要经历多长的时间，近年来对是否能够通过形态学来分辨野生和驯化作物仍然存在争议。

其次，从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从人类开始栽培作物到这些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到45%的比重，经历了3 000多年的漫长岁月。

在栽培植物出现和缓慢增长的阶段里，人类的生存主要还是依赖狩猎采集，因此不能将这种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来定义农业经济。

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1. 经济背景

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遗骸。从目前发掘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动物群利用的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下面对各主要阶段的重要遗址动物统计资料进行一番比较。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 61 种，其中哺乳类 34 种、鸟类 8 种、爬行类 6 种、鱼类 10 种、软体动物 3 种。利用最多的为各种鹿类，其数量数倍于猪的数量。

跨湖桥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 33 种，其中哺乳类 15 种、爬行类 2 种、鱼类 3 种、鸟类 12 种、蟹 1 种。其中鹿类和水牛的数量最多，它们的总数占有所有哺乳动物的 54%。从哺乳动物的数量变化来看，各种鹿类动物的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 30% 到中期的 33%，再到晚期的 37%。水牛和狗的数量显示先扬后抑的利用趋势，水牛从早期的 13% 增长到中期的 20%，到晚期下降到 16%。狗从早期的 4% 增长到中期的 12%，到晚期下降到 8%。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 27% 下降到中期的 10%，到晚期变为 9%。在这些哺乳动物中狗和猪被鉴定为驯化物种，而它们的数量在经济发展中并不呈持续上升趋势，家猪的数量甚至表现为持续的下降，和鹿类利用的增长正好相反。从遗址动物群总体数量统计来看，猪等家养动物占 12%，野生动物占 88%。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发现有各类动物 20 种，其中哺乳动物 9 种、爬行类 5 种、鸟类 1 种、鱼类 4 种、贝类 1 种。猪等家养动物占 15%，野生动物

占 85%。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动物计有 9 种，其中哺乳类 7 种、爬行类 1 种、鱼类 1 种，猪等家养动物占 26%，野生动物占 74%。

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苏州龙南遗址，出土的动物有 12 种，其中哺乳类 7 种、鸟类 1 种、鱼类 1 种、贝类 3 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 70%，野生动物占 30%^①。

上海闵行马桥遗址中，良渚时期出土的动物计有 13 种，其中贝类 4 种、鱼类 2 种、爬行类 1 种、哺乳类 6 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 56%，野生动物占 44%。马桥时期出土动物 19 种、其中哺乳类 12 种、爬行类 1 种、鸟类 1 种、鱼类 3 种、贝类 2 种。猪等家养动物占 21%，野生动物占 79%^②(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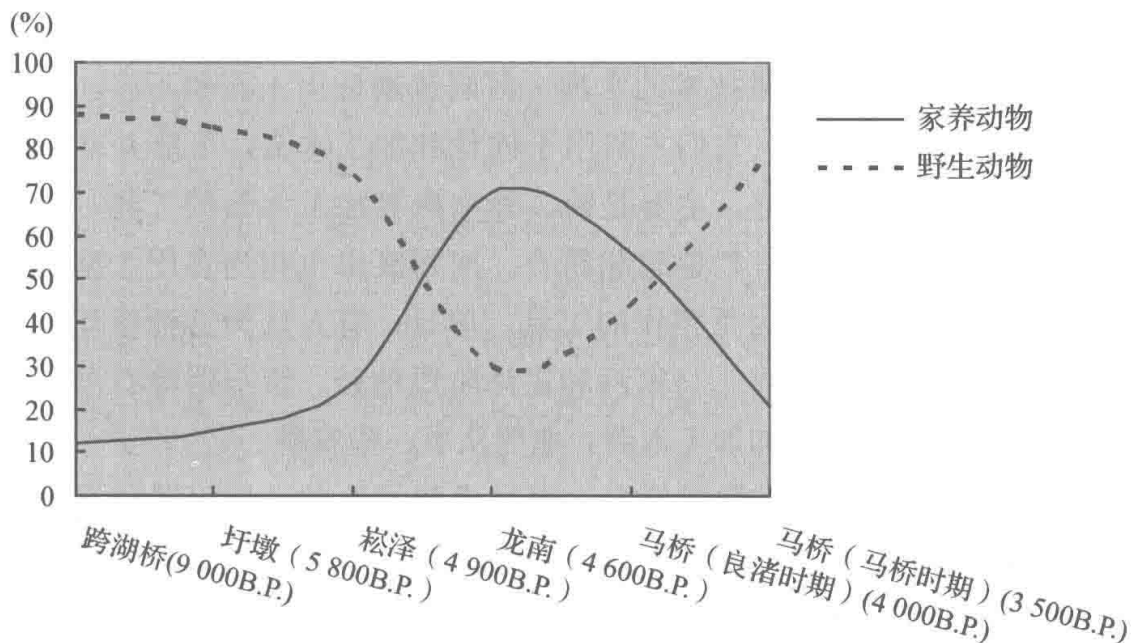


图 1 长江下游史前遗址野生与家养动物利用的历时变化

2. 水稻

稻谷的形态学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粳、类籼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约有 50% 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马桥》，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 年版。

低的原始栽培稻。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粳型、偏粳型、亦粳亦粳型、非粳非粳型等多种形态，说明在很长时期里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和选种并不非常在意。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了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稻谷形态的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不能确定，但是参考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20年到200年之间就可以完成这一情况，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需太长的时间。从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科学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这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

3. 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斨和凿，它们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可能并非农耕工具。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斨、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这和这些遗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杆栏建筑相符合。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用大型哺乳类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认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杆栏建筑的挖土工具。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斨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

良渚时期，不仅石器的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犁、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确凿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的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一般来说，功能专一的器物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积的耕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需要劳力的协作。

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是数量最多的是斨、刀、镰和镞，犁极少。斨个体比较小，应是一种加工木器的工具。刀和镰可用于收割和采集，但从明显缺乏耕土工具来看，马桥时期的稻作生产，显然不是良渚时期的那种组织劳力的精耕细作。良渚和马桥农业工具的显著差别和植硅石分析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显示，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

而马桥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①。

4. 稻田与耕作

对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 16 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而对澄湖角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有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积达到了 100 平方米以上^②。马桥时期的环境分析表明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

四、讨论与小结

我们想从农业起源的理论对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分析，加深对稻作农业起源动因的认识。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酝酿阶段比较符合竞争宴享说或富裕采集文化说。从 9 000~7 000 年前的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开始，人类开始栽培稻子并不标志农业的起源，因为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几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来果腹。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人们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根据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他认为，像玉米和其他谷物在史前期用于酿酒要比果腹更重要，酒类在富裕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和劳力调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说法最近为贾湖的发现所证实，中美考古学家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鉴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酒类残渍^③。当时贾湖遗址和长江下游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野生资源非常丰富。因此，贾湖米酒的证据也为解释水稻在长江下游悠久的栽培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

农业经济成为史前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可能与社会复杂化关系密切，这一考虑比较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解释。良渚时期长江下游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等级分化加剧，资源的积累、消耗与分配以及大规模劳力的调遣成为酋邦运转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的生产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马桥》，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丁金龙：《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水稻田与稻作农业的起源》，《东南文化》2004 年第 2 期。

③ 蓝万里：《我国 9000 年前已开始酿制米酒》，《中国文物报》2004 年 12 月 15 日。

与消耗，以及大规模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这样的复杂社会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显然要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而酒类也可能成为社会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因此强化粮食生产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从稻作生产和家畜的饲养规模上，看到良渚阶段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这一显著的变化应该与良渚贵族阶层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密切相关，因此农业经济的成熟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关系更为密切。

到了马桥时期，良渚的大型酋邦解体。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原来施加在百姓头上的强化剩余产品生产的社会机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自然资源仍然比较富裕的环境里，温饱无虞的人们无须再多费劳力来进行密集农耕以增加剩余产品的产量。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马桥先民仍然栽培稻谷，但是他们的生活又返回到了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之中。虽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和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可能对人类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史前期的长江下游应该是自然资源十分富庶的地区，良渚时期农业经济与其前后阶段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反差，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因此，用“发现论”来看待稻作农业的起源已无法解释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受“发现”或“发明”思维以及现代化农业优越性的影响，会使人们把农业看作是比狩猎采集来得优越的一种技术和经济形态，一旦这种技术和经济形态被发现和发明出来，它的优越性就会显示出来，并会保持持续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然而，我们从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群体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自然环境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利用野生资源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农耕经济。这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佐证，像澳洲、美洲大盆地和非洲卡拉哈利的土著人，他们即使在政府和传教士的鼓励下，面对工业化社会产量很高的粮食生产，也是最迟缓和最勉强的接受者。

长江下游在良渚时期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这一发展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可能并不是人们自发或乐意从事的结果。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

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物来看，自早至晚显示出种类和数量的持续递减。虽然稻作生产在马桥时期出现暂时的倒退，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演进的长期趋势，农业便不可逆转地最终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形态。

我们认为，我国农业起源地研究应该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物和确定最早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陈旧模式，从史前文化适应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的演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农业起源的原因和历程。

(与郑建明合作，原刊《复旦学报》2005年第4期)

农业起源与“广谱革命”理论的变迁

农业起源是世界考古学战略性探索课题之一，其中“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是解释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向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冰后期环境剧变，打乱了人类生存的食物链，一些大型有蹄类动物纷纷消失，而人口的增长也使土地载能很低的狩猎采集经济因大型动物的锐减而面临粮食危机。人类普遍被迫转向开拓以前很少利用的小型资源，如鱼类、贝类、坚果、根茎和草籽等广谱食物种类。这些食物品种回报率较低，而且采集加工费时费力，以前在大动物较多，狩猎回报率较高的情况下是从不利用的。而动物驯养和植物栽培就是在这样一种广谱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在这一概念出现以来的四十年里，它几乎主导着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学术语境，近年来也频繁地被我国学者所论及。然而，随着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一概念也不断被反思、充实和更新。面对这种发展趋势，本文试图对广谱革命理论的变迁做一番回顾，介绍它形成的背景、要义和完善过程，梳理它在新材料冲击下所遇到的挑战，剖析这一概念遭遇困境的原因，并提出这一概念应用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结合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实际情况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一、历史的回顾

在1968年发表的题为《后更新世的适应》一文中，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 R. Binford)总结了更新世末到全新世初人类生存方式变迁的一系列

特征^①。这种变化在资源方面表现为人类加大对小型动物、水生资源和鸟类的利用，之后便出现了动植物驯化和早期农业。在解释变迁原因时，宾福德认为人口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促发因素。他指出，人口会在资源条件最优越的生境中快速增长，然后多余的人口会向资源条件略差的边缘生境转移。由于边缘生境的土地载能没有核心区域高，而生息在这里的社群又不断受到来自核心区域的人口压力，所以人口与资源的平衡不断被打破，导致食物供应的紧张。正是在这种压力下，狩猎采集社群不得不逐渐加强开拓以前所不利用的食物种类，如小型动物、鱼类和鸟类。利用这类资源一般要比狩猎大型动物在能量和技术上要有更大的投入。

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K. V. Flannery)从宾福德的观察和讨论中受到启发，提出了“广谱革命”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一人地关系的转变。他以近东为例，认为食物的广谱化是农业起源的序幕^②。他进而提出，距今20 000~6 000年间，近东地区史前社会发生过三次技术变革——广谱革命、旱地农业和灌溉农业，它们构成了文化和经济演进的“三部曲”，体现了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完整历程。根据出土材料，第一次转变发生在距今20 000~10 000年间，特别是大约10 000年前，局部的人地关系失衡导致食物短缺，人类不得不利用许多以前并不利用的物种，如小型哺乳动物、鱼、蟹、龟、蜗牛、鹌鹑、水禽、贝类，以及野生禾本科的种子，它们在遗址中出现的频率和数量越来越多。他指出这不是一个简单地从大型食物向小型食物转变的过程，而是人类开拓的资源种类从比较狭窄向较为宽泛范围转变的趋势，与这种趋势相应的是大量新的捕猎工具和食物加工工具的发明。人类这一觅食范围及开拓技术转变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广谱革命”，它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土地载能，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食物压力，并成为农业起源的先决条件。

弗兰纳利所定义的“广谱革命”概念有三个关键要素。(1)人地关系失衡：指人口数量超过土地载能，它可能是由于气候剧变导致食物资源的减少，也

① Binford, L. R., 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s. In Binford, S. R. and Binford, L. R.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313-341.

② Flannery, K. V., 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 In Ucko, P. J. and Dimbleby, G. W.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73-100.

可能是因为人口增加使原来土地载能难以满足社群的食物需求。基于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 J. Braidwood)对近东古环境的调查,宾福德和弗兰纳利倾向于认为人口压力是当地食物短缺的主要原因。(2)资源种类:“广谱”指食谱范围的拓宽,弗兰纳利列举了考古记录中所见的数量和出现频率增多的物种,与大型有蹄类动物相比,它们都属于小型物种。但这只是一种基于局部观察的归纳,无法作为可操作的标准定义来使用。所以理论上的深究还应当追问,广谱究竟广到什么程度?何种意义上的食谱才能被视为“广谱”?在实际操作中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近东被定义为广谱的物种,在其他地区是否也可归入广谱的范畴?其他地区的特定物种如何与之比较?(3)农业起源:弗兰纳利强调只有在广谱革命的背景中,才有可能发生最初的动植物驯化,它为后来成为早期栽培作物的物种提供了一种“预适应”的过程。

“广谱革命”的概念说明,农业起源不是某些先知人物的发明,而是人类社会对人口压力和食物资源短缺的一种反应。由于获取这些食物种类无论从劳力投入还是从技术改进上的代价明显高于利用高档的食物种类,所以开拓这些低档的食物种类,并进而对其中的一些物种进行驯化或栽培,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应付饥馑的一种选择^①。弗兰纳利的这一概念受到普遍的重视,因为它比较合理地说明了农业起源发生的背景和动力机制。

二、食谱宽度与广谱革命

在本质上,广谱革命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狩猎采集者拓宽食谱宽度的问题。1966年,埃尔曼(J. M. Elmen)^②,麦克阿瑟(R. H. MacArthur)和皮安卡(E. R. Pianka)^③撰文,初步阐释了觅食理论,他们分别以热量和时间作为计量单位,总结了动物的觅食规律。尽管弗兰纳利并没有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提及,但显然深受其影响。几十年来,生态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大量工作将该

^① 陈淳:《最佳觅食模式与农业起源研究》,见《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② Elmen, J. M., The role of time and energy in food preference.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66, 100: 611—617.

^③ MacArthur, R. H. and Pianka, E. R., On optimal use of a patchy environment.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66, 100: 603—609.

理论发展成了充满活力的数学模型，如查诺夫(E. L. Charnov)^①、舍纳(T. W. Schoener)^②、普利亚姆(H. R. Pulliam)^③、派克(G. H. Pyke)^{④⑤}等人陆续完善数模的条件设置，拓展理论应用范围，并论证了它在预测动物觅食行为上的可行性，史密斯(E. A. Smith)^⑥、温特海尔德(B. Winterhalder)^⑦、贝廷杰(R. L. Bettinger)^⑧等人探讨了觅食模型在研究狩猎采集群生计模式和群体规模方面的应用，特别是霍克斯(K. Hawkes)^⑨和海登(B. Hayden)^⑩注意到它在解释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方面的潜力。这为考古学和民族学探讨人类生计形态中的食谱构成提供了比较精确的定量方法。

食谱宽度模型简介如下：生态学设想生物觅食遵循两大原则，最高效的

① a, Charnov, E. L., *Optimal Foraging: Som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ton, 1993.

b, Charnov, E. L., Optimal foraging: attack strategy of a mantid.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73, 110: 141—151.

c, Charnov, E. L., Orians, G. H., Hyatt, K.,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resource depression.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76, 110: 247—259.

② Schoener, T. W., Theory of feeding strategie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1, 2: 369—404.

③ Pulliam, H. R.,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diets.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74, 108: 59—74.

④ Pyke, G. H., Pulliam, H. R., Charnov, E. L., Optimal foraging: a selective review of theory and test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977, 52: 137—154.

⑤ Pyke, G. H.,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84, 15: 523—575.

⑥ Smith E. A., Anthrop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a critical review.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3, 24: 625—640.

⑦ Winterhalder, B., Optimal foraging strategies and hunter-gatherer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theory and models. In Winterhalder, B. and Smith, E. A. (eds.), *Hunter-Gatherer Foraging Strateg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13—35.

⑧ Bettinger, R. L., Explanatory/predictive models of hunter-gatherer adaptation.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0, 3: 189—255.

⑨ Hawkes, K. and O'Connell, J., On optimal foraging models and subsistence transi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2, 33: 63—66.

⑩ Hayden, B.,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tone Age: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among hunter-gatherers.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1, 22: 519—531.

摄食和保证成功繁殖。在这个前提下，一种食物是否被食用并不取决于它在环境中的丰富性，而是以觅食效率的指标即回报率来衡量。回报率一般以觅食者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卡路里计算，觅食者总是追求回报率最大化的目标，这就是最佳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的原理。某种食物是否能被纳入食谱取决于它的加入是否能提高食物摄入的总回报率，因此如果按回报率标准将食物分档的话，食物将依该值从高到低的档次依次列入食谱的选择范围，直到某一项食物的加入会使总回报率不升反降，这时说明整个食谱的回报率已达到最大值。所以，食谱中的资源种类和项数体现了食谱宽度的内涵。

霍克斯等人是将食谱宽度模型较早应用于考察人类社会觅食的人类学家，他们对巴拉圭东部土著阿切人(Aché)的生计形态研究案例，堪称该领域的典范^①。该研究的目的是想弄清阿切人食谱中的种类构成与哪些因素有关，尤其植物资源是因为其比动物资源更可靠而被利用，还是仅起到补充作用。根据基于食谱宽度模型的推算，一类资源被纳入食谱的判别标准为：每单位时间内对该资源觅食所获的热量，应大于该资源列入前对食谱内已有种类觅食每单位时间的热量回报。用公式可以简单地表达如下：

$$E_a/h_a > E/T,$$

a：将要纳入的新资源； E_a ：取食每一单位 a 资源所获的热量； h_a ：取食每一单位 a 资源所需花费的时间(跟踪与加工时间)；E：纳入 a 资源前觅食所获的总热量；T：纳入 a 资源前觅食所花费的总时间(包括搜索时间、跟踪与加工时间)。

因此，阿切人的 16 种主要资源可依卡路里回报的高低分为 12 个档次(表 1)，随着单个资源回报率曲线渐趋下降，摄食的总回报率曲线上升，最佳食谱宽度止于两曲线相交之前纳入的物种，因为图表显示若再追加回报率较小的物种，将使总回报率降低(图 1)。最后，霍克斯认为阿切人的食谱构成与最佳觅食理论的假设相符，因此觅食回报率是他们是否利用某一物种的关键因素。在资源足够丰富的环境中，人倾向于优先取食高档食物，低档食物是否

^① Hawkes, K., Hill, K. and O'Connell, J. F., Why hunters gather: optimal foraging and the Aché of eastern Paraguay. *American Ethnology* 1982, 9: 379—398.

被利用取决于高档食物相对消费者数量而言的丰富程度。因此他进一步认为，多数低档植食只是在高档食物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才被取食，而不是因为采集植物的风险比捕猎动物小。他还提到，从旧石器时代晚期食谱拓宽一直到农业起源的过程也许可以用类似的机制来解释，大型动物的消失与“广谱化”或中石器时代生计方式的出现应当与这一原理是相通的。

表 1 阿切人食物资源档次分类

档次	资源 A	回报率(卡/小时)	资源 B	回报率(卡/小时)
1	花斑野猪	65 000	鹿	27 300
2	豚鼠	6 964	浣熊	6 964
3	狢狢	5 909	蛇	5 882
4	橙	5 071		
5	鸟	4 769		
6	蜂蜜	3 266		
7	白嘴野猪	2 746		
8	棕榈虫	2 367		
9	鱼	2 120		
10	棕榈叶芽	1 526		
11	猴	1 215	棕榈纤维	1 200
12	棕榈果实	946		

1992年，霍克斯和奥康奈尔(J. F. O'Connell)再次阐述了基于最佳觅食理论的两个推论：(1)由于人总是优先选择高档食物，因此一个地区内高档食物会先于其他物种被耗竭；(2)随着更多的资源种类进入食谱，一般搜寻时间可能渐趋减少，处理时间趋向增大，造成总体觅食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档食物的处理时间。这会导致在食谱宽度增大的同时，伴随觅食半径缩小的局面。这两个推论在与“广谱革命”相关的考古材料中都能找到可以作为证据的现象(不排除这些现象是由非广谱革命的因素所致)，如某些大型有蹄类动物在更新世末的灭绝，以及聚落领地范围的缩减。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的觅食行为与动物的觅食行为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基于动物行为的推论和基于人类觅食的食谱推论是截然相反的。生态学家根

据觅食方式将动物归类，如所谓的“搜寻者”倾向于广谱化的食物，因为它们的主要精力用于搜索，花在加工上的时间可以几乎为零，所以对碰到的猎物不会太挑剔，一切以吃饱为目标，这类动物的例子是食虫鸟。而所谓的“处理者”倾向于特化的食谱，它们消耗在食物加工上的能量和时间比搜寻者大得多，因此就要尽可能缩短搜寻时间，以便尽量频繁地遭遇猎物，供其选择，也就是“挑食”，这类动物的例子是狮子^①。但是人类的觅食行为与动物有很大不同，当他们把大量时间用于搜索猎物时，对象局限于某几种回报率较高的种类，如有蹄类动物。这时人类的食谱虽称不上特化，但范围比较小。人类把低档食物纳入食谱，似乎是高档食物在过度狩猎后几近耗竭的一种无奈选择，在加工时间成倍增长的情况下，搜寻时间越来越少，这是人类从搜寻者向处理者转变的过程，也是食物广谱化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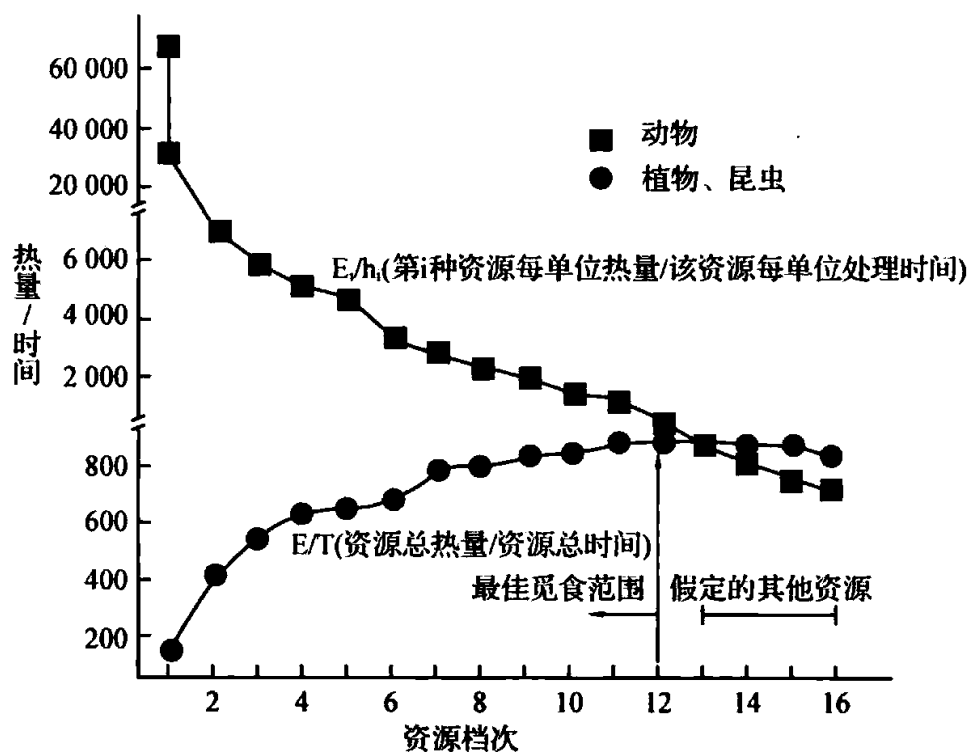


图1 阿切人最佳觅食与食谱宽度示意图

从以上分析可见，基于最佳觅食理论的食谱宽度模型为探究人类食谱的变迁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定量方法，而如何将这种方法用于研究中石器时代的

^① 雷光春：《捕食理论》，见张大勇等《理论生态学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广谱革命”，检验宾福德和弗兰纳利的观察，还需要方法上更细致的设计和完善。

三、实证研究与广谱革命

如何确定广谱革命的发生？怎样利用食谱宽度模型从考古记录中提炼出“广谱”的量化特征指标？其核心问题是哪些动植物遗存及何种表现能够代表所谓的“广谱物种”，这很大程度上涉及食物资源分类标准的合理设置。

海登借鉴生态学家常用的描述生物繁殖策略和生长模式的分类方式，把资源分为K选择策略型和r选择策略型。K选择物种的特点是：个体生长缓慢、竞争力强、体型大、可多次繁殖、生命周期长达一年以上、种群分布相对均匀、易因过量开采而灭绝，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如鹿、牛、猛犸等就是典型的例子。r选择物种的特点是：个体生长迅速、种群数量增长快、体型小、只可繁殖一次、生命周期短至不足一年、种群分布不均匀、不易因过量开采而灭绝，鼠类、各种鱼类、海洋贝类、昆虫、草类等都属于该类型^①。海登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资源压力是促使人类改变生计形态的主要因素。他把整个旧石器时代的资源开拓分为四个阶段，最初人类以零星地获取低回报率的小动物为主，随着捕猎技术的发展，开始有效狩猎以大中型食草动物为代表的K选择物种。到莫斯特时期，几乎所有大型动物都能被捕猎，直到旧石器晚期这类资源逐渐耗竭。旧石器时代末到中石器时代是第四阶段，面对人地关系失衡引发的粮食危机，人类大量利用r选择物种(图2)。显然，海登理论中的K选择物种可以对应前面提及的高档食物，它们在觅食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率先被列入人类食谱。r选择物种对应低档食物，它在K选择物种数量不足以供养人口时进入食谱，在两种资源储量不太悬殊的地区就出现了食谱宽度的大幅拓展，即“广谱革命”。同时，这些地区的社群要努力保证资源的可靠供应，因此驯化动植物的产生很可能是强化利用r选择物种的结果，这一推测与弗兰纳利认为广谱革命是农业发生的先决条件是类似的。这里，r选择物种在食谱中比例明显增加被看作广谱革命的标志(图3)。

^① Pianka, E. R., On r-and K-selection.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70, 104: 592-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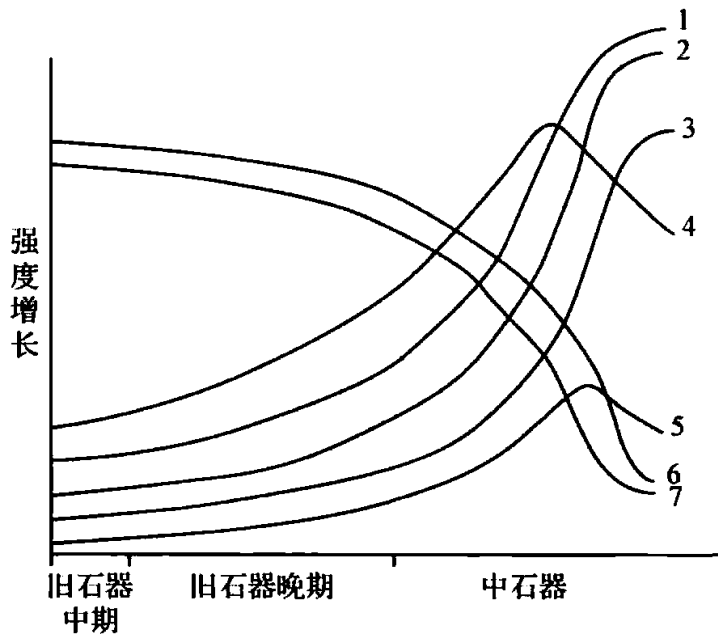


图2 旧石器至中石器时代人类生计演变示意图

- 1. 资源可靠性
- 2. 食物丰富性
- 3. r选择物种在食谱中百分比
- 4. 主食资源多样性
- 5. 技术复杂性
- 6. 游群活动范围
- 7. 游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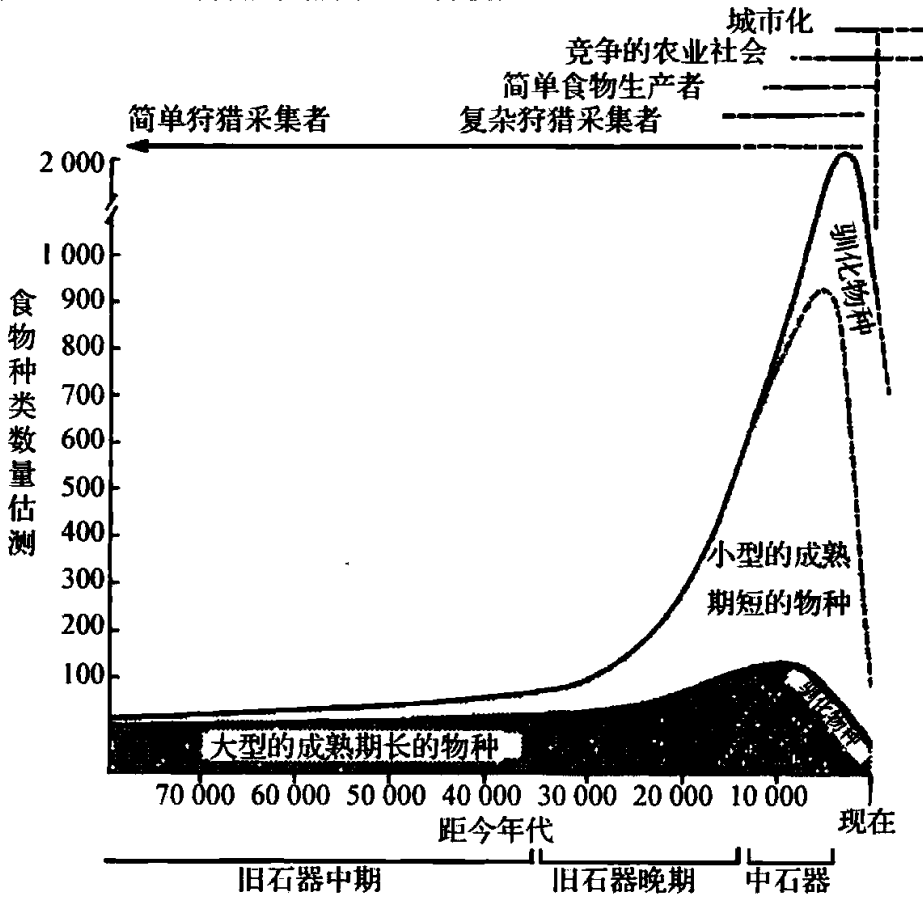


图3 旧石器至中石器时代资源结构变化示意图

虽然海登的观点和论证角度对史前生计演变的宏观趋势把握有一定道理,但稍加深究仍嫌粗糙。K 选择物种与 r 选择物种对应食物档次高低,主要还是根据体型大小的显著差异,觅食回报率差距显而易见。若考虑到回报率是一个能量与成本的比值,不单单取决于能量这一个因素,那么以猎物体型大小划分食物档次就不完全合理了,还应当把构成捕猎成本的搜寻、跟踪、加工时间都考虑在内。麦克阿瑟和皮安卡最初阐述最佳觅食理论,就是从捕食成本最小化问题入手。霍克斯也提到过类似问题,阿切人食谱中的白嘴野猪比花斑野猪体型大,但是它们经常以较大的规模群体移动,需要很多人长距离跟踪才能打到,而花斑野猪以小群体快速移动,一旦遭遇,一两人即可将其捕获,且无须跟踪。因此虽然花斑野猪肉量相对较少,但由于其觅食成本远低于捕猎白嘴野猪的投入,因此回报率反而明显高于后者,成为食谱中最高档次的资源,而白嘴野猪的回报率甚至不如体型小得多的豚鼠、狢狢和鸟。由此可知,实际评估广谱革命是否发生,不能依赖一两个指标,而应当综合考虑资源利用的所有环节以及资源在整个觅食系统中的地位,所涉变量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斯蒂纳(M. C. Stiner)在 1999~2002 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对如何从动物遗存中提炼有说服力的证据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①②③④}。在对意大利、伊朗、土耳其几处年代为距今 200 000~9 000 年间的遗址进行研究时,她提出弗兰纳利所列举的指示“广谱”的小型猎物如兔、龟、鹌鹑、贝类,实际上在繁殖能力、成熟速度、处于强化捕猎压力下的种群恢复能力,以及捕食的难易度等诸方面都明显有别,对它们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她认为食物广谱化

① Stiner, M. C., Paleolithic population growth pulses evidenced by small animal exploitation. *Science* 1999, 283: 190-194.

② Stiner, M. C., Munro, N. D., Surovell, T. A.,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0, 41: 39-59.

③ Stiner, M. C., Thirty years on the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and Paleolithic dem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1, 98: 6993-6996.

④ Stiner, M. C. and Munro, N. D., Approaches to prehistoric diet breadth, demography, and prey ranking systems in time and spa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002, 9: 181-214.

不仅表现为新列入过去被忽略的资源，还应包括资源在食谱中的比例从原来以高档食物为主向各档次食物均匀分布的趋势转变，因此不同种类小型猎物在人类食谱结构中的变化可作为反映人类适应方式转变的敏感指标。这些猎物体型差别不大，以何种指标来分档就成为关键问题。她考虑了两个制约人类利用小型猎物的因素，其一是猎物躲避捕猎的能力，一般行动快速的动物比行动缓慢的动物更能躲避追捕，躲避能力越强就意味着人类捕猎越困难，需要投入更多成本。于是她将小型猎物分为慢行猎物(如龟鳖、贝类)、快行陆生哺乳动物(如兔)、快飞鸟类(如鹌鹑)三个类型，慢行猎物档次最高，后两类档次比它低。她发现龟鳖和贝类在旧石器中期就已出现，灰山鹑、鹌鹑、鸽子等鸟类到旧石器晚期开始变得重要，而兔子要到旧石器时代末比例才明显上升，这种演变与最佳觅食模式的假设相符。基于该分类，她又计算了表示每个遗址中不同种类猎物个体数在组合中分布均匀度的辛普森指数，结果显示该数值在旧石器晚期多数遗址中都远高于较早时期，这表明各档次猎物的个体数趋向均匀，这与她的理论设想是一致的。另一因素是猎物在强化狩猎压力下种群规模的恢复能力，龟鳖种群很容易因过度捕食而失衡，而在同样条件下，兔与鹌鹑分别可以承受7倍和10倍于龟鳖的捕杀压力。因此龟鳖仅在人口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一种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兔和鹌鹑则是更可靠和稳定的资源。狩猎压力承受度弱的物种一旦被过度开采，种群的平均年龄会降低，从而骨骼尺寸普遍变小，考古材料中意大利的海生帽贝和以色列的龟都表现出个体尺寸随时间推移变小的趋势。在此情形下，人类将更频繁地捕食兔和鹌鹑，由于这两种猎物种群对强化开拓的压力不敏感，它们在食谱中的地位将得到维持和拓展，在考古记录中表现为龟鳖在小型猎物中的比重呈历时下降。因此，斯蒂纳将猎物躲避能力和种群再生能力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地中海沿岸从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末期小型猎物开拓的演变规律，很好地诠释了史前人类食物广谱化的过程，并补充了宾福德和弗兰纳利的观察，发现这个过程的开始可以提早到旧石器中期。

斯蒂纳较成功地运用觅食理论为广谱革命假说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佐证，她强调以猎物行动敏捷程度(而不是习用的生物学系统分类或猎物个体大小)

来区分资源档次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从而从纷繁的材料中提炼出有阐释意义的数据，这是其最核心的贡献。她的研究不仅提示史前人的狩猎决策可能接近这种标准，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合理的分类和统计方法。随后，施图茨(M. C. Stutz)、芒罗(N. D. Munro)和巴尔奥兹(G. Bar-Oz)吸收了这套分类标准，对黎凡特(Levant)南部距今 19 000~12 000 年间遗址的动物骨骼进行了高精度年代序列的食谱宽度统计^①。他们发现，大型猎物从旧石器末早段就开始减少，持续到纳图夫时期(Natufian period)降至谷底，主导该长时段变迁的不是气候变化而是人为因素。特别是在纳图夫时期与所有大型动物持续减少相伴的是，早段为快行小型猎物的增加，晚期则可能是对植食依赖的强化，清楚地显示了低档食物随时间推移被相继纳入食谱的过程。这些发现再一次印证了广谱革命的发生。

到斯蒂纳的工作为止，广谱革命假说已经在许多案例中得到证明^{②③}，由此发展出的基于生态学理论的诸多方法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尽管如此，它仍然在接受层出不穷的新材料的检验。

四、面临的挑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多数有关广谱革命的食谱研究都把关注点投向动物遗存，并习惯性地认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食谱以肉食占绝大部分，植物与动物相比属较低档的资源。因此在近东，以草籽为代表的植食出现，往往会被草率地看作食物广谱化的典型特征。这种认识与动植物遗存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中保存状况的巨大差别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早期遗址中只有动物骨骼才能保存下来，没有可用于旧石器至中石器年代序列的食谱演变分析的植

① Stutz, A. J., Munro, N. D. and Bar-Oz, G., Increasing the resolution of the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in the Southern Levantine Epipaleolithic (19~12 k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09, 56: 294-306.

② Clark, G. A. and Straus, L. G., Late Pleistocene hunter-gatherer adaptations in Cantabrian Spain. In G. N. Bailey (ed.), *Hunter-Gatherer Economy in Prehistory: An Europe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1-148.

③ Lourandos, H., Intensification and Australian prehistory. In Price, T. D. and Brown, J. A. (eds.), *Prehistoric Hunter-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5, 385-423.

物组合。2000年后,以色列加利利(Galilee)地区一系列旧石器遗址发掘特别注意对植物遗存的提取,这为检验广谱革命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材料。

距今70 000~55 000年,死海峡谷的阿穆德洞穴(Amud Cave)前被尼安德特人居住。该遗址的植硅石分析揭示了尼人利用植物资源的丰富信息,种类包括类似棕榈的树叶、草本植物、树木的木质部分、成熟草籽等^①。马德拉(M. Madella)等人提出其中至少有两个科后来成为该地区的驯化种,这也许可看作广谱革命早在旧石器中期晚段就已出现的迹象。但是,韦斯(E. Weiss)和巴尔-约瑟夫(O. Bar-Yosef)等人提醒,由于植硅石不能准确鉴定到种属,因此这个推测还需要植物种子鉴定的支持^②。但是这个发现显然表明人类早在旧石器中期就开始广泛利用植物了,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要到旧石器时代末。

位于以色列卡麦尔山的克巴拉洞穴(Kebara Cave),在距今65 000~48 000年的地层里出土了4 000多颗莫斯特时期的炭化种子^③。由于它们出自火塘附近的土样,所以可能是穴居者的食物。有3 956颗种子被鉴定为属于52个不同类别,其中78.8%为豆科,此外还有橡子、开心果、紫草、蓝蓟、菊科红花属、山靛、野葡萄等,只有10颗属于禾本科,包括野燕麦、野大麦、粗山羊草,以及可能的雀麦、短柄草和狗牙根。列夫(E. Lev)等人认为,该植物组合体现了一种广谱的觅食策略,它显示旧石器中期晚段的尼人就可能对植物有相当程度的依赖了。

23 000年前的奥哈罗Ⅱ(Ohalo Ⅱ)遗址出土了90 000多颗炭化种子,经鉴定属于142个类别,其中近19 000颗为禾本科种子。韦斯等人对禾本种子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它们不仅数量惊人,而且皆为成熟个体,因此推断是人

① Madella, M., Jones, M. K., Goldberg, P. and Hovers, E., The exploit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by Neanderthals in Amud Cave (Israel): the evidence from phytolith stud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2, 29: 703—719.

② Weiss, E., Wetterstrom, W., Nadel, D. and Bar-Yosef, O., The broad spectrum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plant remai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4, 101: 9551—9555.

③ Lev, E., Kislev, M. E., Bar-Yosef, O., Mousterian vegetal food in Kebara Cave, Mt. Carmel.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5, 32: 475—484.

类食谱中的主食^①。在弗兰纳利的假说中,标志广谱革命的野生草籽采集大约出现在距今 10 000 年,奥哈罗 II 遗址的发现把人类采集野生禾本科种子的时间大大提前。此外,韦斯依籽实体积将小颗粒草籽与野小麦和野大麦区分开来,小颗粒草籽包括狐尾草、雀麦草、大麦草、碱茅,其数量在禾本科组合中占 86%。这反映了当时人类食谱的多样性,小颗粒草籽指示低档食物在食谱中占有较高比例,与弗兰纳利和斯蒂纳的理论假设相符。

为了追溯禾本科种子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韦斯等人挑选了黎凡特地区遗址中的 19 个植物组合,年代跨度从奥哈罗 II 以后一直到前陶新石器 B (距今 23 000~8 200 年),观察其小颗粒草籽相对野生禾本科种子的体积比。若该比值越大,表明食谱宽度越大。结果显示该比值随时间推移降低,表明越靠近旧石器时代末期,禾本科范围内的食谱宽度越窄,特别是最后小颗粒草籽几近绝迹(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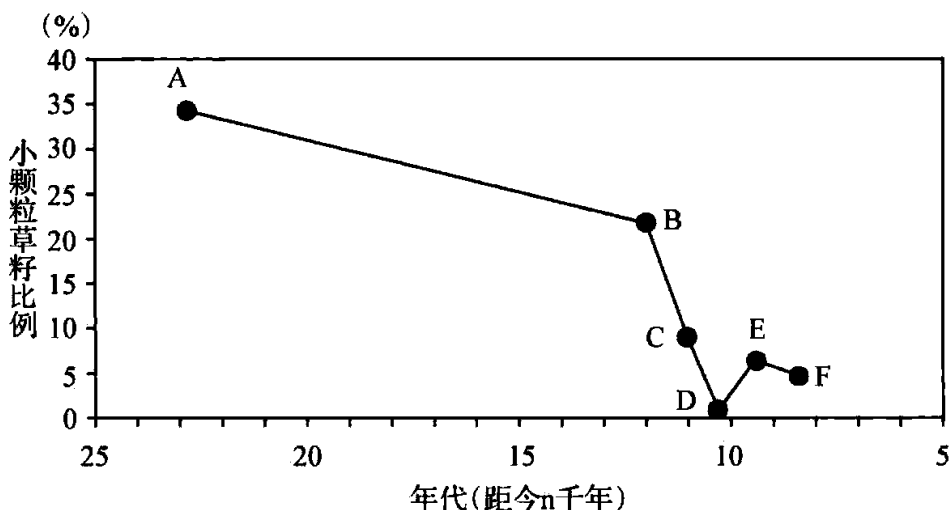


图 4 近东 23 000~8 000 年小颗粒草籽比例变化

综上所述,用近东植物材料对广谱革命理论进行检验产生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将食物广谱化的发生提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尽管阿穆德和克巴拉遗址的植物利用不能指示严格意义上的广谱革命,但奥哈罗 II 遗址明确地表明,人类强化利用禾本科草籽这一低档食物比过去设想的要早。那么,

^① Weiss, E., Kislev, M. E., Simchoni, O. and Nadel, D., Small-grained wild grasses as staple food at the 23 000-year-old site of Ohalo II, Israel. *Economic Botany*, 2004, 58: S125-S134.

如果前两个遗址的证据能得到进一步加强，是否表明低档食物被纳入食谱的时间还要成倍提前？是否暗示广谱革命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发生？考恩(C. W. Cowan)和沃森(P. J. Watson)就质疑旧石器时代人类以肉食为主的观点^①。他们提出植物应当一直是人类食谱中的主食，而不是作为肉食的补充后来加入的。考古记录中没有表现是因为植物考古学多以炭化种子为研究对象，而早期人类用火较晚，所以相关的遗存不能像晚期那样大量保存下来。即便如此，现有的考古材料已经提示早期人类可能与植食有着密切关系，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出土有朴树籽(有学者怀疑可能为自然堆积)，赞比亚北部遗址阿休利文化的直立人可能以植物种子和树上的果实为主要食物来源。考恩和沃森坚持认为，即使在南方古猿生活的背景中，也不排除能够找到其利用植物的直接证据，而在人类会使用火以后的考古遗存中，发现证据的可能性应当大大增加。所以，“广谱革命的发生是否应当更早”的问题将转变成“广谱革命是否真正发生过”。

另一方面的挑战，是小颗粒草籽百分比数值反映的食谱宽度趋于变窄，完全有悖于“广谱革命”的定义。对此，研究者的解释是，广谱革命真正的意义应当是将原先的狩猎采集方式引向禾本科物种的驯化。这暗示正是由于作物驯化进程的推进，使人类越来越倾向食用栽培所得的禾本科种子，而非采集野生的小颗粒草籽，因此造成小颗粒草籽比重降低。笔者认为解释仍显牵强，但有意义的是，从这种现象与理论假设的冲突我们可以意识到，原先建立在观察与归纳之上的简单模型并不能涵盖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案例需要寻求更进一步的解释。

五、存在的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接纳一种理论框架并不是对材料先验性的设定，更不是让材料去迎合理论，而是要用材料反复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要争取在新的尺度上提出补充或修正。这就要求研究者脑子里时刻要有用新材料挑战已有认识的敏感度。“广谱革命”的假说在许多研究中被非常成功地证实，

^① Cowan, C. W. and Watson, P. J., Some concluding remarks. In Watson, P. J. and Cowan, C. W. (ed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 207—212.

但也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越来越多的个案对它的证伪和反思，反而使它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这是一种理论充满活力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它可以被看作一种指导了中石器时代生计形态研究三十多年的范式，那么对它的挑剔甚至否定将会催生新的研究范式的诞生，这是比重复证明一种成熟的认识更加意义重大的进步。

中石器时代广谱经济的概念自最初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论述中以来^①，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②，将这一解释框架应用到中国考古材料的研究中。在这一背景下，笔者想就自己广泛阅读文献的体会结合有限的科研实践来讨论几点今后应用“广谱革命”理论开展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1)虽然“广谱革命”理论对研究设计具有指导作用，但最好还是不要将它作为一个定论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切入点来处理。特别是其包含的最佳觅食原理与食谱宽度模型，对所有人类食谱变迁的问题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觅食理论和食谱宽度的数学模型已经将生物的觅食行为限定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水平上，因此它们对没有储藏活动的狩猎采集群预测能力最强。将它们应用于农业社会的研究时，就需要对变量的复杂性和人类的文化适应机制给予更多细致的考虑。

(2)资源的分类标准很重要。“广谱”经常使人误解为种类多样化，其实本文前面的论述已阐明，生态学意义上的“广谱”，是指食谱中包含回报率高低差别较大、档次较多的多种资源，因此这里所说的资源在本质上以回报率作为分类标准。斯蒂纳也曾强调，一般的生物种属划分和单一考虑猎物个体大小，并不能反映资源真实的档次高低，只有当研究者能体察史前觅食者的分级系统时，食谱宽度模型才能真正发挥其阐释的威力。

(3)广谱革命是否适用于解释农业起源的发生过程并不确定，因为在新材料的不断挑战下，食物广谱化与农业起源的关系越来越模糊。弗兰纳利把中石器时代食物广谱化的过程看作社会经济形态线性演进的一个促发机制，只要人类开拓广谱物种，就必然会走上农业之路。从逻辑上分析，人类没有预

① 陈淳：《中石器时代与农业起源》，见《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裴安平：《史前广谱经济与稻作农业》，《中国农史》2008 年第 2 期。

知未来命运的能力，人类在采取广谱的觅食策略时可能仅仅是采取了一种临时或权宜性的应对方案，他本身没有期待、也不会预见自己行为方式的改变会导致物种的驯化和另一种经济形态的出现。另一方面，农业起源前是否经过了广谱的阶段，目前还不能在所有案例中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

(4) 如何把植物遗存和动物遗存放在同样的统计标准上检验不仅是考古学研究中普遍的问题，更是检验广谱革命理论的难点。动物考古与植物考古在专业人员训练、田野发掘、实验室处理、数据统计与分析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同一背景出土的动物与植物记录往往缺乏在同等范畴内相互印证的基础^①。更糟糕的是，这还会造成如本文所介绍的那样，相同背景的动物和植物记录反映了截然相反的结果。最近有几位学者就动物与植物材料在同一解释框架中的结合作了探索^{②③}，我们希望未来在旧石器晚期人类食谱方面也能出现类似的范例。

(5) 近来，我国学界也重视过渡期的转变和加大对农业起源的探索。如果要赶上国际水准，除了重视对早期驯化动植物的形态鉴定分析之外，还应该考虑对驯化动力机制的探索。因此，广谱革命理论和最佳觅食模式理论无疑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目前，浮选法已经在我国的田野发掘中普遍应用。我们不应该将眼光集中在个别遗址和少数几类驯化物种的鉴定和分析上，而是要像国际学界那样从特定时空范围的遗址中寻找相关材料，关注人类食谱种类的数量和宽度变迁，以了解人类在人地关系互动中觅食策略的变化。这要求我们更加仔细地发掘遗址，不要遗失和疏漏土壤中包含的任何材料，并且进行严格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来提炼和信息，以了解中国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是怎样从狩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

① Smith, A. and Miller, N. F., Integrating plant and animal data.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9, 50: 883—884.

② Kansa, S. W., Kennedy, A., Campbell, S. and Carter, E., Resource exploitation at Late Neolithic Domuztepe: faunal and botanical evidence.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9, 50: 897—914.

③ Miller, N. F., Zeder, M. A. and Arter, S. R., From food and fuel to farms and flocks: the integration of plant and animal remains in the study of the agropastoral economy at Gordion, Turkey.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9, 50: 915—924.

六、小 结

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C. Renfrew)将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和理论，二是技术和方法，三是田野考古发现。问题和理论主导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且指导考古学家寻找哪些考古材料或样本；技术方法根据设计要求，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息，田野发掘则根据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的要求采集样本，最后再根据分析结果来检验先前设想的模式并最后得出理论的阐释。这三个方面都是彼此衔接，相互依存的^①。总的来看，广谱革命理论为研究人类在中石器时代觅食模式的变迁和农业起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框架，更重要的是，它为考古学研究建立了一种有力的生态学背景，来探究史前人类觅食行为和经济形态的变迁。这为考古学家指明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努力方向，知道如何采取交叉学科的方法和各种技术来寻找和分析能够解决问题的考古材料，并为最终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的这一重大转变过程提供更为深入的洞见。

(与潘艳合作，原刊《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①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农业起源研究的实践与理论

农业起源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是考古学、生物学、农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逐渐融合的漫长历史。本文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对此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期从宏观上展现该课题的广度与深度，并希望对我国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农业探源工作有所启迪。

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布鲁斯·史密斯(B. Smith)把农业起源研究发展的过程整体地概括为两种学术传统的引导，一种是考古学的传统，它强调并依赖古代实物遗存的发现，探寻最早驯化物种的时空分布，另一种是生物学的传统，它关注现生驯化物种及其野生祖型之间的关系^①。此外，考古学还认为解释农业起源的原因至关重要，因此相关理论层出不穷，它们试图揭示农业产生的深层动力机制。这三方面的努力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从不同角度为这一庞大而多元的课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首先，考古学方面的努力以实物遗存为对象，体现在方法的突破与材料的积累上，发展出多种技术手段用于植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分析，为农业起源提供驯化物种和年代学的依据。其次，生物学方面的探索随其学科潮流的变迁牵涉到许多分支，以进化生物学为基础的遗传与育种理论较直接地推动了植物遗存鉴定标准的系统确立，

^① Smith, B. D.,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 1995, 1-14.

而进化理论与生态学的视角在解释中起着核心作用。最后，动力机制的理论探讨把这一人类生计形态的重要变迁置于文化演变的大框架中来检视，致力于从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多种变量中归纳出跨时空的宏观规律。

一、证据与技术手段

至今全球已有近十个地区通过考古学证据被确认为物种最初的驯化地^①，这一图景由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激动人心的发现及其依托的技术手段逐步拼合而成。本文的回顾不可能一一详述所有这些发现的历史，因此篇幅将集中在为这项带来巨大变革和影响的技术、人物以及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考古研究上，同时尽可能完整地展现早期农业起源地与驯化物种的分布模式。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R. J. Braidwood)是奠定考古发掘研究农业起源的第一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创了多学科合作的先例。20世纪40和50年代，他率先提出需要了解农业革命这一人类文化演变的重要阶段，而最初利用驯化物种的考古记录尚未被系统地发现和探究过。因此他带领一支研究团队深入地中海东岸的扎格罗斯(Zagros)地区考察^②，旨在寻找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实物证据，该团队聚集了来自多个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从生物学到地球科学。他们在被认为可能是驯化物种野生祖型的自然分布区域选择发掘了卡里姆·沙伊尔(Karim Shahir)和扎尔莫(Jarmo)两处遗址，发掘结果体现出狩猎采集与农业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在聚落、动植物等多方面的鲜明区别。他们特别考察了扎尔莫鼎盛时期的气候情况，得出古今并无明显差异的结论，还分析鉴定了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从中区分出驯化种与野生种。这项先驱性的工作为后来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古地质、古生态等介入农业起源研究树立了成功的范例，此后该领域内最富价值并被频繁引用的

① Price, T. D., Ancient Farming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 106(16): 6427-6428.

② Braidwood, L., Braidwood, R., Howe, B., Reed, C. and Watson, P. J. (eds.),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long the Zagros Flank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Volume, 1983, 105.

成果都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形式正式出版^{①②③④⑤}，这一惯例也对其他时代社群的考古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⑥⑦}。

美国考古学家麦克尼什(R. S. MacNeish)在中、南美洲的工作与布雷德伍德在近东的发掘并驾齐驱^{⑧⑨}。在1960~1964年对墨西哥中部高地特化坎(Tehuacan)河谷众多洞穴遗址的发掘中，他发现了中美洲许多重要作物驯化各个阶段——从野生植物到相当驯化——的实物材料，包括当时年代最早的炭化玉米以及其驯化种标本。1969~1972年对南美阿亚库乔(Ayacucho)地区罗萨马查伊(Rosamachay)洞穴的发掘出土了当时南美年代测定最早的玉米标本^⑩。麦克尼什也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合作，包括著名的植物考古学家卡特勒(H. Cutler)和曼格尔斯多夫(P. Mangelsdorf)，他们分别鉴定了出自特化坎洞

① Byers, D. S. (ed.), *The Prehistory of the Tehuacan Valley, Volume 1: Environment and Subsist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② Flannery, K. V. (ed.), *Quilá Naquitz: 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 Mexico*,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6.

③ Bar-Yosef, O. and Gopher, A. (eds.), *An Early Neolithic Village in the Jordan Valley Part I: The Archaeology of Netiv Hagdud*,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97.

④ Moore, A. M. T., Hillman, G. C. and Legge, A. L., *Village on the Euphr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 Alizadeh, A. (ed.), *Excavations at the Prehistoric Mound of Chogha Bonut, Khuzestan, Iran: Seasons 1976/77, 1977/78, and 1996*,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⑥ Nadel, D. (ed.), *Ohalo II: A 23 000-Year-Old Fisher-Hunter-Gatherers' Camp on the Shore of the Sea of Galilee*, Reuben and Edith Hecht Museum, University of Haifa, 2002.

⑦ Marquardt, W. H. and Watson, P. J. (eds.), *Archaeology of the Middle Green River Region, Kentuck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5.

⑧ Flannery, K. V.,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3, 2: 271-310.

⑨ Smith, B. D., The transition to food production. In Feinman, G. M. and Price, T. D. (eds.), *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 A Sourcebook*, New York: Kluwer/Plenum, 2001, 199-229.

⑩ MacNeish, R. S., Nelken-Turner, A. and Garcia Cook, A.,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Ayacucho Archaeological Botanical Project*, Andover: Peabody Found, 1970.

穴遗址的葫芦^①和玉米^{②③}。在整个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 麦克尼什的学生们继续他的工作, 对中美洲许多早期洞穴遗址进行广泛发掘, 到 20 世纪末, 这些出土材料一直主导着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区农业起源的研究。

毫无疑问, 对考古学而言, 动植物标本是考察生计形态最基本的一手材料, 而今浮选法已成为发现和收集这类遗存的惯例。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即浮选法被应用在考古学中以前, 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生物遗存, 特别是植物遗存对研究人类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的重要意义^④, 但这类材料在地层中保存较差和不易发现, 大多数发掘也不太重视对它们的收集和分析。奥地利植物学家昂格尔(F. Unger)和美国民族植物学家沃尔尼·琼斯(V. Jones)曾分别将风干的土坯砖放在水中化开, 提取其中包含的植物颗粒, 当时这种类似浮选的尝试还非常零星, 而琼斯和卡特勒锲而不舍地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 随后卡特勒把这一方法传授给了斯特鲁埃弗(S. Struever), 后者的文章才最终将其普及。

浮选法利用炭化植物种实和泥土颗粒相对水的比重差异, 用浮力分离土壤中的植物颗粒, 一般分为简易手工操作与较为复杂的机器浮选两类。20 世纪 60 年代初都是采用手工浮选, 其操作过程有三种方式。汉斯·赫尔贝克(H. Helbaek)率先在伊朗的阿里·科什(Ali Kosh)遗址采用浮选技术收集炭化种子, 他的方法是: 将干燥的土样倒入水中, 轻轻搅拌片刻后使泥水慢慢通过孔径细小的网筛, 这样浮在水面的炭化种子就完整地留在网筛里, 晾干

① Cutler, H. C. and Whitaker, T. W., Cucurbits from the Tehuacan Caves. In Byers, D. S. (ed.), *The Prehistory of the Tehuacan Valle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212—219.

② Mangelsdorf, P. C., MacNeish, R. S. and Galinat, W. C., Domestication of corn. *Science*, 1964, 143: 538—545.

③ Mangelsdorf, P. C., MacNeish, R. S. and Galinat, W. C., Prehistoric wild and cultivated maize. In Byers, D. S. (ed.), *The Prehistory of the Tehuacan Valle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178—200.

④ 陈雪香:《北美植物考古学评述》,《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

后可供分析鉴定。他凭借此法在 1963 年的发掘中找到了 40 000 多颗炭化种子^①。斯特鲁埃弗的方法被称为“浸入法”，这种方法将底部代以网筛的洗衣盆浸入小溪，把土样倒入盆中，然后把浮在水面的植物碎片和细小骨骼撇捞出来，这一方法成功地用到苹果溪遗址的发掘中^②。帕蒂·乔·沃森(P. J. Watson)在索尔兹洞穴(Salts Cave)发掘中采用的“垃圾桶”法或“汽油桶”法很像“浸入法”，只是用汽油桶中的水进行浮选^③。这两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们能够处理体积较大的土样。虽然手工浮选比较费时费力，但由于其简便易行，对场地、设备、气候等要求不高而被迅速广泛地采用^④。

浮选法这一并不复杂、也完全算不上高科技的手段为解决考古难题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它能够成功提取遗址中的植物遗存，尤其是炭化种实，而根据浮选原理研发的浮选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植物遗存收集的工作方式和效率。1971 年，戴维·弗伦奇(D. French)首次开发了一款浮选机，用于土耳其坎恩哈桑(Can Hasan)遗址的发掘，被称为“安卡拉浮选机”。它的特点是使用水泵向浮选箱内自下往上地供水，在把轻浮产物从土样中分离并送入网筛的同时，也把重浮产物中的泥土洗净^⑤。这款浮选机的改装版被用于伊朗希拉夫(Siraf)遗址^⑥和美国印第安纳地区^⑦的考古发掘。与此同时，剑桥大学的团队也独立研制出一款“泡沫浮选机”，其中的泡沫发生装置能把比重大于水的种子也提取出来，它在巴勒斯坦纳哈尔厄伦(Nahal Oren)遗址取得了理想的

① Helbaek, H., Plant collecting, dry-farming, and irrigation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ic Deh Luran. In Hole, F., Flannery, K. V. and Neely, J. A. (eds.), *Prehistory and Human Ecology of the Deh Luran Plain*, Ann Arbor: Museum of Anthropology, 1969, 383—426.

② Struever, S., Flotation techniques for the recovery of small-scal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merican Antiquity*, 1968, 33(3): 353—362.

③ Watson, P. J. (ed.), *Archeology of the Mammoth Cave Are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④ Watson, P. J., In pursuit of prehistoric subsistence: 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some contemporary flotation techniques. *Mid-Continent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76, 1: 77—100.

⑤ French, D. H., An experiment in water-sieving. *Anatolian Studies*, 1971, 21: 59—64.

⑥ Williams, D., Flotation at Siraf. *Antiquity*, 1973, 47(188): 288—292.

⑦ Limp, W., F., Water separation and flota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974, 1: 337—342.

效果^①。除近东以外，北美东部的考古实践也为浮选机的改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比尔·罗伯逊(B. Robertson)曾借鉴希拉夫浮选机的特点为肯塔基西部贝冢考古项目专门设计了一款浮选机，其装配和使用更加简便快捷。加里·克劳福德(G. Crawford)把贝冢考古浮选机用于他在日本北海道的发掘，还吸收泡沫浮选机的特点与多伦多大学仪器店共同研制了一款升级版(多伦多大学浮选机)。它有一个轻巧的金属架和聚氯乙烯箱体，能很容易地装载在汽车上，各部件可拆卸，无须翻倒即可排空浮选后的残渣，它在加拿大安大略地区和日本北部的考古中显示出很大优越性。随后，这款浮选机被克劳福德的合作者和学生们带到中国^②、日本^③、韩国^④许多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中，装置和使用方法都会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有所调整。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浮选机在东亚考古中也开始发挥作用。现在，越来越多使用者把自己的经验细节与大家分享，深入探讨多种浮选方法及其结果在不同条件考古中的偏差与意义^{⑤⑥}，总之，丰富多彩的新实践正使这种技术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和完善(图1)。

浮选法大大促进了生态物材料的积累与更新。近半个世纪以来，近东、拉丁美洲、北美、东亚等地区不断有史前驯化作物的新发现，这些大多通过浮选获得的材料在农业起源研究领域一次次引发强烈的反响。在近东，整个

① Jarman, H. N., Legge, A. J. and Charles, J. A., Retrieval of plant remain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by froth flotation. In Higgs, E. S. (ed.), *Papers in Economic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39—48.

② 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浮选法》，《考古》2004年第3期。

③ D'Andrea, A. C., Crawford, G. W., Yoshizaki, M. and Kudo, T., Late Jomon cultigens in Northeastern Japan. *Antiquity*, 1995, 69; 146—152.

④ Lee, G. A., *Changes in Subsistence Systems in Southern Korea from the Chulmun to Mumun Periods; Archaeobotanical Investigatio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3.

⑤ Wagner, G. E., Comparability among recovery techniques. In Hastorf, C. A. and Popper, V. S. (eds.), *Current Paleoethnobotany: Analytical method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Plant Remai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7—35.

⑥ Wright, P. J., Flotation samples and some paleoethnobotan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5, 32; 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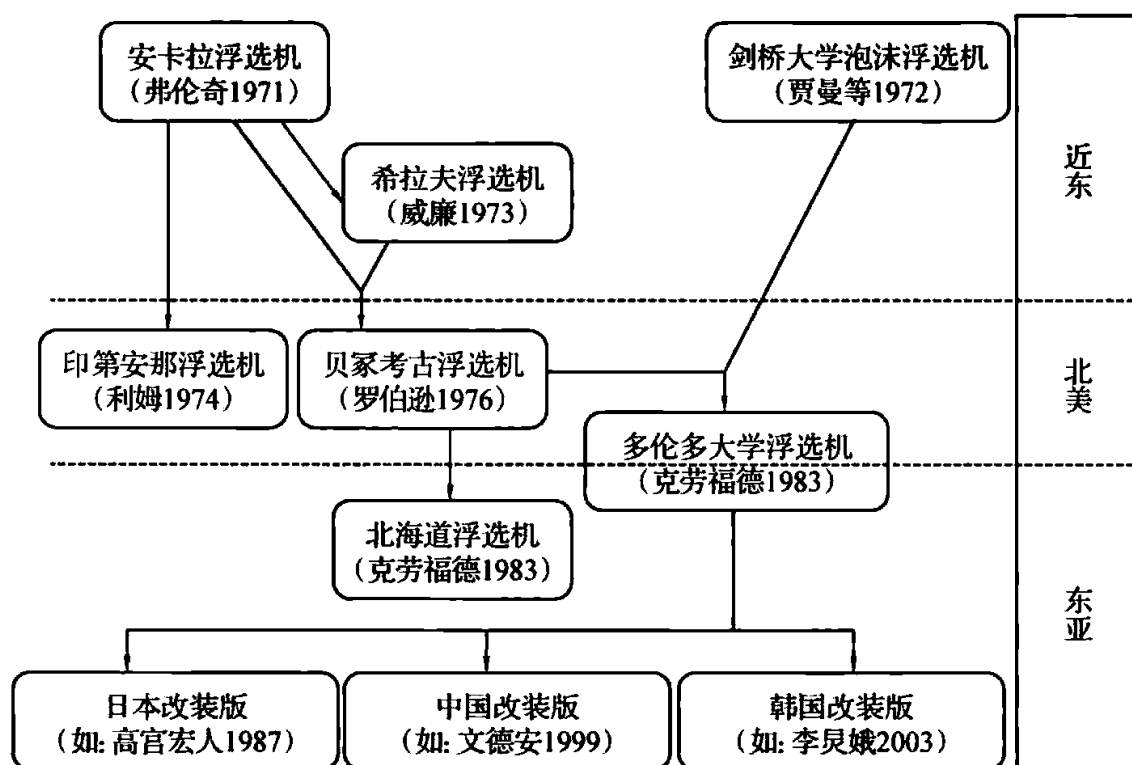


图1 各种版本浮选机的发展与继承演化轨迹

20世纪60年代是植物考古材料激增和不断刷新的狂飙时期^{①②③}，而近20年来考古学家获得了早至23000年前狩猎采集群利用野生草籽晚到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植物遗存证据^{④⑤⑥}。在北美东部，浮选所得的炭化植物中包括以前

① Van Zeist, W.,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lant cultivation in the Near East. *Japan Review*, 1992, 3: 149—165.

② Warnock, P., From plant domestication to phytolith interpretation: the history of paleoethnobotany in the Near East.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1998, 61(4): 238—252.

③ Nesbitt, M., Plants and people in ancient Anatolia.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995, 58(2): 68—81.

④ Weiss, E., Kislev, M., Simchoni, O., Nadel, D. and Tschauner, H., Plant-food preparation area on an Upper Paleolithic brush hut floor at Ohalo II, Israel.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8, 35: 2400—2414.

⑤ Weiss, E., Kislev, M. E., Simchoni, O. and Nadel, D., Small-grained wild grasses as staple food at the 23 000-year-old site of Ohalo II, Israel. *Economic Botany*, 2005, 58 (Supplement): S125—S134.

⑥ Weiss, E., Kislev, M. E. and Hartmann, A., Autonomous cultivation before domestication. *Science*, 2006, 312: 1608—1610.

不为人所知的本地驯化种——瓶状葫芦(*Cucurbita pepo*)、伯兰德氏藜(*Chenopodium berlandieri* subsp. *jonesianum*)、假苍耳(*Iva annua*)和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还有大量不见性状变化但被利用的蓼(*Polygonum erectum*)、五月草(*Phalaris caroliniana*)和小大麦(*Hordeum pusillum*)等草籽，考古学家还据此了解到印第安人的一系列资源管理活动^{①②③}。在东亚，浮选研究证明向来被视作渔猎采集者的东亚绳纹人群实际上拥有荞麦^④、小米等驯化物种，还在阿伊努人史前遗址收集到超过 20 万颗炭化的作物种子，纠正了认为阿伊努人是狩猎采集者的误解^⑤。中国长江中下游^{⑥⑦}、淮河流域^⑧和黄河下游^⑨都发现了早至 8 000 年前的稻米遗存，北方也发现了距今 8 000 年的炭化小米^{⑩⑪}，与它们共生的还包括种类繁多的其他果实和杂草籽。在韩国，浮选法

① Asch, D. L. and Asch, N. B., The economic potential of *Iva annua* and its prehistoric importance in the Lower Illinois Valley. In Ford, R. I. (ed.),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Ethnobota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301—341.

② Yarnell, R. A., Domestication of sunflower and sumpweed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In Ford, R. I. (ed.),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Ethnobota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289—300.

③ Smith, B. D., Hopewellian farmer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 In Smith, B. D. (ed.), *Rivers of change: Essays on Early Agriculture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7, 201—248.

④ Crawford, G. W., Hurley, W. M. and Yoshizaki, M., Implications of plant remains from the Early Jomon, Hamanasuno Site. *Asian Perspectives*, 1976, 19(1): 145—155.

⑤ Crawford, G. W. and Yoshizaki, M., Ainu ancestors and prehistoric Asia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87, 14: 201—213.

⑥ 郑云飞、蒋乐平、郑建明：《浙江跨湖桥遗址的古稻遗存研究》，《中国水稻科学》2004 年第 2 期。

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⑨ Crawford, G. W., 陈雪香、王建华：《山东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发现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稻》，见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 3》，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⑩ 赵志军：《小米起源的研究——植物考古学新资料和生态学分析》，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⑪ 刘长江、孔昭宸、朗树德：《大地湾遗址农业植物遗存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探讨》，《中原文物》2004 年第 4 期。

的应用使研究者第一次系统获得朝鲜半岛农业起源的直接证据，植物组合包括黍、粟、赤豆、大豆、稻米、大麦、小麦以及多种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杂草^①。

有趣的是，浮选法在近东和北美的考古发掘中取得成功后，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学术传统不同，使得以大植物遗存研究为主导的植物考古学在欧洲和北美形成两个不同的学术流派。欧洲学者一般称植物考古学为“archaeobotany”，侧重植物遗存的鉴定分类，较少探讨它们与人类活动的关系^②，强调寻找驯化作物的种子。比如，威廉·冯·蔡斯特(W. van Zeist)曾在荷兰各地用浮选法广泛寻找史前与历史时期人类食用的植物，他遵循欧洲学者的典型习惯，把重点放在一系列以麦类为主的作物上^③。而北美的古民族植物学(paleoethnobotany)则提倡分析和阐释人类与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强调被欧洲流派所忽视的生态学和人类学方法的运用^④。因此，寻找和确认驯化物种固然也是北美学者们热衷的课题，但他们的视野更加注重解读植物背后的社会、文化、经济、意识与信仰等方面的信息。

与大型植物遗存分析相关的另外两大重要技术革新是 AMS 放射性碳测年^⑤和电子显微镜^⑥的使用。20 世纪 60 年代，常规放射性碳测年已经将考古学家的大量精力从断代上解放出来，但对样品有比较高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加速器质谱法(AMS)的出现使测年技术在准确性和适用性两方面都发生了质

① Crawford, G. W. and Lee, G. A., Agricultural origin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tiquity*, 2003, 77(295): 87—95.

② Ford, R., Paleoethnobotany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In Schiffer, M. B. (ed.),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79, 2: 285—336.

③ van Zeist, W.,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food plants in the Netherlands. *Palaeohistoria*, 1968, 14: 41—173.

④ Pearsall, D. M., *Paleoethnobotany: A Handbook of Procedure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00.

⑤ Gowlett, John A. J., The archaeology of radiocarbon accelerator dating.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987, 2: 127—170.

⑥ Smith, B. D., SEM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micro-morphological indicators of domestication in seed plants. In Olsen, S. (e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in Archaeology*, 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1988, 203—213.

的飞跃,使得我们可以对数量很少和颗粒较小的植物遗存直接测年,这意味着农业发生的年代可以以某一驯化物种遗存本身的年代来精准确认。而过去利用地层中木炭的常规测年,尤其是当地层较厚时,样本所代表的驯化发生年代就相当可疑。AMS测年技术一经问世,就被用来检验中、南美洲早年出土的植物遗存。朗(A. Long)等人对特化坎河谷炭化玉米的直接测年表明它们并不如早先地层测年数据那样古老,年代最早的玉米只有距今约5 500年^①。史密斯对20世纪60年代魁拉那奎兹(Quila Naquitz)洞穴出土的西葫芦遗存进行AMS直接测年,结果验证这些标本的确与原先木炭测定的地层年代相同,约在10 000—8 000年前^②。AMS测年还表明特化坎河谷出土的驯化菜豆实际上不超过距今2 500年,瓦哈卡(Oaxaca)河谷出土的驯化菜豆仅有1 300年左右历史,出自秘鲁安第斯山区与沿海的驯化菜豆则早至距今4 400年和5 600年^③。出土大植物遗存的直接AMS测年正在为农业起源研究提供更可靠、精准的年表,这种极其严谨的测年标准应得到广泛的共识,从而成为一项操作惯例。

电子显微镜成为观察、分辨和比较植物遗存细微形态的有力手段,它提供了光学显微镜无法企及的清晰度和立体感的视域。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确认伯兰德氏藜为北美东部本地驯化种。史密斯认为,在人类的栽培过程中,藜会以种皮厚度逐渐变薄的进化适应策略来回应人类的选择压力。因此他用电子显微镜测量了这种藜的出土标本、现代驯化种、现代野生种的种皮厚度,发现考古样品数据甚至略小于现代驯化种,从而证明了其为驯化种的假设^{④⑤}。南美洲奎努亚藜(*Chenopodium quinoa*)的驯化也是通过这种方法

① Long, A., Benz, B. F., Donahue, D. J., Jull, A. J. T. and Toolin, L. J., First direct AMS dates on early maize from Tehuacan, Mexico. *Radiocarbon*, 1989, 31(3): 1035—1040.

② Smith, B. D., The initial domestication of *Cucurbita pepo* in the Americas 10 000 years ago. *Science*, 1997, 276: 932—934.

③ Kaplan, L. and Lynch, T. F., *Phaseolus* (Fabaceae) in archaeology: AMS radiocarbon dat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Pre-Colombian agriculture. *Economic Botany*, 1999, 53(3): 261—272.

④ Smith, B. D., The role of *Chenopodium* as a domesticate in pre-maize garden systems of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Southeastern Archaeology*, 1985, 4: 51—72.

⑤ Smith, B. D., *Chenopodium berlandieri* ssp. *jonesianum*: evidence for a Hopewellian domesticate from Ash Cave, Ohio. *Southeastern Archaeology*, 1985, 4: 107—133.

鉴定的^①。最近，扫描电镜还发现了无花果可能在 11 200 年前的近东被栽培的迹象^{②③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技术在观察块茎、根茎、球茎类遗存组织细胞上的极大潜力^⑤，而寻找这类作物早期栽培和驯化的实物证据恰恰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大难点。

此外，电子显微镜在微型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上功用尤为显著。微型植物遗存包括孢粉、植硅石和淀粉颗粒，用它们来研究农业起源是最近 20 年的事。孢粉最先被用于分辨禾本科中的野生与驯化类型，研究者根据近东的植物材料建立了以孢粉颗粒大小为参照的判别标准^⑥，但由于禾本科种类繁多，光学显微镜无法区别种属，以致这种方法一直得不到推广。扫描电镜用于孢粉种属的鉴定后，北美学者报道了小田纳西河流域古代土著社群自公元 400 年后的千余年间持续清除林地，种植玉米、藜和假苍耳等作物的农业活动。当地的孢粉序列还表明，早至距今 3 500 年人类就已开始在河谷底部和较低的阶地上从事本地驯化种的小型耕作^⑦。尽管孢粉分析技术提供过一些成功案例，但由于扫描电镜的使用远没有光学显微镜来得普及，因此它往往不像另

① Bruno, M. C., A morphological approach to documenting the domestication of *Chenopodium* in the Andes. In Zeder, M. A., Bradley, D. G., Emshwiller, E. and Smith, B. D. (eds.), *Documenting Domestication: New Genetic and Archaeological Paradigm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32—45.

② Kislev, M. E., Hartmann, A. and Bar-Yosef, O., Early domesticated fig in the Jordan Valley. *Science*, 2006, 312: 1372—1374.

③ Lev-Yadun, S., Ne'eman, G., Abbo, S. and Flaishman, M. A., Comment on "Early domesticated fig in the Jordan Valley". *Science*, 2006, 314: 1683a.

④ Kislev, M. E., Hartmann, A. and Bar-Yosef, O., Response to comment on "Early domesticated fig in the Jordan Valley". *Science*, 2006, 314: 1683b.

⑤ Hather, J. G., 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roots and tubers and its bearing on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Journal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4, 21: 719—724.

⑥ Leroi-Gourhan, A., Pollen grains of *Gramineae* and *Cerealina* from Shanidar and Zawi Chemi. In Ucko, P. J. and Dimbleby, G. W.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143—148.

⑦ Delcourt, P. A., Delcourt, H., Cridlebaugh, P. A. and Chapman, J., Holocene ethnobotanical and paleoecological record of human impact on vegetation in the Little Tennessee River Valley, Tennessee. *Quaternary Research*, 1986, 25: 330—349.

外两种技术那样能直接地通过古代标本的形态特征确认驯化种。

植硅石分析技术在最近 20 年的考古学实践中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在东亚寻找早期农业起源证据上获得了引人瞩目的突破。日本学者藤原宏志率先开拓了依据水稻运动细胞扇形植硅石的形态与密度来寻找史前稻作遗迹的系统方法^①,这一技术在寻找中国和日本古代水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②③}。赵志军等人根据另一种水稻表层细胞的双峰形植硅石,在长江中游发现了距今 10 000 年人类刻意栽培水稻的证据^{④⑤⑥}。中国磁山遗址距今 10 400 年左右的驯化小米也是通过稃壳表皮细胞植硅石形态得到确认的^{⑦⑧}。

淀粉颗粒分析是这几项技术中最晚发展起来的,其价值最初体现在广义

① Fujiwara, H.,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rice cultivation using plant opal analysis. In Pearsall, D. and Piperno, D.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Phytolith Analysis: Applications in Archaeology and Paleoecology*, MASCA Research Papers in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Vol. 1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3: 147—159.

② 宇田津彻郎、汤陵华、王才林、郑云飞、柳泽一男、佐佐木章、藤原宏志:《中国的水田遗构探查》,《农业考古》1998 年第 1 期。

③ Cao, Z. H., Ding, J. L., Hu, Z. Y., Knicker, H., Kogel-Knabner, I., Yang, L. Z., Yin, R., Lin, X. G. and Dong, Y. H., Ancient paddy soils from the Neolithic age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Naturwissenschaften*, 2006, 93: 232—236.

④ Pearsall, D. M., Piperno, D. R., Dinan, E. H., Umlauf, M., Zhao, Z. and Benfer, R. A. Jr., Distinguishing rice (*Oryza sativa* Poaceae) from wild *Oryza* species through phytolith analysis: results of preliminary research. *Economic Botany*, 1995, 49(2): 183—196.

⑤ Zhao, Z., Pearsall, D. M., Benfer, R. A. Jr. and Dolores, R., Piperno, D. R., Distinguishing rice (*Oryza sativa* Poaceae) from wild *Oryza* species through phytolith analysis, II: finalized method. *Economic Botany*, 1998, 52(2): 134—145.

⑥ Zhao, Z.,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in China is one place where rice was domesticated: phy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Diaotonghuan Cave, Northern Jiangxi. *Antiquity*, 1998, 72: 885—897.

⑦ Lu, H., Zhang, J., Liu, K., Wu, N., Li, Y., Zhou, K., Ye, M., Zhang, T., Zhang, H., Yang, X., Shen, L., Xu, D. and Li, Q., 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com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in East Asia extended to 10 000 years ago.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 106(18): 7367—7372.

⑧ Lu, H., Zhang, J., Wu, N., Liu, K., Xu, D. and Li, Q., Phytoliths analysis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foxtail millet (*Setaria italica*) and com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PLoS ONE*, 2009, 4 (2): e4448.

的人工制品残渍分析以及相关人类行为阐释上^①，最近才有报道利用古代淀粉颗粒确认早期驯化物种的成功案例。派帕诺(D. Piperno)等人从墨西哥中南部巴尔萨斯(Balsas)河谷希瓦托特拉(Xihuatoxtla)岩洞出土的研磨石器上辨认出属于驯化玉米的淀粉颗粒和属于某葫芦科驯化种的植硅石，相关地层断代为距今9 000年，这几乎将以前所知的最早驯化玉米年代成倍提前^②。此外，这一技术还曾用于探寻土豆在秘鲁驯化的早期历史^③。

由此可见，微型植物遗存在建立农业起源时空框架中的作用越加明显。派帕诺和皮尔索尔曾针对低纬度和一些湿热地区无法完好保存有机质植物遗存的情况提出，微型植物遗存分析的发展可望为在这类环境中发现新的史前驯化材料开辟广阔的天地。此外，孢粉、植硅石和淀粉颗粒这三种材料对考古鉴定而言各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而将它们综合应用到同一批材料或同一物种的研究中恰恰可以取长补短，获得更加可靠的实证依据^{④⑤}。

综上所述，在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的传统中，技术与方法论的发展为植物遗存的早期驯化与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信息，这些个别物种研究和分区研究的积累形成了涵盖全球的时空框架，这回答了农业起源“什么”“何时”“何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对农业起源所涉的跨区域或规律性的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宏观而系统的思考。

二、动力机制的理论阐释

早在20世纪20年代，戈登·柴尔德(G. Childe)就意识到文明进程不光

① Torrence, R. and Barton, H. (eds.), *Ancient Starch Research*,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06.

② Piperno, D. R., Ranere, A. J., Holst, I., Iriarte, J. and Dickau, R., Starch grain and phytolith evidence for early ninth millennium B. P., maize from the Central Balsas River Valley, Mexico.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 106(13): 5019—5024.

③ Ugent, D., Pozorski, S. and Pozorski, T., Archaeological potato tuber remains from the Casma Valley of Peru. *Economic Botany*, 1982, 36(2): 182—192.

④ Piperno, D., Paleoethnobotany in the Neotropics from microfossils: new insights into ancient plant use and agricultural origins in the tropical forest.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998, 12: 393—450.

⑤ Piperno, D. and Pearsall, 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Lowland Neotropic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是事实和物质材料的堆砌，考古学家更需要从中阐述一般性的结论和原理^①，农业起源的动因就是其中一大课题^②。他提出“绿洲理论”来解释农业为何发生，布雷德伍德在扎格罗斯山区的早期发掘正是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尽管研究结果否定了柴尔德的假设，但柴尔德的思考和视野为考古学家在农业起源领域的探索开辟了一条与材料积累和技术发展齐头并进的思路，即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

概括地讲，农业起源动力机制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三个角度：社会外部物质性的压力、社会内部因素、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象征性因素，每种理论所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各不相同，有的涵盖全球，也有的是洲际的区域性的以及更小的地区范围。

1. 外部压力模型

社会外部的物质性因素是考古学家最先探讨的变量，它始于深受文化生态论影响和主导的新考古学。物质性因素一般指人力难以干涉或控制的方面，如气候环境、资源条件、人口增长等，实际上这些变量在人类觅食系统中是互相联系和影响的，很难说某一个因素能够单独触发食物生产。因此“外部压力说”可以简化地理解为人口与资源关系的失衡导致人类开始投入强化劳力进行资源生产。在这一大的理念之下，各家主张的侧重点不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是主要因素。博塞洛普(E. Boserup)^③和宾福德(L. R. Binford)^④最先提出该观点，后者将此过程详细描述为，更新世末人口会在资源条件最优越的生境中快速增长，多余人口会向资源条件略差的边缘生境转移。由于边缘生境的土地载能没有核心区域高，而这里的社群又不断受到来自核心区域的人口压力，人口增长使土地载能接近临界值，食物供应紧张。正是在这种压力下，狩猎采集社群不得不逐渐加强开拓以前不利用的食物种类，如小型动物、鱼类、鸟类和草籽，

① Childe, V. G., *Progress and Archaeology*, London: Watts and Co., 1944.

② Childe, V. G.,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Watts and Co., 1936.

③ Boserup, E.,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Chicago: Aldine, 1965.

④ Binford, L. R., 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s. In Binford, S. R. and Binford, L. R.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313—341.

之后便出现了动植物驯化和早期农业。弗兰纳利(K. V. Flannery)将这一观点发展为“广谱革命”理论,认为10 000年前食物短缺迫使人类强化利用一些后来成为驯化物种的草籽等资源,这一过程是农业发生的先决条件^①。由于人口数量难以从考古遗存中直接观察,研究者开发出一些替代指标(proxy)来衡量人口压力。斯蒂纳(M. Stiner)提出从小型动物的利用可以获知农业起源前夜人类觅食广谱化与人口增长的密切关系^{②③④}。科恩(M. N. Cohen)从古病理学材料推知史前农人的健康状况普遍比觅食者差,因此他认为正是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食物压力使人类饥不择食地选择食用营养价值较差的物种,如栽培草籽作物,这种以数量换质量的策略使人类走上了依赖农业生存的道路^{⑤⑥}。

另一些学者强调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理查森(P. Richerson)等人发现更新世时全球气候干燥多变而且二氧化碳含量低,不适宜植物生长,只有到全新世气候改善后人类才有机会成功驯化作物^⑦。气候动因的探讨集中在近东地区,赖特(H. E. Wright)注意到距今13 000—10 000年间气候从干冷向温暖

① Flannery, K. V., 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 In Ucko, P. J. and Dimbleby, G. W.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73—100.

② Stiner, M. C., Paleolithic population growth pulses evidenced by small animal exploitation. *Science*, 1999, 283: 190—194.

③ Stiner, M. C., Thirty years on the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and Paleolithic dem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1, 98: 6993—6996.

④ Stiner, M. C. and Munro, N. D., Approaches to prehistoric diet breadth, demography, and prey ranking systems in time and spa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002, 9: 181—214.

⑤ Cohen, M. N.,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Overpopul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⑥ Cohen, M. N.,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9, 50(5): 591—595.

⑦ Richerson, P. J., Boyd, R. and Bettinger, R., Was agriculture impossible during the Pleistocene but mandatory during the Holocene? A climate change hypothesis. *American Antiquity*, 2001, 66(3): 387—411.

的转变与文化演进和动植物驯化在时间上的同步现象^{①②③}。同时,更新世末导致全球降温的新仙女木事件也被广泛认为是促使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和从事食物生产的直接原因^{④⑤⑥}。麦克里斯顿(J. McCristton)和霍尔(F. Hole)则认为当时近东经历了气候上长时间的不稳定,由此加剧的季节性变化使人类迅速耗竭了当地的野生资源,从而导致农业发生^⑦。最近,这类主张气候主导文化演变的观点正在受到严格的检验和反思,马厄(L. A. Maher)等指出现有材料并不表明气候与文化演变之间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两者的同步性应当比所有已知的阐释更复杂,因此进一步的探索需要更加详细精准的测年数据、分辨率更高的古环境数据序列,以及更精细的模型才能将古环境资料与史前人类的行为整合起来^⑧。

第三种观点着眼于人类生存环境中资源结构的变化,布赖恩·海登(B. Hayden)借鉴生态学家常用的描述生物繁殖策略和生长模式的分类方式,

① Wright, H. E. Jr.,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BioScience*, 1970, 20(4): 210—212, 217.

② Wright, H. E. Jr., The environmental setting for plant domestication in the Near East. *Science*, 1976, 194(4263): 385—389.

③ Wright, H. E. Jr.,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in Near Eastern pre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3, 34(4): 458—469.

④ Bar-Yosef, O. and Belfer-Cohen, A., Facing environmental crisis: societal and cultural changes a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Younger Dryas to the Holocene in the Levant. In Capper, R. T. J. and Bottema, S. (eds.), *The Dawn of Farming in the Near East*, Berlin: *ex oriente*, 2002: 55—66.

⑤ Bar-Yosef, O., The role of the Younger Dryas in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West Asia. In Yasuda, Y. (ed.), *The Origins of Pottery and Agriculture*, New Delhi: Roli Books, 2002: 39—54.

⑥ Moore, A. M. and Hillman, G. C., The Pleistocene to Holocene transition and human economy in Southwest Asia: the impact of the Younger Dryas. *American Antiquity*, 1992, 57 (3): 482—494.

⑦ McCriston, J. and Hole, F., The ecology of seasonal stres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1, 93(1): 46—69.

⑧ Maher, L. A., Banning, E. B. and Chazan, M., Oasis or mirage? Assessing the role of abrupt climate change in the prehistory of the Southern Levant.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011, 21: 1—29.

把资源分为 K 选择策略型和 r 选择策略型，K 型物种由于觅食回报率高而被优先纳入食谱，他认为随着人类捕猎技术变得越来越有效，K 类资源到旧石器晚期已几近耗竭，人类面对资源基础恶化而引发的粮食危机，不得不大量利用以小型动物和草籽为主的 r 型选择物种，动植物的驯化很可能就是强化利用这类资源的结果^①。芒罗(N. Munro)的研究发现，近东的纳图夫(Natufian)社会即使在环境改善和人口减少的条件下仍有持续的资源压力并采取强化利用的策略，这种资源压力可能暗示了农业发生的原因和途径^②。

外部压力模型的解释强调人类对客观物质环境的适应，这虽然充分考虑到环境和资源条件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但是却忽略了人类无处不在的改造环境、控制自然资源的能力和主动性。这些观点都潜在地将人类对自然的适应策略视作危机与穷途胁迫下的被动反应，如果考古解释一味遵循这些模型，就容易落入环境决定论的窠臼，这是外部压力模型最大的弱点所在。

2. 社会内部动因模型

社会内部动因模型一般强调群体内外的互动与竞争的关系。在讨论群体内关系时，驯化物种的生产一般被认为是具有野心的领袖人物用来控制劳动力和社会资源的途径。当讨论群体之间的关系时，农业起源与不同地区的资源互补和交流有着密切关系。

弗兰纳利以群体间物资交换的需求来解释农业起源的过程^{③④}。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居住在不同海拔的人群开发不同类型的资源，他们之间通过交换来获取自己不开拓的种类，这使一些物种离开其自然原生地，开始依赖人类的照管而生存，这种关系促成了动植物的最初驯化，而成功的栽培和畜牧则又强化了自然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和专门生产。

① Hayden, B.,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tone Age: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among hunter-gatherers.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1, 22: 519-531.

② Munro, N. D., Zooarchaeological measures of hunting pressure and occupation intensity in the Natufian: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origins.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4, 45 (Supplement): S5-S22.

③ Flannery, K. V., The ecology of early food production in Mesopotamia. *Science*, 1965, 147(3663): 1247-1256.

④ 肯特·弗兰纳利：《美索不达米亚早期食物生产的生态学》(潘艳译)，《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

本德(B. Bender)认为农业是强化食物生产的一种形式,这种强化的需求(区别于非主食的、小规模的食物生产需求)如何产生才是农业起源的核心问题,她强调狩猎采集群中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非技术或人口因素——是导致农业产生的深层原因^{①②}。觅食中的剩余物资一方面要供社群之间的交换,另一方面要供应各种再分配活动,而这两类行为都因包含较复杂的物资流动和信息沟通而需要一定的组织,某些人会通过调节操纵这些活动来提高个人威望,控制劳力和产品。这种对物质财富的掌控加剧了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继而推动强化的生产需求,因此某些地区出现了农业。

海登的竞争宴享理论与本德强调个人的控制欲在推动社群采纳农业中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处^{③④⑤}。他提出,最先被驯化的物种都需要投入大量劳力和试验的成本,应当不是用于果腹的主食,而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只有资源丰富的环境和复杂狩猎采集社会中富有的个人或家庭才能负担得起这种经济活动。在此条件下,有野心的人会利用基于经济的竞争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租赁,成为推动物种驯化的力量。

尽管这种从个人能动性出发的理论视角独特,但漏洞非常明显,它们都基于已经历了漫长复杂化过程和已经成为农业社群的民族学材料,对于用来解释考古材料中的起源问题,还是存在许多疑点。布鲁斯·史密斯提出用现有的实际证据检验竞争宴享假设,如果理论是合理的,那么实证材料应当与以下两个推论不矛盾。第一,最初驯化的物种应多为需要投入强化劳力的非主食物种,而不是平淡无奇的日常口粮。但目前出土的早期驯化物种——如近东的大麦、豆类,东亚的稻米、小米、豆类,北美东部的藜——几乎都出现在史前人类的日常食谱当中,而且民族学和实验考古学证据表明最初栽培

① Bender, B., *Farming in Prehistory: From Hunter-Gatherer to Food Produc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② Bender, B., Gatherer-hunter to farmer: a social perspective. *World Archaeology*, 1978, 10(2): 204-222.

③ Hayden, B., Nimrods, piscators, pluckers, and planters: the emergence of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0, 9: 31-69.

④ Hayden, B., Models of domestication. In Gebauer, A. B. and Price, T. D. (eds.), *Transitions to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y*, Madison: Prehistory Press, 1992: 11-19.

⑤ 布赖恩·海登:《驯化的模式》(陈淳译),《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它们并不需要十分强化的投入。此外，有些驯化种如狗和葫芦是作为工具被驯化的，而非食用。第二，最早驯化物种的出现应当与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社群结构复杂化同步，但考古学材料显示，在大多数地区，贫富分化和社群内部分层的出现要比农业起源晚得多。基特(I. Kuijt)也提出类似的质疑，他举例论证，复杂狩猎采集者中的储藏和以竞争为目的的宴享在农业起源以前并不常见，即使存在，规模也很小，它们反而是在农业出现以后快速增长^①。由于实际材料与理论预期有所抵牾，从社会内部因素解释农业起源动因的模型仍然停留在缺乏实证的假说阶段。

3. 象征与后过程模型

后过程考古学的观念主义观强调社会关系与物质性之间的密切联系，物的象征性是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象征主义充满意识形态地改变了生产关系”^②。伦福鲁(C. Renfrew)^③和霍德(I. Hodder)就是从实物证据所表现出的象征体系演变入手，揭示早期农业的产生机制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定居生活。霍德认为在社群规模扩大的漫长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时空感的变化使人的意识和认知也相应产生渐变^{④⑤}。个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强化会在生活实践和物质投入中表现出来，物质投入越多，社会关系就越复杂和强化，反过来又会刺激更多物质投入，最终物质关系与社会关系两者间的牵连就变得难以分割。在霍德看来，驯化物种是物质性表现的重要方面，它的出现是社会关系复杂化过程中的伴生物。更确切地说，农业的从无到有实际上渗入了社会结构复杂化乃至社会秩序重组的过程，它是物质性与社会关系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刺激乃至不可分割的自然结果。霍德的观点与本德

① Kuijt, I., 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food storage, surplus, and feasting in pre-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9, 50(5): 641—644.

② 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阅读过去》(徐坚译)，岳麓书社2005年版。

③ Renfrew, C., Symbol before concept, material engagement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Hodder, I. (ed.),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122—140.

④ Hodder, I., Çatalhöyük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ddle Eastern Neolithic.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7, 36: 105—120.

⑤ Hodder, I., *The Leopard's Tale: Revealing the Mysteries of Çatalhöyük*,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2006.

以社会关系为切入点来剖析农业产生的内在机制不谋而合，不同的是，他以象征性来解释物质在社会关系中的功能，深刻揭示出社会关系复杂化的动因。

法国学者考文(J. Cauvin)强调近东在旧石器时代末就出现了女性小雕像和牛头，它们应该分别代表女神和男神，祖先崇拜也几乎与村落生活同步出现，逝者的遗骸由埋入地下墓葬转为供奉在较为醒目的公共场合，由此可以肯定对拟人化神祇的崇拜先于驯化物种和农业经济的产生^①。因此，人类物质行为的革命源于象征系统的革命，如果把栽培行为看作人类对其他物种主宰欲的外在表现，那么这种基于人类认识到自身操控外界能力的象征系统为农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这个信仰与象征系统模型有很多缺陷。其一，先于农业经济出现的因素有很多，为什么是象征性而非其他因素成为最核心的必要条件呢？其二，即使上述演绎足够令人信服，那么象征系统或人群心理的改变最初又由何而起呢？还需要指出的是，象征性模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内部动因模型的启发，霍德和考文都提到了本德、海登理论中所倚赖的宴享和社会复杂化等因素，但其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前两种象征性模型强调物质上的强化是出于一种下意识行为和群体的心理状态，后两种模型则突出个体行为的刻意性和主动性^②。后过程模型还关注谁是主要驯化者。由于女性在觅食活动、家庭生活、社群联姻、家族传承等事务中的角色定位，她们被认为比男性更多介入环境管理和照料的工作，特别是在小型的园艺活动中，也与植物的象征性联系得更加紧密。因此，女性很可能是物种驯化和农业起源的主导者^{③④⑤}。

① Cauvin, J., *The Birth of the God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Hodder, I., Symbolism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001, 11(1): 107—112.

③ Watson, P. J. and Kennedy, M. C., The development of horticulture in the Eastern Woodlands of North America: women's role. In Gero, J. M. and Conkey, M. W. (eds.), *Engendering Archaeology: Women and Prehistory*,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1, 255—275.

④ Hastorf, C. A., The cultural life of early domestic plant use. *Antiquity*, 1998, 72: 773—782.

⑤ Fritz, G. J., Gender and the early cultivation of gourds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American Antiquity*, 1999, 64(3): 417—429.

纵观纷繁多样的农业起源模型，我们可以发现理论阐释目前存在两种趋势。一是由于新材料的涌现，原先那些可以涵盖全球范围的理论框架受到挑战，其普适性越来越有限，信息详细多元的倾向限制了考古学家在解释时的自我发挥和想象空间，避免了随意附会，提高了准确性和可检验程度，现在的解释框架更多是区域性适用或仅限于遗址的个案。二是以某一因素所代表的主动模式受到了广泛质疑，研究者更加热衷从物质、社会、象征性多种因素综合来演绎农业出现的过程。

综上所述，如果把布雷德伍德的田野发掘和柴尔德的思考看作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两个源头的話，那么在近一个世纪的探求中，是否真的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分野？毫无疑问，今天的研究的确存在两元分化的倾向。一些研究者思考的宏观问题是超越地区范围的、较复杂的文化演变问题；另一些研究者则关注某地域、某物种的驯化历史。两者与其说不同，不如说互补。前者看似凌驾于实物材料之上，但它实质上立足于后者所提供的事实，实物证据越丰富越可靠，理论演绎也越有说服力。但是，理论并不应当局限于实物证据所支持的范围，对于其中尚未与实物证据建立明确联系的部分，或者尚未被现有研究范式充分检验或顾及的部分，我们不能轻易否定。

三、生命科学研究传统

对史密斯所述的生物学传统，这里使用“生命科学”一词来涵盖所有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领域对农业起源探索的关注和贡献。这种传统并不显见，但是它的影响却深远而持久。这主要表现为三种研究走向，一是育种与遗传研究对野生种和栽培作物关系的探究，二是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解释农业发生的过程，三是民族学考察与民族志的积累成为窥探古人类生态的活化石。它们与生态学的密切结合促使考古学家以人类生态视角来看待农业起源的过程。

1. 从植物育种到分子遗传学

20世纪30年代，苏联遗传学家尼古拉伊·瓦维洛夫(N. Vavilov)在栽培作物遗传与育种方面的工作率先尝试预测了世界主要栽培植物的起源地。他提出了物种驯化的两种途径：一为原生驯化，驯化物种在最初起源地会出现不同种的变异与分化，这是人类出于不同目的而对同一物种不同特征强化选择形成的，因此具有丰富遗传多样性的区域可能是物种的独立驯化中心；二为次生驯化，有一些物种起初并非人类有意选择，但它们与人类的活动共生，

因人类干扰而繁盛，最终成为驯化种。基于该假设，瓦维洛夫调查了全球的植物资源分布，将多个物种多样性重叠的区域预测为农业起源地，并给予两个规律总结：(1)农业起源中心多为山地；(2)农业起源地往往也是古人类文明发端的区域^{①②}。虽然这一理论存在许多不足，但它在半个多世纪内对驯化物种的栽培及其起源研究影响深远。瓦维洛夫开创了探索现生植物驯化种与其野生祖先之间关系的学术传统，杰克·哈伦(J. Harlan)采纳他的植物地理学思路，结合考古发现提出了作物起源的“中心与非中心”说^③。

此外，哈伦和德威特(de Wet)还提出，所有禾本科作物从其野生种被驯化为栽培种的过程包含了许多相同的特征。他们首次基于育种与遗传理论，详细讨论了野生种、杂草种、驯化种的分类、杂交、与人类行为的关系等问题^{④⑤}。根据物种对人类依赖的不同程度，一个物种的生存可被分为野生、受干扰、驯化等宽泛涵盖区间的一系列状态^⑥。这项工作最重要的贡献是使考古学家在分辨古代植物遗存，特别是禾本科物种的驯化状态时有了可靠的依据^⑦。

育种与遗传理论还与实验生物学方法结合，为寻找驯化物种祖型提供线索，最近墨西哥类蜀黍(Teosinte)和摩擦草(Tripsacum)成功杂交对玉米驯化的启示可算是该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进展。这个问题在近四十年中一直处于不

① 尼古拉伊·瓦维洛夫：《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琛译，许运天校)，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

② Vavilov, N. I., *Origin and 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Harlan, J. R., Agricultural origins: centers and noncenters. *Science*, 1971, 174 (4008): 468—474.

④ Harlan, J. R., de Wet, J. M. J. and Price, E. G., Comparative evolution of cereals. *Evolution*, 1973, 27(2): 311—325.

⑤ de Wet, J. M. J. and Harlan, J. R., Weeds and domesticates: evolution in the man-made habitat. *Economic Botany*, 1975, 29: 99—107.

⑥ Harlan, J. R., *Crops and Man*, Madison: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Crop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1992.

⑦ Smith, B. D., The floodplain weed theory of plant domestication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In Smith, B. D., *Rivers of Change: Essays on Early Agriculture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7, 19—33.

明朗的状态，弗兰纳利在 1973 年仍然相信这两种植物不能成功杂交和繁殖后代，没有证据能表明摩擦草在玉米的驯化中起到任何作用。而 2001 年尤班克斯(M. Eubanks)最终证实墨西哥类蜀黍和摩擦草能够杂交并成功繁殖后代，其果实是迄今所知与考古出土最古老的驯化玉米遗存及其复原形态最为相似的样本，该实验同时为墨西哥类蜀黍从野生到驯化为何如此迅速提供了佐证^{①②③}。至于如何将这一现代育种的发现与考古实证相结合，是留给植物考古学家的课题了。

此外，分子遗传学所倚重的 DNA 技术在农业起源研究中的应用正在成为学科交叉的热点，目前的实践集中在：(1)通过现生动植物各个种群的遗传特征与相似度推测它们之间的关系；(2)古代标本的 DNA 提取与测序。结果一般用于回答以下问题：驯化种可能的野生祖先是什么？最有可能的驯化起源地在哪里？某些物种究竟是一次驯化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还是在不同地区多次独立驯化？驯化物种的地理传播路线与速度是怎样的？^{④⑤} 在对现生种群的研究中，多布利(J. Doebley)通过同工酶和叶绿体 DNA 证实墨西哥类蜀黍是玉米的野生祖先，并因巴尔萨斯河谷墨西哥类蜀黍野生种群的分子遗传特征与玉米相似度最高，进而推测当地可能为玉米的最早驯化地^⑥。当时，驯化玉米的最早证据出自瓦哈卡地区，但 2009 年公布的考古证据最终支持了多布利的推测。霍恩(M. Heun)对近东小麦驯化做了类似的工作，他推测的驯

① Eubanks, M., A cross between two maize relatives; *Tripsacum dactyloides* and *Zea diploperennis* (Poaceae). *Economic Botany*, 1995, 49(2): 172-182.

② Eubanks, M. W., The mysterious origin of maize. *Economic Botany*, 2001, 55(4): 492-514.

③ Eubanks, M. W., The origin of maize; evidence for *Tripsacum* ancestry. *Plant Breeding Reviews*, 2001, 20: 15.

④ Brown, T. A., Harris, D. R., Rollo, F. and Evershed, R. P., How ancient DNA may help in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iological Sciences*, 1999, 354(1379): 89-98.

⑤ Jones, M. and Brown, T., Agricultural origins; the evidence of modern and ancient DNA. *The Holocene*, 2000, 10(6): 769-776.

⑥ Doebley, J., Molecular evid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maize. *Economic Botany*, 1990, 44(3 supplement): 6-27.

化起源地得到了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遗址出土材料的佐证^①。现生水稻中有关籼粳分化的基因片段研究使沃恩(D. A. Vaughan)等人推测,今天世界各地的栽培稻是远古野生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驯化后再传播开去的后代,籼稻与粳稻很可能源自同一个古代驯化品种^{②③},当然这还有待考古材料的检验。由此可见,古今材料的比对在DNA技术的使用与疑点论证中十分关键,而从考古植物遗存中直接提取DNA已有成功先例。佐藤洋一郎曾直接从出土的栗子中提取DNA,遗传物质多态性研究表明其中中性基因的多样性程度低于现代野生种,因此推测绳纹时代的人类已经栽培栗树,而非仅仅收获“野生”栗实^④。对美洲各地遗址出土葫芦遗存的古DNA研究表明,美洲的葫芦是10 000年前传播过去的亚洲驯化种后代^⑤。确认西葫芦的一个亚种(*Cucurbita pepo ssp. ovifera*)是北美东部独立驯化的物种也是在古DNA研究的协助下完成的^⑥。

2. 进化理论

在农业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达尔文进化论一直是学术探讨的出发点,它在两个方面对阐释农业起源影响尤为突出,一是最佳觅食理论在人类觅食

① Heun, M., Schafer-Pregl, R., Klawan, D., Castagna, R., Accerbi, M., Borghi, B. and Salamini, F., Site of einkorn wheat domestication identified by DNA fingerprinting. *Science*, 1997, 278 (5341): 1312—1314.

② Vaughan, D. A., Lu, B. R., Tomooka, N., Was Asian rice (*Oryza sativa*) domesticated more than once? *Rice*, 2008, 1: 16—24.

③ Vaughan, D. A., Lu, B. R., Tomooka, N., The evolving story of rice evolution. *Plant Science*, 2008, 174: 394—408.

④ Sato, Y. I., Yamanaka, S. and Takahashi, M., Evidence for Jomon plant cultivation based on DNA analysis of chestnut remains. In Habu, J., Savelle, J. M., Koyama, S. and Hongo, H. (eds.), *Hunter-Gatherers of the North Pacific Ri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187—197.

⑤ Erickson, D. L., Smith, B. D., Clarke, A. C., Sandweiss, D. H. and Tuross, N., An Asian origin for a 10 000-year-old domesticated plant in the Americ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5, 102 (51): 18315—18320.

⑥ Smith, B. D., Eastern North America as an independent center of plant domest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6, 103(33): 12223—12228.

策略变迁中的应用,二是动植物在家养环境中与人类共同进化的讨论。

前一种学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化考古学的思潮中盛行一时。进化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主张,物种能否成功繁殖后代是衡量其生存成功的标志,这取决于它对环境的适应程度,而适应策略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觅食。生态学家将其发展为最佳觅食理论,并以食谱宽度模型来预测动物的觅食行为及其食谱的构成和变化^{①②}。人类学家很快发现它对狩猎采集群行为研究非常有用,埃里克·史密斯(E. Smith)^③、温特霍尔德(B. Winterhalder)^④、贝廷杰(R. L. Bettinger)^⑤等人探索了觅食模型在研究狩猎采集群生计模式和群体规模方面的应用,而霍克斯(K. Hawkes)^⑥、海登、温特霍尔德(B. Winterhalder)和肯尼特(D. J. Kennett)^⑦等学者又注意到它在解释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方面的潜力。

最佳觅食理论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觅食者选择一种食物并不取决于它在环境中的丰富性,而是取决于其回报率或觅食效率。回报率一般以觅食者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热量来计算,觅食者总以追求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如果按回报率标准将食物分档的话,食物将依该值从高到低的档次依次列入食谱的选择范围,直到某一项食物的加入会使总回报率不升反降,这时说明整个食谱的回报率已达到最大值。

① Pyke, G. H., Pulliam, H. R., Charnov, E. L., Optimal foraging: a selective review of theory and test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977, 52: 137—154.

② Pyke, G. H.,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84, 15: 523—575.

③ Smith, E. A., Anthrop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a critical review.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3, 24: 625—640.

④ Winterhalder, B., Optimal foraging strategies and hunter-gatherer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theory and models. In Winterhalder, B. and Smith, E. A. (eds.), *Hunter-Gatherer Foraging Strateg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13—35.

⑤ Bettinger, R. L., Explanatory/predictive models of hunter-gatherer adaptation.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0, 3: 189—255.

⑥ Hawkes, K. and O'Connell, J., On optimal foraging models and subsistence transi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2, 33: 63—66.

⑦ Winterhalder, B. and Kennett, D. J. (eds.), *Behavioral Ec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人类最初驯化的物种几乎都是回报率很低的草籽，按照最佳觅食理论推测，农业很可能是人类面临高档食物匮乏情况饥不择食的无奈选择，对低档食物的强化开拓最终导致农业发生，弗兰纳利等人称该效应为“广谱革命”。从外部压力寻找农业起源动力机制的研究往往偏爱这个假说^{①②}。虽然许多实证研究支持“广谱革命说”，但新材料和相关反思都在挑战该理论的普遍性与合理性^③。在理论方面，有学者提出，最佳觅食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觅食斑块是均匀分布的；二是人能够充分了解环境中资源的分布情况，而现实案例并不满足这些条件。在实证方面，近东地区尼安德特人或莫斯特时期遗址中都已发现利用植物的证据^{④⑤}。这令人质疑：低档食物究竟何时开始被人类取食？抑或，被习惯性地视作“低档”的植食是否实际上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的食谱中？基于最佳觅食理论的“广谱革命”是否名副其实地发生过？这些疑问暴露出觅食理论在解释农业起源机制上的缺陷，它强调人类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这虽然充分考虑到资源条件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但是却忽略了人类行为的主动性，容易落入环境决定论的窠臼。

进化理论的另一影响是共同进化的思想。达尔文认为，进化发生在生物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当中，驯化物种的形成是动植物在家养环境中与人类长期共存、相互影响的结果。埃德加·安德森(E. Anderson)提出的“垃圾堆理论”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⑥。他指出，在自然界中只有不断受到扰动而保持开放状态的生境才能接受新物种进入，如常年或季节性受侵蚀的河岸台地、

① 崔天兴：《“广谱革命”及其研究新进展》，《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② 潘艳、陈淳：《农业起源与“广谱革命”理论的变迁》，《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③ Cowan, C. W. and Watson, P. J., Some concluding remarks. In Watson, P. J. and Cowan, C. W. (ed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D. C., 1992, 207—212.

④ Madella, M., Jones, M. K., Goldberg, P., Hovers, E., The exploit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by Neanderthals in Amud Cave (Israel): the evidence from phytolith stud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2, 29: 703—719.

⑤ Lev, E., Kislev, M. E., Bar-Yosef, O., Mousterian vegetal food in Kebara Cave, Mt. Carmel.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5, 32: 475—484.

⑥ Anderson, E., *Plants, Man and Lif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或是人为造就的表面无遮盖的土层——即垃圾堆。驯化物种即这类新物种，它最初以与人相伴的杂草形式出现，这些杂草很容易在人类居址附近的垃圾堆上生长起来，在人类活动的照料和庇护下，物种的性状变异被越来越多地保留下来，最后形成了不同于野生祖型的驯化种。

布鲁斯·史密斯基于此发展出洪积平原杂草理论来阐释北美东部农业发生的过程。他认为靠近河谷的洪积平原是农业起源的关键地形，季节性的频繁泛滥使环境保持开放的状态，因而它们适于一年生种子植物——包括瓶状葫芦、伯兰德氏藜、假苍耳和向日葵——的移入和生长，同时这些物种也具备适应与洪泛的自然扰动具有类似特征的人为扰动的能力。当人类在河谷中的定居生活逐渐强化和稳定时，这些植物在人类扰动或刻意选择的干预下发生了一系列标志驯化的性状改变，如种子尺寸增大、种皮变薄等。科平杰(R. Coppinger)和施奈德(R. Schneider)也用类似的“垃圾堆理论”解释过狗的驯化过程，他们提出，当人类的永久性居址出现，累积的食渣与废弃物形成了“垃圾堆”生境，这吸引狼中间性情比较温和、不畏惧人的品种来此觅食，这种环境提供了狼与人亲密接触和互动的机会，最后这些逐渐适应人类定居生活的狼就成为驯化的狗^①。无论是“杂草理论”还是“垃圾堆理论”，其中强调的“人源干扰”(anthropogenesis)^②受到持共同进化观学者的欢迎。克劳福德和丹吉里亚(D'Andrea)在研究日本东北部史前人群的生计时非常注意观察植物组合中杂草类型的构成和变化，杂草比例的增长和一些种子尺寸变大表明绳纹时代定居者对环境的扰动相当活跃，并且已经开始驯化植物^{③④}。综上

① Coppinger, R. and Schneider, R., Evolution of working dogs. In Serpell, J. (ed.), *The Domestic Dog: Its Evolution, Behavior an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2-44.

② “anthropogenesis”多见于生态学术语，指由人的因素所造成的效应，多家的中文译法不一，本文的中文译法依李博、赵斌、彭容豪等译文。见 Chapin, F. S., Matson, P. A., Mooney, H. A.: 《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Crawford, G., Anthropogenesis in prehistoric Northeastern Japan. In Gremillion, K. J. (ed.), *People, Plants and Landscapes: Studies in Paleoethnobotany*,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7, 86-106.

④ D'Andrea, A. C., Later Jomon subsistence in Northeastern Japan: new evidence from palaeoethnobotanical studies. *Asian Perspectives*, 1995, 34(2): 195-227.

可见,人源扰动的开放生境提供了一种契机,使野生物种进入人类主导的环境,参与系统的共同进化,这是驯化过程必不可少的背景。

林多斯(D. Rindos)赞同安德森的人源扰动论,他认为杂草向人源扰动的生境迁移是驯化发生的关键环节,人类对环境的持续影响推动和强化了人与物种之间共同进化的关系。林多斯用三种过程模式——偶发驯化、专门驯化和农业驯化——来描述其共同进化的强度。偶发驯化指非农业社会中物种出现性状变化,它很可能因某些物种比较容易适应人为创造的环境而产生。这种关系促使专门驯化的发生,随着驯化物种在人类居址中散布,原先的生态演替序列被新的演替取代,也就是人造的农业生态成为环境的主导趋势。农业生态继续强化就会导向农业驯化,它一般标志着农业生产系统的确立和完善^①。

皮尔索尔用该框架来阐释中美和南美北部农业发生的过程^②。中美洲距今10 000至7 000年间已出现早于人类定居的偶发驯化证据,南美北部的植物材料也表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距今5 500年左右,人类开始较频繁地利用驯化种,有意耕种土地,物种也趋多样化,定居生活开始出现,这表明专门驯化阶段开始,在南美洲这始于距今约4 300年。距今4 000年左右,中美洲人类更强化地操控环境,社会经济趋于复杂,人口大增,农业生态日趋强化,可视为驯化阶段到来,在南美洲这种趋势见于距今3 500年以后,有些地区则更晚。纳尔逊(S. M. Nelson)也用林多斯的三阶段理论解释朝鲜半岛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栉文早期为偶发驯化阶段,栉文中期与晚期被归为专门驯化阶段,无文早期水稻栽培的出现标志着农业驯化开始^③。

① Rindos, 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84.

② Pearsall, D. M., Domestication and agriculture in the new world tropics. In Price, T. D. and Gebauer, A. B. (eds.), *Last Hunters-First Farmer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ic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5, 157-192.

③ Nelson, S. M., The question on agricultural impact on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rehistoric Korea. In Aikens, M. C. and Rhee, S. N. (eds.), *Pacific Nor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 Hunter-Fisher-Gatherers, Farmers and Sociopolitical Elites*,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70-184.

综上所述，进化理论为农业起源的探讨提供了两种有关人地关系的不同视角。主张最佳觅食原则的行为生态论将环境视作既定前提或硬性胁迫力，来考察其对人类觅食的选择压力。强调共同进化的人源干扰论则考虑人类对环境的改变作用，认为人地互动改变了原先的自然选择压力，使双方成为共同引导进化趋势的因素。从国际上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后一种视角较好地兼顾与融合了进化论与生态系统理论，对社会文化因素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适当的评估，较符合实际案例。

3. 人类生态学与民族志“活化石”

生态学以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为认识地球的物理环境和生物过程的特征与功能提供了框架，是一门描述和解释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运作，以及为何这样运作的学问^①。尽管它在当代自然科学中比较年轻，但是它对考古学的渗透却很早。20世纪50年代，格拉厄姆·克拉克(G. Clark)在史前欧洲的研究中引入了生态学视角，萨尔(C. Sauer)的《农业起源与传播》一书首次明确意识到考察人类行为生态学背景的深远意义^②。尽管当时的生态学思想吸引了一些考古学家的兴趣，但在传播论盛行的文化历史考古学时代，文化“如何”与“为何”演变的问题受到冷落和忽视，生态学并无用武之地。

到20世纪60年代，尤金·奥德姆(E. Odum)的《生态学基础》课本^③已经培养了最早的两代生态学家，生态系统研究成为生态学的主流^④。与此同时，新考古学强调系统论和科学方法的应用，生态系统研究的范式遂受到考古界的追捧，学者们广泛使用生态学概念和变量来描述研究对象，并用其建立量

① Chapin, F. S., Matson, P. A., Mooney, H. A.: 《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学原理》(李博、赵斌、彭容豪等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 Harris, D. R., Paradigms and transi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In Ammerman, A. J. and Biagi, P. (eds.), *The Widening Harvest: The Neolithic Transition in Europe;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Bosto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2003, 43-58.

③ Odum, E. P., *Fundamentals of Ecology*,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1953.

④ Craige, B. J., *Eugene Odum: Ecosystem Ecologist and Environmentalis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化模型。哈德斯蒂(B. L. Hardesty)^①和巴策尔(K. W. Butzer)^②等人在将生态学方法系统地应用到考古研究中做了大量整合性的工作。这种潮流在农业起源研究领域表现为传播论的失势，人们转向思考什么样的生态条件会促使农业发生，什么样的条件又有阻碍作用。

新考古学的另一项重要的、得益于生态学的创造是民族考古学研究，其研究对象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土著群体，它们被看作现代人观察和理解古代人类生活方式所需要借鉴的“活化石”。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一大批关于土著人群的文化生态学研究涌现出来，它们结合生态学、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为土著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比如，亨利·刘易斯(H. Lewis)对加利福尼亚土著烧除行为的分析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③，生态学家德尔考特夫妇(P. A. and H. R. Delcourt)则毕生追踪和探究印第安人的生态变迁^④。这促使考古学从新的角度认识到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特别是在那些“似农非农”生存状态中的特殊作用。其一，人们并不像斯图尔特在其文化生态学中所理解的那样以被动的方式适应环境^⑤，实际上人类一直在地表景观的改变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食物及其他资源生产方面^⑥。其二，今天土著人的生存策略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是漫长的动态过程，绝非其祖先适应行为的复制，因此用近现代民族学观察解释考古学材料需要非常谨慎。自此，考古学家认识到了人类与环境互动的漫长历史和现实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及动态本质，古人类生态学作为

① Hardesty, D. L.,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7.

② Butzer, K. W., *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 Method and Theory for a Contextu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Lewis, H., *Patterns of Indian Burning in California: Ecology and Ethnohistory*, Ramona: Ballena Press, 1973.

④ Delcourt, P. A. and Delcourt, H. R., *Prehistoric Native Americans and Ecological Change: Human Ecosystems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since the Pleistoce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⑤ Steward, J.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⑥ Thomas, W. L.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一个学术分支应运而生，对后来农业起源概念的更新和研究思路的转换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类生态学的兴起有力促进了考古学的人地关系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认识到，对于采纳农业的社会，无论其技术源于外部还是内部，无论是长期保持多样化、简单的小型作业，还是强化规模发展迅速的农业形式，都必然要经历人地关系变化的过程，而且必须是由人的行为主导和维持的^{①②③④}。因此，以人源干扰为核心理念，生态学成为沟通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的桥梁。人类生态的前沿理论和概念迅速与农业起源研究结合起来，如生态系统工程^⑤、人类生态位构建^{⑥⑦}。这些概念明确地把人类行为的主动性及其对环境的积极影响置于农业起源问题的中心地位，与过去一味寻找动力因素的研究导向不同，它强调在了解农业“如何”起源的基础上重新讨论“为何”的问题。这个视角为理解由实证材料构成的事实与探索发生机制的理论之间提供了逻辑联系。它强调人与其他有机因素(如动植物种)和无机因素(如气候、地质)在生态学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人类对资源物种广泛的管理以及对它们环境的改变。它使考古学有可能透过物质材料看到其背后更加广阔的、动态的人类生态系统的运转。

① Crawford, G. W.,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early agriculture in Japan.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1, 52: preprint.

② Denham, T., Early agriculture and plant domestication in New Guinea and Island Southeast 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1, 52: preprint.

③ Riel-Salvatore, J., A niche construction perspective on the Middle-Upper Paleolithic transition in Ital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010, 17: 323—355.

④ Bleed, P., Matsui, A., Why didn't agriculture develop in Japan? A consideration of Jomon ecological style, niche construction and the origins of domestica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010, 17: 356—370.

⑤ Smith, E. A. and Wishnie, M., Conservation and subsistence in small-scale societ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0, 29: 493—524.

⑥ Smith, B. D., Niche construction and the behavioral context of plant and animal domestication.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2007, 16: 188—199.

⑦ Odling-Smee, F. J., Laland, K. N. and Feldman, M. W., *Niche Construction: The Neglected Process in Evolu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四、小 结

近年来，中国农业起源研究成果斐然。突出表现在最早驯化物种——如稻、黍、粟——的发现，不仅将已知的农作活动年代大大提前，而且出土遗存数量多，分布区域广。此外，方法与技术也日渐成熟与普及，有些还达到了同类研究中的国际领先水平。但是，将国外的实践与国内的进展做一比较，我们仍可发现整体性的差距。比如，虽然浮选法成果频见于各类遗址报告，但是并没有像国外那样成为一种发掘研究的常规操作程序。更重要的是，相关的理论建设亟须跟上材料的激增。更高的追求是，理论的思考和认识还需随大量新材料的分析、琢磨、推敲、反思而推进。这样，我们才能将农业起源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更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我国北方旱地与长江流域农业起源研究提高到新的层次，以我国本土实践的真知灼见来为这个全球性的课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与潘艳合作，原刊《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第四部分

文明与国家探源

酋邦与中国早期国家探源

自张光直在他的《中国青铜时代》(1983年中文版)中介绍了“酋邦”，并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列为酋邦之后，这一术语渐为国内学者所知。然而，由于对这一概念的人类学理论背景缺乏全面的了解，国内一些涉及酋邦的讨论便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意义重大，有人则认为这一概念不适用于中国。本文试图对酋邦这一概念在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中的意义做一探讨，以期能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更大关注。

一、问题与思考

近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项和一些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心的相继成立，使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成为一个耀眼的学术亮点。在这一研究课题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并在某种程度上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即如何将舶来的社会法则研究和考古学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将对社会发展一般性规律的探索与中国史学和考古学个案研究相联系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酋邦这个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在中国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全新的。而且，这个概念在当代文明与国家探源中被视为至关重要并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之中，但是在中国它的意义尚未被充分的认识与探讨。

张光直说，在中国古代史这种历史悠久的学科里常常会有很陈旧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包袱。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过去所有的成见暂时地、完全地

抛除，进行重新的思考^①。这种思想包袱不但体现在学术定位和方法论上，而且表现在对理论指导作用的重视程度上。

从一开始，中国的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就被定位于史学范畴之内，受制于传统的史学框架，文献资料不但左右着研究的重心和探索的方向，而且决定了学术成就的价值取向。20世纪初西方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的初衷，就是被用来解决国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当初对考古学寄予的最大期望，也是有望能够帮助解决三代史实的问题。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与国家探源相比，中国拥有丰富的典籍和发达的史学传统，这是研究的一大优势，但是从科学探索的角度来说，则难免成为一种束缚观念的成见。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主导特征是个案的记载，而非抽象的概括。这使得当李济的殷墟发掘在中国建立起新的考古学传统的时候，仍然无法超脱传统史学的窠臼，结果殷墟发掘的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之上^②。

由于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承袭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于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中，所有现代化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学在内，全部围绕着史籍的内容而展开，并使理论在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指导地位和阐释作用被史籍所掩盖和取代。其实，文献和考古材料只是不同的信息库，它们都属于基础研究的对象而无主次之分，无论是文献研究还是考古观察，都需要用现代科学理论来予以指导和审视。将文献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会使探源工作成为变相的考证而非科学的探索。

所有现代科学都十分重视通则的探究，以求建立具有预测性价值的普遍规律，国际科学界对这种永恒真理的追求看得远比重建偶然事件的真相来得重要，而这一高层次目标则是和理论密不可分的。然而，在当代的中国考古活动中是根本没有理论这个范畴的，这既和中国传统史学本身就缺乏抽象理论思维直接相关，也和科学考古学在被引入的过程中只吸收了获取材料的操

① 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张光直：《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作技能而忽略了解决问题的探索思维有关。史学导向的考古学被看作是为证据不足的历史问题提供新依据，它并不需要考古学家发挥独立的思考能力。加之，中国传统史学是一种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于是在这种历史观里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就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空谈^①。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L. R. Binford)甚至刻薄地形容，中国考古学家把理论看作是天国里的泼阿斯所为，是某种空洞的胡诌。因此，中国的考古报告是因循守旧的典范，是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东西^②。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被普遍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形态，但是由于一方面缺乏从物质现象中提炼人类行为的考古学中程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用僵化和教条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原始社会发展的理论，使有的学者丧失了探索的主动性和敏感性，把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变成了现成的答案和教条，于是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理论探讨变成了只是将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与考古材料对号入座^③，陷入了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的一大怪圈^④。自考古学引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满足于运用李济及其同时代的西方学者的方法来处理考古资料，错失了许多良机，未能利用中国丰富的或者也许是独特的材料，为构建更完善的社会科学理论做出积极的贡献^⑤。

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与历史学、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学提供文献线索，考古学发掘地下证据，而社会人类学提供阐释的理论依据。在这点上人类学和历史学及考古学是有区别的，即社会人类学因其探求“规律”的性质而属于“正题法则科学”，而历史学并不从事规律总结的抽象思维，而是以补充的形式重建事件的复杂性。因此有学者认为，缺乏规律性

① 张光直：《序言》，见布鲁斯·特里格《时代与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刘景之译：《外国学者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春秋》2001年第5期。

③ 童恩正：《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④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⑤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探索和理论支持的历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社会人类学自从在西方诞生以来，主要是以没有文字和历史记载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因此它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立足于研究对象缺乏信史这一前提。过去几十年来，社会人类学者努力将当代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却还没有成功地解决如何将这些理论方法与一个有悠久文字记载的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①。

中国考古学虽然有丰富的史籍记载和悠久的史学传统，但是这段历史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所占的比例也十分有限。而且，史籍提供的信息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涉及社会历史各个层面。现代史学也需要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方法，突破传统史料学的窠臼，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由于中国考古学发生和发展的特殊社会背景，使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证经补史的作用上面，一旦面对处于史籍以外的考古材料，就只能用常识和经验来进行处理和解释。再加上缺乏社会人类学理论的训练，考古学家自然不会有探索的科学意识去研究材料和现象的原因或社会发展的因果率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中国早期国家的探源工作仍然局限在三代编年学定位上的原因。虽然早在1929年，郭沫若就呼吁我们应当抛弃国情不同的成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②。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也提出，如果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不能得到确立，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就不能前进一步^③，但由于背着沉重的传统包袱，我们在学习和接受现代科学思维时才显得那么的艰难和如此的勉强。

社会科学理论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经过西方大批哲学家和学者几个世纪的持续努力，创立起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优良传统，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不断发展，日臻成熟。这一进程完全是和以牛顿、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同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和以哲学及逻辑抽象思维为特点的理论发展密不可分的。正是由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③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于西方学术界对理论的重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对规律和通则的探索均成为学术问题的核心，并成为无数探究的起点和向导。

中国的国学以“经”“史”为两大支柱，方法是记述和考证。因此，中国的学术传统擅长主观的价值判断，缺乏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训练。科学考古学在引入中国之后，就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重视近代科学的演绎法，并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发扬光大，却将其纳入了与传统历史学相一致的描述与编年的窠臼。这种历史学导向的思维也成为我国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的主要特点。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文明和国家探源是社会文化演变研究的重要课题。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B. G. Trigger)指出，社会文化演变研究可以被视为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方法，它可以对历史整体的形态和发展方向做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并赋予人类行为以特殊的含义。因此，社会演变和史学研究实质上是通则和个案的区别，两者互补并缺一不可。没有个案的实例和归纳就不可能提出通则所要解决与认识的问题，没有通则的探索也无法科学地阐述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

有学者可能认为，中国经历了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轨迹不同的发展历程。文明是某个地区本身历史过程的产物，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塑造了迥异的民族文化，因此，这种“国情不同”的史学研究没有多少规律性可言。过去，西方也有学者将社会文化演变等同于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史学研究和社会文化演变的课题是相同的。但更多的学者认为，社会演变研究不能等同于历史学，而是对社会演变动力的研究。为此，旨在揭示中国国家起源真谛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若不同其他社会科学密切结合，便将无所作为。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研究放到社会科学总体框架中去讨论的必要性。

已经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国内好评如潮，但是国外同行却并不认同，而且引发了一场网上的大讨论。一些外国学者对工程的性质提出质疑，认为工程的学者们受政治驱动，试图跨越缓慢而又无序的科学研究去证明中国文化的原初性和独特性。有些美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今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田野方法与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方法相仿，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他们指出，某些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作为

夏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甚至是误导的^①。中外学者对工程性质的看法如此大相径庭，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进行反思，这不是单单用意识形态、价值观或文化优越感对一些批评反唇相讥就能解决的，因为中国与当代国际上的文明与国家探源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存在巨大的鸿沟。

表面上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轰轰烈烈、热闹非凡，实际上它已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诚如有些考古学家所言，依靠文字材料搞三代纪年，能做的也基本都做了，即便采用先进的测年技术也不见得能得出真实的结果^②。另一方面，夏代纪年范围内的遗址也已发现不少，但是学者对什么是夏仍然众说纷纭。问题症结何在？关键在于缺乏能够帮助我们从文献和考古遗存来判别国家形态的科学标准。没有一套用坚实科学理论构建起来的独立分析体系，即便将夏文化的所有遗址发掘殆尽，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达成对夏的共识。换言之，面对坛坛罐罐，我们如何来判断它是早期国家？没有对酋邦社会形态的探究，我们又如何能确认国家的诞生？

当前，编史学定位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国家探源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主要原因。其实，文献和考古材料只是不同的信息库，它们都属于最基本的研究材料而处于基础研究的同一层面并无主次之分。然而，目前我国的国家探源工作仍将史籍记载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所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学在内全部围绕着典籍的内容而展开，所有学者的工作也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这就是要证实三代的史实及其年代学的可信度。显然，这项工作将早期国家探源研究变成了变相的考证而非科学的探索。我认为，这项研究应当尽快从狭隘的编史学中解放出来，引入国际上流行的方法论，并充分重视理论的作用。历史学和考古学是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相关的信息应当通过持续的反馈结合起来，防止将考古研究简单地按编史学的框架来进行设计。中国的国家起源研究必须超越传统文献的线索，努力为新的历史问题提供新的认识与启示，从而创造一种古史研究的新境界。

① 刘星：《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

②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见《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为此，应当意识到理论探究在国家探源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它绝不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胡诌，而是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认识早期国家形态和了解远古文明发展历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酋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换言之，只有从科学理论上确定了酋邦的社会形态以及什么是早期国家的标准，才能够从物质形态上来探讨它们的存在和分辨它们之间的差异。同样，只有借助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和指导，史学研究才能和考古资料进行科学的整合，进而深入了解中华大地上文明和国家起源和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并为完善有关国家起源的社会通则做出独特的贡献。

二、酋邦——前国家的复杂社会

一直到 20 世纪中叶，西方学术界对酋邦社会仍然知之甚少，尽管这种复杂社会遍布全世界，但是人类学界并没有将它看作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1955 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 Oberg)根据中美洲低地的人类学研究，将当地的部落社会称为“酋邦”，并将社会演进的形态用同姓部落、氏族部落、酋邦、国家、城市国家和帝国等类型来表述，从而开创了酋邦探索之先河。之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图尔特(J. Steward)将酋邦定义为由多部落聚合而成的较大政治单位，并将酋邦分为两类：神权型与军事型。然而，如何在酋邦与早期国家之间进行划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1962 年，塞维斯(E. R. Service)在他的《原始社会结构》一书中将酋邦定义为：“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他认为，酋邦的产生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需要将分散的劳力组织起来从事大规模的生产，二是定居社会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导致经济的特化。在塞维斯看来，酋邦等级制的诞生是源于协调区域性特化经济再分配的需要，而这种分配等级制度基本上是在资助贵族阶层及其政治活动的特殊背景内运转的^①。

1972 年，弗兰纳利(K. V. Flannery)利用丰富的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论证了酋邦与国家的特点和区别。他认为酋邦标志着世袭不平等的出现，在酋邦社会中人的血统是有等级的，高贵和贫贱与生俱来。酋长不仅意味着高贵的出身，而且往往是神的化身。他们与神祇的特殊关系使其权力合法化。酋邦常常以繁缛的祭祀活动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接受贡品。至于国家，弗兰纳

^① Service, E. R.,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利认为它是一类非常强大的政体，拥有高度集中的政府和专门的统治阶层，总的来说已基本脱离了标志简单社会的那种血缘关系。它是高度等级制的，居住方式常常基于职业上的专门化而非血缘和姻亲关系。国家可以发动战争、征募士兵、征收税赋和强索贡品。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结构，常常以市场的存在为特点。经济大部分为一批上层人物所控制，他们是产生高官的阶层^①。

1975年，塞维斯(E. R. Service)在他的《国家与文明起源》一书中正式将酋邦列为社会发展的独特形态和重要发展阶段，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和国家这一社会演变的新进化论模式，从而取代了摩尔根的蒙昧、野蛮和文明的三阶段文化演变理论。塞维斯认为，酋邦介于平均主义社会和强制性国家之间，社会地位的世袭使它具有一种贵族社会的性质，但是它没有武力压迫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机制，缺乏由国家行使的那种与权力垄断相关的强制制裁能力。这种社会大部分是用宗教来实施管理，因此酋长的权力基本上是一种调定权而非统治权。酋邦的结构普遍是神权型的，酋长或祭司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和使民众臣服^②。

1981年，卡内罗(R. L. Carneiro)详尽讨论了酋邦的概念，他给酋邦所下的定义是：“由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这种超聚落的社会结构是向国家演进的基础，其下限标志着聚落自治的结束，而其上限标志着向国家演进的起点。卡内罗认为，酋长虽然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的权力是有限的，酋邦不存在真正的政府来实施具有法定约束力的决定。卡内罗指出，酋邦一般只有两层等级制，而国家至少拥有三级等级制，包括国王、地方行政长官和聚落首领。卡内罗还列举了从考古学上分辨酋邦的4项判断标准：(1)存在大型建筑物，其规模和所需劳力超出了单一聚落人口所能胜任的程度；(2)存在数量上少于聚落的祭祀中心，表明存在超越聚落自制的社会结构；(3)存在标志特殊地位人物如酋长的富墓；

^① Flannery, K. V.,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2, 3: 399—426.

^②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75.

(4)平等部落社会的居址形态和大小布局基本上非常接近,但是酋邦存在一个结构上大于一般村落的聚居中心。卡内罗认为,一般作为国家标志的强制性垄断权甚至在早期国家中也并不明显存在^①。

随着探讨广泛展开,学术界对酋邦的认识也日趋深入,主要表现在:(1)酋邦不是一种划一的和铁板一块的社会形态,它是一种差异极大、形态各异的复杂社会。简单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高级酋邦已非常像早期国家。(2)酋邦本身的发展体现为一种“轮回”的兴衰过程,并不是所有的酋邦都能向国家演进。探讨的领域也从社会形态的划分转向了解产生酋邦形态多样性的原因。(3)酋邦发展和国家起源的动力不仅是塞维斯提出的劳力集中和经济多样化导致的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化,还要将卡内罗提出的冲突和战争动力考虑在内。

20世纪70年代,厄尔(T. K. Earle)根据他对夏威夷土著社会的民族学研究提出了一种复杂酋邦的概念,表现为:(1)酋长与平民之间在等级上完全隔离;(2)领导权特殊化;(3)地区等级分化日益明显。并认为夏威夷是仅次于国家层次的复杂酋邦的最好例证^②。在1987年的一篇重要的综述中,厄尔认为酋邦是一种进化的社会类型,是原始平等社会和官僚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酋邦是形态差异很大的社会,对不同的分类加以归纳:有神权型、军事型和热带森林型的划分;有集团型和个体型的划分;有层级(stratified)型和等级(ranked)型的划分;有最高(paramount)、层级(stratified)和非层级(non stratified)酋邦的划分;还有简单和复杂酋邦的划分。

厄尔认为,酋邦最好被定义为一种根据地域性组织起来的社会,拥有一种集中的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大批聚落之间的活动,规模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酋邦也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的社会,贵族阶层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交换来控制经济和劳力。象征、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标志酋邦

① Carneiro, P. L.,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In Jones, G. D. and Kautz, R. R.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7-79.

② Earle, T. K., 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 complex chiefdom: the Halelea District, Kauai, Hawaii. *Anthropological Paper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63, Ann Arbor: Museum of Anthropology, 1978.

进入了最早的文明阶段；酋邦普遍具有神权的性质，使酋长的统治成为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许多酋邦的祭祀建筑将社会的宗教活动延伸到宇宙的秩序上。厄尔总结酋邦三种意识形态的物质表现：(1)纪念性建筑的营造，如英国的巨石棚、密西西比的土墩群和夏威夷的神庙。这些建筑是世俗与神祇的维系点，使酋长能够扮演与宇宙力量沟通的神圣角色。这些建筑也是酋长拥有劳力和资源操纵能力的最好明证。(2)酋长普遍强调他们的外来起源，从而使自己的统治赋予神圣的地位并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这些贵族墓葬里发现的大量珍贵随葬品往往都是舶来品，可以体现他们对神秘知识和权力的拥有。(3)武力的象征，在酋长的墓葬中常常有代表尊严的武器，用以表现由武力主导的宇宙秩序的延伸^①。

1991年，克利斯蒂安森(K. Kristiansen)进一步阐述了酋邦的多样性，认为它是一种介于部落到国家之间的差异极大的社会形态。为了研究酋邦与国家的关系，克利斯蒂安森在酋邦纵向的发展层次上又划分出一个“阶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y)的形态作为国家结构的雏形，这种复杂酋邦已具有早期国家的一些特征，如强大的社会经济分工和领土意识，但仍缺乏完善的官僚体制。而在横向的变异层次上，克利斯蒂安森定义了两类酋邦：一类立足于控制生存资料生产的常规经济(staple finance)，另一类立足于奢侈品生产的财富经济(wealth finance)。但是，克利斯蒂安森认为这两种类型并非相互排斥，非此即彼，而是可以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在讨论社会演变轨迹时，他认为酋邦常常处于一个进化和倒退的较大历史旋涡之中，在许多情况下酋邦是次生的发展，但有时却是一种倒退的社会。

1984年，赖特(H. Wright)提出了酋邦发展的一种“轮回”(cycling)概念，指复杂酋邦在区域性简单酋邦群中兴起、扩张和分裂的周期性波动^②。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大部分的复杂酋邦会分解成为简单酋邦，或从整体上崩溃。这种波动可能是由于与周边社会的竞争、传染病、人口失衡、农业歉收、领

① Earle, T. K., Chieftdom i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7, 16: 279—308.

② Wright, H. T., Prestate political formation. In Earle, T. K. (ed.), *On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 Essays in Honor of Harry Hoijer*, Malibu (CA): Undena, 1984, 43—77.

导不力以及继承等各种因素所引起。“轮回”的发展概念被许多学者公认为酋邦社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无数失落文明遗留的悬念。

在1999年发表的题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与动力》一文中，弗兰纳利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及公元前200年的墨西哥和秘鲁，人类创造了我们称之为‘早期国家’的大型、政治集中和分层的社会。考古学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要回答为什么。”弗兰纳利进而将起源问题用“过程”和“动力”两个概念来概括，“过程”是指要了解早期国家从哪类社会演化而来，而“动力”问题是要了解促成社会演变的主要动因。弗兰纳利指出，虽然酋邦具有早期国家赖以形成的世袭不平等和等级结构，但只有极少数的酋邦才能演进到国家。他深信，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就形成于酋邦“轮回”的动力环境之中，孤立的酋邦不可能转变成国家^①。

最近弗兰纳利和马库斯(J. Marcus)撰文指出，全世界的首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营造大型的土墩和祭祀建筑。卡霍基亚(Cahokia)酋邦建造的“僧侣土墩”(Monks Mound)高达30m，占地300m×212m，是新大陆最大的土墩。墨西哥奥尔梅克酋邦在拉文塔(La Venta)矗立起巨大的石雕人头像、复活节岛的首邦雕刻了900到1000具巨大的石像。奥尔梅克和新西兰的毛利酋邦都雕刻玉器，并成为贵族的传家宝。许多酋邦还有精美的木雕，贵族房屋的梁和柱都以雕刻加以装饰，有的雕刻着武士，有的雕刻着传说中的祖先。他们还指出，即便是最高酋邦(paramount chiefdom)或阶层型复杂酋邦也不能幸免于轮回与瓦解的进程，也不一定能演进到国家。由于酋邦社会的凝聚机制一般无法控制距离较远的民众，所以酋长总是尽可能将人口集中在自己的居住区周围。只有极少数最高酋邦才能制服和吞并周边的大型酋邦，形成一个不能再作为酋邦统治的政体。因此弗兰纳利和马库斯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武力征服的作用不可忽视^②。早在1970年卡内罗就提出过国家起源的战争

^① Flannery, K. V., Process and agency in early state formation.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999, 9(1): 3-21.

^② Flannery, K. V. and Marcus, J., Formative Mexican chiefdom and the myth of the 'Mother Cultur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00, 19: 1-37.

理论模式^①。1992年他又将冲突和战争的理论模式用于解释酋邦的发展^②。

综上所述，酋邦和国家的关键区别有三点：(1)是否存在官僚政府机构；(2)是否拥有合法的武力；(3)社会凝聚机制的血缘关系是否被地缘关系所取代。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M. Fried)将国家定义为：“超越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③社会人类学所确立的国家标准应当可以被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在应用这些标准的时候也需要用中国的案例加以检验。张光直指出，在将西方的法则用到中国的史实上来的时候，需要做一些重要的工作，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他指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更为强化^④，因此三代和西周前期应当分入酋邦还是分入国家，成为中国国家探源值得深究的问题^⑤。

20世纪末在一篇回顾酋邦与早期国家研究的论文中，美国考古学家斯坦因(G. J. Stein)总结了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新趋势。首先，当代学术进展已经偏离构建并检验有关早期国家起源一般性理论模式的导向，开始转向更加关注特定文化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分析。这一新的趋势努力将理论与实证研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一种复杂社会和政治经济的多样性的框架来解释都市化结构、手工业特殊化和交换的多样性。这一研究的新趋势也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新进化论和文化系统论的批判性反思，意识到这些理论模式过分强调文化进化和文化适应、过分强调演绎法所造成的忽视历史个案研究，以及囿于线性观、功能观的和环境决定论所造成的偏颇。

其次，新的研究趋势使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日益紧密，将复杂社会看作是一批多样化的功能实体，在其中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社会经济群

① Carneiro, R. L.,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970, 169: 733—738.

② Carneiro, R. L., Point counterpoint: ecology and ide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World civilization. In Demarest, A. A. and Conrad G. W. (eds.), *Ideology and 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2, 175—203.

③ Fried, M. H.,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④ 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⑤ 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体文化传统上的特殊形态相结合，在塑造特定政治实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有关酋邦研究方面，斯坦因列举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项趋势：(1)酋邦是一个过于广泛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在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之间做出区分。(2)酋邦越来越被从贵族阶层利用扩张的策略来导致并维持经济不平等的角度来予以定义。因此，社会复杂化成型的关键因素是控制剩余产品的流通和聚敛，从而造成经济不平等并使之永久化的能力。(3)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被操纵来作为控制剩余产品和竞争权位的主要手段。学者们强调，控制奢侈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酋邦政体最为关键的要素。

在国家探源的研究方面，斯坦因也列举了四项趋势：(1)现在已不再将国家看作是一种高度集中和权力无限的政体，而倾向于以一种多样化的眼光来看待国家和城邦结构的多样性并探讨国家权力的范围。(2)与酋邦研究相同，国家的研究也关注国家政体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中央统治机构与其他社会经济部门之间关系的状况。(3)更加关注农村聚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间的相互关系。(4)国家分析开始探究复杂层次上不同的政体之间区域性互动的政治经济学。

斯坦因还指出，由于史籍中几乎没有关于大部分社会阶层如都市平民、个体工匠、农民以及游牧民的相关资料，因此有关这些被史籍所忽视的社会群体的状况就必须要靠考古学的研究来了解^①。

三、中国学者的误区

酋邦概念在引入中国之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并开始尝试用这一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和考古材料。由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背景和沿革缺乏全面的了解，于是在讨论中出现了许多不得要领的情况。

在“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一文中，谢维扬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与酋邦放到一起讨论，认为中国的早期国家不是由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演化而来，而是从非部落联盟类型的酋邦发展而来，并用个人观点概括了所谓西方学者对酋邦的定义：(1)酋邦比部落大；(2)社会分层；(3)经济上由互惠转

^① Stein, G. J., Heterogeneity, power and political economy: some current research issu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Old World complex societ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998, 6(1): 1-44.

变为再分配；(4)出现了宝塔形权力结构和专职的官员；(5)血缘关系解体^①。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将部落联盟和酋邦看作不同的前国家形态是一种概念错误。其次，上述的五项特征中除了前三点言之有据之外，其他均属主观臆测。

该文有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第一，摩尔根时代还没有新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式，当时流行的是蒙昧、野蛮和文明的三阶段文化发展模式。摩尔根提到的部落联盟仅是19世纪民族学案例的研究，而酋邦是20世纪提出的社会人类学理论概念，故将酋邦与部落联盟相提并论并扬此抑彼显然将两个时代的不同概念混为一谈。第二，根据新进化论的观点，易洛魁、雅典、罗马以及中国的前国家形态均属于酋邦的范畴，它们之间的社会形态差异反映了酋邦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说易洛魁、雅典、罗马的前国家形态是部落联盟，而中国的前国家形态是酋邦，说明作者对酋邦的理解还是局限在个案而非通则的认识上。于是，从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来评价西方学者有关酋邦论述的武断和片面显然有失偏颇。

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谢维扬除了继续将部落联盟看作是前国家社会的一种不同形态之外，还对酋邦的误解有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酋邦的主要特点是：在进入国家社会之前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该书还罗列了四项酋邦的特点：(1)酋长拥有特权，而且包括了征兵权和对臣民的生杀之权；(2)酋邦有各种官员，组成了一个较为正式的政治机构和权力网；(3)酋长和他的官员拥有特权；(4)酋长的地位成为永久性的^②。与社会人类学公认的酋邦概念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这些所谓的酋邦定义存在非常大的问题。诸如中央集权、征兵权和生杀之权、官员和正式的政治机构以及权力网等属于国家的特征，都被用来描述酋邦，误导了酋邦的基本概念。

无论是批评摩尔根的部落联盟不具备普遍意义，还是推测塞维斯不提部落联盟并非疏忽，都是作者概念不清所产生的误解。因为，摩尔根时代还没有将部落联盟作为向国家过渡的普遍形态来加以讨论的背景，因此指责摩尔根的失误显然没有道理。而塞维斯不提部落联盟也并非是其不具代表性，而是酋邦概念已涵盖了所有多部落的复杂社会。

^① 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②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在谈及国家时，谢维扬令人惊讶地引用了克烈逊(H. J. M. Claessen)和斯卡尔尼克(P. Skalnik)的一句话作为开宗明义的说明：“根本不存在为整个学术界所公认的国家定义。”但是，这句话的本意看来不是指学术界没有公认的定义，而是指没有完美的定义。结果，作者不去讨论诸如血缘和地缘关系、政治经济和合法武力等 20 世纪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在 19 世纪恩格斯和列宁有关国家是阶级冲突产物的论述上大费笔墨。

谢维扬有关酋邦的论述存在两个很大的误区。第一，将部落联盟作为一种前国家形态和酋邦搅到一起，以为部落联盟和酋邦是两种不同的前国家社会形态，将西方的前国家社会归入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而将中国的前国家社会说成是酋邦。第二，完全以“准国家”的标准来看待酋邦。其实酋邦是一种形态多样、发展层次各异的复杂社会，并以“轮回”兴衰过程为发展特点。于是为了要将酋邦描述成国家的“候选人”，便刻意提升酋邦的地位，将许多进步特点堆砌到酋邦的头上。在这种“准国家”形态的渲染之下，我们看不出酋邦是原始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桥梁，也不知道什么是促成向国家演进的动力。于是，在将酋邦概念和中国的史实相结合时，也难免流于生搬硬套。

我国资深人类学家容观复对此提出过批评。他说，我国一些学者(主要是历史学者)不善于运用考古实物资料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做必要的参证，孤立地进行实证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近年来对我国前国家形态的研究问题上。他们借用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所创建的酋邦概念，认为我国早期国家不是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而是古代酋邦在政治上演变的产物。1987 年起有不少关于酋邦的专论，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就是在解剖诸如良渚文化或红山文化时，并没有像国外文化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那样，在确定其为酋邦时尽可能地取得实例，然后开展类比分析和验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是由作者仅仅用考古遗物、遗迹和少量的文献记载便构筑起代表整个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的“酋邦社会”的全貌^①。

对于酋邦，另有学者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王震中认为，酋邦除了启示我们在部落到国家之间还应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之外并无普遍意义，因为它无法和考古遗存对号入座。他认为，从平等聚落、通过初步分

^① 容观复：《人类学方法论》，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然后向都邑发展这三大阶段才体现了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轨迹^①。其实，酋邦是人类学对社会发展阶段普遍性的一种理论概括，是社会规律的总结。无论是史料还是具体的考古发现，这些具体的经验事实和人类学理论概念并不处在同一阐释层次上。科学理论是一种高层次的规律性认识，它们都以全称命题的形式表述，因此酋邦具有理论概念的抽象性和普遍性。而史料和考古材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部分，仅处于低层次的“经验观察”范畴。所以，用考古证据的不同来否定酋邦概念就好比根据性别和人种差异来否认存在抽象的“人”的概念一样。

由于我国历史和考古学者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并不内行，于是在面对基于人类学理论来探讨历史和考古现象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困扰。有的学者似乎不理解“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到底有何不同，时常下意识地偏信直观的事实而怀疑抽象的规律。社会人类学认为，处于相同发展层次上的社会，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物质文化。比如，拥有精美青铜器的殷商完全不同于拥有雄伟金字塔的古埃及，但是两者都符合早期国家的概念。同样的道理，世界各地的前国家形态可以千差万别，但是都符合酋邦的概念。可见，王震中否定酋邦实质上是混淆了两个不同学术层次上的认识，根据自己对现象(考古证据)的认识来否定科学规律性(理论)的认识。对理论概念认识的不足同样表现在将部落联盟和酋邦的相提并论上，谢维扬将两者混为一谈，根本上说也是混淆了对“社会规律”和“社会现实”的认识。

此外，王震中提出用聚落形态判断社会演进阶段的标准，也没有了解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聚落考古学的精髓，是从人类居址逐级向心聚合的过程和布局及规模的变迁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等级化。当代考古学已发展出一套从聚落和居址形态来判断社会和政体的发展层次、观察史前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和国家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弗兰纳利指出，简单酋邦一般具有两个层次的居址等级，表现为一批小村围绕着酋长的大村。复杂酋邦有三个层次的居址等级，小村围绕着大村，而一批次级酋长的大村又围绕着最高酋长

^①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的聚落。酋邦通过吞并邻居来壮大自己，或取而代之或迫使他们对其臣服^①。

虽然对酋邦概念的重视反映了中国的国家探源工作开始将社会人文科学与中国的史实及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的一种可喜努力，但是由于没有吃透理论概念和掌握基础理论研究方法，我国一些学者的讨论难免传递了误导的信息和混乱的概念。

在传统的领域，我国学者将典籍中记载的朝代国家不加批判地公认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国家，因此夏商周三代自然成为国家探源的焦点。但是由于夏代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记载，又缺乏判断早期国家的科学标准，使得从考古遗存来分辨夏成为争议极大的问题。现在学术界对夏存在五种不同的看法，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所以也就等于没有结论。对于前国家形态的社会也倾向于从典籍的记载来加以辨认，比如，将这些社会称为“方国”或“古国”，或统称为“五帝时代”。由于这些社会都缺乏文字的记载，所以对它们的研究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的眼光，否则这种研究也只能停留在想当然的猜测之上。

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的早期文明犹如漫天星斗。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三星堆文化、齐家文化等都是形态各异、复杂程度有别的酋邦社会。我国传统的考古学研究完全根据物质遗存来进行分析与比较，将各种考古遗址命名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用酋邦来分析这些史前的复杂社会，可以为考古学分析引入“社会”的概念。换言之，中华大地上的史前文明可能经历过不同的发展轨迹，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这些复杂社会演进的层次和的社会动力可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酋邦作为一种分析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文化特征的比较来了解前国家的社会形态，并探究这类社会如何向国家演进或者崩溃瓦解的原因^②。

在酋邦概念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检验和完善有关早期国家的理论概念，这是我们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认识早期国家形态和了解远古文明发展历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从科学理论上确定了酋邦的社会形态以及什么是早期国家标准，我们才能够从物质形态上来探讨它们的存在和分辨它们

① Flannery, K. V., Process and agency in early state formation.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999, 9(1): 3-21.

② 陈淳：《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98年第7期。

之间的差异。

四、小 结

将当代社会人文科学理论和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相结合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将中国传统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用现代科学理论武装起来，使我们传统学科变得更严谨更科学，并能够增强我们对古代社会发展本质的了解。第二，用中国的史实和考古材料来检验社会科学的一般性理论，使中国的文明与国家探源跻身世界学术之林。

对于社会科学理论与国家探源的关系，弗兰纳利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哺乳动物原来是由动物学家所定义，于是古生物学家可依此来分辨它们的骨骼。国家最初是由社会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定义，于是考古学家才能据此来分辨其结构的形态^①。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理论的规律性认识，是考古学家具体研究设计的向导，以及从物质遗存来判断社会发展层次的科学依据。我国史籍中虽然有朝代和国家的称谓，但是它们毕竟和现代科学意义的早期国家并不相同。缺乏理论提供的依据就像是缺乏“按图索骥”的标准，结果，我国的史学和考古学界在对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墟的探讨就难免变成一场缺乏共识的毫无结果的纷争。因此中国学者必须意识到，只有建立在坚实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国家定义而不是典籍中的线索，才是指导我们从史料和考古资料来判断中国早期国家的标准。

再有，国际学术界从文明与国家探源中归纳出来的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只有经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可能具备世界意义。然而，中国学者自古以来便作茧自缚，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外国有的，中国都有，只要研究中国就行了。于是，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位置，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张光直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的三部曲：（1）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学科主流的核心问题；（2）研究中国的案例能否对全人类的问题做出新贡献；（3）一定要用世界性学者能看

^① Flannery, K. V., The ground plans of Archaic states. In Feinman, G. M. and Marcus, J. (eds.), *Archaic States*,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8, 15—57.

懂的语言把自己的贡献写出来^①。

张光直还指出，将中国国家文明探源置于世界背景中去审视，可以得出两项重要结论。第一，中国的早期国家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具有相似的起源动力。第二，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与西方社会科学所确立的某些通则不合，西方社会科学描述的古代国家表现为亲族制度式微、政教分离、文字的产生是为了记录商品的流通。但是中国的早期国家与此迥异，亲族制度与国家制度紧密相连，政教没有分离，文字最初的使用也和商品流通没有很大的关系。为此，张光直认为拥有丰富史料和考古材料的中国对世界社会科学做贡献的潜力是无可限量的。然而，中国学者若要对社会科学做重大贡献的话，头一件事就是要把当代的社会科学学好。中国史料中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种种真理，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闭关自守的学究所能发掘出来的。如果能够做到这点，那么 21 世纪的社会科学可能是中国的世纪^②。

要做到这点委实是任重而道远，这首先需要我们跳出圈子、克服成见、放下架子，老老实实从头学起。文明与国家探源是中国能够为世界社会科学做出贡献最有潜力的一个领域，但是像奥运会零的突破一样，我们的成绩若要得到世界公认，就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这种贡献既不是用现代科技来考证典籍中的史实，也不是我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生搬硬套或一知半解的发挥，而应当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成就上的全新创造和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原刊《中国学术》2003 年第 2 期）

① 张光直：《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与现代性》，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环太湖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比较研究

一、社会复杂化概念

在当今国际考古学界，复杂化是社会文化演变和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重要研究课题。对于“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这一概念，美国学者罗思曼(M. S. Rothman)认为，复杂化是指一个多村落社会中经济、管理和宗教相互依存关系所发生的一种量变和质变过程。这种依存关系的核心是不同社会成员作用的分异(segregation)和集中(centralization)。在此，分异是指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亚系统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复杂化也包括了分属不同族属、社会等级、性别和职业等范畴的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①。阿诺德(J. E. Arnold)认为，社会文化日趋复杂化的原因是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一些首领人物提供了机会来操纵人口、资源和生产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劳力政治上的集中应该被视为社会文化复杂化的动力^②。希尔(J. N. Hill)等认为，复杂化主要是指一个文化系统从其组织结构异质性看其内部的差别程度——如不同的居址类型、职业分工、群体、等级地位和技术等变量。因此当发现有新的变量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文化系统的

① Rothman, M. S.,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y: Mesopotamia in the late fifth and fourth millennia B.C.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4, 12(1): 75-119.

② Arnold, J. E., Labor and the rise of complex of hunter-gatherer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3, 12: 75-119.

复杂性有所发展。社会文化复杂化有两种形式：非等级与等级的。前者是指平等社会，后者是指头人社会、酋邦和国家等。一个文化系统不同部分与结构在规模上的增长通常表示了社会文化复杂化程度的增长^①。

目前，一些史前考古学家对社会复杂化的讨论主要围绕着社会不平等(分层)是在何时、何地及如何变得系统化的，并且关注从遗址大小、建筑规模、纪念性建筑或其他公共建筑等证据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集权和等级化。非生存必需物品的生产、消费和交换也是一个方面。在考古学上，以房屋、食物、物品形式表现出来的物品分布的不平衡，反映了社会成员地位和对物品的不同拥有程度。意识形态赋予社会不平等以合法地位也是复杂社会研究的一个方面^②。

因此，社会复杂化是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诸方面从简单到复杂、由平等向等级分化转变的一种进程。社会复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结构性变化的研究上，而不是单单关注一些个别特征的出现与消失^③。

二、复杂化的动力机制

目前，探讨社会复杂化的原因集中在社会环境的选择压力上，主要包括人口增长、战争、农业的强化和贸易交换等方面，欧美学者大都是从一个或几个方面为切入点进行热烈的探讨，根据不同的具体案例分析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和阐释^④。

① Hill, J. N., Trierweiler, W. N. and Preucel, R. W.,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complexity: a case from the Pajarito Plateau, New Mexico. In Arnold, J. E. (ed.), *Emergent Complexity—The Evolution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1996, 107—127.

② Creamer, W., Developing complexity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constructing a model for Rio Grande Valley. In Arnold, J. E. (ed.), *Emergent Complexity—The Evolution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1996, 91—106.

③ Arnold, J. E.,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In Arnold, J. E. (ed.), *Emergent Complexity—The Evolution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1996, 1—12.

④ Drennan, R. D.,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accounting for variability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regular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y. In Arnold, J. E. (ed.), *Emergent Complexity—The Evolution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1996, 25—34.

1. 人口因素

人口压力是社会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人口密度增加，就会导致土地和资源的短缺。对资源和土地的竞争，会促进社会群体加强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导致社会结构的运转从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造成对基本生产资源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内部一般通过首领的协调来加以化解，于是再分配体制的形成会促使财产私有化和世袭体制的发展。拥有分配权力的人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社会就会产生等级的分化^①。

再分配被认为是促使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机制。原始平等社会是一种互惠机制，但是日趋严重的人口和资源平衡失调所激发的社会扰动，会使互惠形式向再分配形式转变。再分配的作用是在供求不平等的情况下合理分配资源以避免冲突。这种再分配在私下无法解决时，就会求助于某种社会机制。这会促使一些首领人物运用其权力来操纵劳力和资源，从而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和社会等级的分化。但平均主义社会的成员并不乐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和驱策。只有当外界压力严峻，如食物短缺和环境恶化，外来威胁增大，使人们意识到除了听从首领的摆布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社会成员才会被迫放弃社会流动性和经济主动权以换取社会生存保障。再分配机制复杂化的政治表现就是首领权力的增强、社会管辖制度的产生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随着社会规模的增大和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化，促进了管理体制的复杂化^②。

另一方面，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粮食压力，亦导致了不平等的发展。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制度化的强制性约束，拥有剩余产品的个体就能在社会内部提高自己的地位。当社会中对私有财产的拥有成为一种广为接受与普遍的价值观时，私有财产的拥有者便很容易确立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③。

人口增长除了造成资源短缺与竞争外，还会形成梯度压力(scalar stress)。梯度压力是指人口当以更大规模接触和交流时，所需处理的信息量超过了个

① Harner, M. J.,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ists.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70, (26): 67—86.

② 陈淳：《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

③ Hayden, B., Thresholds of power in emergent complex societies. In Arnold, J. E. (ed.), *Emergent Complexity—The Evolution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1996, 50—58.

体所能应付的能力而产生一种“交流压力”，导致经常产生冲突，从而使群体决策效率降低。社会处理梯度压力表现在五个方面：(1)增加仪式频率和扩大仪式规模；(2)使群体分裂；(3)增加社会等级分化；(4)群体结构细化；(5)“基本单位”规模扩大^①。

宗教仪式频率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等级分化和基本单位的扩大都直接导致社会的复杂化。群体分裂策略是早期人类社会特别是狩猎采集群应付资源压力的一种办法。但是当理想的栖息地均被占据后，群体分裂与向外移民不但受到环境的限制，还受到了社会本身的限制。社会限制是指高密度的人口对生活为中心区的人们产生类似于环境限制所产生的压力。例如在 Yanomamo，有近一万人居住在一处开放的雨林中，人们会以为这里的村落会是平衡分布的。然而，查格农(B. L. Chagnon)发现其中心地区的村落要比边缘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群体之间存在比边缘地区更多的冲突，战争的规模和频率也更大。此外，中心区的人们也无法迁移来躲避攻击，于是为了以利攻防，Yanomamo 中心区的村落比在边缘地区规模更大，首领更为强悍有力，村落间的联盟也比边缘地区更加强大。显然，中心区域的社会环境促成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②。

从游群向部落、酋邦、国家的演进中对于信息的处理、贮藏、分析能力的提高是社会复杂化一个重要趋势。

在游群中，大部分的信息资料由非正式的头人来掌握，他们处理的信息通常也比较有限，且一般服务的人数不超过 100 人。农业部落社会不仅需要掌握野生资源的资料，而且也要控制土地的分配、种植与收获的时间、土地开垦的协作等。可能最重要的是，因土地肥沃程度所导致的收获与剩余产品的差异必须从整个群体利益出发进行调节。在平等部落社会，甚至在酋邦中，复杂的仪式活动可以有效调节和缓解这种差异。仪式往往代价昂贵，而首领需要处理的资料和环节也更复杂。在拥有成千上万人口的酋邦中，有时单凭

^① Friesent, M., Resource structure, scalar st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uit social organization. *World Archaeology*, 1999, 31 (1): 21-37.

^② Carneiro, R. L.,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970, 169(3947): 733-738.

复杂的宗教仪式也不足达到调解的目的，于是世袭的首长和随从被赋予更大的权力，而社会要用更多的剩余产品来养活这些贵族阶层^①。

2. 强化粮食生产

摩尔根和泰勒等人类学者认为，社会复杂化与经济基础直接相关。摩尔根认为“人类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多少与生存资源的扩大直接相关”。后来塞维斯与弗里德又重新估价了生产基础与其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强化的粮食生产与社会复杂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伴关系。从新大陆的研究来看，许多地区酋邦的出现与强化的玉米种植直接关联。在俄亥俄河谷，随着玉米农业的引入，先前不存在的复杂社会——酋邦随之出现。¹³C 同位素的分析表明，进入酋邦的密西西比人中与仍处于部落社会的城堡古人中的同位素的比例不同。前者消耗的玉米比后者要多，表明农业的强化程度与社会复杂化程度差异之间存在的密切相伴关系^②。

强化粮食生产对社会复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土地协调。生产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基本的生产手段——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发展。技术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土地开垦是最繁重的劳动，因此集体协作占据主导地位，所有男人均需参与其中，土地属于整个社群所有，但是小块耕地属家庭所有，家庭变成了基本的生产单位。比如，新不列颠一个早期农业社会巴宁(Baning)的土地清理与开垦是集体进行的，但各个家庭独自劳作并收获他们的作物。在这个社会群体的领地范围里，土地在由独立家庭组成的社群中分配，每个家庭自己选择和利用一块耕地，但其所有权要到种植后才被确认。当土地停止使用时，它又归整个群体所有^③。

于是，一方面土地的共同开发需要一种管理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存在肥沃和贫瘠差异，不同家庭可能为此发生竞争与冲突，这样就需要有一

① Flannery, K. V.,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2, (3): 399—426.

② Schurr, M. R., Associa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and social complexity: an example from the prehistoric Ohio valle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5, (14): 315—339.

③ Kabo, V., The origins of the food-producing econom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5, 26(5): 601—616.

种协调机制。因此，当某种层次上的决定不再由族长做出，而是由头人或首领做出时，便产生了某种超家族的管理机制。

(2)私有财产。由于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于是在许多地方家庭延伸所组成的家族便成了独立的社群。因为富有的家族在社会中拥有了广泛的影响，因此许多家族为了财富而加倍努力工作，获得了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这些家族中的首领，扮演了敛聚者(accumulators)的角色，常常通过积聚粮食、物品和服务，并将它们作为某种回报以便扩大他们的权力与影响。敛聚者常利用消耗大量劳力的食物或精美物品的竞争性享宴来展示财富和权力^①。

比如，在所罗门群岛中布干维尔岛上的西瓦伊人中，首领被称为姆米，年轻人的最大野心就是成为姆米。一个年轻人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并省吃俭用才能用竞争宴饮来证明自己有能力当姆米。如果在他首次宴饮获得成功，就会形成一批支持者的圈子。随后，他要准备更大的宴饮。如果又获得成功，就会进一步扩大支持者的圈子。于是人们就开始称他为姆米。最后他便向其前辈姆米挑战，在这一争夺姆米地位的宴会上，有人记录下挑战方及其追随者赠送给当任姆米及其追随者的猪、椰子饼和西谷椰仁布丁的数量。一年之后，当任的姆米如不能回请与挑战者同样奢豪的宴席，他就会声誉扫地，失去姆米资格。姆米还没有强制他人服从的权力，也不能提高别人的生活水平。但是他在社会中拥有了权威，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初步的权力。如在打仗时召集战士，调解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等，一个代表了初步的社会分层的“头人”开始出现^②。

(3)缓解风险。食物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越丰富、越稳定，人类生存的风险就越小。但在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的过程中，人类缓解生存风险的能力有所减弱。

西方学界用“生态广度”概念指利用食物资源的多样性，并被用来衡量一个群体所处的生存条件。一种广泛的生态具有可供选择的多种资源，能起到很好的风险缓冲作用，人们可以在某些食物种类短缺时选用其他种类来对资源波动做出反应。但是，利用新的资源是因为原先的资源耗竭或者靠不住，

^① Hayden, B., Nimrods, piscators, pluckers, and planters: the emergence of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0, (9): 31-69.

^② 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黄晴译),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那么觅食范围的转变实质上是将先前的一种应急食物变成了主食。这种转变其实隐含着生存的危险。当狩猎采集经济在维持群体生存达到一种饱和点时，游群可利用的生态广度已明显下降，作为主食的可利用资源减少，于是人类的生存风险增大。

在狩猎采集向农业过渡阶段，生存风险会进一步加剧。根据人口压力理论，农业起源是在有限的区域内强化卡路里生产以应付食物短缺的一种反应。相对于狩猎采集，农业的生态广度相对较窄，它是通过栽培少数作物来强化卡路里生产的生存系统。因此，在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栽培作物的产量和稳定性如果不能很好缓解资源短缺和波动，人类生存的风险是很大的。此外，被选择引入的农作物种类如果不适合本地的环境，风险也非常之大。

脆弱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使狩猎采集者失去了在人口密度较低条件下的适应机制，这种情况随着流动性的减少而进一步加剧。资源竞争和利用上的投入增加，领土和资源所有权意识逐渐形成。此外，投入增加、竞争加剧、加上协作项目的需求造成社会的向心凝聚及社群界限的形成，因此简单游群中随资源而调整人口规模的弹性机制也由此消失。

环境风险的增大与传统缓冲机制的减弱结合在一起，为发展新的平衡机制提供了选择的动力。最初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贮藏系统的出现，它可以平衡食物产量时间上的不平衡。在早期农业社会中发现有大量贮藏食物的证据。除了缓解风险的功能外，它还能群体协作提供资助，从而在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贮藏的最后一功能的强化，往往成为政治经济复杂化的重要特点^①。

此外，贮藏还引发了另外一项社会功能——再分配，再分配被认为是社会复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缓解资源危机的另一项有效手段就是贸易，区域贸易一方面可以调节和缓解不同地区粮食资源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成为促成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4)手工业专门化。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增加，可以使更多

^① Cohen, M. H., The ecological basis of New World state formation: general and local model building. In Sones, G. D. and Kautz, R. R.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5—122.

的人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造成了专业分工。手工业专门化与权力和贵族的出现有着直接的相伴关系。专业工匠不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他们要么与农人进行交换，要么完全依附于供养他们的贵族。前者导致了贸易的发展，后者则导致了奢侈品生产体制的出现。

显赫物品(*prestige goods*)是指那些贵重、稀有、精美、作为权力与地位象征的物品。由于这些物品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和特种的技艺，只有贵族才能维持生产所需的专职工匠和生产设施，因而也能有效控制这些物品。奢侈品主要用于社会各种仪式，由于它们为社会重要活动所需要，而又被地位较高的人所控制，于是控制奢侈品生产也就具有了政治权威并逐渐使这种权威合法化^①。

3. 交换与贸易

互惠的物物交换在平等社会即已相当普遍，这种交换是所有的亲缘社会用来维系或强化社会关系的一种纽带。亲属、社会群体之间通过相互赠送礼物来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冲突。这是原始人群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经常采用的有效手段^②。

然而，物品的交换和积累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在区域间的首领之间进行，并由整个地区社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领主持。部落之间的交换中，则由整个部落的最高首领主持，于是这些主持人实际上控制了群体所有成员的物品^③。

互惠的礼物交换在平等社会中十分频繁，交换来的礼物需要在内部重新分配，财富被集中在首领的手中，然后再分配给社会的成员。显而易见，一个具有代表社群或再分配地位的人无疑占据着分配物质财富的关键地位，这一地位即使不能为他直接创造财富，但无疑也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起初，平等交换不存在侵吞交换物品的情况，因为血缘群的所有成

① Peregrine, P., Some political aspect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World Archaeology*, 1991, 23(1): 1-11.

②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75.

③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张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员——包括再分配者——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进行生产，贫富分化不明显，并缺乏明显的奢侈品。对于再分配者来说，除了礼尚往来和在社会支持上进行再投资外，他们能做的确实很少，哪怕有权势的再分配者也不能过一种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生活。然而，虽然他们与一般的人的生活相差无几，但是从这种交换过程中，他们能逐步积累起以后将带来特权的权威。

首领对交换的控制，使原本社群之间的活动逐渐变成了首领个人之间的行为。一方面交换物品逐渐积聚到了首领人物的手中，另一方面物品因个人与政治原因在首领之间转手，它们作为礼物和贡品在道歉、邀请、缔约、结盟的互惠活动中被馈赠和授受。外来物品成了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体现拥有者所拥有的权力。在等级社会中，特别是在贵族地位和权威没有立法和政治力量支持时，这些象征品成为贵族权力的主要标志，其个人独有的饰品自然成为政治权威的象征，拥有这些饰品的人由此而拥有了权力的合法性^①。

4. 战争

战争与人口压力有密切的联系，人口持续增长会造成资源和土地的匮乏，并在群体之间为获得控制权而发生激烈的竞争和冲突。这一由资源持续缺乏而不断推动的进程，使社会竞争的强度足以造成基于不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等级分化。这类竞争会不断强化集中军事政治机制的发展。竞争愈激烈，阶级分化和政治上的集权愈趋复杂化。基于社会内部竞争所导致的阶级分化，再伴以源自社会外部的竞争，其结果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体制的进一步发展^②。

卡内罗提出了一种限制理论，即战争并不会在所有的环境中产生。在一种开放的环境中，被征服者可以外迁以开拓新的资源与领地来缓解冲突。只有在相互竞争的群体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受沙漠、高山和大海包围的秘鲁沿海河谷，被征服者无法外迁来逃避，因此只能臣服于强者，这种

① Peregrine, P., Some political aspect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World Archaeology*, 1991, 23(1): 1-11.

② Harner, M. J.,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ists.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70, 26: 67-86.

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集权和国家的形成^①。

上面有关社会复杂化的四个动力机制中，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后面起着作用，这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与资源的短缺所造成人口/资源的失衡。这种人口/资源的失衡是社会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外部表现为人口的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带来了复杂社会形成所必须具备的人口规模。而其内部表现为被迫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压力，包括强化粮食生产、祭祀和贸易等。这些措施又促进了私有财产、再分配机制、等级分化、宗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原来许多小型和分散的社群逐步融合到一个大型的、等级分明的复杂社会中去，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渐从部落向酋邦发展，最后演进到国家。

三、两地社会复杂化进程比较研究

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两地复杂化程度的差异，复杂化时间的差异及促成复杂化的动因的差异。

1. 环太湖地区

从聚落形态、墓葬、祭祀活动等物质形态来看，环太湖地区在崧泽文化的中期开始社会复杂化进程。

在马家浜文化及崧泽文化早期，遗址数量少，密度稀，遗址内功能分区不明显，生活区、生产区、墓葬区集中在一处，居住形态主要是一种适合大家庭或家族集体居住的长房子。单人葬于公共墓地中，随葬品数量不多，以陶、石器等生产与生活用品为主，无明显贫富差别。生活区内发现少量的祭祀物品，表明仪式局限于家庭范围而未成为整个社群的活动，也不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因此这一阶段还是一种平等的社会。

崧泽中、晚期与良渚早期，聚落规模不大，中心遗址周围所聚集的遗址数量不多，遗址内出现了某种生产性的分区，如手工业作坊。葬俗差别不大，基本为工具与生活用品，随葬品数量出现某些的差别，但未见奢侈品。虽出现了土墩，但规模不大，基本上表现为家庭或家族拥有。墓地上可能已有简

^① Carneiro, R. L.,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970, 169(3947): 733-738.

单的仪式活动。暗示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初步的等级分化，可能为等级制的部落或简单的酋邦。

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聚落规模扩大，大型遗址群出现，遗址群内等级分化和功能区明显。卫星遗址群往往围绕某个中心遗址分布，生活、生产、墓葬、祭祀区严格分开，出现了专门制造奢侈品——玉器的作坊。墓葬从随葬品上明显可看出三个等级，大型墓葬建筑有高大的土墩和祭坛，随葬品为各种玉、石、陶器，其中玉质礼器占较大的比重。中型墓葬也有土台，但规模较小，随葬品中玉器的比例相对较少，玉质礼器一般只有玉璧。小型墓葬一般平地挖坑掩埋，随葬品以陶、石器为主，仅为少量小件玉质饰件，也有不少墓无随葬品。此外，在遗址群中心还出现了大型的宫殿型建筑，往往位于修筑的高大土墩上。遗址群内和遗址群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已进入了复杂酋邦阶段，至少形成了三个等级。

以上是根据考古材料对环太湖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所做的一种定性的分析。下面我们试图对一些材料进行一些定量的分析，以观察社会复杂化的程度和进程。首先采用装饰品的量化分析，然后从随葬品和墓葬进行综合的分析。

(1)随葬品。装饰品的定量统计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贵族阶层的出现与手工业专门化存在某种关系，并表现在作为奢侈品的玉质饰品和礼器生产劳力的控制和投入。对这些奢侈品生产的控制是一种政治策略，以便使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合法化。贵族肯定会在劳力、资源和工艺技术上努力提高生产这些物品的能力和数量。这些个人饰品和礼器的拥有和使用，使贵族阶层逐渐与社会其他成员进一步隔离开来。因此手工艺专门化和奢侈品生产的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和艺术活动，更是一种政治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手工艺专门化的发展是与政治集权的强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集权程度越高，贵族阶层会努力生产和使用更复杂的个人饰品和礼器，兴建更大的公共建筑。因此观察和统计奢侈品生产的劳力和精致程度可以一个用来分析社会的复杂化程度^①。

对环太湖地区墓葬和随葬品的分析集中在分辨三方面的差异：原料获取

^① Peregrine, P., Some political aspect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World Archaeology*, 1991, 23 (1): 1-11.

过程中的劳力投入、制作过程中的劳力投入、原料来源的本地与非本地性。

获取原料劳力投入分成高低两级，通过贸易、采矿等获得的可归入高级，而本地采集的归入低级。玉质原料归入高级，石陶质器归入低级。

制作过程劳力投入也可分成三个等级：陶、石器一般属于低级，因为原料低廉、加工简单。个人简单的玉质饰件可归于中级，因为原料相对陶、石器罕见，需要一定的劳力投入，但加工相对还比较容易。装饰繁缛、制作精致的玉礼器和少量精致的玉饰件属于高级，它们需要大量劳力投入，大块和优质的玉料极为稀罕，可能需要付出大量资源进行交换或远距离的开采，并需要特殊的技艺如为玉琮钻孔。

由于环太湖地区墓葬众多，我们根据时代早晚选取三个不同时期的三处墓地：草鞋山①、崧泽中层②、福泉山③(表1)。

表1 随葬品在原料获取、制作过程中的劳力投入与复杂化关系

器物名称	无随葬品	陶、石器	小件玉饰件	礼器琮、璧、钺	备注
投入劳力与资源	低	低	中	高	
草鞋山马家浜文化墓葬数(座)	25	81	8	无	装饰品主要为玉玦、坠等，与陶、石器共出
崧泽遗址中层墓葬数(座)	9	91	14	无	玉器与陶、石器共出，出现玉琮等非实用器
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数(座)	1	29	22	11	只随葬陶、石器的仅6座，玉礼器一般与小件玉器共存，小件玉器中的冠状器、璜等也刻有兽面纹
原料获取难易度	无	易	难	难	
原料获取所投入的劳力	无	低	中	高	玉器越是大件玉料越珍贵，也越难获得，因此所投入的劳力也越大。而玉礼器往往形体较大
复杂化程度	低	低	中	高	

①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见《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③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表中随葬玉器的墓葬，一般均有陶、石器，马家浜、崧泽、良渚三个时期随葬玉器的墓葬占总墓葬的比例分别是：7.5%、14.0%和73.3%，其中良渚时期随葬玉礼器墓葬的比例为36.7%。反映了三个文化在随葬品上所投入的劳力和社会复杂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在崧泽时期，这种分化已初显端倪，但是还不是很明显，然而到了良渚时期，社会等级分化非常鲜明，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酋邦。

(2)综合观察。美国学者奥谢(J. M. O'Shea)等建立了一种利用4种考古学变量来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和等级差异的标准，下面用表2予以表述^①。本文借鉴表2中的4个因素来对马家浜、崧泽和良渚的社会形态进行综合分析。平均值1是部落社会，平均值2是简单酋邦社会，平均值3和4是复杂酋邦社会(表3)。从表3的分析来看，环太湖地区在马家浜时期是平等的部落社会，崧泽时期进入简单酋邦社会，到良渚时期进入了复杂化程度相当高的复杂酋邦社会。

表2 四个标准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表

变量名称	级 别			
	1	2	3	4
世袭的促成作用	没有	一些	大多数	所有
墓葬的精致程度	没有	少量	主要	特殊的建筑
等级墓葬的空间分布	自由	均匀	分组	单独墓地
象征品的地区性分布	本地/独有	均匀/非等级	本地性等级/地区性均一	地区范围等级

表3 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层次

变量名称	案 例		
	马家浜文化	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
世袭的促成作用	1	2	3
墓葬的精致程度	1	1	3.5

^① O'Shea, J. M. and Barker, A. W., Measuring social complexity and variation: a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n Arnold J. E. (ed.), *Emergent Complexity—The Evolution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1996, 13—24.

续表

变量名称	案 例		
	马家浜文化	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
等级墓葬的空间分布	1	2	3.5
象征品的地区性分布	1	2.5	4
中间值	1	2	3.5
常规分类	部落	简单酋邦	复杂酋邦

根据上述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环太湖地区从崧泽文化中晚期开始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开始，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高峰。

2. 宁绍平原

宁绍平原情况则和环太湖平原存在显著区别。整个河姆渡文化时期，聚落规模不大、数量较少，遗址内和遗址之间不存在着等级区别，遗址内也不见功能分区。墓葬均埋葬在地面上，规模较小也没有土台，随葬品极少且主要是日用陶器，不见玉质礼器等奢侈品。不见仪式性场所和建筑，零星的仪式性器物发现于生活区内。居住形态主要是一种杆栏式的聚族而居的“大房子”。这种社会复杂化的物化形态反映的是一种小型、分散的平等社会。

到了相当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时期，虽然遗址的数量比前期有较大的增长，但是从整个地域分布来看，仍然显得十分稀疏，不见大型和集中的聚落群。遗址规模变化也不大，遗址间等级分化与遗址内功能分区也不明显。个别墓葬出现了土墩，但是规模不大，由于土墩上部已遭破坏，因此葬俗还不是太清楚。这一时期也不见有发现祭祀性建筑和奢侈品。这一时期变化最明显的可能是房屋结构，早期的“长房子”已不见，出现了许多一种小型的地面建筑。从名山后遗址发现的土墩及可能存在的随葬有成组石钺的墓葬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已有了一定的等级分化，但是整个社群的规模并不大，从奢侈品的数量和质量分析，等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可能还只是相当于等级制部落或简单酋邦社会。

3. 复杂化动因探讨

史前社会复杂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应对生存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种压力来自于人类人口的增加或环境波动所造成的人口与资源的失衡所带

来的生存危机。复杂社会比简单平等社会能更好地组织人力与物力，强化经济生产，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和区域内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与协调，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共同的生存压力和资源短缺。而环太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地不同的文化特点和社会演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暗示，两地不同的生态背景决定了社会复杂化的不同进程。

环太湖地区的崧泽中晚期与良渚文早期，缓慢增加的遗址数量表明人口的逐渐增长的。这种人口增长可能会对粮食供应生产一定压力。这一时期野生资源发生了显著的递减，大型哺乳动物急剧减少甚至几近灭绝。其原因大致为两种：其一，这一时期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波动，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原先喜暖湿的大型的哺乳类如鹿和水牛等可能为此而南移；其二，由于人口的增长和长期过度捕猎，使这些大型哺乳类数量急剧减少，这样社会就会出现生存压力和粮食危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社会一般有几种措施可供选择，如向外移民、控制人口和扩大粮食生产。

从民族学的资料看，狩猎采集群控制人口的策略通常有以下几种：杀婴、杀老、杀病、延长哺乳期、流产、节欲等^①。但是采取这些策略，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规则和习俗，而改变社会规则和习俗既非常困难也是十分缓慢的，它不可能用来应付短期和持续强化的危机。人类在面对粮食危机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外迁徙。但是，这种在狩猎采集群中最普通的应付资源波动的办法，到了农业社会可能就很难奏效。因为，大部分的土地已经被不同的农业群体所占领，土地所有权出现并得到强化。所以在移民无法应对人口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化粮食生产。从考古记录来看，从崧泽中晚期开始，人类正是采用了这种策略来应对人口压力的。

马家浜时期这一地区已经开始栽培水稻等作物，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崧泽中、晚期，这种栽培技术应该变得相对较为成熟，在技术上为以后强化稻作栽培提供了可能。加上崧泽中、晚期气候渐趋干凉，使原来的亚热

① a, Hayden, B., Population control among hunters/gathers. *World Archaeology*, 1972(4): 205—221.

b, Sengel, R. A., On mechanisms of population growth during the Neolithic.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3, 14(5): 540—542.

带与温带的气候特征趋于单一，导致原来资源比较丰富的环太湖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可用食物资源种类也逐渐减少。

除了环境因素外，随着这一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开始，形成中的贵族需要花费的剩余产品也逐渐增加，野生资源已经无法满足等级社会运转的需求。人们必须进行强化稻作生产来应付资源短缺的压力。这在考古学上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种类、数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石犁、耘田器、石镰等专用和高效农具出现，稻子形态趋于稳定并颗粒变大。这表明人类在水稻的选种、土地的耕作以及其他管理方面介入力度空前提高，水稻产量增加。成熟的稻作农业应该在这一阶段出现，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的转变反过来又加速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农业经济对社会复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1)土地需要集体社会协作开垦、管理和分配。

(2)土地属于整个社群所有，但是小块耕地的耕种与利用可能属家庭所有，由于土地存在着肥瘠的不同，利用这些土地和对收获多寡的分配需要社会的调节。

(3)农业使食物种类趋于单一化，人类缓解食物短缺风险的能力减弱，遭受饥馑的可能性增加，应付这种压力而出现的食物贮藏，除了其调节功能外，还能发挥金融作用而在复杂社会的运转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此外，贮藏所带来再分配，也成为社会复杂化的重要机制之一。

(4)农业生产导致了私有财产观念的出现，一些家庭可以比别的家庭积累更多的财富。他们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来获取特殊的回报，并将它们作为地位和权力表现。于是，私有财产促成了地位和权力的形成。

(5)农业导致了生产专门化的发展，并刺激交换和贸易的产生，而奢侈品的生产成为强化首领权力、促成社会等级分化的重要一环。

(6)农业经济的成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人口密度会进一步增加。这反过来会进一步造成生存压力，使土地和资源的价值提高。这种对资源和土地的竞争，会促进社会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合作，促使社会结构从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转变。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会形成社会内部管理上的压力，使得社会结构必须发展出更为复杂的体制来解决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促成社会机制的复杂化和权力的强化。这种政治结构复杂化往往表现在官僚体制的出现，内部功能的异化和特化，权力和管辖功能的细化，等等。

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的演化，表现在人口增长与气候波动共同作用下粮食短缺的压力，为缓解压力，人们充分利用稻作栽培技术，强化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刺激了私有财产的出现、社群的劳力协作和等级分化的现象，使得这一地区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在宁绍地区，整个河姆渡文化时期一直处于平等社会状态，只有到了相当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时期，在局部地区才出现了等级制的部落或层次较低的简单酋邦。这种复杂社会的出现，可能并不是本区域人地关系互动所产生的结果，而更多是受了北部先进文化影响刺激所致。这有点类似于国家形成机制中原生国家与次生国家的关系。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受原生国家的影响和刺激，其周边的落后社会会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向国家演进，因此这些次生国家的形成要晚于原生国家。造成两地社会发展不同轨迹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种：

(1) 宁绍平原被许多河流和山脉分割，形成一种相对破碎、封闭和孤立的小环境，生态和资源多样而复杂，其间山林、盆地，河网密布。在这种生态广度较大的环境中，既有大量的山林、陆地资源，也有丰富的水生资源。其野生资源的种类与丰富程度要比生态环境较为单一的环太湖地区要高。此外，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由于与外界交流不多，人口增长缓慢。虽然在相当于良渚时期时本区域遗址数量有所增长，但从总体的密度上看变化并不明显。这就使这一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口和资源能够保持相对的平衡，因此缺乏社会结构复杂化的外界和内部动力。

(2) 宁绍平原与环太湖平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河姆渡文化时期不很明显，且它对环太湖地区的影响似乎更大。但是到了良渚时期，随着良渚强势文化的整体性扩张，大量环太湖地区的文明因素才传入宁绍地区，这些文化因素的传入，部分可能是文化传播，部分也可能是环太湖地区来的移民所创造^{①②}。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稳定性，这些外来群体在到达宁绍平原后，除了带来了相应的器物外，应该还沿袭了原来的社会结

① 蒋乐平：《塔山下层墓地与塔山文化》，《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

② Rothman, M. S.,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y: Mesopotamia in the late fifth and fourth millennia B. C.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4, 12(3): 75—119.

构。但是由于外来群体规模较小，在适应上更多的是采取入乡随俗的策略，不可能对该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发挥重要的影响。

四、小 结

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是国际学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目前也是我国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发展层次广受学界的注目，然而对其演进动力的探讨仍然不多。而对环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两地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差异和原因更是无人关注。对造就社会复杂化原因的探讨，必须关注包括生态环境和人地关系在内的各种因素的整体分析，探究各地社会复杂化不同的动力机制。本文初步对两地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差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不同进程，是由于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不同人口压力所造成。环太湖地区自马家浜文化以来人口缓慢增加，食物资源压力逐步加大，崧泽早中期环境的波动导致的大型哺乳动物消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压力。于是强化农业生产成为应对这种压力的重要策略，强化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社会劳力的合作，于是这种协作促进了区域社会结构的重组。而强化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剩余产品刺激了再分配机制的完善和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了社会等级的分化和贵族权力的产生。农业经济的成熟反过来进一步造成人口增长，使整个社会规模进一步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反馈和互动下，使环太湖地区的史前社会在良渚文化中晚期达到了复杂化的高峰。

宁绍平原由于相对独立、分散而封闭的环境和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使这里的文化交流不畅，人口增长缓慢，人地关系的平衡一直较为稳定。由于缺乏刺激，该地区的社会结构一直变化不大，表现为小型的平等社会。只是到了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时，受环太湖地区强势文化的刺激和影响，才出现了社会初步复杂化的迹象，时间上要比环太湖地区复杂社会的出现晚得多。

（与郑建明合作，原刊《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

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

一、前言

在中国早期国家探源中，夏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自从商代的史实因殷墟发掘而被确立为信史之后，论证夏的真实性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早在 20 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①。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为两片可能的区域^②。并亲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遗存后，进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建议。1959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对二里头进行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晚期到早商的三层文化堆积^③。

之后，有不少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提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的见解。比如，佟柱臣以《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圈定夏的地理位置，将《竹书纪年·夏纪》“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来对应二里头遗址的两个¹⁴C 年龄，从时空上锁定二里头应该就是夏代的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② 徐旭生：《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 年第 11 期。

③ 中国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

都邑，然后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宫殿遗迹、青铜器、墓葬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特征来讨论^①。尽管存在争议，但是在一些权威学者的坚持下，不同声音渐渐变小。比如，邹衡就力排众议，赞同“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②。这种学术界的共识，使得疑古辨伪成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古代传说和记载又被不加检视地应用，有人乐观地声称，对于疑古派极力否定的夏朝，经过数十年历史学家们的艰苦工作，目前史学界中明确否定的人已经很少了^③。

1995年以后，受到埃及、两河流域考古纪年成就的激励，国务院决定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合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应用较先进的断代技术，将包括夏在内的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结项验收，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其总目标是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该项目的成果发表后在国内受到一致好评，但是在国际上却遭遇尖锐批评，凸显了中外学术界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显著差异。

“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确信夏的存在，而且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坚持这一论断的学者以四条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1)豫西和晋南是周代文献中提到的夏人活动区域，其中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2)二里头发现了宫殿遗迹，表明国家的存在；(3)¹⁴C测年结果证明二里头在夏的纪年内；(4)既然司马迁所记载的商朝被证明为信史，那么夏的存在也应该是可信的^④。但是在持不同意见的中外学者看来，这些理由显然是不够令人信服的，这项研究不应该预设夏的存在，而应该证明它存在。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代，而时间上离夏最近的商代甲骨中也未见有关夏的只言片语，因此，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这个问题不能预设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从考古学上来进行独立的探究。但是目前考古学者并没有充分消化考古材料，利用所含的信息潜力来破解这个问

① 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

②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社会科学报》2003年11月27日。

题，而仅仅局限于比较出土文物的异同来界定夏文化的内涵，并坚信不疑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

在夏文化研究和断代工程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中，令人担忧的不只是观点的异同，而是这项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规范。比如，论证夏的存在明显与确立华夏 5 000 年文明史、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又被列为“凝聚力工程”，这种带有预设倾向的研究，很难保证科学家在做判断时的中立性。曾有国外学者指出：进行考古研究总有政治的存在，总有政治的共鸣。解释过去总是现在的一种政治行为，如果科学的中立性得不到保证，那么我们对过去的解释绝非是从真实世界中获得的冷静的客观判断，而总会与今天的政治和道德判断混在一起^①。正是受这种价值观影响，使得本属正常的学术讨论夹杂了反常的情绪。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言论严加痛斥。有的学者则采取抵制心态，“至于说个别外国学者认为夏文化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也只好由她去，是无碍于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的，我们用不着因为她来确定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②。这种态度和言论显然不是正常科学讨论所应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研究是世界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能为世界社会科学做贡献的最有潜力的一个领域。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学者，对中国的学术成就应当会深表激赏并深受鼓舞。但另一方面，就像奥运会零的突破一样，我们的成就若要获得世界的公认，也必须通晓和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由于对国际同类研究现状所知甚少，国内学者的视野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陈旧，论证程序存在不少问题，这好比用国内自己认定的过时标准来申报世界纪录，自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刘莉曾对二里头与夏的争论做过一番有关学术自由方面的讨论，认为中西学者的分歧主要是传统的而非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原因^③。本文想对二里

① 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② 田昌五：《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殷都学刊》1999年第4期。

③ Liu, Li, Academic freedom,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debate on Xia-Erlitou relations. *Antiquity*, 2009, 83: 831—843.

头和夏文化的研究做一番回顾，然后从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对目前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一番审视，以期对我们优化这项研究有所助益。

二、回 顾

下面我们从7个方面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做一番回顾，然后参照国际学术范例和研究现状对中外学者为何会在这项研究中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进行剖析和讨论。

1. 田野发掘

自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并由考古所进行试掘之后，洛阳队从1960年至1964年又在二里头遗址进行了8次发掘，在陶器中发现早、中、晚三期不同的器物特点，并提出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的相对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之间^①。

1974年，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一号宫殿遗址^②。1977年，在一号宫殿遗址东北150米处发现二号宫殿遗址。根据夯土层和所含陶片判断，二号宫殿始建于二里头三期，废弃于二里头四期偏晚或者二里岗下层偏早，其下是一、二期地层。此外宫殿北部有一座同时期大型墓葬^③。此次发掘确定了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分层。

1980年，配合基建工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第3轮发掘。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类型辨认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的文化特征^④，并发现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是同时的，且直接发展成为二里岗上层^⑤。整个80年代，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对二里头进行了数度发掘，发现不同时期的房基、器物、

① 中国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74年第4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墓葬和灰坑^①。

一直到 20 世纪末，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用习见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来进行的，因此分层、分期和用陶器类型来辨认文化特征成为田野工作的重心。发掘选点似乎没有问题导向，缺乏验证不同设想以及从聚落布局来观察社会等级结构这样的分析思路。二里头遗址发掘也未曾发表过一张比较完整的遗址布局图，这样的操作要让国内外学者了解遗址的规模、重要性及其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认可其“夏墟”的都邑地位显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从 1999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才开始将聚落形态问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进行了四年的踏勘、钻探和重点发掘，对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环境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并由此深入探索二里头遗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遗址在聚落网络中的地位，及其所在聚落群的社会结构^②。

2. 文化分期

迄今为止，有关二里头和夏文化的讨论基本上都立足于上述的一系列信息量非常有限的发掘简报，而分期则被认为是年代学最为关键的工作之一。根据许多遗址的地层学观察，如在新密市新砦遗址、洛阳东干沟遗址、临如煤山遗址，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而在偃师二里头、巩县(今巩义市)稍柴、郑州洛达庙等遗址都可见到二里头文化上叠压着二里岗文化。因此，二里头文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根据出土陶器类型有人曾把二里头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1974 年，二里头考古队根据宫殿遗址的发掘资料，提出了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划分方案。

1979 和 1999 年对密县新砦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发掘者声称分辨出一种介于二里头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文化层，称为“新砦期”，并将其细分为两期。新砦一期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二期似乎是龙山文化和二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2 年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1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 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 年第 4 期。

②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见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头文化的过渡阶段。于是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新砦二期”应被归入二里头文化，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或者“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新砦型”^①。

郑光根据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的材料提出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应该有一个第五期，或被称为“二里岗下层期”^②。但是二里岗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还是有较大差别，现在较为普遍、为人公认的分期还是二里头文化四期说。

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来对史前遗址进行分期是一种必要的手工作，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主观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建立在器物类型的异同之上。分期固然可以观察文化的细微变化，但是追溯国家起源的社会演变轨迹，分期的作用显然十分有限。比如，即便我们确认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界，但无法认定这就是夏朝的开始。

3. 文化内涵

由于目前普遍接受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于是二里头类型遗址的出土遗存就被作为夏文化的特征来描述。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来于陶器，二里头出土了一批有特色的陶器，包括圆腹罐、豆、盃、斜腹盆、爵、平底盆、小口瓮、瓦足皿、觚等。虽然有些器物在早期和晚期存在形制上的差异，但是这些器型不见或者少见于其他考古学文化，因此被视为鉴别夏文化的特征器物^③。

邹衡曾归纳了3条夏文化的鉴定特征：(1)陶器多为圜底；(2)二里头出土一件陶方鼎具有铜器特征，意味着夏文化早期已经开始铸造铜器；(3)礼器主要有觚、爵、盃等^④。

有人则从墓葬来讨论夏文化特征，二里头一期为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墓，二、三期数量增加。大、中型长方形竖穴墓在二、三期出现，规模很大，有的还出现二层台，随葬品丰富。四期墓葬沿袭前制，但数量和规模稍稍逊色。

① 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② 郑光：《试论二里头商代早期文化》，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刘绪：《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文物》1986年第6期。

④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一期墓葬有较多的河南、山西龙山文化色彩，四期墓葬则与二里岗下层比较相像，二、三期墓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体现了二里头文化发展的鼎盛期^①。

总体来说，夏文化主要是依靠一批典型器物作为分辨标准的。即作为炊器的鼎、侈口圆腹罐，作为食器的深腹盆、三足盆、平底盆、豆、小口高领罐、瓮等，作为酒器的觚、爵、盃等^②。

在1977年11月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给夏文化下了一个定义，即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应当指出，以器物定义的考古学文化不一定能对应一个民族群体，而一个王朝或一个国家也可能融合了不同的民族群体。由于民族身份很难从考古学上来分辨，于是直观的器物类型便成为分辨夏文化的主要标准。根据目前的论证方式，我国学者大致是这样来进行推理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夏国的疆域。以后我们会讨论，这样的推论存在很大的问题。

4. 文化属性

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全省、山西省西南部、陕西省东部和河北省南部均有发现。现根据资料可以分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西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冀南豫北地区的豫东类型、豫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其中以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最多，而二里头遗址又是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因此二里头遗址被当作这类文化的代表。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体系确定以后，学术界就开始对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夏的关系展开讨论。虽然二里头文化被认为就是夏文化，但是二里头遗址四期的文化是否都可以归入夏文化仍有不同看法。1977年，夏鼐总结了当时争论中的四种观点：（1）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全部四期是夏文化遗存；（2）河南龙山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遗存为夏文化遗存；（3）二里头一二期遗存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4）二里头一至四期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不是^③。

① 郑若葵：《论二里头文化类型墓葬》，《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② 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1998年第4期。

③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20世纪80年代¹⁴C技术开始普遍应用于我国的考古断代。通过原有历史文献记载中推测的夏代年限和对二里头各期遗存中样本的¹⁴C测定相对照,发现二里头文化各期均在夏代范畴之内。学术界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根据《史记》《竹书纪年》《汉书》《尚书》以及“利簋”铭文等文献推算出武王灭商在公元前1075年;再根据《史记·殷本纪》《初学记》《竹书纪年》得知商代积年,根据《易纬》《竹书纪年》《路史·后纪》推出夏代积年;最后推出夏代上限为2061B.C.左右,下限在1554B.C.左右。而¹⁴C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在2000~1600B.C.(杨育彬文中提出的夏代纪年为2070~1600B.C.,二里头¹⁴C年代2000~1600B.C.;庄春波所记夏代年代为2061~1554B.C.,二里头¹⁴C测定的年代范围,上下限分别为1800~1730B.C.,1560~1521B.C.;《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所用数据为1950~1625B.C.,还有1900~1560B.C.的说法,这里用的是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为主要依据,并整合其他意见后的数据),说明二里头遗址的年代都卡在夏代范围之内^①。

5. 夏文化溯源

二里头文化被确定为夏文化之后,学术界开始追溯夏文化的初始。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显示,夏代的始年为2070B.C.,如果我们选择1900B.C.的数据为二里头一期的上限,期间还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意味着夏代的始年要比二里头一期还早。

20世纪80年代对登封告成王城岗的发掘引起了人们对于夏文化渊源的关注,该遗址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筑城址,不但有城墙,内部还有十余座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还有使用青铜容器的证据^②。其地理位置与文献中夏禹的都城十分接近,出土器物又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相像,建筑规模也很宏大^③。此外,¹⁴C测年显示其时代在2190~1965B.C.,和夏代纪年重合^④。当时就有人推测这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应是文献中提及的“禹都阳

① 庄春波:《二里头文化与夏纪年》,《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3期。

③ 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考古》1983年第3期。

④ 方燕明:《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城”。有学者比较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点、各类器物的器型、建筑形式、葬俗等，提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新砦期就是两者的过渡^①。否定了20世纪70年代末老一辈考古学家所认为的“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器物特征上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并不是一种文化”的论断^②。

许多学者认为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是相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中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包括河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巩义稍柴等遗址)才是早期夏文化。

但是近年又有学者重提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而是吸收了王湾三期文化及周边地区不同文化形成的新的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分属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依据是二里头一期遗存中与王湾三期文化相近的器物群与其还是有较大差别，而王湾三期中带有二里头特征的群体数量比例上亦小于二里头一期^③。因此，二里头一期才是夏文化的初始。

6. 夏、商分界

与夏文化的初始同样受到关注的是夏、商的分界。二里头文化四期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即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是夏、商的分界点；另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是相互继承关联的，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才是夏、商分界。

根据类型学分析，学者们发现二里头早期(一、二期)和晚期(三、四期)器物类型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还是属于同一体系。而二里岗下层的一些器物如深腹罐、圜底盆、鬲、大口尊等和二里头四期同类器物在形制上没太大差别，但是其他很多器物却有较大差别，而且器物组合有很大差异，二里头晚期的平底盆、瓦足皿、缸、甗、觚、盃在二里岗下层几乎不见，二里头晚期常见的爵、簋、小口瓮、罐等在二里岗下层文化中少见，而二里岗下层出

① 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② a, 邹衡：《关于夏文化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b, 吴汝祚：《关于夏文化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

③ 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现的鬲、斝在二里头晚期鲜见^①。

赵芝荃认为二里岗文化是由二里头文化直接发展而成的，理由是：（1）几处较大的二里头遗址上直接叠压着二里岗文化遗存；（2）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陶器的种类基本相同；（3）两者房屋和墓葬形式相近；（4）一些铜器如戈、爵相似^②。程平山等人认为二里岗文化虽然包含大量二里头文化因素，但是有的器物形制差异很大，种类也有差异，最重要的是二里岗的典型器物在二里头少见或者形制不同。此外，二里岗在豫西以外的其他地方呈现不同的风格。因此二里岗文化是由于地域上与二里头文化的局部重叠，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一些因素，加上其他地方因素混合，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③。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学者们一般赞同夏、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之间。

有的学者从城址入手寻找夏、商的分界，文献上记载夏桀是被商汤消灭的，因此只要找到夏桀或者商汤的王都就可以确定夏、商之交的位置。由于夏都暂时难以确定，因此商都的确认备受重视。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令人瞩目，这座商城虽然规模远不及郑州商城，但是是早商城址之一，可望提供一个区分夏、商分界的标尺^④。最近有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就是夏、商分界的确切标志，因为该城年代上距离二里头文化最近，空间位置也只和二里头遗址相距6千米，商文化与夏文化并列发展，逐渐扩张，最后吞并处于晚期的夏文化的可能性非常大^⑤。

也有学者以《尚书》《国语》《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提到的“桀奔南巢”“夏桀无道……避居北野”等为线索，以江淮地区薛家岗、寿县斗鸡台，北面的夏家店等遗址中出现的零星二里头特色器物为依据，认为江淮和晋、冀、内蒙古等地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时候应该就是夏、商分界^⑥。

① 刘绪：《从墓葬陶器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文物》1986年第6期。

② 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③ 程平山：《二里岗文化渊源刍议》，《华夏考古》2001年第4期。

④ 李伯谦：《二里头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⑤ 杨育彬：《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夏商考古文化研究》，《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⑥ 杜金鹏：《夏商文化断代新探》，《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像追溯夏的渊源一样，夏、商分界的辨认主要还是采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定势思维。其实，国家和朝代的出现和更替与日用陶器的变迁没有必然的关系。不予检视，完全用文献来印证考古发现也非良策，首先夏桀逃亡事件的真实性有疑，而且突发政治事件和日用陶器的传播似乎根本搭不上界，将两者拉到一起作为判断夏、商的分界是经不起推敲的。

7. 城址研究

二里头遗址发现后，一部分学者将其定为早商城址，并引发“西亳说”和“郑亳说”之争。认为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早商的学者认为三期的宫殿基址是商汤西亳，坚持二里头四期都是夏文化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是郑亳，郑州商城是汤都西亳^①。

随着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变化。西亳说进而分为三派，而郑亳说对于夏代都城的问题也有分化。有的主张二里头三期两座宫殿基址是太康都邑“斟寻”，有的认为三期应属少康时代，有的把二里头一期推为少康时代，三期晚是夏桀时代。另有人并不细分夏王年代和二里头文化分期之间关系，笼统把二里头遗址看作夏邑“斟寻”^②。

一些讨论还涉及二里头遗址是文献中记载的哪个夏代城址，文献中夏代诸王的居邑和都邑有：禹居冀、阳城、平阳等地；启即位于夏邑；太康居斟寻；相居商丘；后羿居斟寻；少康归夏邑、迁于原；杼迁老丘；胤甲居西河；桀复居斟寻。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一期堆积层薄，物质文化不丰富，可能只是一般居住点。二期时间虽短，但是堆积较厚，可能是人口增加。三期出现宫殿和厚坟墓，之后宫殿废弃，表明有迁都事件发生。四期年代很短，宫殿重新使用，可能恢复了都邑的地位。因此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少康之都“夏邑”，并解释“斟寻”就是少康复国后所回的“夏邑”。尸乡城遗址是汤都“西亳”，由于文献显示西亳并非始建，而是在夏桀的都邑上改建的，因此这座城址可能是后羿始建的另一座“斟寻”^③。

① 赵芝荃：《二里头考古队探索夏文化的回顾与展望》，《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3期。

② 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③ 庄春波：《二里头文化与夏纪年》，《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赵芝荃只是认为二里头是夏代晚期的都邑，偃师商城则是商汤“始屋夏社”在夏朝统治中心建立的新都，没有明确指明二里头遗址到底为夏代哪一个都城^①。

目前的有关二里头城址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将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对应。在文献可信度存疑的前提下，任何讨论和结论都难以被看作是历史的事实。

三、讨论

接下来我们想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范式、文献应用等5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为何会引起中外学者如此激烈聚讼的原因。

1. 认知方法

中国早期国家探源研究虽然是一项科学研究，但是由于主要参与的学者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因此从研究方法而言仍然是本国史学传统的延续。因此，中西学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其说是观点的不同，不如说是认知方法的差异。考古学家张光直说过，中国传统史学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其主要方法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以史料和史料考证为主的历史观在20世纪30和40年代曾受到过批判，但仍然一直占据着主导或至少是优势的地位^②。我们可以从对二里头和夏的研究中，处处感受到这种主观判断的强烈倾向。

但是西方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则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并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这种在西欧发展起来的科学认知方法对人类具有普遍的卓越价值，其要义或精髓就是鼓励研究者怀疑自己的前提，并系统地将自己的结论让怀疑者进行带有敌意的审视^③。因此，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科学的基本特点，而且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正是这种认知方法的不同，导致中西学者在对待一些结论和看法时会出现大相径庭的态度。比如，对夏代的真实性或二里头就是夏这一结论的质疑，我国学者在无法提出更多的证据来说服别人时，往往就用学界的共识来捍卫

① 赵芝荃：《论二里头文化为夏代晚期都邑》，《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② 张光直：《序言》，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Harris, M.,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自己的立场。殊不知，“个别科学家的主观信念，或科学家集团的共识，并不能赋予科学知识以真理性。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并不来自人们的信仰或约定，而是来自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①。

就正常的科学程序而言，任何研究是从“问题”开始，而“怀疑”则是从事科学探索的第一把钥匙。因此，“疑”和“思”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②。在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中，研究的问题完全按照史籍来展开，学者们无论对待文献还是自己的判断都缺少起码的怀疑精神。对别人提出的疑问，往往以情绪化的态度来抵制，这显然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如果自己讨论的前提和结论不容别人怀疑，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2. 考古学范式

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在二里头和夏文化的研究中，采用的是文化历史学的考古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柴尔德所倡导，并被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所采纳。这一范式的操作方法是类型学将含有相同或相似器物的组合合并到一起，建立一种与民族学中“文化”概念类似的分析单位。柴尔德一度认为，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只有当人们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才有可能，那些拥有相同考古学文化的人应当具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意识、并在社会和政治上彼此认同。

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一范式已经受到了包括柴尔德本人在内的广泛质疑。考古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考古学文化并不以机械的方式与部落或民族这样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不一定与社会或政治结构相一致。柴尔德正确地指出，完全用类型学而不用社会学因素定义考古学文化，有着把同一群体不同方面划分为不同文化的危险。同样，拥有相同的物质文化并不能证明这个文化的成员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正如物质文化的不同不能说明没有认同意识一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可能有不同的渊源，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样的社群看作是民族学上截然不同的集团。因此，考古学家认识到，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相对封闭的、较为定居的史前社群。由于在复杂社会中，

① 张巨青：《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方法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林定夷：《科学研究方法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会形成文化的多元性，考古学文化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成为不适当的衡量手段^①。

正是认识到这一范式的缺陷，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类型学方法开始式微，文化的功能观、以聚落形态为基础的社会考古学开始兴起，考古学范式也开始从以文化编年为目的的研究，扩展到关注影响文化演变动因的探索。由于缺乏交流，中国考古学界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考古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变革十分隔膜，在研究中仍然采用西方20和30年代的方法。因此，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中，国外学者指出中国考古方法落后，基本上与美国30年代的方法相仿^②，并非是刻意的贬低。

在早期国家的探索中，我国学者还未充分意识到考古学研究三个难度级别的问题，这就是研究生存方式比较容易，研究社会结构比较难，研究意识形态最为困难^③。目在我国学者在对早期国家的问题上，采用的仍是擅长分期和观察生存方式层面的器物类型学方法，上升到社会结构层面，考古学家必须调整视野，采用不同的观察和分析方法。由于方法过于陈旧，因此在试图要解决较高难度层面上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具体分析就显得不得要领。

由此可见，上面提及的我国学者的推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夏国的疆域为何难以得到国外学者的认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3. 文献的应用

从前面的回顾中，我们看到在夏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多以缺乏批评的态度，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对应。不可否认，文献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比物质遗存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可以直接提供历史信息，不必像考古分析只能用间接方法来推断。但是，不加审视地利用文献也会招来批评。

且不论文献中夏代的真实性如何，我们目前单凭史籍中的记载就确认夏就是第一个国家是有问题的，因为古人或司马迁那个时代所谓的国家和我们

① 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刘星：《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

③ Hawkes, C. F.,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4, 56: 155-168.

探索的早期国家在科学定义上是否一致是有问题的。国际上的同类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历史文献中的早期国家概念，中外学者显然不同。

一个例子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国家。成书于公元 1155 年前后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及国王出现在公元 500 年左右，这很容易使历史学家将其作为国家出现的依据。但是经考古学独立研究认定，一个真正的国家要到公元 780 年左右默西亚(Mercia)的奥法国王(King Offa)或公元 871 年韦塞克斯的艾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时期才形成。十分明显的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所谓“国家”实际上是现代科学概念的“酋邦”^①。

另一个例子是埃及。从文献证据而言，古埃及的国家形成一般认为从上埃及和下埃及政治统一的 0 王朝开始。但是考古学的独立观察认为，当纳尔迈在征服了三角洲地区之后，其统治方式仍然是南方酋邦的延伸，标志一个国家的特征一直要到第 2 王朝才真正出现^②。

根据一种说法，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的《书经》(即《尚书》)，据说是周公的言论。一项对这些言论的解读认为，夏是西周初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目的是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此外，商代甲骨文中不见任何有关夏的记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③。另一流行说法认为，夏在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在晋武帝时汲县古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历史学者认为它是魏国的史书，成书于战国中叶^④。即使以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 299 年)为成书的下限，离夏代也有 1 000 多年的历史。即使夏代的真实性可信，那么如何看待和采用这时隔 1 000 余年的记载，显然是今天学者做研究时必须严谨面对的问题。

① Renfrew, L. and Bahn, P.,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Ltd., 2012.

② Savage, S. H., Some recent trends in the archaeology of predynastic Egypt.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1, (9)2: 101—155.

③ Bagley, R. W., Changjiang bronze and Shang archae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 1991, Antiquities, Part 1*.

④ 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见《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英国学者伦福儒和巴恩指出，文字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未知社会有极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应当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历史记录的最大危险在于它们会将其自身的观点影响我们，以至于它们不但为我们的问题提供答案，而且无意中限定了这些问题的性质、甚至我们的概念和术语^①。

美国学者贝克利也指出，文字记载的历史对于考古学有着双重的危险。它不但会左右考古学采样以求与传统保持一致，告诉考古学家往哪里看，而且还会告诉我们该看些什么^②。

在没有对文献可信度做详细论证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将其作为确凿依据来推算夏的起讫年代并和¹⁴C断代相印证，而且推算出各位夏王在位的年表，或据此将考古发现的城址与各夏王都邑相对应，其结论备受质疑并不令人奇怪。

4. 论证程序

在用考古材料论证早期国家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普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比如，一看到大型的建筑基址就说是宫殿，然后就由此推导出一个王甚至一个国家的存在；一见夯土围墙就是城址和都邑，并力求和文献上的某项记载相对应；一见厚坟墓就是阶级社会的标志，发现陪葬或非正常死亡的骨架则被看作是人牲或人殉，是进入奴隶社会的证据；青铜器和玉器就是礼制和王权形成的证据；文字的出现就证明文明的产生。关于国家或王权的讨论都缺乏对主要概念的定义，一旦要寻找理论依据时，就全盘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摩尔根的语录，怎样从考古资料中辨认国家社会形态几乎从不予以讨论。

其实，在社会文化现象和它们产生的原因之间存在种种不同的可能性，绝对不可能是那种单一、刻板和机械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通晓世界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就可能发现太多的例外。这是由于我国学者习惯于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很少考虑人类文化和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见某种现象就将其看作是某种历史事件的证据。

美国学者索普对二里头遗址一些现象的推理提出不少异议。比如，一看

^① Renfrew, I. and Bahn, P.,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Ltd., 2012.

^② Bagley, R. W., *Changjiang bronze and Shang archae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 1991, Antiquities, Part 1.*

到大型的夯土基址就判断为“宫殿”是不妥的，他认为只有掌握了遗址中人类活动的充分证据时，才可以判断这些建筑的功能。这样的建筑，不妨称作宫殿式庙宇，可能具有多功能用途。因为参考中国传统的宫殿形式，二里头的宫殿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无法容纳觐见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对于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种类似宗庙的建筑。

对于中国学者根据大、中、小三种墓葬的等级来推导社会结构的做法，索普也认为缺乏依据。二里头遗址大型厚坟墓只是少数，只有在大范围内发现更多大型墓葬时才可以证明其王室贵族的属性。何况二里头的富墓在规模和随葬品质量上远不及陶寺或良渚的大墓。

在物质遗存上，索普对中国学者把青铜器、玉器等当作王权的象征，进而作为国家的标志持批评态度，认为铜器只是王室的特权实在夸张过头。他反问，如果把这类器物看作是社会复杂结构的标志，那么早期国家是否就只能到青铜文化中去寻找了？^①

对此，我们有必要聆听英国科学哲学家贝弗里奇的告诫：“传统的科学方法、常识和直觉思维对于处理复杂问题通常是完全不合适的。在这里用 a 造成 b，然后 b 再造成 c，而不考虑其他影响的直觉思维已经不行了，而且可能会误入歧途。”^②

5. 通则与个案

目前中国的早期国家研究仍然围绕编史学的问题展开，缺乏国际上通行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于是，学者们满足于确定中国第一个国家出现的地点、时间和特征，并不考虑它形成的原因。张光直对此曾深表困惑：“为什么近十年来的学者对‘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动力？”^③因此从研究层次上，中国的早期国家研究还只限于个案的范畴，无法为社会科学通则性的探索提供具有普遍价值的成果。

① Thorp, R. L., Erlitou and the search for the Xia. *Early China*, 1991, 16: 1-38.

② 贝弗里奇：《发现的种子》，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③ 张光直：《序》，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涉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必然要依赖理论的指导，但是中国考古学强烈的编史倾向，使得理论在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理论的欠缺又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设计和材料的阐释，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探讨，学者就只能从史籍中来提出问题，凭自己的经验和推测来下结论。由直观获得的经验判断无论在观察深度还是在解释的可信度上都十分有限，难免出现众说纷纭和饱受质疑的现象。

其实，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可以提高研究层次和分析水平，加深我们对早期国家产生的原因、性质和特点的了解，并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深入到国家形成的机理和深层动因。

在西方的科学价值评判来看，通则性的规律探索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核心和精髓，因为它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具有世界意义。我国学者拘泥于史料的个案研究与西方强调普遍意义的通则研究相去甚远，这种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中外学者对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的歧见。

四、小 结

在二里头文化与夏之间关系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中国学者和少数西方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的代表或物化形式，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没有文字证据，无法肯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的代表，无法根据二里头的物质文化就能确认史籍中夏王朝的地位。本文对这种学术分歧做了深入的分析，其原因可以归咎于中西认知方法、科学范式、论证过程和学术视野之间的明显差异。由于能用考古发现来印证文献记载是中国编史学最有成就感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学者为何执着于将二里头文化对应夏的历史情结。刘莉也指出中西学界之间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差异导致的歧见，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学者倾向于将考古类型学定义的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文献记载的族属或政体，没有认识到两者是不同的分析概念和需要用不同方法论证的问题。她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及其社会复杂化进程与公元前 2100 年前后夏王朝兴起的文献记载并不吻合^①。根据聚落形态、城市化、手工业专门化和社会分层的最新研究，刘莉和陈星灿认为，国家政体形成于二里头二期，他们倾向于用二里头

^① Liu, Li,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国家而非夏来指称这个早于商的早期国家^①。为此，文献与考古材料是不同的证据，最好分别根据各自的概念和方法进行研究。在对二里头和夏的争论进行再思之后，刘莉和许宏指出，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主要关注还是在它的族属和朝代的归属，很少留意对于国家与城市起源的一些关键因素，如手工业专门化、农业生产、城市人口和城乡互动等问题。中国学者应该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用多学科研究来了解中国早期城市化的进程^②。就目前而言，没有将二里头文化与夏对号入座的必要，当代考古学完全能够脱离文献来独立探究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文献只是有用的线索和证据而已，编史学家不应热衷于争论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墟的问题，而是应该利用考古学提供的新证据来重写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与龚辛合作，原刊《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有改动）

①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

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古史辨运动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科学和民主的大背景下，继承与结合了乾嘉学派的求实精神和今文经学的辨伪精神，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运用近代史学的科学思辨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无情的检讨。由于无论是疑古学派还是传统学派都拿不出一部“上古信史”来，中国学界于是认识到真正的古史重建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正是由于这场运动，使得西方科学考古学能够在 20 世纪初疑古思潮最为汹涌澎湃时进入中国。

20 世纪末，我国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回顾。在基本肯定了疑古思潮的历史地位和积极意义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该是“释古”和重建古史的时候了。提出这种见解的学者主要是认为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了基础，并且认为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研究应该和文献学联系在一起，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资料来说明才有价值。但是，有学者也坦言对考古学的失望，认为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两张皮，考古报告搞历史的人没法看，两者无法契合^①。

认为疑古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应该进入释古和古史重建的时代，这种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我们还是需要审慎考虑这样的提法是否现实，可行

^① 张京华：《20 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第 1 期。

性究竟有多大。第一，疑古辨伪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科学思辨方法，还是仅仅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和事件？认为我们现在的古史重建无须怀疑精神和科学思辨，把疑古和释古割裂开来，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第二，如果认为我国考古学的进展已经为释古和重建古史奠定了基础，可能有点过于乐观。考古能够发现的地下文献资料毕竟有限，并且大部分都是无言的物质遗存。在尚未能够充分解读出古代社会文化信息的情况下，文献和考古发现根本无法契合，何况大段的史前史和上古史是没有或仅有少量文献可供借鉴。许多历史学者坦承他们无法读懂考古报告，在历史学者无法利用绝大部分考古学成果的情况下，可信的历史重建又从何谈起？

在回顾疑古思潮的讨论中，有人指出中国学者的看法得不到国际同行的认同，认为这是外国学者不开窍，不了解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学术进展。李零提到，西方学者对巫鸿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的。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国外学者的想法，所以需要沟通和对话。于沛也呼吁将疑古思潮放到世界学术背景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去分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可能更全面一些^①。而我认为中外学者看待古史辨的立场既有科学价值观的差异，也有学术传统的不同。西方学者特别难以接受中国学者那种只重材料、不讲理论、缺乏批判意识，以及“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②，他们也无法接受以文献为导向的古史重建方法。由于大部分倡议走出疑古、进行古史重建的学者是历史学家，他们对文献资料情有独钟，认为考古发现中有文字的东西比没有文字的东西负载的信息更多、更有价值。他们对考古学的作用、特别是当代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进展并不十分了解。大部分人对考古学的作用还局限在 20 世纪初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认识上，以为考古学家可以为他们挖到古代的文字资料，有了这些佚籍，他们就能据此重建古史了。其实，这种对考古学作用的认识已过于狭窄。纵观考古学的发展史，其理论方法发展的精髓就是超越文献资料，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和检讨我国古史重建中的一些

^① 《众议疑古思潮》，见张京华编《疑古思潮的回顾与前瞻》，京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张光直：《序言》，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基本问题，以及考古学如何才能真正为历史重建提供材料的问题。本文试图对疑古、考古及古史重建的关系进行一番思考和梳理，并从国际学界的科学价值、科学思维以及学术发展现状的角度对我国这项研究课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比较中外学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介绍科学范式变革和学科交叉所带来的课题重心转移，以期能为我们讨论和评估疑古思潮提供一种比较广阔的世界背景。

一、考古学史的背景

疑古思潮对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被认为对考证古史有用的方法，使得中国考古学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加上史学在国学中的至尊地位，使得中国考古学被认为只有依附于历史学才有意义，只有用来重构国史才有价值。正是对考古学作用和地位的这种褊狭认识，才会有学者提出发掘出来的东西只有用文献解释才有意义这样的见解。这些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到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难道考古的发现因为没有文献可以解释就没有意义？研究两河流域和墨西哥文明的资深美国考古学家、*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一书的作者罗伯特·亚当斯(R. McC. Adams)指出，文献资料作为社会机构和事件的标识对于我们分辨其分布和特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早期文明和国家的文字记载一般局限于贵族的观点和活动，几乎很少提供社会信息，更不用说生态的过程和背景了^①。如果考古发现只有用文献解释才有意义，那么是否意味着考古材料中只有贵族的观点和活动才有价值？其中蕴含的大量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技术、艺术、信仰和平民文化的信息就没有意义？

中国考古学的特点与它被接纳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背景与西方科学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差异很大。可以这样说，现代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是在理论方法上摆脱和超越文献记载的局限上来体现其科学价值的。但是，中国考古学却是通过在证经补史中的作用来体现自身科学价值的。这种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中国考古学和欧美考古学十分不同的发展轨迹。从积极方面而言，中国的古史研究有了一根弥补文献不

^① Adams, R. McC., Complexity in archaic state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01, 20: 345—360.

足的拐杖。但是从消极的方面而言，中国考古学没有能够充分利用出土材料的潜力来全面重建影响社会演变的各种条件。考古学家在解读历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响到考古报告的科学性和可读性。换言之，历史学家无法充分利用考古发掘的原始资料来重建古史。他们至多只能根据出土的一些青铜铭文和简帛的文字资料来补充他们的信息，面对出土的大量物质材料只能表现出对考古学“本位主义”的浩叹和与考古学难以沟通的无奈。

19世纪科学考古学在欧洲的诞生有几个关键的条件。第一是18世纪末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启蒙思想本质上是思辨性的，它提倡社会和技术进步的法则，对于民众世界观摆脱宗教束缚和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第二则是欧洲古物学的基础。与中国金石学依赖文字不同，从很早起，一些早期欧洲古物学家就开始尝试和创造独特的方法来研究古物，如从器物形制和建筑风格来分析它们的时代和源流，这些方法都对后来科学考古学方法的诞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影响。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说过，欧洲古物学向考古学发展有赖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进步。在地质学出现之前，在均变论被广泛接受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

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是丹麦古物学家汤姆森三期论的确立。三期论的意义在于它创造出了一种完全不求助文字记载的年代学方法来独立研究古物的方法，成为古物学和考古学的分水岭。丹尼尔在评价三期论时就论及考古学超脱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并说，汤姆森没有陷入关于凯尔特人、古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的迷茫和想入非非之中，而是根据器物石、铜、铁的材质变化，提出了三阶段的分期学说，创立了相对年代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没有这种相对年代的思想，史前考古学就绝对跳不出古物学的窠臼。由此可见，不依赖文字材料，从物质遗存本身来研究历史是科学考古学的精髓。正是汤姆森的系统理论满足了这种要求，使得三期论被誉为“史前学的基础”和“现代考古学的柱石”。

在汤姆森从三期论来建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的同时，将出土文物与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的民族相对应的方法也十分流行。汤姆森的助手、丹麦考古学家沃尔塞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丹麦的古代史，但是他反对将考古学上分辨出来的古代群体与历史传说中的民族挂钩。他认为，史料中不可能全面保留

了最初居住在北欧的所有民族；面对少得可怜又似是而非的材料，也就犯不着执意将它们和史料上记载的古老民族拉上关系。历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他的做法对史学研究毫无助益。但是他反驳道，如果接受这种批评，那么全部的史前学将在史学研究中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否认，文字释读对于重建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博良和罗林生分别对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释读，延长了两地 3 000 年的文明史。但是倘若依赖文字记载来解读古物以重建古史，马上就会因文字记载的缺乏、内容的含糊不清，以及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难以对应而变得困难重重。比如，地中海东部的早期考古研究就彰显了史学家的痼癖，学者们努力用历史名称来命名史前文化和重建区域历史，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贴上腓尼基人文化、利古里亚人文化、伊比利亚人文化、凯尔特人文化和条顿人文化等标签。后来，这种研究方法被斥为完全的虚妄之谈，被视为根本无法证明的问题。虽然谢里曼的考古发掘始于对荷马史诗的向往得益于历史的启发，但是其贡献却完全超越了文献的范畴。他起初打算用考古发掘来证实荷马讲述的历史事实，但是结果却表明，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存在局限性。他的发掘把史前考古学真正提高到一个显要的地位，并且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明，考古发掘与对非文字材料的研究同样可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古史体系。换言之，谢里曼发现古希腊的奥秘，是用考古学方法将历史学从文献探索的油灯下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古希腊灿烂的阳光下^①。

中国考古学的产生背景和科学考古学在欧洲诞生的背景十分不同。中国虽然没有宗教思想的禁锢，但是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国有发达的经史学传统，却缺乏产生自然科学的土壤和条件。中国虽然有悠久的金石学根基，但是却没有从文字释读转向对器物进行独立研究的探索动力。所以，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是被作为一种有助于获取“地下之材”的掘地技术而引入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理论方法，包括三期论的相对断代思想在像西阴村和殷墟发掘等考古学处女航中几乎没有体现，田野工作完全是以考证古史和文献为出发点的。李济发掘西阴村，是因为他推测夏县可能是夏王朝的所在地。对于殷墟发掘，张光直指出它完全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而促成的，

^①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而甲骨文研究更是文献史学的延伸。因此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上，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①。在殷墟出土遗存的处理中，对甲骨的整理和研究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重视程度上，都远远超出了殷墟其他相关材料，成为安阳发掘的“关键珍品”。李济将 1936 年夏第十三次发掘所发现的 H127 甲骨堆积称之为“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②。

由此可见，科学考古学从欧洲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后，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学者将考古学仅仅看作是挖掘“地下之材”的有用方法，使得孕育科学考古学的思想精髓没有和操作技术一起输入，而科学考古学的要义就在于摆脱文献来独立研究物质遗存。令人困惑的是，李学勤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缺点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呼吁考古学应该超越文献才能吸收新东西的看法不以为然，坚持认为只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才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③。从上面介绍的考古学发展史可见，这种所谓的中国考古学特色，在本质上是与科学考古学的宗旨相抵牾、并早在谢里曼时代就已被证明存在重大缺陷的研究途径，是考古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和古史重建的最大误区。

二、认识论与方法论

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出土材料激增，但是具体研究还没有给古史重建带来一片灿烂的阳光。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我国学界只把考古看作是掘地技术，是历史学的附庸，而不是一门独立提炼信息的学科。中国考古学的这个缺陷显然是在它被引入中国时的定位和期待所决定的，一些学者信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考古发掘为文献研究提供材料才应该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殊不知，像甲骨和金文简帛这样的地下之材毕竟有限，大量无言的物质遗存如果无法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历史信息，中国的上古史将仍然是一片迷茫。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信息解读则不重视，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而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李济：《安阳》（苏秀菊、聂玉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因为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方法，大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提供历史学家所能理解和利用的历史知识。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J. H. Poincare, 1854~1912)曾经说过：“科学由事实所构建，正如房子由石头筑成一样；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一座房子一样。”^①而这正是中国古史重建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并转化为历史学家所能利用的具体知识，那么考古学除了类型学和地层学之外，还需要其他理论方法的开拓与帮助。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认识论的问题。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践性或实证性的学科，主要凭借发掘材料来了解人类的过去和重建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强调“无征不信”，这种认识论与1949年以来大力提倡的唯物史观也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但是中国治学传统也有重视主观性的一面，即“心知其意”^②。张光直先生将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形容为：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治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成见^③。对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欠缺，难免使我们常常把增进对过去的认识寄希望于材料的积累，而不是持续反思和提高自己的观察和研究能力。

为此，我觉得中国的古史重建和文明起源研究不能再闭门造车，不能再局限在文献学范畴内来进行了。其实，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是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们的目标相同，但各自的研究材料和方法却有很大的差异。即便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到的地下之材，也仅仅是指出

① Thomas, D. H., *Archaeology*, Third edition,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Inc., 1998.

②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见顾潮编《顾颉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③ 张光直：《序言》，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土的文字资料，而大量的物质文化所能提供的信息是区区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重建远古文明史需要更多地依赖考古学的探究。其他文明古国由于文献资料不如中国丰富，所以考古学家们努力发展各种方法以从考古资料中独立提取信息。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我们的福气和有利条件。但是，文献和考古研究应该作为积极反馈的两个独立研究领域来进行操作，不能将考古看作是史学的附庸，有文献帮助可以使我们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工作做得更好更细致。不然，从文献出发进行研究会严重限制考古学的视野和它的探究潜力。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从生态环境、生存方式、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各个层次来全面分析原始社会在长时段中的历时演变，并梳理影响社会文化复杂化的各种因素，如环境、人口、技术、经济、宗教等与文明演变至关重要的变量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变量互动和文明发展的进程和轨迹，我们才能真正重建古史和完成中华文明探源的任务。

20世纪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罗宾·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对如何从考古发掘和研究来了解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他指出，成功发掘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项发掘无论其大小，发掘者应该明知其发掘的理由，必须知道他想找什么，然后决定怎样发掘才能找到。这就是科林伍德的“问答逻辑”的中心原则。他说，早期的考古发掘都是盲目的，没有寻找答案的明确问题。虽然后来考古发掘从18世纪的挖宝转向19世纪的求知，但是在操作上基本也是盲目的。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仍以遗址而非问题为导向，即选择一个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在完整发掘后，再选择下一个遗址。这种发掘的结果是，博物馆堆满了出土文物，但是对于遗址的历史仍所知甚少。

科林伍德指出，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探方里出些什么东西，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对于询问不同问题的人来说，出土器物的含义各不相同。比如，那些倾心古董的人可能只关注出土文物的市场价值；关注类型学的考古学者可能主要留意出土遗存的年代和文化谱系；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文字资料才是他最关心的内容，其他东西则毫无意义；而关注社会发展和文化适应的学者则会留意许多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的迹象；而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可能什么都不是。因此，他认为，认知思维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感知过程，而是积极的探究。科林伍德还指出，即使是最简单的感知也只能

来自于观察者脑子里固有的概念。人们无法感知自己经验之外的现象。虽然像时空等概念与生俱来，但是人类大部分认知概念是习得的。不管这些概念来自何处，如果没有这些习得的概念，任何观察都将毫无意义。

此外，科林伍德还认为，考古学家研究的历史并不是死亡的未来，它仍然存活于今天。因为我们有关于过去的了解都来自于遗留至今的文献和器物。考古学家只关心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子里的想法。他们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过去残留至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工作与自己感知结合而已^①。

今天的考古学家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他们探询的问题和他们所认为是合理的答案，这种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为此，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 G. Trigger)说，考古学阐释受现代社会的左右不会随学科的进步而减弱，它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项永恒特点。从最坏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没有真实的过去可以被研究，考古学家没有办法来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今天阐释的对象只不过是“过去留在今天的印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无法证明他们重构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由于考古记录作为过去的产物是由完全独立于我们信仰之外的力量所塑造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真实的历史独立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给予的重构和解释之外。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带有价值观倾向的判断左右着我们的解释时，我们如何才能明白我们重建的历史是真的？因此特里格认为，希望利用考古材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其结果对我们是有害而无益的^②。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在对古史辨的评价上，虽然口头上肯定其时代意义，但是又以指责其怀疑过头、造成古史的空白为由加以贬低。于是，20世纪90

① Collingwood, R. G.,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②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年代初便有学者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认为疑古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应该走出这种阴影。其理由是，考古出土的文献表明许多古籍不可轻易否定，疑古搞了许多冤假错案^①。还有学者指出，虽然疑古派的观点在表面上似乎贯串了一种对待史料的合乎现代史学规范的要求，但实际上它本身是非常不严谨的，因为他们从未提出过任何关于这些传说是由某部文献或某个古代学者编造出来的直接证据，在方法上的不严密是显而易见的^②。这些批评的片面之处在于：刻意纠缠于疑古辨伪之太过，完全不顾及其求真的一面，而疑古辨伪的目的正是为了求真^③。

傅斯年当年曾说：“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进而将史料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比如，像《周书》和《明史》是间接的史料，而毛公鼎和明代档案是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比较可信，间接的史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和加减。但是直接史料也许是孤证或例外，有时间接的史料可能为前人精密直接归纳所得。所以要获得历史的真实面貌，需要随时随地分别看待。傅斯年的看法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理性思辨，是历史学和考古学进行历史重建时所必须慎重考虑和对待的问题。他这样评论历史记载的可靠性问题：“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④

傅斯年的见解其实代表了古史辨学派的精髓，也是任何从事科学探索的人们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吕振羽指出，伪造历史是剥削阶级的传统。由于当时科学知识的水平，大家不但竞相从历史上找根据，且不惜托古以加强自己的论证，因而演成伪造历史的风气。正如地下考古一样，从地层的分析上，分别出同时代的遗物，和因地层的变动或其他原因而杂入不同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中国史的研究上，对古书中的材料，也必须经过一次开挖的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③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见顾潮编《顾颉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④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手续，才能正确引用^①。

遗憾的是，疑古辨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学界似乎一直很不吃香。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虽然被人尊重，但是因为挑战传统，从来不被看作是学界的主流。以批评疑古派怀疑过头或怀疑方法很不严谨来否定史料梳理的必要性，集矢于材料梳理过程中出现误判这种正常现象，借此来否定对文献资料进行科学梳理的必要性，本质上是维护和回归传统的一种辩解。殊不知，怀疑精神正是科学最基本的精神，真正有见地的科学家都提倡并强调怀疑精神。古人云，于无疑处见疑，方是进展。朱熹说，学贵善疑。明代学者陈献章说，疑者觉悟之机也。李四光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爱因斯坦说，科学家很难察觉他们训练中所习得的概念会存在问题。所以，为了科学就必须反反复复评判这些基本概念，以免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它们支配。欧洲谚语说，怀疑是智慧之母。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由此可见，怀疑不仅是一个学者必须具备的特质，也是进行科学探索的首要环节。这种怀疑不是无端的猜疑，更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建立在对事实和知识进行分析基础之上的怀疑。人的认识发展就是一种由疑而信，由信而疑的过程。初看起来怀疑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它似乎是要否定一种知识，但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它常意味着思维的进展和认识的提高。科学问题通常是以否定的形式向当代的科学理论提出疑难和诘难，这种疑难和诘难有时带有极大的挑战性，动摇了那一时代的科学根基，实际上正是这些疑难和诘难，推动了科学的进步，甚至造成了科学的革命。在科学的思辨方法中，“疑”和“思”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说，有条理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科学的基本方法，而且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特点^②。

虽然人们不否认科学需要怀疑精神，但是传统观念却不但不鼓励怀疑，甚至经常扼杀科学中可贵的怀疑精神^③。据此，我国一些学者以疑古辨伪中出现错判和怀疑过头为由，否定这种科学精神和作为研究方法的必要性，这从科学发展观而言不能不被看作是一种维护传统的倒退，从方法论而言则有

①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林定夷：《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林定夷：《科学研究方法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悖于起码的科学精神。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传统观念竟然以一种政治立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有人说，对于备受外国霸权欺凌和压迫的中华民族，疑古思潮是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因此，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也不能只对它做正面的肯定^①。从中国传统史学中表现的道德价值取向和民族主义情结来看，这种言论显然难以被看作是一种学术观点。由此推理，认为古代史料可以增强民族精神而不宜对其中掺杂的有伪成分进行辨析和梳理，那么这与英国人用伪造的皮尔唐人头骨和日本人用假石器来推前本民族的历史、弘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有何本质区别？

疑古辨伪的意义被人刻意贬低，也和考古学在中国的处女航——殷墟发掘结果有密切的关系。殷墟发掘是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项重要成就，但是在解决传统学派和古史辨派之间的争论上，却成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正是殷墟发掘与典籍的吻合，使得这一成果变成了对疑古思潮的嘲讽，客观上为维护传统提供了科学依据。其结果便在学界产生这样的想法，即典籍中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怀疑精神不但多余，而且反会造成混乱，造成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所以，殷墟的发掘成果不只是对疑古辨伪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对倡导科学精神的重挫，它支持了史籍的可信度并巩固了饱受诘难的传统学术的地位。于是，被傅斯年赞誉为“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的古史辨^②，虽没有被否定，至少被排斥到边缘的地位。结果，本来就缺乏科学思辨的国学方法又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也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理论方法上下功夫，把自己紧紧依附在传统史学上，成为证经补史的工具。

中国传统认知体系中缺乏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逻辑和抽象思维的因子，其中对传统知识体系崇尚有余而批评不足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历史被看作是代代相传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传统被赋予了民族的价值观，因此对历史和传统的怀疑和批评自然被视为居心叵测，怀疑精神也就被蒙上了一层消极的阴影。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和我国历史和考古学者主要受传统国学熏陶，受传统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有很大关系。于是在面对新

① 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见《原道》第四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思维和新理念与传统方法发生冲突或产生怀疑时，常会不自觉地站在传统立场来加以评判。正如有学者指出，中世纪的欧洲，“进步”和“不道德”几乎是同义词。一百年前的中国大体也一样。新旧是有道德意义的，新的东西很危险，被称为“奇技淫巧”，旧的东西倒是几千年来一直宣扬的东西^①。这种认识论的道德价值观，在我国人文学者中是否仍然存在，显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认知因素最终会影响到研究中具体问题的选择和方法论的采纳，从而决定我们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传统史学中对史料的重视也对考古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我国的考古研究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学者们将发掘材料等同于文献资料，把材料积累等同于知识积累，把考古资料的累积看作是史料累积的延伸。如李济将殷墟发掘的主要成就看作是“累集史料”，是“地下材料”的增加，并将其誉为中国史学界革命性的变化。于是，中国考古学的治学方法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精神：以中国为对象，以新的春秋大义为目标，以文化个案为基本资料，以对现代群众的教育为目的^②。然而，被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考古发现的物质材料不等于史料，没有经过考古学理论方法详细而严谨的分析研究，出土材料本身是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历史知识的。由此可见，没有正确的科学态度，缺乏理性的思辨精神，没有独创的理论方法来提炼各种信息，“走出疑古”和重建信史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奢望。

三、范式的变革

对于提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强调用“二重证据法”重建古史的学者而言，他们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仍停留在 20 世纪初的水平。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研究的对象没有变，但是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却日新月异。那些坚持文献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今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早已不是 20 世纪初那种治学方法，中国目前的研究现状已经远远滞后于国际水准。因此，我们有必要谈谈科学范式变革的问题。

美国哲学科学家托马斯·库恩对科学范式(paradigm)的变更和科学革命

①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张光直：《序言》，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做过著名的精彩论述。——所谓范式就是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模式和规则。库恩将范式定义为一种公认的科学实践规则，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实践，它们为科学研究特定的连贯的传统提供了模式。他还提出了科学革命的概念，将科学研究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种状态。“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之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被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间内公认是实践的基础。然而科学的发展往往不在于常规科学的完备，而是在于科学革命。随着新范式的确立，一些老问题会转移给别的学科去研究，或被宣布为完全“不科学”的问题。以前不存在的或认为是无足轻重的问题，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可能会成为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①。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的考古学和历史学都发生了科学范式的变革，产生了新考古学和新史学的新范式。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一直停留在史科学和编年学的传统模式上，对国际上科学范式的变更感到十分陌生。因此，了解一下科学范式的变更和国际考古学、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的研究现状十分必要。

1. 新考古学。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考古学像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一样迅速变得面目全非了。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电脑的普及、广泛应用统计方法以及科学哲学的影响，使得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它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广泛，分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理论研究也随之蓬勃兴起，不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并促成了分析方法的分化和探索领域的扩展，考古学已从一门大致上的描述性学科发展成更为严谨的探索性学科。

20 世纪 60 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同时在英国独立发生的新考古学运动，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新考古学又被称为“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这里的“过程”一词与“动力机制”同义，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社会演变的动力或原因。新考古学抛弃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中将文化看作是一批典型物质遗存的集合，而将其看作是人类对环境的超肌体的适应方式，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并将环境、人类及其文化看作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系统，而这种系统的运转并不取决于人类适应的生物学过程，而是取决于其拥有的文化亚系统的功能。新考古学还重新定义了学科的研究目标，将其概括为三个范畴。第一是复原文化历史，第二是复原人类的生活方式，第三是研究文化的进程。文化进程是指“阐释考古遗存产生、发展和传承的原因”。

在美国新考古学兴起的的同时，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年轻考古学家也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对传统考古学进行反思，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戴维·克拉克(D. Clarke)。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是考古学学科环境和内容急剧变化的时代，相邻学科在互相碰撞中改变自己，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探索领域。这期间重大的技术进展为考古学提供了崭新的手段，从大型挖土机到新式的航空及水下设备，从运筹学、原子物理到计算机电子学，一场质和量的技术和社会革命正慢慢地改变着全世界的考古学。

新的研究体系产生了许多新的观察结果，了解到了以前根本无法知道的原因和复杂情况，进而从根本上震撼了整个学科体系。这些新的结果可能完全改变了在旧学科研究体系中所得到的成果和定型认识，从而必须对这些认识进行重新修整。克拉克进而指出，新考古学就是新环境当中新方法、新观察、新范例、新哲学和新思想体系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对考古材料和现象的解释存在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层次，因此考古学家必须整理出一套明确的程序规则，以检验和判断解释的正确性、中肯性和合理性。对考古现象直接原因的解释与对现象更深层次的动力机制的解释，往往被搞混。所以，考古学必须完善它的理论体系，它既要有负责解释考古现象相互关系的那些低层次的理论，还要有一种统领全局的总体理论。克拉克最后呼吁，田野考古学家应当更加认识到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了明确的理论意识，他的贡献就不只是考古资料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可以达到质量上认识的深化^①。

新考古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意识到仅仅采集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考古材料本身的具体性无法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事实，考古学必须摆脱那种经验和直观的分析和常识性的推断来研究考古材料，应该引入各种

^① 戴维·克拉克：《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见《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精密科学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然后对考古现象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因做出理论的阐释。对传统方法的不满浓缩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应当更加科学化和更加人类学化”。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考古学家对新考古学日益不满，他们特别是对从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提出质疑，批评新考古学在解读和阐释人类的认知因素和世界观方面的无能。于是，剑桥大学一批考古学家开始从人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角度来研究考古材料，关注人的能动性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他们认为，人类文化并非一种只对环境起作用的适应系统，人类思想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样重要。人类的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思想所积极操纵，物质现象不只是对生存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被动反映，而是特殊社会策略的一部分。这一进展导致了考古分析如何看待人类本质问题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出现了多样化的考古学思潮和流派，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被考古学界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后过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意识形态对社会演变所发挥的作用，关注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思维”和“价值”。比如，象征考古学希望了解器物的纹饰和设计在哪些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贵族如何应用奢侈品的象征性来操纵社会信仰和运用他们的权力。结构考古学试图分析考古材料之间在结构上的关系，解读背后蕴含的规则。结构考古学认为，许多信息并不反映在个别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组器物 and 遗迹现象共生的结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则将利益关系和冲突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是矛盾、冲突和竞争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社会发展中，人类的思想也能被用来改造世界。

2. 新史学。1900年，法国学者亨利·贝尔在《历史综合杂志》的发刊词上指出，传统史学以政治事件为唯一内容，以考证文字为唯一方法，以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唯一线索，以叙事式为表达研究成果的唯一方式，只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个性，因此缺乏科学性，应当创立一种新型的“综合历史学”来取代它。他指出，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更没有历史学。只有当历史学不停留在描述而是开始做出解释时，才是科学的历史学。

1929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提出了“总体史”的口号，要求把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乃至心理和下意识的领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1949年，年

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纲领，即关于“历史时间”的“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采用结构—功能方法，应用系列数据去研究社会中各种传统的功能作用。他把历史时间比作“三层楼”的大厦，底层是“地理时间”，是人类与地球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第二层是“个别时间”，是传统的“历史事件”研究的领域。第三层是“结构和势态的历史”，也就是长时段的历史。新史学就是“结构”和“势态”的历史，旨在揭示制约政治事件的社会结构和势态。

新史学的变革带来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1)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叙述事件，而新史学则把结构的分析看作主要的任务。(2)历史学领域的扩大带来了史料和史料处理方面的新问题。传统史学是以考证文字资料为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把官方的档案看作唯一可信的证据。新史学选择新的研究对象，改变观察历史的角度，不仅利用文字史料，而且还使用新的史料，包括口述史料和统计数据来复原普通民众的活动和思想。(3)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在处理新型史料上表现出它的无能，新史学面向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利用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从它们当中去寻找理论、问题和方法。(4)新史学和传统史学在历史解释的准则上有根本不同的标准，新史学更多的关注集体的行动和社会变化趋势，而非传统史学关注的个人因素。(5)新史学主张用厚今薄古的思想进行研究，从人类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学，从普通民众的新角度去解释历史事件，也被形容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新史学的变革还体现在历史研究的计量化上，成为当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计量史学是指自觉地、系统地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推理的研究活动。因此，计量史学既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新型的历史学^①。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国史学界也开始注重方法论的改进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视。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中，要求史家从传统的以王朝为中心的族类记忆、国家记忆，转向近代民族、近代国家记忆，并引导人们关注世界记忆。他认为，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方法。他号召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来进行“史

^①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之改造”。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学术、政治、法律及风俗习惯历史发展作了系统的反思，开创了后来中国学术史、社会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文化史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提倡的思想和方法，体现了一种会通中西、贯通新旧的特点。胡适也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疑难发生、指定问题、假设、推理、证明五个步骤，并将其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运用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追根穷源，建立了一种现代史学的范式。而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更是功不可没，这场论战促使史学家进一步从传统史学中解放出来，把史学研究向科学化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些五四运动所触发的学术改革与创新在我国后来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课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反映，究其原因可能与1949年后史学领域强烈的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至上的风气有关。1949年后，新史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都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常常被从负面来加以评判。平心而论，就开拓性、创新性和科学性而言，我们今天的学术视野似乎还不及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从学科范式的变更上，我们看到，欧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发生了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转变，提倡超越政治史和贵族史的范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由于中西学界之间过长的历史和学术隔膜，使得中外学者在文明探源和古史重建的研究目标、科学思维、理论方法、学术语汇和解决的问题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表现出较大的差距。从科学范式变革所造成的差距上，我们可以理解西方学者为何会对我国学术传统、学术训练和研究成果持如此尖锐的批评态度，以及中外学者之间难以沟通的原因所在。

四、古史重建与文明探源

我国目前的古史重建主要体现在以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为中心的重大工程上，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来看，这项研究的目标还是集中在文献学和年代学上。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多学科的参与也被用来解决史籍中漫漶不清的王朝年代问题。

从国际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文明探源工作一直在两种主要形式之间变换。一种是关注个别事件和具体特征的历史学和个案研究，一种是关注社会

文化一般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摩尔根在他的代表作《古代社会》里最早提出了三阶段的文化进化模式,使学界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激励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思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和最终发展方向。20世纪上半叶,博厄斯学派的历史特殊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和当时考古学盛行的文化历史研究的宗旨正好不谋而合,无论在埃及、中国,还是在其他文明中心,追溯文明和早期国家的独立起源,构建历史具体轨迹成为国际学界的主流。20世纪中叶,美国新进化论再次强调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性,使得学界对于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新进化论建立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四阶段社会进化模式,为探究文明起源和阐释社会演变的动力和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新考古学提倡文化生态学理论,从环境、人口、资源、权力、宗教等各个方面来分析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和特点,聚落考古、环境考古和人地关系互动的研究将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层次。自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除了强调检验有关早期国家起源一般性理论模式外,开始转向更加关注特定社会文化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分析,使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日趋紧密。复杂社会被看作是一种多功能的实体,其中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社会经济群体文化上的特殊形态相互结合,在塑造特定政体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①。

在最新发表的总长达92页、引用文献计1083条的两篇综述性文章中,美国学者史密斯(M. E. Smith)和施赖伯(K. J. Schreiber)对近十年来美洲复杂社会和早期国家研究的成果与进展做了回顾。在第一篇回顾早期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研究的论文中,涉及的领域和课题包括强化农业生产、手工业、交换与贸易、家居考古、家庭与社会消费、不平等和阶级、群体合作、性别考古、民族身份^②。在第二篇回顾政体、宗教和都市化研究的综述中,他们介绍了有关早期国家的政体与权力、都市化、聚落形态、宗教(纪念性建筑、献

① Stein, G. J., Heterogeneity, power, and political economy; some current research issu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Old World complex societ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998, 6(1): 1-44.

② Smith, M. E. and Schreiber, K. J., New World states and empires; 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5, 13(3): 189-229.

祭和地形)、墓葬与人牲、家庭祭祀、历史演变与动力、语言与迁徙、气候与生态环境等探索领域与最新成果。他们将这些课题从考古材料、方法论的进展和理论阐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述,为我们提供了当代美洲早期国家研究现状的详尽概况^①。这些领域和课题体现了当代学科重心转移后早期国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将它们与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领域和课题在我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中不是极其薄弱就是完全空白,这种差距可能正是我们的文明探源成果难以获得国际同行认同的主要原因。

面对中外治学方法的差别,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应,即西方学者那套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工作的成就和意义。我国学者的这种态度和反应,在前面已经提及,实质上是科学范式变革造成的结果。对于仍然习惯于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而言,面对完全陌生的当代理论、方法和实践,只能以不适用自己来加以掩饰。而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学者考虑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已经过时,他们认为我们仍然在做不恰当、不值得做或已被证明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正如库恩所指出的,范式一变,科学研究的世界也随之改变。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在新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新的方法,注意新的领域,关注新的不同的东西,好像整个学术圈搬到了另一个星球上。范式的改变使得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如果有一些人固守这种或那种旧观点,干脆会被逐出这个行业,此后没有人再理睬他们的工作了^②。为此,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水准,还是应该加强与国际学界的沟通,虚心了解学科的进展,不宜再用国情不同的理由来漠视或掩饰这种差距了。

人类学取向的文明探源不但要求了解历史事件的经过,而且还要解释社会演变的原因,了解主导文明起源的动力。这种研究与注重文献的历史学研究并没有抵触,而是能够强化历史重建的深度和广度。考古学从生态环境、生产技术、经济形态、人口压力、社会结构、聚落形态、权力形式和意识形

^① Smith, M. E. and Schreiber, K. J., New World states and empires: politics, religion, and urbanism.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6, 14(1): 1-52.

^②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态来了解影响社会复杂化进程活动中主要制约因素的作用和互动；人类学理论解释社会演变的因果关系和潜在规律；历史学的文献研究可以提供相关政体、贵族、经济和宗教等活动的细节。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研究表明，在乌鲁克至早王朝时期的上半叶，泥板文字都被用作会计目的，统计和记录庙宇贵族之间的谈判和交易，配给、施主、产量和销售所记录的账单是主要内容。此后，文字也用到了管理和立法等其他事务上。到了早王朝时期的下半叶，文字才被用来记录历史事件、统治者名字、文书交流和口述文献。在埃及古王朝时期初，文字主要被王室用来记载人名、地名、日期、容器中的物品。连续记载的表述一直要到第二王朝晚期和第三王朝初才出现。古典玛雅的文字主要是铭刻，主要记录了国王和朝代的历史、行政资料、年历和宗教经文。中国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主要记载了王室贵族占卜、祭祀和军事等活动。在印度河谷，早期文字主要出现在商品和宗教物品上，其功能很可能像今天的信用卡和身份证，是较高地位人士的标记。此外文字还被刻在陶、石质的书版上，很可能是账册，证明当时的城市是商贸中心^①。

从世界几个文明古国来看，文字系统的起源和应用各有特点，而且其内涵和提供的历史信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早期的文字资料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提供社会某些特定方面的局部知识，不足以用来构建完整的古代史。在今天的国际学界，文献研究只是文明探源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信息都要靠考古学来进行独立的提炼和解读。虽然中国拥有可观的文献资料，但是这些对于了解和重建上古史来说还是非常单薄的。与其强调考古发现只有用文献来说明才有意义，还不如说文献只有在考古学全面解读了物质材料后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五、小 结

从对疑古辨伪、考古研究、古史重建及文明探源的思考与讨论中，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美国文化唯物论学者哈里斯(M. Harris)指出：“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一项独特与宝贵的贡献，这并不否认其他文明对科学知识的贡献。但是只是

^①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在西欧，科学方法的独特规则被最早确立和予以清晰的表述，并系统地应用于整个无机的、有机的和文化的现象。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不是从种族优越感来肯定科学是一种认知方法，它对全人类都具有卓越的价值。在整个人类史上，只有一种认知方法鼓励其本身的参与者怀疑自己的前提，并系统地将自己的结论呈现给怀疑者进行有敌意的审视。”^①这种科学态度和思辨精神，要求学者们不但要重视对研究客体真实性的梳理，而且还强调对研究者本人立场、知识背景、学术能力以及各种影响主观判断的社会影响和价值观进行严格审视的必要性。因此，“善思”和“善疑”应该是我们从事研究必备的基本科学素质。

第二，我们应该超越传统学术方法，从国际水准来审视我们这项工作的差距。考古学探索的范围远不止文化和事件的历史编年。从某种意义而言，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处于一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汇合的聚合点。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依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而它也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信息库。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应当是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它和历史学不是依附的关系，也不是仅仅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而同是以了解人类自身历史和社会发展历程的独立研究领域。

第三，我们的古史重建和文明探源应该超越三代国家的纪年、地点和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来探索文明和社会发展具体轨迹并阐释其原因。我们还要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是否和其他文明古国有类似之处，或寻找我国文明起源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原因和动力机制。只有在对中华文明起源具体过程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构建一部科学的古代史，才能使我国的文明探源跻身世界学术之林。

（原刊《文史哲》2006年第6期）

^① Harris, M., *Cultural Materi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考古研究中，普遍将夏、商定为奴隶社会，并将其看作是早已解决并无须深究的问题。这一共识主要是根据苏联 20 世纪初斯大林钦定的五阶段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模式。受意识形态影响，这一阐释模式被看作科学定论，很少人去思考如何从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检验这一模式是否符合中国早期国家的具体情况，也没有人试图从激增的考古材料分析经济和政治特征并对当时的社会性质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于是，奴隶社会成了一种对中国早期国家定性的标签。虽然 20 世纪初，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和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进行过有益的讨论，但是受意识形态左右这一讨论难以成为一场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争鸣。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历史学者重提中国古代国家的性质问题，并对古代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然而，这种共识并没有对我国早期国家探源产生任何触动。许多学者特别是考古学者仍习惯于利用马列经典中的社会进化概念，把夏称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一场热烈而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讨论无疾而终。

由此可见，文献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导向如何左右着学者们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视野。本文试图从苏联五阶段社会进化模式的产生，国内外学者对早期国家社会性质的探讨，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困扰等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并呼吁学界对中国早期国家性质的问题加以关注。希望考古学能够摆脱证经补史和理论概念教条化的习惯思维，为深入了解中国古

代社会的性质和演变提供更客观、更具体和更科学的认识。

一、五阶段社会进化论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被公认为研究社会发展和文明演变的经典和开山之作。他从对印第安人血缘系统演化的研究深入到对社会技术、制度和文化知识共同演化的层次。他提出了著名的人类文化的三阶段进化模式，将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向文明的进化看作是普遍经历的发展过程，认为奴隶制随财产的增加而产生。像以前和与他同时代的进化论者一样，他支持社会文化的一种直线或平行演化模式，指出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经所有的低级阶段就可以到达较高的层次。他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可能向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制度发展的看法，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赏识，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探索国家形成的原因以及作为一种压迫机构的真正性质。马克思仔细研读了《古代社会》，写下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批语，打算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是他没能完成这一心愿就去世了。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于1891年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经典名著。

根据对摩尔根《古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所有制形态的研究，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中提出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根据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和概念，在经过一番争论和综合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1928年提出了一种人类社会直线递进的发展模式：原始社会被分为氏族前、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三个阶段；后继为三个形态的阶级社会，分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为两个无阶级社会，分别是社会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主义和共产主义^①。这一划分后来通过一个原始平等社会、三个阶级社会和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合并，被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总结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的、社会主义制的”模式，并认为，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是怎样^②，将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混为一谈。

这种单线直进的社会发展模式因斯大林的钦定而被赋予了纲领性、真理性和指导性地位。于是，全世界的社会不管民族、不论国别被认为一概都要经历这个直线发展的历程，最终都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中国，这一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取向的社会进化论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长期以来对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阐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对认识古代国家性质的影响

在将苏联这一模式应用到中国古代史分期中来时，曾在中国史学界产生过激烈的讨论和争鸣，特别是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性质成为讨论的焦点。早在1949年之前，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就努力应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和苏联社会进化模式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定性。比如，郭沫若起先把铁器和奴隶制相对应，把周代看作是奴隶社会。后来将夏、商和西周归入奴隶社会，将春秋与战国之交看作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阶段。后来，他又把春秋战国都看作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阶段，直到秦灭亡才结束^③。

除了郭沫若之外，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学者都一致认为殷商属于奴隶社会，尽管他们在后续阶段的分野上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学者的观点几乎是对斯大林的指示对号入座，并刻意将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欧洲模式比附和套用。但是，对此持不同意见也大有人在。比如，王锡礼认为，在中

① Trigger, B. 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②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见《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国古代，奴隶从未在生产上占过支配地位。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国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不必机械地在中国寻找奴隶社会这个阶段^①。胡厚宣也认为，殷代有奴隶，但是不能因此而将殷代看作是奴隶社会^②。冯汉骥支持胡厚宣，认为他的观点“自为卓识，可一洗将中国社会比附西洋社会发展的通病^③。”但是，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有所抵牾，这些意见难免理直而气短。

20世纪50年代，一切以苏联为楷模的政治导向，使五阶段的社会进化模式被看作社会演变的普遍规律而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加上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等学术问题进行商榷显然不合时宜。但是仍有人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李鸿哲在1957年撰文指出，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多年来为人所信从，实在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但是这一教条不是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得来的，而是由郭沫若和苏联斯特鲁威院士等提倡起来的。由于这一教条的存在，苏联和我国的史学家们曾花费很多力气在古代各国历史上寻找奴隶^④。不幸的是，就当时的政治环境，李鸿哲和其他持相同观点的学者都难免因言获罪。

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思想枷锁的解放，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说再次被提了出来。1979年黄现璠首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论文^⑤，接着张广志也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⑥。到198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想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大部分人认为，奴隶制和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谈，将殷商看作奴隶社会，理论公式化，史料不足，不能将马克思的欧洲社会分期套用到中国来。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信奉无疑的商代

① 王锡礼：《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之谜的时代》，《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

② 胡厚宣：《殷非奴隶社会论》，见《甲骨学商史论丛》，上海书店出版社1944年版。

③ 冯汉骥：《自商书盘庚篇看殷商社会的演变》，《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第5、6期。

④ 李鸿哲：《“奴隶社会”是否是社会发展必然阶段？》，《文史哲》1957年第10期。

⑤ 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

⑥ 张广志：《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奴隶社会说，原不过是沙滩上的大厦^①。

然而，这些讨论似乎对考古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一些学者仍将夏看作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中央集权王朝。如果考古工作者不带着问题去收集能够解决早期国家社会性质的第一手资料，并检验不同看法的真实性，那么历史学者的讨论也难免流于空谈并难以为继，我们对中国早期国家性质只能停留在概念和标签的层次上。

有学者提出，过去评价中国历史的标尺，都是以西方进步案例为参照，无不是从欧洲发生过的事例里推导出来。但是西方学者却告诫：你们被“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误导了。你们奉为圭臬的那种理论并不是西方的历史，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这方面，最大的敌人不是猜想和反驳，而是盲从和武断；不是自身认识有所偏差，而是被别人的认识替代了自己的思考^②。

三、思考与探讨

我国史学界在古史分期上有关奴隶社会的讨论明显表现出几个特点：(1)虽为学术问题，却是意识形态的产物；(2)集中于单一模式、局限于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如何从实际材料上进行论证做得较少；(3)没有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特别是考古学领域的参与，根据事实材料进行探索和验证。因此，这个问题的探讨和深入便难以为继，在20世纪80年代热闹一阵之后就趋于沉寂。由于理论在中国考古学中没有什么地位，考古学者对于古代社会分期和夏、商是否是奴隶社会的讨论似乎毫无兴趣，完全置身其外。许多学者继续采用苏联的五阶段社会进化模式来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把夏、商看作是奴隶制国家，这种缺乏学术进取心的表现可能有三个原因：(1)这种问题牵涉到政治，太过敏感，还是照贴标签比较保险；(2)考古学只是提供材料，如何进行阐释是别人的事情；(3)考古学研究完全没有检验设想的问题指导，社会性质问题似乎和收集材料没有关系。于是，单靠史学界围绕概念做文章，自然难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有所进展。

^① 张广志：《商代奴隶社会说质疑》，见《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王家范：《序：对历史认识持敬畏的态度》，见叶文宪《重新解读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由于早期国家性质的讨论明显存在意识形态导向，使不同观点和立场所据之“理”不再中立和对等。因此，我们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时，需要隐去郭沫若等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光环，完全从学术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郭沫若认为商代杀殉大量奴隶，因此殷商为奴隶社会铁案难移。但是，许多学者持不同看法。比如，20世纪40年代胡厚宣根据甲骨卜辞中对奴、臣、仆、妾、妇、妃等字的解读后认为，这些甲骨记载无一能作为殷商为奴隶社会的证据。甲骨中虽有用俘虏为奴，但是战争之有俘，古今皆同，不能作为商代为奴隶社会之证^①。20世纪50年代杨绍萱对将殉人和殉葬制度等同于奴隶制的提法进行质疑^②。陆德和杨向奎等学者也把殉人制度看作是上古民族灵魂不死的思想的反映，和社会制度无关^③。张广志针对郭沫若的立论，从甲骨卜辞、人祭和人牲、羌和众等方面进行举证辩驳，认为商代为奴隶社会不能成立^④。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看法，特雷斯特曼(J. M. Treistman)指出，殷墟王陵大量用青壮年男子殉葬，常被作为商代属于奴隶社会的证据。但是，葬俗不能成为经济基础的证据。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商是一个在经济和农业上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⑤。吉德炜(D. N. Keightley)也指出，在商、周文字中没有“奴隶”和“自由民”的词汇和人口买卖的记录，因此商代社会不像是奴隶制的特点。把商代大墓殉葬的人牲看作是奴隶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人在殉葬前被作为奴隶劳力使用，殉人更多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关系宗教信仰，表明这些墓主希望延续生前的生活，维持这些作为殉人的亲戚、侍女、卫士、奴仆和囚徒死后继续为他服务的关系^⑥。

① 胡厚宣：《殷非奴隶社会论》，见《甲骨学商史论丛》，上海书店出版社1944年版。

② 杨绍萱：《关于“殷周殉人”的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

③ 陆德：《试答杨君绍萱的殷周殉人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5月24日；杨向奎：《殉葬和俑》，《光明日报》1950年7月5日、19日。

④ 张广志：《商代奴隶社会说质疑》，见《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 Treistman, J. M., *The Prehistory of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Explanation*, New York: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2.

⑥ Keightley, D. N., *The Shang: the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dynasty*. In Loewe, M. and Shaughnessy, E. 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2-291.

特里格(B. G. Trigger)在比较早期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人祭人殉现象时指出,人祭常常是用来献给上帝和神灵,感谢它们的超自然力量给世界带来的万物轮回和人间福祉。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奴仆,他们一切劳动都是为上帝服务的。商、周时期的祭品都是献给自然神灵和祖先亡灵,这些神灵根据献祭的程度来维持它们的力量,强大的神灵一般需要比其他神灵更奢华的献祭。殷墟的祭祀方式除了人牲以外还包括食物、美酒和动物。玛雅人认为,诸神需要人类的照料才能维持它们的力量,所以人们要不断为神提供祭品包括人牲。阿兹特克人认为上帝会因为赋予万物以生命而会感到饥饿,所以人们必须不断为上帝提供牺牲以保持宇宙秩序。虽然玛雅常常用俘获的异族首领作为人祭,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人牲应该是地位低下的囚徒、俘虏或异族成员,如商代的人牲常常是外族的俘虏。但是就这些早期文明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制,征用大量平民为王室和贵族服务使他们的境遇和奴隶相差无几^①。

从迄今发现的大量考古证据来看,二里头和早、中商时期的聚落形态、生产方式和墓葬材料在许多方面仍然和龙山时期十分相似,并没有迹象表明在这一时期社会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奴隶阶层和以奴隶为主要劳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虽然有人认为这一时期前后出现的“乱葬坑”中埋葬的是奴隶,但是族群仇杀和战争是早期复杂社会中的常见现象,难以单凭这些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来判定其为奴隶,并由此推导当时的社会性质。倒是在东汉发现过身份确凿、被劳役和酷刑折磨致死的刑徒墓地,许多人还戴着镣铐入葬^②。

值得指出,奴隶和奴隶社会应该是两个概念,存在奴隶和奴隶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比如,古罗马和贩卖黑奴的近代美国存在奴隶制,但没有人将它们定性为奴隶社会。加拿大西海岸的印第安部落社会将俘虏作为奴隶从事以牟利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并将人牲看作是财富的一种特殊消费形式,但是也没有人认为这些部落和酋邦是奴隶社会。将殉人看作是奴隶,进而根据

^①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四期。

早期国家存在殉人的葬俗推导出当时的社会就是奴隶制显然过于简单。殉人的葬俗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出现，并在历史时期仍然存在。像中国、美索不达米亚、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早期国家的人祭习俗更多的是体现了意识形态和宇宙观的特点，它和标志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把夏、商定为奴隶社会显然受了苏联五阶段模式的影响，因为该模式将奴隶社会定为人類第一个阶级社会，根据这种定势思维，夏、商必定是奴隶社会无疑。然而，斯图尔特(J. Steward)提出，早期国家形成中的战俘有可能形成一个奴隶阶级，但是美洲土著社会是否存在过真正经济上的奴隶制则很可疑，俘虏的社会作用和奴隶制的起源及性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①。根据弗里德(M. Fried)的阐述，早期国家的基本性质是阶级分层的制度化，确立不同社会成员获取资源的不同途径和方式，使民众臣服于权威并确立主权和疆域。奴隶在国家社会前就已出现，他们主要是俘虏，常被用作牺牲而非劳力^②。塞维斯(E. R. Service)也持相同看法，认为法律和政府的出现是国家制度化的体现，统治者行事从此可以凭借武力而无须公众一致认可^③。由此可见，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从未认为早期国家必定是奴隶社会。

如果中国古代不存在奴隶社会，那么这些早期国家又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应用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几个马克思主义概念来讨论社会进化及其性质，一旦脱离这些概念和术语，我们会感到无所适从，思考和分析出现了语汇的真空。于是，中国古代国家如果不是奴隶制，那就只能是封建制了。比如，有学者指出，奴隶制生产方式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现象在古代不可能存在。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原始社会结束后进入封建社会才是社会发展的规律^④。晁福林认为，社会形态应该从人们如何组织起来使用土地进行判断，夏、商可以被看作氏族封建制

① Steward, J. H., Cultural causality and law: a trial formul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ivil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9, 51(1): 1-27.

② Fried, M.,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③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5.

④ 朱晞：《要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的论述》，《南开史学》1986年第2期。

社会，西周是宗法封建制社会，到东周进入地主封建制社会^①。

如果把中国整个历史时期的国家都定为封建社会，仍然令人困惑。因为，源于中世纪拉丁语的英语 feudalism 一词无法完全对应中国文献中的“封建”“封建制”和“封建主义”。汉语中的“封建”是指古代国家的殖民建邦，如西周的分封诸侯和周联邦，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 feudalism。1901年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把 feud 译成“拂特”，即封土、领地、采邑、食邑等。因此封建之制是指一国有许多联邦组成，这些联邦由领主或封主统治，农民耕种领主的土地，为领主服役，民众只知领主，不知国王，国王无法驾驭他们。在封建制的国家里，国王是最高君主，他的权力受到诸侯的承认，但是国王无法强迫诸侯每天承认他的权威。在非常时期，诸侯有责任忠君勤王，其他时候诸侯完全是他自己领地的主人。因此将欧洲的 feudalism 和中国的“封建”对译，产生的问题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极短，而中国的封建制却有“四千数百载而有余”^②。问题是，除了西周类似封建制外，漫长的中国朝代国家并没有封主或联邦制度的存在，将它们称为“封建王朝”显然也是和苏联社会进化模式对号入座的结果。看来，无论是西方的 feudalism 还是中国的封建制，都和中国朝代国家的性质不合。因此，要为中国四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定性，要么对源于欧洲的封建制概念做重新定义，要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做合乎中国国情的修正。

为此，有学者对我国学界教条和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特别是斯大林版的社会进化论进行了批评。长期以来，许多人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作万能公式到处简单照套，甚至把五种生产方式曲解为一切民族或每个民族必经的“历史必然”，我们不应该把马克思经典中根据欧洲社会建立的发展模式和苏联五阶段社会发展模式简单套用到中国历史发展中来^③。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摩尔根的直线进化论趋于式微。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并无目的可言，它不会按照人类的价值观行事，因此否

① 晁福林：《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② 日知：《“封建主义”问题》，《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

③ 杨适、田盛颐：《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我们今天》，《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认社会文化会朝着一个预定的方向演变。这一时期，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非常流行。他认为没有一种标准可以被用来对不同文化发展的相对程度和内在的价值作比较，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将文化从与学者自己文化的一种相似程度来做比较，而必须从它们本身人群的意义来予以评判。而且，每种文化必须作为一个独立发展过程的产物来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加唯物论的态度来看待社会文化演变，形成了一种所谓新进化论的思潮。新进化论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摩尔根的直线进化论，它提倡生态、人口和技术决定论，强调“一般演化”，力图了解和解释社会文化演化的普遍特点和发展主线。这条主线以人类历史上每个相继阶段中最先进的文化为代表，不管这些文化发现在何处，与其他文化有没有关系。

新进化论的两位主要的倡导者是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 White)和斯图尔特。怀特视自己是摩尔根思想的继承者，他提出“一般演化”的概念，把文化看作是人类超肌体的适应方式和手段，将其比喻为一种热动力系统，每一种文化系统是由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亚系统所组成，技术位于最下层，社会结构在中间，意识形态在最高层，其中技术力量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力量^①。斯图尔特开创了一种更为特别的生态学方法来研究社会文化的演变，像以前的进化论学者一样，他认为社会演变虽然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但是他认为生态的适应在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斯图尔特试图确定社会文化是如何在不同环境条件中发展的，为什么在世界上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如热带雨林、干燥的河谷和北方林地中会独立演化出基本相似的社会文化特点，遵循相似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不同自然环境中的文化也会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他把这种社会文化演变称为多线演进，和以前进化学者提出的直线演进或平行演化有所不同。斯图尔特声称，研究的目的应该解释所有或大部分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中文化的那些共同特征，而不是去解释那些由历史偶然事件所造成的独特事件和非重复发生的那些特殊性。他强调要从跨文化规律的角度和从特定事件的历史学角度来研究文化演变，同时也视演化规律和历史研究为相互不同的概念，认为只有对演化现

^① 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象的研究才能产生科学的总结^①。

斯图尔特于1949年提出了新进化论的一般性社会进化模式，来比较世界上五大古代文明中心自旧石器时代至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文明的演进轨迹。它们共分为8个先后相继的阶段或时期，分别为狩猎采集期、早期农业期、形成期、区域兴盛期、早期征服期、黑暗期、轮回征服期、工业革命期。在这个进化模式中，中国的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被归入狩猎采集期，新石器早期属早期农业期，仰韶龙山属形成期，夏、商属区域兴盛期，西周属早期征服期，战国属黑暗期，秦、汉至明、清属轮回征服期^②。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和塞维斯分别提出了四阶段原始社会的社会进化模式。弗里德的四个阶段分别是平均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和国家社会^③。塞维斯则利用民族学资料提出了高度一般性的直线发展序列，表述人类社会自游群，经部落、酋邦向国家的发展轨迹。

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考古学家对运用一般进化模式来解释考古材料日益感到失望。科迪(R. H. Cordy)就新进化论模式提出了五项缺点：(1)新进化论所定义的各阶段特征不易从实证上来衡量；(2)酋邦与国家之间的区别较难分辨，特别是介于两个类型或阶段之间过渡型社会；(3)在被定为酋邦的社会中，其人口、疆域和社会梯度所表现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各异，复杂酋邦阶段中的社会差异甚至大于酋邦和国家之间的差异；(4)缺乏系统论导向的分类，将所有社会类型的分类都以一些特征的存在或缺失为依据；(5)认为社会各种特征会随整个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基本原则是不对的，社会结构各部分的发展速率并不同步，有的部分会突进，而有的部分则会滞后^④。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对新进化论的缺点进行了批评，认为新进化论所提出的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并不能构建一批特定的社会形态，而只不

① Steward, J. H.,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② Steward, J. H., Cultural causality and law: a trial formul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ivil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9, 51(1): 1-27.

③ Fried, M.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④ Cordy, R. H., *A Study of Prehistoric Social Chang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the Hawaiian Island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过是些定义含糊的范畴罢了，其特征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相互重叠。直线发展的模式无视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社会中存在的变异程度，没有人努力来系统揭示这种地理上的差别。而且，社会文化演变远不是一种通过依次不同的阶段而日趋复杂的过程。个别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图像，它可以向上发展，也会向下衰落和崩溃，衰落的社会也不会倒退到它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原始阶段，在较高阶段获得的知识 and 行为会在社会瓦解后保存下来，然后在社会重新复兴过程中发挥作用。

于是，欧美学界开始偏离新进化论那种强调构建和检验有关早期国家起源一般性理论模式的导向，开始转向更加关注特定社会文化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分析。这一趋势努力将理论与实证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复杂社会和政治经济多样性的框架来解释文明进程中社会结构、手工业专门化和交换的多样性。这一新的趋势反映了国际学界对新进化模式过分强调文化进化和文化适应以及过分强调演绎方法所造成的忽视历史个案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新的研究趋势使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日趋紧密，将复杂社会看作是一种多功能的实体，其中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社会经济群体文化上的特殊形态相互结合，在塑造特定政治实体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①。

特里格以更为宽泛的视野来比较和分析早期国家的性质，并避免采用分类和阶段发展的线形模式。他认为，就文明发展来看复杂酋邦和早期国家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于是他提出了早期文明社会和晚期工业前文明社会两个概念。早期文明社会是指那些最原始和最简单的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主导这些社会运转的主要机制已经不是血缘关系而是等级制，阶级关系取代了血缘和民族关系成为主要原则，尽管血缘关系在下层社会和统治阶级的凝聚机制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成千上万的民众生活在以血缘为基础的社群或酋邦中，由一些统治者运用武力来维持权威。政治控制基于一种施主和被庇护人(patron-client)的关系，政治上的成功大体取决于最高首领的个人素质。当领导失误，疆域就会变动，核

^① Stein, G. J., Heterogeneity, power, and political economy: some current research issu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Old World complex societ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998, 6(1): 1-44.

心就会分裂。尽管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比平民奢侈，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阶级关系被安置在一种由等级制构成的血缘网络之中，其中血缘关系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权力基础建立在对剩余产品的控制上，尽管技术仍然十分原始，但是劳力的组织和管理已经十分复杂。政府能够有效和稳定地运转好几代人。虽然早期文明都有奴隶存在，但是并不像晚期工业前文明中那么普遍和暴虐。统治阶级普遍声称自己与超自然神祇的关系，被赋予神授和半神圣的地位。就像阶级取代血缘成为凝聚社会的基础一样，宗教概念也取代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和政治语言的媒介。

早期国家会进一步发展到工业前文明社会，其区别于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普遍采用货币，特别是金属货币以利交换和储藏财富。此外，军事力量规模更大、更专业和更制度化。而在早期文明社会中，专职的军人很少，并由国王、政府官员和当地首领直接统领，但是到了晚期工业前文明社会，军队已由专职的将领指挥。有别于早期文明社会中对自然力量的膜拜，这一时期的信仰已趋世俗化，大自然已被视为是无生命的，动植物已不再被认为具有人类的理智和意识。于是对自然、社会和超自然范畴的认识被明确分离开来。一些哲学家开始否定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有的认为超自然境界太遥远，与人类无关。但是大部分民众仍然视神祇是超宇宙的，人类和万物的存在有赖于上帝的创造和存在。于是，一些新的国际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袄教开始出现，它们强调个性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区别并声称自己的信仰适用于全人类。这种宗教思想影响了政治生活，早期文明的世俗王权开始被各种政府所取代，民主的、寡头的、专制的和军事独裁的制度开始发展起来。权力更加依赖武力，对奴隶和平民的压迫和剥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里格将中国汉代看作晚期工业前文明社会的初始，与亚述和波斯帝国、古希腊、古罗马、欧洲和日本中世纪的封建国家相当。但是，非洲撒哈拉南部和美洲的土著社会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从未发展到晚期工业前文明阶段，虽然玛雅可能是一个例外，但是它的宗教、经济和社会结构从未发生过变化^①。

^①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特里格根据经济、技术、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等特点分析了世界上早期文明和工业前文明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描述了国家演进的一般趋势。虽然他并没有为这些古代国家贴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等标签，但深刻揭示了早期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性质。中华文明的三代和后继的朝代国家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它们如何演进，需要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共同研究。如果我们能够不受程式化概念的影响，参照当今国际同类研究的成果，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中进行独立的研究，一定能够对这个问题获得更为科学的认识。

四、小 结

采用苏联的五阶段社会进化模式来对中国早期国家定性，使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影响如何左右着对古代社会的解释。学者生活和工作的社会环境，不但会影响他们所探讨的问题，还会使他们得出先入为主的答案。因此，学者们在了解过去的时候，不但受到研究材料和研究手段的限制，还会受到自己思考方式的限制。在中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文献和意识形态已成为两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制约。一方面，正是夏在文献中的幸存，使得今天的文明探源工程将证实夏的存在列为中心任务，并被看作是最有成就感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把苏联五阶段社会进化模式看作真理，使得我们对早期国家社会性质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概念的层次上，丧失了深入探究社会问题的动力，并漠视国际学术思潮和科学认识的进展。面对大量出土材料，没有人仔细审视过三代文明究竟建立在怎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之上，它们和后继的皇朝究竟有何不同。因此，了解影响学术研究的社会因素，将会增进考古学家的自我意识，提高阐释的价值。如果中国的文明与早期国家研究能够不囿于程式化的苏联社会进化模式，力求从具体的材料来客观探究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并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那将是对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原刊《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

安阳小屯发掘的回顾与思考

——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

安阳殷墟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它不但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主持的最为重要的大规模田野工作之一，而且，由殷墟发掘建立的考古学传统对中国考古学后来发展的影响至深。它塑造了现代中国考古学，并培养了第一代中国考古学的领导者。一方面，它所建立的将西方引入的田野方法和器物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后来中国学者严格遵循的范式。另一方面，殷墟发掘使饱受怀疑的上古史成为信史，它稳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确立了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学术定位。

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项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和上古史重建影响深远的研究做一番回顾和思考。正如张光直所言，殷墟发掘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而促成的，而甲骨文研究更是文献史学的延伸，因此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上，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以史学为导向的考古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它的道德价值取向；第二是它的研究特点是关注个案的记载，而非抽象的历史概括；第三是它的视野局限在中国的地理空间之内，体现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①。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考古学开始拥抱人类学，历史学研究也开始转向社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会学研究。虽然中国考古学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操作，但是新的探索也开始尝试。一些外国学者用其独到的视角解读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与中国学者信奉的“二重证据法”不同，人类学导向的考古学和文献解读将考古资料看作人类活动和行为的证据，文献材料除了其字面提供的历史信息外，还蕴含着其他深层或外延的信息，结合考古学材料，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殷商社会许多方面的历史场景。

殷墟研究的传统途径主要集中在甲骨、墓葬和城址三个方面。但是 20 世纪下半叶，海内外学者的殷墟研究趋于多元化，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本文在对殷墟研究进行一番约略回顾后，试图对如何用考古发现与文献材料来进行古史重建做一番思考。希望我们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能够跳出文献学的窠臼，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来重建上古史。

一、传统途径

在引入田野考古学前后，殷墟研究可以被看作两个不同的阶段。采纳田野发掘之前，研究可视为金石学的延伸。在引入考古学方法以后，在获取资料的手段和研究的科学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视野大为拓展。然而，由于考古发掘和发现的遗物遗迹数量可观，对这些遗存加以消化和解读颇费时日，而且远不如释读卜辞那么容易。因此，胡厚宣对 1949 年前 30 年殷墟研究的一百余种成果进行了统计和分类后指出，甲骨学虽是新发现的学问之一，但其主要成就只限于文字，不能从整体上了解古物^①。1949 年后，发掘和研究的模式大体延续之前的传统。而且大部分之前出土的材料被运往台湾地区，海峡两岸长时间中断交往，对殷墟研究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殷墟研究的传统领域主要包括甲骨、墓葬和都城，而墓葬研究涵盖了王陵贵族墓葬、氏族墓地和人牲、人祭等方面，下面予以约略的回顾。

1. 甲骨

安阳殷墟发掘之肇始得益于甲骨学的发展，从 1899 年清末的王懿荣开始，经过刘鹗、孙诒让、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的的工作，确立了甲骨学的学术地位。五四运动对儒家经典地位的颠覆以及疑古思潮对传统古史观的冲击，加上安特生和李济等人的田野考古学实践，促成了在甲骨学中开始引入现代

^①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版。

考古学的方法。

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关于该所的宗旨，傅斯年这样写道：“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①史语所一成立，董作宾就被派往小屯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当时殷墟发掘的组织者是把甲骨当作新史料来进行发掘、收集和研究的，而田野考古学被看作是获取新史料的一种新工具。

在李济加入发掘队时曾和董作宾达成如下协议：董作宾研究文字记载，而李济负责其他遗物。但是在具体材料处理中，甲骨无论在收集还是重视程度上，都远远超出了其他材料，成为收集的“关键珍品”。比如，李济将1936年夏发现的H127甲骨堆积称为“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之一，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②。

董作宾的知识背景缺乏现代考古学的训练，因此他对出土文物的期望大体与前辈金石学家相近。但是，他是为甲骨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位学者。他指出：“用近世考古学的方法治甲骨文，同时再向各方面作精密观察，这是‘契学’唯一的新生命。”他根据“大版四龟”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辞断定卜贞之间的某是贞人名，创立了贞人说。并根据同版共见贞人差不多同时的判断，将其作为甲骨断代的标准之一。并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八项标准^③。在历时十年，于1943年完成的《殷历谱》一书中，董作宾系统分析了各种祭祀仪式，并将当时发生的各类事件按年代序列编排^④。

田野方法的引入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虽然该领域也包括了材质、制作方法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甲骨钻凿形态等研究，而且其发展也突破了初期因字论价的局限，但是最受关注的仍然是刻辞文字，将它们看作是商代史料的主要来源。

2. 墓葬

(1) 王陵及贵族墓葬。1934年梁思永领导的第十次殷墟发掘对侯家庄西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期。

② 李济：《安阳》（苏秀菊、聂玉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董作宾：《大版四龟考释》，《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第3期。

④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版。

北冈王陵进行了发掘。1949年前对该地点进行的三次发掘，共揭露墓葬1232座和大量祭祀坑。由于墓葬中未发现具有断代标准的甲骨或因为墓室被盗严重而缺乏标志性器物，学者们只能根据墓道打破关系和利用骨笄形制变化来确定墓葬的相对年代^①。

由于历代盗掘所造成的严重扰乱和缺失，给墓葬断代和复原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导致墓葬形制、随葬品和墓主等各种现象和信息难以呼应，无法进行综合研究。这个局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妇好墓的发掘才有所改观。妇好墓是殷墟一座未经盗掘的贵族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铜器群、玉器、骨器、石器和陶器1900多件。墓葬形制、器物和铭文对断代和判断墓主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器物铭文中刻有“妇好”“司母辛”“亚”“亚其”“亚启”“束泉”等名字或标记。其中以“妇好”组铜器数量最多^②。

武丁时期的卜辞中记载了妇好的很多资料。此外，第四期武乙、文丁甲骨也有“妇好”的记载。虽然裘锡圭等学者推测妇好为晚期，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妇好应属武丁时期^③。妇好是武丁的妻子，地位显赫，从事征伐活动并主持祭祀典礼。卜辞中还有武丁为妇好占卜生育、健康状况和凶吉祸福等内容，从卜问她死葬及为她举行的多次祭祀可以判定她死于武丁晚期。李学勤对妇好墓多数青铜器上看似较晚的复层花纹做了讨论，从小屯331号墓葬、H21窖穴等遗址出土的早期器物上相似装饰风格，来说明复层花纹也存在于早期^④。妇好墓为研究武丁时代青铜器提供了关键的信息，进而建立起类型学的断代标准，为悬而未决的殷墟青铜器分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它与陶器类型分析相结合成为殷墟文化分期的重要尺度。由于妇好墓保存完整，因此借助文字和随葬器物的研究，使得这座墓葬在整个殷墟研究中成为一个标尺，从而能将墓葬、器物、铭文和甲骨文结合起来从事综合性研究^⑤。

① 李济：《笄型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联京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

④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

⑤ 张光直：《殷墟5号墓与殷墟考古上的盘庚、小辛与小乙时代问题》，《文物》1989年第9期。

(2)氏族墓地。氏族墓地集中分布在后岗、大司空村、殷墟西区和南区以及苗圃北地，其中以殷墟西区为最大。该墓地根据墓葬的地理位置和成群分布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界限，同区各墓葬的方向、大小、葬式和随葬品基本一致，而且出土青铜器上普遍存在作为墓主身份标志的多种图形铭文。此外，《礼记·丧服小记》中商代氏族命名的内容和《周礼》中多处记载的周代“族坟地”聚族而葬的现象，被认为是商族葬俗的传承。《左传·定公四年》中也有对殷人分族而治和以族为基本社群单位的记述。据此，出土铭文铜器的墓区被认为是该族“聚族而葬”的墓地，属于宗氏一级组织，而墓区中的墓群反映了氏族中不同的家族，共有相同铭文铜器的相邻墓区间关系密切^①。

杨锡璋根据铜器族徽的不同，考证了商代后期各族与商王以及族与族之间关系，指出第七墓区“共”族为商王异姓族，第一墓区的“子韦”和第八墓区的“子”则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多子族，同一墓区的小墓间是同族关系^②。

氏族墓地之间及各族内部墓葬规格和随葬品存在很大差别，大墓(如出土了殷墟发掘中唯一一件有纪年铭文铜器帝辛铜鼎的第七墓区 M1713)随葬整套精美青铜礼器、车马器、玉石器和数量不等的人殉^③。平民墓葬品简单，说明当时以血缘关系联结的氏族中等级差别和阶级分化的历史事实。带墓道的大墓的墓主是族内地位较高的小奴隶主或贵族，平民墓墓主的身份与甲骨文中的“众”或“众人”一致^④。

(3)人殉和人祭。李济就曾根据殷墟葬俗中人殉人祭现象，探讨过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实，但对殷商祭祀现象的全面关注，则要到 1949 年后武官村大墓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祭祀场和杀殉坑的发掘才真正开始。武官村大墓是殷墟发掘恢复后发掘的第一座王陵，该墓为“亚”字形，殉葬的人兽合计 131 个个体^⑤。墓葬南面还分布有成排的祭祀坑，是殷墟人殉、人性最多的一座墓葬。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79 年第 1 期。

② 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77 年第 10 期。

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 1713 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 年第 8 期。

④ 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77 年第 10 期。

⑤ 段振美：《殷墟考古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模式和殷墟人殉、人祭的现象将殷商定为奴隶制时代^①，但是许多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不能将殉葬制度等同于社会制度，人殉更多反映了古代灵魂不死的思想，与社会制度无关。尽管存在不同意见，20世纪50年代在殷商社会性质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殷商生产力已进入青铜时代，生产关系上属于奴隶制。

殷商时期的人祭以武丁最多，帝乙、帝辛最少。对于这种现象，杨锡璋和杨宝成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奴隶的劳动力价值逐渐受到重视而不再随意杀戮。殷墟青铜器生产的发展轨迹刚好与人殉、人祭现象的衰退趋势相反，说明生产力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人祭不再受到鼓励^②。

从葬俗三个方面的研究可见，断代、氏族关系和社会性质是关注的焦点。虽然在氏族和社会性质的探讨上，许多学者已经涉及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问题，但是从整体视野而言仍然囿于历史学的范畴。正如郭沫若坦言，希望用地下发掘出的材料和科学史观来研究和解释历史，并将殷商确定为奴隶社会作为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观点应用于中国古史研究的一大成果^③。这种在殷墟研究中所尝试和确立的、将考古现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术语对号入座的古史研究与分期方法，成为1949年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3. 都城

1908年，罗振玉考证甲骨出土地为安阳小屯，后来进而认为小屯应为殷商武乙到帝乙时的王都所在。后来，王国维把殷墟修正为盘庚至帝乙时期的商都^④。1928年，殷墟发掘出大量甲骨之后，董作宾在考释大龟四版和对甲骨文的研究后，肯定了古书《竹书纪年》中“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记载^⑤，使殷墟作为晚商盘庚迁殷到商纣灭亡时都城的说法得到普遍认同。

但是，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殷墟是否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② 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④ 王国维：《说殷》，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⑤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版。

是晚商都城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田涛根据殷墟卜辞中缺少帝辛、帝乙名谥等资料认为，帝辛、帝乙徙都于朝歌，即在今天的淇县而不在小屯^①。秦文生认为，盘庚应迁都于郑州商城。殷墟没有发现城墙、街道、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所以它并非王都，而仅仅是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的宗庙区、陵墓区和大型祭祀场所^②。

杨锡璋等批驳了殷墟非殷都说，认为殷墟没有大型宫殿建筑的说法并不符合科学发掘的事实。1998年春在三家庄东和花园庄村西之间铁路西侧的钻探中发现了夯土建筑基址，据此杨锡璋等认为这里很可能分布着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时期)遗址，并推测这里可能是盘庚迁殷的最初地点，殷墟则是武丁即位后所迁之地^③。

这种武丁迁殷说的最早提出者是丁山，他对《国语·楚语》武丁“自河徂亳”进行考证，最早提出“武丁始居小屯”的论断^④。彭金章和晓田根据文献中有关“盘庚渡河南”“河南偃师为西亳”等记载，认为安阳小屯作为都城的历史始于商王武丁时期，盘庚迁都于偃师商城^⑤。唐际根根据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盘庚迁殷的可能性不大，也倾向于武丁迁殷的说法^⑥。

主张武丁迁殷说的主要依据是殷墟没有发现武丁以前的甲骨文，以及殷墟一、二期文化特征之间的明显差异。但许多学者对此表示异议，如杨宝成认为，殷墟的甲骨文尚未完全揭示，因此不应轻易断言殷墟不存在武丁以前的甲骨文。殷墟甲骨文从字形结构和造字方法来看已比较成熟，因此，这种文字必定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绝不会仅自武丁时期开始^⑦。

① 田涛：《谈朝歌为殷纣帝都》，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版。

② 秦文生：《殷墟非殷都考》，《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秦文生：《殷墟非殷都再考》，《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③ 杨锡璋、徐广德、高炜：《盘庚迁殷地点蠡测》，《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④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版。

⑤ 彭金章、晓田：《殷墟为武丁以来殷之旧都说》，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⑥ 唐际根：《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3年10期；唐际根：《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

⑦ 杨宝成：《试论殷墟文化的年代分期》，《考古》1993年第10期。

而孙华、赵清和陈旭则认为武丁以前尚无甲骨文，他们从已发掘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小双桥遗址均未发现甲骨文的事实推断，甲骨文在早商文化中很可能还未出现^①，武丁时期出现大量卜辞则是当时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的产物^②。

邹衡认为，仲丁到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国内政局不稳，迁徙无常，居住时间短，所以不能形成考古学文化上的特点。武丁之世，商王朝兴盛，正是这种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殷墟一期早段文化特征更接近于早商或中商文化特征，而与晚商文化特征存在很大不同^③。

从殷都的讨论可见，大家关心的中心问题还是如何用考古证据来印证文献中的史实。由于文献和考古发现之间常常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契合关系。因此，如果没有更多的甲骨文出土来澄清事实，殷墟是盘庚还是武丁所建之都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某些历史原因无疑使殷墟研究受到很大影响。1949年前，学者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忙于田野发掘、收集资料和处理各方关系，发掘和研究过程的艰辛和可以理解的成果滞后，使得这一阶段工作既令人惊叹又略有些遗憾。1949年后，李济和其他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直到两岸关系冰释后才为大陆学界所知。1977年李济在美国出版的《安阳》一书直到1990年才在大陆翻译出版。该书是李济对殷墟研究和他一生事业的一个总结，体现了他追求整体知识的理念。除了甲骨文字提供的信息外，他还从其他物证来重建当时的历史，复原安阳的环境、经济、手工业、动植物、建筑、贸易、交通运输、葬俗、人性和装饰工艺等。因此，虽然李济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但是他的许多理念和成果对大陆的考古实践和殷墟研究并没有太大影响。

二、研究进展

殷墟研究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新进展体现在环境与经济、聚落考古、甲

① 孙华、赵清：《盘庚前都地望辨——盘庚迁都偃师商城说质疑》，《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② 陈旭：《关于殷墟为何王始都的讨论》，《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③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骨学、宗教信仰、手工业专门化、青铜器研究、国家特点、社会性质和理论阐释等方面。这些方面，胡厚宣、李济、张光直、吉德炜等海内外著名资深学者以及许多新锐都有大量著述问世，在此不能细及。简介的内容有的集中在殷墟，有些则与整个三代研究联系在一起。

1. 环境与经济

安阳位于清水、淇水和漳河汇聚的平原之上，土地肥沃。在 5 000～2 500 B. P.，气候较今天温暖湿润，并有湿季风期。殷墟发现的 29 种哺乳动物包括犀牛、大象、虎、狼、獾、水牛、豹、羊、熊、马、羚羊、竹鼠、猴和各种鹿类，其中以圣水牛、肿面猪和麋鹿为最多。水牛的大量发现，表明当时气候与今天江南甚至华南地区相仿。附近有茂密的森林和大片沼泽。当时的村落遗址大多位于小山或土岗之上，表明当时这里地势低洼、潮湿多水。甲骨文上也很少有降雪的记载。据甲骨文记载的殷代农作物有稷、水稻、黍、麦、莱、秔和禾等，其中稷(小米)和水稻是主要作物，秔是野生的水稻。家养动物包括狗、牛、圣水牛、绵羊、马、猪和鸡，其中马可能是进口动物，而牛是主要的祭祀动物，并是占卜甲骨的主要来源^①。

2. 聚落形态

美国考古学家欧文·劳斯(I. Rouse)将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定义为“人们的文化活动和机构在地面上分布的方式。这种方式包含了文化、社会和生态三种系统，并提供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记录”。劳斯指出，文明和城市化是不同的进程，文明是指一群人活动的发展，因而是文化的。而城市化是指一种机构的发展，因而是社会的。对于从聚落形态来分辨文明的迹象，他提出了一个两分标准，这就是“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的分化。对于非文明社会，聚落内居住的是单一的维生人群。当聚落形态显示专业人群的分化，出现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相互依存的共生状态时，应该显示文明进程的开始^②。

特里格(B. G. Trigger)将聚落考古定义为：“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

^① 张光直：《商代文明》(毛小雨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Rouse, I., Settlement pattern in archaeology. In Ucko, P. J., Tringham, R. and Dimbleby, G. W. (eds.),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95—107.

系。”聚落形态有两种主要研究的方法，一种是生态学方法，将聚落形态看作技术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主要研究聚落形态如何反映了一个社会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另一种是社会学方法，将聚落形态看作是史前文化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结构的反映^①。

聚落考古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并在殷墟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近年来，通过对殷墟保护区周围的勘探，其范围有所扩大，东西约 6.5 千米，南北约 5.5 千米，总面积将近 36 平方千米。2004 年配合基建项目，在大司空村东南发掘出家族宗庙一类的建筑群基址，南北 4 排、3 进院落，西侧有两进跨院，有较为完善的排水系统。其中一座中心建筑基址见有用穿孔田螺和蜗牛组成的雁、凤、夔龙图案和散落的成组陶器。2003~2004 年对殷墟西区孝民屯遗址进行的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墓葬、半地穴式房屋遗迹和铸铜遗存。这些半地穴式房基有单间到 5 间不等，但是以单间和两间为多，里面出土了灶塘和日用陶器表明这里是一处平民的居住点，使用时间多为殷墟二期。铸铜遗址出土大量陶范、范土坑、存范坑，并找到了大型铜器的浇铸现场^②。

一项出色的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是 1993 年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对以殷墟中心、总面积达 800 平方千米区域进行的调查和地质钻探，以了解殷墟遗址及外围地区的遗址聚落形态、地貌环境及其和遗址形成过程。调查发现，在仰韶时期聚落较为稀疏，仅 7 处，主要分布在洹河上游东段和下游西段，到晚期遗址数量增加到 12 处。龙山时期聚落数量大增，并向西扩展，数量增加到 28 处，并有 3 处明显大于其他同期遗址，显示两级聚落形态的等级结构。早商除下七垣遗址外，未见有大型聚落中心。中商阶段区域洹河边出现了一处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花园庄遗址，出土有铜器窖藏和夯土建筑基址，但是延续时间很短。晚商殷墟时期花园庄遗址消失，洹河下游居民点密集，小屯成为一处大型政治中心，并在洹河流域不见有介于小屯和小型村

^① Trigger, B. G., 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s and promise. *American Antiquity*, 1967, 32(2): 149—159.

^② 岳洪彬、何毓灵：《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 年 10 月 15 日。

落之间的中等规模的聚落中心，表现为两级聚落形态的等级结构^①。

从该项聚落调查来看，洹河流域与小屯周围的二级聚落形态似乎显示等级结构较为简单，这可能仅反映了洹河流域的局部情况。考虑到殷墟建筑和墓葬规模以及奢侈品丰富程度所反映的巨大资源和劳力投入，该中心不是周边这些小村落居民所能维持的，而是需要更广地域范围内税赋、劳役和进贡的供养。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亚当斯(R. McC. Adams)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平原都市化进程的研究中也发现，都市中心对直接毗邻地区的次级中心如镇的扩大有直接的抑制作用^②。殷墟作为国家政体的聚落等级结构如从更大范围来考察，应该可以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

3. 甲骨学

与中国学者比较侧重从字面上来了解殷墟王室贵族的日常活动外，西方学者则较注重人类学信息的解读。除张光直和一些日本学者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炜(D. N. Keightley)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从甲骨卜辞来了解晚商的主权、宗教与血缘、结盟与战争以及贸易与进贡，试图解决有关晚商文明起源的何时、何地和什么等问题。吉德炜根据卜辞中商王发布命令和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判定，商王是许多事件的决策者，掌握着发起和取消某项行动的主权，这些执行命令的人有的是他的官员，有的是相邻部族的首领。从商王行使主权的方式来看，他基本上采用的是一种面对面的方式，经常采取巡狩的机会来控制各地民众和解决内外矛盾。由于甲骨文中没有特定地域单位的概念，因此晚商看来还没有一种明确定义的疆域，国家政体被看作是国王个人权威所及、而非指他具体控制的土地面积。而且这种地理范围也很不确定，常常会因商王本人威望的增减和与周边部族的顺从或反叛而发生变动。根据一些称谓分析，吉德炜推断“侯”应该是服从商王调遣的部族，和“侯”一起出现的地名应该在商的控制范围以内。但是他认为“伯”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头衔，它常常是“方”的首领，而“方”一般是指非商族群。甲骨文中很

① 中美洹河考古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② Adams, R. M.,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early southern Mesopotamia. In Ucko, P. J., Tringham, R. and Dimbleby, G. W. (eds.),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735-750.

少见到商王给“方”的首领发号施令。但是当“伯”受商王调遣时，该“方”族群应该和商是盟友关系。甲骨文中提到“方”的族群有 55 个，商应该是这些部族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商和这些方国属于不同的政体，它们处于商的控制区域以外，或者以飞地形式生活在商控制的区域以内。这些被称为“方”的族属中还有 22 个到西周还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表明这些方国在周灭商以后仍然独立存在^①。

吉德炜认为，晚商国家以一种与异族或政体联盟的方式运转。在商王的眼里，国家的疆域以他巡视的范围而定，因此他需要持续到各地展示他的旗帜，发布命令，不断占卜、祈祷和祭祀，与自己的臣民及其他族群保持超自然的联系。根据甲骨文上记录的 500 余处地名以及它们地理上的分布，吉德炜认为晚商的势力范围大致东到山东南部与西部、北抵河北南部、西达山西中南部以及陕西中西部地区、南到安徽中北部和苏北地区。

吉德炜指出，晚商国家的运转建立在宗教、政体和血缘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商王通过占卜、决策、牺牲和祈祷等祭祀活动，以祖先神灵愿望的名义使政治权力集中化和合法化。祖先崇拜隐喻国家的组织机制，表现为一种以血缘为中心而非官僚体制的管理机制，血缘世系是政治和宗教权威的来源。正是商王献祭和祭祀所获得的祖先神灵的庇佑，才保证了农业的丰收和与敌对部族竞争的胜利，参与这些祭祀活动的贵族和族群都被看作是商王统治的受益者。如果一个部族首领并不属于王室世系，但是他参与商王室的祭祀活动，就可以被认为是晚商政体的一分子。当然，这一推断尚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甲骨文中还有像“人”“来”和“取”这些记录进贡和强索贡品的记载，表明了商王室与周边部族的贸易和交换关系。

为此，吉德炜觉得，晚商的国家形态至多是早期国家的霸权。朝代世系是一种原始官僚世袭方式，王室通过不时迁都来进行管理，在其管辖范围之外则是无数相互攻伐的大小酋邦和部族。卜辞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表现为从卜梦、病、丰收、敌人入侵等日常生活方面转为较为简洁、乐观的预言和验证，使用裂纹征兆减少，占卜者人名消失，字体缩小等现象。吉德炜据此认为商

^① Keightley, D. N.,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1979—1980, 5: 25—34.

王的占卜程序日趋正规，着重关注与政治和祭祀相关的日程安排，这些表明国家合法权力的确立和国王更为稳定和正式的权威^①。

在2000年出版的《祖先的景观：晚商中国的时间、空间和社群》一书中，吉德炜指出，晚商国家的性质像是一种早期王朝国家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商王个人和他直接支持者身上。国家政体可以被看作是个人权力和血缘联盟相结合的形式，下属的部落和群体首领以多种形式和变化无常的血缘关系、宗教信仰和各自利益与商王维系在一起，在商王直接控制下发挥着领导功能。领土主权基本上是相对的，商王的权威随着向周边距离的延伸而递减，并逐渐变成结盟的形式。虽然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但是也存在无数外围的次级行政中心，中央政府仅对它们实施有限的控制。这些外围的首领不时会反叛和威胁中央政府，所以商王需要经常巡视其领土以显示其主宰的地位，用巡狩、安抚、作战、调解、举行祭祀仪式，以及与盟友谈判来使他的地位合法化。

晚商的血缘关系大体上是作为晚商土地和历法的一种文化创造。在商的国家政体内，商王处于其社群的顶端，而这一社群中的等级、政治和血缘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王位采取世袭。从甲骨文的记载中可知，与王室权力相关的祭祀对于建立国家认同至关重要。商朝是父系社会，通过男性世系继承。占卜在商王的政治和宗教权威上具有战略性的地位，因为商王并不依靠本人进行统治，少数占卜显示，商王向一些较晚的祖先献祭，而这些较晚的祖先会向更早的祖先献祭。这样通过层层献祭，最后献祭的对象集中到“帝”——最高的神身上。商王通过一系列的汇报与祖先保持接触，生者与死者共同生活，通过祭祀进行沟通，就像商王的盟友和官员向他汇报一样。祖先或神灵会按照其后代的言行做直接或间接的回应，在他们高兴时就加以保佑，而在不悦时就施予惩罚。将死去的贵族陪葬以大量的青铜器和礼器，可能是便于死者向更早的祖先祈祷，就像生者为新亡和旧亡的祖先祈祷一样。祖先崇拜扩大了社群的规模，死去的祖先仍是世系中强有力的成员，并对现世的后辈施予影响。

^① Keightley, D. N., The late Shang culture; when, where and what. In Keightley, D. N. (e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523—564.

商朝贵族也是自然神祇的崇拜者，由于他们总是对各种灾难存在恐惧和敬畏，因此这些自然神祇显得有些不可捉摸和十分危险。一旦商王离开京畿或祭祀地后，并不处于祖先神灵的庇护之下，他们会感到危险、易受攻击和很不自在。这一推断可以从一个事实来验证，这就是商王在外巡视时从不向祖先占卜，并特别关心自身的安全。

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被称为“土”，并按方位将其疆域称为“四土”。商将其疆域内的土地称为“方”，或指非商的敌对社群。“方”的非商性质可以由一个事实表明，即商王从不占卜“方”的收成。这些被视为“方”的社群可能位于商的疆域外，甚至可能位于商的疆域之内。所以，在“土”的范围内也存在“方”的社群。因此，商王经常要在战争上投入大量气力以对付这些群体^①。

该书根据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新成果，对晚商的社会历史做了紧凑而令人信服的研究。著作内容涉及气候、农业、时间、空间、社群结构与关系，以及宇宙观和遗产，被评价为超越了以往所有中、英、日文所发表的这方面的著作^②。

曹兆兰根据甲骨文和金文来研究殷周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关系，她认为殷代的贵族女性可以参与朝政、主持祭祀、参与祭礼，并驰骋疆场。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便是妇好，妇好是武丁的宠妻，甲骨中关于她的卜辞有 20 多条，她常常征战四方，为王前驱，战功显赫。武丁另一位妻子妇姁也能率领军队，征伐敌国，在卜辞中以主帅的身份出现。根据妇姁负责农业生产的卜辞多于军事方面的内容，曹兆兰认为妇姁可能为商王负责农业生产，与妇好分别负责商王内外的政务^③。

在美国受训的中国艺术史学者王迎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的比较，以及借助于甲骨文记载来分析商王室等级和贵族妇女的等级地位。她认为，洹河以北的侯家庄西北冈王室墓地等级最高，许多带有 4 条和 2 条墓道的大墓都

① Keightley, D. N., *The Ancestral Landscape: 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ca. 1200~1045 B. C.)*,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53, Berk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② 陈星灿：《介绍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两部新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 年 7 月第 2 期。

③ 曹兆兰：《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集中在这里，武丁和他的王后妇姁也葬于此。而洹河以南、位于小屯北面和宫殿宗庙区西面的王室墓地在等级上次于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妇好墓就位于此。妇姁和妇好是武丁的两位王后，妇姁和武丁同葬一个墓地，而妇好则被葬在河对岸，两位夫人的地位明显有别。妇姁应为第一夫人，而妇好居其次。从墓葬形制看，在西北冈大墓中，妇姁的墓只有一条墓道，相对于其他大墓其规格最低，但是与其他王妃相比规格却最高，如妇好墓只是一个竖穴墓，没有墓道。从随葬品看，虽然妇姁墓被盗，但是出土的司母戊(后母戊)方鼎高 1.3 米，重量近一吨，而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方鼎，风格和设计司母戊(后母戊)方鼎非常接近，但是高度和重量显然不如前者。此外，妇姁墓在破坏后还发现了 7 种雕刻骨器，251 件骨镞和 38 个殉人，而未盗的妇好墓只有 5 种雕刻骨器、29 枚骨镞和 16 个殉人。妇姁随葬的箭镞竟然比以军功闻名于世的妇好多 8 倍以上，两人等级地位之悬殊可见一斑。妇好墓附近两座未盗的 17 和 18 号墓，时代相近，规格形制相仿，但是出土随葬品却无法和妇好墓相比。武丁的嫔妃无数，但是只有正式的后妃死后才能享受王室的祭祀供奉和高规格葬礼的殊荣，而且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严格的差别，表现出王室等级的森严。而且，晚商王后和嫔妃的等级地位决定了她们子女的地位，而非母以子贵^①。美国学者林嘉琳在肯定妇姁地位高于妇好之外，还根据妇好墓出土许多北方草原地带的小型器物而推断她不是商族的贵族女性，而是可能通过联姻来自商朝统治之外的一个方国的贵族女性。虽然她不是武丁等级最高的配偶，也没有生育男性王储，但是她的婚姻，以及商与她来自的方国关系，以及她的天赋，使她获得了特殊的身份和地位^②。许倬云指出，文献中商代王族为子姓，且文献中从未有商人有同姓内通婚的记载。然而，妇好就其墓葬规格之高，随葬品之丰富和精美，显然是王后一级的人物。若以殷商命名原则，这位人物是子姓，亦即王室可以娶子姓女子为后了^③。

^① Wang, Ying, Rank and power among court ladies at Anyang. In Linduff, K. M. and Sun, Yan (eds.), *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4, 95—113.

^② 林嘉琳：《安阳殷墓中的女性》，见林嘉琳、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许倬云：《序》，见林嘉琳、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这几位海外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史角度的综合探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根据甲骨文字的大量记载，大家多以为妇好地位高于武丁的其他妻妾，权力和地位最高，并且军功卓著，甲骨文记载也许表明武丁对妇好更加宠爱。但从妇妁的墓葬位置、性质、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司母戊（后母戊）鼎的规格昭示，妇妁才是权倾一世的第一夫人。而且从妇妁墓出土的武器、将军盔甲来看，她生前也可能统领军队，进行征伐，只不过在卜辞中没有被充分反映罢了。这是一个文献资料可能误导我们观察和思维的极好案例，并昭示了一种如何用实物结合文献来提炼信息和重建史实的科学途径。

曹兆兰对殷代甲骨文和金文中“妇”进行了分类研究，认为这些“妇”有的是商王的妻妾、有的是大臣、诸侯、方伯的妻妾、有的是商王已婚的姐妹^①。吉德炜也同意商王室通过联姻结盟的看法，认为甲骨文中 88 处冠以“妇”的妇女不大可能都是商王的妻妾，但是应该是商王室的成员，跟在“妇”后面的地名很可能是该妇女出生地，而该地很可能是与商结盟的部族。在 30 个带有“妇”的称谓中有 18 个有可以分辨的地名，其中包括二处提到“妇周”，表明商王室和周的联姻关系。他还推测，这些挂有“妇”的称谓不只是异族入嫁商王室的女子，还有可能是商王室下嫁到异族的女儿^②。

张永山通过对殷墟甲骨卜辞的分析，借鉴西周金文和传世文献探讨了晚商盛行的军礼。自出征命将开始，在大军出征时要告庙祭祖和天地神祇，然后举行隆重的迁庙主和社神仪式。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安庙主和立社神，祈求得到祖先和社神的佑助。在行军途中始终将保护庙主和社神的安全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班师凯旋同样要举行安庙主和社神的隆重仪式。献俘礼既是总结战果，又是向祖先报功的礼仪活动，其中杀俘祭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这些仪式都弥漫着神秘的宗教气氛^③。

① Wang, Ying, Rank and power among court ladies at Anyang. In Linduff, K. M. and Sun, Yan (eds.), *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4, 95-113.

② Keightley, D. N., The late Shang culture: when, where and what. In Keightley, D. N. (e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523-564.

③ 张永山：《商代军礼初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从以上这些研究介绍可见，甲骨文的解读结合考古材料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超越字面提供的知识来透视晚商政体和社会的诸多方面，为全方位重建上古史提供重要的依据。

4.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在史前时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在酋邦阶段已发展出神权的政治体制。到了早期国家，宗教信仰在政治控制手段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以迷信和祖先崇拜为特点的宗教信仰和以彰显王权、厘定尊卑的礼制在晚商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祭祀和宗教这种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复杂化的进展，到晚商发展到了极致。所谓殷人尚鬼，因此占卜和祭祀极其频繁。祭祀的对象包括自然神和祖先，因此后世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说法。在祭祀仪式中，常常用动物和人作为献祭，这种宗教祭祀到了晚商明显成为王室和上层贵族日常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殷墟许多建筑基址附近都发现有祭祀遗迹，建筑奠基时都埋入献祭的动物和人。而王陵区的祭祀遗迹更为丰富，用以献祭的人牲绝大部分是年龄在 15 岁到 35 岁之间的男性，也有少数女性和儿童。王陵区东部发现的数千座祭祀坑所在应是商王历年进行祭祖和宗教活动的场所，类似的人牲祭祀活动也见于贵族家族墓地之中。从祭祀遗迹判断，晚商社会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是祖先，还有上帝和代表山、水、日、月的诸神。虽然从甲骨文的一些记载知道这些人牲中可能许多是通过战争中俘获的异族人员，但是根据体质人类学的鉴定，这些人牲和地位较高的墓主之间并没有超出同一种系的范畴，可能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内部和不同族群成员阶级和地位之间的差别^①。

张光直指出，商代的祭祀为商王的统治提供强有力的心理和思想支持，祖先的意愿使得商王的政治权力合法化，并能为百姓带来福祉。在管理国家时，占卜是所有其他祭祀活动的基础，并为询问大约 20 多种不同的活动服务，主要包括天气；商王的运气；期待的活动如战争、田猎、出游等可能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结果；以及对单独事件如做梦、灾难、生育、疾病、死亡可能的结果做解释^①。

朱志荣认为，商代的宗教信仰表现出一种巫覡特点，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通过祭祀和占卜等方式加以展示。这种宗教信仰对艺术的表现影响至巨，商代的宗教与艺术混为一体，宗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思维和艺术活动。商代的各级首领和贵族又是宗教领袖，不仅处理日常事务，还要主持祭祀活动。当时的宗教包括上帝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等四种，涉及天神、图腾、人鬼和地祇，是一种一元多神的信仰体系。商代的宗教活动和巫覡文化主要功能是“绝地天通”和“沟通人神”。由于对自然现象和事件因果缺乏认识，人们始终处于无知与畏惧状态，便常常会将偶发事件看作是因果必然的联系与神的指示与征兆。于是人们采用占卜来预测凶吉，并逐渐发展成商代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商代宗教另一个特点就是以青铜器为代表的艺术表现，商代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是宗教观念的形象体现，是当时狞厉、神秘和繁缛社会宗教生活的折射^②。

5. 专业手工业

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专业手工业可能成为由王室和贵族专门控制的生产部门，特别是青铜器生产到晚商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殷墟已发现四五处铸铜作坊遗址，薛家庄作坊遗址出土了数千件陶范，铸造觚、爵、簋、盃、鼎、卣、壶、戈、镞、矛和车马器等。从这些作坊分布在殷墟宗庙区和都城范围内的位置来看，铸铜业应该直接处于王室和朝廷的直接的控制和管辖之下，铸铜生产规模庞大、分工明确，其中冶、铸分离，大型熔炉和大型陶范的发现表明当时的工艺已经解决了铸造大型青铜礼器的技术问题。孝民屯是殷墟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铸铜遗址，面积达5万平方米。其中发现了范土备料坑、陶范制作场所、范块阴干坑、烘范窑、祭祀坑、熔炉器具、铸铜器具等遗迹。殷墟大型、形状复杂的青铜礼器都由多块分范拼合而成，分范有垂直分范和水平分范两种。熔炉为内燃式，以木炭为燃料。小型器物用浇包浇铸，而大

① 张光直：《商代文明》（毛小雨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朱志荣：《商代审美意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型器物可能采用四到八个熔炉同时浇铸的办法，并由多人用皮囊鼓风^①。

早商和中商阶段，玉器数量和种类不是很多，到了晚商玉器加工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青铜器取代了玉器的象征地位，玉器发展在礼器功能上减弱，主要表现在装饰性和个人身份的象征性上。殷墟宫殿区范围内玉石作坊的发现表明，玉器是在王室控制的专业作坊里生产的。玉料来源一般认为主要来自新疆和田，对玉料来源的垄断和控制，应该像对铸铜原料控制一样，对商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决策和运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晚商发现了近 60 座车马坑，表明车子这类运输工具的生产和发展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这些车子不但在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在日常使用和葬俗中成为贵族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表明，制车业也可能成为王室和贵族控制的一个专业部门。

商代的骨器生产也成为高度专业化的行业，用来加工骨、象牙、鹿角等工具和日用器物。殷墟发现有制骨作坊两处，大司空作坊面积约 1 380 平方米，工作间 1 座，骨料坑 12 个。制骨原料以牛骨为最多，其他还有猪、羊、狗、鹿骨，并有少量人骨。晚商的骨器中还包括礼乐器、装饰品和艺术品。此外，殷墟还有蚌器加工业、纺织业、漆木器加工，以及可观的酿酒业的存在^②。这些专职手工业主要为王室和贵族阶层服务，为他们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这些产业的组织、运作和产品的流通构成了商王朝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

6. 青铜器研究

传统青铜器研究主要被用来断代或分期，但是现在的视野已经拓展到其他领域，并是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课题。刘一曼对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组合研究认为，商代晚期墓葬随葬品的组合清楚显示，墓主生前地位明确反映在随葬青铜器上。对于当时的统帅和将领，青铜武器的种类、数量和质地有明显的不同。统帅和高级将领的武器有铜钺、大刀、戈、镞等，其中铜钺和铜大刀是军权的象征。青铜武器的数量也据地位的不同从数十件到数百件

^① 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不等，而普通士兵一般只有一种兵器如矛或戈。除了军人随葬青铜武器外，一些行政官吏和记事史官墓葬也有青铜武器与礼器共出，可能这些官吏在任职期间也曾领兵作战。此外，根据殷墟共出青铜礼器与武器的墓葬存在时代不同，但铭文相同的情况，暗示殷代的官职的世袭性。一些大族的族长和首领不同时期都出任重要的武官，与甲骨文的记载吻合^①。

张光直认为，从商代开始，青铜器成为社会每一等级中随贵族不同地位而异的徽章和道具。青铜礼器和武器是被国王送到自己领地上去建立他的城邑与政治领域，并作为象征性礼物赐予皇亲国戚。到了地方上宗族进一步分支时，它们又成为沿着贵族线路传递礼物的一部分^②。

段勇根据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探讨了两代宗教信仰的特点与差异。他认为，兽面纹应是“帝”的象征，各种夔龙纹配置在兽面纹两侧可能代表了各方崇龙部落的从属于“帝”的象征。商周两代青铜器动物纹饰判然有别，商代青铜器特点表现为神秘、恐怖、威严、繁缛、凝重，而周代的青铜器纹饰则较为世俗、活泼和富丽。商代的祭祀周期往往长达一年，祭祀的神和祖先达上百位之多，显示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宗教特点。而周代对神的膜拜已经淡化，孔子所谓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敬鬼神而远之”的民生思想逐渐占据上风。由此可见，商人的宗教气氛更浓，更虔诚，而周人的宗教色彩较淡、较理性。因此，商人的宗教可以称为“巫”，而周人的信仰可以称为“礼”^③。

岳洪彬从殷墟青铜器的纹饰特点探讨了礼器的方向性问题。他认为，青铜器上的多组主题纹饰中有一组或二组的纹饰是正面纹饰，能够提供使用过程、摆放方式、铭文和铸造意图方面的信息^④。岳洪彬还对殷墟的青铜礼器进行系统研究，在过去分类、分期、器物组合、区域文化关系和金属成分研究的基础上，扩展到纹饰、祭祀和礼仪功能、地位、财富和等级象征等方面，并关注到“财富与地位差”的现象。他认为，殷墟为中心的晚商青铜礼器代表

①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考古》2002年第3期。

② 张光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见《青铜挥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③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岳洪彬：《殷墟青铜器纹饰的方向性研究》，《考古》2002年第4期。

了当时最高的青铜文明，对周边区域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使得这些周边社会文化逐步认同中原以青铜礼器为标志的商代社会制度、权威和观念，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

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指出，许多器物使人感到殷墟青铜器的母题及其象征性完全不是商人创造的，许多动物纹饰几乎都是南方的东西，是和周边地区短暂接触后的产物。成组青铜器上的纹饰及其复杂性是用来吸引注意力的，这些青铜器属于不同的个人，与不同的等级相对应，具备不同的礼仪功能。不同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器物的不同尺寸，如果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同时陈列在宗庙里的时候，它们占有的巨大空间及外观会显示出不朽的特征。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被用来满足拥有者对等级和所属关系的要求，它们不只是一种特别思维模式和信仰体系的产物，还是提供一个复杂社会使用的复杂工艺的产物^②。

7. 国家特点

李济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殷王室世系采取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最小的兄弟则将王位传给儿子。一直到周代，才确立了长子继承制^③。张光直推测，王室血统被分组成十个礼仪单位，分别以十干为名，王从各个单位中挑选，依其干名先后在其死后给他以谥号，并定期为他们举行祭祀仪式。王室世系以男性继承，并通过礼仪上得到认可的配偶把血统变得更具凝聚力。王室血统的家系中常有复杂的姻缘关系，常常是族内通婚。王位在不同的单位之间转换，从来不在同一单位内继续，为一种昭穆制，王室内十号宗族分为两组，轮流执政，或称为“轮流继承制”。除了王室血统和商王外，还有妇(王室的配偶)、子(王子)和官员们，他们当中许多人被授权建立城邑，开垦耕地。商王有足够的军队，并由商王本人、他们的配偶、王子和一般首领指挥。甲骨文中充满了征伐的记载，投入的人数从3 000到1.3万不等，有时一次可以俘获3万名俘虏，这些俘虏大量被用作祭祀的牺牲，祭祀为商王的统治提供强有力的心理和思想支持。殷商统治以商王直接控制下的众多邑

①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罗森：《晚商青铜器设计的意义与目的》，见《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李济：《安阳》(苏秀菊、聂玉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的网络体系为特点，商王直接控制的京畿地区叫“内服”，其较远的领地称为“外服”。游猎是商王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其踪迹遍布商王的疆域，但是从甲骨上记载的地名来看，主要集中在豫西泌阳一带^①。

与中国学者倾向于从考古发现的城址来和文献中记载的某个城市相对应不同，西方学者则试图从这些城址的规模、功能和分布来探讨中国早期国家究竟是“城市国家”(city-state)还是“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城市国家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政体，每个国家由一个城市核心与周边农业卫星村落构成。地域国家则由国王统治着一片范围较大的区域，形成与聚落形态相对应的省地级多层管辖中心。

梅塞尔斯(C. K. Maisels)根据马克思的亚细亚或农村—城市生产模式探讨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认为华北的黄土区的环境比较单一，当时政体的管辖和祭祀中心被一大批在相同土地上以相同方式从事生产的村落所包围，这种单一性经济基础形成的是一种分散和纵向的社会结构，缺乏那种生态和资源多样环境里形成的社会经济在横向上互补的有机结合。因此，中国早期国家的都城基本上是贵族世系之所在，当世系成为整个国家的凝聚机制，那么各城镇乡村也就这样组织起来了^②。因此，在梅塞尔斯看来，中国早期国家缺乏地域国家的那种凝聚机制。

索撒尔(A. Southall)也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模式来分析中国早期国家，指出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一系列总体上自治的地方共同体以一种礼仪和神祇的名义形成一种松散的联系，并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一般产生“散中心”(decentralized)的社会结构或分散型国家。他认为，中国的早期国家应该是城市国家，近年来考古发现的许多城址很可能是不同城市国家的中心。当这种散中心的政治体制不断发展，随着生产力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就会发展出世俗权力的君主。夏、商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轨迹，它们的城址基本上是礼仪中心，代表了一种“宇宙—巫觋”的象征系统，表现为宫殿、宗庙、祭坛沿中轴线分布的格局^③。

① 张光直：《商代文明》(毛小雨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② Maisels, C. K., *Models of social evolution: trajectories from Neolithic to the state*. *Man*, 1987, 22: 331—359.

③ Southall, A., *Urban theory and the Chinese city*. In Guldin, G. and Southall, A. (eds.), *Urban Anthropology in China*, Leiden: Brill, 1993, 19—41.

耶茨(R. D. S. Yates)也认为中国的夏、商比较符合城市国家的概念,这就是存在一个明显可辨的、由城墙和围壕环绕的中心,采取一种由周边农村维持的自给自足经济,与同一地区其他城市国家拥有相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但分享政治和主权的独立。他认为中国城市国家起源于二里头和郑州商城时期,它们是王权和祭祀中心,是统一宇宙观的象征,并成为后来千百年延续的中国政体模式^①。

但是特里格倾向于将商看作是一个地域国家,并同意邹衡的观点,认为商王同时拥有好几个不同的首都。商朝统治者可能采取的是一种流动的生活方式,经常迁都,在游历途中实施朝政、祭奠各方神圣、狩猎宴饮、帮助地方官员镇压反叛或抵抗外族的入侵。与张光直认为三代经常迁都是出于追求对政治资本铜、锡矿的控制不同,特里格认为这是地域国家十分典型的统治方式,因为当时技术的落后使得信息传递和交通十分不便,难以在一个中心对广大的区域实施管理。此外,因为在其管辖的地域内比较稳定,一些都城不筑城墙。地域国家的统治者经常将农民迁到人口比较少的地区,因此农业并不表现为强化的生产方式^②。

8. 社会性质

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理论,将商和西周定为奴隶社会后,奴隶社会的性质问题备受争议。如王礼锡认为,在中国古代,奴隶从未在生产上占过支配地位。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国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不必机械地在中国寻找奴隶社会这个阶段^③。胡厚宣也曾提出,殷代有奴隶,但是不能因此而将殷代看作是奴隶社会^④。冯汉骥支持胡厚宣,认为他的观点“自为卓识,可一洗将中国社会比附西洋社

① Yates, R. D. S., The city state in ancient China. In Deborah, N. and Charlton, T. (eds.), *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s: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7, 71-99.

② Trigger, B. G., Sha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9, 1: 43-62.

③ 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之谜的时代》,《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

④ 胡厚宣:《殷非奴隶社会论》,见《甲骨学商史论丛》,上海书店出版社1944年版。

会发展的通病”^①。但后来受意识形态至上的影响，不同意见难成主流。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说再次被提了出来。1979年，黄现璠首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论文^②，接着张广志也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③。到198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看法，美国学者特雷斯特曼(J. M. Treistman)指出，殷墟王陵大量用青壮年男子殉葬，常被作为商代属于奴隶社会的证据。但是，葬俗不能成为经济基础的证据。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商是一个在经济和农业上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④。吉德炜也指出，在商、周文字中没有“奴隶”和“自由民”的词汇和人口买卖的记录，因此商代社会不像是奴隶制的特点。把商代大墓殉葬的人牲看作是奴隶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人在殉葬前被作为奴隶劳力使用，殉人更多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关系、宗教信仰，表明这些墓主希望延续生前的生活，维持这些作为殉人的亲戚、侍女、卫士、奴仆和囚徒死后继续为他服务的关系^⑤。

特里格在比较早期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人祭人殉现象时指出，人祭常常是用来献给上帝和神灵，感谢它们超自然力量给世界带来的万物轮回和人间福祉。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奴仆，他们一切劳动都是为上帝服务的。殷商的祭品都是献给自然神灵和祖先亡灵，这些神灵根据献祭的程度来维持它们的力量，强大的神灵一般需要比其他神灵更奢华的献祭，殷墟祭祀方式除了人牲以外还包括食物、美酒和动物。在大部分情况下人牲应该是地位低下的囚徒、俘虏或异族成员，如殷商的人牲常常是外族俘虏。

① 冯汉骥：《自商书盘庚篇看殷商社会的演变》，《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第5、6期。

② 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

③ 张广志：《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④ Treistman, J. M., *The Prehistory of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New York: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2.

⑤ Keightley, D. N., *The Shang: the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dynasty*. In Loewe, M. and Shaughnessy, E. 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2-291.

但是就这些早期文明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制^①。

其实，奴隶和奴隶社会是两个概念，存在奴隶和奴隶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比如，古罗马和贩卖黑奴的近代美国存在奴隶制，但没有人将它们定性为奴隶社会。20 世纪的社会人类学也不认为早期文明存在奴隶就是奴隶社会。受苏联五阶段社会进化模式的影响，中国学者习惯于用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几个马克思主义概念来讨论社会发展及其性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简单定性。这使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影响如何左右着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学者生活和工作的社会环境，不但会影响他们所探讨的问题，还会使他们得出先入为主的答案。因此，学者们在了解过去的时候，不仅受到研究材料和研究手段的限制，还会受到社会意识和自己思考方式的制约。

9. 阐释

在从理论和社会发展动力上来探讨中华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方面，张光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提出的许多独特见解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比如，他认为夏、商的都城分布与铜、锡矿分布吻合，表明三代迁都与追逐矿源有密切的关系。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只是前赴后继的继承关系，而且是有所重叠的列国关系。三代的更替是它们之间势力强弱的沉浮而已。张光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是财富，而中国早期文明生产工具和技术并不发达，说明财富的积累和集中是依赖劳力的强化投入，而动用这种劳力只能依靠政治和宗教的手段来做到。张光直用美国学者塞维斯的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新进化论模式来阐释中国文明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他还引用弗兰纳利阐述的概念，将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和合法武力看作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并认为这些特点出现在夏、商时期。但是，夏、商时期虽见有合法武力的出现，但未见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②。

受张光直将三代迁都归因于对铜、锡矿追求的观点启发，刘莉和陈星灿根据对一些重要政治经济资源的分布以及交通运输来探讨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为了控制和获得这些资源而促成的区域社会的融合。为了控制这些资源，夏

^①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商的统治者逐渐建立起水陆交通运输网络，并通过对资源地的政治和军事控制来保证资源供应的畅通，从而逐渐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他们认为青铜器是权力斗争的手段，把三代都城的位置和相互征伐看作是对战略资源的控制^①。

刘莉还用国家和酋邦理论和聚落形态方法对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种动力阐释。认为中国的早期国家不是从复杂酋邦而是从对抗的简单型酋邦发展而成^②。二里头时期的贵族阶层为了控制标志地位和权力的青铜器生产，逐步建立起核心区 and 周边区两个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以保证信息的流通以及原料供应和产品分配。这种“世界系统”用祖先崇拜为特点的信仰体系从意识形态上确立其核心统治地位，而这种用青铜器作为象征的祭祀宴享仪式被周边的社群所采纳，这一过程反过来促成了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二里头时期的共同文化传统扩散和形成。刘莉认为，传统上所谓的“夏代”在它的初期并非是一种国家层次的社会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态要到二里头二期才明确显示。鉴于国家形成于对立政体的相互竞争和冲突之中，二里头的国家也应该诞生于众多酋邦的包围和对抗之中^③。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殷商的源流，它在酋邦和早期国家阶段应该一直是和夏处于对抗状态的一个政体，最后在竞争和冲突之中取而代之。

在一篇去世后发表的文章里，张光直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动力做了更明确的表述，认为文明是一个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一种质的表现，其关键在于财富的积累、集中和炫示。根据考古证据，他认为从仰韶至三代，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并不是伴随着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水利和灌溉的作用，而表现为阶级分化、战争、防御工事、宫殿建筑、殉人与人牲等政治和权力的强化。因此，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④。

①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② Liu, Li, Settlement patterns, chiefdom vari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tates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6, 15: 237—288.

③ Liu, Li,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如李宏伟撰文指出，张光直对生产工具的错误认识是文明起源理论的重大失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论述。她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 475 件青铜器中有 70 多件农具的事实，认为商代青铜农具应该从生产力上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推动作用^①。该批评的偏颇之处是，用商时期一个墓葬中发现的孤例来涵盖整个商代农具和农耕技术的普遍特点，并以此作为对商代生产力水平定性的依据，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何况当时江西新干是否处在中原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以内还是有问题的。白云翔指出，虽然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 21 世纪前后，但早于公元前 16 世纪的青铜农具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商代和西周的青铜农具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十分稀少，对当时农耕活动的促进相当有限^②。笔者对新干大洋洲出土的一些青铜农具的实物观察发现，不少农具铸有与礼器相似的纹饰，而且保留着明显的铸模痕迹，刃缘和器表面缺乏因使用所致的磨蚀和抛光痕迹。因此，这批所谓的农具和其他共出的青铜器一样，很可能也是一类象征性器物，而非实用的耕耘器具。就像许多铜钺并非真正的战斗武器，而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一样。从许多早期文明发展特点来看，剩余产品和财富的积累主要还是靠强化劳力的投入，青铜由于其原料的相对缺乏，主要被贵族阶层用来生产奢侈品，不可能大量用来制作农具并普及到底层的平民。只是到了铁器的使用，才真正能使金属工具的使用普及到生产农具层面，起到了全面推动生产力的作用。所以生产力不完全以农具和技术来体现，人才是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

特里格指出，出于分析概念不同，有些学者认为殷商是大型王国甚至帝国，控制着广泛的区域，经常讨伐周边的小国并强索贡品。而有些学者认为殷商只不过是一个酋邦，缺乏强有力的武力和统治机制，只能依赖统治者个人魅力、宗教制裁和赏赐来维持权力，维持社会组织机制的原则是血缘关系而非等级或阶级关系。他还指出，现在学界采用的多种术语如商文明、商时期、商民族、商代、商国和商文化是范畴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不能互换。

① 李宏伟：《张光直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得与失》，《河北学刊》2003 年 5 月。

② 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 年第 1 期。

商代国家也要比考古学定义的商文化和商文明范围小得多。研究商代国家好比盲人摸象，有些分析十分有用，但是有时却相互矛盾，对其政府形态的了解要比其他文明更少。但总的来看，商代政治发展层次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王朝时期的发展阶段相仿^①。

三、古史重建的思考

从上面对殷墟研究的回顾可见，传统途径和多学科综合探索的差异十分明显。传统途径一般关注史籍中的问题，以充实和考证史实为己任。而多学科的综合则以探索殷商整个社会状况为目的，而出土甲骨学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其字面内容，而是从这些内容来分析透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考古材料信息的充分提取再结合文字记载，可以从更深更广的背景来重建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经济生业、聚落形态、城址特点、人口规模、民族关系、社会结构、地位等级、专业手工业、意识形态、宗教祭祀等诸多方面细节，而社会人类学的社会进化理论则为探讨社会演变的动力和过程提供科学的阐释。从本文介绍可见，这些人类学导向的探究大部分是由海外学者或在西方工作和受训的中国学者尝试的，国内学者的系统和全面介入还比较有限。

对于如何重建上古史，自古史辨讨论以来一直争论不断。不少国内学者至今仍信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考古发现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有字的。有字的一类负载的信息更丰富。他们还认为，与历史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鲜明特色，这与西方考古研究与艺术史、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极不相同。他们还对中国考古学过分依附历史学，只有打破这一点才能吸收新东西的批评意见持否定态度^②。有学者仍然坚持，考古学是和文献学连在一起的，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材料来说明才有价值，二里头文化要用文献中的“夏文化”来说明才有意义^③。在这些学者看来，只要将地下出土材料用地上文献加以考订，就可以充分复原或重建上古史了。

正是这种对文字的过分偏信和依赖，使得这些学者对疑古思潮感到不快，

① Trigger, B. G., Sha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9, 1: 43-62.

② 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张京华：《20 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第 1 期。

因为它动摇了他们赖以重建上古史的根基。不可否认，文献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比物质遗存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可以直接提供历史信息，不必像考古分析只能用间接方法来推断。但是，不加审视地利用文献也会招来批评。这种以文献为导向的研究在三代研究中尤为突出，许多学者在夏商研究中以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对应。但实践表明，这些学者所信奉的方法并没有给中国的古史重建带来光明，而是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这种将考古发现和文献简单比附的例子在我们的研究中比比皆是：二里头文化被等同于夏文化，于是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墟”；二里头文化与先前龙山文化之间的文化中断现象被对应于“后羿代夏”的历史事件；登封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文献中提及的“禹都阳城”；偃师商城发现后，一些学者根据汤商“始屋夏社”和“尸乡，殷汤所都”的记载将其看作是汤都西亳。然而郑州商城的发现又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孰为“亳都”之争，结果有人提出“两京制”来调和。小双桥遗址被比附为“傲都”；安阳花园庄遗址则被认为是“河亶甲居相”的“相”。甚至有人以《尚书》《国语》《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提到的“桀奔南巢”“夏桀无道……避居北野”等为线索，以江淮地区薛家岗、寿县斗鸡台，和北方夏家店等遗址中出现的零星二里头特色器物为依据，认为江淮和晋、冀、内蒙古等地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时候应该就是夏、商分界。

事实上，新发现的考古遗址如果没有共出的文字证据，主观地将考古遗址与文献中地名对号入座完全是死无对证的猜测。目前研究就凸显了顾此失彼、自相矛盾和盲目跟风的弊病。这种简单比附、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可能为古史重建带来任何有意义的贡献，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济就批评了“惟有文字才有历史价值”的偏见，指出现代考古学的一切发掘就是求一个整体的知识，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宝贝。他认为，一切无文字而可断定与甲骨文同时之物，均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许多文字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土中情形便可察觉。他还强调了问题意识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性：“有题目才有问题，有问题才选择方法，由方法应用可再得新问题，周而复始，若环无端，以至全体问题解决为止。”^①遗憾的是，李济

^① 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安阳发掘报告》1930年第2期。

这种问题意识和追求整体知识，以及超脱文字来进行独立研究的科学理念，在后来的大陆考古实践中如果不能说基本缺失，也是十分薄弱的。

王汎森在论及中国近代新旧史料观时，也批评了文献为导向的古史重建。他将中国学者对文字资料的“迷恋”看作是清儒的治学方法，这种史料观认为只有记载在经书上的文献知识才是知识的源泉，将其他文献和实物看作经学之附庸。这些研究对象也许以后有独立的地位，甚至“婢作夫人”，仍然都是经学的“婢女”。王汎森认为，在这种范式指导下，所重视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文字中考证和判断，而不是去开发文字以外的新史料。这种研究即使下了极大的功夫，积累了极深厚的功力，许多问题还是无法得其确解。他还指出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局限性，高度评价了傅斯年和李济的贡献，认为史语所的方法与意趣已超出了这个范围，是中国古史界的一个重大突破^①。可见，对于那些至今仍坚持文献学导向、倡导用二重证据法来重建上古史的学者来说，其旨趣和眼界还不及 20 世纪初的傅斯年和李济，更妄论 21 世纪的国际水准了。

三代考古研究中对文献导向的执着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已引起了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反思，如水涛写道：

中国考古学始终是把自己的主要使命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范围之内，早年有所谓的证经补史说，现在有重建古史说。这种对于历史的使命感，或者说认同感，使考古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考古发现同历史记载或民间传说结合在一起，因而具有了在西方学者看来难以理解的所谓历史情结和考据倾向。特别是在夏商阶段的考古学研究中，这种历史情结表现得非常强烈，也因此引出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缺陷。现在，一些学者在倡导走出疑古时代，在大胆地肯定诸如《山海经》这样一些颇具传说性质的先秦文献的可靠性。即便真的如此，也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三代社会情况的记载，资料非常贫乏，完全不能适应考古学研究日益深化的需要。以商代都城为例，传统文献大多记载“商人屡迁，前八

^①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后五”，自王国维以后，历代学者对此都有非常精辟的考证。而实际考古发现却表明，商代自成汤以来的都城，有可能不限于五个地点。关于郑亳与西亳的争论，似乎焦点是在确认各自的合法性。……同样，关于夏代建国的问题，如果过分强调它的特殊性，也不合乎实际的考古发现所揭示的普遍现象。我们自己可能存在着中国传统观念里所谓正统与非正统的认识论缺陷，即重华夏而轻夷狄。……从这一点来说，西方学者所批评的历史情结问题的确有其针对性。不管有些学者在感情上是否能够接受这种批评，都必须清醒认识到，如果我们仍然按照这样一种传统研究方法去探讨三代考古的基本问题，还是不可能真正走出疑古，也将会陷入更多的争论之中。^①

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主要负责人许宏也指出，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的整合，实际上已成为困惑三代考古的一个敏感问题。把文献学的研究重点作为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在考古资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简单比附文献记载，将文献地名与考古发现对号入座，使这类论题处于一种聚讼纷纭，难以深入的境地^②。

美国学者罗泰指出，中国传统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器物铭文能够用来纠正传世文献中的错误，但是他们大部分的工作偏重于纯粹的考证。其实，对古代文献做严密的语言学和古文字学分析就能对它们的可靠性提供重要线索，但是这些方面的主要贡献却是西方学者做出的。由于受文献记载的左右，我们对黄河流域早期朝代国家的认识已造成了一种扭曲的图像，夏代的重要性可能因为它在史籍中的幸存而被强调得过头。如果独立于史料之外来进行研究，田野考古可能为之提供一种真正的新见解。中国的考古报告充斥了种种努力，常常是不大可信地将考古发现与历史事件、人物和族群拉到一起。他同意夏鼐的观点，应视考古资料为一种不同的“文献”，它们并不一定非要验证史料，而是要用一种新的途径来获取它们。罗泰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摒弃成见，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可以超越传统文献的局限，启示我们古史重建的新

^① 水涛：《近十年来的夏商周考古学》，见李文儒主编《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② 许宏：《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

问题，创造古史研究的新境界。比如，根据人骨材料做人口、年龄、性别、病理和聚落人口结构的分析，约略推断古代居民的健康状况，劳动习惯和饮食文化。聚落考古的动植物资料可以复原原始社会的生存资源和生态环境，这些信息关乎历史极其重要，绝不亚于文献记载的王公贵族和朝代更替。中国考古学应该从狭隘的编年史模式中解放出来，努力去寻找那些只有考古学家才能提供的证据，并使各种学科相互交叉。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类似世界上流行的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方法就会在研究中出现。到那时，考古学不再是为历史学提供材料的附庸，而是真正成为历史新知识的源泉^①。

许倬云也呼吁，考古资料和文献可以互补，中国考古学资料丰富，其中可以开拓的空间绰绰有余。我们不必囿于目前常见的课题，可以在许多未经耕耘的园地尝试前所未见的阐释^②。当代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多元方法的采用，完全可以超越文字记载来独立提炼信息，开辟我国科学重建上古史的康庄大道。

四、小 结

当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殷墟研究和考古学如何进行古史重建做一番思考：文献学导向的考古学研究究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康庄大道，还是越走越窄的死胡同。20 世纪初，文献学正是由于饱受疑古思潮的质疑和在研究上古史上的无奈，才从西学东渐的考古学得到了帮助，重获了生机。但是，在今天世界考古学已经发展成一个全方位的研究领域时，中国一些资深学者竟然仍试图将考古学捆绑在文献学身上，继续充当提供地下之材的工具。

夏鼐先生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起源问题一样，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只好主要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佐证^③。苏秉琦先生也说，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与现在的研究很不相

① 洛沙·冯·福尔肯霍森(罗泰)：《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季刊》1995 年第 2 期。

② 许倬云：《序》，见林嘉琳、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见《考古学论文集》(下)，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称。中国历史传统就是天下国。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有责任，考古学家也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口号，呼吁在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考古学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提出^①。

因此，21 世纪的中国古史重建不能再囿于“二重证据法”的范畴，不可能期望这项任务单凭两者草率兼容就能胜任，也绝不可能以文献学的价值取向为依从。我们应该放眼世界，学习国外学者如何重建他们的历史，看看他们如何研究中国的上古史，了解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正如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和巴恩所言，考古学的历史是新观念、新方法和新发现的历史，现代考古学根植于 19 世纪对三个核心概念的接受，即人类的古老性、达尔文进化论和三期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科发展的步伐加快，20 世纪下半叶的新考古学转而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试图解释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同时，田野考古也从时空研究上开辟了一个真正世界性的考古学^②。由此可见，世界考古学发展和学术定位一开始就从未将文献研究置于核心地位，而是努力发展各种理论方法来独立提炼信息，复原已逝的过去。我国学者自以为高明的所谓中国考古学鲜明特色，无非是传统国学自大而又狭隘的心理表现而已。在创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破除“天下国”的心态，了解和吸收世界学科的最新进展。如果我们能够借鉴国际上相关领域内的成功经验，从新的视野探究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动力因素和具体表现，有助于我们从世界标准来探究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重建 21 世纪的中国上古史。

致 谢

感谢韩进为殷墟发掘与研究的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付出的辛勤劳动。

（原刊《文史哲》2008 年第 3 期）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聚落考古与城市起源研究

一、前言

20 世纪上半叶，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定义考古学文化和建立文化的年代学上，也就是用物质文化来延长和补充编年史。这样一种以器物为中心的操作往往造成见物不见人，于是也在学界内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一批文化人类学家的倡导下，文化生态学理论开始影响考古学，这一理论的鼻祖是美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J. Steward)^①。斯图尔特将人类文化看作是一块“蛋糕”，技术经济位于最底层，中间是社会结构，上层是意识形态。但是，斯图尔特在这块“蛋糕”之下又加了一层“生态环境”，并将它看作是影响文化演变的重要因素。聚落考古的思维最早也是在斯图尔特的启发下萌发的，40 年代中叶，斯图尔特正在从事美国西部大盆地半定居印第安土著的民族学研究，跟随土著部落迁徙，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在不同地点废弃遗物的方式。他建议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 Willey)在考古研究中采取他对大盆地土著的研究方法，不只局限于研究一群人留在一个地点的遗存，而应当研究一群人在不同地点留下的遗存，也就是说要从人类栖居活动的形态来研究人类的文化。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威利首次将这一方法运用于秘鲁维鲁河

^① 朱利安·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潘艳、陈洪波译，陈淳校)，《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

谷的考古工作，起先，威利将聚落或居址形态看作是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反映，可以了解先民的文化生态学 and 适应方式。之后，威利超越了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原理，认识到聚落和居址形态在研究古代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演变上的巨大潜力。他将大约同时期的房屋、墓葬、宫殿、城堡以及灌溉系统拼复成一幅幅相互关联的功能图像，并从它们的历时演变来追溯该河谷中几千年的社会变化^①。因此，聚落考古学不但能够了解人类群体在不同环境里的适应，而且能够研究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探究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在文明和国家的探源中，城市的起源往往成为判断国家政体存在的证据。于是在一个区域中追溯从原始村落到城址的发展，可以追溯史前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轨迹。威利在聚落考古上的开拓性工作受到了考古学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考古学文化功能分析的战略起点”，以及自三期论以来考古学方法论的最大突破^②。

二、聚落形态研究

美国考古学家欧文·劳斯(I. Rouse)将聚落形态定义为“人们的文化活动和机构在地面上分布的方式。这种方式包含了文化、社会和生态三种系统，并提供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记录”。生态系统反映了人们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他还指出，聚落形态研究意在确定人类活动的范围，如从粮食生产到艺术宗教活动，并标示出这些活动地点的分布。它也要确定人们机构的分布范围，如从起居的住所到作坊和宗教场所，并将这些地点的分布表示出来，从而表明人们是如何参与各种活动的。然后，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不同地点的网络，将每个地点所从事活动的记录和机构性质结合起来，便是我们所要了解的聚落形态。如果从聚落形态来分辨文明发展的进程，需要分辨该人群的社会发展程度。劳斯指出，文明和城市化是不同的进程，文明是指一群人活动的发展，因而是文化的。而城市化是指一种机构的发展，

① Willey, G. 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ú Valley, Peru*,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ulletin 155, 1953.

②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2版)(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因而是社会的。对于从聚落形态来分辨文明的迹象，他提出了一个两分的标准，这就是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的分化。对于非文明的社会，聚落内居住的是单一的维生人群。当聚落形态显示专业人群的分化，出现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相互依存的共生状态时，应该显示文明进程的开始。这就需要我们分辨这些共生人群活动在聚落形态上的表现。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早期苏美尔共生人群都生活在城市中，专职人群在城市中心，而维生人群在城厢和郊区。中美洲古典玛雅专职人群住在祭祀中心，维生人群住在卫星村落中。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专职共生人群住在城市里，而大多数维生人群住在乡下^①。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B. G. Trigger)将聚落考古定义为：“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②与目前我国仍然流行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不同的是，聚落考古不是对我们所要了解的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关系方面做一些补充，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经济、政治和相关的功能系统来看待。特里格指出了聚落形态两种主要研究的方法，一种是生态学方法，将聚落形态看作技术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方法主要研究聚落形态如何反映了一个社会和技术如何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另一种是社会学方法，将聚落形态看作是史前文化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结构的反映。前者适合研究史前的简单社会，如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社会，而后者比较适合研究复杂的等级社会。

特里格提出了聚落形态研究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个别建筑。一方面个别建筑反映了当地的气候环境，以及技术和建筑材料所允许的条件。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特点，如在简单社会里只有一种非常单一的房屋类型，没有特殊目的建筑物。但是在复杂社会里，建筑物有明显的多样性，包括各种房屋、庙宇、要塞、墓葬和其他特殊功能的建筑物。而且房屋的大小可以反映家庭结构和组织形式，一些大房子及其结构可以反映社会等级制度，各种特殊功能的公共建筑也变得十分明显。如果这些建筑的功能可以从

^① 欧文·劳斯：《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潘艳、陈洪波译，陈淳校)，《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② Trigger, B. G., 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s and promise. *American Antiquity*, 1967, 32(2): 149-159.

考古学上加以确定的话，对于了解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层次是社区布局，一般来说社区相当于一个聚落或村落。社区的规模很大程度受制于生态环境因素，但是其布局则受家庭和亲属制度的影响很大，在原始的血缘社会中聚落形态的布局常以亲属关系的远近而聚合或进行季节性的分裂，内部建筑和结构区别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复杂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生活在仔细划定的区域里，不同的宗教群体和族群也可能如此。拥有财富的不同可以明显从这些不同群体所居住的房屋反映出来。此外，在简单社群的聚落里专门手工业生产可以在一个地点或村落的层次上发展，而复杂社会的手工业生产可能有更为严密的组织，存在集中的作坊和大规模的原料供应和储藏，并与市场和贸易网的安置关系密切。第三个层次是聚落的区域形态，在简单社会中社群和遗址的分布形态一般依自然资源和条件而定，如狩猎采集群的遗址一般集中在接近水源和食物资源比较集中的地方，而农业村落的布局取决于土壤的肥力和便于灌溉的位置。在复杂社会中，聚落的区域布局越来越多地会取决于经济和政治因素而非生态因素，聚落大小明显因为其重要程度不等而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特别到了国家社会，城市成为管理和维系周边农村的中心，而首都则可以从其规模和奢华程度来予以分辨，这种政治经济中心存在的宫殿和神庙反映了政治组织的规模。一个区域里一个大的中心和周围一大批中小型聚落的分布，反映了后者对于前者的从属地位。如果要研究一个区域里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可以将聚落形态的同时性和历时性特点进行整合研究，从而可以追溯其演进的具体轨迹，并判断其社会发展的层次^①。

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K. V. Flannery)在对中美洲和近东村落起源的比较研究中提供了许多启发性的见解，他注意到自更新世结束后村落在全世界各地逐渐独立出现，在近东大约出现在公元前 7500 年，安第斯山区出现在公元前 2500 年，中美洲出现在公元前 1500 年。但是村落、农业和定居生活这三个变量并非必然密切相关，农业不一定有定居生活和村落，定居生活不一定需要农业和采取村落的形式，而村落的存在不一定需要农业和全年的

^① 布鲁斯·特里格：《聚落形态的决定因素》，《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定居生活。比如，在近东公元前 8000 年的人们已经完全定居，但是缺乏驯养动植物的证据。在中美洲，人们在公元前 5000 年已经栽培了四五种农作物，但是在后来的 3500 年里仍然采取流动性很大的生活方式，无法定居下来。

弗兰纳利介绍了麦克尼什(R. MacNeish)对中美洲干旱高地游群聚落形态的观察。麦克尼什分辨出两种居址形态，一种是“大游群”营地，由 12~20 个人在某个季节的大部分时间里居住。另一种是“小游群”营地，由 2~5 个人占据时间从数天到一个季节不等，由于“小游群”营地中一般兼有男女使用的工具，麦克尼什称之为“家庭采集群”，而“大游群”营地则是某些地区在食物资源十分充足的时段里，由许多分散家庭阶段性聚合的场所。这种狩猎采集群缺乏领土概念，部分是因为资源的分散性和群体之间对其广泛分享的需要。

但是到了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集中在沼泽湿地或季节性泛滥冲积平原上，维护这些有限和局部的资源造成相邻群体之间的竞争，于是产生了社群领土所有权的概念。为了维护资源的所有权，农业社会一般有三种方法：(1)在关键资源区域里定居下来；(2)建立起一种栖居形态从“核心”地带到“边缘”区域的梯度；(3)形成一种继承的意识，强调代代相承来维护土地的所有权。

弗兰纳利还确立了早期农业村落的两种居址类型，一种是圆形房屋的住宅，另一种是由较大的方形房屋组成的真正村落，并具体总结了这两类居址类型所反映的社会结构。(1)一般而言，在新石器时代社会里每人的居住的房屋面积大约为 10 平方米。(2)圆形房屋往往为流动或半流动社群的居址特点(从统计学上的观察)；而方形房屋一般为完全定居社群的居址特点(当然存在许多例外)。(3)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考古学证据来看，有一种方形房屋结构随时间的推移取代圆形房屋的趋势(虽然也有相反的情况)。(4)尽管圆形房屋易于建造(常易于拆卸)，但是方形房屋更易添加房间，以适应不断扩大的延伸或宗亲家庭。在不分层的社会里，这种早期村落存在一个弱点，即当一个村落里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因矛盾和冲突而分裂，如亚马孙农业部落就缺乏一个维系不断增长的群体规模的政治机制。因此，复杂社会所需要的强化农业生产不是受制于他们拥有的技术，而是缺乏真正的权威。所以不分层的社会大都是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强化生产不在于新的农业系统，而是要么让人们多劳动，要么让更多的人劳动。弗兰纳利指出，村落社会的成功是

政治进一步演变的前提，后继的文化发展阶段——酋邦和国家是基于强化的生产、财产和地位的悬殊分化^①。

30年后，弗兰纳利根据新的考古资料对上述的观点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正，认为采用一种模式来解释一种居址形态取代另一种的理由看来过于简单了，两种居址策略很可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来调节变异很大的不同条件和变量，而且这种取代在情况发生变化时会发生逆转。此外，从史前村落的发展来看还有一个重要的社群发展阶段：经济专门化。比如，在秘鲁沿海的考古遗址后来出现了农人、渔民、编织工匠、陶工和金属工匠的居址。而古典期中美洲的城市特奥蒂卡坎有专供专业陶工、陶俑工匠、黑曜石工匠等专职人士生活和工作的区域。在美索不达米亚专职陶工绘制他们的产品会留有以供分辨的标记。而在幼发拉底河的早期城市里有农人、牧人和渔民的生活区。弗兰纳利将这种生产专门化导致的居址形态的发展称之为继圆形房屋向方形房屋村落发展之后的第三个阶段——一种从核心家庭向延伸家庭的转变，其较大范围的劳力组合标志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多种经济的发展^②。

就聚落形态而言，部落社会因其经济上自给自足和政治上自治的性质，使得地域上的聚落布局呈均匀分布的状态，大小基本相差不大，没有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或经济中心。到了酋邦阶段，由于部落的聚合使得一些起管辖和再分配作用的聚落成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因此聚落形态至少出现两个层次的等级^③。此外，酋邦在聚落形态上还表现为出现了大型的建筑物，特别是那些从事宗教活动的祭祀中心，其数量一般少于聚落的数量，而劳力投入则需要多聚落之间的合作。

早期国家的管辖和聚落层次超过了酋邦，弗兰纳利指出，近东的酋邦一般表现为二到三个聚落层次的等级，而早期国家的聚落层次至少有四个等级：

① Flannery, K. V., The origin of the village as a settlement type in Mesoamerica and the Near East: a comparative study. In Ucko, P. J., Tringham, R. and Dimbleby, G. W. (eds.),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23—53.

② Flannery, K. V., The origin of the village revisited: from nuclear to extended households. *American Antiquity*, 2002, 67(3): 417—433.

③ Creamer, W. and Haas, J., Tribe versus chiefdom in lower central America. *American Antiquity*, 1985, 50(4): 738—754.

城市、镇、大村落和小村落。他还指出，“管辖等级”和“聚落等级”含义并不相同，前者指社会系统管辖级别的数量，如果没有文献资料的帮助，一般很难从考古学上进行分辨；而后者是指社群规模级别的数量，一般可以从聚类矩形图上或从考古学对一些建筑发掘所显示的不同级别的管辖机构上反映出来。比如，墨西哥萨波特克(Zapotec)地区最早可以明确分辨的国家(100B. C. ~ A. D. 100)表现为至少四个层次的遗址等级。最高等级是首都，拥有一处大型的“政府宫殿”、一处祭祀广场、多处寝宫和王室墓葬、多处标准神庙、一处以上的球场、一座用象形文字记载下属省份的建筑。次一等级的遗址拥有规模较小的“政府宫殿”、数量较少的庙宇、较少的寝宫和墓葬，只有一处球场。再次一等的遗址只有一处庙宇，没有宫殿、祭祀广场、球场。最低层次的遗址没有任何公共建筑。在萨波特克腹地的瓦哈卡河谷(the Valley of Oaxaca)估计有41 000人分布在518处遗址中。首都占地416公顷，人口约14 500人。下一等级的遗址共有6个镇，人口约970~1 950人，他们分布在首都周围14~28千米范围以内。再次一等的遗址由至少30个占地5~10公顷、200~700人的“大村落”组成。最低层次的遗址由400个以上不到200人的“小村”组成。

在玛雅低地，由于拥有象形文字资料，早期国家的聚落形态和遗址等级的考古学分析可以得到文献的佐证。玛雅城市卡拉克姆尔(Calakmul)是中心等级之首，周围有6个次级镇以相等距离呈网格状分布，这6个镇之间大约以34千米的相等距离相间隔。各个镇也被若干大小村落围绕分布。在中心城市卡拉克姆尔和周边的镇之间有一系列道路相连。这些从属的镇在它们的铭文中都有标志卡拉克姆尔的徽号雕刻。弗兰纳利认为，如果聚落形态研究发现四个层次的遗址等级，特别是表现为一种围绕一处主要城市呈网格状分布，那就是标志一个国家存在的线索^①。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总结了研究复杂社会聚落形态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其中“中心位置理论”认为如果自然条件分布均匀，那么聚落分布模式是应该十分规则的。相同规模和性质的聚落和城镇会呈等距离的分布，一些中心会被次一级的中心所围绕，而后者本身周围也会有更小的

^① Flannery, K. V., The ground plans of archaic states. In Feinman, G. M. and Marcus, J. (eds.), *Archaic States*,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8, 15-57.

卫星村落分布。在一种完美的条件下，每个中心控制的地域呈六边形，而层次不同的中心会组成一种错综复杂的聚落网络系统。“遗址等级分析”可以根据遗址的大小排列成等级的次序，然后用柱状图加以表示。在一个聚落系统中，中小村落和居民点一般要比大的城镇多得多，因此柱状图可以用来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社会类型的遗址等级进行比较。比如，在狩猎采集社会里，遗址规模基本相同，变异很小，另一方面国家社会就会有城市、镇、大村落和寨子这样的规模差异，这种聚落形态结构和遗址等级就是社会结构以及复杂程度的反映^①。

三、城市与都市化

城市和都市化是复杂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常常集中在城市的性质方面，而考古学在研究一个大型遗址时经常会涉及判断其是否是一个城市的标准问题。由于早期文明或国家的城市与后来的都市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将最早的城市和先前的中心聚落区分开来，是考古学必须仔细加以解决的问题。在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中，讨论城市的形成机制以及主要的特点是国际学界最为关心的课题。

城市(city)和都市化(urbanization)是两个常常可以互换的术语，在中国的文献资料中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欧美的术语中，城市是指表现有许多都市特征的聚居实体；都市化是指具有许多与简单社会居址不同特征的聚落形态，不但具备都市社会的结构，同时还表现为维系周边镇和村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早期的城市根据其形成的过程和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而被认为有许多不同的形态，如大部分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是人口聚居的中心，并没有仔细安排和规划的城址，然而我国华北和印度河谷的早期城市的布局比较规范，有仔细安排和规划的城址。在古埃及，并非所有城市都是大批人口聚居的中心，有些城市拥有大量的祭祀建筑但是居民数量很少。在尼罗河谷，这些祭祀中心是权力之所在，发挥着和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同样的政治聚合功能。同样，在爱琴海克里特岛的迈锡尼文明中，发现的许多宫殿并不位于拥有大量人口的聚居中心，但是它们发挥着一种将社会聚合和组织起来的世俗统治中心的作用。

^①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世界各地早期城市有不同的形态，但是作为一个城市的主要特点还是有较高的人口密度和较大的占地面积，雷德曼认为城市区别与镇等居址的人口底线应该在5 000人，尽管存在有更多人的聚集却不一定存在城市的聚合特点，而人数较少的社群反倒具备了所有必要的都市特征的可能。定义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应该是它的复杂性和聚合形式，城市不单单是有密集的人口，而是在于人口或职业的多样性，以体现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和相互依存，这是城市区别于简单聚落形态的关键所在。他指出，大部分的城市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具有大量和密集的人口；(2)复杂而相互依存；(3)具有正式和非个人的机构；(4)存在许多非农业活动；(5)兼有为城市和周边地区社群提供的各种服务^①。

20世纪50年代，柴尔德(G. V. Childe)曾提出了10项从考古学上界定城市的标准。他指出，要对城市进行定义是极其困难的，从历史或史前史的角度来定义城市，意味着它是一种“革命”的结果和象征，它开启了社会进化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他将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看作城市起源的重要因素，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进程大约在5 000年前的尼罗河、两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开始出现社会剩余产品的积累，足以供养不必自己从事粮食生产的定居专职人士。同时依赖灌溉使得这些地区的耕地限制在容易获得水源的地区并防止洪水泛滥的威胁，使得人口的聚集成为可能。这就最终导致出现了比新石器时代村落大十倍的聚落单位——城市。城市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聚落单位，柴尔德将标志城市特点的10项标准描述如下：(1)城市的规模和密度要比任何先前的聚落来得大，虽然它可能比现代的许多村落要小得多，如苏美尔城市的人口在7 000到20 000人之间；(2)城市人口的结构与任何村落不同，很可能城市的主要居民还是耕耘周边农田的农民，但是所有城市存在自己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职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吏和祭司；(3)每个基本的生产者都必须以向神祇和国王进贡的形式交付一定的税赋，后者成为剩余产品的集中管理者；(4)出现了宗庙、宫殿、仓库和灌溉系统这样的纪念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劳力工程，以区别于一般的村落，并且是社

^① Redman, C. L.,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78.

会剩余产品集中的象征；(5) 出现了一个完全脱离体力劳动的宗教、政治和军事的特权统治阶级，阶级社会成型并实施对社会的组织和管理；(6) 为了提高管理效率、记录税收导致文字的发明；(7) 农业和宗教活动的需要导致数学、几何、历法和天文学等科学技术的产生；(8) 由专职工匠生产的标准化的和高度发展的艺术品，成为体现地位的象征并体现美学意识；(9) 生产专门化和交换扩展到城市范围以外的地区，导致长途贸易的出现；(10) 出现了按居住方式或职业范围而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机构取代了基于血缘关系的政治认同^①。

虽然柴尔德提出的 10 项判断标准被考古学界广泛引用，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这 10 项特征在早期城市形成过程中并不一定同步，而且每个特征的重要性在不同功能的城市形成中也存在一定差异。比如，许多早期国家和城市并不一定出现了文字、数学和天文知识。所以，针对具体案例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以便能够了解某个城市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和所发挥的具体功能。莫妮卡·史密斯(M. L. Smith)认为，如何认定一处聚落已经到达城市的标准即使在现在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古代了。今天对城市的界定一般根据人口统计和经济发展状况，对古代城市的界定一般较难做到。因此，无论对于现代还是古代城市一般根据集中的人口、多样的经济、专门的社会和宗教活动来予以判定。量化的参数如人口、密度和占地面积等是有用的衡量标准，质量的参数如城市和农业活动的差异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②。

杰弗·恩布林(G. Emberling)提出城市的三重特征。一是专业化的社群，这种职业和社会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被亚当斯认为是城市起源的主要机制。二是人口聚集的中心。三是居民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城市必须考虑包括占地规模、人口密度和周边聚落的关系在内的几项关键要素。一个城市不可能独立存在，它的形成、发展、运转和功能有赖于与周边城镇和农村的依存关系。在考古学的观察上，这些学者也更注重遗址所反映的社会内部结构。比如，

^① 戈登·柴尔德：《城市革命》，见《考古学导论》(安志姆、安家瑗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② Smith, M. L., Introduc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Book, 2003, 1-36.

近东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的杰里科(Jericho)(10000B. C. ~8500B. C.)遗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它占地面积2.5公顷,遗址周围有石砌的高墙和望塔。然而从内部居址特点来看,分布多为单间的住宅,房屋和墓葬没有等级差别,也不见手工业专门化的迹象。发掘者基扬(K. Keyon)认为高墙是为抵御外敌而建,而巴尔-约瑟夫(Bar-Yosef)认为可能是为了抵挡洪水。虽然从外部特征来看,该遗址确实很像是一座城市,但是从社会复杂化和都市化的标准来看,它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城市。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是专业人群的聚居处,它们形成于乌鲁克时期,统治者、祭司、商人和工匠构成了城市独特的群体^①。

到了国家阶段的城市,特别是首都往往会显示最高统治者地位的特点,庙宇、宫殿和墓葬都会表现出反映统治阶层地位、权力和宗教信仰的大量劳力和资源的投入。比如,玛雅的昌昌(Chan Chan)是奇穆(Chimu)王国的首都,它建有10个高墙围绕的城区,占地6.73到21.2公顷不等,9米多高的围墙内有113到907间不等的房屋和其他设施,如广场、仓库和皇室墓地。还有一种被称为“U型房屋”的特色建筑,其宏大的规模、复杂的结构、华丽的装饰表明它们可能是奇穆国王的宫殿。这种高墙建筑的城市形成于公元前750—公元前600年,即奇穆王国和首都格局日趋完备的阶段^②。

莫妮卡·史密斯把城市看作是社会日趋复杂过程中随机出现的少数结节或中心点,以维持社会网络的稳定性。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城市便成为一种将无数农村和边远地区人群联系到一起的途径。因此,一处城市从本质上说是构建和促进人际沟通的手段。城市在社会政治日趋复杂化和人口分散的区域中成为维系社会网络的中心,它们在诸如防卫、祭祀和经济等因素的刺激下显示出社会交往和信息流通上的便利和重要价值。古代城市常常被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是政治等级和人口集中并不总是能直接

① Emberling, G., Urba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First City”—new research from Mesopotamia.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Book, 2003, 254—268.

② Moore, J. D., Life behind walls—patterns in the urban landscape on the prehistory north coast of Peru.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Book, 2003, 81—99.

对应。在古代社会里，城市的存在并不需要国家层次的政治结构，它们只需较大的劳力投入和发挥维系社会网络的功能便会形成。一旦城市生活的价值被不利条件所压倒，城市便会迅速瓦解。在古代，城市和国家常常相互交织，学者们从城市劳力的投入和城市结构来定义国家甚至帝国^①。

在一篇新发表的论文中，史密斯根据印度次大陆的案例进一步强调，人口集中的城市并不必然与大型的政体相关。她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看待城市，认为城市可以在国家政体形成之前就能形成，并在国家政体崩溃后仍然存在。她认为可以用质与量的标准来定义城市：一方面，如果一处遗址有大量人口聚居的证据，即使其内部功能契合程度较低，也能定义它为城市；另一方面，有些遗址即使人口较少、占地面积较小，但是存在内部高度特化或多样化的功能契合，也能定义它为城市。她试图改变学界将城市看作是基本由贵族居住和控制的地方，强调城市和人口聚居中心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认为城市是为许多个人和团体提供成功机会的地方，是社会不同阶层谈判、协调和达成共识的产物。城市的长期的稳定性与政体短命的轮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可以超越政体的兴衰而长期存在和发展^②。

沃尔卡(Warka)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最大的早期城市，占地面积约 80 公顷，人口估计约一万人，考古发掘的两处宗庙区显示，阿努(Anu)塔庙是由一系列的建筑组成，经由历代修葺到乌鲁克(Uruk)时期形成了目前所见的规模。其中白庙(White Temple)保存最为完整，它的基座是由复杂的工序用砖砌成，建筑长 22.3 米，宽 17.5 米，三重台阶，内部结构包括一个长形的祭祀房间和两边的一排小房间。该庙是祭祀苏美尔人的主神——天神(Sky God)之所在。阿努神庙的建筑群每年大约需要 7 500 人的劳力，其设计规划、营造技术、投入劳力以及反复的修缮，表明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统治阶级控制着可

① Smith, M. L., Early walled cities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s “small world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Book, 2003, 269—289.

② Smith, M. L., The archaeology of South Asian cit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6, 14(2): 97—142.

观的经济资源、劳动人口和具有专业技术的工匠^①。

特里格讨论了早期文明中城镇的特点和从考古学上进行判断的依据。他指出，考古学家一度认为没有一个文明不存在城市，然而有许多早期文明的城市实际上是仅仅居住着少数祭司的“祭祀中心”，居住在周边的人们定期聚集到这里进行宗教活动。城镇也曾被定义为非农业人口的聚居地，人口规模至少达到5 000人或每平方千米386人。然而，欧洲中世纪许多法定的城市只有数千人，而东欧和意大利许多农业村落人口则是这些城市的好几倍。在许多早期文明和前工业社会里，大量的农业人口居住在都市中心。近至1910年，开罗人口的10%是由农业人口组成。因此特里格认为，定义城市的关键应该着眼于那些联系周边广大农村、发挥一系列特殊功能的特征。早期文明被用城市来定义的范畴中，最大的一类是城市国家(city-state)的首都或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的首都和省会。在它们之下是缺乏特殊功能的镇和村。然而，城、镇和村的分类至多只是人为根据聚落形态大小和功能级别所定的主观单位，而不是从结构或功能上进行定义的实体。无论城市具有何种功能，它们是早期文明社会中上层阶级以及非农业人口居住的地方。它们往往是高级的政治和管理中心，主要从事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商贸、长途贸易、高层次教育、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地方。除了很少的例外，重要的庙宇、宫殿和公共建筑都位于城市中心，而这些中心人口所需的粮食有赖于周边农村的供应。重要城市都以它们的规模、富有、庄严和宏伟建筑物令人惊叹，这些特点都强调普通人的渺小和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地位以及超自然力量的伟大。有人将早期文明城市的起源归因于宗教的功能，其实这一看法与考古证据不合，特别无助于区分其在宗教、管理和商贸上发挥的作用。

特里格指出，在一些主要中心里集中各种特殊功能能够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比如，长途贸易者和专职冶炼工匠居住在同一个社区里，这对于工匠来说很容易从贸易者那里获得原料，并将他们的剩余产品通过贸易渠道出售。这种不同功能的聚集对于统治阶层而言也提供了方便，他们能够很容易获得想要的物品或服务，并能够监控各种专门的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权力和福利。

^① Redman, C. L.,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78.

每个城市国家的最大社群总是位于城市的中心，这种中心位置可以降低在政体内部和外部运输和交流的代价。有些城市国家，特别是那些比较小的和高度集中的国家，只有一个管理中心。较大的或聚落形态比较分散的城市国家，其首都会有次一级的管理中心，以大约 10 千米的间距呈卫星状分布，而次一级的管理中心又被第三级中心所围绕。地域国家会存在层层相套和呈等级的无数中心，等级越高的中心数量越少，而公共建筑越大，表明那里居住的人地位越高。庙宇、宫殿和市场也会随中心聚落等级的下降而规模变小或缺失。提供服务人员或侍从往往居住在他们主人的附近，使得城市出现贫富区域的划分^①。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早期农村为了防御劫掠会建筑城堡，但是单凭城堡尺度和体量的扩延不能使乡村变成城市。古代城市与农村社会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协调等级的社会，其组织方式完全是为了满足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已不再是一些卑微家庭互助共生的社会。他认为，古代城市始于一些神圣的地点，较周围的农村地位优越。古代城市在形成的时候把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分散机构集中到一起，并圈围在城墙之内，促使它们相互作用与融合。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与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其产品变为可储存与复制的形式。通过其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序的风俗与交际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能够将其复杂的文化代代相传。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些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类的智慧与力量。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围形，化能力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这一直是城市赋予我们最大的贡献^②。

四、中国学者的标准

中国学者倾向于把古城看作是城、乡初步分化意义上的产物，把古国看作是高于氏族部落的独立政治实体^③。然而，人们在城市的定义上常因汉

^①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龄、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曲英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

语“城”与“市”的结合而多歧义，有学者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高度复杂的聚落形态，是有别于乡村的一种地域单位，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复合有机体。不能将“城”和“市(场)”的结合看作是城市出现的标准，因为很难说在城出现之前就没有市场，也不能说发挥特殊功能却没有市场存在的中心聚落就不是城。他们提出了判断城市的三项标准：(1)城市应当是具有多种职能的复合体，不像早期农村只具备单项的农业职能；(2)空间结构、布局和功能分化，体现城市是人口、手工业生产、商品交换、社会财富、房屋建筑和公共设施集中的场所，以适应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需要；(3)城市应当表现人口多、密度高、职业构成复杂，相当成员从事非农业的经济、行政和文化活动。他们认为不能仅仅将夯土城墙的出现作为城市形成的标志，而要看这个遗址的内涵是否达到了从事城市活动的条件^①。这种观点十分接近西方在定义城市时，把城作为一个自然实体和都市化特点之间区分开来，表明我国学者强调社会复杂化的内涵，避免单凭一些简单表征来判断城市形成的正确思考。

张光直赞同傅斯年等学者的看法，认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的最早城市在很多方面显著不同，中国早期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和象征。他进而根据商代考古材料列举了早期城市的主要特点：(1)夯土城墙、战车、兵器；(2)宫殿、宗庙和陵寝；(3)祭祀法器包括青铜器与祭祀遗迹；(4)手工业作坊；(5)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而西方文明史上的最早城市一般以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市乌鲁克为代表，这个时期的城市遗迹中出现了三项新的重要文化成分，即巨大的庙宇建筑、圆柱形印章和楔形文字。这些新文化成分的出现，充分反映了当时经济贸易活动的起飞^②。

目前我国考古界从田野发掘中判断一处遗址是否是城，习惯上以是否有墙为依从，所以比较容易引起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是城市就必定有城墙，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城墙是一种防御性设施，城市的特质是在于具有作为政治中心的“都邑”地位，它和有无城墙并无必然关系。中国的早期城市可

^① 高松凡、杨纯渊：《关于我国早期城市起源的初步探讨》，《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

^② 张光直：《青铜挥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以既无城墙，也不一定有市，它们一般是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聚落形态。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的商贸并不发达，因此不适宜过分强调中国早期城市的商贸功能。中国早期城市一般表现为三个特点：(1)作为邦国的权力中心而出现，具有一定地域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功能，考古学上往往可见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垣；(2)因社会阶层分化和产业分工而具有居民构成复杂化的特征，存在非农业的生产活动，又是社会物质财富集中和消费的中心；(3)人口相对集中，但是在城市的初级阶段，人口的密度不能作为判断城市的绝对标准。我国学者还发现，中国尚未发现早期城市是从原始中心聚落直接演化而成的证据^①。这一观察表明，城市确实不再是农业聚落那种纯粹对生态环境适应的产物，而是脱离了基本生存适应功能的更高层次上的聚落或政治管辖中心。

石兴邦指出，从中国历史传统而言，城市是国家的心脏和神经，是社会运转的动力和枢纽。然而，就考古学的“城址”而言，则是多属性的，如要确定某个城址是否是城市，需要科学地界定其内涵和性质。有防御设施的史前聚落或城址有可能只是单功能的生存单位，内部社群结构简单，生产和消费基本是内向和自给自足的。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城市应该是打破血缘关系，以政治、社会等级和疆界等因素构成的体制，经济上以横向沟通的生产关系来维持。所以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城市是集政治、经济、贸易、宗教和军事等社会职能于一体，并以市场和服务维系着周围的聚落族群^②。

钱耀鹏认为，有城墙的聚落往往被称为城址，但是未必是城市，而城市也未必都有城垣。这往往成为认识史前城址性质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城墙或城垣不能作为城市的根本标志，但是古代城市大多有城墙则是不争的事实。修筑城墙毕竟体现了当时社会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如冲突加剧和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的提高。而伴随着聚落形态分化和社会等级而产生的城乡分化意义上的城市，则和文明和国家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呼吁在城址考古的田野工作中应该在分辨城墙或城垣的同时，

^①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石兴邦：《序》，见钱耀鹏著《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也应关注城址内的社会等级和功能区的分化以及反应城乡之间分化和相互依存的证据，这样可以使城址研究和文明起源研究更有成效^①。

我国学者分析早期城市的思路已经十分接近国际学界的一些流行看法，如果能够更多借鉴国际上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探索方向，可以开拓我国早期城市研究的视野，获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城市和都市化研究是社会复杂化和国家起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探索城市的起源涉及许多变量，包括人口、经济基础、社会结构、贸易、信息处理以及战争等因素，有许多重要的信息难以直接从考古材料中进行观察和评估。考古学分析不仅要确定促使城市产生的那些变量，还需要弄清这些变量的相互关系。比如，人口规模普遍被看作是城市的重要特征，但是现在仍不清楚的是，究竟人口的规模和密度是城市形成的先决条件呢，还是都市化的进程为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和集中提供了条件^②。因此城市和都市化起源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协作探究。考古学家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城市的占地面积往往占地很大，加上都市化研究需要了解城市形成中与周边城镇和村落的关系，需要发掘和勘探的面积非常之大，局部观察往往是难窥全豹，而且需要对一些证据进行仔细的量化分析才能看出它们的演变和内在联系。徐莘芳先生也提到，先秦城市研究的最大困惑是许多城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彻底，无法提供研究所需的资料，对城内的遗址情况所知甚少，很难做深入研究^③。所以，城市研究比新石器时代一般聚落的发掘需要有更明确的探索目标，为采集必要的证据做精心的研究设计，在大型城址无法做全面发掘和揭露的情况下，采取将定点发掘和概率性勘探相结合的策略，以便了解和弄清城址中心区域和各组成部分的布局、甚至需要涵盖周边卫星镇和村落的分布和结构，通过仔细采样的数据分析来了解城市的性质和功能。中国早期城市研究不仅要关注早期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也应当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了解区域都市化的进程。

五、三处早期城址的探讨

1983年发现、1993年发掘的河南郑州西山城址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

①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Adams, R. McC.,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Chicago: Aldine, 1966.

③ 徐莘芳：《序》，见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

类型遗址，因为存在夯筑的土墙，因此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城址。西山遗址依山傍水，最大径 180 米，面积约 3.4 万平方米，不但小于后期的城址，而且小于同时期的一些村落遗址。围墙的形状不规则，内部房屋以两三间成排分布，多是 10 平方米左右的圆屋，最大一座房子约 100 平方米。从出土遗存来看，大多为生产生活用具，墓葬无随葬品，并有尸骨不全和身首异处的埋葬。研究者认为该城址是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体现，是统领一方的聚落中心，但不是统治一方的政治中心^①。对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分析，为了解该遗址的环境、生计和社会发展层次提供了某种参考。比如，当时的西山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与今天的长江流域相仿。当时虽然粟类栽培和猪的饲养是农业经济的重要基础，但是早期对野生资源的依赖仍然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栽培作物和牲畜的依赖逐渐加大。总的来说，当时的经济形态还是农业和狩猎采集大致并重^②。

根据上述中外学者对早期城市的论述，西山遗址虽然筑有城墙，然而从遗址内聚落形态的特点，结合随葬品特点分析，社会地位等级分化或复杂化并不明显。比如，大多数房屋为 10 平方米的圆形房屋，与其他仰韶文化早中期的房屋相仿，并与美国考古学家弗兰纳利描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屋相吻合。这种房屋似乎更像是单人的宿舍，而非核心家庭的居所。因此，这种夯筑土墙的聚落很可能只是一处防御性的聚居点，难以被看作是统领一方的中心，该遗址与同时代的半坡与姜寨并没有什么区别，血缘和宗族关系可能是构成仰韶文化社群的主要基础，基本上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或生计，表现为原始农耕与狩猎采集互补。从房屋的结构结合墓葬的特点，稳定的家庭结构似乎还不明显，因为人们的居所基本上是半地穴式的圆形小屋，不大适合一家几口的家庭共同居住，墓葬不是单人葬就是多人二次合葬，不见有以家庭为单位的葬式，而大房子的结构看来是议事和举行祭祀议事的场所。这样的社会应当出于原始平等社会，内部还没有等级的分化，部落首领可能由年长的族长担任，各种事务通过族内协商解决，这些首领无论在财产还是在居室上都和一般成员没有区别，因为从考古学上无法见到这些首领专用的居所和特殊的葬俗。非正常死亡的埋葬

① 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性质》，《华夏考古》1997 年第 1 期。

② 陈全家：《郑州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学报》2006 年第 3 期。

很可能是劫掠或族群冲突的牺牲者，这也为建造围墙的目的与用途提供了证据。特别是遗址中缺乏等级、职业分化、财富和象征权威的证据。根据芒福德筑墙并不能使村落变成城市的论断，西山遗址很难被看作是一座城市。在这点上，上面提及的世界最早城址近东杰里科遗址的分析和判定值得我们参照。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学界探寻夏代的焦点，其分布面积约3平方千米，遗址区发现有各种建筑，包括下层平民居住的半地穴式窝棚、平地而起的单间和多间房屋，还有宏伟壮观的宫殿或庙宇。手工业作坊种类齐全，规模大，主要从事青铜冶炼、制陶和制骨。高级墓葬出土象征王权的礼器和精美陶器。能够表现为王权存在的是宫城遗迹和青铜爵、斝、铃和绿松石镶嵌铜牌等显赫物品。发掘墓葬达数百座，但大多数为中小型墓，高规格墓葬仅见一座。二里头遗址被誉为“中华第一王都”。

2007年在浙江杭州余杭区发现的良渚古城是近年来令人瞩目的重要考古发现^①。据发掘调查，良渚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为墙基，上面堆筑较为纯净的黄土，墙基宽度达40~60米，墙高在某些地段达4米。城墙内外有水系分布，城外水系较大，为湖泊状，城东北、西北和南部有古河道通进城内。城内分布着莫角山祭坛，面积达30万平方米，高约10米。莫角山东侧有龙里和大山等大型土台，西北角为反山贵族墓地。城外有瑶山和汇观山等贵族墓地，分布着一些大型聚落。良渚古城被认为是龙山时期中国最大的古城^②。

良渚古城的定性也存在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认为，良渚时期这一地区的地貌主要为小丘点缀的沼泽平原，阡陌交错、河流纵横，这种地貌如何营建延续几公里的城墙^③。林华东也对城墙提出许多疑点，如西南角城墙在风山脚下经过，从防御角度而言不合情理，这会便于敌人居高临下的观察和攻击。作为墙基的石块大小较为一致，棱角分明，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史前期，开采石料谈何容易？墙基宽度达40~60米，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② 郑好、高蒙河：《长江流域史前城址特征》，见《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6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 佚名：《“良渚古城”拷问学术良知》，《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2008年5月3日。

从一般比例估算，墙高也应有 10 米，这种巨大工程在当时是否有可能和必要？林华东指出，良渚古城所在位置紧邻东苕溪，河床又窄又高，历史上经常发生洪水，是闻名遐迩的“西险大塘”，宋代和明代都曾在此修建堤塘大坝以抗洪灾。墙基的这些石块明显有金属工具开凿的痕迹，很可能与修建这些堤塘大坝有关。该地区的水灾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治理才得到控制^①。罗以民从城墙石块的开采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观察到这些石块都重三四十斤，刚好是一个人能够扛动的重量，主要是灰岩，还有摩氏硬度在 5~7 级的火山岩，在今天也要用钢钎和 18 磅(1 磅=0.453 6 千克)大锤才能凿开。西城墙墙基一块被铁器凿开的石块的断面还很新鲜，与瓶窑南山宋代采石场开凿的石块风化程度相仿。因此，良渚时期能大规模开采这些石块令人无法想象。罗以民还指出，良渚城墙外墙缓、内墙陡，外墙坡度仅 30°，内墙为 45°，这不像是城墙的坡度，倒很像是水坝的坡度。因此，罗以民认为良渚城墙并不存在^②。

从西山和良渚的两座史前城址的判定来看，中国早期城市的考古研究还是以城墙为标准，缺乏社会内在特征和环境历时变迁的综合考虑。二里头遗址被判定为都邑和“中华第一王都”，主要是根据宫城的规模、墓葬的分化和显赫物品，还有就是与文献记载中夏朝的地望对号入座。二里头还未找到城墙，虽然出土遗物遗存显示这是一处等级较高的遗址，存在社会等级分化和复杂化的证据，但是从纪念性建筑和墓葬的规模和数量来看，要判定它为一处国家级的政治管辖中心，还需从区域聚落形态的等级结构来进行综合分析。

六、小 结

城市起源研究是文明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聚落考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物质文化和历史遗迹来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方法，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这一方法日益完善，分析对象小到微观的家居和单一社群，大到区域的政体和联邦，不但可以使我们探究特殊生态环境里人类社会的适应和组织结构，而且还能追寻社会复杂化以及城市和国家起源的具体轨迹。

① 林华东：《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良渚文化古城献疑》，《观察与思考》2008 年第 1 期。

② 罗以民：《证伪“良渚古城”》，《观察与思考》2008 年第 5 期。

城市起源是社会复杂化程度的集中反映，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始从迪尔克姆所谓的“机械”向“有机”生存方式的转变。机械的生存方式可以用蜜蜂或狼群来比喻，即每户每村的人大多做的是相同的事情，为最基本的生计而操劳，这种社会结构主要以家庭和血缘关系为纽带，没有等级和贵贱之分。西方学者还称之为“分节社会”，好比蚯蚓等环节动物，整个身体的运转由许多功能完全相同的环节组成。而有机的生存方式就是社会成员出现了职业分工，官员、工匠、农人、商人等不同职业团体各司其职，相互依存，使得整个社会以职业为纽带而整合到一起，像个庞大的有机体进行运转。而社会也因制度复杂化和不同部门和层级的管理需要而出现了等级和贵贱。因此，城市要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必须集中体现这种社群“有机”的生存方式。在分辨作为文明或国家标准的城市或都邑时，除了关注城墙外，还需留意表现“分异”和“集中”，或“异质性”和“不平等”的证据和迹象。如超过普通村落的巨大面积和规模，令人艳羡的豪华建筑如宫殿和庙宇，不同职业人士的聚居区，有规则的街区和房屋布局等，并留意城市在周边聚落中的枢纽地位。刘易斯·芒福德说，我们必须透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任务^①。

（原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早期文明的标准与阐释

在早期文明探源中，如何界定文明起源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19世纪摩尔根时代侧重的是一种文化观，文字被看作是区分野蛮与文明社会的标志。20世纪中叶，学界开始将文明探源集中在国家制度的形成。然而，国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而且早期国家有时很难与前国家的复杂酋邦相区别，于是研究不再刻意分辨文明与早期国家诞生的时间，而是关注其形成的过程，这就是社会复杂化的研究。在具体研究中，学者们常常为从文化特征来分辨制度而感到困惑。第一，文化特征较为直观，而社会制度则隐而不见，需要进行间接推断。第二，文化特征与社会制度没有刻板的对应关系，加上不同文明的文化表征差异很大，因此为判断文明发展层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虽然文明探源从“何时”与“何地”转向“为何”的问题，但是文化特征仍然是研究和讨论的重要方面，需要加以梳理。而要从文化表征转向社会制度，从直观转向间接的逻辑推演，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意在当下文明探源主要特征判定做一番剖析，并就文明起源的解释做一番探讨。

一、文化标准

在考古研究中，需要采用许多文化特征来判断文明的起源。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了人类历史的两次革命。一是新石器革命，二是城市革命，后者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①。在他的《城市革命》一

^① 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文中，柴尔德提出了 10 条较为抽象的标准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标志：(1)标志社会整合的人口增长；(2)出现了专职工匠的制度化生产，并成为分配和交换的组成部分；(3)剩余产品的集中，并对农民和工匠生产的剩余产品进行收集和管理；(4)出现了由显赫统治者主导的阶级社会；(5)出现了成熟政治结构与成员的国家组织；(6)出现了宫殿和庙宇等大型公共建筑；(7)出现了长途贸易和交换；(8)出现了天文、数学和几何等精密和预测性科学；(9)出现了雕刻、绘画等艺术品；(10)出现了文字^①。

20 世纪上半叶，这 10 条标准为从考古现象来判断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经典的判断标准。但是，实际情况证明，这 10 条标准在不同文明中并不同时出现，而且表现程度差异很大。在我国考古研究中，经常提及的有 3 个标准，城市、青铜和文字。虽然这 3 项特征标志鲜明，但是要从这些特征来判定文明或国家起源仍存在不少问题。下面对这 3 项标准做一番梳理。

1. 城市或都邑

在我国的田野考古中，城市和都邑的判断大多常以“以墙取城”。虽然，中国古代的城一般筑有城墙，但是，判断社会性质可能不便一概而论。墙的功能主要是防御，所以有墙的聚落未必是城，而有的史前城市也未必筑墙。布鲁斯·特里格认为，城市的关键定义，应该是它是在广阔农村中发挥特殊作用的中心。作为文明的象征，它应该是早期文明社会统治阶级的居住地，还是许多为其服务的专职人士，如官吏、工匠和商人的聚居地。城市也是庙宇、宫殿和市场的所在。主要城市以其大型、富裕、显赫的建筑而令人羡慕。这些上层人士居住在城市可以降低运输、交流和管理成本，并会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形成各自的功能区和聚居区。因此，城市建筑会呈现有规划的布局，并体现当时宗教信仰的宇宙观。从早期文明的聚落形态来看，城镇是国家统治网络不同层次的中心，可以根据它们不同的人口规模，占地面积和建筑的精致程度来确立其在国家运转中的地位。为了防御，城市内外可以筑墙，对外防御敌人，对内用来确保贵族住宅的私密空间^②。张光直对城市的分辨也

^① 戈登·柴尔德：《城市革命》(陈洪波译)，见《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②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中国早期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象征，而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并提出了分辨我国城址的5条标准，这就是：(1)夯土城墙、战车、兵器；(2)宫殿、宗庙与陵寝；(3)祭祀法器与祭祀遗迹；(4)手工业作坊；(5)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①。因此，从复杂社会的早期文明城市来看，我们在研究城址时，不但要关注城墙，更要留意其内部构造和遗迹分布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与不同功能。

如果从社会复杂化视角来观察城市，那么它就是复杂化程度的集中反映。美国学者罗思曼(M. S. Rothman)将社会复杂化定义为在彼此紧密相关的社群中，产生了经济、管理和宗教上性质有别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的核心，就是功能上的“分异”和“集中”。分异是指职业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部分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分异和集中程度愈高，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也就愈高^②。美国人类学家麦奎尔(R. H. McGuire)则用“异质性”和“不平等”来表述社会复杂化，前者是指社会群体之间人口构成或职业的分化，后者是指一个社会内部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差异。这两个变量导致社会结构在横向和纵向的特化，使得社会日趋复杂化^③。如果说平等社会表现为横向的同一性和缺乏纵向等级差异的特点，那么复杂社会就以横向异质分化和纵向等级森严为特点。古代城市集中了这些社会复杂化的特征，应该成为我们判断城市的基点。

城市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始从迪尔克姆所谓的“机械”向“有机”生存方式的转变。机械的生存方式可以用蜜蜂或狼群来比喻，即每户每村的人大多做的是相同的事情，为最基本的生计而操劳，这种社会结构主要以家庭和血缘关系为纽带，没有等级和贵贱之分。而有机的生存方式就是社会成员出现了职业分工，官员、工匠、农人、商人等不同职业团体各司其职，相互依存，使得整个社会以行业为纽带而整合到一起，像个庞大的有机体进行运转。

①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Mitchell, S. R.,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y: Mesopotamia in the late fifth and fourth millennia B. C.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4, 12(1): 75-119.

③ McGuire, R. H., Breaking down cultural complexity: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3, 6: 91-142.

而社会也因制度复杂化和不同部门和层级的管理需要而出现了等级和贵贱。因此，城市要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必须集中体现这种社群“有机”的生存方式。因此，在分辨作为文明或国家标准的城市或都邑时，除了关注城墙外，还需留意表现“分异”和“集中”，或“异质性”和“不平等”的证据和迹象。如超过普通村落的巨大面积和规模、令人艳羨的豪华建筑如宫殿和庙宇、不同职业人士的聚居区、有规则的街区和房屋布局等，并留意城市在周边聚落中的枢纽地位。

2. 青铜和冶金

金属的使用也常常被看作文明的标志。汤姆森的三期论将青铜的使用置于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而柴尔德将青铜时代等同于城市革命，与旧大陆的早期文明相提并论^①。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出土了不少早期铜器，如陕西姜寨的黄铜残片和铜管^②、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铜刀^③、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铜锥^④、河南临汝煤山王湾三期文化出土的铜炉残片^⑤、登封王城岗出土的一件铜片^⑥。于是，对于中国铜器或冶金术的起源便出现了各种说法，认为在龙山时期甚至仰韶早期或中期，中国本土已出现了铜器以及冶铜和制铜的条件，借此可以作为将中华文明起源提前的理由。

其实，如果要用铜和冶炼技术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标准，我们可能不能仅限于铜器的出现和有无，还必须考虑这些铜器加工使用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柴尔德指出，自然铜很早就被史前人类作为一种特殊或高级的石头开采和加工，如美国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就为生产目的而广泛开采天然铜。但是，

① 戈登·柴尔德：《青铜时代》（安家瑗、沈辛成译），见《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 半坡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近十年来文物考古新发现》，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⑥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四期出土的铜器WT196H617：14残片检验报告》，《文物》1983年第3期。

他们只是将其看作一种优质的石头，从未将其铸造成型，更少用熔化方式来提炼它，他们从未真正发现过冶金术。作为常规的冶金业，除了一大堆技术方面的学问外，还意味着经济独立性的丧失。铜矿一般不见于农业区的冲积平原，需要从山地矿区输入。所以，柴尔德认为，关键点不是发现金属质地，而是出现为正规提炼、分配和加工建立组织和人员配备的机制。许多人必须离开粮食生产，加入工业生产。这些人必须放弃他们的农耕和渔猎，到荒山野岭里去开采矿石，并穿越高山河流运输这些矿石。必须有庞大剩余财产的积累来吸引人们去从事勘探、采矿、冶炼、分配和铸造这些具有风险的职业。因此，冶金术不可能由独立的农业聚落所支撑^①。

为了论证金属作为文明起源标准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区分铜器反映的是实用技术还是显赫技术。加拿大考古学家布赖恩·海登(B. Hayden)指出，实用技术是解决基本生存与舒适问题的技术，包括工具、容器和房屋等，它们是对环境压力的一种直接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用技术与现实的生存需求相关。显赫技术并不与实用工作和生存活动相关，而是为了展示财富、地位和权力。显赫技术是尽量利用剩余劳动以制造对别人有吸引力的物品，并使民众对物主经济、审美、技术及其他能力的尊崇而对其产生敬畏和臣服。显赫物品创造和支持了一种特殊关系，使等级化的经济、社会、政治组织成为可能。它们不仅仅是财富的一种的反映，而且是复杂社会中权力和等级的基础，没有它们，等级制度将无法运转^②。彼得·佩里格林(P. Peregrine)则指出，控制和分配显赫物品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并使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合法化。如商代的青铜器，它们不仅是财富，而且是一种权力的象征^③。实用技术和显赫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违反了人类“最省力”的生存原则，即用最小支出使回报最大化。显赫技术往往体现了一种不计成本的显赫消费，意在以非实用目的消耗资源和能量作为衡量权力大小的标志。于是，奢侈品便成为权力的象征。因为它们体

① 戈登·柴尔德：《青铜时代》(安家瑗、沈辛成译)，见《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 Hayden, B., Practical and prestige technologies: the evolution of material system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98, 5(1): 1-55.

③ Peregrine, P., Some political aspects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World Archaeology*, 1991, 23(1): 1-11.

现了巨大的劳力投入，暗示拥有者控制巨大劳力和稀缺材料的非凡力量^①。

判断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铜器是否可以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必须着眼于这些器物是否是一种显赫技术或显赫物品，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目前发现的一些早期铜器基本都是实用器和饰件，如刀、箭镞、锥和管状物等，这种铜器体现的生产数量和规模都非常有限，应该与石器和陶器生产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的金属制品出现在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全新世初期，那里的天然铜和铅首先被用来制作饰珠、挂件、手镯和饰针。而在北美西北沿海复杂狩猎采集社会中，铜被用来制作铜片、铜盘和铜管。铜的吸引力在于它的难以开采、难以加工、随意的可塑性，以及在制成铜管时所发出非同一般的悦耳声音。因此一旦社会复杂化启动，它便是显赫技术极佳的原料^②。

比较而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已经是一种显赫技术，表现出与早期实用铜器明显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因为，铜的冶炼被用来生产爵和铃这样的奢侈品。这可以让我们窥视到，一旦铜的质地和珍稀被贵族阶层所青睐，用于生产显赫物品，那它就标志着铜的生产已被社会上层人物掌控来为其地位和权力服务，其采矿、运输、冶炼和铸造必然会形成一种专业化的要求。这种生产条件应该明显有别于以村落规模和实用技术的铜器生产。因此，铜器本身可能并没有一般想象的那么重要，关键要探究其生产后面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即便铜很早被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所发现和利用，但是其低下的经济技术和简单的社会结构，使得铜的作用只不过是制作工具的一种比石头更耐用的原料而已。但是，在文明的复杂社会里，贵族阶层需要用显赫物品来确立自己的地位，而由于贵族阶级能够调动更多的劳力和资源，使得铜的开采、运输、冶炼和加工能够成为一门脱离维生经济的专业手工业而蓬勃发展，从而生产日益标准和精致的青铜器，也就成为当时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的标志。

① Trigger, B. G., Monumental architecture: a thermodynamic explanation of symbolic behavior. *World Archaeology*, 1990, 22(2): 119—132.

② 戈登·柴尔德：《青铜时代》（安家瑗、沈辛成译），见《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因此，考古发现的早期铜制品，必须从其制作和使用特点来考察其社会背景，如果它们基本体现了一种实用技术，如山东龙山文化的铜锥和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中的铜刀，那么它们作为文明起源标准的意义不应过分夸大。张光直指出，作为文明标志的以礼器和兵器为特点的中国青铜时代有别于之前以小件工具与器具及饰物为特点的“红铜时代”，因为它体现了文化与社会水平上的差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中国早期国家，青铜礼器与兵器便是统治者权力与统治合法性的象征^①。

然而，冶金术不一定是复杂文明和早期国家的普遍性特点。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青铜时代与国家起源关系密切，但是新大陆的玛雅和印加帝国却没有青铜时代，其社会复杂化水平与旧大陆早期国家相比却毫不逊色，而西欧罗马帝国之前的青铜时代并非国家而是酋邦。

3. 文字

文字被摩尔根作为他文化三期论中文明社会有别于野蛮社会的分野^②。柴尔德指出，文字发明之所以重要，是它确实标志着人类进步的新纪元。我们认为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透视我们祖先的思想。但是其真正意义在于它对人类知识的传播是一个革命。有了文字，人类可以将自己的经验永存，并传递给远方同仁和尚未出生的下一代。这是科学冲破时空限制的第一步。但是柴尔德也指出，文字发明的作用也不应过分夸大。书写并非为公共交流而发明，而是为了管理的实际需要。早期文字在表达思想上相当笨拙，以至于文字成为高难度的特殊技艺和秘境^③。杰克·古迪(J. Goody)和伊恩·沃特(I. Watt)指出，文字使得文明社会完全不同于野蛮社会，它促成了精致的记录方式，使得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发展成为可能。文字还促进了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思想更加抽象、普遍并具备逻辑的连贯性。他们还声称，文字促进了发现、发明和技术进步，并使得各种机构逐渐从国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③ 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家控制中分离出来，并刺激了私有财产的发展^①。然而在不同文明之中，文字记录的发展和使用的差异很大。

文字最早和普遍认可的定义是“一种用耐久符号记录词汇序列的系统”。于是，一位从未见过某文本的有阅读能力的人就能根据同样的序列读懂文本作者所写的意思。早期文字系统至少有3个功能：(1)纪念国王及其功绩，如埃及和玛雅石碑上的铭文；(2)管理功能，如美索不达米亚庙宇里的泥板账册；(3)宗教祭祀目的，如中国殷商的甲骨文。早期文字并非现代意义的历史记录，它们仅限于宫廷和王室的一些活动信息。到后来，历史记录才作为一种事件的说明结合到王室年鉴、纪念性铭刻和丧葬文本之中。这种记录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成分，一些功绩被夸大，一些失败被隐瞒。阿兹特克和西周的统治者都可能销毁了前任或前朝统治者的历史档案。然而，尽管历史记录的积累最终使得较系统地研究过去成为可能，但是早期文明并没有堪比古希腊和中国东周开始的那种对人类历史、抽象哲学及自然界进行研究的文献^②。李峰在论及金文与传世文献时指出，金文作为最早的历史文献是反映西周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证据。但是这些记载多为其拥有者的荣耀和成就，不会涉及他们的耻辱与失败。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它们的偏见和主观性。文献资料的情况更为复杂，几乎所有历史记录都产生较晚，这种晚出的史料已丢失大量重要信息，并会经历文学上的增饰和修改。因此，对于这些珍贵的文字资料，我们也应该作为像其他考古遗存一样的材料进行分析，以了解其背后的社会背景，而不应该作为深信不疑的证据来重建历史^③。陈致也指出，传世文献固然重要，但是不能一味信赖，因为大部分文献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重新编订和辗转誊录或口耳相传，有些可能已非初意。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已与后来的增益混为一体，要从后来者的编

① Goody, J. and Watt, I.,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63, 5: 304—345.

②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0—121.

③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撰和篡改中筛选出某些事实，并非易事^①。

我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社会可以在缺乏文字的情况下运转。而有的历史学家声称，考古学是和文献学连在一起的，发掘出来的东西要用文献材料来说明才有价值^②。夏鼐指出，就像世界上大部分早期文明一样，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也应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时期正处于文字萌芽和初创的阶段。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只好主要以考古学的实物材料为佐证^③。20世纪初，中国古史研究对早期国家辨伪的无助，才求助于考古发掘提供地下之材。当然，文字资料非常珍贵，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历史人物、具体事件和确切年代，但是其重要性不宜过分夸大，更不宜将文献与无案可稽的考古发现对号入座，或用文献线索来左右考古学的探索。首先，历史事实远比文献记载的内容复杂得多，绝大多数考古发现都不见文献记载。其次，早期文字资料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就像考古材料一样需要我们通过科学方法进行梳理和解读。而且，就像冶金术一样，文字并非早期国家的普遍特征。在特里格进行比较研究的七大早期文明：中国殷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约鲁巴-贝宁、古典玛雅、印加帝国和墨西哥河谷之中，只有四个早期文明拥有文字。结绳记事的印加帝国，其社会复杂化层次与古埃及和玛雅相比毫不逊色。

二、社会标准

20世纪中叶，随着国际文明探源从“何时”“何地”转向“为何”，关注问题不仅涉及社会演变的过程，而且希冀探究文明起源的一般性规律。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 D. Sahlins)和塞维斯(E. R. Service)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概念，构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一种普遍性直线发展序列^④。社会人类学家提出这四个类型的社会进化概念和标准，就像生物学家用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构建脊椎动物的进化序列一样，以求体现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

① 陈致：《从礼仪化到世俗化》(吴仰湘、黄梓勇、许景昭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见《考古学论文集》(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④ Sahlins, M. D. and Service, E. R.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M. 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发展阶段。这四个历时或进化社会类型是萨林斯和塞维斯根据同时性民族志材料中所见的社会结构与性质差异所建立。其中，定义部落和酋邦形态的性质是根据太平洋地区土著社会的详尽知识，特别是美拉尼西亚头人社会(big-men societies)为定义酋邦提供了模型。有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态模型，考古学家便能从考古现象来判断社会的演进，好比古生物学家用现生不同类型动物的体质特征作为参照和比较，借此分辨早已绝灭的化石动物类型，追溯生物进化的具体轨迹。值得指出的是，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是具有许多基本相似结构的代表，在具体案例中这些类型未必构成直线的序列^①。由于不同社会和各大文明特异发展过程中文化特征差别极大，因此用文化现象作为判断社会层次的标准难免会遭遇尺度不同和不易把握的问题。而以民族志为基础构建的、有明确科学定义的社会类型作为判断史前社会发展层次的标准，显然要比采用器物、墓葬和建筑等物质标准更为合理。

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文明形成的标准，那么酋邦便是探索文明起源的关键。美国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 Earle)指出，“酋邦”这个术语是用来研究非国家社会的社会复杂化。酋邦是过渡型社会，是无首领平等社会向官僚国家演化的桥梁。他认为，酋邦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其进化原因也非常复杂。虽然这一术语存在争议，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进化研究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②。

酋邦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之后，学界表现出不同态度。有人尝试用它探讨中国史前社会演变，分析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前国家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传统文献中名称如“古国”或“五帝时代”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诚如刘莉指出，古国、王国和帝国等传统称谓并非科学概念，没有提供判断国家的合理标准。因此，问题不在于使用外来术语还是传统用语，关键在于与该术语相关的研究方

① 布鲁斯·特里格：《美国考古学当前的趋势》，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Earle, T., Chieftoms i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7, 16: 279-308.

法^①。与国际学界的术语相比，传统用语既缺乏进化理论支撑的逻辑关系，也没有可供具体操作的科学定义。它们只不过是传世文献中的具体称呼而已。在方法论上，判断古代的社会性质或文明发展层次，必须通过类比。人类学和历史学术语的用法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强调一般，而后者注重特殊。首先，酋邦是一个抽象的社会人类学概念，是社会演变一般性趋势中的一个进化类型和发展阶段，并不与古今中外某个或某种具体社会对号入座。史籍中的古国大体特指某些具体对象，缺乏人类学术语指称的普遍性意义。其次，酋邦是根据人类学和民族志观察提出的概念，现代土著社会在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方面不同层次的参照蓝图，可以作为与考古材料类比的依据。然而，传统文献中的古国却缺乏可供类比的具体参照，难以为考古学家判断社会发展层次提供蓝图。张光直说：“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具备所有种类的蓝图，这些习俗与制度，在考古遗址里面，只有一点物质痕迹残留。不熟知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工作者，很自然地将这些遗物只当作物质文化处理，熟知各种习俗制度蓝图的考古工作者，便有可能根据残存的部分将全部习俗或制度复原。”^②

作为文明起源阶段的酋邦社会有简单与复杂之分，但是它们有着基本的共性。塞维斯将酋邦定义为地位世袭的贵族社会，但它没有武力压迫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机制。这种社会以宗教仪式进行管理，因此酋长的权力是一种调定权而非统治权^③。厄尔将酋邦定义为区域性组织起来的社会，拥有一个集中的决策阶层，政体规模从简单酋邦的一千人到复杂酋邦的数万人不等。酋邦存在世袭的等级制，酋长等级作为特殊的领导者分离出来，但是其内部功能并没有分化，而集中则是酋邦最明显的标志。酋长通过对生产资料、显赫物品生产和武力的控制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上，酋邦普遍表现为“神权”性质，并普遍建造巨大的纪念性建筑来创造神圣景观的仪式地点，以

①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张光直：《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③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75.

便使将尘世与宇宙相连。在仪式中，酋长扮演“神”的角色。在复杂酋邦里，最高酋长就是“上帝”^①。而罗伯特·卡内罗(R. L. Carneiro)则将酋邦定义为“由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群组成的自治政体”^②。

早期国家与复杂酋邦差别不大，有时难以区分。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总结了各家观点认为，早期国家保留着许多酋邦的特点，但是它已有明确的特权来建立法律，并通过武力来实施法律。社会不再依赖血缘关系维系，而是分成了不同的阶级。统治者的职能与祭司有别，出现了官吏组成的行政机构，他们征收赋税以供养政府、军队和专职工匠^③。

由于社会体制不如文化特征直观，因此必须根据各种考古证据结合聚落形态来加以综合推断。特里格提出了几种分辨管辖机制的方法：(1)人口学方法，一般而言，部落人口的上限为5 000到6 000。酋邦为10 000到12 000。原始国家在10 000到100 000。国家在100 000人以上。(2)物质文化分析方法，分辨强化劳力投入的建筑物如宫殿、庙宇与墓葬。(3)社会学方法，留意全职的专业人士如工匠、官吏、士兵和侍从；与高等级墓葬相伴的人殉和人牲。(4)地理学方法，研究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如宫殿、庙宇、仓储、军营、会议大厅等的分布。(5)肖像学方法，统治阶层的艺术会表现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权力肖像”。这些肖像的主题、尺寸、位置、服饰，与被象征对象的等级密切相关。特里格还强调，仅凭单一证据的推测不能得出结论，判断国家体制需要建立在不同方法合力探究的基础之上^④。

有了社会人类学定义的标准，从考古现象来判断国家的起源就有了基本的科学依据。比如，一般认为上下埃及的统一标志着古埃及早期国家的诞生，但是，美国考古学家斯蒂芬·萨维奇(S. H. Savage)根据人类学标准认为，统

① Earle, T., Chiefdoms i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7, 16: 279—308.

② Carneiro, R. L.,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In Jones, G. D. and Kautz, R. R.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7—79.

③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布鲁斯·特里格：《管辖体制的考古》，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一后的埃及仍是一个酋邦，国家特点要到第二王朝才真正出现^①。同样，据古文献记载，英格兰国王出现在公元 500 年。但是，考古学证据强烈显示，真正的国家社会要到公元 780 年奥法国王统治时期才形成。所以，传统文献上的那些早期国王只是酋长而已^②。我国学者常常对西方学者不承认殷商之前中国早期国家的地位感到难以接受。如上所述，西方学界不会因《史记》有夏的记载就会简单认同其国家地位，他们需要用社会人类学的国家标准进行独立判断。因此，我们如要国际学界认同夏的早期国家地位，就需要努力寻找并提供符合社会人类学标准的考古证据。

三、阐释

如果把考古研究和文明探源看作重建上古史或修国史^③，那么我们需要认识到，“重建的目的总是指阐释”^④。阐释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和方法论的支持，并在认识上需要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升华。科林·伦福儒说，阐释就是“把问题说明白”。他把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中叶称为考古学阐释的“漫长休眠期”，而 1960 年后为“大觉醒期”。虽然柴尔德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提出了一般性阐释，为考古学思想做出了许多创新，但是，一直要到过程考古学兴起之后，国际考古界才认真考虑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和概念框架，以及知识系统化所要求的清晰度和严谨性^⑤。

阐释因对象、目的和种类的不同而差异很大，如特殊或个别事件的阐释和规律或一般性的阐释，归纳性阐释和演绎性阐释等，在此无法尽述。对于我国文明探源而言，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需要建立一套逻辑上统一的阐释体系，不能因人而异，否则大家做再多的工作可能也难以达成共识，更

① Savage, S. H., Some recent trends in the archaeology of predynastic Egypt.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1, 9(2): 101-155.

②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④ 布鲁斯·特里格：《史前考古学的目的》，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⑤ Renfrew, C., Explanation revisited. In Renfrew, C., Rowlands, M. J. and Segraves, B. A. (eds.), *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5-23.

谈不上与国际接轨。

美国科学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指出，科学是有别于常识的组织化和逻辑上统一的知识体系。科学将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思想引入常识之中。它通过说明事件的前因后果，通过揭示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以追求统一的阐释体系^①。就目前我国文明起源研究而言，迄今已发表了汗牛充栋的论著，但是学者们在研究规范、使用的术语和概念上仍缺乏某种统一性。个人见解的随意性较大，在概念和前提不同的情况下讨论相同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讨论难免仍是一己之见，而非科学阐释所要求的那种“条理化”的统一知识体系。意见相左和观点发生碰撞是科学研究中常见的现象，也是科学发展的刺激因素之一。但是，不同意见的交锋必须在讨论前提条件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个人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必须考虑本意是要追求知识的“统一性”。否则，这种独立见解虽被冠以“学术观点”，但实际上仍与常识无异，并会使我们对文明起源的认识一直处于聚讼不断、鸡同鸭讲和难以推进的状态。

内格尔还说，为了探求系统的阐释，科学必须重塑日常语言，以减少其表述的不确定性。日常语言缺乏必要的专门性，无法精确描述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科学阐释的术语必须加以定义，以降低语言表述的模糊性，提高其专门性。他还指出，科学概念不同于常识概念在于它的抽象性，科学概念与经验事物性质的关系并不明显，表述的抽象性是科学知识的显著特点^②。在我国文明探源的讨论中，也存在术语和概念模糊的问题。上面提到的古国就为一例，我国一些学者在19世纪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术语与20世纪国际流行术语的使用上，也存在新老不分的模糊认识。

美国科学哲学家肯尼斯·胡佛(K. R. Hoover)指出，概念是科学方法的一个要素，用准确的名称来称呼一样东西是理解的第一步，严格定义的概念可以统一和规范语言的表述，因为这是使思想能把握真相及其过程的关键。概念的要点在于：(1)尝试性的；(2)基于共识；(3)必须把握住有意义和能够予以定义的内容。他认为，将科学应用于社会科学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而且

①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是更加复杂的事业^①。为了提高文明探源的研究水平，我国学界有必要参照国际学界的标准，统一基本的学术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这样可以消除许多无谓的争论，并提高研究的质量，并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和同行间的认可。

为了做出正确的阐释，我们还需要培养推理性判断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学者在下结论时，都难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因此“判断”就非常重要。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由无意识偏见和潜意识价值观所产生的问题，很难通过排除偏见的诚恳方式就能解决，只有通过科学的自动校正机制才能克服。这就是鼓励负责任的批评，欢迎不同探索之间的竞争^②。我国学者常常担心正常的学术批评会被视为个人攻击，影响学术交流的健康互动。我们需要建立健康的争鸣氛围，完善批评的自我校正机制，以减少阐释和讨论层面上的无序性。

四、小 结

本文着重讨论了城市、铜器和文字这三项最受关注的早期文明标准，认为对这三项标准的考古学研究需要超越城墙、实用技术和一般符号的分辨，以透视它们的社会功能，以便从社会体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和管理需要的视角，为社会复杂化层次提供洞见。早期国家形态是文明探源的重要标志和关键目标，判断早期国家有一套基于社会人类学原理的标准。这种根据民族志观察建立的社会标准，为考古学从物质遗存来判断古代社会的发展层次提供了类比和参照的蓝图。为了将文化现象或文化标准转化为可操作的社会标准，需要采用多学科方法，从人口规模、地理分布、社会制度、等级分化等方面来综合判定史前社会是否具备了国家的基本条件。本文最后强调了阐释的重要性，我国文明探源成果如要成为组织化和逻辑上统一的知识体系，需要学者们从严格定义的统一概念和术语出发，努力从抽象的理论高度揭示各种复杂现象的因果机理和一般性规律。

（原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

① Hoover, K. R.,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18—21.

②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从“专业”到“通业”：当今文明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当前的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结合了社会科学通则与历史学个案的研究，是一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就总体情况而言，这项探索的关注重点已由“何时”转向“为何”，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早期文明、早期国家所处的所谓原史时期虽有古文字记载可供研究，但并不能满足人们了解社会变迁诸多方面的要求，因此需要依赖考古学田野工作和理论方法的不断改善提高对物质现象的解读能力。本文在回顾这项研究的沿革后，拟对文明探源的理论和方法做一简介，并对目前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略予述评，以期我们的这项战略性课题能够在更高水平上与国际学界研究成果比肩。

一、历史回顾

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最初是哲学家探讨的对象。柏拉图认为，国家形成是因为人类没有它就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它的体制是上帝赋予的^①。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动物^②。卢克莱修揣测了社会的进化，从最早的动物般生活，发展到家庭、氏族和国家的形成。国家由契约而形成，

① 柏拉图：《柏拉图理想国》（侯健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 年版。

② 高柏园译著：《古典理性的殿堂——亚里斯多德》，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3 年版。

社会的进化得益于技术的变迁^①。但是这些哲学思想并没有成为一种持续探究的领域，也没有对事实和想法之间的关系加以进一步论证。只要合乎逻辑和没有矛盾，或不违反常理，各种论点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在中世纪，由于《旧约全书》详述了西方文明的起源，因而关于人类和文明起源的独立研究便成为多余，甚至成为对神学的亵渎。根据犹太教年历，创世以来只有 5 000 年的时间，这使得古老的史前史及人类和社会的进化思想没有立锥之地^②。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文化进化观，为人类与文明探源带来新的视野。在考古学领域，进化思想促使斯基的纳维亚的考古学家从技术发展角度构建人类史前史，最终导致汤姆森(C. Thomsen)石、铜、铁三期论的诞生，标志着有别于古物学的科学考古学的诞生。在社会科学方面，现代含义的“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的“文明”一词，在 1752 年才出现在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A-R-J. Turgot)的笔下，但是其著作并未发表。1756 年，法国思想家维克托·里凯蒂(Victor Riqueti)也即米拉波侯爵(Marquis of Mirabeau)在他的《人口论》一书中使用“文明”来形容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这是该词首次在出版物中出现^③。苏格兰启蒙运动核心人物亚当·弗格森(A. Ferguson)于 1792 年在《文明社会史论》中首次采用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递进阶段论述社会制度的变迁，并讨论各种不同国家的特点，包括民主政体、贵族政体、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的特点，以及人类理想的政体^④。在中国文献中，“文明”一词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天下文明”，原意是“有文章而光明”。现在中文用它来翻译西文中的 civilization，与“野蛮”相对，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⑤。

19 世纪，社会进化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与实证论之父孔德(A. Comte)在 1830~1842 年间完成的许多著作中提出一系列重要社会学理论，社会被视为一种由普遍进步法则主导的有机体，而社会学是由静态观察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② Malina, J. and Vašíček, Z., *Archaeology Yesterday and To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费南尔·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 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见《考古学论文集》(下)，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社会形态)和动态研究(进化理论)所组成。他认为人类本性是进步的,人类的智慧从神学阶段,经过哲学思辨阶段,最后发展到实证阶段。赫伯特·斯宾塞(H. Spencer)建立的体系被认为是实证进化论的经典,19世纪50年代,他将“进化”(evolution)视为“进步”(progress)的同义词。进步的变迁是世界万物的特点,适用于自然的、生物的和心理社会的领域。他认为社会如同生物有机体,进化如同从简单、同质性的起点向日趋多元的分化。社会的进步表现为其构成部分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以及这些部分之间联系数量的增加。他认为,供养日益增加的人口,会刺激个人的创新精神,并促进经济的发展。较为复杂和整合较好的社会较之简单社会会更加繁荣。他认为,社会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自由与产权保护的结合,它使得人们能够享受自己创造的成果^①。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L. H. Morgan)在《古代社会》中构建了经典的直线文化进化论,从亲缘系统进化的研究延伸到对技术、社会机构和知识文化更为全面的研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依次递进的阶段,各个阶段被以不同的创造发明加以区分。他把社会看作是功能整合的系统,并支持一种直线的文化进化观,认为没有文化可以不通过初级阶段而达到高级阶段^②。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他们探索国家形成的原因以及作为一种压迫机构的真正性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对摩尔根的阶段进化思想做了进一步和更加集中的阐发,认为某些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农业与畜牧业及农业与手工业两次劳动大分工、生产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剩余产品的增加和各阶级的重新划分,社会剩余产品被用来进行交换与贸易。当这一过程逐渐扩大,社会的需要就从自给自足经济向日用品生产发展。随着商品生产的形成,产生了农村与城市的对立,不劳而获的私有财产也就产生,寄生阶级就出现了,这是国家起源的经济基础^③。马克思也试图以进化模式来构建资本主义前的社会

① Trigger, B. 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②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发展阶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根据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1928年提出一种人类社会直线进化模式：原始社会被分为前氏族、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三个阶段；后继为三个形态的阶级社会，分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为两个无阶级社会，分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该社会进化模式被西方学者称为“苏联进化论”^②。在苏联和中国，这一社会进化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阐释产生了重大影响。

18世纪至20世纪初，从进化论角度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探索基本上是在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进行的，大体上属于一种规律性或通则性的探究，意在解释文明起源的普世动因和一般进程，而且带有明显的单线进化论特点。到了20世纪上半叶，博厄斯学派的历史特殊论开始在美国社会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弗朗兹·博厄斯(F. Boas)反对进化概念，反对摩尔根的文化进化论，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实体，必须从其本身来获得了解和评估。博厄斯认为社会文化演变是一种偶然的过程，由传播、传统行事方式出错，以及对既有思想的偶然重组所引发^③。当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阶段时，其研究导向趋于忽视理论概括，强调事实比理论更重要。当时博厄斯派中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资料收集工作可以脱离理论指导来进行，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料，就可能得出清楚的理论解释。总的来说，博厄斯学派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反对社会进化学说^④。在历史学领域里，从19到20世纪初，兰克学派主导着国际史学潮流。兰克学派提倡秉笔直书，用材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Trigger, B. 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③ Trigger, B. 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④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料说话。探究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因超越材料被看作是带有个人偏见的陈述而遭到冷落。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近东与欧洲考古材料大量积累的时期。考古学家通过努力逐渐构建起这一地区的文化年表，使人们能够从物质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近东与欧洲史前期的社会变迁及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澳籍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他将自己大部分学术生涯用于以审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解社会演变的性质。在1936年出版的《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中，柴尔德以一种累进和定向的发展趋势总结人类社会的进步，提出“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他认为，科学知识的积累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控制自然，最后导致复杂和进步社会体制的形成。他用“城市革命”或“第二次革命”来指称文明起源，认为这次革命的实现首先需要以粮食为基本形式的资本积累，并且必须有某种程度的集中，使之有效实现社会目标。这一过程就是财富积累、技术改进、劳动持续专门化和贸易扩展的历史^①。在1942年出版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柴尔德采用经济学方法了解社会变迁，探讨最进步社会集团的谋生之道，从中确认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每次革命都会以人口的增长为标志^②。除了明确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阐述文化演变，用蒙昧、野蛮和文明表述社会发展的三个累进阶段，他还将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看作进化的主动力，并关注它们在引起演变中的作用。但是，柴尔德并没有信奉直线进化论，而是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国家和埃及神权政体的形成看作由不同社会和政治手段以控制农业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柴尔德也质疑社会必然持续进步的想法，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层次，特别是早期文明阶段，牢固的等级制和刻板的宗教信仰会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于是，他提出文化进化的两条路线：一条是进步的路线，以技术持续发展和灵活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为特点；另一条是保守的路线，以技术停滞不前和繁缚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为特点^③。1950年，柴尔德撰写了一篇题为《城市革命》的专论，探讨早期文明的起源与特征。他指出，在旧石

① 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②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③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器和新石器时代或蒙昧和野蛮时代，社会没有劳动分工，这种单一和辛勤的劳作方式不需要国家组织来维持。社会结构建立在迪尔克姆所谓“机械”的生存原则之上。随着社会劳动的专门化和剩余产品的积累，社会结构逐步摆脱血缘关系的凝聚纽带，开始以功能或职业互补而重组，标志着文明进程的开始。于是，大约在5 000年前，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流域出现第一批城市。柴尔德将城市起源看作文明的标志，并定义它的10项判断标准：(1)集中的人口；(2)除了农民外，城市人口还包括专职工匠、搬运工、商人、官吏和祭司；(3)税收和剩余产品的集中；(4)出现真正的纪念性公共建筑；(5)出现统治阶级；(6)出现文字系统；(7)精确和预测性科学如代数、几何、天文学及历法的进一步发展；(8)出现新的艺术风格；(9)远程贸易十分普遍；(10)出现脱离血缘关系的、职能互补的社会结构^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10条标准为从考古现象来判断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经典的判断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博厄斯历史特殊论失势，美国人类学界在探究社会发展规律和构建文化进化论方面兴趣复炽，以莱斯利·怀特(L. 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特(J. Steward)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开始流行。该流派重视生态、技术和人口等因素对促成社会文化在不同环境中多线演进的一般性趋势，并将总结社会进化的通则看作人类学的主要目标。

莱斯利·怀特自许为路易斯·摩尔根的学术继承人，尽管他承认并非所有文化都会进步，但还是断然摒弃博厄斯派的历史特殊论，提出“一般进化”概念，试图将进步作为文化的一般性特征来了解。怀特并不在意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专注于解释文化发展的主线。这条主线是以人类历史相继各阶段最先进的文化为代表，不管这些文化来自何处，也不管早晚阶段的这些最先进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历史传承关系。因此，怀特的进化序列由一系列累进的代表性文化构成，他把社会文化结构复杂化的逐步升格看作进化研究最重要的途径^②。怀特还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的汇

^① 戈登·柴尔德：《城市革命》(陈洪波译)，见《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② Trigger, B. 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编，而是从普遍性探讨特殊性，使经验成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他将文化看作一种热动力系统，认为人类文明史就是借助文化手段控制自然力的历程，而技术便是文化系统整体的决定力量。于是，文化发展是由工具的改进以及所利用能量的增长引起的。史前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是比较单一、未分化的原始社会。农业技术革命引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导致原始社会制度瓦解，部族和氏族废除，社会分解为各种职业群体，社会分成两大主要阶级。于是，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文明社会取代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国家取代部族与氏族，这是一种具有协调功能和维系机能的特殊社会机构^①。

朱利安·斯图尔特提倡一种生态学和经验性的社会文化演变研究，认为社会文化演变具有很大的共性，并相信生态适应在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声称，进化人类学的目的应该是解释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所有或大部分文化共有的那些特点，而不是设法去说明那些由偶然原因产生的独有的、特别的和非重复发生的特殊事件。他强调研究演变的跨文化规律，提倡将“进化”和“历史”看作是相互排斥的概念，只认为研究进化现象才能得出科学的通则。他认为，如果人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那它就必须停止像博厄斯派人类学那样解释特定事件，而应努力去解释跨文化的规律^②。1949年，在一篇讨论早期文明的论文中，斯图尔特重申了人类学的终极目标是寻找文化规律。他认为，尽管不同文化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但是也无异存在许多共性。探究文化的特殊性为各种通则性的阐释提供了必要材料。现在是构建一种文化发展通则的时候了，这需要通过文化差异来看共性，探究文化进程中独立重复发生事件的机制。他强调，收集事实并非一种完美的科学程序，事实只有与理论相联系时才有意义。他指出，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秘鲁北部和中美洲的古代文明，在物质文化、农作物、社会等级、神灵表现和祭祀方式上差异很大，但是通过抽象出来的共性进行比较，可以探究其形

① 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Trigger, B. 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成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他定义了五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来对这六个早期文明的发展共性进行总结，探讨其中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产生这些社会结构的原因。斯图尔特倡导的是一种多线的、生态决定论的文化进化观，相信在相似的环境背景里，不同社会会变得形态相同，并会遵循相似的发展轨迹^①。

起初，学界对怀特和斯图尔特的呼声响应寥寥。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文化演变研究才渐成气候。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 Sahlins)和塞维斯(E. R. Service)根据同时性民族志材料中所见的社会结构的性质差异，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概念，建立起一个推测性的和高度一般性的四阶段进化模式，以概括人类社会演进的一种直线和普遍性的发展序列^②。其中，定义部落和酋邦形态的性质是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对太平洋地区土著社会的详尽知识，特别是美拉尼西亚头人社会(big-men societies)为定义酋邦提供了模型。尽管酋邦概念饱受争议，并不断得以修正，但是它仍被视为对社会进化的准确表述而广泛接受。美国政治人类学家莫顿·弗里德(M. Fried)也提出一个相似的、从平等社会向等级、阶层和阶级社会进化的直线序列^③。弗里德的模型强调促使社会复杂化发展的政治因素，主要侧重社会如何能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新进化论思想因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新考古学将考古学主旨定为构建社会发展通则的目标而被广泛采纳，社会复杂化成为考古学对社会进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酋邦概念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中国之后，学界出现不同态度。有人尝试用它探讨中国史前社会演变，分析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前国家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中国古代名称如“古国”

① Steward, J. H., Cultural causality and law: a trial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9, 51(1): 2-28.

② Sahlins, M. D. and Service, E. R.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M. 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③ Fried, M. H.,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或“五帝时代”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①。诚如刘莉指出，古国、方国和帝国等术语缺乏概念上的阐释，没有提供合理的判断国家的标准。因此，问题不在于使用外来术语还是传统术语，更重要的是与该术语相关的研究方法^②。在方法论上，判断古代的社会性质或文明发展层次，必须通过类比。人类学和历史学术语的用法还是存在区别，前者强调一般，而后者注重特殊。首先，酋邦是一个抽象的文化人类学概念，是社会演变一般性趋势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能与古今中外某个或某种具体社会对号入座。美国科学哲学家内格尔指出，科学陈述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具体事物所显示的关系或属性并不明显，甚至相去甚远，但它是探求综合性解释的必然结果。为了说明形形色色事物性质的普遍性，在系统表述其结构特征时，就必须进行抽象^③。史籍中的古国大体特指某些对象，缺乏人类学术语那种泛指的特征。其次，酋邦是根据人类学和民族志观察提出的概念，现代土著社会在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方面不同层次的参照蓝图，可以作为与考古材料对比的依据。但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古国却缺乏可供类比的具体参照物，难以为考古学家判断社会发展层次提供具体蓝图。所以，酋邦就像“人类”或“国家”的称呼一样，是个泛指的抽象概念，用来统指部落与国家之间的各种社会形态。其优点是西方人类学家对它有基于民族志研究的一般性总结，并有明确的科学定义，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对中国考古材料进行比较，便于分辨这种前国家社会的演变。而中国习用术语如“古国”“王国”和“五帝时代”，无论古籍还是当代学者并没有给予它们任何科学定义，因此难以用它们从考古学中辨别和分析史前社会的形态和变迁。西学东渐的术语在中国语境中“水土不服”，也许还与中西学术方法不同有关。除了面对新的

① 采用者如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叶文宪：《部族冲突与征服战争：酋邦演化为国家的契机》，《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认为不适用者如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不存在者如张学海：《聚落群再研究——兼说中国有无酋邦时期》，《华夏考古》2006年第2期。赞同用本土术语者如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②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③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西学术语我们会有自己的好恶和选择外，中国学者传统上习惯用文献考证方法处理和解释考古学涉及的各种社会与文化问题，而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则是采用一套高度抽象概念，通过逻辑推理的解释体系，意在揭示错综复杂材料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李济说，文化人类学最有用的方法之一，是把那复杂的文化内容分成若干较小的单位作比较研究。这种较小的单位就是特征。这些特征、成分及个体的分离或复合的程序，就是文化的演变^①。虽然在这里李济谈的是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社会文化的研究显然也同样适用。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新进化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都受到批评，这些学说被认为是都强调客观因素，依赖某种形式的决定论，将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当作社会以外的东西对待，将人类看作由外因塑造的被动物体。于是，文明探源出现了一种从注重生计、手工业生产、交换、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等唯物主义探索，转向侧重探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促成文明形成上的作用，弥补了先前对人类能动性和创造性关注的不足。使得文明探源能够更加细致，更加全面。但是，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知识的主观性，信奉极端相对主义和观念主义。他们拒绝文化进化理论和进步观念，赞美随机和特殊的文化多样性，坚持局部文化的完整性来捍卫自由。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否定权威知识，提倡多种不同声音，重视弱势群体的阐释。结果，“真理”不再被视为必然的解放。他们宣传，跨文化规律是毫无意义的学术构建，强调必须从其本身了解每个文化。这鼓励重拾一种对叙述文化多样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普遍关注^②。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特里格指出，社会科学的发展史表明，人文科学远非客观的学科。它们的成果常常被用来支持社会和政治运动。但是从长远看，这些学科还是能够为人类历史提供客观和详细的认识。如果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避开当前极端相对主义的陷阱。极端相对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危害远远超过实证主义的不足。社会科学家不但要有怀疑的精神，同时也要有勇

^① 李济：《从人类学看文化》，见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气相信自己和他们所做的工作^①。

综上所述，欧美的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共同探索的课题，其发展大致经过从神话传说、哲学思考到科学实证和重视文化与认知因素的轨迹，表现为各种思潮风云变幻、不同流派潮起潮落。它们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在借鉴时需要认真梳理，并了解其社会和学术背景。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因此中国的文明探源更擅长从延伸文献记载的历史从事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探源的区别和接轨问题，也许可以用李济对王国维的两点评论来解决。其一，近代中国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有若干重要成就，主要原因正是有王先生传承下来的凭借。其二，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并非不能与现代科学思想融合的体系^②。张光直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西方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意义也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的案例可以为检验和完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做出贡献，还能从本质上增进我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他认为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学究态度，把西方的社会科学学好^③。

二、理论与方法

20 世纪上半叶，国际文明探源研究受人类学的传播论影响很大。在英国民族学中，传播论取代进化论方法，并被英国人类学家格拉夫顿·埃里奥特·史密斯(G. E. Smith)和威廉·詹姆斯·佩利(W. J. Perry)发挥到极致。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早期文明都源于埃及，于是人类被看成是缺乏创造力的，文明发展只能依靠外来思想的影响和进步人群的入侵。传播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也很大，如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以及 20 世纪中叶中国学界流行的中原中心论都是国际传播论思潮影响的结果。

在传播论流行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探索文明起源动力的重要理论，柴尔德的自发论和魏特夫的水源论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两个。柴尔德采纳摩尔根

① Trigger, B. G., Hyperrelativism,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rigger, B. G., *Artifacts and Ideas, Essays in Archaeolog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② 李济：《关于王国维的两点评论》，见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张光直：《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现代化》，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将技术经济发展导致的剩余产品增长看作文明起源的动力。随着剩余产品的增长，贸易和私有制就会出现。于是社会管理、维护私产和地位的努力就会导致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形成。由于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趋势，因此，文明和国家起源是自然发生的必然过程^①。

美国学者魏特夫认为，早期文明起源的一些主要地区都存在大规模灌溉农业，他据此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早期国家和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他的论点是，水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使得大规模的农业灌溉需要集中控制的管理和协调。在缺乏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只有投入大量劳力，这就需要进行协调、赋予纪律和加以领导的有效管理，一旦这种组织机构发展起来，它就会承担起监督其他活动的职责，制订其他类型的公共计划，建立社区制度和防务。这种多功能机构的首领就是具有国家水平的专职管理人员。当统治阶层形成，在实施管理的同时他们也会通过操纵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②。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是对现象产生原因假设的一种逻辑推理和因果机理的阐释或说明。由于理论偏重通则或抽象的规律总结，因此在尊重史实和强调材料客观性的研究中，理论往往被认为是主观见解而受到漠视。比如，兰克学派“让史实说话”的客观主义反对用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和观点解释历史。博厄斯派人类学也认为历史只能是对事实和现象的经验观察，不应有任何抽象的推理，因此其研究忽视理论，强调事实比理论更重要。于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中，对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的研究均缺乏理论关照。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张光直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理论的讨论。受史学影响，中国考古学也表现出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倾向，在考古活动中根本没有理论的地位^③。

考古学理论是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新考古学的兴起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因为新考古学强调科学的实证方法和社会规律探究的重要性，于是用理

①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②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张光直：《序》，见布鲁斯·特里格《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论和通则来解释社会演变的原因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目标。因此，对理论的重视是随着学科范式的变革而上升到显著地位的。同时，问题导向的研究对方法论的要求也达到新的层次。要回答理论提出的问题，经验和常识已经无法胜任，而必须用严谨的材料分析来检验。

夏鼐指出，就像世界上大部分早期文明问题一样，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应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时期正处于文字萌芽和初创的阶段。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只好主要以考古学的实物材料为佐证^①。不仅如此，当下的文明和国家探源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何时何地的问題，像 20 世纪上半叶那样根据柴尔德提出的城市起源的 10 条标准判断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相反，现在的文明探源研究，不仅要确定文明形成的时间，而且要探究文明形成的原因和孕育过程。因此，现在的文明探源要用“社会复杂化研究”表述，就是要了解同质性的、彼此独立的原始社会如何逐渐发展到异质性的、相互依存的国家社会。显然，这样的研究不可能单凭材料和文献证据的收集得以完成，原始社会的物质文化和文献记载不会自动告诉我们答案，我们需要通过现象分析和理论阐释解决这些问题。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蒂姆·马瑞指出，考古学家如果没有理论就无法解释事物，而几乎没有考古学理论不是抽象的^②。因此，理论是帮助我们在静态的考古证据与动态的社会变迁之间做出解释和历史重建的桥梁。

美国学者罗思曼(M. S. Rothman)将社会复杂化定义为这样一个社会转变过程，一批生活在各处遗址、彼此紧密相关的人群中，产生了经济、管理和宗教上质量有别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的核心，就是功能上的分异(segregation)和集中(centralization)。分异是指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部分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分异和集中程度愈高，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也就愈高^③。美国人类学家麦奎尔(R. H. McGuire)将社会“复杂化”分解为“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不平等”(inequality)两个概念，前者是指

①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见《考古学论文集》(下)。

② 蒂姆·马瑞：《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多样性及其问题》(马萧林译)，《华夏考古》2002 年第 3 期。

③ Rothman, M. S.,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y: Mesopotamia in the late fifth and fourth millennia B. C.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4, 12(1): 76.

社会群体之间人口构成或职业的分化，后者是指一个社会内部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差异。这两个变量导致社会结构在横向和纵向的特化，使得社会日趋复杂化^①。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新进化论的流行，许多唯物主义理论开始被用来解释社会复杂化的过程，探究从游群、部落向酋邦和国家的演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卡内罗(R. L. Carneiro)和哈斯(J. Hass)的战争或冲突论、拉斯耶(W. L. Rathje)的贸易论、弗兰纳利(K. V. Flannery)和雷德曼(C. L. Redman)的系统论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和完善，表明人们的研究从早期比较狭窄的单因论转向多因论的阐释。比如，从强调水源、人口、战争、贸易等某单一原因，转向文明起源多种原因互动的探究。这就意味着文明和国家起源受几个主要变量的制约，但是这些变量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明起源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各有千秋^②。

在新考古学的鼎盛阶段，文明探源研究表现出对制定社会变迁通则的强烈兴趣和对历史学研究的漠视，学者认为通则性研究是考古学跻身其他规律性总结学科行列的必由之路，其地位要高于以编年和叙述为己任的历史学。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人们发现将通则和理论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割裂开来是不对的。任何一门历史学科的目的，不仅要注重描述，而且要对特定事件加以阐释。如生物学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它虽然能够完美解释生物进化的原因，但是某个生物的进化轨迹问题还是需要古生物学的经验性研究和证据积累来解决，这是通则性的进化原理所无法解决的^③。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国际学界对文化在塑造人类观念和行为上的重要性予以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因此了解文明起源的轨迹，必须了解文化的异质性特点。于是，文明和早期国家比较研究受到青睐，人们希望更加详细地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独特性和共性，了解这种独特性和共性的原因，以便更好地了解每个早期文明的特点

① McGuire, R. H., *Breaking down cultural complexity: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3, 6: 100—105.

② 参见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布鲁斯·特里格：《史前考古学的目的》，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和产生原因^①。

中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研究主要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开展，而在国际学界，人们更加重视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在这一领域的参与。关于人类学在重建史前社会的作用，张光直有这样的建议：“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具备所有种类的蓝图，这些习俗与制度，在考古遗址里面，只有一点物质痕迹残留。不熟知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工作者，很自然地将这些遗物只当作物质文化处理，熟知各种习俗制度蓝图的考古工作者，便有可能根据残存的部分将全部习俗或制度复原^②。”因此，在文明探源工作中应该采取历史学(文献研究)、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相互结合或交叉的途径。下面将讨论各类学科的优势和欠缺，以及它们之间可以互补的优势。

作为非常珍贵和重要的历史信息的来源，古代文献可以告诉我们具体国家或朝代诞生和更替的年代、地点、国王的名称以及世系。中国有丰富和悠久的编年史，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也可以得益于这个独特优势。然而，古代文献也有它的缺陷，即研究者需要对其进行科学的梳理，而不能以深信不疑的态度简单加以应用。古代文献的显著缺点包括：(1)世界各地文字的出现大多晚于原初国家的诞生，如甲骨文出现在晚商，而有的文明和国家如印加帝国甚至没有文字。因此，古代文献的研究并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文明与早期国家是如何形成的。(2)早期文献大多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而并非编年史，如殷商的甲骨文及玛雅的象形文字就是这样。在解读这些文字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通过逻辑推理重建当时的习俗和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和政治关系，根据社会科学理论判断当时社会的结构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性质。(3)诚如李峰所言，几乎所有历史记录都产生较晚，这种晚出的史料已丢失大量重要信息，并会经历文学上的增饰和修改。即使被看作当时政治和生活实录的第一手证据——金文，也仅仅告诉我们其拥有者的荣耀和成就，而难免带有作铭者的

^①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张光直：《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见《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偏见和主观性^①。陈致也指出，传世文献固然重要，但是不能一味信赖，因为大部分文献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重新编订和辗转誊录或口耳相传，有些可能已非初意。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已与后来的增益混为一体，要从后来者的编撰和篡改中筛选出某些事实，并非易事^②。

因此，文献虽然非常重要，但在文明探源工作中应该仔细分析，审慎使用，也不能将文献记载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构建国家历史的蓝图^③。历史学不宜照搬古代文献对各种社会制度的描述和称谓，如古代文献中的古国，是否能等同当代社会科学所定义的国家，要靠具体证据来判断；更不宜将文献记载与无案可稽的考古发现直接对号入座。我们还应避免采用单线进化论模式和术语对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进行简单定性。比如，不应仅仅根据随葬品的差异断言贫富差异和阶级分化，推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不应仅仅以人殉作为判断奴隶社会形成的标志，一味将奴隶社会推前至新石器时代；也不应仅仅以聚落的围墙作为城市出现的证据，推断的文明起源。古代文献并不告诉我们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后者需要我们根据当时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加以判断。因此，与其说文明探源要仰仗文献与地下之材的互补，不如说它主要是依靠考古学对出土材料的解读解决问题。考古学能够直接研究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和痕迹，但是它最大的缺点是材料和证据往往残缺不全，而且并非像文字那样不言自明，这就需要考古学家像侦探一样从中提炼信息，参照人类学的理论模式破解历史谜团。这种重建很像古生物学家利用现代动物的体质特点复原绝灭动物的运动机理和生息，通过观察现生动物的适应和变异来构建物竞天择的进化理论。

拥有丰富而古老的文献，对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和创新并非福音。因为考古学理论方法主要是由史前考古学而非原史或历史考古学所取得的。在欧洲，历史材料最为贫乏的北欧成为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摇篮。因为无文字可供断代，埃及学家皮特里在法尤姆发掘前王朝墓地时发明了原创和精致的

① 李峰：《西周的灭亡》（徐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陈致：《从礼仪化到世俗化》（吴仰湘、黄梓勇、许景昭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

类型学方法^①。同样，由于北美殖民前时期根本无文字可考，所以美国考古学一直致力于理论方法的创新来从物质材料中独立提炼信息。自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 R. Willey)开创聚落考古学的先河以来，聚落形态分析方法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探究社会复杂化的一种有效方法，被称为“社会考古学”^②和“对考古学文化做出功能性阐释的战略起点”^③。威利的贡献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甚至是自汤姆森建立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聚落考古除了可以从生态学的环境适应的角度了解人类的生存之外，它也能被用来了解史前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具体分析中，聚落形态可以从个别建筑、社群布局 and 区域形态三个层次对史前社会做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通过个别建筑，可以了解人们对气候环境的适应、建筑技术、家庭结构、财富和等级差异、手工业专门化、宗教活动、政治体制乃至世俗品味。社群布局与环境、资源相关，也与血缘关系、族群差异、阶级分层、贸易或生产专门化、宗教活动和宇宙观念有密切关系，需要仔细加以分辨。区域形态主要从聚落的区域布局，了解人类生计和经济形态、生产与贸易、政治结构与统治方式、战争与防御、宗教与宇宙观。如果从这三个方面整合研究史前社会各个方面的历时变迁，就能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洞见^④。

在聚落形态研究中，考古学家发现聚落的等级规模或层级是判断社会发展或复杂化层次的有效标志，比如，由区域聚落形态出现了三个到四个层级的分化，也即寨子、村落、镇和城的出现，便可推断国家的形成。但是，这只是一判断依据。除了聚落层级分化之外，还需要从其他方面了解管辖体制的复杂化。单凭聚落的层级有时并不能确认国家体制的形成，如在古典玛雅和殷墟，只有两个层级的聚落形态：一般村落和政治或祭祀中心。相反地，

① 贾洛斯拉夫·马里纳、泽德奈克·瓦希塞克：《考古学概念的考古》(陈淳译)，《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② Trigger, B. G., Settlement archaeology—its goal and promise. *American Antiquity*, 1967, 32: 149—160.

③ Willey, G. 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in the Virú Valley, Peru*, Washington, D. C.: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155, 1953.

④ 布鲁斯·特里格：《聚落形态的决定因素》，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有的新石器时代聚落虽然在规模上出现了三到四级的区域形态，但是最大聚落内部居民并没有职业分工的明显迹象，或者这类聚落在政治上尚未起到管辖其他次级聚落作用，在经济上并未发挥维系各级聚落交换和再分配的功能，因此它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城市。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列举了判断管辖体制或政府机制形成的几种多学科方法，将其结合到聚落形态的分析中，能帮助我们有效地判断社会制度的发展层次和历时过程。

第一种是人口学方法。根据民族学研究，人口总数是社会结构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村落的人口超过 500 就会分裂，人数超过 1 000 到 1 500 人时，这个社会就需要行政机构或头人实施管辖功能。人口越多，管辖机制就越复杂。一般而言，简单部落人口的上限为 5 000 到 6 000，酋邦为 10 000 到 12 000，小国在 10 000 到 100 000，国家在 100 000 人以上。当然，依据单一因素和标准不能确定国家的存在，单凭人口数量的增长也不一定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形成。还有，虽然考古研究很难直接观察史前人口，但是现在已经有从人口学方法从房屋结构、村落大小和墓葬来约略判断史前人口规模。第二种是物质文化分析方法，这是考古学较擅长的的工作。在复杂社会中，贵族群体会拥有奢侈品、豪宅、墓葬和标志地位身份的物品，从而与平民有别，标示社会的等级差异。但是，就和其他标准一样，单凭文化特征也无法得出肯定结论，它必须与其他标准一起为社会复杂化提供更多信息。第三种是社会学方法。特里格认为有些证据肯定能够推断国家的存在，这些证据包括：(1) 强化劳力投入的建筑物，如显示高贵地位和炫耀国家权力的宫殿、庙宇和墓葬；(2) 存在全职的专业人士，如工匠、官吏、士兵和侍从，他们的存在导致贵族文化的产生；(3) 与高等级墓葬相伴的人殉和人牲。但是，这些特征在较简单的早期国家中可能并不明显。第四种是地理学方法。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如宫殿、庙宇、仓储、军营、会议大厅等的分布研究，能够提供社会政治结构的信息，考古学家用点位理论确定聚落等级和它们的地理分布。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统一会导致巨大的国家项目如灌溉、运输和防卫系统的营造，如罗马和印加帝国的道路系统、中国的长城和大运河、罗马的界墙和英国的奥法墙等。第五种是肖像学方法。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典玛雅中，统治阶层的艺术会表现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权力肖像”。这些肖像的主题、尺寸、位置、服饰，与被象征对象的等级密切相关。这种肖像学研究，

能够提供关于社会政治结构以及统治者政治心理的非常有用的信息。虽然中国早期文明中没有类似古埃及和古玛雅统治者那样的肖像题材和艺术表现，但是青铜器和玉器也是衡量权力和地位的符号。再如三星堆的青铜人像、良渚玉琮上的人形神徽等，也能提供类似信息。特里格指出，在考古分析中，仅凭单一证据的推测不能得出结论，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需要建立在不同方法合力探究的基础之上^①。

近来，国际考古学界文明探源和社会变迁研究流行一种“世界系统理论”，也即研究一个区域中周边对核心的依存和互动。该方法借鉴由德裔美籍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 G. Frank)1966年提出^②，后由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于1974年完善的世界系统理论^③。该理论起初被用来分析16世纪西印度群岛与欧洲之间的宗主国关系，当时西印度群岛作为欧洲的殖民地在经济上与后者紧密相连。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世界系统并非指整个世界，而是想象有不同“世界系统”的共存，每个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如西印度群岛与欧洲是一个系统单位，中国与周边国家是另一个系统单位。世界系统理论，是基于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系统依附和结构性联系而建立的一种核心—周边辐射状模式。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因国际劳动分工、原料开采与出口及依赖第一世界高端产品之故，而被锁定在与第一世界的剥削性关系之中。第三世界无法遵循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为满足西方利益而重组了其政治经济。世界系统理论对考古学家产生巨大吸引力，因为它能够通过考古学的直观方式将政治、经济和地理联系起来以分析区域聚落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世界系统理论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在西方考古学中日趋流行，被广泛用于分析不同程度和规模的社会变迁：小到美国加州一处河谷内某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大到罗马帝国与北欧、中东和北非之间的关系。将现代世界的国家关系模式用于解释古代社会，自然会产

① 布鲁斯·特里格：《管辖体制的考古》，见《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Frank, A. G.,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1966, 18: 17-31.

③ 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74.

生许多问题。于是，考古学家设法对其加以调整，以符合史前社会或早期国家的区域关系。考古学家采取缩小系统，降低核心的主导作用，让周边扮演更为积极和多样的角色，使两个区域之间的联系类型更加多样化的措施，使该理论模式更加适用于早期国家的情况。考古学家也围绕世界系统模式对早期国家研究的优点进行了争论，其中包括核心主导的强度、系统的规模、流向系统不同部分的物品类型以及周边依存和独立的相对程度。^①总的来说，世界系统确实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种比传播迁移论更能说明问题和解释社会变迁的途径，它的优点是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社会的界线思考史前经济系统的规模，有助于考古学家结合聚落形态和各种器物分布来观察和说明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值得借鉴。

三、实践的进展

美国的聚落考古学方法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张光直介绍到国内。在 1984 年为陕西省考古所做的报告中，张光直指出聚落考古是欧美考古学的主流，它可以把考古发现当作人类社会和文化活动研究的具体框架来操作，还鼓励中国的早期文明研究也要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世界做出贡献^②。同年，在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开设的专题讲座中，张光直详细介绍了聚落考古的概念、方法、操作与阐释^③。在张光直的启发下，中国文明探源逐渐从关注礼器、墓葬、城址和宫殿转向聚落形态。

自 1999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聚落形态问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进行了四年的踏勘、钻探和重点发掘，对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环境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并由此深入探索二里头遗址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遗址在聚落网络中的地位，及其所在聚落群的社会结构^④。与此同时，自 1997 年至 2002 年，一支由中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专家组

① Jennings, J., Core, peripheries, and regional realities in Middle Horizon Peru.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06, 25: 346-370.

② 张光直：《当前美国和英国考古概况》，《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3 期。

③ 张光直：《谈聚落考古学》，见《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④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见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对二里头所在的伊、洛河流域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形态调查，结合地质考古调查、植物学研究和陶器分析，以探索区域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口波动、集团冲突、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农业生产水平、手工业专门化、区域间互动和政治的集中等重大课题。调查面积达 219 平方千米，时段纵跨 6 个考古学时期，即从公元前 6500~公元前 5000 年的裴李岗时期一直到约公元前 1600~公元前 221 年的商、周时期。该项调查发现，早在裴李岗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的腹地的聚落形态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等级分化，但是这些社会基本处于相对平等的阶段，并延续于整个仰韶时期。到了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开始激增，聚落规模明显增大，小米和水稻作为主要经济作物对人口的增长意义重大。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出现第一次集中，形成三级聚落形态，出现灰咀和稍柴两个地区次级中心，其形成动力应该是为二里头提供资源和手工业制品。到了二里岗文化早期，聚落数量有所下降，但是该文化晚期的人口密度和遗址数量又有明显上升。之后，这一地区的聚落形态表现出衰落趋势，这可能与当时早期国家为控制和调动资源而进行的人口外迁有关。这次调查表明，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所体现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国家比肩^①。

在伊、洛河聚落形态调查的基础上，乔玉根据聚落面积来估算各时期人口的变迁，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重建各时期聚落领地的生产力和土地利用情况，进一步探讨人口与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系。在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过程中，人口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其增长和集中可以反映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化程度。乔玉借鉴西方人口考古学的方法，利用 10 平方米以上房屋数量和面积，以及与人口数量密切相关的陶器数量来估算人口，并根据区域可耕地范围及每个遗址的领地范围估算领地生产力，然后根据每个人粟的年平均消耗量和粟的单位面积产量，估算维持聚落人口必需的可耕地面积及土地利用情况。研究发现，伊、洛河流域自裴李岗时期经仰韶到龙山文化早期，先民都有足够的领地生产力养活聚落的人口，基本不存在人口压力。到了龙山文化晚期，聚落数量激增，聚落等级形态出现，一些中心遗址出现农业用

^① 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2 年第 2 期。

地严重短缺的情况。到了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数量有所减少，除少数中心遗址外，所有聚落基本上能够养活自己的人口。二里头二期聚落增加，总土地利用率又达到高峰，人口接近土地载能。二里头文化三期到四期，这一区域保持着三级聚落形态，除两个大型遗址外，其他聚落基本能够保证足够的领地生产力，但是总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研究发现，聚落等级分化与人口增长同步，在伊、洛河流域有两次人口增长高峰，第一次高峰是在仰韶文化中晚期，伴随二级聚落形态的出现。第二次高峰是在龙山文化晚期并持续到二里头时期，伴随有三级聚落形态的出现。分析发现，即使在人口最多的时期，总土地利用率平均为46%。作者认为，伊、洛河流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并非人口压力所致。因此，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动力需要到其他方面，如对区域资源的获取和控制上去寻找^①。

另一项值得称道的研究，是戴向明从聚落形态和陶器生产专门化的发展轨迹来探索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他的研究案例是晋南的垣曲盆地，这里距离文明腹地的伊、洛河流域不到100千米。聚落形态调查表明，从裴李岗到仰韶文化早期，垣曲盆地内遗址数量少，规模小，社会结构应处于部落阶段。到仰韶文化中期，盆地内出现大型聚落中心和三级聚落形态，显示早期复杂社会的出现，社会结构进入酋邦阶段。从仰韶晚期到庙底沟文化二期，聚落和人口规模有所减少，但是仍处于酋邦阶段。龙山时期盆地内的社会规模没有扩大，但是聚落等级再次增加，社会系统控制更加集中，竞争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到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垣曲盆地先后被整合到河南偃师地区早期国家的进程中去，南关二里岗期的考古材料明确显示贵族与平民的差别。在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戴向明又考察了陶器生产的专门化，以作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另一佐证。他借鉴美国考古学家赖斯对手工业专门化发展的判断标准——家庭生产、家庭工业、个体作坊和核心作坊——分析垣曲盆地聚落系统内的陶器生产。根据陶窑分布、陶器特点，作者认为仰韶文化早期的陶器生产基本上以家庭手工业为主，制陶基本为一种兼职性活动。到庙底沟文化二期，陶器生产仍呈分散形势，个体作坊为当时主要的生产方式，专业化作

^① 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

坊可能已经出现，但其规模较小、强度较低。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垣曲盆地成为二里头晚期的一处次级中心，在二里岗文化时期成为一处首要的中心聚落。陶器生产从低级的专业化，发展到集中的专业化生产。南关成为主要生产中心，在贵族的控制下由全职的工匠在专业作坊和作坊群中进行生产。研究证明，陶器生产的专业化过程与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基本同步，聚落形态和手工业专门化方法在中国的实例研究中，可以检验社会复杂化理论的普遍性，并为了解中原地区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做出贡献^①。

1993年，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对以殷墟中心、总面积达800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调查和地质钻探，以了解殷墟及外围地区的遗址聚落形态、地貌环境及遗址形成过程。调查发现，仰韶文化时期聚落较为稀疏且结构匀一，龙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大增，并向西扩展，出现二级聚落形态。早商时期的下七垣遗址和中商阶段的花园庄遗址成为区域聚落中心。到殷墟时期，花园庄遗址消失，洹河下游居民点密集，小屯成为一处大型政治中心，但洹河流域仍表现为两级聚落形态的等级结构^②。虽然洹河流域显示为二级聚落形态，但是两级聚落之间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极不相称、反差极大，表明殷墟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广大区域内的赋税、劳役和进贡。在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都市化进程的研究中，罗伯特·亚当斯也注意到都城对直接毗邻的聚落发展有直接抑制作用^③。所以，殷墟作为国家政体的社会结构与聚落等级需要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考察。

刘莉从更大范围考察中原地区聚落形态的变迁，发现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发展时出现了几个显著变化：(1)遗址数量骤降；(2)聚落规模剧增，表明人口的向心集中；(3)聚落从三级转变为四级；(4)多个竞争的实体变为单一中心支配多聚落的局面；(5)出现青铜礼器；(6)多个陶器类型变为二里头的两个类型。因此，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和二里头遗址在二、三期处于支配地位，暗示这一地区早期国家政体的形成。然而考古学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早期国家的形成和传统认为的夏王朝存在于公元前2100~公元

① 戴向明：《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② 中美洹河考古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③ Adams, R. M.,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early southern Mesopotamia. In Ucko, P. J., Tringham, R. and Dimbleby, G. W. (eds.),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735—750.

前 1600 年间的观点不合^①。这一时期包括龙山文化晚期和大部分二里头文化，而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仍显示为酋邦社会。二里头文化二期国家结构的出现似乎是一个相对突然的事件，如果夏朝确实存在的话，其初期仍是一个酋邦，到后期才发展为一个地域国家^②。

张光直提出，由于青铜器对于早期国家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因此三代都制及其迁徙可能都与控制战略资源相关^③。受这一观点启发，刘莉和陈星灿在聚落形态、陶器及其他考古材料分析的基础上，用“世界系统理论”讨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当二里头文化三期成为人口集中的都市中心时，形成了四级聚落等级。在二里头遗址半径 25 千米区域内出现几处中等规模的聚落，它们是巩义的稍柴、偃师的灰咀和伊川的南寨。作为次级中心，稍柴可能为二里头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农产品，并是一处重要交通枢纽。灰咀附近有丰富的石灰岩，发现有大量石铲等工具和半成品及废料，是一处以石器生产为主的手工业制造中心。南寨位于接近铜、铅、锡等资源的交通要道。从二里头核心再向外辐射，北面有晋南靠近中条山丰富铜矿资源的东下冯和南关，它们是制造陶器和青铜器手工业中心。东下冯在盐湖北面 30 千米处，并处于向北和向南的运输通道上，战略地位非常突出。南关似乎处于铜和盐运输的枢纽上，很可能是为二里头核心开采和提供铜和盐的区域中心。二里头向西辐射达陕西东部，这里发现了八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商州的东龙山遗址靠近丰富的铜、铅和锡矿，是历代开采铜矿和铸造钱币、铜镜和铜器的要地，不远的蓝田还盛产宝石。更重要的是，东龙山还处于连接黄河与长江的西部水路上。二里头核心向南辐射抵达长江流域的湖北和江西一带。盘龙城位于长江、汉水等江河交汇处，是水路交通要道。考古学家在盘龙城发现了从二里头二期到二里岗晚期的文化堆积，在其周边还发现十几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似乎表明二里头政体在长江流域获取铜矿资源的努力。

①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③ 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上述这些周边区域的遗址中，二里头文化和先前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物质文化存在的明显区别，表明存在着从二里头核心地区向外的人口迁徙、文化同化及扩张。由于这些周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都处于战略资源产地和交通要道，因此二里头政体的扩展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的原因。

二里头遗址的社会文化发展到四期让位于早商的二里岗文化，该衰落进程与其东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崛起同步，这两处遗址的年代已进入早商阶段。导致偃师商城兴起的可能是军事因素，而郑州商城则是二里岗时期最大的中心。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和南关已成为筑墙聚落，并继续是陶器和青铜器的生产中心，成为著名的垣曲商城。到二里岗后期，东下冯和垣曲商城衰落，区域聚落系统瓦解，其原因可能与中条山铜矿资源枯竭有关。二里岗文化向周边区域的辐射比二里头文化更广，向西抵达陕西中部，向西北辐射至鄂尔多斯和内蒙古南部，向东到达山东西部的济、泗河流域以及济南的大辛庄，向南抵达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湖北、安徽与苏北。盘龙城在二里岗晚期扩展到 100 公顷，并在遗址中心建立起一座占地 7.5 公顷的筑墙城池，其筑城工具、技术与风格与偃师和郑州商城相同，表明它与北方政体存在紧密的依附关系。同时，陶器起先为本地风格与二里岗风格的混合，但后者日趋主导地位，暗示二里岗晚期中原核心地区向盘龙城移民的加速。江西赣江是受二里岗文化影响的南部边陲，明显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吴城文化，是一支与本地万年文化有别的二里岗文化变体。吴城遗址大约在其中期迅速变为大型区域中心，筑起城墙，内有宫殿遗址、祭祀中心、冶铜作坊、烧制印纹陶和白陶的炉窑群，并在遗址东面 20 千米处发现了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 480 余件晚商青铜器。二里岗文化也抵达长江下游的安徽与江苏，铜陵和连云港附近出土二里岗的青铜器，如斝、爵、觚和甗。这里丰富的铜矿和森林资源以及便捷的水路运输条件，反映了中原核心对周边区域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世界系统”可以用来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青铜器生产和分布，追踪它们采矿、冶炼、铸造到产品分配的全过程。因此刘莉和陈星灿认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以核心区获取和控制周边关键资源为特点。二里头和郑州商城等初级中心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迅速增强及其影响力的扩张，表明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出现了集中的地域国家，其势力范围并不固定，对周边区域的控制可能运用了军事征服、移民、殖民、结盟、交换显赫物品和联姻等各种直接和间接手

段。他们的研究也支持了张光直的论断，即为获取权力而生产青铜礼器和武器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主要因素之一。虽然考古证据仍无法证明二里头就是夏王朝的都城，但是对二里头复杂政治经济系统的研究证明，该政体已超越酋邦社会的管辖规模^①。

在有文献可稽的原史阶段，早期国家研究仍然需要学科交叉的方法。李峰运用考古、金文和文献与地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西周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历史重建，为我们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范式和印象深刻的阐述。李峰从西周国家的地理环境入手考察其政治空间的特点，确定渭河流域是周人的家园，而豫西的洛阳平原是西周东部所在地，连接两地的地形和崎岖交通使得国家管理非常不便。于是西周地缘政治的一项重大策略就是建立地方封国，以分配土地资源换取诸侯的支持和实行政治管理，于是众多封国沿一条权力中轴线呈放射状分布，与地表形态融为一体。西周在短时间里的过度扩张，使它不得不将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分散到各地，以维持庞大的地缘政治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封地诸侯日强的离心和周边外族的侵扰，使周王室不得不兼顾平叛和征伐，以消除内外危机。到西周中期，国家已明显出现混乱和衰落迹象，并伴随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西周晚期，国家已积弱难返，内有贵族对抗，外则背腹受敌，需要面对东西两侧频繁的外族入侵。公元前771年，西戎攻入渭河谷地，劫掠丰镐二京，杀死幽王，西周灭亡。《西周的灭亡》中，李峰掌握了西方史学的长处，以事实为基础、以理论探讨为途径，使整体框架和局部有机结合，并与其他学科进行融会贯通。

以上这种历史的重建，不仅是对文献记载的完善，而且是对整个历史场景和事件过程的复原，既有详尽的细节陈述，也有鞭辟入里的因果阐释。如有文献作为证据，历史重建的过程和图像则会更加具体和精确。上述成果也基本印证了张光直的看法，即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是政治和财富的结合。这与埃及、玛雅、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早期国家起源中环境、人口、灌溉、贸易等因素所起的主导作用有别。这应该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对世界社会科学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

^①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四、小 结

从文明与早期国家这项战略性课题的发展来看，中国与西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希腊哲学家对国家起源的思考到现代考古学的全方位实证探究，经历了思潮和范式不断更新的过程。由于欧美缺乏悠久的成文史，考古学家更注重从考古材料中独立地提炼信息，重建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完善社会变迁通则，考古学也一直与自然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保持持续与密切的关系，通过学科交叉吸收和借鉴有用的理论方法，表现出研究成果的不断精进。中国国家起源研究长期囿于“二重证据法”对古史的补证价值，对文明探源课题的多学科探究只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但其进展令人鼓舞，并正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文明探源中。在古老文献的帮助下，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史的重建可以提供其他国家文明探源所无法企及的、更加具体和更为详细的历史图像和规律阐释。

学术全球化是当下学界讨论的热点，从本文介绍的成果来看，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一些新进展便得益于中外学术的密切交流。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对这项工作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学者从过去被动地了解信息，变为主动地创造信息，这种独立创造的经验也能修正和完善基于西方经验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理论^①。

中国的文明探源与古史研究应该像张光直所言，从专业向通业转变。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如果按照按材料性质区分专业，有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中国古史研究就会变得四分五裂。如果搞通业，我们不但要将各种专业融会贯通，还得把中国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各地的情况做比较。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没有中国学术的训练就难以深入，但缺乏世界眼光的话也如坐井观天，讲不彻底^②。因此，打通各学科之间的隔阂，破除与国际学科范式之间的藩篱，应该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努力的方向。

（原刊《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① 刘宏：《海外中国研究的三大变化》，《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日。

② 张光直：《前言》，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探究早期文明社会的世界观

一、前 言

2012年5月在张家港市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要重视文明探源中精神文明形成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被冷落但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而且它在文明探源中与生态环境、技术经济和政治制度等课题同样重要。如果能够能在这个课题上取得成果，那么对于我们加深对早期文明起源、动力、性质和运转的了解有重要的帮助和启发。但是，古代人类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并不保留在考古遗存中，因此难以企及。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美国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克斯声称，考古研究所能企及的大体限于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那些方面，而对人类最独特的那些方面则无能为力或很难加以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研究难度级别的霍克斯梯度，即从物质遗存来研究生存方式和经济形态比较容易，重建社会结构比较困难，而最困难的是重建意识形态^①。这一时期，虽然器物研究中无法避免古代器物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方法论，只能停留在推测的层次如将它们定为礼器或仪式用品，很少探究其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和社会功能。而像柴尔德那样认识到宗教在古代文明中重要性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他说，古人创造的迷信和虚幻世界对于他们安于现状和承受生活是必

^① Hawkes, C. F. C.,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4, 56: 155-168.

需的，这是支撑社会结构得以矗立的不可或缺脚手架。城市革命最终被巫术和宗教所利用，登上宝座和拥有大权的是巫术而非科学。于是革命所开拓的新科学，常常被奉承迷信所羁绊^①。

到了过程考古学阶段，对人类物质遗存中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有了很大的重视。比如，路易斯·宾福德就指出，器物是人类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反映，它的技术方面反映了人们如何应付生态环境，其社会方面反映了人们如何用它来协调社会关系，而其思想方面则反映人们的意识形态。宾福德以刀为例，表明其切割功能可满足生活需要，它的金质刀柄显示主人的高贵地位，而其刻在刀上的符号可能是祈求神灵的护佑^②。虽然过程考古学重视意识形态，但是却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对环境适应的一种副现象，在重视程度上不如生存方式、聚落形态和环境适应研究。宾福德对考古学研究古代意识形态的能力也心存疑虑，认为考古学家所受的训练不足以从事古心理学研究^③。

后过程考古学开始将意识形态研究放到了这门学科的显著地位，并体现在这个趋势中的认知领域和象征课题上。后过程考古学家给予古代的思想、价值观、宗教信仰研究以空前的关注，有人指出，了解物质文化在祭祀和显示威望中的作用，是重建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第一步^④。由于“意识形态”是如此不可捉摸，而且无法从考古学记录来论证，以至于难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使认知考古学的发展表现为一种无序、不系统和定义不清的特点。肯特·弗兰纳利和乔伊斯·马库斯认为，认知考古学是更加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一种途径。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能凭空猜想，而应该像过程考古学实的证方法一样做细致、艰巨和严谨的工作。而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就是需要有可靠的民族志、历史学、民族史和考古证据的支持和佐证，否则这种研

① 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② Binford, L. R.,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1962, 28: 217—225.

③ Binford, L. R.,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2.

④ Braithwaite, M., *Ritual and prestige in the prehistory of Wessex 2 200 ~ 1 400 B. C. ; a new dimension to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Miller, D. and Tilley, C. (eds.), *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3—110.

究与科幻小说无异^①。

在考古学中，我们所见的大部分重要文明遗迹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和信仰的产物。从古埃及和玛雅文明的金字塔到英国的巨石阵，从殷墟的青铜器和甲骨到良渚文化的玉器，应该都是当时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产物。有学者指出，在世界早期文明社会中，大部分政治思想从本质上都是宗教思想。这是因为早期文明的统治者都试图将他们与一种永恒的神授秩序联系起来，以便使天赋的神力和神秘性能够支持和增强他们在世间的权威。上层阶级就是用基于宗教的意识形态来证明并确立其行为的合法性^②。

本文试图探讨早期文明社会里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与特点。虽然这种探索可能无法企及说明诸如良渚文化的玉器在祭祀中发挥的具体功能或三星堆文化信仰何种神灵的问题，但是这种史前世界观的探索基于两点人类学理由：(1)所有人类具有基本相似的心理过程和能力，人类社会不会产生无穷变异，而会显示随时间变化的跨文化规律；(2)人类文化具有可识别的形态，即非物质的世界观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诸如聚落形态、艺术、建筑和丧葬实践方面^③。这一尝试希望在宗教人类学理论、跨文化比较的成果和早期文字解读的帮助下，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宗教信仰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二、信仰的起源

宗教信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宗教使人类行为超越自然与物理世界和生物界的界限，超越为获取食物与繁殖的需求而有了文化的意义^④。但是，宗教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征，它是现代人类的特点，其起源与人类体质与智力的进化相关。美国考古学家史蒂文·米申指出，早期人类如能人、直立人和尼人的智慧由四个互不相通的板块组成。一是技术智慧，表现在石器制作的对称和式样的复杂性上。二是自然智慧，是有关动植物、水源和洞穴等

① 肯特·弗兰纳利、乔伊斯·马库斯：《认知考古学》(寻婧元译)，《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② Houston, S. D. and Stuart, D., Of gods, glyphs, and kings: divinity and rulership among the Classic Maya. *Antiquity*, 1996, 70: 289—312.

③ Dickson, D. B., *The Dawn of Belief*,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④ 金泽：《宗教人类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景观地理的知识。三是社会智慧，一般反映在群体大小和营地的规模上。四是社会语言，一般从脑容量、神经结构和声道来了解。米申认为，早期人类的大脑好比瑞士军刀，拥有应对特定行为方面的多种智慧，但彼此间缺乏互动。因此，虽然古人类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相似，但是他们缺少现代人智慧的关键要素：认知的流动性。古人类四种孤立的智慧到现代智人阶段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整体智慧，于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类文化所特有的艺术和宗教现象。然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如西欧的洞穴壁画，与今天非实用性物品和创作的艺术概念应有根本的区别。当时的狩猎采集者不会有现代人的闲暇和雅致来创作与生计无关的艺术。考古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并非是在舒适的条件下，而是人们面临极为严酷的生存压力下创作的。艺术体现了古人类三种认知过程的结合，即脑子里的图像概念、交流意图和赋予的含意，标志现代智人整体智慧的形成，而这种视觉象征性的出现为宗教意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①。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通常被解释为狩猎巫术，在这些地点举行某种仪式是保证狩猎成功和食物供应所必须，其威力可能比拥有一支锋利的长矛更强大。

美国考古学家迪克逊指出，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质形态表明原始宗教实践的存在：(1)物质现象反映宗教活动，如丧葬实践、壁画和可携艺术品；(2)中晚段更多墓葬的出现，包括妇女和儿童。随葬品的增加和葬俗的多样化；(3)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的壁画和可携艺术品风格有较大的一致性；(4)欧洲西南部，人类的居址与壁画所在地存在明显的空间两分，从洞穴壁画所在地缺乏生活垃圾表明，这些并非人类的日常居所；(5)壁画艺术各异，其质量和精致程度也有差异；(6)许多壁画位于不易到达的洞穴内部，可能易于创造某种类似梦境的幻觉。由于宗教活动是有组织的活动，与社会文化系统密切相关。因此，墓葬和仪式形式的复杂化反映了日增的社会复杂化^②。

^① Mithen, S., *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 A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Art, Religion and Scien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6.

^② Dickson, D. B., *The Dawn of Belief*,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特拉梅尔指出，宗教的产生是人类为了应对可怕且不可控制的状况。人类与其他生命都难免一死，加上期望与实际的差距、有限的寿命、疾病、恐惧、沮丧和残忍等不可操控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令人感到畏惧。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是人类与这些状况最终结局进行斗争的感情和智力手段。这种斗争通过对神灵的膜拜结合起来^①。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布瓦耶指出，宗教最普遍的特征就是相信无形的生命。他列举了宗教意识形态的三项常见特征：(1)认为一个人生命的无形部分(如灵魂)在死后仍然存在；(2)认为社会中的某些人拥有与神灵沟通的特殊能力；(3)认为用恰当的方式举行某种仪式能够改变自然界。布瓦耶还指出，宗教意识形态的无形生命违反通常的生物学直觉知识，如尽管认为无形生命可能有某种样子，但是它们并不经历生死、繁衍和兴衰的轮回。同样，它还违反物理学的直觉知识，如无形生命(精灵)能够穿越时空和坚硬物体，来去无影。但是，它也有符合直觉知识的方面，如它们会有像人一样的信念和欲望。布瓦耶认为，正是这种违反和符合直觉知识的混合成为宗教意识形态中超自然生命的特点^②。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认为人类的意识形态经历了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发展阶段，认为科学是文明的最高形式^③。然而在史前社会，巫术、宗教和科学并不分家。比如，古埃及建造金字塔和太阳历的科学知识就是在宗教迷信的实践中创造的。因此，我们现在称之为巫术和宗教其实是古代人类看待自身和世界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布瓦耶指出，宗教源于人类的头脑需要说明、人类内心需要慰藉、人类社会需要秩序、人类智力易于幻想。对于原始人类而言，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谜团。人们被各种令人费解的日常现象所包围，如日月的起落，雷电、降雨、洪水的发生。对于这些现象，神灵能够提供满意的解释。在许多神话中，天上的星宿就是各路神仙。世界各种文化都有太阳神、雷神、土地神、火神、战神、死神等各种掌控自然和人

① Trammel, W. C., *Religion, What Is I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4.

② Boyer, P., *The Naturalness of Religious Ideas: A Cognitive Theory of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③ 弗雷泽：《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世现象的神祇。宗教也为令人费解的大脑活动提供解释，如梦境和灵魂。死去的亲人和祖先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与人们在梦境中沟通。幽灵则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可以说明我们在梦境和幻觉中见到的故人或神灵。宗教可以解释世间生物的起源。人们目睹生物的兴替，但是无法说明其来历和原因，而上帝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宗教除了为人们提供解释外，还为发展中的人类社会提供管理机制。宗教可以将各怀私利的个人聚集起来像一个整体那样行动。宗教可以建立起稳固的社会秩序，支持和规范社会的伦理道德，以阻止犯罪、偷盗和背信弃义。相信和畏惧上帝对每个人操行的监控，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确保社会的正常秩序^①。

原始社会的迷信、神话和巫术被现代社会所轻视，但却为当时社会的必然。正如爱德华·泰勒所言，这种信仰为蒙昧人群所固有。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以人类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但也是以人类愚钝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人类较低智力状态会将彼此有实际联系的那些事物联系起来，但是却曲解了这些联系，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人们还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预言和引发事变，变成了纯粹幻想的性质^②。但在原始社会里，巫术还是具有某种积极的力量。柴尔德说，巫术是由科学实验一样的推理所激发。新石器时代革命并不曾废除巫术，实际上正好相反。面对难以预测的自然灾难，人们仍然用祭祀、符咒和魔力来趋利避害。任何以自己魔力成功控制这些未知因素的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赢得巨大的威望和权力。太阳历的发现就是古埃及国家王权的来源之一。柴尔德还对巫术和宗教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由非人格化的力量所直接控制，而后者的力量是人格化的，因此可以像人一样用恭维和祈求来施加影响^③。由此可见，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说与人类世界观的发展息息相关。

三、宗教与社会复杂化

社会人类学家以不同的模式说明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比如，罗思曼将社

^① Boyer, P., *Religion Explained: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Religious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 2001.

^②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重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会复杂化定义为功能上的“分异”和“集中”。分异是指职业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部分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①。麦奎尔将社会复杂化分解为“异质性”和“不平等”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社会群体之间人口构成或职业的分化，后者是指一个社会内部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差异^②。多尔认为社会复杂化表现为三个过程：一是结构的分化，二是功能的特化，三是结构与功能整合到新的机构层次^③。迪克逊认为，多尔的模式比较契合宗教体制的发展。社会越复杂，宗教信仰和实践也会表现出更加多样化、异化和特化的特点。他以社会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定义的四类宗教机构来描述宗教信仰的发展。这四个宗教类型包括：(1)个人宗教，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宗教形式。其特点表现为仪式无需由萨满或巫师等专职人员操纵。大部分游群的宗教实践属于这个类型。(2)萨满教，其特点是由兼职的萨满操纵。这些萨满或与生俱来，或通过训练获得了一种与超自然力量、神灵和祖先沟通的能力。(3)群体宗教，是比萨满更复杂的一种宗教实践，见于有相当人口规模、政治和经济复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存在专职的宗教人士。(4)教会宗教，是最复杂的宗教形态，仅见于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系统。其特点是存在全职的神职人员，并以一种等级制组织起来。宗教形态的复杂化表现为在复杂宗教类型出现后，简单和原始的类型仍然会继续存在^④。

美国人类学家金斯利·戴维斯在谈到过去几千年来宗教理论与实践的一般性发展变迁的特点时指出，当人类从小型、孤立的社会向大型、复杂的都市社会发展时，宗教信仰会发生5种变化：(1)神祇会逐渐退出本地的舞台；(2)拟人化会减弱；(3)宗教日益与日常事务分开；(4)宗教的同质性减少；

^① Rothman, M. S.,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y: Mesopotamia in the late fifth and fourth millennia B. C.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4, 12(1): 75—119.

^② McGuire, R. H., Breaking down cultural complexity: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3, 91: 142—105.

^③ Dole, G. E., Shaman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among the Kuikuru. In Gross, D. R. (ed.),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Native South America*,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3, 294—307.

^④ Wallace, A. F. C., *Religio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5)宗教系统开始分裂，并发生冲突。所有这些发展特点可以归为世俗化的趋势^①。由于教会宗教是现代社会的宗教形态，因此在史前或早期文明阶段，宗教形态至多发展到群体宗教的层次，仍应表现为强烈的萨满教特点，只是主持仪式的祭司可能已由贵族或专职人士承担，而且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萨满和巫术关注通灵、治病和驱魔等实践范围。

在研究史前或早期文明社会中的宗教时，最大的问题是将原始宗教和意识形态与后来或晚近超凡脱俗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提并论。古埃及有“神”“祭司”和“崇拜”这些词汇，却无“宗教”这个词，因为宗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早期文明社会像游群和部落一样，并不像我们那样在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进行区分。在这些原始人看来，他们所处的自然界，超自然力量无处不在，并因它们而生意盎然。因此，自然和超自然并无区别，所有东西都是活的、有意识、并且相互关联的。自然界由拟人的力量所操控，只不过更加强大，因此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这些力量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神祇和精灵。大约从公元前第一千纪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希伯来的犹太教、波斯的祆教、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开始挣脱原始宗教的绝对束缚，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神灵的超自然世界区分开来。在希腊，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否认超自然的存在，只有社会和自然界才是与人类相关的领域。晚期的欧亚前工业社会一项最伟大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发现，是注意到自然界根本不同于人类社会。于是，人类的思想开始从宗教和神话中解脱出来，开始以理性的思维看待社会和自然界。每个思想家的传道解惑成为一种认知的基础，起先它只是吸引个别的追随者，后来则是整个民族。这些思想体系成为世界主要社会体系的基础。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恰当地将人类世界观发生巨变的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始^②。

虽然古代社会的人们将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者不分，但是他们像我们一样明白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特定的石头可以用某种方法打制，黏土烘烤后能够变硬等。古人与现代人世界观的差异主要在于看待天地万物的性质。

^① Davis, K., *Huma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ian Publishers, 1949.

^② Jaspers, K.,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古人会以他们的理解来看待世界，将其视为与人类社会相同。宇宙是由像人一样的强大力量所主宰。于是，当人类需要超自然力量来帮助他们克服自然和社会危机时，就能求助于它们。古人可能深信，凡是可以说出、写出、画出的事物，在一定宗教仪式的魔力作用下，可以变成现实或另一个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这是古代信仰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①。

由于早期文明社会将超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体，因此当时社会可能将取悦神灵看作是像吃饭睡觉一样不可或缺甚至更重要的生计。美国考古学家蒂莫西·厄尔指出，在意识形态上，酋邦普遍表现为“神权”性质，普遍建造巨大的纪念性建筑来创造神圣景观的仪式地点，以便使将尘世与宇宙相连。在仪式中，酋长扮演“神”的角色^②。在早期国家里，国王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理人。布鲁斯·特里格指出，早期文明的国王位于社会的顶点，成为联系世间万物和社会福祉所系的超自然力量与人类之间最重要的纽带。这种关系由仅限于国王及其代表所掌控的祭祀仪式来协调^③。这种沟通人神的特点，使得早期文明的宗教和祭祀活动带有强烈的萨满教或巫的特点。张光直就指出，中国早期的巫与萨满具有极为相近的功能。

萨满源于东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专指能与神灵沟通的巫覡。后来它被视为古代宗教的普遍形式，常与现代其他正式宗教如佛教共存。萨满活动的主要焦点就是出神的降神会，萨满或巫师用这种仪式来治病、驱魔、调解和占卜。仪式以击鼓、唱歌、跳舞、穿戴精心制作的盛装来表演^④。虽然酋邦和早期国家的宗教属于“群体宗教”，但是其与神灵沟通的仪式与萨满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扩大，主持仪式由酋长或专职人士掌控，酋长用这种降神的力量来强化他的地位和权力。

弗兰纳利和马库斯用乔纳森·弗里德曼研究缅甸克钦人的民族志资料，

① 蒲慕州：《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版。

② Earle, T., Chieftoms i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87, 16: 279-308.

③ 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介绍了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平等群体中，社会是由一系列平等声望的世系所构成。有一个村寨神被视为所有当地世系的遥远祖先。在更高、更遥远的地方有一批“天神”，在此平等阶段，任何一个世系都能通过自己祖先的媒介与这些“天神”沟通。在向等级社会的转变中，“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村寨神被某特定的当地世系所垄断。于是，该世系就转变为首领世系。这个首领世系现在与主要天神直接相连，并与他有姻亲关系。该贵族世系的首领成了在超自然和社群之间进行沟通的调停者，旧的平等意识形态被世袭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当部落社会向酋邦制转型时，形成中的贵族世系——本来只是在轮流做东的情况下才由他来代表其社群——逐渐开始永久接管宴庆主办者的工作^①。依此类推，早期国家的国王只不过是垄断了整个社会与神灵沟通的权力而已。

张光直指出，巫覡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占有核心地位。当时，只有掌握着人神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和权力。于是巫便成立每个宫廷必不可少的成员。三代王朝创立者的功德都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甲骨文中，有商王占卜问风雨、祭祀、征伐或田狩的记载，也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梦的内容。它表明，商王就是巫师^②。吉德炜认为，商人将自然现象看作是神灵所为，因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并没有像我们那样将神圣和世俗区分的观念。于是，像刮风和下雨这样的现象天生就有神圣的意义。甲骨文显示，商人认为，这些自然现象由风神或雨神所造成，但是这些神祇是听从帝或土这样的最高神祇的驱策^③。

这种萨满教传统在西周仍然延续，郝铁川认为周公也是一个巫师。理由是：(1)据《史记》记载，周公曾先后两次为武王、成王跳神治病；(2)西周的巫祝卜史官职通常为家族世袭，周公后裔邢也为太祝；(3)西周的重要占卜活动都是由周公亲自进行；(4)巫祝的一个职能就是看风水，周公曾为兴建东都洛邑占卜；(5)周公在摄政时，用商代巫祝卜官辅佐商王的先例以证明自己辅

① 肯特·弗兰纳利、乔伊斯·马库斯：《认知考古学》(寻婧元译)，《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② 张光直：《巫覡与政治》，见《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③ Keightley, D. N., *The Ancestral Landscape: 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佐成王的合法性。然而，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应该是周公“制礼作乐”的贡献，他为治国方略建立起世俗的道德法规，为将依赖巫术执政转变为礼制执法做出了贡献^①。这似乎是东周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轴心时代”来临的先声。

四、意识形态的物化与研究

如果将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看作虚幻的思想活动，那么考古学可能对此束手无策。但是，在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当思想和信仰的交流 and 一体化超出个人和社群的范围，变成酋邦和早期国家全体民众的身份认同时，统治者必须采用文化手段和政治策略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将意识形态加以物化，使之成为具体而有形表现，可以用来反复教育和团结其臣民。于是，考古学家便能从各种物化手段来解读古代的意识形态。德马里斯等人介绍了意识形态物化的四种表现^②。

第一种就是祭祀仪式。通过举行和参加仪式、舞蹈、宴饮和布道，主持者在参与者中培养一种共享的经验，并用作协调社会各阶层权力关系最有力的手段，包括争权夺利的部落首领到新征服的社群。在许多社会中，仪式会在固定时间，按农历或节庆周期重复举行。许多仪式需要消耗大量食物和用品，展示各种塑像和象征性物品。在酋邦社会中，酋长定期举行仪式和宴饮以展示他调动资源无人可及的能力，以培养臣民对他的依赖和忠诚。早期国家的仪式除了炫耀巨大的财富与国力外，还明确展示权力的不对称。有些仪式会用人牲来展现政治高压。仪式用品会仔细设计制作，以符合表演和演员的不同标准。

第二种是肖像和象征物品。它们包括个人的仪式用品和服饰、绘画、各种雕像和图徽。可携的象征物品有利于在个人、社会团体以及政体之间流通，以确立依附、联合或对应关系。由于象征物品能够拥有、继承和转让，于是它是个人社会地位和权力最好的标志。在墓葬里，随葬品在墓主人死后仍然发挥着这种功能。象征物品一般限制流通，因此极为珍贵。

① 郝铁川：《周公为巫的历史意义》，《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26日。

② DeMarrais, E., Castillo, L. J. and Earle, T., Ideology, materialization and power strategies.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6, 37(1): 15—31.

第三种是纪念性建筑和景观。一些公共建筑如人工土墩和金字塔、大型建筑物、政治活动中心和防卫建筑，能够令臣民叹为观止，对统治者的力量和权威产生敬畏之心。有些大型建筑物如金字塔能被广阔地域内的民众目睹，是进行教化、控制和宣传的理想工具。纪念性建筑也会用作仪式场所，贵族和统治者会对这些建筑加以使用来显示他们的地位，如埃及、玛雅国王和贵族的墓葬往往被安置在金字塔建筑之下。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和良渚文化的祭坛可能具有同样的功能。

第四种是文字系统。书写的文件如甲骨、石碑和纪念物上的铭文、法律文书、契约和故事是信仰系统的具体表现。文件能使统治者建立的规则和关系正式化。成文的宗教解释经文、祷文和祭祀传统，将这些讯息规范化，以便在广阔范围内传播和执行。书写的文件也能传递政治信息和进行宣传。虽然整体识字人口不多，但是文字可以作为一种秘传知识，以显示贵族和宗教人士的能力和权威不可或缺。虽然在各早期文明中，文字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国殷商、古埃及和古典玛雅的文字确实与意识形态相关，有了这些文字，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窥视到当时社会的世界观和宗教信仰。

在考古研究中，我们习惯于将那些无法说明其用途的物品看作是仪式用品，或将某种葬俗和艺术表现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比如，将墓葬的头向解释成灵魂归宿的方向，将在人骨上撒赤铁矿粉和涂朱看作是希冀死者的重生，将瓮罐葬瓮底的小孔说成是便于灵魂出入，将仰韶彩陶上的鱼纹人面图解释成巫师，等等。对于史前社会这类现象的主位(emic，即从器物主人的角度)解读，如果缺乏文字证据可能永远不得其解。尽管我们无法对史前仪式用品的具体功能做出可信的解释，但是根据人类学的规律探索和意识形态物化的特点，我们还是能够对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以及反映的政治权力做出恰当的推断。

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我们所见的大部分所谓的仪式用品和丧葬实践可能都反映了个人宗教和萨满教的层次，这类意识形态器物大多表现为异质性特点，虽然某种区域文化中日用的陶器类型比较一致，但是宗教器物可能多为个人物品，较少雷同。表明当时部落和聚落单位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仪式由独立的巫师或萨满操纵。柴尔德曾经指出，有明显使用价值的工具、武器，及其他技术用品会被贸易和仿造而迅速传播，而装饰品和葬俗反映了

局部品味，相对不易传播^①。个人宗教和萨满教的信仰应该表现了局部人群的品位，如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8 000年前龟甲、骨器和石器上的契刻符号和七孔骨笛^②，应该就是萨满仪式的用品。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令人瞩目的蚌壳摆塑龙虎图案^③，将其看作巫师的墓葬并不离谱。

从萨满教向群体宗教的发展似乎与酋邦的复杂化同步，这在海岱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比较明显。比如，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大伊山遗址的石棺墓中出土了少量璜、玦和穿孔玉珠，似为个人饰件。而相同时期江苏沭阳万北遗址有红陶钵覆面的葬俗，仪式器物不很明显。但是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仪式用品也开始日益复杂，并呈现一定的分布范围。其中以莒县陵阳河遗址比较典型，除了墓葬表现出地位和贫富差异外，富墓出土了钺、玉璧、骨牙雕筒和大量的白陶鬶和黑陶高柄杯，刻有图像文字的厚胎大口尊，并在陵阳河、大朱村、尉迟寺尧王城等遗址发现八种二十余字。大汶口文化中比较流行的还有用猪的下颌骨陪葬，墓主手执獐牙钩形器。这些显然是举行仪式和宴饮的物品，出现的图像文字可能作为最早的象征符号显示或传递贵族或祭司拥有某种权力的信息。中晚期的花厅遗址大墓出土了几十件玉器，用人殉、整猪和整狗陪葬。其中M20的规模惊人，墓坑掘入基岩内一米以上，用两名少年殉葬，男性墓主颈挂两串玉珠、左右手套有玉瑗和玉环，头和腰部各置一件精美石钺。墓主显然是一位集酋长与祭司为一体的人物。花厅出土的玉器与良渚玉器非常相似，曾被认为是良渚远征军的墓地。如果考虑到早期文明的强势辐射能力，这类玉器的广泛分布并不令人意外，一如西周青铜器在其势力范围以外地区的发现。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骨牙雕筒趋于消失而玉器出现，并普遍出现卜骨，邹平丁公遗址的陶器上发现11个文字，蛋壳陶高柄杯和陶鬶则成为普遍的仪式和宴饮器物。栾丰实正确认识到这些都是当时的宗教法器，但是对这些器物变化的内涵颇感困惑，觉得这是神权地位逐渐下降和王权出现的表现^④。其实，早期文明的权力是由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

① Childe, V. G.,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③ 濮阳市文管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④ 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四种权力组成，国王和酋长就是以独特的方式联合操纵这四种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觉得，骨牙雕筒被玉器和卜骨所取代，很可能与酋邦规模的升格与仪式的变化有关。大汶口时期的獠牙钩形器和骨牙雕筒也许因制作成本较低和材质较普通神秘性显然不及玉器，可能是级别较低的仪式工具。玉器从材料和劳力投入来看是更加显赫的物品，而甲骨占卜在沟通人神的仪式上更具神秘性。因此，前者的消失可能与龙山时期的酋邦日趋复杂，酋长或祭司权力和地位日增，需要改用更具超自然力的仪式用品有关。

意识形态的物化以良渚玉器最具代表性。牟永抗根据反山、瑶山大墓中玉器的出土位置复原了良渚最高酋长的打扮：“头戴缀着三叉形式的冠冕，众多的锥形饰立插在冠上的羽毛之间。头的上端束三副缀有四枚半圆形额饰的额带……颈项及胸前缀满珠串，有的还佩以圆牌或璜。两臂除环镯之外，还有串珠组成的腕饰，左手时常握有柄段嵌玉的钺，右手则握以其他形式的权杖或神物。”^①这完全是一个大巫或祭司的打扮，如果他站在祭坛上，点起熊熊的圣火，供起琮璧，便可与天地沟通，令万民膜拜。玉琮和玉璧一直沿用到历史时期，《周礼》上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说法。而东汉郑玄注“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璧和琮为祭祀天地的礼器是比较可信的^②。良渚文化分布在太湖流域从苏南到钱塘江以北大约 36 600 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在约 1 300 年的兴衰过程中，这一区域的不同社群用相同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文化认同，用不同类型和数量的玉器，从纵向厘定整个社会的等级地位，从横向确定各地次级酋邦和社群之间的依附和从属关系，并用反复举行的仪式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玉器类型的变化也折射除太湖流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在马家浜文化时期主要是以玛瑙、玉髓为材质的玉玦，为个人饰件。如有信仰崇拜也仅限于个人宗教和萨满教的层次。崧泽文化时期开始使用真玉，类型有璜、环、玦和坠饰等，信仰层次社会结构与马家浜时期相仿。到了良渚文化时期，

① 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汪遵国：《论良渚文化玉器》，见《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璧、琮、钺、三叉形器等的大型仪式用品的出现，成为宗教祭祀的法器^①。从玉器使用的变化，我们明显可以看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还是平等部落社会，而良渚的群体宗教明显进入了酋邦社会。

复杂酋邦和早期国家的体制转变可能无法从世界观和宗教仪式上加以区分，但是用于仪式显赫用品上的投入也许可以作为某种衡量尺度，如二里头的青铜爵和青铜铃和商代种类繁多和体量巨大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的稳定需用武力来维持外，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必须靠祭祀来强调，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能量都被投入到兵器和礼器这两项没有任何回报的生产中去。

此外，商、周的文字给了我们以直接了解早期国家世界观的机会。殷商的甲骨文表明，殷人没有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者的区分，人、祖、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超自然力量包括上帝、祖先和各方神祇（主管天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殷人通过占卜与这些超自然力量进行交流沟通，而且这种关系并不涉及道德或感情因素。殷人通过仪式向神灵祖先进行献祭，祈求它们的庇佑和赐福。目前所见的占卜资料仅限于王室的活动，并不清楚民间是否也能进行同样的宗教活动。但是，从上面缅甸克钦人的民族志资料来看，形成中贵族是通过垄断整个社会与神灵沟通的仪式来获取地位和权力的。因此，举行祭祀仪式与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应该是商王的专利，并借此掌控着国家的最高权力。西周的意识形态大体与商代相近，但金文和其他文献显示出一种不同的面貌。殷人的上帝不过为诸神中的一员，但是周人赋予上帝以道德判断意志和世间最高仲裁者的地位，宗教仪式开始具有道德天命和礼制规范的意义^②。这就是上面提及的周公将国家权力从巫术执政转变为礼制执法的意义。

五、小 结

在早期文明起源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中，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考古学对史前仪式用品和现象无法做出主位的解释，大体限

^① 汪遵国：《太湖流域史前玉文化历程》，见《良渚文化论坛》，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私——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于主观的推测。但是从本文的讨论来看，有了宗教人类学、民族志的比较和历史资料的帮助，我们还是能将史前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探究置于较为坚实的理论 and 实证基础之上。酋邦和早期国家处于群体宗教阶段，具有强烈的萨满和神权特征。当形成中的统治者逐渐加大将意识形态用作权力基础时，他们会在仪式用品和纪念性建筑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劳力。这种物品和建筑都会体现显赫技术的特点，这就是不计成本和没有回报的巨大投入。于是考古学可以从仪式用品和纪念性建筑上投入的能量来观察和衡量当时的政治等级、经济实力、劳力调遣规模以及社会凝聚范围。

以“轴心时代”为分野，我们应该慎将早期文明的世界观与历史时期的“礼制”和当代意义的“宗教”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世俗社会的两元划分。在早期文明中，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位一体。古人将神灵和祖先看作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成员，随时可以通过仪式沟通。他们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和献祭犹如空气和食物一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由于神灵的无所不能和人类的弱小无助，古人便会时时祈求神灵以应对叵测的命运和各种灾难。对于复杂社会中的首领，他们自然会借助神灵以确立自己地位和权力的合法性，宗教仪式便成为支撑政体和社会系统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因此，早期文明中的政治和信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中国，大约要到春秋战国，古人才将天地和人看作是不同的范畴，需要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于是才有政教的分离。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古人的世界观，我们也许能够对早期文明起源及社会复杂化进程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

(原刊《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6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第五部分
后过程考古及其他

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

一、前言

女权主义是源自西方争取妇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和社会运动。自 19 世纪出现后,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有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政治诉求,但是对考古学研究几乎没有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初,受到其他社会学科如社会学、文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对性别问题兴趣日增的影响,性别问题开始与意识形态、象征、结构、认知、个体和能动性等议题一起,成为欧美后过程考古学的热门话题^①。虽然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成为挪威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直要到 80 年代初,当琼·杰罗于 1983 年发表了《考古学中的性别偏见:跨文化的视野》^②和玛格丽特·康基与珍妮特·斯佩克特于 1984 年发表了《考古学的性别研究》^③这些先驱性论文之后,北美考

① 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② Gero, J., Gender bias in archaeolog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Gero, J. et al. (eds.), *The Socio-Politics of Archaeolog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Report No. 23, 51-57.

③ Conkey, M. and Spector, J.,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gender. In Shiffer, M. B. (ed.),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 7: 1-38.

古学家才开始讨论考古材料阐释和美国考古学实践当中的性别偏见问题^①。

女权主义和性别问题在其他学科如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探讨远远早于考古学，这是因为早先考古学研究主要关注物质文化的年代学和文化适应等问题，而物质遗存也难以观察个人活动和两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去考古学家毫不关注考古现象中的性别问题，如考古分析常常涉及墓葬中男女性别的比例和随葬品的差别、墓地骨骼的性别鉴定和比例、旧石器时代女性雕像的含义，以及原始社会中的男女劳动分工和是否存在母系制度等问题。当然，这些研究被女权主义者批评为一种“含糊的、根植于我们当下自身经验的”，而且“严重缺乏严谨的方法论和理论”的研究，因此充斥着个人和传统的性别偏见。

美国新考古学家的早期研究，也曾试图用陶器来推断史前社群的居住形态。他们认为，如果原始社会的陶器生产主要是由妇女从事的家庭手工业的话，在母系社会中制陶知识由母传女的家族传承，那么从母居的社会体制会使得陶器技术和形制非常稳定。而父系社会的妇女都来自其他的家庭，所以陶器技术和形制会表现随机的特点。这些研究并非主要注重性别问题，而是尝试从物质现象来探究社会结构，而采用主要的方法是民族志类比和美国考古学所特有的“直接历史学法”。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性别考古学思潮是对行业中妇女地位边缘化的一种政治诉求，并讨论考古材料阐释和美国考古学实践当中存在的性别偏见。提出这种诉求的，大多是女考古学家。她们提出，妇女在专业考古学家中的地位较低，而在过去她们大多充当技术人员和实验室分析员，而非田野项目的主持人，而且在申请资助经费过程中也常常屈居男性同行之下，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们还指出，妇女地位的边缘化导致对考古证据充满偏见和以男性为中心的阐释。对文化进化阐释“男人是猎人”的男性中心论观点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与这种批评相伴的，是要求这门学科聘用更多的女性，并赋予她们更多权力来增强考古学的学术可信度，并促进社会公正。

总的来说，性别考古学是在后现代的相对主义语境中的一种表现，即认

^① Trigger, B. G.,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为科学研究并非一种完全客观的事业，而是充满了科学家自身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各种偏见。由于本文对如何从考古学的解读来探索古代的性别问题比女性考古学家的政治诉求更感兴趣，因此，此文主要从西方学者的努力来回顾一下如何从考古学分析来探究性别问题，并尝试寻找其中那些对我们考古学实践具有启发价值的内容。

二、性、性别与性别考古

在中西方的专业术语中，性和性别之间存在一些容易引起混淆的问题。英文中的性(sex)一词，主要是指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异，而性别(gender)则是指男女作用和身份的社会文化构建。于是，性别考古学除了研究男女两性的作用和活动特点以外，还有其他性别不同对象。比如，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未成年孩子被作为中性成员来对待，他们并不表现成年男女的角色和社会身份。而有些社会中，巫师可能也属于第三性成员。比如，在美国加州楚玛什(Chumash)印第安人的墓葬中，发现过两个驼背男子的葬俗和随葬品与其他男子十分不同。参考了楚玛什的民族志资料，研究者判定他们是灵媒(spirit-undertakers)，而非正常男人^①。

不同社会从生物性上的男女来规定男女性别文化上的行事方式，被称为“性/性别系统”(the sex/gender system)^②。该模式最初由人类学家所创建，这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文化中见到了男女发挥作用的极大多样性。从观察男女在文化中的行事方式如何不同，“性/性别系统”模式提供了一种框架来思考不同文化中是如何推行性别规则的。对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区别生物学上的性与文化上的性别非常重要。如果性别是由文化所构建，那么性别作用、性别象征和性别身份的历史对于了解任何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都至关重要。虽然“性/性别系统”在社会科学中是一个广泛认可的模式，但是一个主要问题是自然或生物学的性(sex)与文化的性别(gender)的界线并不清楚。基于表现理论(performance theory)的另一种性别模式认为，性和性别的本质

① Brumfiel, E. M., Method in feminist and gender archaeology: a feeling for difference and likeness. In Nelson, S. M. (ed.), *Handbook of Gender in Archaeology*, Washington, D. C.: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31-58.

② Rubin, G.,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eiter, R. R. (ed.),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Woma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9, 157-210.

并不稳定，它们是通过社会角色(social actors)的性别表现来持续构建的^①。一些考古学家比较欣赏这种模式，认为它有助于从性别表现来研究物质文化的空间分布和表现形态。

从考古学史来看，对过去文化的研究偏重男性的经验和成就，很少提到女性的贡献以及两性作用的历史变迁，许多考古学家也忽视了性别在构建文化许多方面的重要性。性别考古(gender archaeology)有时被称为女性考古(feminist archaeology or archaeology of women)，就是一种刻意努力来改变考古研究中存在的这种偏颇。但是，尽管性别考古的兴起与女权主义密切相关，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女性考古。因为所有考古学研究都关心性别问题，所以没有女性优先的特别理由。目前，大部分史前与历史考古学家都同意性别考古有3个目的：(1)揭露考古探索各个阶段中存在的性别偏见；(2)从考古材料中寻找妇女，并分辨它们在性别关系、性别意识形态、性别作用中的表现；(3)询问性别差异的问题^②。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性别研究与考古学之间的关系。女权主义在其宽泛的定义上是指推动当今男女权力变革的文化、政治和学术运动，不过并非所有从事性别研究的考古学家都认为他(她)们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他(她)们的著作是女权主义的。然而，根据当今社会男女性别的偏见来进行考古研究，并不能增进我们对过去性别问题的了解。因此，在考古学研究中要注意，不应将今天对男女及性别的看法投射到对过去性别问题的解释上去。美国考古学家萨拉·纳尔逊指出了性别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原则。第一，要避免女性研究生物学和生理学上的本质主义倾向(essentialism——指各种现象存在一个深藏的唯一本质，认为找到这种本质便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第二，将性别的劳动分工看作需要说明的问题，而非理所当然。每个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都需要加以论证，性别的活动是否存在相仿、重叠和灵活性的现象。第三，要质疑男主外、女主内的公私两分，要询问什么角色对男女都合适，哪些角色

① Butler, J.,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② Conkey, M. and Gero, J., Tensions, pluralities and engendering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women and prehistory. In Gero, J. and Conkey, M. (eds.), *Engendering Archaeology: Women and Prehistory*,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Inc., 1990, 3-30.

是不分性别的。第四，要避免将一个社会内的所有男女一视同仁，以为某社会里的男女都做相同的事情，担任相同的角色。分辨性别并不意味着将人们分成其他不同的工作、祭祀和社会活动群体的范畴就没有意义或不重要^①。

不幸的是，尽管考古学研究有一种男性中心论的偏颇，但是考古学其实也没有很好研究过男性在社会角色中的作用，以及通过物质文化所展现的男性意识形态。而女性考古学会在研究中漠视男性的作用，努力提高过去文化中女性的贡献会无意中造成一种错误的看法，就是男性的性别问题一直如此，亘古不变^②。

康基与斯佩克特在她们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制定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清晰的理论，而且要建立性别考古研究的清晰框架，以便我们能够在性别体制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方面建立起有意义的相伴关系，从而使我们能够拥有一种方法论来从考古记录中观察有关性别的发展方式与演进。她们视性别考古为多维度和多方面社会现象研究，包括性别的作用(角色)、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形态。性别作用是指特定文化背景中不同性别成员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体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性别身份是指个人作为男女的自我感受，这种自我感受未必与其他人对其指认的性别范畴相合。性别意识形态是指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男、女、性与繁殖的含义。这种含义系统包括男、女或其他文化定义的性别范畴如男扮女装癖、女扮男装癖及同性恋的因袭惯例以及对其的排斥。她们希望，通过考古学的女性视角，可以为考古学提供一种新的途径来思考我们对过去的社会生活可以做些什么和了解些什么。

有学者指出，性别研究需要分清问题的层次，全面考虑各种可能，不然也会造成混乱和偏颇。比如，根据对中国社会中的不同文化现象的观察，我们可能会对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出完全不同的推断。如果从道教的阴阳观念出发，认为阴阳(男女)平等、对立、交融，孕育了宇宙万象，那么我们会推测

① Nelson, S. M., *Gender in Archaeology: Analyzing Power and Prestige*, 2nd edition,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② Voss, B. L., *Engendered archeology: women, men and others*. In Hall, M. and Silliman, S. M. (ed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xford: Blackwell Inc., 2006, 197-127.

中国社会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社会文化中强烈的父系传嗣原则、重男轻女和父亲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我们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如果考察妇女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文化的贡献，如对女娲、西王母、妈祖、花木兰、黄道婆、穆桂英等传说和历史人物的尊崇，我们又能认为，女性在中国社会享有较高的地位。而观音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位最受崇拜的主要神祇，也许有人会像解释史前社会的母神那样，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母系社会。因此，我们在处理不同材料时，应该弄清这些材料和现象说明什么问题^①。

简言之，性别考古研究并不限于女性的优先，也并非全由女性来研究。性别研究关注男女的社会作用、调查男女性别差异的社会价值观。因此，性别是考古学社会结构研究的一部分，具有研究社会分层和社会演化等级同样的意义^②。

三、方法论与研究策略

加拿大考古学家布赖恩·海登认为，研究性别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规律性的或理论通则性的方法，另一种是具体的方法。从史前考古学的观点来看，具体的解释不太管用，因为它是高度主观性的陈述，不易检验和确证。在某一社会或不同社会中，个人行为常常差异很大，物质表现有太多的可能性解释，很难用普遍性的原理加以解释。而且异质性的个人行为对于了解社群的发展和变迁，重要性相对比较次要。相反，集体的行为，特别是受制于私利、经济回报和物质利益等原则驱策的行为，则有规则可循。而且，由于史前学主要研究社群的行为和一般人的行为变迁，因此社群和家庭是史前学更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海登进而提出了性别研究的六种方法，分别是比较民族志、骨骼与葬俗、古代文献、艺术与神话、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在此，本文对这六种方法做一简单介绍。

比较民族志研究：这是将民族志研究中观察到的具有普遍性的性别差异

^① Ortner, S. B., *Making Gender—The Politics and Erotics of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② Gilchrist, R., Women's archaeology, political feminism, gender theory and historical revision. *Antiquity*, 1991, 65: 495—501.

来与考古材料进行比较，以便对相似现象做出解释的依据。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有助于将物质与非物质方面联系起来最有潜质的领域。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性主要从事狩猎、打仗和其他专门的男性活动，而妇女主要从事采集和照料孩子得到了大量民族志观察和证据的支持。虽然有些人对这种性别分工的普遍性提出质疑，并试图否认存在某种明确的分工方式，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性别分工是原始社会甚至更加复杂社会的基本原则的表现。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性别分工明确的工作包括：伐木、造船、石匠、开矿、金属匠、正骨以及骨角器加工。这种有力的跨文化规则，成为最佳的通则基础并为史前性别研究建模。跨文化研究得出的通则，还没有成为考古学解读的理论基础，如妇女在史前社会刮削和加工皮革，制作家庭使用的陶器，碾磨食物和加工储藏鱼肉。如果加以论证，就有望将端刮器、小型的碾磨工具、石杵和皮革加工工具看作是妇女的签名，就如将投射尖状器和手斧视为男性的签名一样。不幸的是，除了手斧和端刮器之外，大部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工具无法指认性别。到了晚近时期，特别是手工业专门化出现后，许多传统上由妇女从事的工作由男子来从事，而这些工作成了养家糊口的职业，如陶器生产、皮革加工、采矿、编织、裁缝和农业。专业化的唯一条件就是这些职业经常由男性从事。民族志比较方法主要是确定一种特殊的行为是否具有普遍性，并如何解释这种普遍性。如果发现该行为不具备普遍性或存在例外，那么需要解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异。尽管存在少数具有普遍性的行为，但是在性别分工的行为的许多方面存在多样性。海登认为，正是性别行为的多样性，为了解性别差异的起源提供了最有用的关键信息。

骨骼与葬俗研究：骨骼遗骸和丧葬实践是史前性别研究的重要途径。骨骼体现了人类的进化史和个体的生命史，是丰富的、有关两性活动尚未企及的信息库。骨骼遗骸只要保存完好，就能够准确判断性别，进而能够从骨骼探究营养、食谱、劳动负荷、男女比例和丧葬处置来进行比较研究。营养、食谱和健康状况可以反映男女之间生活条件、地位和等级的区别。骨骼的病理学分析可以了解特别种类的劳动及强度，如负重、强化的皮革加工、碾磨谷物、编织，以及战斗留下的劳损和创伤。性别比例是一个重要研究的方面，如西欧和近东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墓葬中男性占 65%，而女性占 35%。如果这样的比例具有普遍性，那么这样的比例失调就不是采样所造成的。在澳大利

亚和英国奥克尼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年龄组中，男女比例达7:1，这是杀婴还是不同的丧葬处理方式，是性别比例失衡值得探究的问题。墓葬按不同性别处置，以及随葬品的不同，是性别和社会结构的重要信息来源。海登认为，从随葬品来判断性别、男女的作用和行为仍然需要谨慎从事，并参考其他的证据和一般性的解释。

古代文献研究：文献研究在时间上具有局限性，大致只能上溯到5 000年前。比如，苏美尔文献记载了妇女的法律地位，后来的文献也记载了妇女的政治地位和其他权利。这些早期文明的文献对于了解古代女性活动极具价值。但是对于文献资料，也需要谨慎对待。历史文献作者的观点会受当时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将文献证据结合考古材料时要注意这种历史的偏见。遗憾的是，古代文献的记载无法解决史前期的性别问题。

艺术与神话研究：性别或女性在艺术和神话中常有表现。可惜，人的程式化描绘和表现可能代表不同的含义。由于不了解艺术家、施主、使用者和观赏者的动机，因此陶俑和其他艺术表现在确定史前性别的行为、地位和权力上是最不可靠的途径。对于这些艺术表现的意义和解释并没有一种共识，大部分这类研究缺乏严谨性，过分依赖主观印象。海登指出，社会经济现实与意识形态和神话之间常常存在差异，如北美西北沿海印第安土著的图腾、宗教和艺术表现的是熊、蛙、渡鸦、海狸、水獭和郊狼，而非维持生计的鲑鱼与比目鱼。同样，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中最重要的动物并非维持生计的主要种类如驯鹿。在强调欧洲女性雕像维纳斯的女性崇拜时，一些史前学家忽视了献祭中公牛角的主导作用，这类牛角被考古学家看作是男性多产的象征。因此，海登认为艺术和神话很难代表真实世界的反映，这些艺术和神话可能是当时乌托邦的一种理想化表现，更多受到特定文化历史的影响，因此需要特别的解释。而这个方面还没有可行的方法论，是考古学研究最为困难的领域。

生理学研究：荷尔蒙对两性的攻击性程度和第二性征有着明显的影响，女性荷尔蒙在女性对待工作的细致和耐心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对与狩猎相关的空间任务有消极的影响。男性更加胜任整体的运动工作，而女性更加胜任空间的采集工作。男女大脑和其他的结构差异，会造成他们行为的差异和不同倾向。比如，男性要比女性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具有竞争和主宰的倾向，

并具有空间分析和擅长数学的潜质。海登认为,这种生理学差异能够提高过去性别行为重要的推断依据,能够用来了解民族志观察中所见的特定工作的性别偏好。这种生理内在差异的解释,从进化选择的优势而言,肯定能够为未来研究提供有趣的研究课题。

比较动物学研究:比较动物学研究就是观察高等灵长类如黑猩猩的两性行为差别,来和人类的两性差别进行比较,这可以了解史前期原始人类行为的性别差异提供洞见。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与现代智人肯定有很大不同,而灵长类观察和比较能够提供许多有益的思考。这种比较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研究两性的体质形态区别,这是高等灵长类都有的特点,在其他哺乳动物中也很常见。在动物中,这种两性体态差异是由雄性争夺交配权而造成的。而对于人类,可能还要从更新世狩猎采集者两性的社会作用、生存风险、行为、地位,以及态度的进化来考虑。二是研究观察灵长类动物的两性行为,其遗传机制和环境适应。黑猩猩被认为是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其两性间存在明显的行为差异,雌雄黑猩猩在竞争环境中有不同的求生策略。其中雄黑猩猩要比雌黑猩猩更多合作狩猎、在更广的范围内觅食、在他人领地更具侵略性和更要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人类男性的行为非常相似。

海登指出,性别行为研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区别男女行为与生俱来和文化习得之间差别。社会生物学界强调性别差异的遗传说,而社会学家则怀疑性别差异的遗传作用,倾向于将所有现在人类行为的性别差异看作是文化价值观的产物。再者,男女无论在生理上还是行为上并非截然分明,非此即彼,而是存在一定的重叠。如生理上,有的女性高大似男人,而有的男人矮小如女性。社会和文化行为上男女同样也可能有这样的重叠,需要经验性的观察来论证。总的来说,史前史大致是群体行为的共同行为,很难分辨个人和两性的行为和价值观,需要各种方法的综合和兼容^①。

其他学者也认为,民族志类比、墓葬和随葬品以及器物工具是性别考古研究最重要的途径,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纳尔逊认为民族志类比要留意殖民主义的影响、民族志的偏见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应简单就认定现在

^① Hayden, B., Observing prehistoric women. In Claassen, C. (ed.), *Exploring Gender Through Archaeology*, Madison: Prehistoric Press, 1992, 33-47.

所见的民族志文化就是过去停滞不变的反映。骨骼分析的 DNA 分析对判断性别带来了便利，而且疾病、营养、繁殖方式、生儿育女的负担、死亡率和与性别相关的暴力都可以从骨骼材料中获得。人工器物结合文献、绘画和直接历史学法，两性的器物研究是最好的性别研究途径。但是也要当心，即使性别特征最显著的器物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用途，比如，妇女用她丈夫的矛头来搅拌陶罐里炊煮的食物。纳尔逊还指出，遗址空间安置和家居与性别有关。家居内的空间布局或器物分布会依性别而异，如在室内加工食物与皮革、缝纫、编织篮子与妇女的活动有关，而制作石器则是男人的工作，因此家居考古很适合性别研究。

伊丽莎白·布伦菲尔指出，考古学家应该寻找与性别相关的材料，来发现不同背景中的两性表现。两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会表现不同，呈现一种镶嵌(mosaic)的性质，而非千篇一律。比如，津巴布韦前殖民时期的金矿中至少发现了 9 具尸骨是女性，表明这些矿工是女性。她还认为，当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两种和多种葬俗，它们一般是男女性别差异的标志，未成年人独特的葬俗，表明该社会中年龄也被看作是性别的一种身份。有考古学家指出，葬俗的性别差异可能代表平行的性别差异而非性别的不平等。由于葬俗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未必与实际情况相匹配。因此，从墓葬材料来评估性别平等问题最好与骨骼的营养状况、健康与暴力等指标相参照。艺术表现如人俑、壁画、岩画、彩陶和雕塑有时未必显示解剖学或服饰上性别差异，但是它们体现性别特点时，应该是性别差异的标志。这种表现会随时间变化，如在美国西南部的岩画中，农业之前的古代期(Archaic period——旧大陆的中石器时代)的岩画只描绘没有性别特征的神灵，到了制篮者时期，也即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时期，岩画上表现了解剖学和服饰上的两性区别。到了人口集中的普韦布洛时期，岩画上不再表现性别，而是体现集体的公共表演。布伦菲尔还指出，古代艺术家会通过男女人像的大小和位置来对性别做出意识形态的陈述，如古埃及的王家艺术。如果艺术表现中只描绘一种性别，而缺少另一类性别，可能代表了某性别的主导地位。她还提到，必须留意不同背景中的不同艺术表现方式，比如，国家资助的艺术如纪念性雕塑，相对于普通的艺术如陶俑。这样做，可以捕捉由体制造成的两性差异关系。

玛丽·索伦森指出，欧洲许多史前墓地有 50% 以上墓葬的随葬品并不显

示性别，或根本没有随葬品。这表明，古代社会的性别结构并未完全在今天的民族志记录中表现出来。因此，在试图从丧葬实践来分析性别结构时，必须了解个案的时空和背景，以及墓地层级的表现形式范围。墓葬性别分析复杂性的一个例子是“女武士”，她们在欧洲和美洲都有报道。青铜时代欧亚草原游牧部族的斯基泰人和萨马特人的“女武士”随葬有各种武器，如甲冑、长矛、箭镞和盾牌，而且她们的骨骼带有格斗的创伤及骑射留下的骨骼劳损。她指出，要确证史前社会中的这类“女武士”不能单凭少数的证据，而是需要各种证据的综合考量。这些证据包括：(1)要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表明与战斗相关的骨骼损伤，如骑马和集中在身体正面的创伤；(2)与使用武器相关的骨骼劳损证据，如骑射和舞剑；(3)随葬品显示武士的地位，如武器和与男性共出的物质文化；(4)民族志和文献中有对这种现象的描述。最理想的是对保存完好的墓葬做多学科的研究，包括遗传学、同位素、随葬品、肖像学以及可能的文献研究，以了解特定复杂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性别关系^①。

简言之，性别考古的主要挑战来自从物质遗存来分辨性别，并评估和了解性别分化和等级是如何产生、发展和维持的。像其他后过程考古学研究一样，意识形态和性别差异与分工在物质表现上并非不言自明，而且两性的家庭和社会活动均存在一定的重叠甚至互换(男性取代女性的工作，女性从事男性的活动，如从政、从军、担任高管等)，使得民族志和生理学类比的跨文化通则在分辨性别活动时并不一定完全管用，所以需要特殊现象特殊对待的解释。

四、启示与再思考

中国的性别考古尚处草创阶段，过去与性别相关的研究如母系社会和性别劳动分工的解释，难免受意识形态影响而囿于摩尔根对母系社会早于父系社会论述的先入之见。长期以来，对新石器时代墓地的人骨仅做性别和年龄的观察，并未有意识地探讨古代社会的性别问题，最多只是根据随葬品的性别差异简单地得出男女地位或分工不同的结论。因此，这种常识性判断很难

^① Sorensen, M. L. S., Gender, thing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Nelson, S. M. (ed.), *Handbook of Gender in Archaeology*, Londo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105—136.

促进对中国古代社会性别差异的形成以及发展过程的深入了解。美国的性别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他山之石，可望促进我们的性别考古研究。

受美国性别考古成功经验的启发，本文想对史前考古学中的一些性别问题做一番再思考。这里的论述主要是提出问题，而非提供解释。由于社会的性别差异主要与意识形态相关，因此即使采取民族志类比，提出的看法仍然是有待证实和检验的假设。这种解释没有最终的结论，而是给多种可能性提供足够的空间，然后判断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可能性解释。

(1)旧石器时代。参考海登的论述，我国旧石器时代具有性别意义的器物包括大型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箭镞、端刮器、锥钻和细石核等。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大型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包括广西百色的手斧很可能是男性加工和使用的器物，因为它们大体可以与欧洲和非洲的手斧相当。其打制加工所需的强壮臂力，以及作为重型工具的使用功能，可能更适合于作为男性的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箭镞和细石核可能也与男性有关，因为男性要比女性更多从事狩猎活动，而从细石核上剥制细石叶需要相当强壮的臂力和技巧，可能与男性专职工匠的存在有关。欧洲马格德林时期石叶生产的规范性显示专职工匠的存在，而我国下川、薛关、柿子滩、虎头梁细石核的技术特点也体现了类似的规范性。一般认为端刮器是女性用来加工皮革的，而且端刮器只要对小石片作轻微的琢击就能制成，它们和锥钻一起可能与女性加工皮革、制作衣服的活动相关。以后的发掘，需要观察这些器物出土的空间分布规律，设法辨认女性和男性的器物和活动空间，以进一步检验这一推论。

山顶洞出土了3具完整的成年人头骨和一些零星骨骼，代表10个男女个体，其中102号和103号头骨被鉴定为女性。山顶洞还出土了许多装饰品，均为钻孔石珠、小砾石、动物牙齿、海蚶壳、鱼骨及鸟的骨管。动物牙齿有125枚，其中食肉类108枚，鹿类17枚。食肉类包括虎、獾、黄鼬、狐狸和獐等。此外，还有一枚磨制的骨针^①。史前人类和现代土著都有佩戴个人饰件的习惯，而且男女皆然。但是，饰件往往会体现男女和地位不同。比如，像老虎这类猛兽的犬齿往往由男性和家族首领佩戴，以显示其勇猛、魄力和地位。山顶洞的牙齿饰件中食肉类多于食草类，显示食肉动物的牙齿因其难

^① 裴文中：《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中国古生物志》1939年新丁种第9号。

以获得或因其威猛和灵巧而受到特别的青睐。磨制骨针可能与女性缝制衣服的活动相关。可惜早年的发掘并未留意这些装饰品和骨针与各骨骼个体之间的相伴关系，否则这些材料能够告诉我们该群体性别和日常活动更多的信息。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常常被说成是“狩猎巫术”，认为是马格德林人为了保证猎物的供应而定期举行仪式而制作，希望洞穴内举行杀死动物的祭祀仪式，有望保证正在洞外狩猎的同伴获得同样的成功。海登指出了这种说法的问题，即洞穴艺术表现中的动物并非当时人们生计主要依赖的物种。马格德林人主要依赖大群的驯鹿为生，而驯鹿并非洞穴壁画中主要的描绘对象，更多表现的是洞熊、披毛犀、公牛、野马和大象这些猛兽，如法国萧维洞穴中画了50多头犀牛。在法国的拉斯考洞穴中，主厅被称为公牛大厅，洞顶画了65头野牛、野马和赤鹿。在洞穴难以达到的深处还有一个猫科动物大洞穴。如果是祈求猎物供应和为狩猎成功而施展巫术，那么壁画上主要应该画驯鹿和赤鹿这些日常捕猎和果腹对象，而非难以制服的狮子、豹、犀牛、野牛和野马。人类艺术更多体现的是精神层面的内容，而非日常的劳作。法国学者勒鲁瓦·古尔汉曾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这些洞穴壁画，认为数量上占优势的野马和野牛图像是性别的象征，即野马代表男性，野牛代表女性^①。但是，这一说法难以令其他考古学家信服，后来，古尔汉放弃了这种方法，虽不成功，但是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也许，我们可能需要对“狩猎巫术”的解释进行再思考。一个有趣而值得深思现象是，在西欧大约30处不同的洞穴壁画中都留有许多人手印。戴尔·格里对大量手印(201个)进行测定和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这些手印都是13~16岁青少年的手印^②。考古资料和民族志证据都显示，古代人们特别是男性喜欢佩戴猛兽犬齿制作的项链和饰件(较常见的如雄野猪的獠牙饰件)和从事公牛角的祭祀仪式，可能希望从这些动物身上获得魔力和护佑。还有，今天欧美文化中存在斗牛、奔牛、驯服烈马和降服蛮牛的活动和比赛，似乎

^① Leroi-Gourhan, A., *Les religions de la préhisto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② Guthrie, R. D., *The Nature of Paleolithic A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是远古男性崇尚威猛的一种公共仪式的孑遗。如果这种洞穴内的一些艺术表现和祭祀活动经常与青少年相伴，那么这也有可能是远古狩猎群体男性成年仪式或培养男性猎手制服猛兽精神和勇气的宗教礼仪的表现，就像今天的斗牛和驯马比赛。

(2)新石器时代。我曾经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玉璜，探讨过新石器时代的性别问题。出土证据表明，从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到崧泽文化，璜、琮、玦、耳坠、串饰以及彩陶等总是与女性相伴，而且随葬品的质量和数量均多于男性，说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到了良渚时期，当象征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琮、璧和钺开始流行，并主要为男性所有，表明男权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特点^①。

然而，根据与西方学者的民族志材料比较，这种说法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非洲斯瓦系里社会里，瓷器、彩陶、刻戳纹陶和饰珠是妇女用来驱魔辟邪的。进口的瓷器和彩陶及刻戳纹陶器(甚至碎片)被认为能够吸掉魔鬼的眼睛，需要放置在魔鬼经常作祟的地方，如厕所。所以，这些陶瓷的出处未必表明是进食的地方。玻璃珠和其他饰件也是妇女和儿童用来驱魔辟邪的，其中以蓝色和珊瑚珠子功效最佳，红色珠子必须贴肉佩戴才具有治疗功效。而男性从不佩戴珠子。所以在斯瓦系里，个人饰件和彩陶等器物只和女性相伴。因此，拥有这些质量较好的饰件和陶器看来并不表明妇女社会地位一定较男性为高。

受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进化理论的影响，我们常常将史前时代描述为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发展的直线过程。于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之前的社会被说成是母系或女权社会，到了龙山时期转变为父系或男权社会。然而，大量民族志材料对父系取代母系这种社会演变模式提出了质疑。其实，以父系和母系承嗣与父权制与母权制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族群谱系的传承方式，而后者是社会的管理和统治方式，两者不能混淆。弗吕尔-罗本在质疑巴尔干新石器时代的母权制说法时指出，母权制并没有民族志的证据。迄今为止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妇女地位和作用有时与男性相当，但从未有过超

^① 陈淳、孔德贞：《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

越男性的记录^①。海登指出，妇女在等级系统中的价值在于财富积累与养儿育女。史前母权制社会的倡导者们无法解释，女性在面对男性强大体能、攻击性和崇尚武力的情况下如何能取得社会的主导权。比尔基埃指出，母权制社会“除了在神话的记忆中和在研究家庭权力问题的最早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想象中存在过以外，从未存在过”^②。墨菲指出，古代存在过女权制时代的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幻想式和想象性历史重构的基础之上，这混淆了母权和母系的区别。事实上并不存在母权制。关于古代母权制的绝大部分证据来自幻想^③。哈里斯指出，受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影响，母系社会结构的产生被认为是因为在狩猎采集和早期农耕社会中妇女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地位较男性为高。其实，这种说法存在太多的漏洞。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谁劳动得多谁的地位就高。相反，地位较高和控制着社会资源的人最少参加劳动^④。北美的民族志证据表明，狩猎采集社会由于规模小，流动性大，生存风险大，因此男子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普遍是父系社会，而到了定居的大型农业社会，由于男性经常外出狩猎、打仗和经商，结果一些社会表现出从母居和以母系论血统的社会。

(3) 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字，因此能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性别问题提供极其重要的直接证据。但是，文字记载也会造成错误的印象，需要和考古材料相互印证。比如，甲骨文多次提及妇好，历史学者便以为妇好地位高于武丁的其他妻妾，权力和地位最高，并且军功卓著。王迎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的比较，并借助甲骨文记载来分析商王室等级和贵族妇女的等级地位。她发现，武丁和他的王后妇妁葬于洹河以北的西北冈规格最高的王室墓地，妇妁的墓穴有一条墓道。而妇好则埋葬在洹河以南的王

① Fluehr-Lobban, C., A Marxist reappraisal of the matriarchate.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9, 20: 341-359.

② 安德烈·比尔基埃：《家庭史——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Longacre, W., Some aspects of prehistoric society in east-central Arizona. In Binford, S. R. and Binford, L. R. (eds.), *New Perspective in Archaeology*; Chicago: Aldine, 1968, 89-102.

③ 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 Harris, M.,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室墓地，而且其墓穴为竖穴，没有墓道，显然地位较低。从随葬品看，虽然妇妁墓被盗，但是出土的司母戊(后母戊)方鼎高 1.3 米，重量近 1 吨，而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方鼎，风格和设计与司母戊(后母戊)方鼎非常接近，但是高度和重量显然不如前者。此外，妇妁墓在破坏后还发现了 7 种雕刻骨器，251 枚骨镞和 38 个殉人，而未盗的妇好墓只有 5 种雕刻骨器、29 枚骨镞和 16 个殉人。妇妁随葬的箭镞竟然超过了以军功闻名于世的妇好的 8 倍，两人等级地位之悬殊可见一斑。甲骨文有 20 多条卜辞涉及妇好，也许表明武丁对她更加宠爱和关心，因为从妇妁的墓葬位置、性质、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司母戊(后母戊)鼎的规格昭示，妇妁才是权倾一世的第一夫人。而且从妇妁墓出土的武器来看，她身前也可能统领军队，进行征伐，只不过在卜辞中没有被充分反映罢了^①。曹兆兰根据甲骨和金文来研究殷、周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关系，认为殷代的贵族女性可以参与朝政、主持祭祀、参与祭礼，并驰骋疆场。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妇好，妇好是武丁的宠妻，常常征战四方，为王前驱，战功显赫。武丁另一位妻子妇妁也能率领军队，征伐敌国，在卜辞中以主帅的身份出现。根据妇妁负责农业生产的卜辞多于军事方面的内容，曹兆兰认为妇妁可能为商王负责农业生产，与妇好分别负责商王内外的政务^②。

五、小 结

性别考古在中国仍处于草创阶段，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即使涉及性别或女性的问题，大家仍然习惯采用印象主义或现代主义的途径来做出想当然的解释，而且在社会结构演变的解释上受 19 世纪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直线进化论模式的影响很大。

美国的性别考古经历了 20 多年的历程，成果斐然。除了努力消除历史重建的男性中心论偏见和提高女性考古学家的地位之外，考古学研究努力从民族志类比、墓葬骨骼、历史文献、艺术史和生理学等角度来综合探讨物质文化所表现的性别作用。从物质文化来分析性别问题，特别需要防止单凭个别

^① Wang, Ying, Rank and power among court ladies at Anyang. In Linduff, K. M. and Sun, Yan (eds.), *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4.

^② 曹兆兰：《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证据或一些表象，就简单对性别问题下结论。需要将体现意识形态意义的现象与社会现实区分开来，不要看见母神和女神崇拜就认为是女性地位高于男性或是母系社会的证据。

女性考古研究也要求更加留意在考古发掘中分辨能够区分两性活动和作用的证据，如石器陶器生产以及家居安置的空间关系、葬俗的细微区别、象征男女的物质证据和符号等。只有积累了大量证据和材料，并对它们进行综合考虑，我们才能针对不同问题找到不同的答案。在性别差异的考古学阐释上，跨文化的通则性解释非常有用，它可以增进我们对于社会演变的一般性趋势的了解。但是男女的角色和作用在各文化中也有其特殊的表现，如津巴布韦的女矿工和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女武士，需要针对具体背景进行解读。中国考古学的长处，是文献资料比较丰富。但是要留意文献记录本身的偏颇，最好与考古证据相互印证。中国考古学的弱点，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不足。在这点上，美国考古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山之石。

(原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观察

一、性别考古学概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考古学进展中，一项新兴的探索领域是性别考古学(gender archaeology)。其要旨是从性别研究来进行社会考古学的研究，并对考古学中主要侧重男性的作用和忽视女性的倾向进行纠偏。这项研究并非限于从骨骼的鉴定来区分墓主的性别和年龄，这是属于生物学范畴的体质人类学观察。性别考古是试图从物质文化来探究男女成员在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中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情况和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现象与性别有关，但是它取决于社会因素，而非生物学因素。

虽然考古文献中不乏对史前社会中性别问题的论述，如推断父系和母系社会的特点、男女的婚配形式、男女劳动分工、男女地位差别，但是总的来说考古学还缺乏对性别问题的系统研究，因此考古学需要建立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和清晰的理论概念来有目的地研究考古现象中所反映的性别问题^①。

目前性别考古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条途径。

(1) 民族学的类比，也就是从民族学中观察到的具有普遍性的性别差异现象来推断和解释史前物质文化所反映的男女差别。比如，狩猎，祭祀，战争，伐木，营造祭祀建筑和房屋，复杂的手工业如制陶、开矿、冶炼等活动被普

^① Conkey, M. W. and Spector, J. D., Archaeology and study of gender.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4, 7: 1-38.

遍认为是属于男性的工作；而采集、食物加工、炊煮、家庭制陶、纺织、皮革处理等活动普遍属于女性的工作。因此，发现与上述不同活动有关的物质现象都可以从性别的劳动分工来予以解释。比如，从考古学观察，我国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墓葬中，男性常用石镞、石凿随葬，而女性则用石质和陶质纺轮随葬。同样，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男性墓多随葬石斧、石镞、石凿，女性多随葬纺轮等生活用具。

(2)骨骼与葬俗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往往是考古学分辨性别的主要途径，而不同的葬俗也被用来分辨史前社会的性别关系和男女地位，如同性埋葬习俗、两性比例、随葬品的多少和等级的区别等都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来分析当时社会中的性别关系。现在的人骨分析可以了解食谱、病理学、营养状况、体质状况、疾病感染、伤残、暴力和战争、幼儿的夭折率以及男女的相对寿命，并以此来了解男女从事不同活动对身体的影响^①。比如，在澳洲某些地区和英国的奥克尼郡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男女性别的比例为7:1。在我国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的结果表明男女比例为3:2，而王因遗址出土的885具人骨，男女比例为2.5:1，这究竟是杀婴导致的结果还是地位差异所致，显然是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根据北美普韦布罗印第安人遗址中女性分别埋葬和随葬品相同的特点，朗格克里认为这和史前社会从母居的社会形态有关^②。男女分别埋葬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十分常见的现象。

(3)早期文献，古老文献中有关男女地位和活动差异的记载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来探讨早期文明社会中的性别问题。比如，苏美尔的文献中记载了妇女和妻子的合法权利和地位；较晚的文献还会有妇女政治权利和地位记载。但是文献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比较有限，而且不可避免掺杂着当时史官和作者个人的偏见。

① Hill, E., Gender-informed archaeology: the priority of definition, the use of analogy, and the multivariate approach.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98, 5 (1): 99-128.

② Longacre, W., Some aspects of prehistoric society in east-central Arizona. In Binford, S. R. and Binford, L. R. (eds.), *New Perspective in Archaeology*, Chicago: Aldine, 1968, 89-102.

(4)艺术品和神话传说，早期艺术品如人物雕塑、绘画和陶器上的人物造型对不同性别人像的刻画很可能反映了许多不同的含义。但是，目前还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原则来检验对这些艺术品含义所做的解释。大部分着眼于这些物质现象的性别研究还缺乏严谨的方法论，主要依赖于主观的印象。一项别出心裁的研究是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女性雕像的肖像学研究，麦克德莫特将她对自己所摄的照片和女性雕像的照片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雕像的造型代表了史前女性艺术家对其自身体型的看法^①。这项研究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创造性途径来分析史前考古学中的性别问题，并对旧石器时代艺术品的研究具有革命性影响。

(5)生理学研究，雄性和雌性激素会影响到人的第二性征、行为差别和攻击性程度。因此，男性往往在体力运动方面如狩猎、格斗能力上表现更为突出，而女性则比较擅长耐心细致的工作，如采集、食物加工和纺织等。有学者认为，男女大脑结构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视觉—空间功能，并会在不同的行为上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由于男女大脑结构和荷尔蒙的差异，使得男性生理特征更加具有攻击性、竞争性、主宰性和在主观倾向、数学演算上更为机敏。而女性则表现为擅长细腻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从进化和选择的角度来研究男女性别之间内在生理差别成为未来性别考古学重要的研究课题^②。

此外，一些学者非常重视社会复杂化进程和早期国家形成中的性别关系。在从平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向等级分化为特点的复杂社会演化中，血缘关系的变化直接与男女性别关系和地位的重大转变有关。因此，在早期文明和国家探源的考古学观察中，我们很可能获得大量有关性别重组和变化的信息^③。琼·杰罗对秘鲁高原中间阶段初(公元前200年~公元600年)魁亚什·阿尔托遗址的研究，从共生的铜制别针和纺轮出现频率判断，并参考陶器肖像学中男女独立表现的特点，说明当时妇女拥有很高的、绝不亚

① McDermott, L., Self-representation in Upper Paleolithic female figuri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35(2): 143—152.

② Hayden, B., Observing prehistoric women. In Claassen, C. (ed.), *Exploring Gender Through Archaeology*, Madison: Prehistory Press, 1992, 33—47.

③ 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于男性的社会地位。而性别考古的先驱玛利加·金芭塔丝认为,欧洲东南部新石器和铜器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塑像表明了女性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后来随青铜时代好战的男性等级制度的崛起而消亡^①。根据放射性碳同位素和考古遗存的综合分析,南美印加帝国建立之前,男女的食谱基本一样,但是到了印加帝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少数男性更多地参与聚会、祭祀和义务性工作,这使得男性在玉米和肉食消耗上明显多于女性。并使妇女为男性服务的作用趋于专门化,她们专门从事酿造玉米酒的工作,供少数男性消耗^②。

性别考古在我国的考古研究中尚未涉及,本文尝试采用这种后过程考古学的方法对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玉璜做一番另类的观察,以期为我国习见的玉器研究提供一种与传统方法不同的社会学视角,尝试从器物分析来探讨史前性别差异所反映的社会结构问题并提炼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信息。

二、玉璜研究梗概

玉璜是一种形态差异较大的半环形或半璧形玉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出现,如黄河流域的仰韶、马家窑、龙山文化中见有不同的玉璜,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大溪、薛家岗、石家河等文化也见有各类玉璜^③。由于形制相对简单,加工也不十分复杂,因此一些地理位置相距较远的早期玉璜各自独立起源的可能是很大的,而晚期不同地区的玉璜则可能存在着传承关系。

由于玉璜是一种个人饰件,没有像琮、璧这些礼器那样显赫,所以相关专论极少。目前仅见杨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史前玉璜研究》对江浙一带出土的史前玉璜作了综述,但是对玉璜所蕴含的性别象征性以及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仍未做深入探讨。由于玉璜是史前阶段出现最早、并与性别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一种非实用性器物,因此用它从性别考古的角度来探讨史前的社会问题也许能获得一些与传统方法不同的信息。

① Renfrew, C. and Bahn, P.,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91.

② Fagan, B., A sexist view of prehistory. *Archaeology*, 1992, 45(2): 14-18, 66.

③ 邓淑萍:《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文化》,见《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版。

对于玉璜的分类，学界普遍采用了自名的方法。《说文》有“半璧曰璜”的记载，于是一批形态差异颇大的条弧形和半璧形玉器均被称为璜。根据形态，杨晶将其分为半环形、半璧形和折角形三大类。在佩带的方式上注意到崧泽到良渚早期多为单璜的项饰，少数双璜并列，佩带位置在颈部。进入良渚中期，璜与管串联组合，或与璧、管珠连缀，佩带位置下移到胸腹部^①。中原历史时期则出现了更为精美华丽的鱼或鸟形的动物形玉璜，大多以组佩方式佩带。

关于玉璜作为祭祀和佩饰的功能也是根据史料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推断。《周礼》中有用六种瑞玉祭天的说法，其中提到“以玄璜礼北方”。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周礼》成书于东周，因此所记载“六器”之说的真实性一向为史家所怀疑^②。由于史籍中关于玉璜的祭祀功能可能是在比较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因此不能推断史前的玉璜也具有相似的功能。根据考古发现，从史前随葬品的性质来看大体是一种个人的饰件，早期为单件的玉佩，后来成为组佩的一部分。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长江下游史前时期和中原历史时期玉璜的发现和研究的。

长江下游可能是玉璜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在距今 8 000~7 000 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发现有一件宽短的璜形玉饰，尽管它的形制和后来的玉璜不太一样，其属性可能还有待探讨^③。河姆渡第四层出土过 4 件残缺的玉璜，距今约有 7 000 年的历史。到马家浜时期玉璜初具雏形，早期多为半环形或条弧形，中后期出现少量折角璜。到了崧泽文化时期，璜数量增多，成为主要饰件，并且形制多样，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半璧形玉璜。到了良渚时期，琮、璧、锥形器等玉器大量出现，成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而玉璜仍然保留着它个人饰件的象征性。为了显示身份的高贵，有些玉璜的质地和加工非常精美。

在良渚文化神秘消亡后，各种玉器也随着酋邦社会结构的解体而消失。后继的马桥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玉器，其衰败景象甚至无法与马家浜和崧泽的玉器比肩。该地区的玉器技术和文化后来似乎为黄河流域的复杂社会

① 杨晶：《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史前玉璜研究》，《考古与文物》2004 年第 3 期。

② 邓淑萍：《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由考古实例谈古玉鉴定》，见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玉器一）2001 年版。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所继承。

殷商时期，玉璜是重要的佩饰件和礼仪用品。除了素面的玉璜外，许多玉璜被琢成龙形或鱼形。龙形璜的下腹往往雕琢出牙脊。殷墟妇好墓曾出土30件片状玉璜和43件龙形或鱼形玉璜。这些玉璜可复合为璧或环，也可以单独作为佩饰。

西周玉璜沿袭了殷代风格，并发展成组佩。玉璜被上凹下凸地用于串饰中，项链上的玉璜也逐渐增多，上下重叠，有多至数枚者。最具代表性的为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侯墓地，这些组佩成为高级贵族身份的象征。

春秋早期，玉璜趋向小巧，某些地区还出现了铜、陶、石质的璜。春秋以后，璜多饰以龙、虎等动物形象。战国早期，镂空透雕使得玉璜更趋精美、华。秦汉时期，大多数玉璜用于装饰而少数为祭祀用品。两汉时期玉璜趋于式微，也不重雕饰。魏晋时期偶见玉璜，大多光素无纹。再后来，玉璜趋于消失。

从玉璜的发展和回顾可见，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璜和中原地区商、周以降的玉璜虽然在技术、形制和设计艺术上前后似乎有所继承和发展，但是它们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背景里可能有较大的区别，需要通过不同途径加以解读。

三、玉璜的性别观察

本文的性别观察主要限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发现的玉璜。在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的第四层中出土了4件残璜，与纺轮共出。条弧形，未残一端钻一孔，推测整璜原应为两端各打一孔。但一层和二层分别见有一端未钻孔的完整玉璜和一段残璜^①。因此，有人判断河姆渡的玉璜仅一端穿孔，之后向两端穿孔发展^②。由于河姆渡第四层和第二层的年代可以相差约2000年，而且第一、二层的文化已大致和马家浜、崧泽文化同时，因此难以肯定玉璜早晚形制完全一致。由于遗址埋藏在含盐含水较高的土壤中，造成了尸骨无存。目前第四层发现的4件残玉璜已无法判断其属性，但是从层位中共出的大量纺轮判断，如果原来这些都是随葬品的话，有可能为女性的器物。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5期。

② 周南泉：《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值得一提的是，河姆渡遗址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双鸟朝阳蝶形器”（又名鸟形器）的形制和佩带方式与半璧形玉璜十分相近。虽然为象牙质且其属性不得而知，但是其独特的造型和装饰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佩带它的人必定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地位。

马家浜的玉璜式样变异较大，也有两孔和单孔之别，表明佩带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早期的璜均为条弧形，体形较纤细，圆心角常在 120° 到 180° 之间^①。到了中后期开始出现半环形璜。此外，还有少量折角璜。苏州越城马家浜文化下文化层三座墓葬随葬器物极少，M8出1玉玦，M9出1玉璜和1夹砂红陶小罐，而M10没有随葬器物。专家根据随葬品中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推M8、M9为女性墓，M10为男性墓^②，说明当时女性在拥有珍稀物品上明显与男性有别。

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发掘墓葬1001座，随葬玉器种类有钺、纺轮、琚、璜、玦、耳坠、串饰等。虽然这些随葬玉器的墓主性别没有详述，但是从介绍的3座典型墓葬来看，玉器似与女性共出。被鉴定为男性墓的M609、M447、M38分别出土6件、4件和10件随葬品，主要为石器、陶器和骨器，未见一件玉器。M636为女性，出土随葬品15件，除4件陶器外，还有玉玦、象牙制品、4件刻有纹饰的骨板，以及骨环、骨匙、骨簪等^③。凸显了女性和男性在随葬品数量和质量上的明显区别。

崧泽文化是玉璜出土数量最多的时期，这时玉璜似乎已经成为女性主要佩饰。在崧泽遗址第一次发掘的中层墓葬登记表中，出玉璜的墓共13座，其中7座为女性墓，1座男性墓，2座幼儿墓，3座不明^④。首先女性墓明显多于男性墓的现象就是值得思考的。而且这些女性墓的随葬品多为罐、壶，有时伴有纺轮，并且较其他墓葬出土器物数量多。在此，一男性墓出玉璜似属

① 牟永抗：《试论中国古玉的考古学研究》，见《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③ 王根富、张君：《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见嘉兴市文化局编《马家浜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

④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孤例，值得进一步审视，是否人骨性别鉴定有误还是一种例外。而与此同时，女性佩戴玉饰的风气已开始盛行，墓葬中不少女性佩挂玉璜，有的佩戴石镯，个别死者口中还有玉珞。这都说明了这些墓主，特别是女性，在氏族中具有相对较高的地位。从第二次发掘已作性别鉴定的 29 座墓来看，男性墓 11 座，随葬器物共 52 件，平均每座 4 至 5 件；女性墓 18 座，随葬器物 125 件，平均每座约 7 件，女性墓葬的数量和随葬品均略多于男性，且葬有玉器和彩陶的基本上是女性墓，说明当时女性在社会上处于受尊重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男女随葬品总体来说差异不大，说明当时的社会还是处于地位和财富分化不明显的平等社会^①。

从昆山绰墩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崧泽文化遗存中见有 27 座墓，其中有 5 座墓各出土 1 件玉璜，一座墓出土 2 件玉玦。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玉璜、玉玦和陶纺轮墓葬的随葬品数量明显较其他墓葬明显为多。除了含玉璜的 M14 和 M18 分别出土 4 件随葬品外，M10 有 11 件，M11 有 9 件，M19 有 11 件，最多有 13 件随葬品的是含两件玉玦和陶纺轮的 M6。其他墓葬的随葬品较少或根本没有^②。从玉璜和玉玦常与纺轮共出的现象来看，拥有较高地位的显然为女性。

良渚文化是玉器大发展的时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比以前有了前所未有增加，最引人注目的是，玉器种类从珞、璜、玦、耳坠、串饰等个人饰件，扩展到琮、璧、钺、冠状器等标志地位和社会等级的礼器。而对不同玉器的拥有的分析，可以为从性别上来观察男女社会地位和制度的变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目前可以提供较为清晰的性别和社会等级信息的考古发现是浙江余杭的瑶山墓地，墓葬分南北两列但均尸骨无存。南列诸墓共见的琮、玉钺、三叉型饰和与之配套的成组锥形饰等重器为北列诸墓所未见；而北列诸墓出的璜和纺轮又为南列墓所未见。虽然考古报告未对这一现象作性别上的分析和解释，但是根据良渚墓葬分析中“璜与琮、钺不共出”现象，以及璜与纺轮共出的特点，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南行墓列的墓主应为男性，而北行墓列的墓主为

^① 黄宣佩、张明华：《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 年第 1 期。

^② 苏州博物馆、昆山市文物管理所：《江苏昆山市绰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0 年第 1 期。

女性。此外，南北两列墓葬都出土冠形器，但是仔细加以观察，男女冠形器的形制还是存在一些差别，而这些贵族成员本身身份的不同又造成随葬品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①。

下面，我们将瑶山考古报告墓葬出土玉器的表格改制后，将属于北行墓列的 M1、M4、M5、M6、M11、M14 和南行墓列的 M2、M3、M7、M8、M9、M10 分置表格的左右。其中璜、纺轮和琮、钺、三叉形器绝不重合，而圆牌也似乎为女性所有，其中 M2 例外的原因不得而知，由此随葬器物组合在反映两性差异上便一览无遗(表 1)。

表 1 瑶山墓葬出土主要玉器组合表

	M1	M4	M5	M6	M11	M14	M2	M3	M7	M8	M9	M10
璜	2	2		1	4	1						
纺轮				1	1							
圆牌	6	8	3		13	1	1					
琮							2		2		1	3
小琮							2	2	10		5	
钺							1	1	1	1	1	1
锥形器	1	1		1	2	1	2	1	1	2	1	
三叉形器							1	1	1	1	1	1
冠形器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良渚反山墓地也有类似的规律，9 座墓基本按南北分成两排，除了西侧 2 座墓葬随葬品较少，可能暗示墓主地位较低外，其他几座显贵墓葬也较有规律，即北列应为女性，南列为男性。北列三座墓中 M22、M23 无琮无钺出璜，M20 相当特殊，出土 547 件随葬品中无琮无璜，但见 26 件钺和 1 件三叉形器。南侧墓列中 M19 墓坑很小未见琮，可能属一未成年男性贵族成员，其他墓葬均见有琮、钺和三叉形器，其中位于正中的 M12 出土了 6 件琮，其中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

包括一件重达 6.5 公斤的“琮王”^①。北列 M20 出土钺和三叉形器极不寻常，墓葬位置和随葬品数量给人的印象应该为一位地位非同一般的贵族女性。

福泉山的良渚墓葬的玉器也颇耐人寻味，处于良渚文化鼎盛时期（第四期）的 M60 与璜共出有璧、石钺等，但无琮。与 M60 同层位的 M74 出土纺轮、钺，也无琮，墓主似可判断为女性^②。M2 出土随葬品 170 件，见有纺轮和玉璜，共出的还有 4 件玉钺^③。

显然，“璜与琮、钺不共出”存在少数破例的现象，可能反映个别等级较高女性的特殊身份。反山 M20 的随葬品特点显示该女性地位非常高，虽然没有玉璜，但是却用许多钺和大量玉器显示其地位。而福泉山 M60、M74 和 M2 的女性贵族拥有石钺也标志了其不同一般的地位，这是否意味着良渚社会全盛时期，那些具有很高地位的女性虽然与沟通天地的琮无缘，但却可以染指标志世俗权力的钺？这些反常案例所反映的问题值得我们对良渚文化内部的社会关系和女性地位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四、社会学探究

以上对新石器时代玉璜的分析可见，从河姆渡、马家浜到崧泽，这类最早出现的贵重饰品似专为妇女所有，加上女性陪葬品普遍较男性为多的现象，暗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较男子为高，并在崧泽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在这段女性地位较高的历史时期里，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等级和财富还未出现太大的分化，处于组织结构较为简单的平等社会。

玉璜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是女性的象征，并仅限于个人饰件体现其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步入良渚时期后，琮、璧和钺开始超越个人饰件的范畴，成为重要的社会、宗教和权力象征，标志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社会成员的地位、等级和财富分化明显加剧。当象征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琮、璧和钺开始流行，并主要为男性所拥有，表明男权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而璜作为女性的象征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表明女性地位已退居于男性之下。当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 期。

②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 年第 10 期。

然，少数地位很高的贵族女性仍然拥有不亚于一般贵族男性的等级地位，但是她们在宗教或社会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可能还是和男性有别。随着良渚文化的衰落，无论是琮、璧还是璜，统统随着酋邦社会的解体而消失，表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等级关系比较简单的状态。虽然其中一些玉器的形制与工艺后来被中原地区的复杂社会所继承，但是由于青铜礼器的出现，它们的象征性和社会意义已经和新石器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

如何从考古现象来管窥史前社会的性别和组织结构，目前我们的研究还乏善可陈，许多看法还是用摩尔根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建立的社会进化模式来套用一些考古现象。比如，说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人已经步入氏族社会，说仰韶文化早期为母系社会，中晚期进入父系社会，到龙山文化时期进入阶级社会^①。

其实，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进化理论是在 19 世纪民族学和考古学证据十分单薄的情况下建立的，随着 20 世纪人类学的进展，学界对人类原始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北美的人类学研究表明，狩猎采集社会由于规模小、流动频繁、生存风险大，一般是以夫妻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而且男子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普遍是父系制的。倒是在定居的大型农业社会中，因其以母系论血统的组织形式，表现为母系社会形态，这一点与我们一些学者的推测正好相反。

需要指出的是，以父系或母系论血统与父权、母权制是指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辨认族群谱系而言，这是一种血缘维系的不同社会组织机制，而后者则是一种管理和统治形式。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史前社会中只存在过以父系或母系论血统的社会及父权制的社会，而母权制社会“除了在对社会神话的记忆中和在研究家庭权力问题的最早的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想象中存在过以外，从未存在过”^②。

美国人类学家墨菲也指出，古代存在过女权制的时代的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幻想式和想象性历史重构的基础之上，这混淆了母权(matriarchy，由妇

^① 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安德烈·比尔基埃：《家庭史——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1 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女统治)和母系(matrilineality, 从妇女承嗣)的区别。事实上并不存在母权制,关于古代母权制的绝大部分证据来自神话^①。因此,对我国一些学者从新石器时代的葬俗来讨论女权制问题的方法值得做重新审视。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指出,受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影响,母系社会结构的产生被认为是因为在狩猎采集和原始农耕经济中,妇女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地位较男性为高。其实,这种说法存在太多的缺点和漏洞。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谁劳动得多谁的地位就高。相反,地位较高并控制社会资源的人往往最少参加生产劳动^②。

一种民族学解释是,农业社会的男性常常在外打仗、狩猎和长途贸易,所以男性长期缺席意味着女性成了主人,北美许多地区母系群的出现就是如此。比如,随着引入玉米栽培,易洛魁人的聚落趋于定居,规模增大。当地的猎物如鹿很快被猎杀殆尽,冲突加剧,长途贸易变得频繁,男性长年在外从事远程狩猎、贸易和劫掠,社会结构从父系变为母系。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自河姆渡至崧泽这段时间里,从女性普遍拥有玉璜和其他贵重玉饰件和随葬品,而男性一般用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品随葬的特点来看,当时的社会结构似乎应该是从母居的母系社会,女性地位较男性为高。但是,女性受到尊重可能并不是由于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也不能由此推定当时是一种女权社会。上述考古学文化中随葬品所反映的性别差异可能表明,当时的女性在血缘社会中发挥着维系社会稳定和凝聚力的纽带作用。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指出,原始婚姻关系是一种群体之间的联盟形式而非单单男女两个人之间的结合,它是类似一种政治契约^③。如果我们把从女承嗣看作是史前社会的一种组织体制和维系方式,那么女性就相当于这一体制所必须遵循的契约中的法人代表,女性地位高于男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到了良渚阶段,象征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琮、璧、钺等器物出现和“璜与琮、钺不共出”的现象,表明男性为主导的复杂社会发展到了较高的层次。

① 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② Harris, M.,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③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75.

实际上，像良渚和大汶口、龙山文化这类复杂社会应该属于等级(rank)或阶层(stratified)社会，而不是我国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阶级社会。塞维斯说，在原始社会中，家庭以外的政治事务一般是由男人而非女人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在家庭层次活动中性别的地位差异并不明显，但是这种性别差别会随社会政治活动的日趋重要而得到扩大和强化^①。从璜和琮、钺的象征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公共政治活动日益频繁所导致男权兴起和性别地位转换的轨迹。

五、小 结

以上对玉璜为代表的玉器所做的性别考古分析，尝试一种另类视野来观察史前社会的演变问题。虽然，这项分析仍然十分粗浅，但是凭借社会人类学理论的指导和民族学资料的对比，考古材料应该可以为我们重建已逝的历史和远古社会形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器物研究仍然局限于描述和对比，没有被设计来观察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问题。因此，对玉器这类象征性器物的研究值得我们采取更为精细的手段来分析性别、地位和社会复杂化的进程问题。

当代考古学的发展使学界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考古学者在探究历史时并不完全受制于材料的不完整，而是在许多方面受制于我们的世界观和分析、解读方法的局限性。正是如此，国际考古学的发展开始关注物质文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别问题、个人作用以及家庭和小型社会单位，以求从更加微观的层次来重建远古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轨迹。

中国拥有大量的考古资源和悠久的历史，考古分析应当在重建史前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和具体发展轨迹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本文玉璜的性别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如果学界的同行能够对此有所共识，那么中国丰富的考古发现将不再是简单的材料积累，而是真正担当起了重建中华民族历史的艰巨任务。

(与孔德贞合作，原刊《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

^① Service, E. R.,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75.

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

一、前言

1986至1987年，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十分别致和新颖的考古遗存，其中如青铜人像、青铜面具和青铜树等是以前从未见的器物，引起了中外考古学者和艺术史学者的极大兴趣，研究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作。面对这批罕见材料的独特性，在对其用途和文化性质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学术界也出现了诸多歧见和纷纭的解释，成为我国考古研究中最具悬念的课题之一。

应该指出的是，孕育三星堆文化的远古社会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一种异己的社会，我们无法以我们现代文明社会的思维和常识来揣测其背后的种种原因，我们也不可能用对中原地区远古文化和社会的了解来类推三星堆的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根据英国考古学家霍克斯所确立的考古研究的难度级别^①，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遗存显然是当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考古学的解读上，要比分析一般生活和生产用品来得更为困难。

在我国学者的解读工作中，一个显著的倾向是比较侧重依赖历史文献来寻找可以说明这批文物的依据，很少利用文化人类学对人类原始思维的研究和宗教人类学的理论，从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的一般特点来剖析远古社会宗

^① Hawks, C. F.,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4, 56: 155-168.

教信仰的表现特点和性质，了解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层次，并推断当时这批文物在社会运转中的意义和作用。

本文尝试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树入手，利用宗教人类学的理论，从萨满艺术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青铜树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并从祭祀坑出土遗存的整体特点来管窥三星堆文化以神权为特点的社会运转机制。

二、神树及其解释

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均出自二号祭祀坑，其中大型神树两件以及破碎和无法拼接的小型神树与残段若干。根据《三星堆祭祀坑》一书的介绍，它们的基本特点大致择要如下^①。

一号大型神树形制最大，通高 396 厘米，残高 359 厘米，圆形底座圈直径为 92.4 厘米~93.5 厘米，圈上三足呈拱形，状似树根。座上为树身，其上套铸三层树枝，每层出三枝弯曲向下，全树共九枝。第一层树枝靠近根部，第二层树枝在树干中段，第三层树枝靠近树端，端部残缺。每层树枝共分三叉，其中一枝中部又分两叉。各下垂枝端有一花，中部向上短枝花朵上有一立鸟，共九只鸟。在与分两叉的树枝方向相反一侧的底座上嵌铸一龙，龙身呈绳索状蜿蜒顺树干而上，尾巴残缺(图 1)。

二号大型神树人为损毁比较严重，曾被砸击和焚烧而变形。残留部分为树座和树干两部分，底座为圆形圈座，三个拱形足如同树根。树干通高 193.6 厘米，残高 142 厘米，底座直径 54.8 厘米。圈座三面正中有一方台，上有一 19 厘米的跪坐人像。现存的仅二层树枝，有三个分叉，但仅存一枝完好。该枝从中段上下一分为二，上段有一立鸟站在花瓣上，下段端部为一花朵。

小型神树只有一件比较完整，也颇有特色，残高 50 厘米。该树为三股辫绳状树干，基座无存，但周围有几枝卷曲的枝条外展。树的主干中部有两层树枝向外展出，但端部均残。两个主干顶端分别有一立鸟。特别有意思的是，该两只鸟均为人面，戴着面罩，方脸、大眼、高鼻、大耳，身短翼大，造型更像是长着鸟翼的人(图 2)。

这些青铜树和其他前所未见的器物，如青铜人立像和青铜面具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正如英国学者罗森所说的那样，这些惊人的东西构建出一幅异

^①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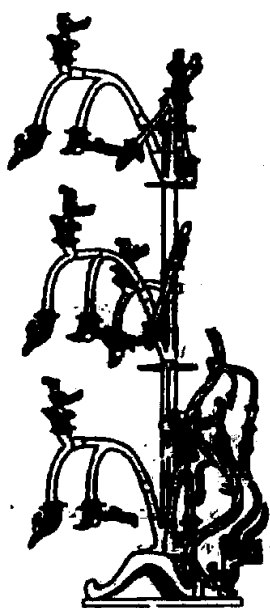


图1 三星堆一号大型青铜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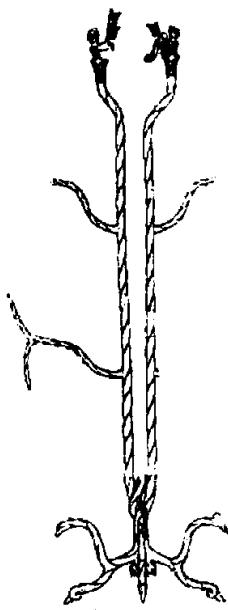


图2 三星堆小型青铜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

乎寻常的世界图像。三星堆青铜器是一种舞台道具，它们描绘了神灵的世界，对于那些参加这幕剧的人具有极大的意义^①。然而，对于这些道具的用途和象征意义，学者们仍然众说纷纭。对于青铜树，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扶桑若木说。持这样一种观点的学者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还包括了很多的日本学者。这种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中国古代的文献如《山海经》和《淮南子》。《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三星堆祭祀坑》一书也根据其“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的记载，认为那棵人面鸟的神树就是司木之神“句芒”。

同时，《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提及了若木的特征：“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灰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名曰若木。”《淮南子·地形训》中有若木上居住着十个太阳，树的果实掉落在地上的描述。从以上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扶桑与若木是古代传说中分别生长在东极和西极的两棵太阳树，也就是太阳和神鸟升起和栖息的

^① Rawson, J. (ed.),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ies*,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6.

场所，每天早上太阳从扶桑树上升起晚上就落在若木树上。远古传说天有十日，每天升起一个太阳，余下的九个太阳神鸟就栖息在树上，这也正好映合了青铜树上有九只青铜鸟这样的一个事实^①。

(2)建木说。这一观点也是基于古代文献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在《山海经》中，建木被描述为一棵盘根错节及其茂盛的通天神树，它拔地而起，直上九霄，长满了层层叠叠的果实和树叶。在《淮南子·坠地训》中记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建木因此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众神或者仙人以及具有人神交往无穷法力的巫师来往天上人间的通道，也就是说建木是一座神奇的天梯。但由于建木与太阳的关联并不直接，且无法有效解释树上栖息的九只鸟，所以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并不是很多^②。

(3)图腾说。这种解释主要是从对建木的理解上延伸而来。有些学者认为，建木具有图腾柱的特征，并与古人对日影的观察有关。如闻一多先生认为：“直立如建表，故曰‘建木’，表所以测日影，故曰‘日中无影’。”萧兵认为，原始人生产简陋，知识贫乏，生活单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往往用高山、大树等为坐标，测量太阳的相对位置用以计时。陆思贤认为先民重视太阳运动的观察，十日神话就代表了这样的一种观察，因此图腾柱被用作立杆以测日影。但图腾柱并不仅仅为了满足立杆测影的需要，也为了满足一个氏族共同崇拜和信仰上的需要^③。

(4)摇钱树说。这种观点来自于对考古学材料的推测和研究。根据汉代出土的青铜摇钱树，推论三星堆青铜树也有可能是一种摇钱树。因为祭祀坑出土了许多贝币，他们推测这些贝币有可能被挂在树上。此外，20世纪80年代位于雅砻江下游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川滇走廊上的四川盐源县境内，考古工作者在战国至西汉初的墓葬中曾采集到一批人兽纹青铜祭祀枝片，其造型与“摇钱树”酷似，但铸造工艺更为粗狂古朴，有学者认为它就是通天神树的象征，树端立有沟通天地的巫师，枝端的璧形物被认为可能代表太阳。由于这

① 徐朝龙：《中国古代“神树传说”的源流》，见西江清高主编《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巴蜀书社2002年版。

② 黄剑华：《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巴蜀书社2002年版。

③ 黄剑华：《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巴蜀书社2002年版。

样一种造型的器物出土在四川省境内，因此就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同样出土于此的三星堆青铜神树，因此也被认为是青铜神树的发展形式^①。

(5)外来传播说。一种观点认为神树是中东地区普遍的装饰物，巴比伦乌尔王陵的出土法器就大致如此，不同的是，那棵巴比伦的神树只有八个分枝，假如能够证明九个果实与叶子属于蔷薇科杏类，则更能肯定它确实来自中东犹太人，因为杏树在古代犹太人中间特别受到青睐。同时鸟也是中东地区非常普遍的装饰物和神圣的象征，一些民族崇拜鸟，因此很有可能闪米特民族的一些传统会流传到三星堆文化中来^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来源于西亚民族对竹的崇拜，这主要是根据青铜神树分节这一形态来进行推断的^③，但是这种观点受到较大的质疑。

大部分外国学者都附会中国学者的观点来讨论青铜树的象征性，如德国学者乔帕(R. Goepfer)指出神树和立鸟可能和古蜀国的太阳崇拜的习俗有关，神树上立鸟数目一共是十只，正好与中国神话中关于“后羿射日”的故事吻合。他也列举了神树是世界的脐带和连接天地的纽带^④，及古蜀国的“生命之树”等中国学者的看法，但是对外来说却不以为然，认为对神树的解释从两河流域的发现来推断其象征意义，显然走得太远^⑤。

然而，罗森对青铜树的讨论，并没有陷入文献的圈套。她认为，这些树采用了贵重的材料，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因为人世间的树木是木头的而不是青铜的。树上的鸟在礼仪和宗教世界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鸟可能代表了诸神，是专门保护某些特定人群的神明或神界的重要角色。罗森还对利用时空和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文献和考古发现来解释青铜树含义的做法表示怀疑。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原地区早期的人们和晚期的文化享有共同的信仰，更妄论当时的四川

① 黄剑华：《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苏三：《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昆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④ 季智慧：《神树、金杖、筇与蜀文化》，见《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 年版。

⑤ Goepfer, R.: 《古老的中国——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 220 年之中国的人与神》，见罗泰主编《奇异的凸目》，巴蜀书社 2003 年版。

先民与中原先民享有共同的语言和信仰了。中国学者用较晚的文献来解释这些树和小鸟，看来是无稽之谈，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如想了解这些树和小鸟的含义，恐怕还需要有其他器物来提供一个更充分的背景，并在这种宗教和礼仪的背景之下来进行讨论^①。罗森女士的看法显然是不无道理的。

三、原始宗教与萨满艺术

我们在此想跳出文献的窠臼，尝试从原始宗教的角度分析三星堆祭祀仪式的作用，并用萨满艺术中对树和鸟的相似表现来解读青铜树的象征性。

从本质上说，宗教是人类与自身条件所决定的最终命运进行斗争的最初级的感情和智力手段。美国人类学家迪克逊(D. B. Dickson)将人类的宗教形式从简单到复杂分为4种形式，分别为个人宗教(individual cults)，萨满教(shamanistic cults)，群体宗教(communal cults)和教会宗教(ecclesiastical cults)。个人宗教是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宗教形式，主要流行于狩猎采集群中，并没有专业人士操纵。萨满教是一种常见的宗教形式，也称为巫。与个人宗教一起，萨满教主要见于较为简单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群体宗教表现为比萨满更加复杂的信仰和实践，它们不见于小规模原始群和部落社会，主要在人口密度较大、政治和经济发展较为复杂的社会之中，并且有专职的宗教人士。教会宗教是更加复杂的宗教形式，主要见于发达的社会文化之中，并以官僚等级体制将专职神职人员组织起来。

对于人类社会，宗教实践发挥着如下的作用：(1)常常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机制；(2)具有缓解社会压力的作用，为社会成员解惑并提供心理支持；(3)宗教活动将个人整合到较大的社会组织之中，成为家庭、团体、部落和国家的一分子；(4)在社会的各种活动中提供组织、思想和超自然的支持；(5)面对社会压力、混乱或解体的威胁时，宗教往往可以重新激发和改造社会文化系统，使之应对新的情况^②。

从三星堆出土的文化遗存来看，它显然是当时社会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证据。虽然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社会发展层次尚不清楚，但是从祭祀规模和道具制作所体现的对资源和人力的控制来看，其社会的发展阶段似乎远在单一部落

① 罗森：《三星堆祭祀坑之谜》，见罗泰主编《奇异的凸目》，巴蜀书社2003年版。

② Dickson, D. B., *The Dawn of Belief*,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之上，具有酋邦结构的特点。然而从宗教祭祀的形式来看，又具有强烈的巫覡特点。因此，我们想从萨满宗教的角度来深入探讨三星堆祭祀活动的性质。

宗教人类学认为，巫覡或萨满是借助超自然和神秘力量使得种种现象得以发生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通过宗教活动，萨满和祭司借助某种仪式和道具与超自然的神灵接触，直接获得神的“召命”。在古代和现代的原始部落中，人们通过巫的帮助来与神灵、祖先沟通以及治疗病痛，因此控制着这种通天手段和特殊知识的人，是真正执掌权力的统治者。在巫覡与超自然神灵的接触中，动物是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因此，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的萨满艺术中看到对种种动物的描绘，最常见的有鸟、蛇、鱼、蛙、虎、鹿等。

萨满这个词汇被认为来自东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但被看作是古代宗教行为的普遍形式。它又被称为巫师，专门指那些蒙神感召，具有神赐异能的男女。他们在陷入迷狂状态时，具有控制神灵的能力，他们能脱离肉体之身，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来往，与神灵进行交流，从而达到治病，丰产，保护以及侵犯的目的。萨满与精灵的交流往往以动物为载体进行灵魂的神秘旅行。萨满的主要活动是出神的降神会，在这种活动中，萨满与精灵建立联系，击鼓，唱歌，跳舞，穿戴精心制作的盛装，有助于萨满角色的转换，召唤精灵进入他们的身体。在降神会中，观众既是表演者，同时又是分享者^①。

张光直曾介绍了美国学者佛尔斯脱(P. T. Furst)的“亚美式萨满教的意识形态”，具体内容如下：(1)萨满式的宇宙是巫覡的宇宙，超自然的环境是巫术变形的结果。(2)萨满的宇宙是多层的，一般有天界、人界和地界等若干层次。每层有神灵的统治者和超自然的居民。宇宙诸层之间有一个“中央之柱”(或“世界之轴”)沟通，并有沟通各界的象征物。这个“中央之柱”常以树来表现，或称为“世界之树”，上面常有鸟作为在天界飞翔与超越各界的象征物。同时，世界又以南北和东西分为四个象限。(3)萨满的一条公理是人和动物在本质上是相等的。(4)人与动物本质的平等观念，使得人与动物可以互相转形。萨满一般以动物为助手，在仪式上，穿戴动物的皮、面具和其他象征物来转换身份。(5)自然界里的所有原因现象都被赋予生命或灵魂。(6)人类和动物的灵魂，或本质的生命力都居住在骨头里。(7)灵魂可以和肉体分开，在

^① 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地球上旅行，也可以到上界的天和下界的地去旅行。灵魂可以被精灵掠去，也可以被萨满巫师所拯救，失魂是疾病常见的原因，治病是萨满的特殊本事。(8)萨满用产生幻象的植物来达到迷魂失神的效果^①。

在另一篇文章里，张光直介绍了伊利亚德(M. Eliade)对萨满的描述：“在世界民族志上所说的巫，一般称为萨满，是在一个分层的宇宙下有贯穿不同的层次的能力，也就是说能够升天入地，沟通人神的巫师。巫师常常是生来就有这种沟通天地的本事，但他们在行法作业的时候，经常得到某种动物(尤其鸟类)的帮助。神山和神树也常常来帮助巫师上达天境；巫师升天入地时又常常跳舞奏乐，吃药饮酒，进入昏迷状态，在这种昏迷状态里与神鬼接触^②。”

除了宗教人类学对萨满的特点进行了介绍之外，民俗学的萨满艺术研究也为我们解读三星堆的青铜树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借鉴。今天的民族学考察，仍然能够看到许多艺术表现充满了萨满教的含义。如赫哲族的刺绣，萨满树是主要的表现对象。树干上的树枝有的直线斜向上方，有的呈曲线或涡旋状，枝端有叶，多为三叶相连。树枝上有立鸟。树干中上部画有圆状或带射线的花结状图形表示太阳(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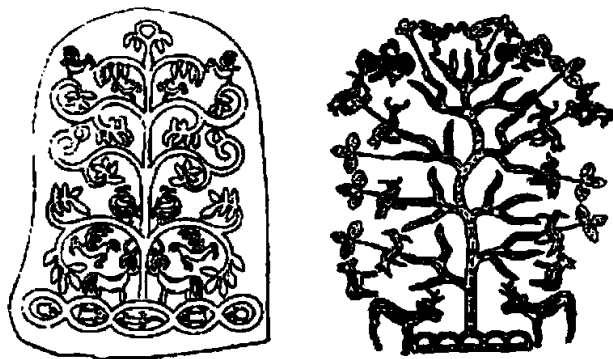


图3 民间艺术中的萨满树(王纪等：《萨满绘画研究》)

在许多民族的传说中，树和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吉祥鸟和神树”，每个萨满也都有自己的萨满树，传说第一个萨满就是在桦树上出生并由一只鸟抚养长大。树上的鸟是氏族生命延续与繁盛的象征，

①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一个鸟巢繁盛的氏族树象征着氏族昌盛，人丁兴旺。如赫哲人认为，天上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神树，上面栖息的众多的“魂鸟”，在投胎到母腹之前，它们都栖息在“魂树”的枝头上^①。在今天北方信奉萨满的各民族中，这样的仪式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如在新萨满的考核仪式上，新萨满被要求爬树、爬杆或登上刀梯(杆、刀梯被看作宇宙树的一种异化形式)，这样才可以成为真正的萨满^②。

在萨满借助精灵通天的能力方面，鸟类是最常见的象征动物之一。鸟崇拜在萨满教中十分普遍。不但第一代萨满由一只鸟抚养长大，鸟也是强大生育能力的象征，掌管生育的女神乌麦有时就以鸟的形貌出现，人死后也被看作栖息在树上的“魂鸟”，这些都足以说明鸟在萨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除了对于普遍意义上的鸟进行崇拜之外，萨满对鹰有着特殊的感情。鹰是萨满神技的最好象征，是力量与威武的表现，是生命之母神，后来成为萨满的重要守护神^③。

四、讨论

根据对原始宗教作用以及萨满艺术特点和表现形式的介绍，我们再来看三星堆的青铜树以及其他祭祀物品，就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启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萨满教是在比较原始的社会群体里常见的宗教形式，但是它所表现的沟通人神的能力，成为后来复杂社会中被统治阶层用来谋取政治权威的手段。张光直说，在古代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巫的帮助与天沟通，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天地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权力，于是巫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而帝王自己就是众巫的首领^④。因此，到了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商、周和秦、汉时期，巫觋仍然在朝野的宗教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像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首邦社会，巫觋手段在权力运作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了。两个祭祀坑所发现的所有文化遗存，均强烈暗示当时统治阶层沟通人神的宗教活动，并表现出鲜明的巫觋和萨满特点。

根据上面宗教人类学和萨满艺术的分析，我们可以基本这样认为，三星

① 黄强、色音：《萨满教图说》，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孟慧英：《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王宏刚、于晓飞：《大漠神韵——神秘的北方萨满文化》，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 张光直：《巫觋与政治》，见《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树既非扶桑、若木或建木，也非图腾和摇钱树，而是巫师或祭司在祭祀仪式上用以沟通天地的道具：“萨满树”。以一号大型神树为例，这棵萨满树分为三层，应该代表天界、人界和地界的三层宇宙，每层树枝上的小鸟代表各层沟通上下界之间的信使与精灵。每层的树枝向三个方向分叉，似乎代表世界的象限，而没有树枝的一侧恰好是一条身贯天地的龙。从青铜树的象征性来推断，三星堆文化的宇宙也分为三层和四个象限。龙身所缺失的腹和尾原来刚好固定在树干中下层的分枝部位，固定龙身的残钉依然留存。以龙来标志宇宙象限的一方，对于三星堆文化可能具有特别的含义。我们在此想做一个大胆的揣测，如果三星堆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和交流，那么这条龙很可能被用来代表东方的象限，暗示东方华夏民族的神灵。而且龙身被设计成触地通天，象征了无与伦比的神力。如果这一揣测能够成立，那么这棵萨满树当时在仪式中，龙头应该被安置面向东方。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与龙头相反的一侧中层的树枝分出两叉，与上下层的仅有一叉的树枝不同，如果该分叉是代表西方象限的话，应该指的就是蜀地的方位。一般萨满树的中层分枝代表人界，因此这一设计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也是值得玩味的。

小型神树上的人面鸟则更清晰地向我们透露了动物精灵的象征意义。上面我们已经提到，鸟类因为其能够飞翔的能力而普遍被萨满用来作为沟通天地的精灵，我们可以从良渚玉器和商、周青铜器的纹饰中看到以鸟为突出主题的表现。张光直引用美国学者坎贝尔(J. Campbell)的一段描述，为鸟的象征性做了一番阐释：“萨满的神力在于它能使自己随意进入迷幻状态……并把他的伙伴如野兽和鸟类召到身边。这些旁人看不见的动物能助他一臂之力，帮助他升天。他也是在这种迷幻癫狂之时施展法术，并在昏迷中像鸟一样升向天界，或像驯鹿、公牛或熊一样降临地界。”^①

最耐人寻味的是，小型神树上的鸟与大型神树上的不同，把鸟头直接铸成了人面，暗示其造型就代表了萨满或巫师，表现出祭祀仪式中萨满和巫师在魔力作用下的身份转换，以便进入天界，达到了沟通神灵的境界。这个人面鸟的面部造型非常像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暗示了那些青铜面具极有被萨满或祭司用来作为人神转换的道具的可能性。萨满和巫师这种身份的转换在原

^① 张光直：《巫觋与政治》，见《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始人类社会的宗教信仰中是极其普遍的，根据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在原始人群中，灵魂的一般特点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动物的灵魂被认为是人类灵魂的自然延伸，他们之间可以转换。于是，各种动物成为萨满和巫师借以沟通灵界最常见的工具。

在此，我们还想从祭祀坑出土遗存的整体背景来观察青铜树的作用。这批利用珍贵材质制作和劳力投入不菲的器物，对于三星堆的先民来说，并不是什么艺术品，而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符号与象征，在原始人类来看，世界对人来说是充满了各种征兆，并将这些征兆看成是神秘天命的信念。他们深信物质世界在精神力量的控制之下。于是，原始宗教都通过象征主义来指向终极或超自然的境界，用符号或象征来表现和理解超自然的境界^①。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遗存，从整体上而言就是这种超自然境界的象征和符号，是三星堆先民宗教信仰的浓缩宇宙，祭司和首领人物就是通过宗教仪式和象征符号的运用，来上顺天意，下服民众。在这样的原始社会中，宗教信仰总是与强烈的感情、极度的敬畏、深度的恐惧和若痴若狂的仪式连在一起^②。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三星堆祭祀坑的掩埋原因，然而出土的这批宗教仪式道具可以令我们想象当时祭祀仪式的场面。

张光直曾介绍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东周青铜杯上的祭祀纹饰，特别提到了图案左侧的树和鸟，他认为这就是萨满借助神树和鸟在上传天意，并将天意下传人间^③。祭坛左侧的意境似乎是“上传天意”的仪式，右侧也有一颗神树，周围有人击鼓、跳舞和奏乐，意境应该是“以舞降神”。左侧萨满树下还有一人拉开弓箭作射天状。可能并不是在射鸟，而是另一种沟通人神的仪式(图4)。作者曾撰文讨论过三星堆和金沙古蜀金器“射鸟纹”中那枚无头矢，认为箭作为一种飞行的武器和工具，有可能被巫觋用作在世界各层间升降的象征物^④。这幅东周的祭祀图案，也许可以为三星堆萨满树和鸟，以及射鱼纹的功能和含义提供进一步的旁证。

① Stanner, W. E. H., Religion, totemism and symbolism. In Lambek, M. (ed.), *A Reader in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90—98.

② Fortes, M., Fate in religion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Lambek, M. (ed.), *A Reader in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376—382.

③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④ 陈淳：《金沙古蜀金器“射鸟纹”之我见》，《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27日。



图4 东周青铜杯上祭祀图案中的萨满树(《文物》1961年第10期第29页)

五、小结

《三星堆祭祀坑》一书将出土器物的功能分为神像，神灵，巫祝，祭器，礼器，仪仗和祭品6类。其实，从整体结构来看，这批器物反映了三星堆文化整个宗教体系中具有不同功能和意义的各类象征和符号，是三星堆先民整个宇宙观的缩影。虽然对远古人类意识形态产品的解读有着特殊的难度，使得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这批器物的真正含义，但是我们除了利用文献资料以外，还应该借助宗教人类学的规律性分析和民俗学类比，以便能够管窥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了解社会结构的运转层次。

目前，对于三星堆青铜神树的解释基本都依赖古代文献和神话的记载，将其看作是扶桑、若木、建木、杜树、句芒，或者根据与汉代摇钱树的相似特点，将其看作是“放在宗庙里用于迎钱和祭祀日神的神树”。这样的解释当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从这批文物所表现的强烈宗教意义上来看，这种依赖神话描述的解读似乎显得深度不够。本文则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借鉴了萨满艺术表现的普遍特点，对其作了一番解读，希望能够为这类遗存提供一种可能性解释。作者曾根据三星堆和商、周青铜器的比较，认为三星堆青铜器和其他祭祀器物的结构特点明显具有强烈的“巫觋”特征，它们显然缺乏商、周青铜器那种强烈的王权意识(相对于三星堆的神权概念)和地位分层的象征性，较为突出地表现为“以舞降神”和“沟通人神”的萨满特点，社会复杂化程度显然较殷商为低^①。我们期望，今后的三星堆研究能更多地利用宗教人类学的理论来整体分析这批独特器物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使我们更加深入认识这批独特文化遗存的意义和价值。

(与殷敏合作，原刊《四川文物》2005年第6期)

^① 陈淳、韩佳瑶：《从青铜器看三星堆的巫和殷商的礼》，《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13日。

考古学与未来：工业文明的忧虑

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但令人们同样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文明的崩溃。我们常常自豪地宣称，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其他的早期文明和后来的历史进程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是一些断了源头的文明。世界上酋邦阶段的远古文明更是不计其数，如中国的龙山、良渚、三星堆与红山文化，中美洲的奥尔梅克，英国的巨石阵，太平洋中的复活节岛，北美西南部的查科峡谷(Chaco Canyon)，等等。这些早期文明社会像流星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划过天空，突然消逝在深邃遥远的过去，留下了壮观的遗迹和令人遐想的悬念。于是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来猜测它们的来龙去脉，甚至把一些史前文明看作是外星人的杰作。

对这些消逝文明的探究，由于人们不清楚当时的各种具体状况，常常将它们的崩溃归因于外界的因素，如战争、入侵、洪水等灾难性事件。以为早期文明的崩溃是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机制十分脆弱，对环境和灾难的应变能力有限，以至难以抵挡各种突发事件。当然，早期文明一般会比现代文明社会受到更多的制约，而无法预见和难以控制的人口增长、环境退化、宗教信仰及内外冲突等因素常常会成为这些早期文明潜在的致命弱点。但是，考古学研究表明，在许多文明崩溃案例中，人类自身往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认识也引起了这样的思考，当代工业文明具有强大的科技力量，能否根本避免古代文明那种轮回与崩溃？

本文尝试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审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景。俗话说，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衰。同样，考古学对古代文明崩溃的研究，也可以为现代文明的走势提供一面镜子。文章将对玛雅文明、复活节岛和中国良渚时期的文明崩溃现象做一番介绍，然后分析社会崩溃的机制，最后以一种危机感来对现代文明做一番思考。文章表明，考古学并不只是研究人类的过去，它对我们未来发展的思考也有意义深远的警示作用。

一、古代文明的崩溃

1. 玛雅

玛雅文明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在特殊生态环境中的特殊发展，像佩滕地区的丛林似乎是最不适宜文明发展的环境，但是它却成为玛雅低地文明的摇篮。就在这片茂密的雨林中，玛雅人栽培各种谷物、蔬菜和水果，建造起巨大的祭祀中心。北部尤卡坦地势低洼而平坦，到处分布着茂密的灌木丛。由于处于石灰岩地区，腐殖质层不过几英寸，裂隙发育的喀斯特地貌使得雨水直接渗入地下，地表没有很大的河流和湖泊，因此这一地区十分干旱。

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前古典期到公元 250~600 年的古典期，是玛雅文明的形成阶段。在低地的热带雨林环境里，人们从事一种刀耕火种的农业，从前古典时期到古典期早段，粮食生产一直能够维持人口的增长。但是在此之后，玛雅开始出现粮食短缺。之后，由于采取了强化的农业技术，在山坡上开垦梯田并填高湿地和沼泽以增加土地面积，扩增了一万平方千米的耕地，情况开始好转。进入古典期后，其全盛期仅延续 300 年。到公元 9 世纪，连续的干旱最终拖垮了玛雅文明。

美国考古学家亚当斯(R. E. W. Adams)，总结了玛雅文明崩溃的三大特点。第一，贵族文化消失，表现为：(1)宫殿被废弃；(2)祭祀建筑停止营造和维修；(3)石碑铭刻停止制造；(4)精致陶器和玉器等奢侈品停止生产；(5)历法和文字停止使用；(6)与上层贵族活动有关的一切行为如球赛等均不复存在。第二，农村和祭祀中心人口锐减。第三，崩溃发生在 50~100 年的很短时段之内。然后，亚当斯总结和评估了阐释玛雅崩溃的各种原因和不同观点。(1)生态因素：认为崩溃的原因是刀耕火种农业对森林植被和土壤肥力造成破坏、水土流失、旷原杂草蚕食及病虫害肆虐，拉垮了玛雅的农业和文明基础。(2)灾难：有学者认为宫殿和整个祭祀中心的废弃是因为地震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玛雅低地经常发生飓风，并对玛雅文明崩溃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亚当斯认为，自然灾害作为文明崩溃的主因不够令人信服。(3)农业潜力：这种观点认为热带雨林不适合高度文明的演化，环境和刀耕火种农业内在的局限性导致文明必然崩溃。(4)疾病：有学者认为玛雅崩溃可能与疾病传播有关。但是亚当斯指出，疾病一般不大会导致生物学灾难。因此，传染病在诸多崩溃因素中可能性最小。(5)人口：一些学者认为出生率中性别比例失衡可能是一种原因。(6)社会结构：这一观点认为过重的税收导致阶级矛盾加剧和内部动乱，玛雅贵族从墨西哥中部引入雇佣军导致军事化和世俗化，意识形态改变导致道德瓦解。但是亚当斯认为，内部暴动很难从考古学上察觉，一些动乱的证据也可以得出其他解释。(7)入侵：一些学者认为来自尤加坦北部的墨西哥人入侵，在这里建立了贵族政权。伴随着战争和饥荒，玛雅低地人口锐减，破坏了农业经济导致国家崩溃^①。

马库斯(J. Marcus)总结了有关玛雅崩溃探讨的两个趋势，一批学者倾向于强调自然因素的主导作用，认为持续的干旱是公元9世纪大量祭祀中心被放弃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批学者则倾向于内因，觉得环境问题在玛雅低地因地而异，因此认为社会政治问题是崩溃的主因。她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我们还无法分辨各种扰动因素来确定造成玛雅崩溃的直接和最终影响^②。

以瑞土地球化学家豪格(G. H. Haug)为首的一批学者，在2003年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玛雅文明崩溃与古典期末持续干旱有关的论文。他们对南美委内瑞拉北部卡利亚科盆地(Cariaco Basin)未受扰动沉积物中的块状钛含量进行分析，以了解河流注入物质的变化和气候水文循环，对公元700~950年这段古典玛雅兴衰阶段的气候和沉积物变化进行了细致观察。钛的季节性分解记录显示，玛雅文明在达到全盛期后不久，该地区就开始出现不断扩大的干旱趋势，并在公元800~900年至少发生两次持续多年的严重干旱。

玛雅低地文明处于季节性的干旱地带，农业主要依赖自然降雨进行灌溉，而大部分的雨量集中在夏季，加上尤加坦半岛的喀斯特地形很难形成较大的

① Adams, R. E. W., The collapse of Maya civilization; a review of previous theories. In Culbert, T. P. (ed.), *The Classic Maya Collapse*,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versity Press, 1973, 21-34.

② Marcus, J., Recent advance in Maya archaeolog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3, 11(2): 71-148.

地面水体，为了应付雨量的不均匀，玛雅人只能想出各种办法来集聚雨水以维持农业生产。公元550~750年是玛雅低地气候的最佳时期，充沛的降雨使农业得到发展，导致玛雅文明迅速扩张。到古典玛雅的全盛期，人口从先前的300万猛增到1300万，人口膨胀达到了环境和土地载能所能承受的极限，使得社会在面临干旱和农业歉收时变得十分脆弱。考古学和环境资料精确控制的年代学研究显示，气候恶化与玛雅文明衰落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伴关系。玛雅低地的最初旱情始于公元760年，一直延续了40年之久。不久，从公元810年又开始了一波长达10多年更严重的干旱。到公元910年再次发生了一波长达6年的严重干旱。由此可见，在玛雅文明于公元750年达到顶峰之后，马上就开始面临干旱的困扰。这种持续和反复加重的干旱无疑对玛雅低地的农业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过多的人口和农业歉收带来的资源压力，加上统治者管理和对应危机上的失误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社会运转系统瓦解，最终在公元9世纪拉垮了玛雅文明^①。

2. 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是东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一座小岛，由火山喷发所形成，轮廓为三角形，长14英里(1英里 \approx 1.6千米)，宽7英里。岛的三个角上分别有三座死火山，最高的一座海拔1700英尺(1英尺 \approx 0.3米)。复活节岛位于浩瀚的太平洋中，是地球上最偏远和最孤独的地方。大约在公元700年岛屿被栖居后，岛上就发展出比较复杂的酋邦社会。当时的社会分成各个阶层，由祭司进行统治，各种专职工匠负责雕刻和建造石像，食物则由农民和渔民提供。周围海域可以提供丰富的鱼、虾和贝类，种植的作物包括芋头、香蕉、白薯和甘蔗。同时古代岛民还养鸡。一直到16世纪的七八百年里，岛上社会稳定，人们制造了大约1000尊巨大石像。当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格文(J. Roggeveen)在1722年4月复活节登上这座岛屿的时候，他不但为岛上矗立的几百座石像所惊讶，而且被荒凉的景观和稀少的人口所困惑。但是考古学证据表明，岛上曾一度覆盖有大型棕榈树为主的茂盛植被，但如今已经绝灭。岛屿环境因为人为过度开发而被破坏，为了要运输这些巨型石像，岛民

^① Haug, G. H., Gunther, D., Peterson, L. C., Sigman, D. M., Hughen, K. A. and Aeschlimann, B., Climate and the collapse of Maya civilization. *Science*, 2003, 299: 1731-1735.

砍伐大量木材来做木橇，制造独木舟和工具、房屋也需要消耗许多木材。一旦岛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石像也就无法运输和矗立，独木舟也停止生产，一些原来经常开拓和赖以生存的近海资源如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也就无法利用。林木消失造成覆盖在火山岩上薄薄的一层土壤很快流失，无法再生长大型的树木。

随着岛屿环境的恶化，岛屿上的部落开始发生冲突。据说哈瑙伊普族和哈瑙莫莫库族之间为争夺耕地进行战争，结果以哈瑙伊普族被消灭而告终。战争的结果导致岛屿上的粮食生产中断、人口锐减、宗教制度瓦解、贵族失去了权威、有效的经济体制解体，甚至出现了将人作为食物来猎取的可怕场景。这次冲突发生的时间离罗格文抵达复活节岛只不过40年^①。

3. 中国良渚

良渚文化的中心分布区环太湖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的江南部分。这里出土的大量玉器和高规格的墓葬被誉为东方文明之光和5000年中华文明的第一证。本地区内共发现了500多处遗址，并呈聚落群分布，形成了几个大型的聚落中心。主要包括以余杭良渚一带为中心的聚落群、以上海福泉山一带为中心的聚落群、以苏州东部地区为中心的聚落群和以无锡南部为中心的聚落群等。这些聚落群规模庞大，密度较高，不仅聚落群与聚落群之间形成了等级上的差异，而且聚落群内也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异。从规模上看，诸遗址中有像昆山绰墩这样达几十万平方米的，也有像余杭上口山和杜山那样仅几百平方米的，遗址间的规模分化进一步扩大。每个聚落群的遗址数量均达几十处甚至是百处以上，各个遗址之间有了明显的功能分区，出现了专门的墓地、居住区与作坊区。

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差别反映了地位和等级的分化，大、中型墓地的营造普遍采用土墩埋葬，大型土墩可达几万立方米，此外，大型墓地还出现了专门的祭祀场所——祭坛。这些祭坛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显然需要动用大量劳力。随葬品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玉器的使用成为墓葬等级高低的重要标志。贵族墓葬大量使用玉器，主要以钺、琮、璧、锥形器、冠形器等随葬。

^① Cazeau, C. J. and Scott, S. D., *Exploring the Unknown*,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0.

良渚文化大约在 4 000 年前消失，后继的马桥文化无论是人口规模、农业经济、玉器等奢侈品，还是聚落形态都无法和良渚相比，反映出显著的倒退。

环境地理学研究显示，距今 5 000~4 000 年全球气候发生了一次变冷和降温的过程，长江下游在这一时段里也发生了降温。良渚中晚期的年平均温度为 $12.98^{\circ}\text{C}\sim 13.36^{\circ}\text{C}$ ，比现在低 $2.2^{\circ}\text{C}\sim 2.7^{\circ}\text{C}$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100~1 264 毫米，比现在少 140~300 毫米。水稻是一种对水和气温要求很高的农作物，良渚中晚期的干凉气候特点必然对稻作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使粮食产量明显降低。良渚中晚期的长江下游地区处于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并发生过多起水域扩大的事件，对农业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难以低估。社会文化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有机体，在面对环境波动应该有一种自我调节能力。但是，如果环境恶化所导致的人地关系达到了难以调节的地步，任何偶发事件都能够引发文化更迭和社会变迁^①。

二、崩溃的机制

1988 年美国考古学家泰恩特(J. A. Tainter)出版了《复杂社会之崩溃》一书，对文明和复杂社会的崩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泰恩特列举了标志文明和复杂社会崩溃的八项主要特征：(1)社会分层和等级差别明显降低；(2)经济和手工业专业化降低或消失；(3)集中控制消失，不再有贵族掌控的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间的协调和整合；(4)社会控制和管理层次降低；(5)作为文明迹象的纪念性建筑和艺术投入减少或消失；(6)贸易和再分配减少或消失；(7)个人之间协作和组织活动减少；(8)小型社会局限在较小的地域之中。泰恩特提出了社会政治演变的“边际产量”概念，从经济学角度来了解复杂社会运转能量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

泰恩特认为，像有机系统一样，人类社会和政治结构都是由能量的持续流动来加以维持的。同时，人类群体获取和分配资源的动力机制受制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机构，并由后者进行整合。能量流动和社会政治结构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对于人类社会的运转而言两者缺一不可，而且两者必须相互协调才能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维持一个社会政治系统不仅需要能量流动，而且维持

^① 陈杰：《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环境》，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2002 年。

这个系统的复杂性也必须有足够的能量支持，复杂社会需要有比简单社会更高的人均产量来维持。

泰恩特指出，在许多关键方面，社会政治复杂性在能量持续投入达到收益开始下降的一点后，就会开始缓慢下滑，然后这种下降会加速。于是，不但社会民众会不堪重负，而且在达到某一点后，加大投入却导致收益的持续降低。许多经济学家将这种报酬递减的原理看作是一种“法则”，用来分析在生产上增加投入却导致报酬递减的现象。这种经济学原理对于解释复杂社会的运转是很有启发的，其中两个概念十分有用，一是平均产量(average product)，一是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平均产量是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边际产量是指整个投入所产生的整个产出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剩余产量。同样，平均支出是指每单位投入的代价或支出，而边际支出是指由增加(或减少)单位投入导致的整个支出的增加或减少。将这些概念运用到社会复杂化上，可以看到社会政治演进不断增加的支出常常会达到边际产量开始减少的一点，在经过这一点后社会复杂化投入的增加不再产出按比例递增的回报。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支出增加，复杂化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成本逐渐提高。

社会日趋复杂化的过程与一种系统运转相似，作为相互关联一部分而被迫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其他部分也必须相应进行调整。社会复杂化需要更多的农业产出来维持其需要，并要加大能源和矿物资源的开采，创造出来的财富需要军队加以保护，反过来又需要农业和其他资源的支持。当民众被迫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资源来维持这个系统时，用于司法和强制手段的开销也同时增加。这种复杂性的增加需要依赖专门的管理者，他们也需消耗资源和财富。为了维持基本人群的产能，加大农业投入也在所难免。

如图1所示，发展中的社会文化系统最终会达到图中曲线B2和C2的点位，然后进一步复杂化投入的回报开始以一种边际衰减速率下降。当到达这一点后，社会便进入了一个面对崩溃变得十分脆弱的阶段。有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会使得社会变得很容易崩溃。第一，压力和紊乱如农业歉收、边界冲突和内部动乱，是所有复杂社会常见的特点，因此社会必须采取常规手段来应付这些事件。还有为了应付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社会也需要做一些战略储备。但是面对边际产出递减的社会即使采取加大投入的策略，其产出和投入也不成比例。结果，即便社会能够成功应付压力或突发事件，但是这些过

程会使它元气大伤，使得它在应对下一个危机时变得更加脆弱。一旦一个社会因边际回报递减而变得十分脆弱时，崩溃可能只是时间和运气上的问题了，它完全可能会因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灾难而突然发生。第二，递减的边际回报会使复杂性成为解决问题的下策，社会复杂化的优势最终会败给运转代价较低的简单社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瓦解变得比维持复杂社会那种整合更具吸引力，人们行为上的相互依存会被各行其是所取代。当参与一个复杂社会边际代价过高，整个经济体制中的生产单位会对集中等级制的要求产生越来越大的抵制，或试图从整体上脱离，这就会导致国家分裂和内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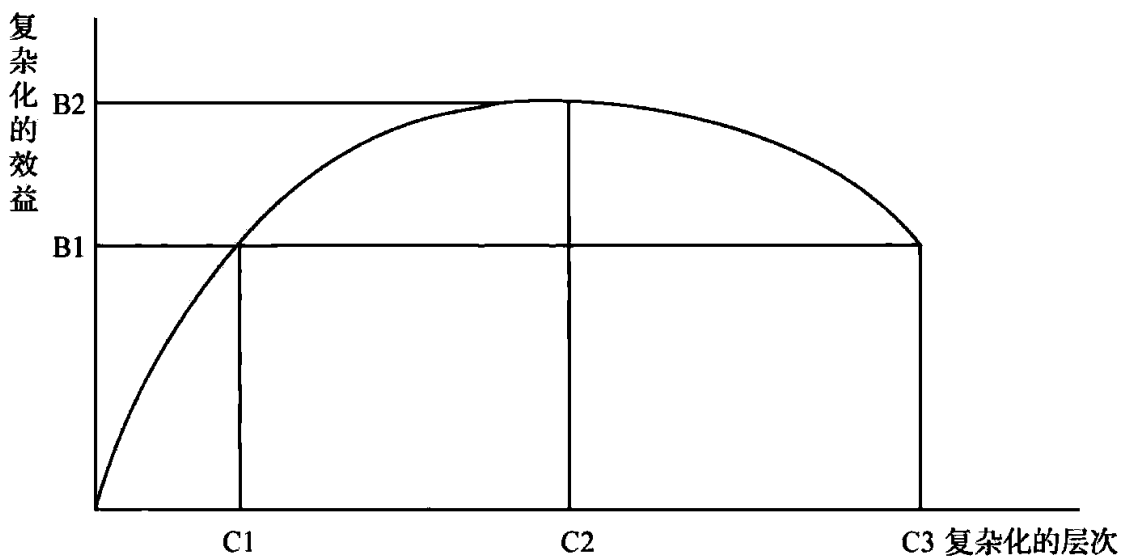


图1 报酬递减与复杂社会解体示意图 (依 Tainter, 1988)

特里格(B. G. Trigger)借用“最省力”原则审视文明和早期复杂社会中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他指出，所有人群在从事与粮食及其他物质资源生产和分配的活动中总是努力保存能量，这种节制在人们的活动安排和空间组织上都十分明显，工业前社会也像现代工业社会一样十分重视他们活动在空间上的安排，以求在人口、物品和信息的流通中减少能量的支出。史前狩猎采集群和农业部落用最省力原则指导他们的行为并不亚于当代的经济决策者。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现代决策者以紧缩开支以获得最大收益，而史前社会

^① Tainter, J. A.,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一般以节省力气和时间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是特里格指出，在文明和早期复杂社会中普遍存在一种显赫或奢侈消费的行为，也就是以浪费劳力和资源的方式来提高威望和权力。显赫或奢侈消费对最省力原则是一种公然的违背，因为为了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经济和省力的原则应该是主导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主要方式。然而，政治权力普遍被看作是一种对能量的控制能力，统治者无不是在加强其控制的活动中投入大量能量来维护其政治权力，于是权力最显赫的表现就是一个统治者在非实用目的上消费他所控制能量的能力。

早期文明中充斥着权力的物质表现，贵族人物将自己用珍稀或进口材料、由技术高超工匠精心制作的珠宝装饰起来，以象征高层次的能量消费。同时，早期文明社会在建筑、文字、历法、占卜和其他宗教活动上投入大量能量来强化和维持复杂社会系统，这会加大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距离，损害普通百姓的福祉。权力物质表现的最典型特点莫过于公共纪念性建筑，这是一个统治者所能希望做出的最为不朽的权力诉求。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建筑可以延续千百年，而且这种建筑规模愈大，它们所表现的权力也愈大^①。

结合泰恩特的“报酬递减”原理和特里格的“最省力”原则，我们可以对文明崩溃和复杂社会解体的动力机制加以说明：当社会一旦日趋复杂化，其趋势或进程就不可逆转。贵族阶层的收入和消费不会降低、专职人士不会减少、祭祀建筑需要营造，当社会的剩余产量不断投入维持复杂系统运转而非供养民生时，社会系统运转的报酬递减必然会掏空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处于这种状态的文明社会就像是风中残烛，已经不起任何压力和动荡，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趋于瓦解。因此，当我们看到玛雅、复活节岛和良渚等史前文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免揣测它们是否遇到了意外灾难和入侵。如果我们能够从其内部运转方式和固有缺陷来考虑问题，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只不过是导致球赛最后失利的临门一脚。

虽然“报酬递减”和“最省力”原理被用来解释古代文明的崩溃，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在根本上受制于这些经济规律，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① Trigger, B. G., Monumental architecture: a thermodynamic explanation of symbolic behavior. *World Archaeology*, 1990, 22(2): 119—132.

如果人类漠视这些规律，工业文明也难免重蹈古代文明崩溃的覆辙。

三、工业文明的忧虑

我们在探讨文明起源的同时，它们的消失和崩溃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我们发现，那些孕育了早期灿烂文明的地区，现在大多处在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人类起源摇篮的非洲大陆目前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地区，人口、饥荒、艾滋病和环境的压力使得专家们认为非洲的振兴已经没有指望。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今天战火连绵，满目疮痍，孕育了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的伊拉克深陷动乱和苦难之中。中国、埃及、印度和墨西哥等文明古国都处于第三世界，在近代历史上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即使在中国，孕育了夏、商、周和灿烂汉、唐文明的摇篮目前也位处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种强烈的反差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历史怎么会选择这里作为伟大文明古国的核心！为什么新的文明不能在古代文明的废墟上重新崛起？看来，社会的演化也像动物的进化，绝灭的物种不可能在向上演进的链条上再次出现。孕育古代文明的各种条件早已不复存在，现代文明只能是人类社会在全新条件下的全新创造。

文明崩溃就像文明起源一样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经久不衰的课题，这个课题和无数的案例向我们昭示，文明是脆弱和并非永恒的。我们今天所处的现代文明社会得益于科技的昌明和工业的发展，便常常使人以为古代文明只是局限在少数社会，它们的崩溃是偶然和突发事件所导致的悲剧性结果。我们现代社会拥有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历史、经济学知识，应该能够克服古代文明社会所无法克服的困难，可以使当代工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有理由对人类发展的未来充满乐观和憧憬。

当我们在审视像玛雅、古埃及和古罗马这些辉煌古代文明崩溃的案例时，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现代工业文明真的比古代文明先进而能永恒吗？当代工业社会能够永远保持持续增长和发展势头吗？地球人口真的可以克服马尔萨斯理论而不受限制地增长吗？先进的科学技术真的能够克服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带来的压力吗？我们过去受“人定胜天”口号的鼓舞，对科学技术的潜力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觉得人类的智慧和社会进步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阴影，在现代高科

技炫目的光芒之下，许多令人担忧的阴影隐约浮现。早在1968年，未来学研究的著名团体“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著名意大利经济学家佩切伊(A. Peccei)认为，世界的状况正在恶化，人口和粮食、资源和能源、都市化、工业增长和环境污染相互作用，正在对全球的文明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受罗马俱乐部委托，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书中指出，如果目前世界的人口、工业化、污染及粮食产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系统中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的话，地球发展的极限将在100年内出现，我们被迫面对全球的大变动。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研究报告警告，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①。

未来学家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在为人类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外，也出现了大量的弊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无限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无条件强调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加消费，浪费资源和能源，刻意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过度消耗资源，特别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工业的发展常常忽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于是，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成为全球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威胁。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耕地面积就开始出现难以遏制的下降趋势，与人口增长相互作用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地球98%的水资源是非淡水资源，随着工业发展、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危机开始笼罩经济增长和人类的生活质量^②。现在，人们逐渐感到周围无清洁的空气可供呼吸，没有放心的水可供饮用。滥用化肥和杀虫剂、食品添加剂、色素和加工监管不严，使人感到无安全的食品可供放心食用，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和局部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两级冰盖融化、酸雨肆虐、森林、草原和湿地退化严重，并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湿地的大面积消失导致动植物绝灭进程加速。目前，石油、天然气和煤是人类社会消耗的主要能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占消耗能源的60%，煤、水电和核能占40%。由于石油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于是超级大国对战略资源的需求、争夺和控制，成为世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① 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秦麟征：《破损的世界——现代文明的阴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虽然资源较为丰富，但是与庞大的人口一比，根本无“地大物博”的优势可言。加上资源分布极不均匀，运输代价昂贵，浪费污染严重，形势不容乐观。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加速，对能源的需求也在猛增，能源危机的压力也在逐步显现。地区各大小煤矿为了追求眼前商业利益进行破坏性开采，开采和利用的低效造成大量宝贵资源浪费，并酿成当地矿难惨剧屡禁不绝、环境污染积重难返。实质上，中国既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又是一个能源消耗和浪费大国。据最新报道，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7.7%，煤炭为 58.6%。根据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能力测算，我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可开采年限分别只有 80 年、15 年和 30 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 230 年、45 年和 61 年。伴随着化石能源储量的急剧减少，我国的能源消费却直线上升，2005 年煤炭产量为 21.9 亿吨，比 2000 年翻了一番。石油的净进口量也由 2000 年的 0.76 亿吨飙升到 2005 年的 1.43 亿吨。与能源短缺和消费激增形势很不协调的是，我国的能源浪费惊人，能源利用效率只有 33%^①。

我国的水源危机也令人担忧，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供水矛盾日益尖锐。据报道，我国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供水不足，六分之一的城市严重缺水。由于透支地下水，目前地下水超产量已经达 100 亿立方米，导致地面下沉和海水倒灌等地质灾害。北京东郊 600 平方千米地面下沉，中心区沉降达 0.55 米。天津地面最大沉降达 2.46 米，太原达 1.38 米，京津塘地区地下水已经“十水九空”。农村 3 亿多人口的饮水不安全，其中 1.9 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超标，6 300 万人饮用高氟水，200 多万人饮用高砷水，3 800 万人饮用苦咸水，血吸虫病区 1 100 万人饮水不安全。目前，我国 25% 的地下水遭到污染，35% 的地下水源不合格，平原地区有 54% 的地下水不符合饮用水标准，一半以上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如京津塘地区地下水中的污染物种类达百余种之多^②。

①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煤炭石油天然气没几年可采了》，《新民晚报》2006 年 8 月 26 日。

② 杨东平：《喝 5 亿年前水是透支“救命水”》，《新民晚报》2006 年 4 月 17 日（原载《新京报》）。

另据报道，我国7大水体中劣质5类水体占30%左右，黄河上游部分除了部分河段水质为3类外，其余长年为5类水质。渭河从甘肃进入陕西境内时为2类水质，但是到达潼关进入黄河时已变成5类水质。群众称“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汾河为山西的母亲河，她有66%已经成为5类水质，太原以下的水体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态功能。山西境内的另一条黄河支流涑水河全程为5类水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条排污沟^①。淮河水系中60%是5类水，表明这些水体已不可用。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自来水处理技术只能对细菌和微生物起作用，对有机物、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却无能为力。目前的处理技术最多能够杀灭30%的有机物，现在国际上从水中检测出的有机污染物已有2000余种，其中114种被疑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作用。中国的水源中只能检测出100余种有害有机污染物，而传统和陈旧的自来水净化技术已经无法处理污染日趋严重的水源，过去衡量饮用水的标准并没有列入许多新出现的污染指标，因此目前衡量饮用水的安全标准早已不安全。专家忧心忡忡地指出，在整个水环境恶化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饮用水源的枯竭也难以遏制。如果重新制定的安全标准出台，那将需要更新净水技术、提高自来水价格，结果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和颠覆性的冲击^②。

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也同样严峻，其污染状况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专家列出了长江流域面临的六大危机：(1)植被退化，泥沙增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2)枯水期提前；(3)水质恶化，危及城市饮用水安全；(4)物种受到威胁，珍稀物种灭绝加速；(5)固体废物严重污染河湖，威胁水闸与电厂；(6)湿地面积萎缩，水的自洁功能日益丧失。专家认为，长江的开发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但是有关单位仍计划在20年内再在长江干流上建造百座电站。目前全球有21条河流生态严重退化，其中长江排名第一。如果这些工程项目上马，肯定将进一步威胁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造成无可挽回的负面影

① 综合新华社消息：《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黄河流域四条支流“有水皆污”》，《新民晚报》2006年8月27日。

② 朱红军、吴娟、蒲彩：《一滴自来水的的天安全悬疑》，《新民晚报》2006年4月21日（原载南方周末）。

响和生存危机^①。今天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用水形势已经如此严峻，子孙后代将何以为生?!

人口压力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更新世末发生的粮食危机导致了农业起源，在更新世末全球人口达到 320 万人花了 300 万年的时间。农业经济产生之后，人口增长加速，但由于增长率较低，到全新世中期的 5 000 年前才增加到 500 万。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到工业革命的 18 和 19 世纪，人口在短短几千年里增加到 10 亿。然后，人口的增长开始加速，从 10 亿增加到 20 亿花了 80 年时间，从 20 亿增加到 30 亿花了 30 年时间。1960 年~1975 年人口又从 30 亿增加到 40 亿，到 1987 年又从 40 亿增加到 50 亿，从 1987 年到 1999 年增长了 10 亿人也花了 12 年时间。据 2006 年 2 月 26 日报载，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项目中心推算，全球人口在该日上午 8 时 16 分达到了 65 亿。它还预测，2012 年全球人口将达 70 亿，2050 年人口达 90 亿^②。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粮食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地球的耕地只会减少不会增加，人口不能无限制地增长。但是面对目前这种人口增长难以遏制的势头，人类社会似乎还没有对应的良策。比如，目前中国的耕地为 1 亿多公顷，如果不包括 3.5 亿公顷的北方草场，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略高于 666.6 平方米(1 亩)。以 1 亩多的土地来提供一个人的全年粮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和联合国开发和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作研究认为，我国土地最多能够养活 17.36 亿人，为了保持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认为，必须首先保护耕地，使耕地面积不少于 1.2 亿公顷，而且要努力到 2050 年将人口控制在 16 亿之内。不久前，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调查，由于退耕还林、还草和还湖，我国的人均耕地已从 2004 年的 1.43 亩减少到 2005 年的 1.41 亩。全国耕地面积从 1996 年的 19.51 亿亩减少到 2004 年底的 18.37 亿亩，8 年里减少耕地 1.14 亿亩^③。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过大，以 50 年增加 3 亿人的速率，我们的对策何在?

① 张魁兴：《长江上游再建百座电站有隐忧》，《新民晚报》2006 年 5 月 15 日(原载北京青年报)。

② 据《新民晚报》2006 年 2 月 26 日报道。

③ 据《新民晚报》2005 年 3 月 30 日报道。

四、讨论与小结

考古探索不只是增进我们对自身历史的了解，而且对我们应对未来的挑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考古学家莫里森(K. D. Morrison)指出，考古学实际上就是研究“生”和“死”，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讨论为什么有的社会很容易崩溃，而有的社会则能延续很长的时间。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的祖先也经常面临资源短缺、环境退化、人口压力、政治不稳和社会动荡的问题，一个社会是否能够成功应对这些问题向来凶吉难卜。虽然复杂社会的崩溃总是和环境恶化关联，但是社会的文化实践同样至关重要。一方面，不管自然环境自身的波动还是人为的破坏常常会触发和加剧社会的衰败和瓦解。另一方面，社会因素诸如人口压力、统治者应变的处置方式、社会等级之间的沟通强度、经济基础投入的力度，以及在社会价值观与灵活性之间进行平衡的能力，往往也决定了社会处置危机的成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古代许多条件十分优越的社会都崩溃了，而许多比现代社会更脆弱的社会却能够成功延续。莫里森认为，考古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所提供的有关人类行为及其结果的材料有望为我们今天的决策服务，向公众宣传人地关系之间的危险性和脆弱性。考古学能够为今天决策者提供的一个警示，就是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几乎总是社会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了解生态环境的拐点在何处，如果越过这个拐点，社会衰落就不可逆转。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上，社会的成败可能已经处于局部地区所能控制的文化行为之外，于是以史为鉴尤为重要^①。

面对类似玛雅、复活节岛和良渚文明崩溃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需要反躬自问，我们究竟比这些先民有多大能耐和高明之处。今天的地球无非是一个放大的玛雅低地和复活节岛，如果玛雅、复活节岛和良渚文明崩溃是由于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和社会本身处置不当的原因，那么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而人类对危机认识和处置的社会文化行为仍然至关重要。如果史前社会文化发展的压力来自环境和资源的话，那么制约今天工业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样存在，无非是这种压力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古代的土地、粮食、水源等生存资源变成了当代的能源。据估计，未来25年中全球的用电量将翻一番，但是相应的却是能源储量的急剧减少。

^① Morrison, K. D., Failure and how to avoid it. *Nature*, 2006, 440 (7085): 752—754.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维持着当今工业社会高速发展的资源大多是不可再生的，特别是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化石能源。我们可以想象，一旦地球上的化石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消耗殆尽，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虽然有人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能使我们克服化石能源耗竭的问题，我们已经能够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核能和海水转换的氢氧能源，但是利用这些代价高昂的能源究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日常生活带来何种影响还难以预料。比如，核能利用就存在意外事故、废料处理、兴建成本高和可以被用来制造核武器等问题。因此，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人类不能为所欲为，工业文明也不能无节制地持续发展。相对于世界古代文明延续的漫长历史而言，现代工业文明虽然只有短短 200 年时间，但是我们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耗尽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尽管世界上无数有识之士对这个趋势深表忧虑，各国政要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然而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就像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面对巨大的惯性，任何个人可能都已无法轻易将其减速、停下或改变方向。尽管存在种种顾虑，但是再有远见的领袖一旦面对眼前各种棘手难题时，功利性的权宜之计难免成为压倒一切的抉择。虽然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和局部利益冲突，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将地球上的大部分国家捆绑到了一起，人类社会成为一个超聚合的世界系统，不由自主地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变得生死与共。

当代工业文明这列具有巨大惯性的列车带有许多无法停止的动能，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热带雨林的消失、渔业衰退、物种大规模绝灭、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专家们只知道如何使这辆列车加速，却不关心它驶向何处。最近伦敦皇家学会主席马丁·里斯(Martin Rees)发出警告，人类也许仅有一半的机会能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人类拥有难以想象的发展能力，但是如果无法解决许多关键问题，我们有可能面临倒退几百年甚至导致毁灭的命运，因此，21 世纪是十分关键的“危境时刻”(crunch time)。像中国这种处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能够迅速致富，但是经济发展需要庞大的能源消费，特别是石油能源。现在地球还未耗竭石油能源，但是已经耗竭了地球能够吸收能源污染物的空间能力。地球生物圈对工业污染的自我清洁能力虽然还没有达到极限，但是以目前污染物排放数量和速率计算，地球生物圈很快就会达到其无法承受和再生的一点。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消费方式和现代文明的价

价值观，到底是追求“越多越好”(more is better)还是“知足最好”(enough is best)。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过去50年的进步超过了过去的500年，而过去500年的进步超过了过去的5000年。21世纪的文明将会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出现很大的变化，地球在科学技术特别是电脑的帮助下正在变成一个智慧的星球。这种文明的发展趋势将表现为一种与5000年前文明开始以来十分不同的发展轨迹。机遇将和挑战共存，如果人类能够克服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那么文明的进步意义将会比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更深远。但是，如果人类一味盲目追求发展，没有能够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①。

为此，了解古代文明的崩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镜子，只有深刻和清醒地了解人类的过去，才能使我们明智地对待自己的未来。为此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人类不能为所欲为。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应该大力提倡改变消费习惯，珍惜和保护环境，以可持续的理念来控制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努力缓和正在加剧的环境和生存危机。

(原刊《复旦学报》2007年第6期)

^① Martin, J., Future perfect? the measur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 vital blueprint for ensuring our future. *Nature*, 2006, 442(7102): 511—5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國際視野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国际性的课题，是世界各国政府所共同面对的重大责任，在全球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潮流中，如何科学与合理地保护各国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公民必须重视和协调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国家从工业化开始，就逐渐涉及各种文物的保护问题，由于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文物多寡的不同，各国的政府逐渐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对策，健全立法以应付遭遇的各种问题，并试图解决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这一对往往是难以调和的矛盾。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大家意识到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是在文化遗产管理和文物资源保护中都会面临颇为相似的问题，而采取相应的科学对策便成为各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文物大国，但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起步较晚，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法制观念的薄弱、立法的滞后、文物法规在量刑和威慑力上的不足，在文物保护上显得处处力不从心。加上随着我国经济起飞，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城市改造，现代化建设和妥善保护文化遗产便成为一对突出的矛盾。2000年7月，媒体披露的古城定海一些古建筑在旧城改造的浪潮中惨遭大规模破坏的消息，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因此我们觉得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成功的经验，吸取教训，有助于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的完善。为此，本文试图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来探讨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希望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对照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一、保护与发展

经济发展与古迹保护，常常是一对矛盾。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开发、

乡村改革、铺设公路，都会带来地貌的改变，造成地上和地下文化遗产的破坏。受制于资金、人力等客观因素，政府不可能保护所有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只能选择一部分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严禁对它们的改动和破坏。美国“国家登记”清单上的文化遗产、日本的指定保护遗址和我国历次公布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就是受到政府绝对保护的文化遗产。它们只占文化遗产总数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文化遗产，是受到政府的相对保护，即当它们与发展建设形成冲突时，一般会对其进行清理和登记、留下一些信息后再行拆除。在基建中常见的考古遗址抢救性发掘，就是一种相对保护措施。

在实践中，抢救性发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基建施工中发现的考古遗址遗迹进行抢救清理，这种做法比较被动。首先，在施工中发现遗迹时已经破坏在先。比如，在意外发现古墓时，墓道或墓室往往已被推土机推倒或铲掉，其中的文物也会被扰动甚至损坏，因此文物和信息已无法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其次，进行抢救性发掘会影响施工进度，造成经济损失，从而激化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有些意外发现经鉴定具有重大意义，以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而言应当彻底停止基建工程，或是拆毁某些已经完成的建设，以便全面揭露遗址并加以保护。可是建设方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动工，肯定视其为一种干扰或额外负担。建设方通常会采取不配合甚至是抵制的态度，其中包括不愿承担发掘经费、拒不停工、甚至不向文物部门通报考古发现。可见，这种发掘虽然能抢救部分文物材料，但完全是亡羊补牢，损失已无法弥补。另一种积极的抢救性措施是防患于未然，将调查和发掘作为施工计划的一部分来加以执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相形之下，它比前者较为主动。

从应急的抢救性发掘转向文化资源的有序管理，是世界各国文物保护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保护与发展问题的一种有效措施。

临时应急的抢救性发掘其实古已有之。早在 19 世纪末的欧洲，人们在筑路或采矿时发现古迹，也会加以清理^①。虽然发掘技术手段不断更新，但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所谓的抢救性发掘仍是赶在推土机前为抢救文物而清

^① Cleere, H., World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Cleere, H. (ed.), *Approaches to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5-131.

理残局，这几乎是世界上的通病。发展商也会想出种种办法来避开抢救发掘，以英国为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有很多发展商擅自破坏文化古迹，他们宁可事后交付罚金，以避免按法定程序通知有关部门进行抢救发掘所带来的麻烦^①。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许多国家纷纷立法以加大文物保护的主动性，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列为基建项目审批的重要部分，将防患于未然的调查、试探与发掘抢在基建工程实施之前进行。如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规定，在国家登记的遗址内进行建设，需提前两个月通知文化事务部门。由文化事务部门调查后，决定对遗址提前发掘还是追加其为指定保护对象。事先发掘还能保证发掘经费，日本大部分的发掘经费由发展商承担，发展商中有私人企业，也包括政府的有关部门，如建设和交通部门。有些小公司承担不起发掘经费，所以法律没有强制发展商承担发掘费用。遇到这种情况时，由政府决定是否替发展商承担有关费用。但法律规定发展商必须支付保管和登记文物所需的费用，并负责发掘报告的出版^②。

美国也立法确立了一套“顺从程序”^③，规定涉及文化资源管理的有关政府部门，必须服从文物保护法规的相关要求。国家公园管理局、土地管理局、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等大量涉及基建的部门，都聘有专职的考古学家管理有关文物保护事宜。在加拿大，发展商或企业要买地基建，到政府部门注册登记时会被要求与考古机构联系，并签订合同，由这些机构对将征用的土地调查勘探，发现遗迹时先小规模试掘，如果该遗迹十分重要的，由文物部门鉴定后决定是否将其上报给国家注册清单，实行绝对保护，或者对它进行全面发掘。当考古机构完成这些工作后，基建工程才能开始动土^④。

① Cleere, H., Great Britain. In Cleere, H. (ed.), *Approaches to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4—62.

② Tanaka, M., Japan. In Cleere, H. (ed.), *Approaches to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82—88.

③ Fowler, D. D., Cul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Schiffer, M. B. (ed.),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5: 1—50.

④ 陈淳：《为未来保存过去——美国、加拿大的文化资源管理与合同考古学》，《东南文化》1994 年第 5 期。

面对这种国际趋势，我国的抢救性发掘似乎显得相对滞后，除了像三峡工程这样的大项目以外，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文物部门还是对施工中发现的文物进行抢救，而缺乏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文物工作者也曾呼吁过，将文化资源保护列为建设工程优先考虑的程序进行立法，让文物管理部门参与建设工程的审批与监督。但是，我国尚无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正是由于缺乏法律条文，文物部门被排除在建设项目的审批管理程序之外，导致了文物部门无法对施工中的文物安全加以监控。于是这样的现象就屡见不鲜：当施工中发现遗迹和文物时，施工单位却拒绝停工，甚至干扰文物部门实施清理；而民工和围观群众哄抢施工现场中发现的文物之类的事件也屡见报端。甚至还出现了在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部门连续下达文件进行干预，责令舟山市政府在定海旧城区改造中要重视保护古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然能钻法律不严的空子，强行拆毁文物部门明文列入保护范围的古建筑这样的恶性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被动性抢救发掘的弊端已开始被正视，某些地区已采取了相应措施。如成都市从1993年起规定，在地下文物分布密集区域进行建设，要先进行文物勘探才能申请办理规划许可证，勘探费由市规划局向建设单位统一收取。如果这种措施能加以完善而成为全国性的法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也有望被纳入一个新的轨道。

抢救性发掘毕竟是一种相对保护。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对环境恶化和文化资源急剧减少而且不可再生的严峻现实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考虑到现有技术手段的时代局限，我们应当重视为未来的研究而保存有限的文化资源，在经费、技术和人力不足的情况下避免轻率的动土发掘，留待以后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研究方法时再利用它们，以便充分保护文化资源的价值。北美考古界的“保存理念”正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国家越来越强调绝对保护的必要性，对发掘的态度可谓慎之又慎。丹麦国家煤气局在铺设输送管道的建设项目中，牵涉到大量古迹，政府为此制定了保护的措施，其态度慎重和严谨不仅足以成为本国大型工程中文化遗产保护的表率，在世界范围内也可谓首屈一指^①。

^① Kristiansen, K., Denmark. In Cleere, H. (ed.), *Approaches to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1-36.

该管道的铺设从北海起遍布丹麦境内，长达 2 000 千米。在实施保护时采取了五个步骤：第一，在计划阶段和国家煤气公司紧密合作，使用计算机绘制显示煤气管道沿线 7 000 米宽的地带内所有遗迹的地图，煤气公司改变路线以避免这些遗迹。第二，当管道线在实地标出轨迹后，再核实遗址并精确加以定位，公司再次调整管道线路以避免可见的遗址，因此整个 2 000 千米的距离内的煤气管道将不会触及任何可见的遗址。第三，对沿线 30 米宽的范围进行考古调查，注意是否有人类的居住遗迹，一旦发现古迹即调整管道路线。第四，进行小型试掘以决定是否要进行正式发掘。第五，对保存较好的遗址进行全面发掘。

就学术意义而言，这项工程横穿丹麦主要的几种地形，涉及了各种类型考古学居址的实例研究。它还有助于发展勘探和发掘技术，包括采样和航空摄影。在这些技术的帮助下，80 年代的田野勘探有了很大的进步，比以前可节省 50% 的经费，并且效果更佳，由此节省的经费可增加最终发掘的投入。

在我国，保护和发展的妥善协调也有可圈可点的实例。1995 和 1997 年，在广州老城区中心的两处建筑工地发现了西汉时期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广州市政府决定遗址就地保护，原计划建筑的大楼易地兴建，偿还了 2 亿多元的损失，并冻结了周边 4.8 万平方米内的建设和人口，公布了在遗址区内分期发掘的方案，计划将遗址建设成为南越王宫大型遗址博物馆。

丹麦和广州的这种保护模式要求大量的额外投入。在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中，能如此完美加以协调解决例子几乎是凤毛麟角。由于为保护文化遗产绕道所需的额外支出总是远远超过发掘经费，因此发展商们很少能像丹麦国家煤气局和广州市政府那样，为文化遗产保护让路。这种现象不仅在我国存在，在一些发达国家里也仍然是不易解决的一大困扰。由此可见，虽然抢救性发掘的进步使得文化遗产保护与 20 世纪初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保护与发展这对矛盾仍然是文化遗产管理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国际名胜古迹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决议（1990 年 10 月）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发展与保护问题的小结：“经济发展项目是考古遗存遭受巨大威胁的首要因素。因此，必须在经济项目实施之前，考虑研究考古遗存的保护问题。务必制定这样一种法律，使经费预算保障考古研究。法律体现的原则是，完善经济发展规划，最小限度

地影响考古遗存。”^①

二、保护与研究

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还是为了利用，考古遗产是过去人类文化生活的见证，因此我们对考古遗产的利用，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它们的科学研究来实施的。保护和研究相互依存：不保护就无从研究，不研究也失去了保护的意義。

然而在各国的实践中，研究与保护如何完满予以结合，仍是有待于探讨的问题。其中抢救性发掘与科研的矛盾是各国探讨的热点之一，这里先介绍日本的现状以进行说明。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以来每年考古发掘的遗址激增。单是在1996年，整个日本列岛就有大约11 000个遗址进行发掘。这些抢救计划都是由管理部门的考古学家在公共和私人建设工程启动之前进行的^②。抢救性发掘是日本考古遗产管理(Archaeological Heritage Management 或 AHM)的重心，全日本有6 000多位考古学家在为此工作，占全国考古学家人数的90%，日本抢救性发掘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大量发掘也造成了材料的激增。许多遗址发掘后只来得及发表简报，正式考古报告却要滞后几年，甚至始终没有出版。考古学家们被大量的抢救性发掘所累，没有时间进行综合性研究。有人甚至担心，在这种状态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日本考古学家只满足于进行“为保存数据而发掘”。如果考古学家不是带着问题面对遗址，不是努力从调查发掘中取得科研上的进展的话，这种发掘实在和挖宝无异，即便按照严格的操作规程进行发掘，所获得的材料也很难得说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更遑论增进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了^③。

我国的考古活动也有不少与此相似之处，随着全国大量基建工程的展开，

① 国际古迹名胜联合会：《保护和利用考古遗存的宪章》(王素清译)，《文物工作》1994年第4期。

② Habu, J. and Fawcett, C., Jomon archaeolog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origins. *Antiquity*, 1999, 73: 587—93.

③ Okamura, K., Conflict between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the challenges for rescue archaeologists. In McManamon, F. P. and Hatton, A. (eds.),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erspectives on Manag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55—65.

抢救性发掘花去了地方考古专业人员的大部分精力。有些文物大省恰逢几处大型建设项目，如筑路、铺设管道等，这些工程往往就是从遗址和古墓区上穿过，文物考古部门即使全力以赴，仍然承担着难以承受的工作量，于是只能靠组织大量民工，才能仓促完成发掘任务。面对这种局面，虽然材料和数据在激增，但这种材料和数据的积累一般难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提高。因为，对考古材料进行解读的关键信息往往不在于文物本身，而是有赖于对文物埋藏背景的细微观察和详细分析。

除了研究跟不上发掘外，发掘本身的成果也令人担心。为了保证发掘的科学性，各国都制定了控制发掘质量的标准，但是形式上的规定未必能带来高质量的报告和成果。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某些标准限制了考古学家思维和才能的施展，使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报告以应付规定的要求，而无法考虑自己主持的发掘是否有益于学术的精进^①。我国的三峡工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时间仓促、人员不足和经费有限，三峡库区的抢救发掘工作只能采取以挖掘探方面积、砍树和赔田数量为工作进度的管理方式。而发掘单位为了赶进度，也难免为抢救而抢救来做表面文章，以应付上面布置的任务。

不可否认，在人力和资源无法加大投入的情况下，抢救性发掘与研究之间的矛盾不会彻底消失，进行研究设计也许是将研究与抢救性发掘妥善结合的有效途径。所谓研究设计应当包括对某个地区已知文化遗产的分布、年代，以及与这个区域有关的文化发展历史做通盘的了解和研究，提出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确定研究重点。对史前以及历史文化遗产而言，研究重点涉及年代学，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经济形态，古人口统计，生产技术系统，居址形态，等等问题。针对一些重大的文化历史问题，在现有研究和资料的基础上，针对有关问题提出进一步的假设，并为验证这些假设制定详细的发掘和采样程序，并设计可行的分析技术和方法来解决这些重大历史问题。

以三峡为例，目前虽然已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抢救性发掘，但各发掘单位基本上自行其是，没有集中或综合的研究目标。如果从解决文化历史问题的角度来看待三峡工程，应采取各方协作攻关的策略，针对需要解决的

^① 陈淳、高蒙河：《三峡考古发掘的实践和思考》，《中国文物报》2000年1月12日。

重大問題，如三峽地區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人口的变化、經濟形態、生產方式，以及地理交通和區域文化交流等課題，制定有的放矢的專題攻關。這樣的搶救發掘和研究成果，顯然要比純粹挖土方來得更有意義，在田野工作和經費的合理安排上也可以避免以探方面積和賠田為依據的簡單管理方式，把有限的資金用到了刀刃上，使三峽工程的資金投入得到更有價值的學術回報。

1973年，美陸軍工兵部隊要在卡契盆地內執行修築運河的計劃，向兩位考古學家諮詢並簽訂合同，就運河工程對該地區文化資源可能造成的威脅進行評估和調查。這一計劃被稱為卡契計劃（the Cache Project）。這兩位考古學家為該計劃涉及的文化資源進行評估時做了以下工作：（1）了解考古遺址的時空分布狀況，主要弄清人類在各歷史時期的栖居活動特點；（2）了解遺址的性質，特別是人類的生存方式和經濟形態；（3）了解石料的分布和利用，由於盆地內不產石料，研究這一問題可獲得史前人類生產技術、經濟貿易交流，以及社會結構方面的信息；（4）對過去考古工作中提出的一些假設或結論做進一步的檢驗和論證^①。

目前我國的搶救性發掘工作都缺乏事先制訂詳細的課題設計與研究計劃，以便在發掘中有意識去收集某些材料和觀察數據，而不是僅僅按常規收集受到威脅的文物和記錄國家規定需留檔的內容。如果能做到帶著科學的問題去進行搶救性發掘，應當可以獲得更多、更有意義的文化歷史信息，從而改變目前發掘報告僅僅在羅列地層和器物之後，初步斷定其年代，以空泛的“對研究本地區文化歷史具有重大意義”的結論作為交代的現狀。

三、調查與評估

從理論上說，過去所有的人類生存生活的遺物和遺迹都是文化遺產，都值得珍惜。但在事實上，如前文所述，具體的保護和利用都是有選擇的。而這種選擇依據就是通過對文化遺產的調查和評估來決定的。

調查的目的是建立文化遺產的目錄清單，了解它們的位置、重要性與存量。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完善的調查和詳細的登記，沒有文化遺產的一本細賬，

^① Schiffer, M. B. and House, J. H.,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ache Project. *Current Anthropology*, 1977, 18(1): 43—68.

在面对经济建设威胁文化资源时，遴选需要加以保护的對象时就会缺乏科学的根据。此外，对文化遗产缺乏通盘的了解，必然会导致保护上的疏漏。

遗憾的是，世界上真正做到全国性文化遗产调查登记的国家寥寥可数。丹麦在这一方面起步很早，19世纪60年代时已完成了第一次普查。1983年，丹麦的文化遗产调查工作交予地方政府，全部进行了复查，更新了记录，并将数据输入电脑。文化遗产登记清单可以在国家博物馆查询，数据库与地图不仅供博物馆等文物部门使用，也是各地管理部门的必备资料，以便在进行市政规划时作为参照的依据，尽量避免抢救性发掘，或者事先提请考古部门调查发掘。

在英国，系统的普查也做得较好，建立有详细的文化遗产清单，且持续地予以更新和扩充。在电脑技术应用之前，英国就以精确的地图测绘而闻名。与其相比，法国等国家建立的文化遗产分布图只说明了大概情况，而没有注明确切位置，显得较为粗糙。在亚洲，日本的文化遗产登记值得一提。登记程序在1960和1962年间应政府要求由县教育部首先进行。那时建立了包括138 000个遗址的登记清单。由此，在日本就形成了由各县教育部而非国家有关部门主理遗址登记的传统。目前登记在册的有300 000多处遗址。早在1965年和1968年间，全国登记遗址的分布图已经出版。日本的遗址登记主要是为了标明遗址位置，给城市规划做参考。

我国在1949年之后就开展文物调查工作，80年代时开始进行较为正规的全国范围的普查，各省的文物遗迹地图也陆续出版。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建立登记清单时应当更多采用新手段，特别是电脑、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并将文化遗产的详细分布图提供给地方主管部门和基建部门参考。总之，我国文化遗产登记清单的建立和利用都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系统化。

除了建立了文化遗产登记清单、了解它们的存量和分布外，在对文化遗产的存弃进行抉择时还牵涉到对它们重要性的评估。我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本是专家意见综合而成，但没有成文的评判标准，操作仍是经验性的。而在与基建项目发生冲突时，面对发展部门强调经济建设重要性的立场，文物部门往往拿不出法定的标准来据理力争。这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尚未

解决的问题，英国曾以法律形式表述了国家级重要文化遗产的评定标准^①，各国学者对此也有所探讨。但由于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普遍适用的评定标准一般很难制定。

在考虑文化遗产的留存或发掘后放弃时，一般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评估影响文化遗产的基建项目是否十分重要，它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否足以抵消影响文化遗产所带来的损失。如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和我国的三峡工程，都是这种考虑下的结果。其次，受到破坏威胁的遗址遗迹在当地的历史意义，有代表性的或是十分稀有的文化遗产会受到重点保护。最后，它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如果某个遗迹自身并不特别重要，但它是一个人文景观的有机组成，如果破坏或移动，则整个景观都受到影响。权衡利弊时，要将整个景观的重要性和建设性功利进行综合考虑。

应当强调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在北美，原来只重视保存完好的大型遗址，在聚落考古学兴起后，一些小型的短期栖居遗址也受到关注。英国常有散布地表的石块遗迹，本来文化遗产保护不把它们包括在内，近年来人们认识到，这是中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期间流动性很大的人群留下的生活遗迹，于是开始重视制订对这类遗迹的保护计划。我国考古研究的进展也会带来不少对文物和遗迹价值的新认识，因此，如何确立文化遗产重要性评估的标准还需加强和不断修正。

四、公众教育

公众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为各国文物部门所重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所用的经费是纳税人的贡献，应对纳税人有所回报；另一方面，公众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能起到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让大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之一是现场参观。许多文化古迹都已向

^① Schofield, A. J., Now we know: the role of research in archaeological conservation practices in England. In McManamon, F. F. and Hatton, A. (eds.),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erspectives on Manag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76—92.

公众开放，但就教育大众的角度而言，仅仅开放是不够的。有人批评英国的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文化遗迹保护花费巨大，但公众受益甚少，公众参观时只能从单调的指示牌中获得信息，管理部门提供的导游性的小册子，也因学术性太强，令普通观众难以理解而失去兴趣。相比之下，美国的文化遗产阐释工作比较成功，强调针对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观众，在文化遗产处采用各种手段，强化视觉效果，寓教于乐。

为了供大众参观，有些遗迹进行了复原性的重建，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迄今褒贬不一。我国的一些遗址博物馆，如半坡遗址博物馆、河姆渡博物馆中也都有这种重建的复原展示。对参观者而言，遗址的复原景观能以最直观的方式重现先民的住居和生活环境，当然比晦涩难懂的说明与图表更受欢迎，因此在遗址博物馆特别是史前遗址博物馆中，复原性重建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展示方法。但是，有些重建就在遗址上进行，甚至为了效果，毁掉原来的遗址，造起新的仿制品。这种重建与造假古董无异，不但破坏了遗址和文物，有时新造的场景过于粗糙呆板，也会令普通参观者失望，失去了本来阐释遗址、使展示生动化的意义。比较妥当的复原重建不应在原有遗址上进行，应当在遗址范围外建造。

除了对公众日常开放的遗址外，还有一种现场参观，是在考古发掘进程中向公众开放。日本有这种现场参观的优良传统。早在1953年，考古学家在冈山发掘时，就组织了一万多人次参观发掘现场，由考古学家向大家介绍考古发掘的基本要领和该遗址的历史文化意义。参观发掘现场被称为“遗址解释会”，这种与公众的沟通，在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1992~1994年，考古学家发掘了青森地区绳纹时代的三内丸山遗址。这项工作电视和报刊上被广泛报道，有几千名公众参观了发掘现场。考古学家鼓励人们前来参观，并志愿向公众做主动的介绍和解释。考古学家虽然并不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左右政府对该遗址做是否加以保护的决策，但是他们希望公众认可该遗址的重要性。于是，尽管考古学家并没有组织公众来发起遗址保护运动，他们仅仅向民众宣传这个遗址的意义，但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马上自发组织起来向新闻界写请愿信并向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游说以资助遗址的保护。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两个星期之后，当地政府宣布将对遗址进行保护。作为响应，考古学家组织了两天的公众会议，解释这个

项目的意义，参加的观众达八千余人。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每一处考古现场都会引来当地人民好奇的眼光，这是让大众了解考古，增进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契机，如何利用考古发掘现场的教育作用，也值得我国的文物考古部门妥善考虑和利用。

缩短公众与文化遗产距离的另一个途径是书籍、报刊、影视等媒体。国际上普遍的问题是，对这种途径的利用还不够充分，有关文化遗产的出版物和影视作品都相当有限。而且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通常是在有考古重大发现时才加以报道，并且报道时着重于渲染考古发现的历史艺术价值、神秘性和传奇性，把考古学家的科研工作简化为挖宝。这类宣传无益于公众认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反而会引起误导。

在媒体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结合中，也有不多的几个成功实例。英国考古学家约翰斯图策划的电视系列片《动物，植物，矿产》《年代》，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史前考古学的成就，在英国引起轰动，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尤为重要的是，它让公众了解了考古学是一门探知人类过去的科学，而文化遗产是过去文化的见证。

由此可见，考古学家在普及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丹麦国民可称是世界上最具有文化遗迹保护意识的公众了，丹麦有关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并不繁复，也没有定罪的细则，但文物犯罪极为罕见。据统计，几乎每一百个丹麦人中，就有一个订阅考古期刊。这种传统当然和该国上下酷爱文物和民族主义传统有关，但不可忽视的是，从19世纪现代考古学诞生初期，丹麦的考古学家就从未懈怠过向公众做考古知识的普及。从创立“三期论”的汤姆森起，历任国家博物馆馆长都以大家手笔撰写普及读物，这已成为丹麦考古学界的传统。统计数据表明，1966年到1976年间丹麦出版的考古书籍，有34%是普及性的。在这种持续而有力的推动下，丹麦国民人人深明保护文化遗产的大义，自然不足为奇。

我国近年来普及性的考古著作也开始增多，但离初具规模仍有相当距离。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普遍充斥了专业性极强的术语，学术争论围绕地层学与类型学展开，有时不同研究领域的考古学家之间交流尚有困难，离普通公众当然更加遥远。所以加强与公众的联系，不但要求文物工作者有为大众服务的意识，也是对考古学家学术水平的挑战：未经深入，也无法浅出。把堆积

如山的考古材料还原成公众能理解的话语和其他学科可以利用的知识，应当成为考古工作一项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除了普及教育外，文化遗产管理者们也越来越多意识到将其纳入正轨教育的重要性。以我国为例，考古发现不计其数，对中国史前史增进了不少新的认识，对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也多有补充和修正。但在中小学课本中，这些研究成果很少得到反映。今日的学童正是明天的大众，在学校教育中利用文化遗产资料，不失为事半功倍的普及方法。

尽管各国在文化遗产的管理中，都有立法与行政措施，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遗产保护最有力的遵循者和监督者正是公众，有时他们发挥的作用尤胜于政府的法令。1962年，日本为建造铁路打算拆迁奈良的平城宫遗址，知识界人士和普通公民一致发起抗议，声势浩大，迫使政府勒令铁路公司绕道而行。印度有些工厂污染严重，对附近的古迹造成损伤，也是普通公众示威上告^①。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大可加强文化遗产所在地人民的保护意识。比如，秘鲁的斯潘(Sipan)地区有大批古墓，附近农民常在耕作之余挖墓，出售其中的文物牟利。当地一座博物馆的考古学家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他们教育当地农民，使他们认识到古墓中是他们的先人，完整地保存墓葬，留待考古发掘有助于了解这些先人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这些秘鲁农人成了文化遗产的自觉守护者，他们把古墓作为本地文化的象征，不再将其作为经济来源^②。在我国定海古城保护区保护的抗争中，也是普通百姓状告当地政府，体现了公众在文物保护中的觉悟。人民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感情需要教育与激发。教育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无法即刻生效，但是它影响深远，高素质的公民是文化遗产保护最根本的基石。

五、小 结

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各国的坎坷是相似的：保护与发展是文明与

① Thaper, B. K., India. In Cleere, H. (ed.), *Approaches to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63—72.

② McManamon, F. P. and Hatton, A., Introduction: considering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modern society. In McManamon, F. P. and Hatton, A. (eds.),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erspectives on Manag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1—19.

功利的較量；管理與研究總有貌合神離的尷尬；調查與評估得不到足夠的經費和技術支持；而公眾教育缺乏吸引力，無法在這個信息爆炸時代和功利社會中引起人們的充分關注。

行至今日，困難與矛盾漸漸集中在上述幾個議題上。將文化遺產保護的課題置於世界的視野之中，我們就會發現我國的困擾也是各國普遍的困擾，他國的發展經驗能夠作為我們的鏡鑒。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以全球的視野，從文化遺產保護的發展趨勢中，發現自己哪里走在前列，而哪里尚有欠缺。

我國的文明自上古至今未曾中斷，擁有大量地上地下的文化遺產，我們有責任善加保管。我國文化遺產是舉世矚目的瑰寶，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中，我國文物保護工作也有待做出世人矚目的貢獻，既可告慰於先祖，也當無愧於子孫。

從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視野來看，我國需要在兩個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一是迫切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定海古城街區遭到破壞的案例不僅使文物界大為震驚，而且使我國法律界人士受到了震動。一些法學專家認為，目前沒有針對此類事件的法律使違法者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文化管理部門由於缺乏法律的武器，即使有理也無法對這種非法行為採取有效的遏止措施^①。只有職責分明、有法可依，才能徹底改變文物保護的被动局面。

二是要加大對公眾的教育力度，提高百姓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如果百姓的覺悟得到了提高，文化遺產的保護就能事半功倍。公眾自覺的參與不僅使文化遺產的保護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而且可以對各種違法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有了政府完善的法律保護和公眾的全力支持，我們這個東方文明古國也能像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以現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交相輝映來體現中華民族的风範。

（原刊《復旦學報》2003年第4期）

^① 田遠新：《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刻不容緩》，《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23日。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一)中文著作

- [1]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 连树声, 译. 重译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2]爱因斯坦. 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 1936年10月15日在纽约州立大学“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稿.
- [3]安德烈·比尔基埃. 家庭史——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 1卷上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4]安志敏: 《安阳小南海洞穴堆积的再发掘》(未刊稿).
- [5]柏拉图. 柏拉图理想国. 侯健, 译.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
- [6]半坡博物馆, 陕西考古研究所, 临潼县博物馆.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7]保罗·巴恩. 当代学术入门——考古学.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8]保罗·巴恩主编. 剑桥插图考古史.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 [9]贝弗里奇. 发现的种子.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0.
- [10]布鲁斯·特里格. 时间与传统. 陈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11]布鲁斯·特里格. 考古学思想史: 第2版. 陈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12]曹兆兰. 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3]陈淳. 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
- [14]陈淳. 考古学理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15]陈淳. 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16]陈杰. 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环境.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 [17]陈星灿, 邓聪主编. 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 香港: 中国考古艺术中心, 2004.
- [18]陈星灿.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19]陈致. 从礼仪化到世俗化. 吴仰湘, 黄梓勇, 许景昭,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20]戴向明. 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 [21]丹尼斯·米都斯. 增长的极限.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22]邓涛, 王原主编. 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1.
- [23]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 1960.
- [24]董作宾.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5.
- [25]杜金鹏, 许宏主编. 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26]段勇. 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7]段振美. 殷墟考古史.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 [28]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9]范文澜. 中国通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 [30]菲奥纳·鲍伊. 宗教人类学导论. 金泽, 何其敏,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1]费尔南·布罗代尔. 文明史纲. 肖昶, 等,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3.

[32]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33]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王绍祥，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34]弗雷泽·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35]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6]高柏园译著·古典理性的殿堂——亚里斯多德．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

[37]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38]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39]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40]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41]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42]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43]顾潮编·顾颉刚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4]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博物馆编·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4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6]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7]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4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4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50]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44.

- [51]胡厚宣. 殷墟发掘, 上海: 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 [52]胡厚宣主编. 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殷都学刊(增刊), 1985.
- [5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彭头山与八十垱.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54]黄剑华. 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
- [55]黄剑华. 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 [56]黄强, 色音. 萨满教图说.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 [57]黄淑娉, 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58]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暨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 75 周年国际古人类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 2004.
- [59]嘉兴市文化局编. 马家浜文化.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4.
- [60]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编. 江苏植物志: 下册.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 [61]江天骥.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62]金泽. 宗教人类学导论.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 [63]卡尔·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 徐式谷,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64]科林伍德. 科林伍德自传. 陈静,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65]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 考古学: 理论、方法与实践.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66]拉德克利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 [67]莱斯利·怀特. 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 沈原, 黄克克, 黄玲伊, 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 [68]李峰.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徐峰,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69]李济. 安阳. 苏秀菊, 聂玉海,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70]李济.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台北: 联京出版事业公司, 1977.

- [71]李济著,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72]李文儒主编.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73]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 [74]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 [75]李仰松.民族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 [7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77]良渚文化博物馆编.良渚文化论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 [78]良渚学文集:玉器一,2001.
- [7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近十年来文物考古新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80]林定夷.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 [81]林定夷.科学研究方法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82]林嘉琳,孙岩主编.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 [83]林嘉炜.PIXE 在古陶瓷产地和制造工艺中的研究.上海:复旦大学,2007.
- [84]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85]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经》断想.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 [86]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龄,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87]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88]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陈胜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89]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90]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张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91]吕振羽·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92]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93]栾丰实·东夷考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 [94]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95]罗森·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96]罗泰主编·奇异的凸目·成都:巴蜀书社,2003.
- [97]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主编·疑古思潮的回顾与前瞻·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
- [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9]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黄晴,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 [100]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宋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101]孟慧英·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102]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103]尼·戴维,卡·克拉莫·民族考古学实践·郭立新,等,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
- [104]尼古拉伊·瓦维洛夫·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琛,译·许运天,校·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 [105]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106]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107]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 [108]裴文中·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109]裴文中·中国古生物志:新丁种第9号·1939.

[110]蒲慕州. 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2.

[111]蒲慕州. 追寻一己之私——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12]钱耀鹏. 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113]芹沢長介先生追悼论文集刊行编. 芹沢長介先生追悼考古·民族·历史学论丛. 东京: 六一书房, 2008.

[114]秦麟征. 破损的世界——现代文明的阴影.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1996.

[115]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116]曲英杰. 古代城市.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117]让·皮亚杰. 人文科学认识论. 郑文彬,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118]容观复, 乔晓勤. 民族考古学初论.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119]容观复. 人类学方法论.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9.

[120]塞维斯. 文化进化论. 黄宝玮, 温世伟, 李业甫, 金雪鸣,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1.

[121]山西省考古所编, 王益人主编.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 1976~1980 年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122]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崧泽: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123]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马桥.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

[124]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福泉山.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125]斯大林. 列宁主义问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12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祭祀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127]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28]苏三. 三星堆文化大猜想.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29]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30]汪宁生. 民族考古学论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131]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132]王国维. 说殷//观堂集林: 卷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133]王宏刚, 于晓飞. 大漠神韵——神秘的北方萨满文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3.
- [134]王铭铭. 人类学是什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35]王震中. 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136]文森特·鲁吉罗. 超越感觉: 批判性思考指南. 顾肃, 董玉荣,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 [137]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 [138]吴汝康, 等. 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8.
- [139]吴汝康, 吴新智, 张森水主编. 中国远古人类.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9.
- [140]西江清高主编. 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
- [141]夏鼐. 考古学论文集.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142]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 [143]许宏.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 [144]杨伯达主编. 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1.
- [145]杨建华. 外国考古学史.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 [146]杨豫, 胡成. 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47]叶文宪. 重新解读中国.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 [148]伊恩·霍德, 司格特·哈特森. 阅读过去. 徐坚, 译.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 [149]余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 [150]岳洪彬. 殷墟青铜礼器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51]张大勇, 等. 理论生态学研究.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152]张光直. 古代中国考古学.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 [153]张光直. 考古人类学随笔.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54]张光直. 考古学专题六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 [155]张光直. 美术、神话与祭祀.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 [156]张光直. 青铜挥麈.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157]张光直. 商代文明.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99.
- [158]张光直.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59]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60]张广志. 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161]张巨青. 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方法导论.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 [162]张森水. 中国旧石器文化.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 [163]张之恒. 中国考古学通论.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164]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 [165]浙江省文物考古所. 萧山博物馆. 跨湖桥.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16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瑶山.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16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2.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 [16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 [169]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170]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171]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172]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173]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174]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2.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175]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6.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176]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 古人类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8.
- [177]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 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1.
- [17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 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 [17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 [1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三代考古: 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1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胶县三里河.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18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1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1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85]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 1991.
- [186]钟侃, 高星主编. 旧石器时代论集——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 [187]朱志荣. 商代审美意识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88]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二)中文期刊

《北京大学学报》

《北京农学院学报》

《地理科学》

《地理学报》

《第四纪地质》

《东方博物》

《东南文化》

《读书杂志》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观察与思考》

《光明日报》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国土资源遥感》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河南文博通讯》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华夏考古》

《考古》

《考古学报》

《考古与文物》

《科学通报》

《辽海文物学刊》

《南方民族考古》

《南方文物》

《南开史学》

《农业考古》

《农业考古》

《青海师范学院学报》

《人类学学报》

《人文杂志》

《社会科学报》

- 《社会科学战线》
《生态学报》
《史前研究》
《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
《史学月刊》
《世界历史》
《微体古生物学报》
《文史杂志》
《文史哲》
《文物》
《文物春秋》
《文物季刊》
《殷都学刊》
《浙江大学学报》
《浙江国土资源》
《郑州大学学报》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中国农史》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中国水稻科学》
《中国文化研究》
《中国文物报》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中原文物》
《株洲工学院学报》

二、英文文献

(一) 外文著作

- [1] Adams, R. McC. .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Chicago: Aldine, 1966.
- [2] Aikens, M. C. and Rhee, S. N. (eds.). *Pacific Northeast Asia in Prehistory: Hunter-Fisher-Gatherers, Farmers and Sociopolitical Elites*.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 Alizadeh, A. (ed.). *Excavations at the Prehistoric Mound of Chogha Bonut, Khuzestan, Iran: Seasons 1976/77, 1977/78, and 1996*.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 [4] Ammerman, A. J. and Biagi, P. (eds.). *The Widening Harvest: The neolithic Transition in Europe: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Bosto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2003.
- [5] Anderson, E. . *Plants, Man and Lif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6] Arnold, J. E. (ed.). *Emergent Complexity: the Evolution of Intermediate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Monographs in Prehistory*, Ann Arbor, 1996.
- [7] Bailey, G. (ed.). *Hunter-Gatherer Economy in Prehistor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8] Barham, A. J. and Macphail, R. I. (eds.). *Archaeological Sediments and Soils: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Management*. Lond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Conference, 1995.
- [9] Barnett, W. K. and Hoopes, J. W. (eds.). *The Emergence of Potter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Ancient Societies*.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5.
- [10] Bar-Yosef, O. and Gopher, A. (eds.). *An Early Neolithic Village in the Jordan Valley Part I: The Archaeology of Netiv Hagdud*.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997.
- [11] Bender, B. . *Farming in Prehistory: From Hunter-Gatherer to Food*

Produc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12]Bentley, R. A. , Maschnern, H. D.G. and Chippindale, C. (eds.).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8.

[13]Binford, L. R. .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2.

[14]Binford, L. R. . *Working at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15]Binford, S. R. and Binford, L. R.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16]Bordes, F. . *The Old Stone Age*.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8.

[17]Boserup, E. .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Chicago: Aldine, 1965.

[18]Boyer, P. . *Religion Explained :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Religious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 2001.

[19]Boyer, P. . *The Naturalness of Religious Ideas : A Cognitive Theory of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20]Braidwood, L. , Braidwood, R. , Howe, B. , Reed, C. and Watson, P. J. (eds.).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long the Zagros Flank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Volume, 1983.

[21]Brinkhuizen, D. C. and Clason, A. T. (eds.). *Fish and Archaeology; Studies in Osteometry, Taphonomy, Seasonality and Fishing Methods*.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S294, 1986.

[22]Brothwell, D. R. and Pollard, A. M. .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2001.

[23]Bunge, M. A. .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Butler, J. . *Gender Trouble :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5]Butzer, K. W. . *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 Method and Theory*

for a Contextu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6]Byers, D. S. (ed.). *The Prehistory of the Tehuacan Valle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7.

[27]Capper, R. T. J. and Bottema, S. (eds.). *The Dawn of Farming in the Near East*. Berlin: *ex oriente*, 2002.

[28]Cauvin, J.. *The Birth of the God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9]Cazeau, C. J. and Scott, S. D.. *Exploring the Unknown*.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0.

[30]Champion, S.. *Dictionary of Terms and Techniques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Everest House Publishers, 1980.

[31]Charnov, E. L.. *Optimal Foraging: Som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ton, 1973.

[32]Childe, V. G..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Watts and Co., 1936.

[33]Childe, V. G.. *Progress and Archaeology*. London: Watts and Co., 1944.

[34]Childe, V. G..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Schuman, 1951.

[35]Childe, V. G..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36]Childe, V. G..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43.

[37]Claassen C. (ed.). *Exploring Gender Through Archaeology*. Madison: Prehistoric Press, 1992.

[38]Clark, J. D.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500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9]Cleere, H. (ed.). *Approaches to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40]Cohen, M. N..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1]Collingwood, R. G. .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42]Cordy, R. H. . *A Study of Prehistoric Social Change :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the Hawaiian Island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43]Crabtree, P. J. and Campana, D. V. .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1.

[44]Craigie, B. J. . *Eugene Odum : Ecosystem Ecologist and Environmentalis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45]Culbert, T. P. (ed.). *The Classic Maya Collapse*.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versity Press, 1973.

[46]Davis, K. . *Huma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ian Publishers, 1949.

[47]Debenath, A. and Dibble, H. L. (eds.). *Handbook of Paleolithic Ty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4.

[48]Deborah, N. and Charlton, T. (eds.). *The Archaeology of City States :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7.

[49]Delcourt, P. A. and Delcourt, H. R. . *Prehistoric Native Americans and Ecological Change : Human Ecosystems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since the Pleistoce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0]Demarest, A. A. and Conrad G. W. (eds.). *Ideology and 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2.

[51]Dickson, D. B. . *The Dawn of Belief*.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52]Dietler, M. and Hayden, B. (eds.). *Feasts: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Food, Politics and Power*. Washington, D. C.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2001.

[53]Dincause, D. F. . *Environment Archae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4]Earle, T. K. (ed.). *On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 Essays in Honor of Harry Hoijer*. Malibu (CA): Undena, 1984.

[55]Fagan, B. M.. *In 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1.

[56]Feinman, G. M. and Marcus, J. (eds.). *Archaic States*.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8.

[57]Feinman, G. M. and Price, T. D. (eds.). *Archaeology at the Millennium: A Sourcebook*. New York: Kluwer/Plenum, 2001.

[58]Flannery, K. V. (ed.). *Quilá Naquitz: 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 Mexico*.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6.

[59]Ford, R. I. (ed.).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Ethnobota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60]Fried, M..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61]Fullagar, R. (ed.). *A Close Look: Archaeological Methods Series 6*.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1998.

[62]Gebauer A. B. and Price T. D. (eds.).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y*. Madison: Prehistory Press, 1992.

[63]Gero, J. , et al. (eds.). *The Socio-Politics of Archaeolog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Report.

[64]Gero, J. and Conkey, M. (eds.). *Engendering Archaeology: Women and Prehistory*. MA: Basil Blackwell Inc. , 1990.

[65]Grayson, D. K..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 Antiqu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66]Green, K..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Four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67]Gremillion, K. J. (ed.). *People, Plants and Landscapes: Studies in Paleoethnobotany*.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7.

- [68]Gross, D. R. (ed.).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Native South America*.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3.
- [69]Guldin, G. and Southall, A. (eds.). *Urban Anthropology in China*. Leiden: Brill, 1993.
- [70]Guthrie, R. D. . *The Nature of Paleolithic A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71]Habu, J. , Savelle, J. M. , Koyama, S. and Hongo, H. (eds.). *Hunter-Gatherers of the North Pacific Rim*. Mano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 [72]Habu, Junko. *Ancient Jomon of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73]Hall, M. and Silliman S. M. (eds.).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xford: Blackwell Inc. , 2006.
- [74]Hardesty, D. L. .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7.
- [75]Harlan, J. R. . *Crops and Man*. Madison: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Crop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1992.
- [76]Harris, M. .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 [77]Hastorf, C. A. and Popper, V. S. (eds.). *Current Paleoethnobotany: Analytical Methods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Plant Remai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78]Hayden, B. (ed.). *A Complex Culture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Plateau*. Vancouver: UBC Press, 1992.
- [79]Higgs, E. S. (ed.). *Papers in Economic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80]Hodder, I. (ed.).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 [81]Hodder, I. . *The Leopard ' s Tale: Revealing the Mysteries of Catalhöyük*.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2006.

[82]Hofman, J. and Enloe, J. (eds.). *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 : Application of Refitting Studies in Archaeolog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578, Oxford, 1992.

[83]Hole, F. , Flannery, K. V. and Neely, J. A. (eds.). *Prehistory and Human Ecology of the Deh Luran Plain*. Ann Arbor: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1969.

[84]Hoover, K. R. .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85]Jaspers, K. .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86]Johnson, M. .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87]Jones, G. D. and Kautz, R. R.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88]Keightley, D. N. (e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89]Keightley, D. N. . *The Ancestral Landscape : 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90]Knecht, H. (ed.). *Projectile Techn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91]Lambek, M. (ed.). *A Reader in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92]Lee, G. A. . *Changes in Subsistence Systems in Southern Korea from the Chulmun to Mumun Periods : Archaeobotanical Investigation*.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3.

[93]Leroi-Gourhan, A. . *Les religions de la préhistoi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94]Lewis, H. . *Patterns of Indian Burning in California : Ecology and Ethnohistory*. Ramona: Ballena Press, 1973.

- [95] Linduff, K. M. and Sun, Yan (eds.). *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4.
- [96] Liu, Li.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97]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 [98]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99] Loewe, M. and Shaughnessy, E. 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00] Lyman, R. L. , O'Brien, M. J. and Dunnell, R. C. .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Plenum, 1997.
- [101] Lyman, R. L. . *Vertebrate Taph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02] MacNeish, R. S. , Nelken-Turner, A. and García Cook, A. .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Ayacucho Archaeological Botanical Project*. Andover; Peabody Found, 1970.
- [103] Malina, J. and Vašíček, Z. . *Archaeology Yesterday and To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04] Marquardt, W. H. and Watson, P. J. (eds.). *Archaeology of the Middle Green River Regi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5.
- [105] McManamon, F. P. and Hatton, A. (eds.).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erspectives on Manag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 [106] Milikens, S. and Peresanim, M. (eds.). *Lithic Technology: from Raw Material Procurement to Tool Produ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homonymous workshop held in Forli September 1996, within the VI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 1998.

[107]Miller, D. and Tilley, C. (eds.). *Ideology, Power and Pre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8]Mithen, S. . *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 : A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Art , Religion and Scien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6.

[109]Moore, A. M. T. , Hillman, G. C. and Legge, A. L. . *Village on the Euphr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0]Moore, J. D.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Book, 2003.

[111]Nadel, D. (ed.). *Ohalo II : A 23 000-Year-Old Fisher-Hunter-Gatherers ' Camp on the Shore of the Sea of Galilee*. Reuben and Edith Hecht Museum, University of Haifa, 2002.

[112]Nelson, S. M. (ed.). *Handbook of Gender in Archaeology*. Washington, D. C.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113]Nelson, S. M. . *Gender in Archaeology: Analyzing Power and Prestige*. 2nd edition. Washington, D. C.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114]Odell, G. (ed.). *Stone Tools: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Human Prehistory*. New York: Plenum, 1996.

[115]Odling-Smee, F. J. , Laland, K. N. , Feldman, M. W. . *Niche Construction: The Neglected Process in Evolutio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6]Odum, E. P. . *Fundamentals of Ecology*.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1953.

[117]Olsen, S. (e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in Archaeology*. 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1988.

[118]Ortner, S. B. . *Making Gender—The Politics and Erotics of Culture*. Boston: Beason Press, 1996.

[119]Pearsall, D. and Piperno, D.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Phytolith Analysis: Applications in Archaeology and Paleoecology*. MASCA Research Papers in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Vol. 1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3.

[120]Pearsall, D. M. . *Paleoethnobotany: A Handbook of Procedure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00.

[121]Peterkin, G. , et al. (eds.). *Hunting and Animal Exploitation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and Mesolithic of Eurasia*.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No. 4. Washington D. C. , 1993.

[122]Piperno, D. and Pearsall, D. .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Lowland Neotropic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123]Plog, S. . *Stylistic Variation in Prehistoric Cer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24]Preucel, R. and Hodder, I. .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in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6.

[125]Price, T. D. and Brown, J. A. (eds.). *Prehistoric Hunter-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5.

[126]Price, T. D. and Gebauer, A. B. (eds.). *Last Hunters-First Farmer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ic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5.

[127]Ramos-Millan, A. (ed.). *Siliceous Rocks and Culture*.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Granada, Spain, 1997.

[128]Rawson, J. (ed.).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Early Dynasties*.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6.

[129]Raymond, J. S. , Loveseth, B. , Arnold, C. , and Reardon, G. (eds.). *Primitive Art and Technology*.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1976.

[130] Redman, C. L. .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78.

[131]Reiter, R. R. (ed.).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Woma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9.

[132]Renfrew, C. , Rowlands, M. J. and Segraves, B. A. (eds.). *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 [133]Renfrew, C. and Bahn, P. .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Ltd. , 1991.
- [134]Renfrew, C. and Bahn, P. .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Ltd. , 2012.
- [135]Rindos, D. .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84.
- [136] Roberts, C. A. and Manchester, K. . *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37]Rye, O. S. . *Pottery Technology: Principles and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 C. ; Taraxacum, 1981.
- [138]Sahlins, M. D. and Service, E. R.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M. I.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 [139]Sauer, C. . *Agricultural Origin and Dispersal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9.
- [140]Schick, K. D. and Toth, N. . *Making Silent Stones Speak*.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 [141]Schiffer, M. B. .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7.
- [142]Serpell, J. (ed.). *The Domestic Dog; Its Evolution, Behavior an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43]Service, E. R. .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75.
- [144]Service, E. R.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145]Shen, Chen and Keates, S. G. (eds.).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Pleistocene Archaeology*.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179, Oxford; Archaeopress, 2003.
- [146]Shiffer, M. B. (ed.).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
- [147]Smith, B. D. .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Scien-

tific American Library, 1995.

[148]Smith, M. (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ities*.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Book, 2003.

[149]Sol Tax (ed.). *Anthropology Toda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50]Stein, J. K. (ed.). *Deciphering a Shell Midden*.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2.

[151]Steward, J. H. . *Theory of Cultural Change ;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152]Still, D. L.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ers, 1968.

[153]Swanson E. H. (ed.). *Lithic Technology*.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 1975.

[154]Tainter, J. A. .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5]Taylor, W. W. . *A Study of Archaeolog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83.

[156]Thomas, D. H. . *Archaeology*. Third edition.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Inc. , 1998.

[157]Thomas, W. L.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158]Torrence, R. (ed.). *Time, Energy and Stone To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59]Torrence, R. and Barton, H. (eds.). *Ancient Starch Research*.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06.

[160]Trammel, W. C. . *Religion, What Is I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4.

[161]Treistman, J. M. . *The Prehistory of China ; An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New York;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2.

[162]Trigger, B. G. .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3]Trigger, B. G.. *Archeology as Historical Science*. Monograph of the Department of Ancient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Archaeology: No. 14, 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Varanasi, 1985.

[164]Trigger, B. G.. *Artifacts and Idea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3.

[165]Trigger, B. G.. *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 of Prehist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166]Trigger, B. G.. *Gordon Childe: Revolution in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167]Trigger, B. 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168]Trigger, B. G.. *Time and Tra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8.

[169]Trigger, B.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0]Ucko, P. J. (ed.).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171]Ucko, P. J. and Dimbleby, G. W.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172]Vavilov, N. I.. *Origin and 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73]Wallace, A. F. C.. *Religio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174]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74.

[175]Watson, P. J. (ed.). *Archeology of the Mammoth Cave Are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76]Watson, P. J. , LeBlanc, S. A. and Redman, C. L..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An Explicitly Scientific Approa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177] Watson, P. J. and Cowan, C. W. (ed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

[178] Whittaker, J. C.. *Flintknapping: Making and Understanding Stone Tool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179] Willey, G. R. (e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inthrop Publishing Inc. , 1974.

[180] Willey, G. R. . *Prehistoric Settlement in the Virú Valley, Peru*. Washington, D. C. :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155, 1953.

[181] Willey, G. R. and Sabloff, J. A..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4.

[182] Winterhalder, B. and Kennett, D. J. (eds.). *Behavioral Ec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183] Winterhalder, B. and Smith, E. A. (eds.). *Hunter-Gatherer Foraging Strateg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184] Wu, Rukang and Olsen, J. W. (eds.). *Palaeoanthropology and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5.

[185] Yang, Xiaoneng (ed.).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6] Yasuda, Y. (ed.). *The Origins of Pottery and Agriculture*. New Delhi; Roli Books, 2002.

[187] Zeder, M. A. , Bradley, D. G. , Emshwiller, E. and Smith, B. D. (eds.). *Documenting Domestication: New Genetic and Archaeological Paradigm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188] Zimmerman, L. J.. *The Second Score: The Harrington Lectures, 1973~1992*. Vermillio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Press, 1992.

(二)外文期刊

- [1]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54~1984 .
- [2]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54~1991.
- [3] *American Antiquity*, 1967~2002.
- [4] *American Ethnology*, 1982.
- [5]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98.
- [6] *Anatolian Studies*, 1971.
- [7] *Ancient Mesoamerica*, 1990.
- [8]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3~2007.
- [9]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1, 1972, 1984.
- [10] *Antiquity*, 1973~2009.
- [11] *Archaeology*, 1992.
- [12] *Archaeometry*, 1988.
- [13] *Asian Perspectives*, 1976, 1995.
- [14] *BioScience*, 1970.
- [15]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1958.
- [16]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991~2011.
- [17]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89.
- [18]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63.
- [19]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7~2011.
- [20] *Early China*, 1978, 1991.
- [21] *Economic Botany*, 1975~2001.
- [22] *Essays on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1982.
- [23] *Evolution*, 1973.
- [24] *Geoarchaeology*, 1994.
- [25] *Japan Review*, 1992.
- [26]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88~2006.
- [27]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990.
- [28]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98~2010.
- [29]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995~2008.

- [30]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4.
- [31]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0, 1999.
- [32]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974, 1996.
- [33]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991, 2009.
- [34]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987, 1998.
- [35] *Lithic Technology*, 1993~1999.
- [36] *Man*, 1977, 1987.
- [37] *Mid-Continental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76, 1977.
- [38] *Monthly Review*, 1966.
- [39]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Research Report*, 1985.
- [40] *Nature*, 1987, 2006.
- [41] *Nature Reviews*, 2000.
- [42]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1998.
- [43] *North American Archaeologist*, 1995.
- [44] *Oryza sativa*, 1998, 2008.
- [45] *Palaeohistoria*, 1968 .
- [46]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944.
- [47]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iological Sciences*, 1999.
- [48] *Plains Anthropologist*, 1993.
- [49] *Plant Breeding Reviews*, 2001.
- [50] *Plant Science*, 2008.
- [51]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 1991~2005.
- [52]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4~2009.
- [53] *Quaternary Research*, 1986.
- [54] *Radiocarbon*, 1989.
- [55]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1995.
- [56] *Science*, 1964~2006.

[57]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70.

[58]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66~1976.

[59]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995.

[60] *The Holocene*, 2000.

[61]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977.

[62] *Time*, 2000.

[63] *World Archaeology*, 1972~1999.

索引

A

阿布胡赖拉遗址 114
 阿布维利手斧 198
 阿里·科什(Ali Kosh)遗址 299
 阿穆德洞穴 290
 阿诺德 350
 阿切人 282-284, 287
 阿斯旺水坝工程 605
 阿休利手斧 198, 199
 阿休利文化 198, 214, 292
 阿兹特克人 22, 42, 415
 埃尔曼 280
 埃及学 5, 6
 艾萨克 211, 214
 爱国主义精神 7
 爱因斯坦 20, 26, 55, 334, 397
 安德森 321, 323
 安卡拉浮选机 300
 安山岩 140
 安特生 18, 22, 42, 424, 502
 氨基酸外消旋法 190

昂格尔 299
 凹缺器 179, 173
 敝都 80, 81
 奥博格 101, 337
 奥布里 93
 奥代尔 45, 151, 213
 奥德姆 324
 奥哈罗 II 遗址 291
 奥康奈尔 283
 奥林索斯 7
 奥谢 362
 奥匈帝国 9

B

巴策尔 324
 巴恩 383, 455, 462, 463, 488, 489
 巴尔奥兹 289
 巴尔萨斯(Balsas)河谷 308
 巴尔-约瑟夫 161, 222, 290, 466
 巴黎文物博物馆 7
 巴芝丹文化 199
 白庙(White Temple) 467

- 百色手斧 186, 199, 200
 柏济利阿斯 25
 班图人 8
 半坡遗址博物馆 606
 半锥体 170
 邦国 29, 33, 63, 471
 孢粉 66, 109, 110, 112, 117, 230, 247, 254, 306, 308
 鲍斯曼 180
 北京人 150, 164-166, 171, 184, 189-191, 201-203
 北京人遗址 142, 150, 167, 189
 北京猿人 142, 187, 189, 190, 192, 207
 贝蒂 18, 41
 贝弗里奇 384
 贝丘遗址 112, 113
 贝廷杰 281, 320
 贝冢 66, 111, 301
 背景考古学 106
 本德 313-315
 本格 8, 37
 比较动物学 542, 545
 比较语文学 93
 毕克卷转虫 229
 编年史学 6, 56, 205, 220
 变质岩 157
 标准化石 139
 标准器物 159
 冰川时代 111
 病理学 110, 114, 310, 543, 555
 波金斯 149
 波普 96, 158
 帛书 79
 亳都 81, 451
 博厄斯 30, 31, 405, 418, 495, 497, 498, 503
 博尔德 118, 140, 142, 205, 210, 213, 220, 222
 博塞洛普 13, 21, 32, 45, 263, 269, 309
 捕食理论 284
 布朗 196
 布朗族 266
 布雷德伍德 297, 298, 280, 309, 316
 布列吞人 93
 布伦菲尔 546
 布罗代尔 79, 82, 84, 89, 403, 493
 布瓦耶 523
C
 彩陶 19, 22, 42, 241, 244, 260, 261, 502, 530, 546, 550, 561
 蔡斯特 304
 残渍分析
 残渍分析 151, 152, 236, 242, 261, 307
 操作链 146, 147, 213, 219, 177, 209, 215, 220
 草鞋山文化 250
 草鞋山遗址 248, 253, 254, 361
 查科峡谷 579
 查尼尔(Channel)岛 157
 昌昌(Chan Chan) 466
 巢县人 187, 188, 190
 车马器 427, 440
 城市国家 337, 444, 445, 468, 469, 496
 传播论 11, 21, 22, 32, 42, 46, 83, 95, 122, 197, 324, 325, 502
 传统学派 11, 387, 398

- 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 165, 184, 206
- 锤击法 143, 146, 167, 170, 171, 179, 209
- 绰墩遗址 561
- 次生国家 366
- 次生驯化 316
- D**
- 达尔文 5, 7, 87, 94, 319, 321, 334, 398, 455, 505
- 达尔文进化理论 8, 34
- 达尔文主义 22, 42
- 达格代尔 93
- 打制实验 216, 218, 219, 220
- 大洞遗址 155
- 大津巴布韦 8
- 大荔人 195, 201
- 大石片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 165, 206
- 大汶口文化 347, 531, 555
- 大伊山遗址 531
- 丹吉里亚 322
- 丹麦国家古物博物馆 7
- 丹尼尔 7, 42, 59, 96, 97, 102, 103, 390, 391
- 氮同位素 113
- 道格拉斯 109
- 等级社会 34, 358, 365, 419, 458, 528
- 等离子发射光谱法 115
- 迪布尔 143, 147
- 迪克逊 522, 525, 572
- 笛卡儿 13, 20
- 地心说 21, 40
- 地域国家 444, 445, 468, 469, 516, 515
- 地质学 31, 91, 94, 97, 109, 110, 118, 140, 204, 222, 271, 390
- 帝国时代 8, 71, 89, 370, 588
- 第二次革命 496
- 第四纪地质学 140, 204, 205, 222
- 蒂卡尔 140, 158
- 电子自旋共振(ESR) 189
- 淀粉颗粒分析 307
- 丁村遗址 146, 150, 173, 203-205, 208, 209, 223
- 丁村遗址群 141, 150, 204, 207-209, 218, 221
- 丁卡人 62
- 丁考兹 111
- 定海古城街区 609
- 东山村遗址 248
- 动植物遗骸分析 260
- 洞穴壁画 120, 522, 544, 549
- 杜尔哥 493
- 对偶婚 257, 264
- 敦煌研究院 108
- 多线演进 30, 418, 497
- E**
- 俄亥俄河谷 354
- 恩布林 465
- 二里岗文化 372, 373, 377, 512-514, 516
- 二重证据法 6, 16, 36, 92, 388, 392, 393, 399, 424, 450, 452, 455, 518
- F**
- 法国革命 7
- 法医学 114
- 反山墓地 562
- 泛阿拉伯主义 10
- 范皮尔 142

- 范文澜 368, 411
 方国 33, 71, 347, 434, 437, 500
 腓尼基人 8
 腓尼基人文化 391
 废片分析 143, 168, 175, 178, 213
 费侠莉 24, 49, 50
 分节社会 476
 分式 57
 分析测试技术 25, 50
 分子遗传学 316, 318
 封建社会 34, 410, 411, 416, 417, 495
 封建制 411, 416, 417, 422, 447

 封泥 79
 奉食(serving) 244
 佛尔斯脱 573
 佛教 421, 526, 527, 542
 弗雷泽 523
 弗里德 34, 342, 354, 416, 419, 499, 527
 弗里曼 142
 浮选法 25, 26, 51, 52,, 69, 112, 232, 294, 299-301, 303, 304, 327
 福尔塞姆尖状器 197
 福柯 55, 56
 父系氏族社会 257
 妇好墓 113, 426, 437, 443, 552, 559
 妇姘墓 438, 437, 552
 复活节岛 111, 341, 579, 580, 582, 583, 587, 593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 270
G
 高性能液相层析法 201
 哥白尼 21, 40
 哥本哈根 7
 格雷伯纳 197
 格里弗斯 148
 格林威尔 17
 个人宗教 267, 525, 530-532, 572, 572
 更新世学 140, 222
 功能论 22, 30, 42, 56, 66, 69, 95
 共产主义社会 34
 共振背散射 240
 古 DNA 153, 319
 古埃及 10, 29, 346, 382, 450, 463, 485, 488, 509, 510, 521-524, 526, 530, 546, 588
 古不列颠人 390
 古迪 483
 古典古物学 5
 古典考古学 6
 古尔德 100
 古国时代 71
 古脊椎动物学 198, 204, 304
 古器物学 6
 古人类学 140, 185, 186, 196, 204, 221, 222
 古生态学 140, 222
 古生物学 5, 31, 34, 87, 95, 140, 190, 204, 222, 505
 古史辨派 11, 397, 398
 古文献学 6
 古文字学 369, 453
 古希腊 5, 36, 391, 421, 458, 484, 495, 526
 顾颉刚 11, 387, 393, 396, 397, 404

- 观念论 21
 观念论 14, 15, 40, 47, 48
 观念主义 22, 40, 47, 314, 501
 光谱测定法 114
 光释光 110
 广谱经济 112, 236, 242, 263, 278, 293
 广谱物种 285, 293
 硅藻 230, 247
 簠 375, 376, 440
 郭沫若 84, 334, 411, 412, 414, 428, 445
 国际名胜古迹联合会 600
 过程论 22, 42, 48, 56, 66, 69
H
 哈德斯蒂 324
 哈迪 153
 哈里斯 355, 379, 407, 551, 565
 哈伦 317
 含氟量 110
 旱地农业 245, 246, 271, 279, 294
 豪厄尔 146
 豪格 581
 和县人 186, 188
 河姆渡博物馆 606
 河姆渡文化 240, 251, 253, 256, 264, 275, 366
 河姆渡遗址 256, 268, 272, 274, 559, 560
 河南龙山文化 371-376
 荷马史诗 391
 盃 373, 374, 376, 440
 赫尔贝克 299
 赫胥黎 19
 黑陶 19, 240, 241, 531
 黑曜石 140, 157, 158, 219, 461
 黑耀石水合法 110
 痕量元素 84, 114, 115
 红山文化 345, 347, 530, 579
 红铜时代 95, 483
 后过程论 22, 42, 56
 后过程模型 314, 315
 后勤移动 154, 238
 后现代主义思潮 13, 21, 46, 405, 501
 胡佛 13, 490
 胡厚宣 412, 414, 424, 431, 445
 湖居遗址 111
 花厅遗址 531
 花园庄遗址 432, 451, 514
 华北细石器文化 164
 化学元素周期表 20, 44
 怀疑论 43
 环境决定论 13, 20, 32, 45, 312, 321, 342, 402
 环境考古学 69, 85, 110
 黄现璠 412, 446
 霍德 56, 64, 314, 315
 霍尔 311
 霍加斯 6
 霍克斯 42, 266, 281-283, 287, 320, 519, 567
 机会主义 81
J
 基督教 5, 10, 421, 526
 基尔霍弗 153
 基利 213
 基诺族 266

- 吉德炜 414, 431, 433, 434, 438, 446, 435, 528
- 极端经验主义 13, 17
- 极端民族主义 9
- 极端相对论 48
- 极端相对主义 47, 49, 501
- “集食-栽培者”(collector-cultivator) 240
- “集食者”(collector) 239
- 技术决定论 13, 21, 32, 45, 418
- 家户考古学 265
- 家居群体(household group) 144
- 贾湖遗址 236, 268, 275, 531
- 伽利略 21, 40, 334
- 钾氩法 110
- 简牍 79
- 翦伯赞 411
- 交流压力 353
- 教会宗教 267, 525, 526, 572
- 阶层社会 34, 146, 264, 340, 383, 410, 411, 416, 419, 465, 478, 495, 499, 564, 566
- 杰罗 537, 556
- 结构考古学 86, 402
- 今文经学 387
- 金芭塔丝 557
- 金牛山人 188, 189, 195, 201
- 金石学 4, 6, 390, 391, 424, 425
- 金文 6, 79, 392, 407, 436, 438, 484, 506, 517, 533, 552
- 进化论思想 4
- 近代西方史学 11
- 竞争宴享理论 269, 270, 313
- 旧石器时代遗址 10, 141, 150, 164, 177, 184, 204, 206, 208, 209
- 锯齿状器 169, 173, 174, 177, 179, 181, 183
- 聚落考古学 11, 69, 85, 131, 133, 265, 346, 457, 508, 511, 605
- 军国主义 9
- 军事民主制 343, 473
- 均变说 98
- ## K
- 卡顿-汤普森 8
- 卡内罗 338, 339, 341, 358, 505, 488
- 卡契计划 603
- 卡塔尼奥 152
- 喀斯特地形 581
- 凯尔特人 390
- 凯尔特人文化 391
- 坎恩哈桑(Can Hasan)遗址 300
- 砍斫器文化圈 184
- 康基 537, 541
- 考古科技 107, 111, 119
- 考古学导论 7, 29, 57, 465, 478, 480-482, 497
- 考古学史 3, 53, 65, 135, 384, 389, 508, 540
- 考古学思想史 3, 15, 56, 58, 66, 91, 94, 95, 97, 130, 135, 395, 457, 496, 501
-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 60
- 匭河-丁村系 165, 184, 206
- 科迪 419
- 科恩 263, 310
- 科技考古学 107, 109, 119
- 科林伍德 14, 21, 22, 41, 42, 47, 394,

- 395
- 科西纳 9, 22, 42, 97
- 克巴拉洞穴 290
- 克拉克 63, 68, 90, 100, 111, 121, 122, 146, 205, 211, 260, 324, 401
- 克莱姆 97
- 克兰丁斯特 100
- 克劳福德 301, 322
- 克雷布特利 218, 219
- 克利斯蒂安森 340
- 克罗伯 96
- 克钦人 527, 533
- 客观主义 14, 17, 23, 31, 38, 39, 503
- 孔德 13, 20, 43, 493, 550, 566
- 孔子 442, 526
- 口述传统 94
- 库恩 55, 56, 64, 122, 148, 154, 399, 400, 406
- 夸富宴 235, 243, 245, 246
- 跨湖桥文化 240, 245, 246
- 魁拉那奎兹(Quila Naquitz)洞穴 305
- L
- 垃圾堆理论 321, 322
- 拉曼光谱实验室 115, 242, 247
- 莱曼 63
- 赖特 310, 340
- 兰克 17, 31, 39, 510
- 兰克学派 17, 31, 39, 495, 503
-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108
- 蓝田人 191, 194, 201
- 朗代尔手斧工业 207
- 劳斯 57, 62, 431, 457, 458
- 老子 526
- 勒瓦娄哇技术 160
- 雷丁 269
- 黎凡特 237, 289, 291, 482
- 李鸿哲 412
- 李学勤 6, 11, 382, 392, 396, 426, 450
- 里凯蒂 493
- 理查森 310
- 利比 66, 110, 122
- 利古里亚人文化 391
- 砾石砍砸器 139
- 粒子诱发 X 射线荧光分析(PIXE) 115
- 梁启超 6, 16, 403
- 梁思永 425
- 梁钊韬 102, 103
- 两极裂片 168, 172
- 裂变径迹法 110, 190, 198
- 林定夷 45, 380, 397
- 林多斯 323
- 林惠祥 102
- 林耀华 102
- 陵阳河遗址 531
- 刘鹗 424
- 刘易斯 325, 469, 476
- 柳江人 194, 195
- 龙骨山 18
- 龙南遗址 273
- 龙山文化 19, 240, 250, 331, 347, 372, 375, 376, 451, 480, 512-515, 531, 557, 564, 566
- 卢伯克 8
- 吕振羽 81, 82, 84, 334, 396, 411
- 绿洲理论 309
- 罗伯逊 301

罗家角遗址 248, 251-253, 256, 257
 罗林生 391
 罗马俱乐部 589
 罗马时期 7
 罗萨马查伊(Rosamachay)洞穴 298
 罗塞达碑 84, 98, 100, 103
 罗森 143, 144, 158, 443, 568, 571, 572
 罗思曼 350, 479, 504, 524
 罗振玉 424, 428

M

马鞍山遗址 151
 马坝人 188, 194, 195
 马德拉 290
 马尔萨斯理论 588
 马格德林人 549
 马胡德尔 93
 马家浜遗址 248, 250, 252, 255, 266, 267
 马家窑文化 480, 483, 555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86, 88, 89, 402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11, 410
 马库斯 341, 520, 527, 528, 581
 马桥文化 272, 274, 558, 584
 马桥遗址 273, 274
 玛雅文明 63, 111, 521, 580-582
 埋藏学 21, 46, 112, 150, 155, 166, 207-209, 216, 217, 222, 223, 247
 迈克弗 8
 麦克阿瑟 280, 287
 麦克里斯顿 311
 麦克尼什 298, 299, 460
 麦奎尔 479, 504, 525
 曼格尔斯多夫 298

芒福德 469, 474, 476
 梅塞尔斯 444
 门捷列夫 20, 44
 蒙古人种 194-196, 200
 蒙特柳斯 58, 59, 92
 孟德尔 20, 44
 秘鲁维鲁河谷 65, 456
 民族意识 9, 10, 14, 21, 43, 395
 民族主义 4, 7, 9, 71, 185, 398, 607
 民族主义考古学 4, 10
 明德冰期 10
 铭刻学 6, 93
 莫尔蒂耶 94, 120, 205
 莫氏线 184-186, 197, 199, 206, 223
 莫斯特工业 205, 207
 莫斯特人 94
 莫斯特文化 142, 153, 173
 莫维斯 184, 198
 墨菲 551, 564, 565
 母系氏族社会 256, 257, 264

N

纳粹 9, 22, 42
 纳尔逊 96, 323, 540, 545, 546
 纳哈尔厄伦(Nahal Oren)遗址 300
 南方丝绸之路 570
 内格尔 32, 54, 73, 74, 101, 490, 491, 500
 尼安德特人 120, 290, 321
 泥河湾半山遗址 141
 泥河湾石器地点 214
 年代测定 25, 50, 108-110, 122, 151, 167, 187, 190, 191, 202, 298
 年代学分析 22, 42, 83, 86

- 年鉴学派 89, 89, 402
 牛顿 19, 334, 398
 奴隶制国家 369, 409, 413
 努尔人 62
 女权主义 537, 538, 540
 女性考古 540
O
 欧文 57, 431, 457, 458
 欧洲中心主义 413
 偶发驯化 323
P
 派克 281
 盘庚迁殷 428, 429
 盘龙城 515, 516
 庞加莱 23, 40, 393
 泡沫浮选机 300, 301
 培根 37, 38
 佩里格林 481
 砷砒法 146, 209, 219
 皮特里 8, 58, 92, 507
 皮亚杰 37, 160
 拼合研究 144, 145
 平城宫遗址 608
 平等社会 34, 246, 351, 352, 357, 363, 364, 366, 367, 479, 499, 561, 563, 486
 平斯文遗址 144
Q
 栖居形态 124, 131, 133, 153, 154, 222, 460
 齐家文化 347, 483
 奇穆(Chimu)王国 466
 启蒙运动 4, 93, 94, 390, 493, 595
 器物类型学 11, 26, 52, 92, 211, 381
 器物排列方法 109
 乾嘉学派 387
 青莲岗文化 249, 250, 252, 253
 青铜礼器 427, 440, 442, 443, 483, 514, 517, 533, 442564
 青铜神树 568, 571, 578
 邱城遗址 248, 253, 255
 裘锡圭 426
 全球化 35, 52, 106, 518, 593
 群体宗教 267, 526, 527, 531, 533, 534, 572
R
 热动力系统 30, 418, 498
 热释光 110, 189, 190, 251
 人口决定论 13, 21, 32, 45
 人口压力理论 356, 269
 人口压力说 263
 人类生态学 324-326
 认知考古学 86, 223, 520, 528
 日本考古遗产管理 601
 日耳曼人 390
 容观复 102-105, 345
 软锤 139, 143, 198, 199
S
 萨布洛夫 64
 萨林斯 32, 30, 34, 65, 101, 485, 486, 499
 萨满教 267, 525-528, 530-532, 572-575
 三阶段文化进化模式 29
 三内丸山遗址 606
 三星村遗址 560
 三星堆文化 347, 521, 567, 568, 570-

- 572, 575, 576, 578
- 沙利文 143, 144
- 山顶洞人 201
- 山西峙峪遗址 164
- 商博良 391
- 商文化 62, 80, 371, 373-377, 430, 449, 450
- 上高森遗址 10
- 上山遗址 244, 268
- 舍利人 94
-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270, 275
- 社会进化论 11, 29, 33, 34, 410, 411, 417, 423, 463, 495
- 身份考古学 86
- 绳纹人 200, 303
- 绳纹时代 319, 322, 606
- 圣经 5, 7, 10, 93, 109, 192
- 尸乡沟商城 377
- 施赖伯 405
- 施奈德 322
- 石斧 91, 92, 158, 251, 555
- 石核剥片 143, 148, 170, 210
- 石器微痕 84
- 实验考古 218
- 实验考古学 21, 46, 84, 235, 313
- 实用技术 481-483, 491
- 实证论 44, 69, 97, 493
- 实证主义 4, 13, 20, 24, 43, 44, 46-51, 501
- 史记 368, 375, 489, 528
- 试错法 20, 45
- 手斧文化圈 184
- 狩猎采集经济 238, 256, 264, 269, 271, 276, 278, 294, 356
- 舒特勒 160
- 树木年轮 110
- 顺从程序 598
- 司母戊(后母戊)方鼎 437, 552
- 斯波尔丁 60
- 斯蒂纳 287-289, 291, 293, 310
- 斯堪的纳维亚 66, 109, 111, 493
- 斯密 417
- 斯佩克 537, 541
- 斯坦诺 92
- 斯坦因 342, 343
- 锶 113
- 崧泽遗址 255, 361, 273, 560, 561
- 宋兆麟 102
- 苏秉琦 33, 60, 71, 333, 454, 455, 489, 532
- 苏联进化论 495
- 苏联考古学 11, 213
- 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 410, 495
- 梭鲁特人 94
- 索安文化 199
- 索尔 270, 300, 308, 323
- 索撒尔 444
- 泰勒 29, 30, 64, 65, 68, 121, 122, 354, 524
- T
- 谈边文化 199
- 碳-14 117, 162, 230, 250, 251
- 碳同位素 84, 113, 557
- 陶土 79, 92, 114, 240, 261, 262
- 特化坎河谷 271, 305
- 特怀尼 93

- 特殊性研究 28, 30-32
 藤村新一 10
 体质人类学 9, 93, 195, 196, 202, 439, 554
 天皇 9
 天文学 369, 404, 436, 465, 497
 条顿人文化 391
 铁器 93, 94, 109, 391, 411, 449, 475
 廷德尔 20
 通则(generalization)研究 28
 同位素 113, 261, 354, 547
 头人社会(big-men societies) 486, 499
 投石索 148
 图拉(Tula)遗址 144
 图腾 440, 544, 570, 576
 土壤粒度分析 228
 土壤学 110, 271
 托尔特克人 8
 托伦斯 179, 180
 托马斯 8, 55, 115, 122, 399, 400, 406
 托什 218
W
 瓦哈卡(Oaxaca)河谷 305
 瓦维洛夫 316, 317
 外国考古学史 3, 53
 晚期智人 184, 193, 195, 196, 200-202
 汪宁生 102, 103, 265, 266
 王城岗遗址 375, 451
 王汎森 452
 王国时代 71
 王国维 36, 388, 392, 393, 404, 424, 428, 450, 452, 453, 502
 王湾三期文化 376, 480
 王懿荣 424
 王因遗址 555
 威尔士人 8
 微痕分析 115, 149-152, 175, 177, 179, 211, 213, 215
 微痕研究 11, 151, 213
 微量元素 84, 113, 254
 圩墩遗址 248, 252, 253, 257, 272
 唯物论 21, 29, 34, 211, 407, 418, 501
 唯物主义 13, 17, 20, 40, 45, 47, 68, 89, 411, 501, 505
 唯心论 21, 34
 唯心史观 21, 40
 维生人群 431, 458
 尉迟寺尧王城 531
 文化财保护法 598
 文化功能观 110
 文化进化论 30, 33, 94, 494, 495, 497
 文化区 9, 60, 62, 66, 97, 132, 184, 250, 254
 文化区系类型 19
 文化群 9, 97, 142
 文化遗产登记清单 604
 文化资源管理 598
 文献学 6, 25, 51, 387, 393, 399, 404, 424, 450, 452-455, 485
 文艺复兴 4, 5, 56, 595
 沃伦 57
 沃森 100, 292, 300
 巫覡 440, 444, 527, 528, 573, 575-578
 吴家埠遗址 253
 吴汝康 186-188, 192-194, 200, 205
 五帝时代 33, 347, 486, 499, 500

- 五四运动 11, 24, 50, 404, 424
- 物质文化史研究院 11
- 物种起源 7
- X
- 西亳说 378
- 西弗特 159
- 西蒙诺夫 213
- 西山遗址 473, 474
- 西水坡遗址 531
- 西瓦伊人 355
- 西学东渐 11, 23, 24, 50, 56, 90, 109, 403, 454, 500
- 西阴村 12, 77, 391
- 希伯来 5, 10, 526
- 希尔 350
- 希弗 217
- 希克 218
- 希拉夫(Siraf)遗址 300
- 希瓦托特拉(Xihuatoxtla)岩洞 308
- 细石器文化 164-166, 183
- 虾夷人 200
- 下七垣遗址 432, 514
- 夏民族 374, 381, 443, 576
- 夏商周断代工程 331, 335, 369, 370, 375, 377, 381, 404
- 夏娃理论 186, 192, 193, 195, 196, 200-202
- 袄教 421, 526
- 籼稻 256, 319
- 显赫技术 244, 481, 482, 534
- 显赫物品 357, 474, 475, 481, 482, 487, 516
- 线粒体 DNA 192, 194, 201
- 线粒体 DNARF 114
- 相对主义 4, 14, 16, 21, 46-48, 51, 538
- 象形文字 92, 462, 391, 506
- 象征考古学 266, 402
- 象征主义 314, 577
- 小长梁遗址 141, 147, 170
- 小黄山遗址 244
- 小南海文化 164, 165, 167
- 小南海遗址 164, 165, 177
- 小石制品工业 207
- 小双桥遗址 80, 430, 451
- 孝民屯遗址 432
- 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48
- 新史学 400, 402-404
- 新文化运动 11, 387, 404
- 新仙女木事件 311
- 新砦遗址 372
- 形而上学 38, 43
- 性别考古学 86, 538, 539, 540, 541, 548, 554, 556
- 休谟 20, 43
- 徐旭生 368, 371
- 许家窑人 201
- 许家窑文化 165
- 许家窑遗址 164
- 许倬云 437, 454
- “寻食者”(forager) 239
- Y
- 压制技术 139
- 雅典不列颠学派 6
- 雅思贝尔斯 526
- 亚当理论 201
- 亚里士多德 492

- 亚述学 5, 6
 偃师商城 80, 377, 378, 379, 429, 430, 451, 516
 演绎法 13, 20, 32, 43, 44-46, 69, 335, 342
 仰韶文化 102, 472, 473, 513, 514, 531, 550, 564
 瑶山墓地 561
 耶茨 445
 冶金术 88, 93, 480, 481, 483, 485
 一般性研究 28, 31-33
 伊比利亚人文化 391
 伊甸园 5
 伊利亚德 574
 伊斯兰 10, 421, 526
 伊斯兰运动 10
 伊希 96
 遗传学 84, 110, 114, 192, 194, 200-202, 316, 547
 遗址博物馆 600, 606
 遗址解释会 606
 疑古派 11, 369, 387, 396, 397
 疑古思潮 6, 11, 387-389, 398, 424, 450, 454, 485
 以色列考古学 10
 以色列人 8, 10
 艺术史 3, 6, 10, 436, 438, 441, 450, 454, 552, 567
 意大利 5, 18, 41, 97, 148, 287, 288, 468, 589
 因纽特人 94, 99
 殷墟文化 426, 429
 印第安土著 8, 22, 42, 95, 96, 101, 196, 456, 544
 印加人 22, 42, 130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8
 硬锤 139, 143, 197, 198, 219
 尤班克斯 318
 犹太复国主义 10
 犹太教 493, 526
 铀系法 110, 187, 189, 190
 有孔虫 228, 229
 玉玦 251, 255, 361, 532, 560, 561
 原生国家 366
 原生驯化 316
 原始平等社会 339, 345, 411, 473
 约翰逊 93, 217
 越城遗址 248, 560
 郟县人 191
 耘田器 274, 365
乙
 砸击法 145, 167, 170, 171, 175, 179, 183, 208
 砸击技术 143
 灾变论 5
 扎格罗斯 297, 309
 章太炎 404
 整体考古学 106
 郑亳说 378
 郑州商城 80, 377, 378, 429, 430, 445, 451, 516
 直线进化论 94, 96, 417, 418, 496, 552
 植硅石 110, 112, 115, 254-256, 274, 290, 306-308
 植物残渍 153
 峙峪遗址 206

- | | |
|--|------------------------------------|
| 中程理论 21, 46, 85, 98, 99, 102-104, 333 | 专门驯化 323 |
| 中国文化西来说 22, 42 | 专业人群 431, 458, 466 |
| 中石器时代 94, 111, 113, 149, 165, 284-287, 293, 295, 419, 546, 605 | 紫外线荧光 140 |
| 种族主义思潮 4, 8, 22, 42 | 宗教考古 10 |
| 周口店北京人文化 165 | 邹衡 369, 373, 376, 378, 430, 445 |
| 周口店第1地点 142, 150, 151, 164 | 走出非洲 186, 192, 193, 200, 201 |
| 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 165, 206 | 组构 60 |
| 轴心时代 526, 529, 534 | 最佳觅食理论 282-284, 287, 319, 320, 321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

Frontiers of Archaeology:
Theories and Issues

ISBN 978-7-303-20186-0



9 787303 201860 >

定价：158.00元